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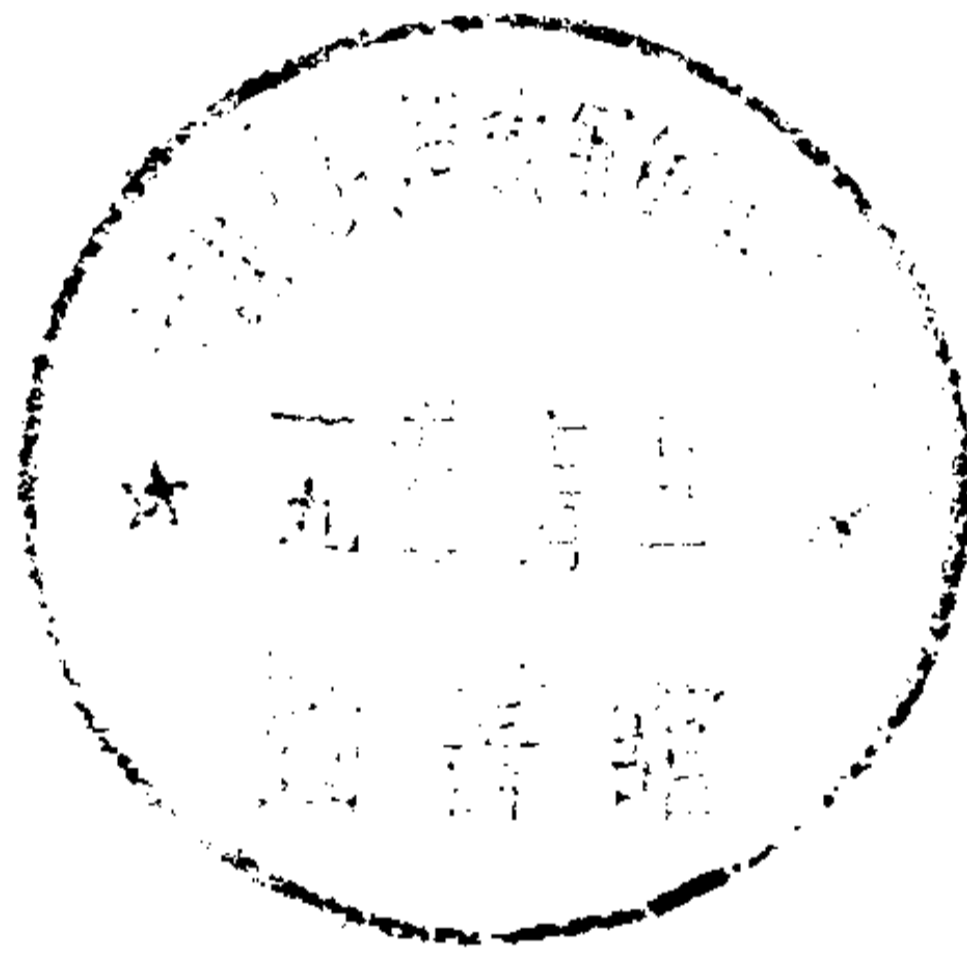


尼赫魯自傳



尼赫魯自傳

張寶芳譯



世界知識社

1956年·北京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獻 給
已與世長辭的
卡 麥 拉



中譯本序言

知道我的自傳要用中文出版的消息，我很高興。這本書是我二十多年前在監獄中寫成的，其中所講的許多事情在今天看來也許沒有多大趣味了。在這二十年中間，在全世界，在亞洲各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然而，敘述一下我們爭取自由的經過情形，以及這種鬥爭如何影響我和我的千百萬同胞，對於別人來說或許還是有点用處的。這種敘述將使別人對我們在進行鬥爭時的印度情況，以及當時我們的心情，有所認識。

每一個國家必須安排自己的命運，用自己的方法來找尋走向自由和充分發展的道路。印度在聖雄甘地的偉大領導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本書雖然是一個個人的敘述，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關於一個國家的鬥爭的敘述。因此，本書可能增進國外許多朋友的認識。在過去幾年中間，時事的发展使中印兩國人民彼此更加接近起來，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希望我這本書對於增進這種了解，對於加強我們兩大國以及兩大國人民之間的團結能有所幫助。

賈瓦哈爾·尼赫魯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於新德里



序

本書除后記和某些不关重要的改动外，全部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监牢里写成的。当时从事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有一定的事可做——这在监牢生活漫长的孤寂中是很必要的，并且回顾一下过去在印度發生的、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使自己能够清楚地認識这些事情。在开始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就抱着自省的心情，并且自始至终相当保持着这种心情。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有意识地准备写给人家看的意思。假如我曾经想过讀者的話，这些讀者就是我自己的男女同胞。要是写給外国讀者看，我的写法可能就不同，选择不同的重点，把本書中輕輕放过的問題着重地加以說明，而对其他一些詳細討論的問題則一笔帶过。这些講得很詳細的事情，有許多也許是外国讀者不感兴趣的，也許他們認為并不重要，也許認為事情很明白，用不着討論。然而我却認為这些事在今天的印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有些地方談到我們國內的政治和人物，外边的人也許对这些很少感兴趣。

我希望讀者記住：這本書是在我一生中特別苦難的時期內写成的，因而显然帶有这个时期的痕迹。假如在更正常的情况下写這本書，写法可就不同了，也許在某些地方能够更含蓄些。可是我決定讓本書保持原来的面貌，因为正由于這本書代表我写作时期的感情，也許会使別人感到兴趣。

我的企圖是尽我的力量追叙我自己的認識發展的过程，并不


在于概述印度近代史。本書表面上很像在概述印度近代史，因而难免使讀者看得過重。我得向讀者鄭重聲明：本書中的敘述完全是片面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從自己出發。許多重要的事情完全沒有談到，許多左右時勢的重要人物也很少提起。要是真正概述過去的事情，這種寫法是不可原諒的，但是個人的敘述卻可以請求讀者加以諒解。凡是想認真研究印度近代史的人只好去找別的資料。但是本書以及其他的個人記述也可以幫助他彌補不足，對事實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我坦白地議論我的一些同事，我和他們共事多年，我對他們抱有極大的敬意。我又批評了各種集團和個人，有時批評得相當嚴厲，可是我沒有因為這種批評而減少對他們的尊敬。我認為凡是從事公共活動的人們，他們互相間，以及對於他們所服務的公眾，必須開誠相見。假使彼此想求得真正的了解，想對我們大家面臨着的問題獲得真正的認識，那就用不着表面上的客氣，用不着逃避各種令人難為情或痛苦的問題。大家必須認識分歧點和共同點，正視事實，不管這些事實怎樣令人不愉快；真正的合作必須建築在這種基礎上。我所寫的東西對於任何個人都沒有惡意或反感。

我故意避免討論印度今天的問題，即使有時談到也講得很籠統，而且是从側面來談的。我在監牢里無法把這些問題搞透徹，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應該怎麼辦。就在出獄後我也並不認為在這些問題上值得再添寫什麼。添寫的東西似乎跟我已經寫的東西不調和。因此，這“自傳式的敘述”依然是一種個人關於過去事情的、隨筆式的、不完全的紀錄，靠近“現在”的邊緣，但小心地避免接觸“現在”。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於巴登威勒城



目 录

中譯本序言

序

第一章	从克什米尔南下	1
第二章	童年时代	7
第三章	神智学.....	13
第四章	哈罗和剑桥.....	19
第五章	回国和印度战时政治.....	31
第六章	結婚和喜馬拉雅山中的探險.....	43
第七章	甘地來訪.....	46
第八章	出境及其后果.....	55
第九章	农村漫游.....	63
第十章	不合作运动.....	71
第十一章	一九二一年和第一次入獄.....	84
第十二章	非暴力主义与武力政策.....	92
第十三章	勒克瑙地方監獄	101
第十四章	又一次出獄	110
第十五章	怀疑和冲突	117
第十六章	那布哈插曲	123
第十七章	科坎拿大会議和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	132

第十八章	我的父亲和甘地	140
第十九章	教派主义猖獗	151
第二十章	市政工作	160
第二十一章	在欧洲	167
第二十二章	印度的糾紛	176
第二十三章	布魯塞爾的被压迫民族大会	182
第二十四章	回到印度，投身政治活动中	188
第二十五章	挨打的經驗	201
第二十六章	总工会	206
第二十七章	空中雷声	215
第二十八章	独立和独立以后	227
第二十九章	和平抵抗运动开始	236
第三十章	在內尼獄中	245
第三十一章	耶拉伏达会谈	256
第三十二章	联合省的抗稅运动	266
第三十三章	父亲的死	278
第三十四章	德里协定	282
第三十五章	喀喇蚩大会	294
第三十六章	南方休假	307
第三十七章	休战期間的摩擦	312
第三十八章	圓桌會議	324
第三十九章	联合省农村中的糾紛	336
第四十章	休战状态的終止	353
第四十一章	逮捕、特种法令和剝夺人权	362
第四十二章	胡說八道	367

第四十三章	在巴勒里和台拉·頓兩獄中	380
第四十四章	獄中心情	392
第四十五章	監獄里的动物	401
第四十六章	斗争	409
第四十七章	宗教是什么?	420
第四十八章	英国政府的“双重政策”	432
第四十九章	長期徒刑結束	448
第五十章	訪問甘地	453
第五十一章	自由主义联盟的观点	464
第五十二章	自治領地位和独立	473
第五十三章	新旧印度	485
第五十四章	英国統治的实际情况	493
第五十五章	文明結婚和字体問題	514
第五十六章	教派主义和反动势力	524
第五十七章	难关	542
第五十八章	地震	551
第五十九章	阿利波尔監獄	564
第六十章	东方和西方的民主	570
第六十一章	凄凉	577
第六十二章	自相矛盾	589
第六十三章	感化或者强迫	614
第六十四章	再进台拉·頓監獄	633
第六十五章	十一天	641
第六十六章	回到監獄	647
第六十七章	几件近事	654

第六十八章 尾声	679
五年后	684

附 录

(一) 独立日誓詞	703
(二) 关于和平条件的建議	704
(三) 紀念的決議	706



第一章 从克什米尔南下

“一个人写自己的事是一个好题目，同时也是一个难题目。讲自己的坏话时自己心痛，讲自己的好话时读者听了刺耳。”

——亞伯拉罕·柯萊

有钱人家的独子是容易宠坏的，在印度尤其是这样。如果一个独子长到了十一岁还没有弟弟或妹妹，他很少有不宠坏的希望。我的两个妹妹比我年轻得多，我们彼此间的年龄相差很大。我在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孤寂的孩子，没有同年的伴侣。我甚至没有小学同学，因为我不上幼稚园或初级小学，我的教育是由家庭教师负责的。

我们的家不是一个清静的地方，依照印度家庭的习惯，我们家中有很多堂兄弟和近亲。不过我的堂兄们的年龄比我大得多，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他们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不能跟他们一起工作或一起玩。因此在那个偌大的家庭里我很寂寞，一个人胡思乱想，独来独往。

我们祖籍克什米尔。两百多年前，在十八世纪初我们的祖先离开了山区来到富饶的平原追求名利。那时正是莫卧儿王朝式微的时代，奥朗则布死了，法鲁克西尔做了皇帝。我们的祖宗名叫拉·考尔。当时他在克什米尔是有名的梵文和波斯文学者。在法

魯克西尔皇帝巡視克什米尔时，他曾受这位皇帝的垂青。大概由于皇帝的示意，他全家在一七一六年时迁居京城德里，皇帝賜給他一塊采地和一幢房子，这块地和房产坐落在运河岸边，所以他的名字添上了“尼赫魯”（从Nahar“运河”这个字轉来）。考尔本来是名，所以就变成了考尔—尼赫魯。到后来考尔这个名不用了，我們只單称尼赫魯。

我們这一家在以后的动蕩不定时期內經歷过許多变化，产业一天比一天减少終于完全丧失了。我的曾祖父拉克什米·納拉延·尼赫魯是薩克尔公司駐在德里皇帝宫廷的首任代表。我的祖父干迦·德哈·尼赫魯在一八五七年大暴动前曾經当过德里的市長，一八六一年去世，死的时候还很年輕，只有三十四岁。

一八五七年大暴动使我們这一家和德里断絕了关系。老家長期保存的文件在暴动中全部被毀了，我們这一家几乎丧失了全部财产，跟着成群結队的难民离开旧日的京城到亞格拉去。当时我的父亲还没有出世，可是我的两个伯父已經是青年人了，并且懂得一点英文。这种英文知識使我的二伯父和其他几个家人逃脫了突然的灾难。二伯父帶着他的妹妹和几个家人从德里逃出，在路上遇到了几个英国兵。我的姑姑像一些克什米尔孩子一样，生長得很秀丽。英国兵便疑心我的这位小姑姑是英国人，說我伯伯拐走了她。在那些日子里，从控訴到定罪往往只是几分鐘的事情，我的二伯父和那几个家人險些兒被这些英国兵在附近的树上吊死。幸亏我二伯父懂英文，能同英国兵打交道，爭取了一点時間，那时恰好有一个認識他的朋友路过那兒，把他和其他几个家人救了出来。

我們这一家在亞格拉住了好几年。我父亲就是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在那兒誕生的[⊖]。我的祖父在我的父亲出世前三个月就死

了，所以我的父亲是个遗腹子。我們家中保藏有一張祖父的小画像，他穿着莫臥兒王朝的朝服，手中拿着一把弯劍，虽然面貌显然是克什米尔人，可是有人把他認成是莫臥兒貴族。

当时維持一家人的重担落在兩位伯父的肩头上。他們比我父亲年紀大得多。大伯父班西·德哈·尼赫魯不久进入英国政府的司法部，以后被派到各地任职，和家中其余的人很少往来。二伯父南德·拉尔·尼赫魯在一个印度邦政府中服务，在拉其普他拿邦开脫里省当过十年的大官，后来研究法律，在亞格拉当律师，我的父亲住在他家里，由他照料。他們兩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像兄弟又像父子。我的父亲是小兒子，祖母十分寵爱他。祖母是一位逞强的老太太，別人不能随便輕視她。她虽然死了將近五十年，可是到現在克什米尔老太太們仍然記得她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太婆，如果誰惹了她，那可不得了。

二伯父在新成立的高等法院当律师，后来高等法院从亞格拉迁移到阿拉哈巴，他一家也跟着搬去。从此以后，阿拉哈巴就成为我們的家乡了。許多年后，我在阿拉哈巴誕生。二伯父的業務日益發达，后来成为高等法院律师領袖之一。同时我的父亲則先后在康波尔和阿拉哈巴兩地讀書，他起初只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直到十三、四岁时才开始学英文。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人家称他为优秀的波斯文学者。他又懂点阿拉伯文，深为許多年長的人所器重。虽然他在知識方面表現了早熟的現象，他在学校里却是以爱玩出名的。他算不得模范学生。他喜欢玩而不太喜欢好好地讀書。他在大学里被認为是搗乱分子的一个領袖。当时除加尔各答与孟买等

⊙ 印度詩人泰戈尔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是有趣的巧合。

大城市外，印度人着西裝，學洋派的人很少，可是我父親却喜歡着西裝，學洋派。雖然他的行為不免狂妄，他的英國教授卻喜歡他，常常幫助他擺脫困難。他們喜歡他的性情，他又很聰明，只要偶然努力一下，就可以把功課作得相當好。後來他常常帶着敬愛的心情跟我們談起他的一位教授——在阿拉哈巴的慕爾中央學院院長哈利遜先生，並且還很小心地保藏着這位教授當時寫給他的一封信。

他考過了大學各種考試，成績不算特別好，以後參加學士學位的考試。他事先並沒有下工夫好好準備，對於自己的第一場考試也並不滿意。他認為第一場考糟了，這次考試沒有考取的希望，於是決定不再去參加其餘的考試，而到泰姬陵去玩（大學考試當時在亞格拉舉行）。後來他的教授叫他去，並且對他大發脾氣，說他第一場考得相當好，其餘各場不去考，簡直是個大傻瓜。父親的大學生活從此結束，他始終沒有畢業。

他急于自謀生活，找職業。他當然希望從事法律業務，因為在當時的印度，法律方面的職業是有才學的人的唯一出路。他的哥哥又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他參加高等法院律師考試，不僅考上，而且考了第一名，得了一枚金質獎章。他找到了他心愛的事業，或者可以說，他很想在自己選擇的職業中出人頭地。

父親在康波爾實習了三年後便轉到阿拉哈巴高等法院工作。不久他的哥哥南德·拉爾突然死了，這件事對於我的父親是一個嚴重打擊。因為南德·拉爾的死，對我父親個人來說，他喪失了一個待他幾乎同慈父一樣的親愛的哥哥。對整個家庭來說，這一家失去了家長和主要賺錢養家的人。從此以後，維持這樣一個大家庭的重担主要落在他年輕的肩頭上。

他一心一意地工作，希望能有所成就。有好几个月，他除工作外其他的事一概不过问。过去打官司时请我二伯父当律师的人，现在有诉讼案时几乎都来找他。由于他办事的成绩不错，所以他很快就实现了他所抱的在律师业中露头角的希望，事情多了，收入也随之而增加。他在早年就成为一个名律师，因而越来越变成了法律的奴隶。他没有时间从事其他公私活动，甚至在假期和节日也埋头于律师业务。当时国大党受到懂英语的中产阶级的注意，父亲去参观过国大党几次早期的会议，在理论上相信国大党，但当时他对国大党的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的业务很忙。除此以外，他对于自己在政治上和公共事务上的立场还没有把握。他过去对这些事情不大注意，了解的不多。对于任何运动和团体，如果他在其中只能充任配角，他都不想参加。童年时代和早期少年时代横冲直撞的精神表面上被压下去了，可是另外用一种新的形式——争取权力的新要求——表现出来。这使他的律师业务蒸蒸日上，同时增加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喜欢斗争，喜欢在困难中斗争。但是说来奇怪，他当时却避免政治活动。诚然，国大党那个时候的政治活动很少斗争，然而这方面的活动对于他还是生疏的，同时他的律师工作很忙。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成功的梯子，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他认为这并不由于别人的提拔或帮忙，而只靠自己的意志和本领。

从广义方面看，父亲当然是民族主义者，可是他羡慕英国人和英国人的风俗习惯。他认为本国同胞堕落了，自作自受。对于那些只会空谈而不实干的政客们，他心里不免有点轻视，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政客们除空谈外能够做些什么。此外，他自己的工作很顺利，他便从此有一种想法，他以为许多搞政治的人（当然不

是所有搞政治的人)都是沒有出息的人。

由于收入不断增加，我們的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多变化。收入增加了，花錢也就更多。父亲不想存錢，他以为存錢的想法就是表明他沒有随时尽量賺錢的本領。他爱玩，喜欢过好的生活，所以錢虽然賺得不算少，花完也很容易。我們的生活方式一天更比一天欧化。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早期的家庭情况[⊖]。

[⊖] 我是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阿拉哈巴誕生的。



第二章 童年时代

我童年时代的生活是一种不用自己操心的、平静的生活。我听成年的堂兄们谈话，不能全部听懂。他们的谈话常常涉及英国人以及欧亚混血种人对待印度人所表现的那种神气活现的、带有侮辱意味的态度。他们说印度人不应容忍这种态度，而应起来反对。当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常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被人充分加以讨论。每次英国人因杀了印度人而受审讯时，总由英国法官宣告无罪释放。火车上总有几个车厢保留给欧洲人，无论车上怎样拥挤——火车上多半挤得厉害——这些保留的车厢即使空着也不让印度人去坐。火车上不是预先订座的车厢也往往被英国人独占，不准印度人进去。公园中及其他公共场所的长凳和椅子是保留给欧洲人坐的。我痛恨印度境内外国统治者这种无理取闹的举动，因此每次看见印度人反抗这种举动时我很高兴。我的堂兄或他们的朋友往往有人参加这种冲突，那时候我们当然很激动。有一个堂兄是我们这一家的好汉，他专门找机会跟英国人吵架，尤其是跟欧亚混血种人吵架；这些混血种人大概为了表示他们和统治者是一类人罢，往往比英国官员和商人还要盛气凌人些。这种冲突多半发生在乘火车旅行时。

我虽然痛恨在印度的外国统治者和他们的举动，但是我对个别的英国人并没有恶感。我家中曾请过英国女教师，我有时也见

到我父亲的英国朋友。在我的心里我还羡慕英国人。

每天晚上总有許多朋友来看父亲。他过了一天的紧张生活后，趁这个时候轻松一下，全家都听见他那宏亮的笑声。他的爱笑在阿拉哈巴是有名的。有时我从帘后偷看父亲和他的朋友，想打听一下他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谈些什么。如果当场被发觉了，他们就把我拉出去，叫我坐在父亲的膝上，这使我很害怕。有一次我看见父亲喝红葡萄酒或其他什么红酒。我认得威士忌酒，我常常看见他跟朋友们喝这种酒。可是这种新的红红的东西却使我充满了恐怖，于是我跑去告诉母亲，说父亲喝血。

我非常佩服我的父亲。我认为他的精力、勇气和聪明远超出我所见过的一切人，我希望自己将来长大了能够赶得上他。我虽然敬佩他，可是也害怕他。我看见过他对仆人和其他的人发脾气，当时觉得他很可怕。他那样对待仆人，吓得我发抖，同时也使我愤慨。他的脾气真可怕，在后来几年中间我也没见到过像他那样的坏脾气。幸亏他有强烈的幽默感和铁的意志，能够控制自己。年纪大了一些，这种自制力就越强，因此他就很少像过去那样大发脾气了。

现在还记得他曾经有一次对我大发脾气，当时我只五、六岁。有一天我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枝自来水笔，我眼红了。我心里打算父亲不会同时用两枝笔，因此我就拿走了一枝。后来我看见他到处找那枝笔，想起自己所干的事，不由得害怕起来，可是我沒有招认。后来发现是我拿走了那枝笔，父亲大发雷霆，把我痛打一頓，我感到深刻的痛苦和惭愧，跑到母亲那儿去，她用各种油膏接連在我身上擦了好几天。

虽然父亲这次处罚了我，但是我并不怀恨在心。我当时认为

这种处罚有道理，不过太重些。我对于他的尊敬和钦佩虽然还像过去那样强烈，可是其中却带有一种恐惧心理。对于母亲就不相同。我不怕她，因为我知道不论我作了什么事，她总会原谅我。而且正因为她盲目地溺爱我，所以我总欺着她几分。我跟她见面的时间比我跟父亲见面的时间多些，她似乎跟我更接近些，我常常对她讲知心话，这些话我从来不会对父亲讲的。母亲身材矮小，我很快就长得同她一样高，我觉得我不仅同她平等，而且比她强些。我惊叹她的美丽，爱她那小巧秀丽的手和脚。她是新从克什米尔迁来的人，她的家人是两代人以前离开故乡的。

我早年还另外有一个知己，就是我父亲的秘书慕巴拉克·阿里。他出身于巴多的世家。一八五七年的变乱使得他家破人亡，他家里的人有一部分被英国军队杀掉了。经过这次苦难后，他对于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孩子们，十分和气，有耐心。在我不高兴或有困难的时候，我总求助于他。他的鬍子斑白，在我年轻的眼中看来，这表示他年高德劭，经历过很多东西。我常常挨着他，睁大了眼睛，听他讲各种故事——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其他的故事，或者一八五七年及一八五八年所发生的事情。若干年后，我成年了，他才去世，现在我回想起他来，仍然觉得亲切可贵。

我又听过母亲和伯母常常给我讲的古代印度神话罗摩衍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叙事诗上的种种故事。我的二伯母读过很多印度古书，讲起故事来总是滔滔不绝，因此我具有关于印度神话和民间故事相当丰富的知识。

我对于宗教的认识相当模糊。我以为这是娘们的事。父亲跟堂兄们总不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老是采取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家中的妇女不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对这些事情虽然也学家中

成年男子那种不在乎的态度，可是心上倒也喜欢。有时我陪母亲或伯母到恒河去洗澡，有时我們参拜阿拉哈巴、貝拿勒斯或其他地方的寺庙，或去看一个据说很有道行的印度教苦行者，可是这一切在我心里很少留下什么印象。

那时每年有些盛大的节日。迎春节这一天全市狂欢，人們可以互相潑水玩。灯节这一天家家户户点瓦灯。黑天誕辰节庆祝克里西娜夜半在監獄中誕生(可是我們很难守到半夜)。恒河神节和罗摩萊拉节則举行游行，演出古代拉麦錢德拉及他征服楞伽的故事，看的人很多。所有的小孩也去看穆哈蘭节打着旗子游行，紀念胡桑与胡賽恩在阿拉伯的悲惨故事。在伊斯蘭教兩個大节日里我父亲的秘書阿里穿上他最漂亮的衣服到大清真寺去禱告，我到他家去吃甜面条和其他好吃的东西。此外印度教徒的日历上还有一些比較小的紀念节日，如印历五月半、八月半等姊妹节。

在我們和别的克什米尔人中間还有几个特殊紀念节，是其他大多数印度教人不大庆祝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山伐底”历的元旦节，这一天大家穿上新衣服，年輕的人还可得些拜年錢。

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节日却是一年一度由我充当主角的节日——我的生日。这一天我很兴奋。一清早我就被放在一架大秤上，跟一袋袋小麦和别的物品对秤，秤完了后，就把这些东西分發給穷人。于是我穿上新衣，領受各种礼物，以后就举行餐会。我自己覺得是中心人物。我主要的遺憾是生日一年只有一次，未免太少了。我曾經鬧着要多做生日。在那个时候我可不認識，將來有一天，一提到生日就令人想起老之將至而感到难过。

有时全家到远处去参加我的堂兄或其他远亲、朋友的婚礼，这正是我們小孩子們所喜欢的旅行，因为在婚礼期間，各种規矩都放

松了，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作客的親友們往往擠着住在一起，每家都帶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這時我不會再開寂寞了，我們痛痛快快地玩着鬧着，有時挨長輩的罵。

印度人結婚，不論是有錢的人或貧窮的人，都很浪費和奢侈，這是大可非議的。除開浪費外，那種俗不可耐的排場，既沒有藝術價值，也不美觀，看了使人難受（不用說也有例外）。在這方面，真正的罪人是中產階級。窮苦人也跟着奢華，有的人甚至因為結婚而負了一身債。有人說窮苦人的貧困是他們的社會習慣所造成的，這種說法是荒謬透頂了。要知道窮人的生活非常沉悶、單調，間或遇到有機會吃喜酒，唱唱歌，就無異在沙漠中遇到水草一樣，解除了他們枯燥的生活。他們很少有笑的機會，誰還忍心奪去他們這種安慰呢？盡量避免浪費，減少奢侈（“浪費”和“奢侈”這種字眼用於窮人的小排場實在不恰當），可是不要把他們的生活弄得比原來更枯燥，更乏味才好。

中產階級也是如此。撇開浪費和奢侈，參加婚禮吃喜酒是難得的社交機會，久別難逢的親戚朋友趁這個機會可以會面。印度是一個大國，朋友很不容易相逢，要許多朋友同時聚在一起尤其困難，因此參加婚禮吃喜酒的風氣很流行。就社交的意義而言，可以跟參加婚禮相比擬，而且在許多方面超過參加婚禮的就只有政治性的集會了。

跟印度（特別是印度北部）其他的人相比，克什米爾人有一種優點：他們的婦女沒有幽居的風氣。他們遷居印度平原後，看見這種風氣到處流行，便也學上了，可是也只在跟“非克什米爾人”來往時才如此。當時在大部分克什米爾人居住的印度北部，這被認作表示社會地位的標志。在克什米爾人自己中間則保持着男女交際

的自由，凡是克什米尔人都可以随意走进任何其他克什米尔人的家里。克什米尔人在祝祭和节日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妇女往往坐在一条长凳上。青年男女间的来往，地位总是相当平等的。至于现代西方的自由，他（她）们还没有。

我的早年就是这样过去了。有时家里发生争吵，这种事情在大家庭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吵得太凶了，传到父亲的耳里，他生气了，认为这些都是娘儿们干的胡闹。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只看见大家讲话的神气不对头，或彼此互相不理睬的举动，觉得一定出了事。我很不愉快。父亲一出来干涉，把我们大家骂一顿。

有一件童年时代的小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七、八岁。我每天出去骑马，由一个驻在阿拉哈巴的骑兵陪着我。有一天晚上，我跌下马来，马——一匹好看的，有一半阿拉伯血统的马——单独跑了回去。父亲正在打网球，家里登时起了一阵惊乱，于是打网球的人由我父亲率领，乘各种车辆出发找寻我。他们在半路上遇见了我，把我看成是仿佛我完成了一番英雄事业似的。



第三章 神智学

当我十岁的时候，我們一家搬到一所更大的新房子去。这幢房子，我父亲命名为“極乐园”，有大花园和游泳池。我一进去就不断發現一些新的东西，心里感到很高兴。当时还在添造新房子，我很爱看工人们工作。

新房子里有一个大游泳池，不久我就学会了游泳，在水中十分舒服。在又長又热的夏天，我一有空就到游泳池去泡一下，一天少不得要去好几次。到了晚上，父亲的許多朋友到游泳池来。这原来是一种新玩意。装在游泳池和房子里的电灯当时在阿拉哈巴算是最新式的。我在游泳时拚命寻开心。我最高兴的是把那些不懂得游泳的人推一下，或拉一把，吓吓他們。我特別記得薩普魯博士当时还是阿拉哈巴律师界的后輩。他不懂游泳，又不准备学。他老是坐在十五英寸深的水里的第一級踏脚石上，不肯再进一步到第二級踏脚石上去。要是有人硬要推他，他就大喊大叫。我父亲算不得游泳家。可是他咬紧了牙关，用尽了气力勉强游过全池。

当时波尔战争正在进行。我很关心这次战争，我完全同情波尔人。我开始看报，想要知道些战争消息。

那个时候恰好家里有一件事吸住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小妹妹的誕生。很久以来我見到别人有兄弟姊妹，而我自己一个也沒有，因而暗中感到难过。一想到自己终于有一个弟弟或妹妹，真高兴

得很。父亲当时在欧洲。我记得为了这件事在阳台上等得很心焦。医生过来对我说，小毛头生下来了，还取笑着说，不是一个将来要跟我分家产的男孩子，想必我心里很高兴罢。我一想到有人竟至于猜测我会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不由得恼怒了。

父亲到欧洲去旅行在印度克什米尔的婆罗门人中间引起了风波。他回来以后，不肯举行滌罪仪式。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人潘迪特·比森·纳拉扬·达尔（他后来当了国大党主席）到英国去当律师。他回来后虽然举行了滌罪仪式，可是正统派的婆罗门人却不肯跟他来往，他被摈弃了。结果婆罗门人内部分裂成声势几乎相等的两派。后来年轻的克什米尔人到欧洲去读书，回来后参加改良派，但只有正式举行滌罪仪式后才能参加。这种仪式本身很滑稽，很少宗教意味，这无非表示服从集体的意志。举行了这种仪式后，每个人就可以从事各种异端的活动，跟非婆罗门人，跟不信印度教的人来往，一起吃饭。

父亲更进了一步，他不肯举行任何仪式，甚至不肯在表面上、形式上迁就一下滌罪仪式。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不少人附和父亲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派。在几年中间，由于观念的改变，原来的禁令废弛了，这三派又逐渐团结起来。有许多克什米尔的男女青年到欧洲去读书，回来后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问题。除了少数正统派的人士（主要是老太太）外，饮食方面的限制几乎全部取消了。克什米尔人跟非克什米尔人，跟穆斯林，跟非印度人共同吃饭的事已经是司空见惯。妇女幽居的风气，就在克什米尔人跟外面的人打交道时也再见不到了。造成这种情形的最后推动力量是一九三〇年的政潮。跟外族人通婚的风气，到今天还不流行，虽然这种事例一年比一年多。我的两个妹妹都

嫁給非克什米尔人。我們家里有一个青年最近娶了一个匈牙利少女。反对跟外族通婚并非根据宗教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种种关系。許多克什米尔人想保持本族的性格和我們显著的雅利安族人的特点，深怕在印度和非印度的人海中丧失了这种性格和特点。在这广大的国土里，我們的人数是很少的。

在近代，到西方各国去游历的克什米尔的婆罗門人大約要算一百年前的摩汗·拉尔王公是第一个。当时他是德里教会学校一个年輕的高材生，被选为波斯語翻譯，随同英国代表团到喀布尔去。后来他周游中亞細亞和波斯，每到一个国家，总設法娶一个新太太，所娶的女人往往出身高貴人家。他变成了穆斯林，在波斯娶了皇家的一个女子，从而取得了“王公”的称号。他又游历了欧洲，謁見过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他写了人人爱讀的回忆录和旅行記。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一位名叫斐迪南·勃魯克斯的家庭教师来管教我。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他的母亲是法国人或比国人。他是一个精明的神智学家，由安尼·白山特夫人介紹給我父亲。他跟我相处將近三年光景，在各方面都給了我很大影响。当时我还另外有一个教师，就是那一位可爱的年老的潘迪特，他教我的印地文和梵文。費了几年的心血，他教給我的少得很，我只能把我可憐的梵文知識跟我后来在哈罗所学的拉丁文相比。这只能怪我自己。我不善于学語言，对文法一門也不感兴趣。

勃魯克斯提高了我的讀書欲。我讀了很多英文書，可是沒有一定目的。我熟讀兒童文学，路易斯·卡罗尔的作品是我爱讀的。此外还有“叢林集”、“克謨”等書。我很喜欢古斯塔夫·多萊替“吉訶德先生”一書所作的插画。南森的“遙远的北方”給我开辟了冒

險的新世界。我記得讀過司各脫、狄更斯和薩克萊的小說，韋爾斯的愛情小說，馬克·吐溫以及福爾摩斯的小說。“普達的囚犯”一書使我拍案叫絕。杰羅姆的“一舟三人”在我看來是幽默小說中的傑作。另外還有一本我特別記得很清楚的書就是莫利爾的“脫立爾倍”，還有“彼得·伊波森”。我又對詩發生了愛好。後來我在各方面都有了變化，可是對於詩的愛好仍然沒有改變。

勃魯克斯又誘導我研究科學。我們東拼西湊地布置了一個小小的實驗室，我常常在那里消磨長久的時間，津津有味地做基本物理和化學實驗。

除開學習外，勃魯克斯還給了我一種新的影響，在一個時期內這種影響對我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是神智學。他經常在他的房間里舉行神智學者的周會，我也參加，因此逐漸熟悉了神智學上的術語和思想。在這些周會中，有關於玄學的辯論，有關於再生、幽靈和其他超自然的東西、靈氣、業報的討論。在討論時不僅提到勃拉瓦茨基夫人及其他神智學者的巨著，還談到印度教的經典，佛教的法句，畢達哥拉斯，泰那的阿坡洛利愛斯以及各派的哲學家和神祕論者。會上所講的話我大部分聽不懂，可是聽來很神祕，很動人。我覺得打開宇宙秘密的關鍵在這裡。我生平第一次開始有意識地仔細考慮宗教和別方面的問題，更加重視印度教。我所重視的並不是印度教的儀式部分，而是它的幾部大著作如“奧義書”[⊖]和“薄伽梵歌”。我不了解這些書，不過覺得它們很神妙。我夢想星體，幻想着飛到老遠的地方去。這種不用什麼機器高飛天空的夢，在我一生中的確時常做。這種夢有時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好像廣

⊖ “奧義書”(Upanishat)是印度哲學論叢之一。——譯者

闊的田野橫在我的下面。我不知近代闡釋夢的學者如弗洛伊德等人怎樣解釋這種夢。

白山特夫人在这个時期在阿拉哈巴游歷，曾就神智學問題發表了幾次演說。她的口才深深地使我感動。我听了她的演講回來，便昏昏然如在夢中。我當時雖然年僅十三歲，決定加入神智學會。我去請求父親的允許時，他笑嘻嘻地答應了。他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並不重視，參加或不參加都無所謂。我對於他的缺少熱情不免感到有點兒難受，雖然我認為他在許多方面都是那麼偉大，可是在精神方面他却有缺點。事實上他是老神智學者，當勃拉瓦茨基夫人在印度的時候，他就加入神智學會了。入會的動機大約不是由於宗教，而是由於好奇心罷，因此不久他就退出會。但是有些跟他一起入會的人堅持下去，在會里爬得很高，擔任要職。

我在十三歲時就當了神智學會的會員。白山特夫人親自替我舉行入會儀式。儀式中有訓話，有神秘記號的傳授，這種神秘記號大概是古代秘密結社的遺迹。這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參加貝拿勒斯的神智學大會，見過美髯的沃尔科特老上校。

一個人要認識自己三十年前少年時代的神情和思想，並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我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我研究神智學的時期，我養成了一副表現虔誠的死板板的面孔，這種面孔在男女神智學者中間是常常看得見的。我抱着高人一等的心情，未始不自得其樂。可是對於跟我同年紀的青年男女，我當時一定是一個不受人歡迎，令人討厭的友伴。

自從勃魯克斯離開以後，我跟神智學沒有接觸。經過非常短的時期，神智學就跟我的生活完全絕緣了（一部分原因是去英國上學）。可是我却明白認識跟勃魯克斯相處的歲月給我留下一個很

深刻的印象，我应当感激他，感激神智學。可是從此以後，我對神智學者的敬重心減少了。他們似乎並不是什麼優秀分子，而是一些平常人。他們喜歡安全，不愛冒險；喜歡輕鬆工作，不愛烈士的命運。可是對於白山特夫人，我總表示熱烈的欽佩。

影響我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激發了我的熱情。我每天等着看報上的新消息。我買了許多關於日本的書，並且讀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對於日本歷史弄不清楚。可是喜歡古代日本武士道的故事以及小泉八雲美妙的散文。

民族主義思想充滿了我的心懷。我念念不忘印度和亞洲擺脫歐洲的束縛，取得自由。我夢想着勳績，我拿着劍，為印度而戰，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

我十四歲的時候，家中發生了變化。我的堂兄們已經離開大家庭，自己單獨成家立業了。新鮮的思想和隱約的幻想浮起在我的心頭。我開始對異性比較感到一點興趣了。可是我还是喜歡跟男孩子在一起。我認為跟女孩子廝混有損我的尊嚴。然而有時在並不缺少漂亮女孩子的克什米爾人宴會場所及其他地方，異性的眉眼或接觸也不免使我心動。

一九〇五年五月，我們搭船去英國，那時我才十五歲。父親、母親、小妹妹和我四人一起去。



第四章 哈罗和劍桥

將近五月底的一天，我們从多維尔坐火車到倫敦，在車上看見報上所載日本海軍在对馬大勝的消息，我的兴致很高。第二天恰好賽馬，我們便去看賽馬。我記得我們到倫敦不久就遇到安沙利，他当时是一个漂亮聪明的青年，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当时在倫敦一家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

我进哈罗公学有点僥幸，因为我当时十五岁，略略超过普通的入学年龄。我的父母和妹妹到欧洲大陆去旅行，几个月后便回印度。

我从来不曾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人群中过，我感到孤單而且想家。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过去了。我努力設法适应学校生活。讀書和玩也使我够忙的。可是我不是一个真正能适应这种生活的人。我总有一种不能完全跟他們打成一片的感觉。他們对我也一定有同样的感觉。我多少有点孤独的感觉。可是总的說来，我充分参加各种运动，大家还承認我并不是一个偷懶的人。

起初我因为拉丁文不好，插在低年級，可是不久就升級了。在若干科目，尤其在一般知識方面，我比那些和我同年龄的同学强。我的兴趣的确比大部分同学更广博，我讀的書和報紙比他們多。我記得我曾經写信給我父亲，說大多数英国学生多么呆板，只能談談游戏。然而也有例外，尤其是当我升到高年級的时候。

一九〇五年底举行大选，自由党大胜。我很关心这次大选。一九〇六年初，我們的級任老师問了我們一些关于新政府的问题，結果使他大吃一惊，全級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答出許多材料，其中包括坎伯尔一班涅曼內閣全部閣員的名單。

除政治外，早期航空事業的發展也引起了我的爱好。当时是萊特兄弟和山多斯·杜蒙(不久法曼、雷沙姆、勃萊乐等人繼之而起)的时代。我曾經兴高彩烈地从哈罗写信給我父亲，說我也許不久能够在周末坐飞机回印度去探望他。

我在哈罗讀書时，那兒有四、五个印度学生。我跟別院的印度学生很少来往。可是巴洛达王子有一个兒子却跟我同院，他比我大几岁，是以玩板球出名的。他在我进去后不久就离开了。后来卡普沙勒大君的長子帕拉易特·辛格进来了，完全格格不入，不快活，不能跟其他学生来往，他們时常拿他和他的行为寻开心。这使他很气惱。有时他对这些学生說，如果他們到卡普沙勒去，他將对他們不客气。这种話并不能使其他学生对他好些。他曾經在法国住过些日子，講得一口流利的法国話。可是，英国公学教外国語的方法很奇怪，他虽然講得很好的法語，可是在法語班上他却并不怎样出色。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怪事。半夜时，舍监忽然来到我們每个人的房間，进行仔細搜查。我們打听到了情由。原来帕拉易特·辛格丢了一根柄上鑲金的手杖。那次搜查什么結果也沒有。兩三天后，伊頓和哈罗兩個学校举行运动比賽，不久就在原主的房間里發現了那根手杖。显然有人在运动場上用了手杖，然后送了回来。

我們本院和別院有几个犹太人。他們相处很好，可是学校里也存在着反犹太的情緒，他們受大家的白眼。不久我也不自覺地

認為抱有反犹太的情緒是應該的。我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犹太人，在以后的年代里，我还有许多好的犹太朋友。

我逐渐熟悉哈罗，喜欢那个地方。可是不知怎样我开始觉得哈罗落后了。我羡慕大学。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兩年中間，从印度傳来的消息激动了我的心。我在英国报上讀到的消息真太少。然而就是这很少的一点消息也足以表明在祖国，在孟加拉，在旁遮普，在瑪哈拉什特拉这些地方正在發生重大事件。拉吉巴特·拉伊和亞吉·辛格被驅逐出境，孟加拉似乎在动乱中，鉄拉克的名字时常出現在从浦那拍出来的电报上。提倡国貨，抵制外貨的运动展开了，这一切使我很激动。然而我在哈罗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他談談这些問題的人。在放假的日子里，我会到了我的堂兄或别的印度朋友才有机会談談心。

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績优异得了獎，獎品是杜維廉所作的关于加里波的的叢書中的一本。这使我喜欢得很，不久我又得了叢書中另外兩本，便把那些書上关于加里波的故事，全部仔細加以研究。种种憧憬出現在我的眼前，仿佛印度出現了同样的功迹，为爭取自由而进行英勇的斗争。在我的心里，印度跟意大利联系在一起。哈罗这个地方似乎太小，这种思想沒有發展的余地。我要到大学更广大的环境中去。因此我取得了我父亲的同意，在哈罗讀了兩年就离开了，比一般学生在哈罗讀書的年限短得多。

我离开哈罗是出于自願。可是我記得很清楚，临走的时候，我很难过，流了眼泪。我相当喜欢这个地方，一旦走开，結束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时期。然而我不了解离开哈罗感到难过的心情真实到什么程度。难道一部分的原因不是哈罗的傳統要求我这样做嗎？我受了这种傳統的影响，我有意不去反抗这种傳統，使自己跟那兒

的環境調和。

一九〇七年十月初，我進劍橋三一學院，當時我十七歲，或者更正確地說，快十八歲了。我當了大學生，比在中學自由得多，可以干我要干的事，因此我感到興高采烈。我擺脫了童年時代的束縛，終於覺得自己算是成人了。我帶着得意的神氣在劍橋的院裏和狹窄的街上走來走去，一遇見熟人就滿心歡喜。

我在劍橋住了三年，這三年是平靜而愉快的，這期間，我結識了許多朋友，逐漸擴大了我的知識範圍。我選擇了化學、地質學和植物學這三門自然科學。可是我的興趣却不限於這三門。我在劍橋，或假期內在倫敦及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人中間，有許多人談論書籍、文學、歷史、政治和經濟，講得頭頭是道。我開頭對於這種相當高深的談話，有點望洋興嘆的感覺。可是我讀了一些書過後就摸着了一些門路，至少不會暴露出我對於一般問題完全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討論尼采（他的思想當時在劍橋很流行），蕭伯納的序言和洛斯·狄更生的新著。我們自以為懂得人情事故，用高尚的態度，談論性和道德問題，隨意提到伊凡·布洛克、哈維洛克·愛里斯、克拉夫脫·愛平、奧托·惠寧格等。我們自己覺得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論了解，已經有了專家以外任何人所應具有的知識了。

儘管我們高談闊論，我們大多數人在涉及性問題時，却很胆小。至少我就是這樣。一直到我離開劍橋之後，在許多年中間，我的知識只限於理論方面。為什麼如此呢？這很難於回答。我們多數人關心性問題。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是否有人把罪惡觀念跟性問題連在一起。我沒有這樣想過，宗教的禁忌一點也沒有。我們談着性，認為這是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的。雖然如此，一種怕羞的心理和對於普通所用的方法的反感使我避免兩性間的風流韻事。在

那些时候，我确实是一个害羞的青年，这种害羞心理的来源大约是我幼年过了孤独生活。

我当时对生活的一般态度有点近于享乐主义。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青年的本性，一部分则受了奥斯伽·王尔德和沃尔德·斐德的影响。把追求安乐的生活和愉快的经验这种欲望称作享乐主义是方便而且称心的。可是享乐主义在当时却含有另外的意义。因为我并不特别想慕安乐的生活，我当时没有宗教的兴趣，而且还厌恶宗教的压制，因此我想寻找另外的标准。我很粗枝大叶，对于事情没有深入研究。生活中的爱美吸引了我，我希望把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不要过庸俗的生活，但是尽量利用生活，使生活过得丰富。我享受生活，不愿把生活看作一个罪恶问题。同时冒险事业打动了我的心。我像父亲一样，带有一点赌徒的性格，开头用钱赌，后来为了更大的输赢使用生活上较大的问题来赌。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的印度政治是处在动乱的状态中，我想在政治上表演一个勇敢的角色，这样一来就不容易过安适的生活了。这些互相牵连，有时候还互相冲突的念头在我心里搅在一起。可是我并不苦恼，因为要打定主意的时候还很远。同时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愉快，各方面的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广，要做的事很多，要看的東西也很多，许多新的道路需要探索。在漫长的冬夜，我们坐在火爐边，从容不迫地讨论各种问题，直到深夜爐火快要熄灭了，我们才哆嗦着上床去睡。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因为争论起劲，讲话不免慷慨激昂，然而这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我们对于各种人生问题，采取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还不是现实问题，我们还没有卷入世界大漩涡里。这是二十世紀初期大战前的世界。不久这种世界就要消失，给全世界的

青年帶來了死亡、毀滅、痛苦、悲傷的另一種世界就要出現了。然而這種前景，却被未來之幕遮蓋着，當時我們認為周圍太平無事。這對於有辦法的人是很愉快的。

我談到享樂主義之類，談到當時影響我的各種思想。然而如果以為我當時已經把這些問題想得很清楚，或者我在當時對這些問題必須弄個清楚，那就錯了。這些問題只不過是在我心上浮現過的隱約的幻想，在這過程中，便多少留下一些印象。我從不費心思去推測。工作、運動和娛樂使我的生活很忙，只有印度的政治鬥爭有時打擾了我。我在劍橋所讀的書有許多在政治方面影響了我。麥萊德斯·湯森德的“亞洲和歐洲”就是這許多書中的一本。

從一九〇七年起，印度紛紛擾擾好幾年。印度不俯首貼耳地對外國的統治屈服，表現出鬥爭精神，這從一八五七年暴動以來還是第一次。關於鐵拉克的活動以及他判罪的消息，關於亞拉文陀·哥斯的消息以及孟加拉民眾認真提倡國貨和抵制外貨的消息使我們在歐洲的印度人全都感到激動。我們差不多沒有例外全都是鐵拉克派，或者照新黨在印度的稱呼，是極端派。

在劍橋的印度人組織了一個團體叫“麥利斯”[⊖]，我們經常在那裡討論政治問題，可是各種爭論都有些不切實際。我們並不致力於討論問題的本身，反而致力於模仿國會和大學學生會的作風。我常到麥利斯去，可是三年中間，我很少在那裡發言，我沒有克服我的害羞心和缺少自信心。我在學校辯論會中也有同樣的毛病。這個辯論會里有一條規則，凡是整個學期不發言的會員應該罰款。我常常付這種罰款。

⊖ 按即會議的意思。——譯者

我記起了爱德文·蒙塔古(他后来当了印度事务大臣)常常參觀我們的辯論会,他是三一学院的老同学,当时是劍桥区的国会議員。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信仰的新定义:就是相信你的理智認為不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的理智贊成了那种东西,那就不会發生盲目信仰。我受了大学里科学研究的影响,懂得几分当时科学所具有的可靠性,因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科学,跟今天的科学不一样。那个时代的科学对于科学本身,对于世界都很拿得稳。

在辯論会中,在私人談話中,印度学生每逢討論印度政治問題时,往往用極端的話。他們甚至用贊美的口吻,談到当时在孟加拉开始發生的暴力行为。后来我發現这些人將來要当印度的文官,高等法院的法官,庄严稳重的律师等。这些激昂慷慨的論客中,后来很少有人切实参加印度的政治运动。

当时曾經有几个著名的印度政治家到劍桥来看过我們。我們敬重他們,可是我們的态度中还帶点自命不凡的神气。我們覺得我們的文化广些,我們看事情的眼光远大。到劍桥看过我們的有貝平·錢德拉·佩尔、拉吉巴特·拉伊、郭克雷等人。我們在一間休息室里會見了佩尔,当时出席的不过十二人,可是他跟我們講話时,提高嗓子大叫,仿佛他是在向一万人的群众大会發表演說。会上的声音嘈杂,我聽不清他講些什么。拉吉巴特·拉伊跟我們講話时很得体,他的演說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写信告訴父亲,說我喜欢拉吉巴特·拉伊的演說,而不喜欢貝平·佩尔的演說,这使他很高兴,因为他当时并不喜欢佩尔。郭克雷在劍桥一次公开集会上發表演說。关于这次会,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会快要結束的时候卡瓦伽所提出的一个問題。卡瓦伽在会場中間站起来,提出一个

糾纏不清的問題，繼續不斷討論下去，直到後來我們大家都忘記了問題是怎樣開頭的，內容是什麼。

哈爾·達耶爾在印度學生中很有名望，他在牛津讀書時比我進劍橋早些。我在哈羅讀書期間，曾在倫敦見過他一兩次。

在劍橋和我同時的人中間，有幾個人後來在印度國大黨政治中很活躍。森—古普塔在我升學之後不久就離開了劍橋。賽福丁·克其魯、賽德·馬茂德、塔沙杜克·阿哈默德·薛爾萬尼都是我當時的同學。現任阿拉哈巴高等法院審判長的蘇萊曼也是跟我同時在劍橋讀書的。此外還有幾個同學已經當了印度政府的部長和官員。

我們在倫敦時常聽人談起席瑪吉·克利西那伐瑪以及他的印度之家。可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他，也沒有參觀過印度之家。有時我們看到他所辦的“印度社會家”這個刊物。過了很久，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日內瓦見到了他。他衣袋裡還塞滿了這個刊物的舊本。他把去接近他的人都看作英國政府派去的偵探。

在倫敦還有印度事務部所設立的学生中心。印度學生都把這個地方看作刺探印度學生行動的機關。這種看法，具有相當理由。可是許多印度人無論願意不願意，總得遷就這個機關，因為沒有這個機關的介紹，差不多不可能進大學。

印度政局的發展，使我父親更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我雖然不贊成他的政治主張，我却很高興他參加政治活動。他當然參加穩健派，其中有許多是他的熟朋友、他的同事。他在本省主持了一次省代表大會，堅決反對孟加拉和瑪哈拉什特拉的極端派。他當了國大黨聯合省委員會的主席。一九〇七年國大黨會議弄得不歡而散，後來完全變成了一個穩健派，當時父親也在蘇拉特。

苏拉特會議后，納文生到阿拉哈巴来作父亲的客人，在我家住了好久。在他所写的关于印度的書里，他說父亲“在各方面都很稳健，只在义气方面是例外”。这是很錯誤的看法，因为父亲除了他的政見外，沒有任何稳健的地方，而且就是这点政治上的稳健，也由于他的天性而逐渐消失。他是一个感情热烈，心高气傲，意志坚强的人，跟稳健派大不相同。可是在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及以后的几年中間他是稳健派中的稳健派，痛恨極端派，可是我認為他欽佩铁拉克。

为什么是这样呢？他精通法律和宪政，他自然要用律师和宪法观点来看政治。他头脑清楚，他知道激烈的話如果没有适应的行动做后盾是不会产生效果的。他看不出可能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提倡国貨，抵制外国貨的运动，在他看来無济于事，而且这种运动的背景是宗教的民族主义，跟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并不希望古印度的复兴，他对于古代的印度沒有一点兒同情，也絲毫不了解。他根本討厭許多旧的社会風俗習慣，种性制度等，他認為这些都是反动的。他眼看着西方，羡慕西方的进步，并且認為跟英国联合就可以实现这种进步。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一九〇七年印度民族主义的复兴实在是反动的。正同东方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新民族主义，是帶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稳健派代表一种更进步的社会观，不过他們只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几个人，跟群众沒有联系。他們很少考虑經濟方面，他們只想到他們部分代表的新的上層中产階級的利益，这种新的上層中产階級需要發展的机会。他們主張实行不重要的社会改革，以削弱种性制度，取消那些阻碍發展的旧社会風俗習慣。

父亲跟稳健派携手后，采取了積極态度。極端派除孟加拉和

浦那的少数几个領袖外，大多数是青年。父亲看見这批小伙子竟敢独行其是，不由得惱怒了。他不能容忍別人的反对，他不肯寬容那些他認為蠢才的人們，因此他便不留情面，痛加打击，一有机会就向他們进攻。我記得在离开劍桥之后，讀到了他的一篇論文，我十分难受，我写了一封很唐突的信給他，說英国政府一定很高兴他的政治活动。他收到我的信后非常生气，他几乎想叫我馬上离开英国回印度去。

在劍桥讀書的时期，我就考虑了选择職業的問題。有一个时期我曾經打算在印度政府的机关中担任文官职务。当时这种职务还有些榮耀。可是我的父亲和我都不热心这种职务，所以这个念头也就放弃了。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还不到規定的年齡。如果我要去印度政府机关中任文官的話，那么我在取得学位之后，还得再等三、四年。我在劍桥接受学位的时候是二十岁，而当时印度文官的年限是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如果成功的話，我也得在英国再过一年。我家里的人对我長期住在英国有点不耐煩，要我赶快回去。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父亲怕我进政府当文官后說不定会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父亲和母亲在我久別之后都希望我靠近他們。因此，我决定从事我父亲的職業，当律师。我便进了內院[⊖]。

說来奇怪，尽管我在政治上日益趋向極端，我当时对于进印度文官处而成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行政机关的一員这种念头并不怎么討厭。这样的打算到后来就引起了我的反感。

一九一〇年接受了学位后，我就离开劍桥。我的化学、地質学、植物学三門考試还算不錯，得了乙等。在这以后的兩年中間，

⊖ 倫敦一法学协会。——譯者

我在倫敦。学法律花不了多大時間。我經過几次律師考試，成績不算好也不算坏。其余時間，我随意讀些一般書籍，我多少受了費边派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关心当时的政治运动。爱尔兰問題和妇女参政运动尤其使我感兴趣。我記得一九一〇年夏季我去爱尔兰游历，很注意当时新芬党[⊖]的初期活动。

我遇見了哈罗出身的几个老朋友，跟他們来往时养成了奢侈的習慣。父亲給我的錢相当多，但是我总常常感到不够用，因此父亲非常担心，生怕我很快墮落。事实上我没有干出特別的事，我只是学那些头脑空空的“花花公子”的样兒。这种安适的、無意义的生活对我没有一点好处。我早年的热情开始消沉，只有一种东西似乎在發展了，那就是我的自高自大。

在假期，我有时到欧洲大陆去旅行。一九〇九年夏天当齐柏林伯爵从康士坦斯湖上的腓特烈港駕駛他的新飞船飞到柏林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恰好都在柏林。我記得这是齐柏林伯爵第一次長途飞行，柏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会。德皇也給他正式欢迎。广大群众大約在一、二百万人之間聚集在柏林的丹卜尔霍夫机场。齐柏林飞船准时飞到，在我們的头上盤旋。阿特隆旅館那一天把齐柏林伯爵精致的像片贈送給全体旅客。我現在仍然保有那張像片。

大約两个月后，我們在巴黎第一次看見飞机在全市上空飞行，圍繞着爱菲尔铁塔盤旋。飞行家的姓名就是孔德·朗伯。十八年后，当林白飞渡大西洋到巴黎的时候，我也在巴黎。

我在一九一〇年在劍桥取得学位后就去挪威游历。在那里我

⊖ 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政党。——譯者

有一次險些兒喪了命。我們在那多山的國家旅行。我們到了一個小旅館，又熱又倦，便要求洗澡。洗澡這件事在那里從來沒有聽說過。旅館里沒有洗澡設備。那里的人對我們說，可以到附近的溪流里去洗澡。我們兩個人——一個英國青年和我——帶了旅館給我們的布巾（也許是小的洗臉巾），走到從附近冰川沖下來的激流里去。我下了水，水並不深，可是冷得要命，水底很滑，我一溜就跌倒了，冰冷的水使我麻木失了知覺，手脚動彈不得，我站不定脚跟，被激流沖走了。我的英國同伴設法走出了水，他沿着岸邊跑，終於抓住了我的腿，把我拖出水。事後我認識了我們所遇到的危險，因為在我們前面二、三百碼的地方，這激流沿着巨大的峭壁，直瀉而下，形成了瀑布，這就是當地的風景之一。

一九一二年夏天，我得了律師證書。同年秋天，我回到印度。我在英國住了七年多。在這個時期內，我曾經兩次利用假期回家。這次我可真正回家了。當我在孟買上岸的時候，我想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長的沾沾自喜的人。



第五章 回国和印度战时政治

一九一二年快要結束的时候，印度的政局很沉悶。鉄拉克被关在監獄里，極端派受了打击，潜伏着，沒有积极的領導。孟加拉在本省划分糾紛以后平靜無事。穩健派“團結”在參議会的明多莫萊計劃周圍。有些人关心海外的印度人，尤其是南非的印度人。国大党是穩健派的集团，每年开会一次，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決議，很少有人注意。

一九一二年聖誕节期間，我当代表，出席班克波尔大会。这次會議可以說是一个懂英語的上層階級的會議。多数人穿晨礼服和燙得笔挺的褲子。实际上这次會議是一个社交性的集会，沒有一點兒政治緊張空气。新从南非洲回来的郭克雷出席了这次會議，在会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神情緊張，办事認真，似乎是會場上把政治和公共事务看得認真、想得周密的有数的人物之一。他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当郭克雷离开班克波尔的时候，發生过一件趣事。他当时担任公共福利委員會的委員，在火車上可以一个人占用一間头等房間。他身体不大舒适。車上人多，跟意气不相同的人在一起使他心煩。他喜欢一个人靜下来，沒有別人来麻煩他。會議忙过了，他希望在火車上可以安靜一下。他上車后找到了他的房間，可是車上其余的地位挤滿了回加尔各答去的代表。不久納斯·巴苏

(他后来当了印度行政院的委員)走到郭克雷面前,随随便便地問可否讓他坐在郭克雷的房間里。郭克雷不由得吃了一惊,巴苏是一个雄辯滔滔的人,因此他只好答应。过了几分鐘,巴苏又回来問郭克雷可否讓他的一位朋友一起来住。郭克雷又和和气气地表示同意。火車快开的时候巴苏毫不在乎地說他和他的朋友睡上鋪很不舒服,郭克雷可否搬到上鋪去,把兩張下鋪讓出来給他們。这件事,我記得也講妥了。于是可憐的郭克雷先生只得爬到上鋪去,很煩悶地在那兒过了一夜。

我从事法律工作,进了高等法院。我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工作感兴趣。我从欧洲回来后,头几个月过得很愉快。我觉得回到家乡,恢复旧的关系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渐渐地我的生活,同大多数跟我相仿的別人一样,开始失掉了新鮮的感觉,陷入了沉悶的生活常軌,这是一种無意义的,空虚的生活。我想我所受的那种杂乱、至少是混合的教育,是造成我对环境不滿的原因。我在英国七年中間所养成的各种習慣和思想,跟我所看到的各种事情不調和。幸而家庭的气氛还算好,这对于我是一种帮助。可是这种帮助不够。此外还有律師圖書館和俱乐部,在这兩個地方所見到的是同一批人,一再討論着几个往往跟律師事务有关的老問題。这种气氛对于知識沒有推动作用。我心里感觉生活枯燥,連有意义的娱乐或消遣也沒有。

埃·姆·福斯特在他替洛斯·狄金生所作的傳記中說,有一次狄金生关于印度曾經說过这样的話:“为什么各族不能互相来往呢?只是因为印度人使英国人討厭罢了,这是鉄一般的事实。”大多数英国人可能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再引用福斯特在另一本書中所說的話,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的想法和行动,都儼

然自以为是占领军的一个成员。在这种情形下，要使两个种族的人建立无猜忌的、自然的亲密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彼此相见总是装模作样，当然他们在一起时觉得不舒服了。彼此都看不惯，便都巴不得各自走开，自由自在地呼吸和行动。

英国人往往只跟那批进出官场的印度人来往，他很少接触到真正有风趣的人。即令遇到了这种人，也不容易谈得来。在印度的英国当局把当官的人——英国人和印度人——提高到显著的地位，在社会上也是如此。而这些当官的人，大多数只是些知识浅薄、心胸狭窄的人。甚至有希望的英国青年来到印度以后，很快在知识方面和文化方面就都落后而跟当前的思想及运动相隔绝了。他们在办公室办公文，忙了一天，少不得要玩玩，到俱乐部去，跟同事们一块儿喝威士忌酒，读英国寄来的“笨拙”杂志和有插画的周刊。他们很少看书。即使看书，大概也不过找些素来喜欢的书看看。他们因为这种精神上的退化而抱怨印度，骂印度的气候，而且笼统地骂那些增加他们的麻烦的煽动家。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堕落的原因在于印度的专制顽固的官僚政治制度，而他们本人也是这种制度中的一部分。

尽管有请假和休假期，英国官员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跟他们一起或是在他们下面办公的印度官员当然不会更好些，因为印度官员竭力学英国官员的榜样。在帝国的重要城市新德里，高级官员们（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有）同坐在一起，听他们刺刺不休地谈升职、请假规则、休假、调职以及琐碎的官场丑事，比这更无聊的生活经验是少有的。

印度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别是懂英语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全都沾染了这种官场习气。仅在加尔各答和孟买这几个城市，多少还

有些例外。这种習气不仅在自由职业界如律师、医生中間風行，甚至流傳到半官方大学的課堂里。这些人脫离了群众，甚至脫离了下層中产階級，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小天地里。政治活动就限于这些上層人物。一九〇六年起，孟加拉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打破了这种情况，把新生命灌輸給孟加拉的下層中产階級和少数群众。在以后的几年中間，这种过程在甘地[⊖]的领导下很快地發展。然而民族主义的斗争虽然生气勃勃，却是一种狹隘的信条，使大家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顧不到其他的活动了。

我不滿意从英国回来后头几年的生活。我对于我的职业并没有飽滿的热情。在我的心目中，所謂政治就是积极反对外国統治的民族主义活动，这也沒有給我發揮热情的机会。我参加国大党，出席了国大党間或开的會議。每逢發生特殊事情时，如印度工人反对斐济群島契約制度或是南非印侨問題之类，我总是用全部精力去做，工作很卖力，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活动而已。

我也作了一些消遣的事，如打獵之类，可是我对于这种玩意也沒有特殊癖好。我喜欢出游，爱好山林，对于杀伤禽兽并没有多大兴趣。別人都知道我不杀伤禽兽。只有一次，我在克什米尔打死

⊖ 本書中我称甘地先生或聖雄甘地为甘地翁。因为甘地本人喜欢这种称呼，而不喜欢在他的名字上加“聖雄”。我在一些英国作家所写的書和文章里看到关于翁的奇怪解釋。有人以为这是一个亲密的称呼，甘地翁的意思是“亲爱的小甘地！”这真是荒謬絕倫，完全不了解印度的生活。在印度，一个人的名字末尾可以加上ji，这对于各种人，对男人、女人、男孩子、女孩子、兒童都适用，表示尊敬之意，等于“先生”、“夫人”、“小姐”。印度語中有很多这种称呼和名誉头衔。ji是最簡單，最通用的。我的妹夫朗吉特·潘迪特告訴我，ji这个称呼有一个長的光荣傳統，它从梵文arya来(表示紳士或貴人之意，不是德国納粹所謂的亞利安)。梵文的arya变成了勃拉克利特文的ajja，再簡化为ji。

(为了簡便起見，本書中的Gandhiji一律譯为甘地——譯者)

了一只熊。自从有一次看到一只小羚羊的情景后，我对打猎的兴趣更加减少了。这只不害人的小动物受了伤，跌倒在我的脚旁边，快要死了，还张开了泪汪汪的一双大眼睛，仰起来看我。从此以后，我就时常想到那一双眼睛。

在早几年，郭克雷所主持的印度公僕会曾经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没有入会的念头，一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个团体的政治见解过于稳健；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当时不想放弃我的职业。然而看到那些会员们为国家服务，收入很少，我不由得十分叹服。我想这种工作也许不是完全做得对，可是至少也算得心地纯洁，光明正大的。

在一件完全不牵涉政治问题的小事上，沙斯特里先生使我大吃一惊。他在阿拉哈巴城一个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告诉学生们尊敬和服从他们的教师和教授，小心遵守当局所定的法令，这种告诫的话并不怎样打动我的心。这种话强调权威主义，老生常谈，令人讨厌，我心里想这也許是由于当时在印度流行的半官方的习气罢。沙斯特里接着讲下去，号召学生把彼此所犯的过失立刻向当局报告。换句话说就是要学生们互相侦察行动，干告密的勾当。沙斯特里虽然没有用这些刺眼的字句，可是我听了心里却很明白。这位伟大领袖的善意忠告不由得使我吐舌了。我是新从英国回来的人，我在学校中所受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出卖朋友。侦探告密，因而使朋友吃苦，这是违反立身处世原则最大的罪恶。这个原则忽然颠倒过来，这使我难过。我觉得沙斯特里先生的道德观念，跟我受教育时所学的道德观念大不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吸引了我的注意。战争离印度很远，起初并不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印度没有完全嚐到战争的痛苦。政治不

关重要。印度防衛法案(等于英国国防令)紧紧地控制了全国。从第二年起,陰謀案、槍杀案以及旁遮普地区抓人当兵的消息便傳到我們的耳中。

尽管有人高声宣称对英国效忠,可是很少有印度人同情英国人。無論是穩健派或極端派,一听到德国軍隊胜利的消息就拍手称快。当然这并不是对德国有什么喜爱,而只是希望自己的統治者倒霉罢了。这是弱者借刀杀人的报仇思想。我們大多数印度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抱着錯綜复杂的心情。在交战国中,我最同情法国。我們对協約国方面的宣傳虽然大打折扣,可是这种宣傳对于我們产生了一些影响。

政治生活又逐漸展开。鉄拉克出獄了。他和白山特夫人各自發起了自治同盟。我参加了这两个团体,可是对于白山特夫人的自治同盟特别卖力。白山特夫人在印度政界日益活躍。国大党的年会很热烈,伊斯蘭教联盟也开始跟国大党前进了。政治空气很緊張。我們大多数年輕人很兴奋,預料不久就会發生重大事情。白山特夫人被捕下獄,使知識分子更加激动,推动了自治运动在全国的發展。自治同盟不但吸引了那些从一九〇七年起就脫离了国大党的極端派分子,而且在中产階級中間吸收了大批信徒。自治同盟沒有接触到群众。

白山特夫人的被捕下獄,激起了包括許多穩健派領袖在內的前輩先生們的义憤。在她被捕以前,我們在报上讀到沙斯特里有力的演說而大为感动。然而恰好在白山特夫人被捕前后,沙斯特里先生突然默不作声了。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完全使我們失望。于是大家对于他在迫切需要領導的时候一声不响,感到極大失望和憤慨。从那时起,我就認為沙斯特里不是一个行动的人,他不善

于应付危机。

别的稳健派领袖一往直前，有些人后来退回来，有些人则留在新的地位上。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纷纷讨论印度防军问题。政府当时依照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的编制，从中产阶级中募集人员，组织印度防军。印度军队的待遇在各方面都比英国军队相差很远。我们认为除非取消了这种侮辱人的差别，我们不当参加军队。经过了许多讨论，我们终于决定在联合省采取合作态度，因为我们的青年认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受点军事训练也是值得的。我提出了参加新军的申请书。我们便在阿拉哈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推动这个计划。恰好在这个时候，白山特夫人被捕了。我趁着群情激昂的时机，努力取得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同意（其中包括我父亲，萨普鲁博士，钱达玛尼及其他稳健派领袖），把我们关于防军的集会以及其他工作，全部取消，作为对政府行动的一种抗议，并且马上依照这种主意发出了通告。我想有些签名的人对于这种战时的激烈行为，后来表示后悔。

白山特夫人被捕，推动了我父亲及其他稳健派领袖参加自治同盟。几个月后，这些稳健派领袖大部分退出，我父亲仍然留在自治同盟里，当了阿拉哈巴分会的会长。

我的父亲逐渐脱离正统稳健派的立场。对于轻视我们，贱待我们的官宪过分退让和讨情的事情，是他的本性所反对的。然而极端派的老领袖们也没有取得他的好感，他对于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很不以为然。白山特夫人被捕及以后的几件事给了他很大影响，可是他仍然打不定采取前进方针的主意。那个时候，他常常说稳健派的办法不好，可是在印度教—伊斯兰教问题未解决以前，也不可能切切实实地做点事。当时他答应只要印度教—伊斯兰教问

題有了解决办法，他就可以跟我們年輕人一同前进。一九一六年国大党在勒克瑙大会上通过了国大党与伊斯蘭教联盟的联合計劃。这个計劃是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我家举行的一次會議上所草拟的，父亲对于通过这个計劃的事很高兴，因为它打开了共同努力的道路。父亲当时还准备繼續向前进，即令跟他的稳健派中的老朋友鬧翻了也在所不惜。他們一直到孟得戈以大臣的身分訪問印度时仍然携手合作。孟得戈—蔡姆斯福报告書發表后不久，就發生了分歧。一九一八年在勒克瑙举行联合省省特別大会，我父亲当主席。在这次會議上，在联合省內發生了最后分裂。稳健派預料这次會議要坚决反对孟得戈—蔡姆斯福的建議，因而拒不出席这次會議。后来国大党召开特別會議研究这些建議，他們又抵制了这次會議。从此以后，他們就脫离了国大党。

稳健派总是靜悄悄地退出和避免国大党的會議以及其他集会。他們甚至不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而奋斗，虽然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反对他們。就为公众服务的人而言，我認为这种作法既不体面，也不相宜。我想这是多数印度人的一般看法。我敢說稳健派在印度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敗，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們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稳健派領袖中只有沙斯特里先生一个人参加了国大党早期的一些會議，其他稳健派人士則一致抵制这些會議。沙斯特里先生在这些會議上提出了他孤零零的看法，正因为这样，人們反而更敬重他。

在大战开头几年，我很小心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我避免在公共集会上講話。我当时还缺少自信心，很怕公开演說。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認为公开演講不應該用英語，而我自己用印度斯坦語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的能力是怀疑的。我記得有一次在阿拉

哈巴發表了我第一次的公开演說，大約在一九一五年，日子記不清楚了。那次集会的目的是反对箝制輿論的新法案。我簡短地講了一通，而且用的是英語。散会后，薩普魯博士在台上抱住我，吻我，弄得我很窘。他之所以这样高兴，并非由于我講話的內容和講話的方式，而只是因为我在公共場所發表了演說，这样就多有了一个人参加社会工作，因为当时所謂社会工作，实际上只是演說而已。

我記得当时我們在阿拉哈巴的青年人多数希望薩普魯博士在政治方面采取更进步的态度。在該市的稳健派中間，他似乎是最具有前进傾向的人，因为他富于感情，有时能够憑热情干一下。跟他相比，我父亲似乎很冷酷，虽然他心里未始沒有热情存在着。可是我父亲意志坚强，我們不存多大希望。因此有一个时期，我們对薩普魯博士的期望更殷。瑪拉維亞有長期的社会工作經驗，当然是我們所欽佩的。我們时常跟他長談，坚决地要求他出来勇敢地負起領導全國的責任。

在早几年中間，政治問題在印度并不是大家心平气和討論的題目，往往一提起政治立刻造成緊張空气。父亲密切注意我走極端主义的傾向，我不断批評空談政治的作法，我坚持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我自己也不很清楚。父亲有时以为我在追随孟加拉有些青年所采取的暴力方針，这使他很着急。事实上我沒有迷恋那条路。可是我心里更加感到我們不應該服服貼貼地順从現狀，必須有所作为。从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的行动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覺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都非对外族統治进行更積極的斗争不可。父亲本来就不滿意稳健派的哲学。他發生了内心斗争。他非絕對看清楚了沒有其他的路可走的时候，总不肯改变立場。每前进一步，对于他总是一种苦悶的内心斗争。經過这

种内心斗争，他向前跨进了一步，就不会走回头路。他并不是凭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理智上的认识，才采取了前进的步骤。因此一旦采取了前进的步骤后，他的自尊心就阻止他回头看了。

父亲改变政见是在白山特夫人被捕的时候。从此以后，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把那些稳健派的老朋友抛在后面。直到一九一九年旁遮普惨案终于使他抛弃了他的旧生活和他的职业，而把他的命运投到甘地所倡导的新运动中。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他仍然拿不定主意应该怎么办。他自己心里还有些怀疑，再加上他替我担心，因此他在讨论当前的时事时不是心平气和的。他跟我们谈话时往往突然不欢而散，向我们发脾气。

我第一次跟甘地见面大约是在一九一六年圣诞节期间，勒克瑙会议的时候。我们大家钦佩他在南非洲的英勇斗争。可是他对我们许多青年人似乎很疏远，很不关心我们，不关心政治。他不肯参加国大党或当时全国性的政治活动，而专门致力于南非洲的印侨问题。以后不久，他代表佃农在詹巴伦地方所进行的斗争和所取得的胜利，使我们很兴奋。我们知道他又准备把他的方法在印度运用，这种方法是有成功希望的。

勒克瑙大会以后，我听过奈都夫人多次在阿拉哈巴所发表的有力的演说，非常令我感动。这些演讲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当时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我在大学时代所抱的笼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淡漠了。一九一六年罗格·开斯门特在受审时所发表的演说，恰恰指出被压迫民族的感情。爱尔兰的复活节周暴动，正因为失败才惹人注意。因为明明知道要失败，但不退缩，向全世界宣布没有强力能够摧毁一个民族的大无畏精神，这难道

不是真正的勇气嗎？

以上所講的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新讀各种書后又重新激起了我头腦中旧时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免不了籠統含糊，与其說是科学的，不如說是人道主义或烏托邦式的。在大战时期和大战以后，我喜欢罗素的著作。

这些思想和要求引起了我日益加深的內心的斗争，使我不滿意我的律师業。我干这种职业，無非因为沒有其他的事可干。然而我却日益覺得要把社会工作，尤其是那种引起我的积极性的社会工作跟律师業調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原則問題，而是時間和精力問題。加尔各答的名律师拉席·勃哈萊·哥斯爵士不知怎样賞識了我，教給了我許多發展業務的方法。他特別劝我选一个法学上的問題写一本書，他說这是新当律师的人訓練自己的最好方法。在写作方面，他願意替我出些主意，并且答应替我修改稿子。可是他这种善意的关心却落了空。就我而言，沒有其他的事比花時間和精力去写法学問題的書这种事更令人討厭的了。

勃哈萊爵士在老年时性情急躁，爱發脾气。后进的人們都怕他。然而我倒喜欢他，我認為他的失敗和弱点未始沒有可取之处。有一次父亲和我在西姆拉他家里作客。当时是一九一八年孟得戈一蔡姆斯福报告書發表的时候。他邀請了几个朋友吃晚飯，年老的克哈派德先生也在座。飯后，勃哈萊爵士跟克哈派德先生爭論得很激烈，講話的声音很大，因为他們兩人在政治上屬於敌对的兩派。勃哈萊是坚定的穩健派。克哈派德先生当时人家認為他是鐵拉克派的重要人物，他后来变成了鴿子式的柔和，甚至穩健派也看不过眼，認為他太穩健了。克哈派德先生开头批評郭克雷（他已經死了好几年），說郭克雷是在倫敦偵查他的行动的英国特务，这

使勃哈萊爵士受不了，他大声說郭克雷是再好不过的人，是他的知友，他不能讓人說郭克雷的坏話。克哈派德先生于是岔开了話头，說起沙斯特里先生。勃哈萊爵士虽然也并不高兴，可是他也并不怎样气憤。显然他对沙斯特里先生沒有像对郭克雷那样敬佩。他曾經說过这样的話，他說郭克雷活着的时候，他曾經在經濟上帮助过印度公僕会。自从郭克雷死后，他就停止他的捐款了。克哈派德先生于是称赞鉄拉克，作为一个回答。他說鉄拉克真正是一个偉人，一个令人欽佩的人，一个聖人。“聖人！”勃哈萊爵士反駁着說，“我就討厭聖人，我不要跟聖人来往。”



第六章 結婚和喜馬拉雅山中的探險

一九一六年我在德里城結婚，那天正是印度的立春節。同年夏天，我在克什米尔过了几个月。我离开住在山谷的家，同一个堂兄在山中漫游了几个星期后，便走上拉达克山路。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些通往西藏高原的窄狭荒凉的山谷。站在佐伊拉关向下一望，一边是苍翠的山景，另一边则是光秃秃的岩石。我們繼續走上兩边都是山的狭窄的山谷去。积雪的山峰閃着光，小小的冰河緩緩地向我們流下来。風很冷，可是白天的太陽却还温暖。天色晴朗，我們常常把物体的距离弄錯，把那些实际上距离很远的东西看作很近。愈走愈荒凉，連草木也沒有，有的只是不毛的岩石和冰雪。有时也看到一些令人高兴的野花。我对于大自然荒凉的境地，感到一种意外的滿意。我的精力充沛，兴致很高。

在这次游历期間，我遇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过了佐伊拉关，我們到了一个名叫瑪塔延的地方，当地有人對我們說，有名的亞瑪蘭那洞窟离該地只有八英里。从瑪塔延到亞瑪蘭那洞窟要越过一座堆滿了冰雪的大山，可是这算什么呢？八英里的路程似乎短得很。我們当时的热情很高，又沒有經驗，决定嘗試一番。我們于是离开了野营（高度一万一千五百英尺），跟着一小队人走上山去，由当地的一个牧人做向导。


我們用繩子系着身子向上爬過好幾條冰河，困難增加了，呼吸有點困難。我們所雇用的挑夫雖然担子輕却有好幾個感到吃不消。天開始下雪，冰河非常滑，我們疲困不堪，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但是我們還是硬着頭皮向前進。我們早上四點鐘出發，幾乎不停地攀登了十二個鐘頭，終於看見了一個大冰田，四周有雪峰圍繞着，好像一頂王冠或一個天神的圓形劇場，這種景色真是壯觀。過了一些時候，新下的雪和霧使我們看不見這種景色了，我不知道當時我們所在地的高度，可是我想一定在一萬五千到一萬六千英尺之間，因為它比亞瑪蘭那洞窟高得多。我們必須走過這個大約半英里寬的冰田，然後從另一邊走下去才能到這個洞窟。我們心里想，攀登既然已經結束，我們的主要的困難已經克服了。因而我們雖然很疲乏，兴致却很好，開始這段旅程。這往後的旅行實在危險，因為一路上有許多罅裂；而且危險的地方又往往被新雪遮沒了。新雪使我寸步難行，因為我一踏着雪，雪就陷落，使我跌進張着大口的罅裂中去。這是可怕的深淵，無論什麼東西落到里面，包管過了幾個地質學年代還可好好地保存着。然而我的繩子拉住我，我抓住罅裂的邊緣，人家就把我拉出來，這種情形使我們心驚胆戰，可是我們仍然堅持繼續前進。罅裂越來越多而且更為寬闊了，有好幾個地方我們簡直無法走過去，因此我們又疲乏，又失望，終於沒有參觀亞瑪蘭那洞窟就折回了。

克什米爾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決定不久就回去游覽。我定過許多計劃，打算過許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來就使我高興的就是準備去游歷西藏的名湖瑪納薩羅天池和附近積雪的開拉斯山。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去過這兩個地方。甚至克什米爾我儘管懷念也一直沒有去舊地重游。我忙于

政治和社会活动，走不开。我用坐牢代替爬山渡海以滿足我的游历热。可是我仍然定計劃，这是一种虽然在監獄中也沒有人能禁止的快乐。而且除此以外，在監獄中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常常夢想有那么一天，我漫游喜馬拉雅山，越过这大山去看我所想望的山和湖，然而年齡不断增加，青年变成中年，中年以后的时代更坏。有时我想到也許我將要老得不能去看开拉斯山和瑪納薩罗天池了。这种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試的。

“这些高山出现在我的心头，
山虽然危險，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么美丽。
山上宁靜的积雪，
多么令我神往！”[⊖]

⊖ 华尔特·戴·拉·梅尔(美国二十世紀詩人——譯者)。



第七章 甘地來訪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印度处于一种被压制的激动状态。工业化發展了，资产阶级的財富和权力增加了。这些上層少数人既然走了运，有錢有势，他們便追求更多的权力和机会，使用他們的投資，增加他們的財富。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們希望減輕一下把他們压垮了的負担。中产阶级盼望实现巨大的宪政改革，借以造成大規模的自治，給他們开辟許多条發展的道路，改善他們的地位。政治煽动工作虽然和平并且合乎宪法的規定，似乎向着爆發的方向發展，大家都很有把握地談論民族自決和自治。这种不安的情緒在群众中間，特别是在农民中間，也看得出几分来。人們想起旁遮普农村中强迫拉人当兵的事时还心有余痛。采用陰謀罪名审讯的方法去鎮压“駒形丸”事件和其他的人，这些行动更是火上加油，增加了人們的憤恨。那些从遙远的前綫退伍归来的士兵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些唯命是听的木头人，他們的智力發展了，他們中間存在着很濃厚的不滿情緒。

穆斯林对于处理土耳其和基拉法問題大为不滿，他們在醞釀行动。对土耳其的条約当时还没有签字，可是当时的整个形势真是山雨欲来風滿楼，因此在他們醞釀行动时，他們等待着。

当时印度全国的主要情緒是期待和盼望，一方面滿怀着希望，另一方面也帶些恐惧和憂慮。接着出現了罗拉脫法案，其中規定

可以不經過法定調查和正式手續執行逮捕和審訊。這引起了全印度的憤慨，甚至穩健派人士也全力反對。事實上，各種不同政見的印度人一致表示反對。儘管這樣，這個法案還是由於官方的推動變成了法令，主要的讓步只是法律的有效期限限制為三年。

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一下這個法案及其引起的動亂是發人深思的。這法案變成了法律。可是據我所知，這個法律在三年有效期內始終沒有實行過一次。這三年在印度並不是平靜的時期，而是一八五七年暴動以來最多事的年代。英國政府不顧輿論的一致反對，匆匆忙忙地勉強通過一個後來並未實行的法律，從而引起了動亂。可以說這種作法是自尋煩惱。

還可以談一談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實。十五年以後的今天，有許多每天實行的法律比羅拉脫法案嚴厲得多。今天我們享受英國統治的好處，有了這些新法律和特別法令。跟這些新法律和特別法令相比，羅拉脫法案幾乎可以說是自由憲章。當然這裡有點區別：一九一九年以後，我們有了大量的所謂自治（孟得戈—蔡姆斯福改革案）。現在據說我們又快要得到另外一次恩賜。我們進步了。

一九一九年初甘地生過一場大病。他在臥病中請求總督不要批准羅拉脫法案。總督對甘地的呼喚也像對其他的請求一樣，置之不理。於是甘地違反了自己的本意，第一次領導全印度的煽動工作，他發起堅持真理社，社員們保證如果羅拉脫法及其他討厭的法律牽涉到他們時，他們一律拒不服從。換句話說，他們公開和故意地要去坐牢。

當我在報紙上初次讀到這個建議時，我感到極大的寬慰。這個困難問題終於有了出路，有了一個公開、直截而且可能有效的行動方法。我滿腔熱情，想馬上去參加堅持真理社，我沒有考慮到后

果——如破坏法律、坐牢等等——即使考虑过的話，我当时也不在乎。可是我的热情忽然消沉了。并認識到事情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我父亲拚命反对，他一向不会被新的主意弄糊塗。他在采取新步驟以前，总是仔細考虑后果。他对坚持真理社及它的綱領越想越不对头，一些人去坐牢有什么好处？这能給政府什么压力呢？除开这些一般的考虑外，真正打动他的心的是私人問題。在他看来，如果我去坐牢，那就真是豈有此理。当时人們成群結队去坐牢的事还没有开始，一想起进監獄就令人討厭。父亲是深爱他的子女的。他虽然不善于表示他的情爱，可是在他压制感情的后面潜伏着偉大的爱。

这种内心斗争經過了好几天。我們父子兩人都覺得問題关系重大，它可能完全改变我們的生活，因而我們尽可能互相体諒。我当然力求減輕父亲显然的痛苦，可是我心里毫不怀疑，我非走坚持真理那条路不可。我們兩人都很难过。我接連好几夜一个人悶悶不乐地踱来踱去，想找一条出路。我后来發覺父亲在地板上試着睡，想嚐一下睡地板的滋味，因为他心想我將來去坐牢是要睡地板的。

甘地应我父亲的邀請来到阿拉哈巴，他們作了長談，我沒有在場。結果甘地劝我不要輕率行事，不要干出叫父亲伤心的事。我听了并不高兴。但是当时印度發生了其他事情，整个形势起了变化，坚持真理社停止了活动。

坚持真理日，全印度总罢業，德里和阿姆利則兩地的軍警开槍，打死許多人，阿姆利則和阿麦达巴德的群众發生暴动，發生了雅利安瓦拉大屠杀，旁遮普省戒严法进行長期的恐怖和暴力統治。旁遮普跟印度的其他地方相隔絕，完全孤立了，厚幕籠罩这个地区，

外邊的人看不見。一點消息也沒有，人們不能進出旁遮普。

從那人間地獄僥倖脫險出來的個別人人都吓得呆頭呆腦，講不清那裏面的情形。我們這些在外面的人無可奈何地等待零星消息的傳來，非常苦悶。我們有些人想要公開地到旁遮普戒嚴區去，冒犯戒嚴法。可是我們被人攔阻了。同時我們代表國大黨建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團體，辦理調查和救濟事務。

主要地區一宣布解除戒嚴，准許外邊的人進去，著名的國大黨人物和其他人士就源源不絕地到旁遮普去，進行救濟和調查工作。救濟工作主要由潘迪特·摩汗·瑪拉維亞和斯瓦米·席拉德汗南達兩個人主持。調查工作基本上由我父親和達斯先生領導，甘地很關心這種工作，別人也經常跟他商量。達斯特別擔任了阿姆利則地區的工作，我被派陪他去，在他需要的各方面幫助他。這是我第一次跟他一起工作，在他手下工作。我很重視這次經歷，我對他的欽佩增加了。關於雅利安瓦拉大屠殺，以及人們被迫在那兒匍匐着走的那條小巷的證據（這些證據後來包括在國大黨的調查報告書內）大部分是我們當面紀錄下來的。我們親自到過出事地點多次，並仔細進行調查。

我記得愛德華·湯普遜表示過意見，說雅利安瓦拉大屠殺的主要人物戴爾將軍心里有一種印象，以為雅利安瓦拉還另外有其他出口，因此他才命令他的士兵連續不斷地開槍那麼久。即使戴爾將軍當時的印象是這樣，即使事實上該地有其他的出口，那也不能減輕他的責任。他這種印象，似乎也令人奇怪。無論是誰站在他當時站着的高地上，都一定看得很清楚那整個地區的情形，那地方四面都是幾層高的樓房，只有一邊，有一百英尺光景的地面看不到房屋，可是那邊也有一垛五英尺光景高的牆。當軍隊連續開槍

的时候，曾經有好几千人找不着出路，拥到那牆边，想爬出去。这时排槍的火力轉向这垛牆（这可以从我們所接到的报告和牆上的彈痕得到証明），阻止人群爬牆逃走。事后有大堆死伤者抛在牆的兩边。

那年（一九一九年）快到年底时，我从阿姆利則到德里去。我走进的車廂差不多全挤滿了人。除一个上鋪外，所有的鋪位都躺着人。我就爬上那空着的上鋪。第二天早晨，我發現同車廂的旅客全是軍官，他們大声談天，我禁不住偷听。他們中間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用粗暴的声音大發議論，不久我就發現他就是雅利安瓦拉大屠殺的英雄戴尔，他叙述他在阿姆利則的經歷，他指出他怎样把全城的命运操在他的手中，他本来想把叛變的城市毀灭成瓦礫堆，可是后来發了慈悲心，沒有那样做。他显然是从拉合尔城亨特調查委員會作証后回来的。我听了他的談話，看到他那凶殘的神情，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在德里下車，身上还穿着睡衣，外罩一件洗臉时穿的外衣。

在旁遮普調查期間，我見過甘地好几次。他的各种建議，我們的委員會往往認為太新奇，沒有采納。然而他总是提出他的理由，要委員會接受，事后証明他的劝告頗有見識，因此我更加相信他的政治眼光。

旁遮普事件以及对这次事件的調查工作对我父亲發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整个法学和宪法学的基础因此动搖了，逐渐准备着改变，这种改变一年后終於实现了。他早就脫离了他那旧日的稳健派观点。一九一九年初，他不滿意阿拉哈巴稳健派所办的“导报”，便在阿拉哈巴另外开办一个日报叫“独立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是从开头，这日报就因經營不善，遭到困难。对于这一層，凡是

跟这日报有关的人——董事、編輯以及經理部的人員——差不多每个人都应当負一定的責任。我是董事之一，对于報紙業務一点經驗沒有。办报的麻煩和糾紛使我十分苦惱。然而不久，父亲和我都因事到旁遮普去，在我們离开的長时期內，这報紙一落千丈，經濟上發生困难，从此一直沒有恢复过来。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虽然曾經出过風头，可是我們一进監獄，这報紙就一敗塗地，終于一九二三年初停刊。这次办报的經驗惹得我害怕。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担任報紙的董事了。实际上我也不能担任这种职务，因为我無論在監牢里或在外面都有其他的事要做，不能够分心。

一九一九年聖誕节期間，我父亲担任阿姆利則大会的主席，他向穩健派的領袖或自由主义派人士(他們自称自由主义派)發出动人的呼吁，請他們参加會議，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应付戒严令的恐怖所造成的新形势，他在呼吁的信中写道：“旁遮普受了伤的心”向他們呼吁。难道他們对于这种呼吁置之不理嗎？可是他們沒有依照他所要求的那样回答，他們拒不参加。他們想望孟得戈—蔡姆斯福改革案所可能产生的改革。他們的拒絕伤了我父亲的心，因而扩大了他和自由主义派之間的距离。

阿姆利則大会是甘地領導的第一次大会。鉄拉克也参加了这次會議，在討論問題时很活躍。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却指望甘地來領導。聖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監獄中出来的阿里兄弟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發展。

穆罕默德·阿里不久参加基拉法代表团到欧洲去。印度的基拉法委员会日益受了甘地的影响，并且开始接近他的非暴力主义

的不合作運動的想法。我記得基拉法的領袖跟摩爾維和烏勒瑪[⊖]早期的會議中有一次是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在德里舉行的。基拉法代表團要去見印度總督，甘地也準備參加。然而在他未到德里之前，發言的草稿照例先送給總督。甘地到德里看過這個發言稿後，大不以為然，甚至說如果發言稿不大加修改，他就不參加代表團。他的反對理由是這個發言稿既含糊又累贅，沒有說明穆斯林必須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說這對於印度總督和英國政府，對於人民，對於他們自己都是不公平的。他們不應當提出自己並不想堅持的過分要求，但是應當把最低限度的要求說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並且堅持到底。如果他們認真的話，這就是他們所應當採取的唯一正確和光榮的道路。

這種論點在當時印度的政界和其他人士中間是很新奇的。我們習慣於含糊的誇張和堂皇的言詞，我們心中經常想及討價還價，可是甘地堅持實行自己的觀點，他寫信給總督的機要秘書，指出已經送出的發言稿中的缺點和措詞含糊，他增加了几段上去。這增加的几段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總督的回信很有趣，他不肯接受新增加的几段，他說他個人認為已經送去的發言稿很妥當。甘地認為他這次跟總督來往的函件說明他的立場，也說明基拉法委員會的立場，因此他結果還是參加了代表團。

事情很明顯：政府不會接受基拉法委員會的要求，因此鬥爭必然發生。委員會跟摩爾維和烏勒瑪舉行了長時間的談判，討論過非暴力主義和不合作運動的問題，尤其是非暴力主義問題。甘地對他們說，只要他們完全接受非暴力主義，他就唯他們之命是

⊖ 摩爾維和烏勒瑪是精通伊斯蘭教經典的學者。

听。在非暴力主义問題上不应当放松，不应当敷衍；也不应当在思想上有所保留。摩尔維很不容易把握这种看法，可是他們終于同意了，但明确地指出他們这样做是为了政策关系，而不是为了宗教信条，因为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并不禁止为正义事業而使用暴力。

在一九二〇年这一年中間，政治运动和基拉法运动向着同一方向并行發展，最后由于国大党通过甘地主張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而携手。基拉法委员会首先采用这个綱領，并决定从八月一日起开始这个运动。

一九二〇年初阿拉哈巴举行过伊斯蘭教会議（我想这是穆斯林联盟理事会），考虑这个綱領。这次会議是在拉薩·阿里家里开的。当时穆罕默德·阿里还在欧洲，可是索卡特·阿里出席了这次会議。这次会議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因为它使我完全失望。索卡特·阿里当然充滿着热情，可是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表現十分不高兴、不自在。他們沒有勇气表示不同的意見，而且显然他們不想采取輕率的行动。难道由这批人来領導革命运动向英帝国进行斗争嗎？我心里这样想着。甘地向他們講話，他們听了后比以前更恐慌。他用他最有威信的調子，講得很好。他很謙虛，可是很明确、坚定。他說話柔和动听，可是十分坚决、誠懇。他的兩眼温和而深沉，流露出一种坚强的精力和决心。他說我們很快就要进行偉大的斗争，敌人是很强大的。如果你們要参加斗争，你們就得准备牺牲一切，你們就得服从最严格的非暴力主义和紀律。一旦宣战后，就得宣布戒严。在我們非暴力主义的斗争中，我們方面如果要爭取胜利，就得有独裁和戒严法。無論什么时候，只要你們願意，你們有权利把我踢出去，或是要我的头，或惩办我。可是在你們選擇我当領袖的时期內，你們必須接受我的条件，必須服从独裁

和戒严法的紀律。当然这种独裁一定要依靠你們的好意合作和接受。一旦你們用不着我了，可以把我攆走，把我踏在脚底下，我不会叫冤的。

甘地所講的这一种話，他所用的軍事上的比喻，以及他本人坚决的誠意使他的多数听众战栗。可是索卡特·阿里在会上安定了动摇分子。到投票时，大多数人靜悄悄地，不自在地投了贊成票，贊成战争！

当我散会后回家的时候，我問甘地是否就这样發動偉大的斗争。我原来以为會場上会表現热烈的情緒、激昂的議論和閃爍有光的眼睛。然而我实际所看到的只是一群怯生生的中年人，斯斯文文地在一起。群众的压力真大，这批人都投票贊成斗争。后来穆斯林联盟的人很少参加斗争。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政府机关中任职。穆斯林联盟無論在当时或以后都不能代表大部分穆斯林的意見。一九二〇年的基拉法委员会是一个有力的、更有代表性的团体，而積極参加斗争的也是基拉法委员会。

甘地决定在八月一日开始不合作运动，可是国大党还一直沒有考虑或接受这个建議。就是在这一天铁拉克在孟买去世。当天上午，甘地在辛德区旅行后到达孟买。我同甘地一起参加全孟买百万市民为悼念他們素所敬爱的那位偉大領袖而举行的盛大游行。



第八章 出境及其后果

我的政治思想是我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全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在现在也多半是如此），稳健派和极端派都同样代表中产阶级，采用不同的方式谋求改善中产阶级的地位。稳健派特别代表人数较少的上层中产阶级，这些上层中产阶级大都在英国统治下一帆风顺，他们不需要足以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的突然变动，他们跟英国政府和大地主阶级的关系很密切。极端派代表下层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的人数因战争而增多了，可是他们只在个别地方组织起来了。他们的影响小得很。农民愚昧无知，饥寒交迫，受苦受难。他们安于悲惨的命运，听任所接触的一切人——政府、地主、债主、小官员、警察、律师、法师等人的压迫和剥削。

看报的人很难想到印度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和数百万工人，以及这些人有很大的重要性。英国人所办的报纸满纸都是关于官员们活动的报道，英国人在大都市和山上避暑区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宴会、化装跳舞会和业余戏剧等等。这些报纸几乎完全抹杀了印度人对于印度政治的看法，甚至对国大党开会的情形也只在不显著的地方登几行了事。他们不认为这些会议具有任何新闻价值。只有在印度人（不论是著名人物或不著名的人物）辱骂或批评国大党和它的主张时，这些报纸才认为有新闻价值。这些报纸有时也

提到罢工，只有当农村中發生暴动时，农村的消息才受人注意。

印度人自己办的报纸竭力学英国人办的报纸，只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报道比較多些。除此以外，这些报纸所关心的就只是印度人新任大大小小的官职，他們的升职和調动。在調动职务的时候，总要开欢送会，“情緒热烈”。每逢政府为增加稅收在农业区从新整理稅收的时候，报纸上就出现了反对論調，因为这影响了地主的腰包。一点也沒有談到穷苦的佃农。这些报纸大都是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办的。所謂“民族主义”的报纸就是如此。

国大党早年所坚持的要求之一就是确定未清理地区内的地产权，其目的在于保护地主的权利。对于佃农則一字不提。

在最近二十年中間，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發展，情形大变了。現在就是英国人办的报纸，为了拉住印度讀者，也不得不登載一些关于印度政治問題的消息。可是这些报纸是依照它們的特別看法發表这种消息的。印度人办的报纸，眼界比較开广些，用善意的口气談到工人和农民，因为这是流行的風气，而且讀者中間对于工业問題、农村問題的兴趣增加了。可是在本質上，現在跟过去沒有什么不同，这些报纸都替它們的主人——印度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說話。許多印度王公也喜欢向这些报纸投資，而且注意着他們的錢有沒有白花。这些报纸有許多自称是“国大党”的报纸，而实际上控制报纸的人并不是国大党的人。只因国大党是人所共知的，有許多个人和集团便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国大党这块招牌。凡是准备采取比較进步观点的报纸，不消說总是时刻担心在严厉的出版法和檢查制度之下要受巨額罰金，甚至停刊的处分。

一九二〇年，我完全不了解工厂中、田里的劳动情况，我的政治見解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当然知道这方面存在着可怕

的穷困和痛苦，我认为印度在政治上获得自由后必须首先解决这个穷困问题。在我看来，政治自由以及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中产阶级占优势，显然是下一步的事。从甘地在詹巴伦（比哈尔）和开拉（古甲拉特）展开农民运动以后，我稍为注意农民问题，然而我的心上却想起一九二〇年的政治事件以及即将出现的不合作运动。

恰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在后来起了重要作用。我忽然跟农民发生了接触，这差不多并非出于我的本心。事情的发生是很奇特的。

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两人都有病。一九二〇年五月初我把她们送到莫苏里地方去养病。我的父亲当时忙于办一件重要的案子，他的对手是达斯。我们住在莫苏里的萨伏伊大饭店。阿富汗和英国的代表（这是一九一九年阿曼努拉即位时短期的阿富汗战争之后）当时正在莫苏里进行和平谈判，阿富汗代表团也住在萨伏伊大饭店。然而他们不跟别人来往，自己另外一起吃饭，不在公用的屋内露面。我并不对他们特别发生兴趣。整整一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们代表团的人员。即使我看见过他们，我也不认识他们。忽然有一天晚上，警察局长来看我，给我看了当地政府的一封信，命令他要我保证不跟阿富汗代表团来往或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在一个月的居留期内，我简直没有看见过阿富汗代表团的人员，而且也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警察局长知道这种情形，因为他在严密地监视着代表团，而且到处布满了密探。但要我提供保证，毫无道理，我就这样答复了警察局长。他要我去见地方法官，即台拉·顿县的县长，我去了。因为我坚持不肯提供这种保证，他便命令我出境，叫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台拉·顿县境，实际上就是说要在几小时内离开莫苏里。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有病，我不

願意离开她們，可是当时沒有和平抵抗运动，我不認為違反這項命令是正当的。因此我离开了莫苏里。

我父亲跟联合省当时的省督哈科尔特·巴特勒爵士很熟，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給这位省長，說这样愚蠢的命令想来絕不会由省督發出的，一定是西姆拉有人自作聪明干出来的。省長回信說这种命令不碍事，我可以照办不至于損害我的面子。父亲再写信去，不同意这种說法，还加以补充說我虽然沒有故意違反命令的意思，可是如果我的母亲或妻子的健康需要的話，那我就管命令不命令一定要回到莫苏里去。恰好我母亲的病情惡化，父亲和我馬上动身去莫苏里。在动身之前，我們收到了撤消命令的电报。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了莫苏里。在旅館的天井里我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阿富汗人，手里抱着我的小女娃兒，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位部長，是阿富汗代表团的团员。原来我出境以后，那些阿富汗人在报上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們感到極大的兴趣。代表团的团长每天送我母亲一籃花和水果。

后来父亲和我会見了代表团的一兩個团员，他們殷勤地邀我們去訪問阿富汗，可惜我們不能利用这个机会。阿富汗的局势有了新的变化，我不知道这种邀請現在是否还有效。

在奉命离开莫苏里后，我在阿拉哈巴过了兩星期，就在这期間內，我和农民运动發生了关系。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几年中間愈益發展，大大地影响了我的看法。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不受出境的处分，当时不在阿拉哈巴閑居，那情形就該怎样呢，大概我迟早总要被拉到农民方面去，然而我走向农民方面的方式以及我所受的影响可就跟現在大不相同了。

一九二〇年六月初，記得約有兩百农民从帕太卜伽走了五十

英里的路来到阿拉哈巴市，目的在使阿拉哈巴的显要政治家注意农民的悲惨情况。他们由一个名叫拉麦钱德拉的人领导，他本人并不是当地的农民。我听说这些农民住在河边，便同几个朋友一起去看他们。他们告诉我们地稅征收人員的苛斂以及对人的非人待遇等情形，說农民实在忍無可忍了。他們請我們陪他們回鄉下去調查一番，并且替他們撐撐腰，免得稅吏們因为农民到阿拉哈巴請願动了怒要报复。什么推托的話他們都不听，拉着我們不放，終于我答应过兩天去看他們。

我同几个同事下乡去，在远离鐵路和公路的农村过了三天。这次旅行对于我是一个啓示。我們發現整个农村热情高涨，單是口头通知一声就有很多人来开会。从一村傳到另一村，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傳下去，馬上整个村子都空了，田野上拥滿了男男女女以及孩子們，大家向开会的地方走去。更快的方法是叫悉达一罗摩，到处高呼悉达一罗一罗一罗摩的声音，别的村子也回声呼应，于是人群像流水般出来，有时甚至跑步走。人們穿的衣服很坏，男的女的都是一样，可是他們的臉上却充滿了兴奋的神情。他們的眼睛閃閃有光，似乎期望种种奇事，仿佛什么神迹会消除他們長期的痛苦似地。

他們對我們怀着滿腔热情，用求助的动人眼色看我們，似乎我們帶來了好消息，引导他們进入想望之地。我看着他們，看到他們的愁苦和濺溢着的感激的神情，不由得充滿了慚愧和悲哀。慚愧的是我自己过着安乐舒适的生活，我們城市中人抱着偏隘的政治見解，把这許多衣不蔽体的印度兒女不放在眼里。悲哀的是我感到印度的退化及其严重的貧苦。一幅印度的新景象似乎出現在我的眼前——飢寒交迫，受人压迫，痛苦万分。农民們对于我們这几

个从遙远的城市来的訪問者的信任不由得使我惶恐起来，我覺得重大的新責任落在我的肩头上了。

我听农民講了許多悲慘的事：地租的負擔日益加重，非法的勒索，被人驅逐，無田可种，無泥舍可住，挨打。他們周圍全是魚肉他們的鷹犬——地主的狗腿子、高利貸者、警察。农民整天勤劳，但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却不是他們的，所得的酬劳是打罵和餓肚子。在場的有許多是被地主驅逐了而無田無地可种、無家可归的人。土地是肥沃的，可是地上的負擔却很重。出租的地少而承租的人多。地主們利用这种地少人多的情形，非法征收巨額酬金，因为法律限制了地租率。佃农無奈何只得从高利貸者那里借錢来付这种非法的勒索。以后由于还不起債，甚至于繳不起租，因而被地主收回了田地，一無所有了。

这种剝削农民的办法由来已久。农民逐漸貧困化的情形也長期存在着。为什么事情忽然爆發而使农村轟动呢？当然是在經濟情形方面。在俄得境內經濟情形都一样，而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农村騷动則大都限于帕太卜伽、雷巴利里和費薩巴德这三个县，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有了突出人物拉麦錢德拉的領導，人家称他作拉麦錢德拉老爹。

拉麦錢德拉本是印度西部瑪哈拉什特拉地方的人，曾經到斐济群島做过契約劳工。回来后他逐漸在俄得这些地区漂流。他走来走去，講述杜尔悉达斯所作的“罗摩衍”史詩，听农民講他們的痛苦。他沒有受过什么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他利用佃农以滿足自己的利益。可是他表現了特殊的組織能力。他教农民常常一塊兒开会，討論本身的痛苦，从而使农民認識團結的重要性。他有时又召开大規模的群众大会，使农民認識自己的力量。悉达—罗摩原

来是一个旧的普通口号，可是拉麦錢德拉給了这个口号一种近乎战争的意义，把这个口号作为紧急情况和各村互相联系的信号。費薩巴德、帕太卜伽和雷巴利里流傳許多关于拉麦錢德拉和悉达的古代傳說，这三个地区是阿尤特雅王朝的一部分，一般人所爱讀的書就是杜尔悉达斯的“罗摩衍”史詩。許多人能够背誦这本书中的几百首詩。拉麦錢德拉喜欢誦讀这本书，并且适当地引用这本书的句子。他把农民組織起来后，向农民作出了各色各样的諾言，这种諾言虽然含糊其詞，可是对于农民却充滿了希望。他沒有任何綱領，当他把农民煽动到群情激昂的时候，他又企圖把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他把一些农民帶到阿拉哈巴来引起人們对于农民运动的兴趣。

拉麦錢德拉繼續在农民运动中活躍了一年，坐过兩、三次牢，后来变成了一个很不負責任、很靠不住的人。

俄得是一个特別适于农民騷动的地区，是地稅征收者的地区，这些人自称系“俄得的老爷”。地主制度在这里發揮得最殘酷。地主們的勒索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沒有土地的劳动者的人数日益增加。整个說来，这里只有佃农这一个階級，这种情形对于联合行动有利。


印度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的地区，另一部分是自耕农地区，可是有些二者兼有的交叉地方。孟加拉、比哈尔、亞格拉—俄得联合省这些省屬於地主区。自耕农比較好过一些，虽然他們的情况仍然可憐。旁遮普或古甲拉特地区的农民群众——这两个地区有自耕农——比地主区的佃农生活好得多。大部分地主区流行各种佃租办法：占有田租、非占有田租、轉租等。各种佃农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因而妨害了联合行动。然而一九

二〇年时俄得境内沒有有占有权的佃农或終身租地的佃农，只有短期租地的佃农，地主随时可以把田地收回，租給願意付較高酬金的佃戶。因为那里差不多只有这一种佃农，所以比較容易把他們組織起来，采取联合行动。

实际上在俄得地区，甚至短期租地的契約也沒有保障。地主收租后总不打收条，因此往往以佃戶欠租为借口而把佃农赶走。佃农方面因为沒有收条，提不出反証。除地租以外还有为数可觀的非法苛捐。有人对我說，某庄地上这种苛捐多到五十多种。这个数目說得不免有些夸張，可是大地主們常常要佃戶付各种特別开支——例如地主家中有人結婚，兒子在外国留学，招待省長或高級官員的宴会，买汽車，买象等費用。这种苛捐有特別名目，如“購汽車捐”、“購象捐”等。

因此大規模的农民騷动在俄得地区爆發，并不足为怪。这种騷动沒有城市的帮助或政客們的干預，全然是自發的，这倒使我奇怪。农民运动当时全然跟国大党分开，跟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不合作运动也沒有关系。可以更正确地說，这两种广泛的、有力的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一九一九年甘地所宣布的总罢業，农民是参加的。甘地的名字在农村中的人看来是“神咒”。

更使我惊奇的是我們住在城市的人对于这种偉大的农民运动一無所知。报纸上对于农民运动只字不提，它們毫不关心农村。我更加認識到我們对于一般民众是多么隔膜。我們是在一个跟老百姓隔絕的小天地中生活、工作、活动。



第九章 农村漫游

我在乡下住了三天，回到阿拉哈巴，以后又下乡一趟。在这些短促的访问中，我们走过许多农村，跟农民一起吃饭，住在他们的泥屋里，跟他们长谈，还时常在大小集会上讲话。我们原来坐一辆轻便的汽车去。农民们真热心，好几百人工作，一天晚上就在田野间修出一条临时公路，使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内地去。半路上，汽车往往陷在泥地里抛了锚，这时总有几十个人来帮忙，把汽车扛起来。可是最后我们不得不丢了汽车，徒步旅行。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总有警察、密探和勒克瑙来的一位税收员跟着我们。我们不停地在田野里走动，使得这些家伙叫苦，他们皆筋疲力尽，讨厌我们，讨厌农民。税收员是一个勒克瑙的文弱青年，穿漆皮鞋，他有时请求我们抑制我们的热情。我记得他跟不上我们，终于落在后头。

那时正是雨季开始前一年最热的六月间。太阳火辣辣地晒得人难受。我不惯于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在外面走路。我从英国回印度后，每逢夏季我总上山去住些日子。现在我整天在烈日高照下奔波，头上连凉帽也没有，只用小手巾裹着。我心中所想的是别的事情，简直把酷热忘掉了。回到阿拉哈巴，当我发现自己已晒得黑黑的时候，我才想起所经历过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不错，我经得起最严酷的热，我对热的恐惧心理完全没有理由。我发现我受得住酷热和严寒，不感到很大的不舒服，这帮助了我日后的工作和在

監獄中度过困难的日子。毫無疑問，我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我的身体一般說还很好，此外，我还有运动的習慣。好运动这种習慣是我从父亲那兒学来的。父亲爱运动，几乎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每天都做健身操。父亲的头髮雪白，滿臉皺紋，看起来使人覺得他年老了，心事重重，除此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在他去世前的一、兩年，似乎比他实际年齡年輕二十岁。

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我訪問帕太卜伽以前，我也时常路過乡村，住在乡下，跟农民談話。在盛大的节日里，我看見上万的农民聚集在恒河兩岸，这时我們就向农民宣傳自治。可是我不十分了解他們是怎樣的，不十分認識他們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像許多人一样，我不求甚解。在訪問帕太卜伽时我認識了这点。从此以后，一想到印度，我心中就出現了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群众。也許当时的空气很緊張，也許我当时的心情容易受外边事物的影响，我所看到的情景，我所获得的印象，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心上。

这些农民消除了我的害羞心理，訓練我在公众面前講話。这以前，我很少在公共集会上講話，一想到要講話我就害怕，尤其害怕用印度斯坦語講話，而实际上講話几乎总是用印度斯坦語。然而我不能在农民面前避不講話，对这些朴素的人我怎么可以怕生呢？我不懂得怎样演說，因此我对农民的講話总是开誠布公地人对人的講話，把我心上所想的講給他們听。不論听講的人是几个人或一万多人，我总采用个人談話的方式。我覺得这种方式無論有什么缺点，至少我講得下去。我講得很流暢。也許他們有許多人对我所講的有許多地方不懂。在他們听来，我的思想，我所用的字还不够淺明易懂。听講的人数过多的时候，我的声音小，有許多人听不見。然而只要他們信任一个人后，听得見或听不見都沒有

多大关系。

我回到莫苏里去看我的母亲和妻子，可是我心里老是想农民，我急于回去。回去后，我马上继续去访问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被压迫的农民有了新的自信心，昂然抬起头走路了。害怕地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心理也减少了。每逢地主从佃户手中收回土地，不让他种时，其他农民便没有一个去租那块地。地主的僕人们的暴行和非法勒索也比较少了。偶然发生这类事情，就立刻有人报告，进行调查，这使地主的狗腿子和警察有所顾忌。地稅征收人害怕了，采取守势，省政府答应修改俄得地区的租地法。

地稅征收人和大地主们自称是“人民的当然领袖”，他们是英国政府的“宠儿”，由于英国政府给他们一种特殊的教养（或者说由于没有给他们教养），这些人就整个阶层说来，已在知识方面完全成了无用的人。其他国家的地主至少还替佃户作一些事情，而印度的地主和地稅征收人没有替佃户作过一点事，完全变成了土地和人民的寄生虫，他们的主要活动在于巴结地方官吏（如果没有地方官吏的照顾，地主和地稅征收人不能长期生存），继续不断地要求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特权。

“柴明达”（zamindar）这个字容易令人发生误解，人们总认为所有的“柴明达”都是大地主。在农民所有制的各省，所谓“柴明达”是指自耕农而言。就在典型的柴明达制各省，所谓“柴明达”包括数目相当小的大地主、成千的中等地主和数十万生活困难不下于佃农的人。我记得在联合省有一百五十万人列为柴明达，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跟最贫苦的佃农一样，另外有百分之九的人比较富裕些。全省的大地主不过五千人。在这五千人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真正算是大地主和地稅征收人。在有些地方

比較大的佃农比貧苦小地主的生活好。这些貧苦的地主和中等地主虽然在知識方面落后，可是整个說来他們是好人，只要給他們好的教育和訓練，就可以改造他們成为良好的公民。他們这些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地稅征收人和大地主（除少数特殊例外）就不是如此，这些人連貴族社会的优点都沒有。作为一个階級而言，这些人在身体和知識方面都墮落了，可以說早就應該灭亡了，只有获得外力——如英国政府——的扶持，他們才能够繼續存在。

在一九二一年这一整年中間，我繼續訪問农村，我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包括整个联合省。不合作运动已經認真开始了，运动的号召达到了偏僻的乡村。各地国大党工作人員到农村中去宣傳这个运动，往往加上“解除农民疾苦”这种籠統的要求。“自主”这个名詞包含的内容很广。可是不合作运动跟农民运动是兩個單独的运动，虽然在联合省這兩個运动互相交叉，互相影响。由于国大党的宣傳，訴訟案一下子减少了，各村建立了自己的仲裁委员会处理本村的糾紛。国大党主張和平的宣傳，起了特別重大的影响，因为国大党的工作人員無論到哪里总是強調非暴力主义的新主張。也許人們还没有充分認識或理解这点，可是这种宣傳却防止了农民采用暴力的傾向。

这种成績不能算小。农村中的騷动很激烈，产生农民暴动。当时俄得区某些地方的农民情緒激昂，准备挺而走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而农民的行動很温和，我記得对地稅征收人行凶的事只有一次。就是一个农民当地稅征收人家里高朋滿座时，走到他面前，打了他一記耳光，罵他伤風敗俗，不体貼他自己的妻子。

后来發生了另一种暴力行动，結果跟政府發生冲突。这种冲

突必然会发生，因为政府不能够坐视农民团结起来后所形成的日益增大的力量。往往大批农民坐火车不买票，尤其是当他们去参加定期的群众大会的时候，这种大会有时人数多到六、七万人。要劝阻他们很困难。而且，前所未闻地，他们竟公开反抗铁路当局，说旧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要求团体免费旅行，我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我们没有向他们建议过。我们突然听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后来铁路管理更加严格，便防止了这种事情。

一九二〇年秋天（当时我远在加尔各答出席国大党的特别会议）有几个农民领袖因轻微的罪行被捕，准备在帕太卜伽镇受审。在开审那天，大群农民挤满了法庭，并且排队站在通往扣押农民领袖的监狱的大路上。法官看到这种情形害怕了，便把审讯延期到第二天。可是群众愈来愈多，几乎围困了监狱。农民们只要吃很少一点炒豆就可以坚持几天。这几个农民领袖在监狱内也许经过一次形式上的审问就被开释了。我忘记了这件事的经过详情。农民认为这次是一个大胜利，他们以为只要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政府方面则认为这种事情忍无可忍了。过了些时，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可是这回的结局就不同了。

这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初，我刚从那格浦尔开完会回到阿拉哈巴，收到雷巴利里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到那兒去，因为预料那兒就要出乱子。第二天我就动身。到了那里知道前几天有几个农民领袖被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农民们想起了他们在帕太卜伽所获得的胜利以及当时所采用的方法，便成群结队到雷巴利里去，准备举行群众示威。可是这回政府却不容许了。政府调动了大批军警来阻拦农民。农民的队伍被阻止在城外一条小河的对岸，可是有些农民从别处绕道到了城内。我一到车站知道了这种情形，就直

奔軍警和农民对峙的河边。半路上我接到县长匆忙写的一封信，叫我回去。我在信纸的背面写了回信，质问他根据什么法令的哪一条命令我回去，并且告诉他在没有得到答复以前，我还是要继续前进的。我到河边，听到对岸的枪声。我在桥边被军队阻止了，不能前进。当我等着的时候，忽然有一大批受惊的农民围住了我，这些农民原来躲在河边的田里。于是我就召开了约二千多农民的大会，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不要太激动。当时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大约一两丈远，有人向农民开枪，到处都是军队，情势非常严重。可是这次会开得很好，安定了农民的恐惧心情。县长从火线上回来。依照他的要求，我同他一起去到他的家里，在那儿他用各种借口把我留住了两个多钟头，他的目的显然是要把我跟农民及城内的同事隔离开。

后来我们听说有许多人被打死了。农民们不肯走开或回去，可是他们很平静。我敢说如果我或另外一个为农民所信任的人在那里，要求农民走开，他们一定会照办。农民不肯服从他们所不信任的人的命令。当时的确有人向县长建议等我一会，可是县长拒绝了。他不能让一个煽动家去完成一件他自己失败了的事。外国政府办事总讲威信，它们不能做这种有损自己威信的事。

当时雷巴利里县发生过两次枪击农民的事，接着情势恶化，官方对于出名的农民运动工作人员以及农村中的仲裁委员会的人员实行恐怖统治。政府决定粉碎农民运动。由于国大党的提倡，用纺车纺纱的运动正在农民中间推广，纺车变成了叛乱的象征，有纺车的人倒霉，纺车常常被烧掉。政府企图用大批捉人及其他方法把雷巴利里和帕太卜伽农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国大党运动镇压下去。大部分主要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两种运动。

不久以后，一九二一年費薩巴德發生了压迫农民的事。那兒事情發生得很特別。有几个乡村的农民搶劫了一个地稅征收人的财产。事后查明在这次行动中农民受了一个地主的僕人的煽动，这个地主跟被搶的地稅征收人有怨仇。当时确实有人对这些可憐的無知識的农民說甘地要他們去搶，他們心甘情願地做了这件事，并且在搶劫的时候高呼“聖雄甘地万岁”。

我听說發生了这件事，不由得十分生气。在事情發生后一、兩天我就赶到出事地点，那是在費薩巴德县內靠近亞克巴浦尔的一个地方。我到后，当天就召集會議。几个鐘头內就有五、六千人从半徑十英里的周圍各乡村来参加會議。我严厉地向他們講話，我指出他們这种搶劫行为污辱了他們自己，也污辱了我們的事業。我說犯罪的人必須公开認罪（当时我充滿了我所認識的甘地的坚持真理精神）。我号召参加搶劫的人举起手来。說来奇怪，尽管当时會場上站着許多警察，竟有二十多个人举起了手来。这意味着这些人必然会吃苦头。

当我后来跟他們中間許多人私下談話，听他們坦白地說出他們被騙上了当的情形时，我很替他們难过。我很后悔不应当暴露这些愚笨而朴实的农民而使他們被判处長期徒刑。可是遭殃的还不止二、三十人。当局認為机会难得，不应当輕易放过，而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地区內的农民运动鎮压下去。一千多人被捕，当地的監獄人滿为患，审問期拖了大半年。在审訊期內，許多人死在监牢里。許多人被判处長期徒刑。后来我进監獄的时候还看到好几个这种人。他們都很年輕，他們的青春消磨在監獄里。

印度的农民缺少进行長期抵抗的持久力，一遇到飢荒和瘟疫就成千上万地死掉。可是这次在整整一年中农民显示了反抗政府

和地主的联合压迫的偉大力量，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是农民开始感到厭倦，政府方面的坚决进攻终于暂时打击了农民运动的精神。可是运动仍然繼續进行，虽然調子低了一些。过去的大規模示威現在沒有了，但是大多数乡村还留下一些沒有被吓倒的旧时工作人員，他們小規模地进行工作。必須記住，这一切都是国大党在一九二一年底發动“去坐牢”运动以前的事。在这种运动中，农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他們在上一年中間吃了不少苦头。

政府害怕农民运动，于是匆匆忙忙地拟訂土地租用法。这种法律本来可以相当改善农民的地位。可是当政府認為它已經能够控制农民运动的时候，它就把这种法律冲淡了。土地租用法中的主要改变就是規定俄得地区的农民有終身租地权。这种規定說起来很动听，可是农民后来發現自己的地位并沒有因此而获得了改善。

俄得地方后来繼續爆發农村糾紛，可是規模比較小。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开始后，物价跌落又引起了严重的危机。



第十章 不合作运动

我比較詳細地說明俄得县农民騷动，因为这种騷动揭开了外表，使我看到了印度問題的基本方面，而民族主义者对于这种基本方面几乎沒有注意到。农村中的糾紛在印度各地随时都在發生，这是农村中長期不安定的表現。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俄得县某些地区的农民騷动虽然有其特別可注意之点，仍然只是普遍的农村糾紛的一种。这种騷动的起源完全跟政治或政客的活动無关，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外面的人和政客們的影响真是微乎其微。从印度全国来看，这种騷动只是地方事件，很少有人加以注意。联合省的报纸大都不理睬这种問題。对于这些报纸的編輯先生們以及大多数住在城市的讀者，衣不蔽体的农民群众的行动沒有真正的政治意义或其他意义。

旁遮普和基拉法的不法事件是当时公众談論的題目，企圖糾正这种不法事件的不合作运动是全国关心的問題，而对于民族自由或自主这个更重大的問題反而并不怎样看重。甘地不喜欢籠籠統統的大目标，他喜欢把問題提得具体、明确。当时人們紛紛談論自主，在各种集会上也常常提到自主。

一九二〇年秋，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別會議，討論应当采取什么步驟，特别是要对不合作运动問題作出决定。在国外居住很久新从美国回来的拉吉巴特·拉伊当會議的主席，他不喜欢不

合作运动这种新奇的办法，表示反对。人们通常把他看作印度政治上的极端派，可是他一般的看法却明明白白地是宪政派和稳健派的观点。在二十世紀初期，他变成铁拉克以及其他极端派的同盟者，这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选择或信仰，而是由于环境的压力。他对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的一套看法，长期住在海外坚定了他的这种看法，这使他比大多数印度领袖具有更远大的眼光。

威·斯·布倫脫在他的日記中描写他一九〇九年跟郭克雷和拉吉巴特会見的情形。他对于这两个人的批评很不客气，說他們过于小心谨慎，害怕面临现实。可是拉吉巴特实在比印度大多数领袖更能面对现实。布倫脫的印象使我們認識当时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领袖人物的水平多么低，而一个有才能、有經驗的外国人見到这种情形感到多么突出。可是过了十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拉吉巴特·拉伊并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反对不合作运动。附和他的人的声势不小。国大党的老同志几乎全部反对甘地关于不合作运动的决議。达斯带头反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贊同决議案的精神，他准备贊成，而且还可以再进一步，主要是因为他反对抵制新的立法机构。

在前輩著名领袖中当时支持甘地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父亲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認識反对的理由，并且受了这些反对理由的深刻影响，这些理由使他的許多老同事参加了反对派。他也像他的老同事一样，对于采取新的步骤，走向一个新的境地，不免表示迟疑，因为一到新的境地就很难有把握了。可是他终于贊成采取有效的行动，甘地的建議虽然不完全合乎他的想法，却主張明确的行动。父亲經過很久的考虑才打定主意。他跟甘地和达斯

長談。当时达斯跟父亲在一个大案件中各人代表一方辯护，所以来往很多。他們对問題的看法差不多相同，对于結論的看法也只有很小不同的意見，可是这很小的不同意見使他們在国大党的特別會議上在討論主要決議案时老是处于对立的地位。三个月后，他們又在那格浦尔會議上相見，从此以后，他們互相合作，彼此更加接近。

在加尔各答特別會議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很少看到父亲。可是每次会見他的时候，我总看出他在考虑这个問題。这个問題除有关国家大事外，还涉及私人問題。参加不合作运动，对他而言，就是說他要退出律师的業務，也就是說他要完全断絕他那过去的生活，建立一种新生活。对于一个快要滿六十岁的人來說，这并不是輕而易举的事。这也就是說他要跟旧时的政治同僚断絕关系，放弃他的職業，放弃他已經習慣了的社会生活，放弃他用錢不在乎的習慣。这个問題在經濟方面的意义并非不关重要，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他不当律师，沒有收入，他就非降低生活水平不可。

然而他的理智，他坚强的自尊心却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新的运动中。他心中充滿着对于旁遮普惨案之类的事件所积下的憤怒；那种对于作坏事和非正义的認識，由于民族耻辱所感到的痛苦，也都需要找出路。可是他不是讓热情冲昏头脑的人。他有律师的分析能力，用理智把正面和反面的理由仔細权衡考虑后，才最后决定参加甘地的运动。

父亲喜欢甘地的为人，这無疑地是影响他的一个因素。他的爱和憎都是很强烈的，因此要他跟他不喜欢的人成为知己是無論如何办不到的。可是这番結合真有点奇特——一个是聖人、克欲家、宗教家，在生活中摒絕刺激和肉体上的享乐；一个是享乐家，生

活上講究享受，不大顧到后果。用心理分析家的話來說，這就是“內向”和“外向”的結合。但是他們之間也有共同的联系，共同的兴趣使他們接近，甚至在后来数年中，他們的政見虽然不同，但彼此仍然保持亲密的友誼。

沃尔德·斐德在他的一本書中說明聖人和享乐家从相反的观点出發，走着不同的道路，一个具有宗教的气質，另一个則反对宗教的气質，可是他們的見解，这种見解就力量和真摯的程度而言，都不同于气質較弱的人們；这两个人彼此的了解比他們了解世俗人物更深刻，他們有时是切实地接近的。

加尔各答特別會議是国大党政治上甘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从那个时候起一直繼續下去，只有二十年代一个时期是例外，在这个时期內，甘地置身幕后，讓达斯和我的父亲所領導的自主党出面活动。国大党的整个面貌改变了，穿洋服的絕迹了，人們所看到的只是印度服。国大党的成分改变了，新的代表主要是下層中产階級出身的人物，說印度斯坦語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的时候用开会所在地方的方言，因为許多代表不懂英語，而且人們对于在自己的民族事業中使用外国語言的反感也一天比一天厉害。在国大党的集会上出現了新生活 and 热情。

大会閉幕后，我陪甘地去看“甘露市場报”的主笔莫鉄拉尔·哥斯，他当时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莫鉄拉尔希望甘地和他的运动成功。他接着說他自己快要到別的地方去，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他总感到滿意，他要到英帝国不存在的地方去，他終于要逃出英帝国的統治。

在我們从加尔各答特別會議回来的路上，我陪甘地到散蒂尼克坦去訪問泰戈尔和他可爱的哥哥“波洛·达达”。我們在那兒住

了几天。我记得安德鲁斯给了我几本书，使我深感兴趣，并且受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书讨论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其中有一本莫雷尔所作的“黑人的负担”使我非常感动。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或者晚一些日子，安德鲁斯写了一本主张印度独立的小册子名叫“独立——当前的需要”，这本小册子写得很出色，以席莱所写的几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论文为根据。在我看来，这本小册子不但给独立问题提出了无懈可击的论据，而且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他那简明而真实的文字明确地表示出那种深刻推动我的要求以及我们尚未完全定型的意愿。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提到经济背景和社会主义，所讲的只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印度所遭受的耻辱，以及印度热烈要求摆脱这种耻辱，不再继续堕落下去。安德鲁斯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属于印度统治种族的人，居然响应了我们内心的呼声，这实在是难得的事。很久以前，席莱就已经说过不合作运动的基本观念就是“帮助外国人维持其统治是可耻的事”。安德鲁斯写道：“自我复兴的唯一途径是内部的重大变动，这种变动所需要的爆发力必须从印度精神内部自己产生，而不能求诸于外来的借款、赠送、津贴、让步、或宣言。这种爆发力必须从内部产生……因此当我眼看着这种内部爆发力真正爆发时——例如圣雄甘地对印度人说：‘要自由！不要再做奴隶了！’印度人热烈响应——我心里非常高兴，仿佛思想上和精神上摆脱了一种不能忍受的重担似的。在突发的运动中，印度所受的束缚开始减少了，到自由的道路开放了。”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合作运动的高潮。抵制新的立法机构选举的呼吁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不合作运动没有阻止，同时也不可能阻止每个人去参加议会，使席位空着。致使少

数选举人可以进行选举，或者选举也可以沒有竞选者，但大多数人仍不去投票，重視民意的人都拒不参加竞选。选举那天，瓦倫廷·齐罗尔爵士恰好在阿拉哈巴城，他到各投票站去走了一趟，抵制选举的成績使他大吃一惊。在离阿拉哈巴城約十五英里的一个乡区投票站里，他沒有看見一个投票人。他在关于印度問題所写的一本书中叙述了这次經歷。

达斯跟另外几个人在加尔各答大会上曾經怀疑这种抵制行动是否明智，可是他們还是服从大会的决定。选举过后，这种不同的意見消除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召开全体會議时，国大党許多老領袖在不合作运动問題上又重新携手合作了。不合作运动的成功說服了許多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

在加尔各答會議后有几个老領袖退出国大党，其中有一个著名人物——真納。奈都夫人称真納为“印度教—伊斯蘭教联合大使”。在过去促使穆斯林联盟靠攏国大党的主要是真納的功劳。国大党內部的新变化——不合作运动；国大党通过了新党章；根据新党章的規定，国大党更成为一个群众組織——却是真納完全不贊成的。他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表示不同意，可是使他脫离的理由主要不在政治方面，国大党內仍然有許多人在政治上不像他那样进步。他在性情上根本跟新的国大党不融洽。穿印度服的群众要求用印度斯坦語演說，这就使他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群众的热情，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暴民的歇斯底里。他和印度群众之間有很大的距离。他曾經非正式地建議只有大学生才可以参加国大党。我不知道他这种出色的建議是否当真，可是这种建議跟他的一般看法相符合，因此他离开了国大党，在印度政治上变成一个孤單的人物。后来这位过去的“联合大使”，不幸竟然跟伊斯蘭教教派主义

中最反动的分子混在一起了。

稳健派，或者说自由主义派，自然跟国大党没有来往。这些人物对于国大党避之唯恐不及，并且还参加了政府，在新的组织中充任部长和高级官员，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反对国大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差不多都得到了满足，政府答应了某些改革，因此他们用不着再去争取什么了。正当全国群情激昂，一天更比一天革命化的时候，这些人物公开变成了反革命，变成政府的一部分。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养成一种用官方观点看问题的习惯。他们不再是名副其实的政党，而只是分散在几个大城市中的为数有限的个人而已。沙斯特里先生当了钦差大臣，受英国政府的委托，访问英联邦各自治领和美国，猛烈抨击国大党和印度人反对英国政府的斗争。

可是这些自由主义派也并不怎样愉快。脱离了自己的同胞，感觉到同胞的敌视，即使自己没有看到或听到，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愉快的经验。群众运动对于不服从的人是不客气的，尽管甘地的一再警告使不合作运动对它的反对者比较温和。就令如此，整个气氛使反对不合作运动的人透不过气来，而使拥护不合作运动的人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群众行动和真正的革命运动通常会产生这种双重效果：它一方面鼓励和发扬了参加群众运动或赞助群众运动的人的品格，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则在心理上压制了反对群众运动的人。

因此有些人不满意，说不合作运动没有容忍精神，倾向于死板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种责难有些道理。道理就是：不合作运动是群众运动，由一个受印度广大群众忠诚爱戴的、有领导才干的人领导。更重要的道理在于这种运动对于群众所产生的影响。大

家有一种如釋重負，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觉。压迫人們低头的恐惧心理减退了，人們挺起腰，抬起头来。偏僻市集的老百姓也在紛紛談論国大党和自主問題（因为那格浦尔會議終於确定自主为斗争的目标）以及旁遮普和基拉法所發生的事情。基拉法这个字在大多数农村中的人們听来帶有奇特的意义，人們以为这个字从烏尔都文“khilaf”轉来，它的意义就是“对抗”或“反对”，因此人們認為所謂基拉法就是反对政府。不消說，人們也談論自己在經濟方面的具体的痛苦，各种集会和會議使群众受了很好的政治教育。

在一九二一年中間，我們忙于国大党綱領的人們一直都感到兴奋，我們充滿了乐观和热情，我們感到为主义而奋斗的快乐。我們沒有疑惑或犹豫的苦惱。我們的道路明确地摆在我們前面，我們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着前进。我們努力工作，比过去更加努力，因为我們知道很快就要跟政府發生冲突，我們想在还能够做事的时候，好好地努力干一番。

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認識了自由，并对这种自由感到驕傲。往日受压迫和失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过去为了怕当局找麻煩，总是私下耳語，或用法律名詞轉弯抹角地說話，現在这种情形沒有了。我們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而且公开大声講，毫無顧忌。我們担心后果嗎？坐牢嗎？我們正求之不得，因为这对于我們的事業有利。那些經常在我們周圍盯梢的偵探和特务变成了一些可憐虫，因为我們一切都是公开的，他們沒有什麼秘密可以發現了。

我們感到滿意，因为我們做着改变印度面貌的有效的政治工作，而且我們相信能够使印度早些获得自由。我們不但有这种滿意的心情，而且我們在道义方面比我們的对手强，我們的目標和方法都比他們高一筹。我們為我們的領袖以及他所倡导的独特的方

法而驕傲，我們經常沉湎于自滿之中。在战斗中，并且当我们自己鼓动这种战斗时，我們感到內心的恬靜。

我們的情緒很高，政府的情緒却很低。政府不了解当时所發生的事情。他們所認識的印度旧秩序在崩潰中。到处出現了一种新的積極精神，自力更生和大無畏的精神。維持英国在印度統治的大支柱——威望——显然在削弱。小規模的鎮压行动反而巩固了运动。政府在采取行动对付重要的領袖以前，犹豫了很久，因为政府不知道这种行动会引起什么后果。印度軍隊靠得住嗎？警察会执行命令嗎？据印度总督里丁勋爵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自称，他們当时感到“彷徨苦惱”。

联合省政府在一九二一年夏天秘密地向各地方官員發出一个有趣的通知。这个通知后来在报纸上發表了。这个通知帶着苦悶的心情說“主动权”經常操在“敌人”（指国大党而言）的手中，并且指出这是一种不幸的事情。当时曾經提出了夺回主动权的各种办法，其中有一种办法就是成立那些可笑的团体“阿曼·薩巴斯”。据说政府方面根据自由主义派部長們的建議才决定采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不合作运动。

形势非常緊張，英国官員們的神經有点兒吃不消。印度人民的反对情緒和反抗精神日益高漲，像雨季的陰云籠罩着官方的印度，可是因为采用和平抵抗方法，官方抓不着什么把柄和机会来实行强力鎮压。一般英国人不相信非暴力主义的好心好意，他們認為这只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一种大陰謀，总有一天要爆發猛烈的变乱。英国人从小就相信东方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在东方的商場和窄狹的巷道里經常醞釀着各种秘密陰謀，因此凡是跟这些認為是神秘地方有關的問題，英国人总想不通。他們不打算去了解那并不

神秘并且是容易了解的东方人。英国人远远避开东方人，只从偵探和秘密結社所講的故事中去了解东方人，因而总是想入非非，疑神疑鬼了。因此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旁遮普發生了慘案。当时地方当局和英国人突然感到恐惧，到处都看到危險，認為会普遍發生暴动，再一次發生叛变，杀人。由于盲目地、本能地企圖不惜任何代价地进行自衛，英国人采取駭人听闻的行动，雅利安瓦拉和阿姆利則克罗林巷的大屠杀是人所共知的。

一九二一年是非常緊張的一年，有許多事情使得官方憤怒、苦惱、心神不安。实际發生的事情已經够糟了，官方疑神疑鬼的想法却更坏。我記得有一件事可以說明这种疑神疑鬼的想法。我妹妹史华拉普的婚礼定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在阿拉哈巴城举行，正如通常这类事情一样，婚礼的日期是参照山伐底历来定的，黄道吉日就这样定下来了。甘地和一些国大党重要人物（包括阿里兄弟在內）被邀請参加这次婚礼。为了这些人的方便，国大党工作委員會决定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在阿拉哈巴城开会。当地国大党人想利用外边著名領袖光临的机会，組織大規模的地方會議，預料附近各地农村有大批的农民前来参加。

因为举行这些政治性的集会，阿拉哈巴很熱鬧。这使有些人的神經感到緊張。有一天一个当律师的朋友說許多英国人心神不安，并且預料城內要發生突然事变。这些英国人怀疑他們所雇用的印度僕人，口袋中帶着手槍以防不測。甚至有人私下傳說英国人已經把阿拉哈巴要塞准备好了，作为必要时英国居民避难的地方。我很感到惊奇，我不了解正当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要光临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会想到在和平宁靜的阿拉哈巴城里可能發生暴动。原来据說五月十日（我妹妹無意中預定結婚的日子）是一八五

七年米路特暴动的紀念日，人們准备紀念这件事。

一九二一年基拉法运动很出風头，許多摩尔維和伊斯蘭教領袖積極参加政治斗争。他們使运动帶有明确的宗教色彩，这使穆斯林受了很大的影响。許多西方化的穆斯林并不特別具有宗教的心情，也开始留鬍子，遵奉正統派的教規。由于新思想和西方化的逐漸發展，摩尔維的影响和威信原来逐漸在減退中，現在又重新發展，并且左右了穆斯林。阿里兄弟本人热心宗教，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甘地也出力不少，他很重視摩尔維和大毛拉。

甘地經常強調运动在宗教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意义。他的宗教并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明确的宗教人生观。整个运动很强烈地受了这种影响。就群众而言，运动帶有复兴主义的性質。大多数国大党工作人員当然拚命学他們的領袖，甚至还轉述他的那一套話，但是工作委員會中甘地的几个主要同事——我的父亲、达斯、拉吉巴特·拉伊等人——却不是一般所謂的宗教人物。他們只从政治的觀點考虑政治問題。在他們的公开演說中并不談到宗教問題。可是他們的言論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他們以身作則的感召力。他們不是已經抛弃了許多世俗所重視的东西，过着朴素的生活嗎？这种作風被人認為是宗教的表現，因而助長了复兴主义的發展。

我对于政治活动中这种宗教因素——包括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在內——的發展，經常感到苦惱。我一点兒也不喜欢这种現象。摩尔維、大毛拉、斯瓦米[⊖]之流在公开講演中所說的話，在我看来，有許多是十分可嘆的。我認為他們对于历史、社会学和經濟学的看法都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加上了宗教的色彩，使人的頭腦不清楚。

⊖ 大毛拉是伊斯蘭教的尊称头銜；斯瓦米是印度教的尊称头銜。

甘地所用的某些話有时我也認為有点不入耳，例如他一再提及罗摩时代，認為这是会重新出現的黄金时代。我無力加以干涉。我自己安慰自己，認為甘地之所以用这些字，是因为这些字是群众熟悉和了解的。甘地很懂得怎样去打动群众的心。


我并不过多地关心这些事。我的工作和运动的發展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時間为这些小事而操心。在当时我認為这些是小事。在一个广大的运动中，有各色各样的人参加。只要我們的主要方向是正确的，少数逆流并不碍事。至于甘地本人，他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物，他有时所講的話几乎是一般現代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們認為我們跟他很熟悉，認識他是一个偉大的，奇特的人物，一个杰出的領袖。我們相信他，至少暫時讓他完全自由行事。我們中間常常討論甘地的古怪脾气和特点，并且半开玩笑地說，一旦自主实现之后，就不应当鼓励这种古怪的脾气。

我們当中有許多人在政治和其他問題上受了甘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宗教方面也不能完全逃脫甘地的影响。直接进攻也許不会成功，間接接触对于破坏防御有很大用处。宗教的外表活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尤其討厭所謂宗教人物們剝削人民的行为。尽管如此，我对于宗教的态度已經緩和了。在一九二一年时我比童年时代以来其他时候更具有宗教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也还不是十分接近宗教的。

我所欽佩的是不合作运动和坚持真理运动在道义和倫理方面的意义。我并不絕對信奉非暴力主义，或者永远接受这种主义，但是这种主义对我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使我相信鑒于印度的环境，和我們的背景及傳統，这种政策是我們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政治的淨化——不是用这一詞的狭义的宗教意义——在我看来似乎

是一个好主意。一个高尚的目的应当用高尚的手段去实现。这不仅是一个好的伦理观念，而且也是健全的实际政治主张，因为不好的手段往往达不到目的，还会引起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向这种手段屈服有损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自尊心。一个人怎样能够避免不受这种不好的影响呢？如果我们卑躬屈节，俯首贴耳，我们怎样能够很快和庄严地向前迈进呢？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不合作运动提供了我所要求的東西——民族自由和消灭对被压迫者的剥削以及满足了我的道德观并使我有个人自由的感觉的手段。我个人感到极大的满意，对于可能的失败也并不在乎，因为这种失败只能是暂时的失败。我并不了解或倾向“薄伽梵歌”的玄学部分，可是我喜欢读这些诗篇，——每晚在甘地学园祈祷会中所背诵的——其中说道一个人应当怎样做：沉着，镇静，不动感情，作自己的工作，不过分担心自己的行动的结果。我自己既不沉着，也不冷静，因而对这种理想特别感兴趣。



第十一章 一九二一年和第一次入獄

就我們而言，一九二一年是多事的一年。民族主义、政治、宗教、神秘主义、狂热等当时錯綜复杂地結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后面的中心問題是农村中的騷动和大城市中日益展开的工人运动。这些五光十色的，有时还互相冲突的不滿情緒在民族主义和一种籠統的但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匯合了。可是民族主义的成分很复杂，其中包含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一部分眼光望着印度境外的伊斯蘭教民族主义，以及跟时代精神更协调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暂时互相結合，到处都是印度教—伊斯蘭教万岁。可注意的是甘地似乎有魔力把各阶级，各不同集团的人团结在一起，为同一目标而斗争。借用一句有人应用于另外一位領袖的話，甘地确实是“代表民众各种要求的象征”。

更可注意的是这些要求和热情本来是針對着外族統治者的，但很少仇視外族統治者的情緒。民族主义本質上是一种反抗情緒，它的生長和發展依靠对别的民族，在附庸国則特别是对外族統治者的仇恨和憤怒。一九二一年时印度人当然对英国人抱仇恨和憤怒，可是跟其他情况相同的国家相比，这种仇恨和憤怒是非常有限的。用不着說，这是因为甘地坚持非暴力主义的結果。另外一个原因則是运动开展后，全国有一种解脫的心情，認識了自己的力量，一般人普遍認為当我们进行得非常順利并且在最近的將來

就可以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們何必滿怀仇恨和憤怒呢？我們大可表示寬洪大量。

但是对于少数帮助敌人反对民族运动的本国同胞，我們心里却并不怎样寬容，虽然我們的行动很慎重而且恰当。这倒不是什么仇恨或憤怒的問題，因为这些人一点力量也沒有，我們大可置之不理，可是由于他們的弱点和投机，由于他們出卖民族光荣和民族自尊心，我們心里觉得他們卑鄙可耻。

我們在兴奋心情的支配下干得很起勁，可是对于目标却沒有認識很清楚。当时我們完全不注意理論問題，忽視了运动的指导理論以及我們应有的明确目标，現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莫名其妙。当然我們大家都高談“自主”，可是每个人对于“自主”的解釋不同。大多数年輕人認為“自主”就是指政治上的独立和民主政治而言，我們在公开演說时也就照着这样講。我們有許多人認為結果必然会減輕工农群众的負担，这种重担压得工人和农民透不过气来。但是我們大多数領袖显然認為“自主”的意义比独立輕得多。在这个問題上，甘地故意含糊其辞，他不鼓励大家把問題搞清楚。然而他常常含糊而又肯定地替下層被压迫的人說話，这使我們許多人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他也說一些安慰上層大人先生們的話。甘地在处理問題时，从来不重視从理智方面去考虑問題，而只強調品格和誠心。他培养了印度人的品格和骨气，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也有不少人既沒有品格，也沒有骨气，反而認為身体虛弱，面貌無神就是誠心的表現。

群众所表現的惊人的坚强态度使我們充滿自信心。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腰参加全国有紀律的联合行动了。我們認為这种行动本身就会使群众产生一种不可

抵抗的力量。我們忽視了用思想指導行動的必要性；我們忘記了假使沒有自覺的認識和目標，群眾的精力和熱情一定會煙消雲散的。在運動中，復興主義的成分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動着我們向前進，我們認為採用非暴力主義的方法進行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糾正錯誤，是我們民族在命運上應當帶給全世界的新使命。我們也像各國人民一樣，錯誤地認為自己是一種特殊的民族。非暴力主義在道德上的力量和戰爭以及各種暴力鬥爭相等。它不僅是道德方面的可以採取的辦法，而且很有實效。甘地對於機器和近代文明的舊觀點，我們很少有人贊同。我們認為就是甘地自己也認為這些觀點是空想的，不大適用於近代的情形。我們大多數人的確不想否定近代文明的各種成就，雖然我們認為這種近代文明必須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變才能適合印度的情況。就我個人來說，我始終喜歡大機器，喜歡便利旅行的交通工具。然而甘地的思想使許多人受了影響，使他們對於機器和機器所產生的後果採取懷疑的態度。因此有些人的眼光看着未來，另外一些人則想念着過去。奇怪的是這兩種人都一致認識他們所採取的聯合行動的價值，這就使大家容易忍受犧牲，克制自己。

我把全部精力和時間放在運動上，其他許多人也像我一樣。我拋棄了其他的社會關係，拋棄了老朋友，書也很少看。報紙呢，也只有遇到和手頭的工作有關的時候才翻一下。我本來經常閱讀當時出版的書籍，注意國際時事的發展，現在可忙不過來了。我幾乎忘掉了我的家庭，忘掉了我的妻子和女兒。很久以後我才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對於他們是多麼重大的負擔，使他們多麼苦惱，我的妻子對我顯得多麼耐煩和容忍。我在辦公室、委員會議和群眾中過日子。當時流行的口號是“到農村中去！”我們到各地訪問農村，

在农民的集会上發表演說。我和群众在一起感到兴奋，也感到影响群众的力量。我开始懂得一点群众心理，認識了城市大众和农民的区别。虽然風塵僕僕，諸多不便，群众集会时的你推我挤，这种生活我也習慣了，不以为苦，虽然群众缺少紀律性也不时使我苦惱。从那个时候起，我有时候遇到声势汹汹的群众，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引起極大的乱子。我后来發現我在这个时期所获得的經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信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老老实实地和群众打交道，信任群众，群众一直对我表示客气和敬重，虽然我們之間对若干事情的看法还不一致。不过群众的情緒常常变化，我將来的經驗也許不相同。

我接近群众，群众也接近我，可是我和群众沒有完全打成一片，我始終覺得我和群众之間有距离。我用批判的眼光看群众。我个人在習慣、希望、認識和精神的看法各方面都跟我周圍成千成万的人大不相同，我始終不了解，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居然能博得这些人的好感和相当的信任。是因为他們对我估計过高，把我看成一种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人物嗎？等他們对我認識更清楚的时候，他們会容忍我嗎？我是在假面目下取得他們的好感嗎？我对他們很坦白、爽直；有时对他們講話很不客气，批評他們喜欢的習慣和信仰，他們还是迁就我。可是我始終摆脱不了这种想法：他們敬重我并不是由于認識了我的真面目，而是由于他們把我看成他們想像中的人物。这种想像中的假人物能維持好久呢？为什么要讓这种假人物維持下去呢？一旦这种想像中的人物倒了，他們認識了我的真面目，那时候会發生什么事呢？

我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爱好虛榮，可是对于这些朴实的群众却談不上虛榮。他們不像我們这些自視比他們高一等的中产階級人

物那样装模作样，那样庸俗。他们的确很迟钝，就个人而言，很平淡无奇；可是聚集成群众后他们就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心和快要发生惨剧的感觉。

我们这些被推选出来的人开会时在讲台上的表演就不相同。装模作样的事情很多，講演时夸夸其谈的庸俗作法并不是没有。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犯了这种毛病，有些基拉法运动的小领袖们的毛病比其他的人更严重。要在讲台上面对广大听众，表现很自然，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这些人以前很少有这种经验。因此我们尽量表现出我们想像中作为领袖人物应当表现的样子，令人看来很严肃、审慎，丝毫没有轻浮或轻佻的气息。我们走路、讲话或微笑的时候，我们心里盘算着群众成千成万双的眼睛注意着我们，因而我们很小心。我们讲话时往往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得要领。一个人要能像别人看自己那样认识自己，当然是困难的事。我对自己的缺点看不清楚，不能批评自己，因此我留心观察别人，发现很多可笑的事情。以后我想到我自己的言行也许在别人看起来认为同样可笑，我不由得深感不安。

在一九二一年整年中，国大党工作人员个别被捕判刑的事发生过，但大批捕人的事还没有。阿里兄弟因为煽动印度军队叛变被处长期徒刑。他们在“煽动”时所讲的话由成千成万的人们在各地讲台上重复地讲。那一年的夏天有人扬言说因为我发表了某些演说要以叛乱罪对我起诉，可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到年底，事情冒头了。威尔士亲王要到印度来，国大党宣布抵制跟亲王这次访问有关的一切社交活动。十一月底，当局宣布孟加拉国大党志愿队为非法组织。接着联合省采取同样行动。达斯向孟加拉发出动人的宣言，其中说：

“我覺得手上帶着手銬，身上捆着鐵鏈，這是受人束縛的痛苦。整個印度是一個大監牢。國大黨的工作應當堅持下去。我被捕與否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生死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在聯合省起來反抗當局的禁令，不僅宣布國大黨志願隊要繼續活動，而且還在報紙上公布了志願隊隊員的名單。第一批名單由我父親領銜。他本來不是志願隊的隊員，只是為了表示違抗政府的命令他才加入志願隊，簽了名。十二月初，在威爾士親王到聯合省以前幾天，大批捕人的事開始了。

我們認識局勢即將急轉直下，國大黨和政府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快要爆發了。監牢對於我還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坐牢是什麼味道。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阿拉哈巴的國大黨辦公室打算把積壓的事情清理一下，一個職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對我說，警察帶着搜查証已經把辦公室包圍起來了。我少不得有些激動，因為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然而我當時很想表現一下自己，不管警察來來往往，我擺出十分冷靜和鎮定的樣子，我叫一個職員陪警官去搜查，其餘的人則照常辦公。過了一會，剛在辦公室外面被捕的一個朋友和同事，由一個警察陪着來向我告別，我當時故意裝出把這些新奇的事情看作家常便飯的樣子，對待這個同事冷酷無情，我毫不在乎地要他和警察在旁邊等一等，讓我把手頭的信寫好了再談。不久消息傳來，城內又有許多人被捕。最後我決定回家去打聽一下情況。一到家，我就看見警察在搜查我家中的一部分地方，警察是來逮捕父親和我的。

這件事比我們所能夠做的任何事情更有利于我們抵制威爾士親王的計劃。親王無論到那里總遇到總罷業，街道上冷清清的沒有人。阿拉哈巴城在他來的時候好像一座死城。兩、三天後，加爾

各答那样大城市的一切活动突然暂时停止了，这使威尔士亲王很难堪，他本人并没有什么过失，人们对他也没有恶感。然而印度政府却利用他来维持其日益衰落的威望。


当时各地都发生捉人和判刑的事，孟加拉和联合省尤其闹得凶。在这些省里，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数以千计。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城市里的人，去坐牢的志愿队员源源不绝。联合省的国大党委员会在开会时全体（五十五个人）被捕。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人，受了群众愤怒情绪的感动，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也卷进了这个浪潮，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却去坐牢。青年们拥进警车不肯走下来。每天晚上我们从监牢里听到外面开来一辆一辆的警车，人们高呼我们的口号。监牢里挤满了人，监狱官对于这种非常现象无法可想。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警车带了逮捕证出去要捉一定数目的人回来（没有写名字，也不可能写名字），可是实际带回来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人数多。监狱官对于这种怪事不知道怎样办，因为监狱手册中找不到有关这种问题的规定。

后来政府逐渐放弃了乱捕人的政策，只逮捕有名的工作人员。同时，群众一时的热情逐渐冷静下来，由于可靠的工作人员都被捕了，群众缺乏领导，不知道怎样办，无可奈何的心情也日益增加。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改变，空气仍然很紧张，充满了革命的可能性。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二年一月间，据估计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而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三万人。虽然大多数有名人物和工作人员被关在监牢里，整个斗争的领导人甘地仍然在外边自由活动，每天发出鼓励人心的宣言和指示，制止许多不妥当的活动。政府一直没有动甘地，怕的是逮捕甘地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后果——印度

軍隊和警察對於這件事的反响。

一九二二年二月初，整個局勢忽然起了變化。我們在監獄里很驚慌地聽說甘地在鬥爭中停止了攻勢，取消了和平抵抗。我們從報上知道甘地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曹里·曹拉村附近出了事。在那里，一群村民為了報復警察的壓迫，放火燒了警察所，燒死了五、六名警察。

當時我們似乎正在鞏固陣地，各方面向前推進，忽然聽說鬥爭停止了，不由得感到憤怒。但是我們在監牢里所表示的失望和憤怒沒有什麼用處；和平抵抗停止了，不合作運動消沉下去。政府幾個月來搞得焦頭爛額，現在可以鬆一口氣，而且第一次有了採取主動的機會。幾個星期後，政府逮捕甘地，並且把他判處長期徒刑。



第十二章 非暴力主义与武力政策

曹里·曹拉事件后，我們的运动突然停止，我想国大党的著名領袖差不多全都表示憤慨，只有甘地是例外。我父亲当时在監獄中深为不安。年輕人当然更加激动。我們日益增長的希望幻灭了，这种心理反响是意料中的事。停止运动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更使我們苦惱。曹里·曹拉事件是一个不幸事件，跟非暴力运动的精神完全相反。但是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們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至少在一定时期內停止嗎？如果說这是个別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們看来，要保証不發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們必須使三亿多印度人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訓練后才能前进嗎？即令如此，我們当中有多少人敢說，我們在警察極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十分斯斯文文呢？即令我們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們运动中来的暗探和內奸采取暴力行动或煽动別人从事暴力行动，我們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进行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那么非暴力的抵抗方法必然失敗。

我們接受了非暴力的抵抗方法，国大党相信这种方法行之有效，把这种方法認作自己的方法。甘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种方法，提出这种不仅是正确的方法，而且是爭取实现我們的目的是最有

效的方法。非暴力抵抗的方法虽然名称上是消极的，却是一种有推动力量的方法，并不是俯首贴耳服从专制魔王的意志，并不是怯弱者逃避行动的口实，而是勇敢的人对坏人坏事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然而如果少数奇怪的人——也许就是冒充我们朋友的敌人——能够用轻举妄动的行为来破坏或停止我们的运动，那么就是最勇敢、最坚强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

甘地用他丰富的辩才和说服力要求人们采用非暴力的方法，采取和平的不合作办法。他的话朴素、简明；他的声音和姿态冷静、明确、不动感情。然而这冷冰冰的外表后面却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开动了我们的脑筋。甘地所指出的道路是辛苦困难的，但是那是一条勇敢的道路，可以达到自由的目标。由于这种希望，我们有了信心向前迈进。甘地在一九二〇年写过一篇题为“武力政策”的有名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我深信假如只有在怯懦和暴力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时，我将劝人选择暴力……我宁愿要印度采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荣誉，而不愿印度卑躬屈节、含垢忍辱地听任人家侮辱，失去自己的荣誉。可是我认为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多，宽恕比惩罚的气魄更大……”

“宽恕使军人更可爱。可是只有操着惩罚权的时候，自制才算得宽恕。一个毫无办法，只好任人摆布的人谈不上宽恕。老鼠被猫撕得粉碎的时候是不会宽恕猫的。但是我不认为印度是毫无办法的国家，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见。力量的来源不是体力而是坚强的意志……”

“我不是幻想家。我自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非

暴力的信仰不仅聖人应当采用，就是一般普通人也应当采用。非暴力是人类的法則，正如暴力是野兽的法則一样。野兽的精神潜伏着不起作用，它除开体力外不知道有其他法則。人类的尊严需要服从更高的法則——精神力。

“因此我冒昧地向印度人提出古代的自我牺牲的法則。在坚持真理派及其各支派看来，不合作运动与和平抵抗运动只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新名詞而已。在暴力中間發現非暴力法則的聖人，是比科学家牛頓更偉大的天才，他們本人是比威灵頓[⊖]更偉大的战士。他們懂得使用武力，他們認識了武力的無用，因而轉而宣傳救世的方法不在暴力而在非暴力。

“非暴力在積極方面的意义就是自覺地忍受苦难。这并不是說伏伏貼貼地服从坏人的主意，而是說用自己的整个精神去反对專制魔王的意志。遵循我們这种法則，單独一个人就可以反抗不公正的帝国的全部威力，保全他自己的荣誉、他的宗教和他的灵魂，并且替那个帝国的沒落或革新打下基础。

“因此我并不是因为印度衰弱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而正是因为認識了印度的力量我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我要印度認識它自己有一个不会灭亡的灵魂，尽管在物質方面有弱点，而能够取得胜利，抵抗整个世界的物質綜合力量。

“我把不合作运动跟新芬运动分开，因为我認為不合作运动不能和暴力并行。可是我要求暴力主义者不妨試用一下和平的不合作方法。这种方法不会因为本身內部存在的弱点而失敗，也許会因为响应的人少而失敗。到了那个时候就会产生真正的危險。那

⊖ 威灵頓(一七六〇——一八五二)是英国將軍；一七九六年他的哥哥当印度总督时到过印度；在打败拿破侖的战役中立过功；曾任英国首相。——譯者

些再不能繼續忍受民族耻辱的有气节的人就要發泄他們的憤怒了，他們會采用暴力手段。我認爲他們這樣做一定會失敗，救不了他們自己，也救不了他們的國家。如果印度采用武力政策，也許可以暫時取得勝利。可是那就不再是我心中引以自豪的印度了。我熱愛印度，因為我的一切都是它給我的，我絕對相信印度對全世界負有使命。”

這番議論使我們感動，然而在我們和整個國大黨看來，非暴力方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宗教，或者是什麼不容爭辯的教條。它只能是產生某些結果的方針和方法，要根據所產生的結果判斷這種方針和方法。個人把它看作宗教，看作不容爭辯的信仰也未始不可。但是任何政治團體，只要它還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團體的時候，就不能這樣做。

曹里·曹拉事件及其後果使我們研究非暴力方法。我們認爲如果甘地停止和平抵抗運動的理由正確，那麼我們的敵人就可以製造一些情況，迫使我們放棄鬥爭。這是非暴力方法本身的過失還是甘地對這種方法的解釋有毛病呢？總之，甘地是非暴力方法的創造者和發起人，關於這種方法的解釋，誰比他更高明呢？如果沒有甘地，還會有我們的運動嗎？

若干年後，在一九三〇年和平抵抗運動開始以前，甘地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這使我們很滿意。他說不應當因為發生了個別的暴力行為就放棄和平抵抗運動。如果由於發生了這種幾乎是不能避免的事情而就認爲非暴力的方法不能用，那麼這種方法顯然不是任何時機都可以應用的理想方法，這點是甘地不肯承認的。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是正確的方法，適合一切情況，就是在敵對的氣氛中，也可以有限度地運用。這種解釋擴大了非暴力行動的範圍。

我不知道它是否代表甘地思想的变化。

事实上，一九二二年二月和平抵抗运动的中止并不只是由于曹里·曹拉事件，虽然多数人是这样想的。曹里·曹拉事件只是最后爆发的导火线。甘地作事往往凭本能。由于跟群众长久密切的联系，他像一般伟大的群众领袖一样养成了一种新的感觉，使他能够了解群众的感情，群众作些什么事，能够作些什么事。他根据这种本能的感覺，决定他的行动，然后为了安慰那些表示惊奇和愤愤不平的同事，他用各种理由说明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决定。这种表面上的说明往往不够，曹里·曹拉事件发生后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和纪律在消失中。我们的优秀分子几乎全部在监牢里，群众一向很少受过训练，不能自己坚持运动。任何来历不明的人都可以任意主持国大党的委员会。事实上，许多不良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敌人派进来的破坏分子——得了势，甚至控制了若干地方的国大党组织和基拉法组织，没有办法去检查他们。

在这样的斗争中，这类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去坐牢时，领袖人物必须带头，而委托别人继续工作。那时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训练群众进行简单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其他的活动。一九三〇年和以前，这种训练群众的工作曾经进行了好几年，因此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和平抵抗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运动。这种情形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是没有的。群众的兴奋和热情缺少真实的内容。如果运动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个别的暴力行为，到了那个时候政府必然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

这些也许是当时甘地心里所考虑的理由和影响。如果承认了

甘地这种推理方法，承認坚持非暴力方法的必要，那么甘地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必須停止無聊的爭論，重新組織起来。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說甘地的决定是錯誤的，不过这种观点跟非暴力方法無关。二者不可得兼。在那个阶段中，如果政府用血腥的手段摧殘运动当然不能够消灭民族运动，因为民族运动就是在失敗后也会复兴起来的。暫时的挫折反而足以帮助把問題明朗化，建立坚强的骨干。重要的問題不是挫折或显然的失敗，而是原則和理想。如果能够保持原則不受群众的坏影响，那么恢复是很快的。可是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时，我們的原則和目标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只有模糊的自主想法，但是思想不明确，只有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如果全国大規模地發生零星的暴力行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至于自主，不容易捉摸。一般人大多不能長期坚持斗争。尽管对外国的統治存在着普遍的不滿，对国大党普遍地表示同情，可是沒有足够的骨干或組織，因而不能持久。就是那些去坐牢的大批人的行动也是憑一时的感情冲动，以为整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一九二二年停止和平抵抗运动的决定也許是正确的，虽然作事的方法还有許多缺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搖了人心。

突然制止和平抵抗运动可能促进了国内另外一个不幸事件的發展。政治斗争中的零星暴力行为固然停止了，可是被压制的暴力得想法發泄，因而在此后的数年中間，教派糾紛更加剧烈。因为广大群众拥护不合作运动，拥护和平抵抗运动，各种教派主义者——大部分人在政治上是不反动的——只好潜伏着，靜待时机。現在他們出头露面了。另外还有許多人，特务分子以及那些企圖制造教派摩擦以取悅政府当局的人們也用这个題目大做文章。摩

普拉起义以及对这次起义的残酷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人被捕后，被关在密封的火车厢里活活地闷死！——给了煽动教派纠纷的人们一个把柄。如果和平抵抗运动没有停止，被政府摧残，那么教派间的恶感可能会少一些，可能会少一些剩余的精力来进行以后的教派冲突。

在和平抵抗运动中止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平抵抗运动开始的时候，政府张惶失措，总督里丁勋爵在一次公开谈话中表示他很焦急，不知道怎样办。那时威尔士亲王在印度，这加重了政府的责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各地大批捕人后，政府在当月中企图跟国大党达成谅解。特别是由于威尔士亲王即将访问加尔各答。孟加拉政府的代表和当时在监狱中的达斯之间曾经进行过一些非正式谈判。当时似乎曾经建议由政府 and 国大党举行一个小的圆桌会议。由于甘地坚持要当时在喀喇蚩监狱中的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参加这种圆桌会议，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因而流产了。

达斯不赞成甘地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他出狱后公开批评甘地，说甘地犯了错误。我们大部分人在监狱中不知道事情经过的详细情形，不了解事实就很难说谁是谁非。不过在那个阶段上，圆桌会议似乎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政府方面只是企图利用这种会议渡过威尔士亲王访问加尔各答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九年以后印度民族和国大党比以前强大得多，曾经举行了这种会议，也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结果。除此而外，我认为甘地坚持要阿里参加会议的行动完全有理由。阿里不仅是国大党的一个领袖，而且是基拉法运动的领袖，基拉法问题当时在国大党政纲上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因而阿里参加这种会

議是必要的。任何政策，任何安排，如果牽涉到丟掉一个同事，那么这种政策，这种安排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政府不准备把阿里从監獄中釋放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會議不会产生任何結果。

我的父亲和我由不同的法院以不同的罪名各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在法院中的审問是很滑稽的，我們照例不参加。要从我們的演講中及其他活动中找出充分資料来定罪当然很容易。可是法院当时所选用的材料却有趣得很。父亲以参加非法組織——国大党的志願队——的罪名受审，法院所提出的証据是他用印地文签字的一个申請表。表上所签的名字的确是父亲的名字，可是父亲在过去沒有用印地文签过名，并且很少有人認識他的印地文签字。法院中出現了一位潦倒的紳士立誓証明这个签字是我父亲的签字。这个人完全不識字，他把签字倒拿着看。我的女兒那时仅仅四岁，我父亲受审时一直抱着她，因而她也获得了第一次上法院受审的經驗。

我的罪名是散發号召罢業的傳單。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行动不能算为有罪，可是我相信現在就有罪了，因为我們現在正很快地走向自治領的地位。我終于被判处徒刑。三个月后我在監獄中坐牢（我跟父亲和其他一些人在一起坐牢），我得了消息說当局复审了我的案子，認為把我錯判了罪，应当釋放出獄。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沒有什么人替我說过話。和平抵抗运动停止了，这显然使复审的法官們活动起来。我出了獄，讓父亲留在那里，这实在使我难过。

我出獄后决定馬上到阿麦达巴德去看甘地。在我抵达阿麦达巴德城以前，甘地就被捕了，因此我在沙巴馬蒂監獄里会見甘地。在他受审时我出席旁听。这是一个值得紀念的情景，我們当时在

場的人是不会忘記的。法官是一个英国人，举止尊严而又帶有感情。甘地对法院的講話很动人，我們听了他的講話后，感情上很激动，他講話时所用的生动詞句，所表現的突出形象，在我們离开法院后，深深地留在我們的心中。

我回到阿拉哈巴城。我感到难过，孤單，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而許多朋友和同志却仍然在尝鉄窗風味。我發現国大党組織的活动有缺点，設法加以改进。我特別关心抵制外国布的运动。虽然和平抵抗运动停止了，抵制外国布的运动仍然繼續进行。阿拉哈巴的布商几乎全体保証不进口或出售外国布，并且因此而成立了一个联合会，規定凡是破坏运动的人应处罰金。我發現有些大布商破坏了他們自己所提供的保証，暗中进口外国布。这种行为对那些坚决执行保証的商人是不公平的。我們曾經劝告破坏保証的商人，但結果等于零，而布商联合会似乎軟弱無力，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們决定派糾察队去糾察那些破坏运动的布店。这个風声傳出后，立刻产生結果，破坏运动的布商馬上繳付罰金，并重新提供保証。从罰金所得的收入都送交布商联合会。

兩、三天后，我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参加跟布商談判的人。我被控的罪名是威胁和勒索！我还另外有一些罪名，包括叛乱罪在內。我沒有替自己辯护，但是我在法庭上發表長篇声明。他們对我至少根据三項罪名——包括威胁和勒索——定罪，可是叛乱罪名沒有处理。大概法官們認為我应得的处分已經够多了，用不着再加上叛乱罪。現在就我記憶所及，当时有三个判決書，其中兩個判我十八个月徒刑，而且是同时执行的。我一共被判处一年零九个月的徒刑。这是我第二次被判刑。我在外面大約六個星期后又重新回到監獄里去。



第十三章 勒克瑙地方監獄

因为犯政治罪而坐牢，在一九二一年的印度并不算新奇的事。特别是在孟加拉划分运动以后，去坐牢的人源源不绝，他们多数被判处长期徒刑，也有不经审讯就被拘留的。当时印度最伟大的领袖铁拉克就是在晚年被判六年徒刑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和监禁的事更多，阴谋案常常发生，参加阴谋案的人通常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阿里兄弟和艾卜勒·凯拉姆·阿萨德大毛拉就是在战时被拘留的。大战后不久，旁遮普宣布戒严，许多人被捕，以阴谋罪名被控，经过草草审问就被判刑。因此政治性的监禁在印度是屡见不鲜的事。但直到当时为止，人们并不故意去争取政治性的监禁。一个人因为从事政治活动，或者因为秘密警察不喜欢他，因而以政治罪去坐牢，但人们总用尽一切方法，在法院中辩护，以求避免。在南非，情况不同。在那里，甘地和他的信徒在坚持真理运动中树立了另外一个榜样。

但是在一九二一年时，监牢还是一个生疏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监牢内的情形。我们模糊地认为监牢里的人都是些亡命之徒，凶恶的罪犯。我们一提起监牢就联想起隔离、耻辱和痛苦的生活，以及对于前途茫茫的恐惧心理。从一九二〇年开始，人们常常提到坐牢的事，再加以我们许多同志去坐牢了，这就逐渐使我们把坐牢习以为常，并减轻了那种不情愿和抗拒心情。尽管精神上有了准

备，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监牢的时候心里仍然感到十分紧张和惊慌。从那个时候起，十三年来，在印度至少有三十万人因犯政治罪而被捕下狱，虽然在起诉时往往引用刑法中政治罪名以外的其他条款。成千成万的人曾经多次进出监牢，他们了解监牢内部的情形，他们尽量设法使自己适应监牢里的特殊生活——不正常的、痛苦的和非常单调的生活。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正如人们逐渐习惯其他任何事一样。然而当我们每次重新走进监牢的大铁门时，总不免有点激动、紧张、心跳。我们的眼睛不自主地转过去看一看监牢外面的绿树和广阔的空间，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以及在长时期内不能再看到的熟人。

我第一次在监狱里只住了三个月就突然出狱。第一次坐牢对于我们和对于监牢中的看守人员都是一个不安的时期。进来坐牢的大批犯人与过去的犯人不同，这使狱吏们惊慌失措。这些新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好像一股洪流，说不定会把旧日的传统界石冲泻掉。更使人焦心的是新来的人属于各阶级，其中以中产阶级最多。这些不同阶级的人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跟平常的犯人完全不同，不能够用旧日的方法对待他们。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又没有新的办法代替现行的办法，没有先例可援，也没有什么经验。在监牢里的国大党党员一般都不是斯斯文文，唯命是听的。在监牢里，他们由于人多也感到自己的力量。加以监牢外的宣传鼓动，一般人很关心监牢里的情形，这更壮了牢里的人的胆。尽管这样，我们的一般政策还是主张和监牢当局合作。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狱吏们的困难一定多得多。狱卒常常来找我们去参观有我们志愿队在内的收容所，安慰这些志愿队员，或劝他们同意某些事情。

我們是自願來坐牢的。事實上，有許多志願隊員是爭先恐後地擠進來的。因此他們沒一個人會逃走。如果有人想要出去的話，他只要對自己的行動表示歉意或保證以後不再從事這種活動就可以出獄。任何想逃走的企圖只會使自己丟臉，因為逃走的行動就等於退出和平抵抗式的政治活動。我們勒克瑙的監獄長完全認識這一點，他常常告訴獄卒（他是一個汗·薩希卜）說，假如獄卒能夠讓一些國大黨犯人逃走，那麼他一定向政府建議封獄卒為汗·巴哈杜爾。

我們大多數在監獄里的人關在監獄的大牢房里。我們中間有十八個人——我想是為了優待的關係——被關在一所舊的織布房里，房旁有一大塊空地。我的父親，我的兩個堂兄弟和我共同住一間房子，長二十英尺，寬十六英尺。我們可以自由地在各個獄房間走動，並且可以常常接見外邊來獄探視我們的親戚。我們可以看報，報上每天所登載的關於逮捕人和我們鬥爭新發展的消息，保持著一種令人激動的气氛。互相討論和談話占了很多時間，因而我很少讀書，也很少能夠好好地做一點踏實的工作。早上我徹底打掃我們的牢房，洗我父親的衣服和我自己的衣服，紡紗。那時正是冬季，在印度北部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在開頭幾個星期，監獄當局允許我們開班，教志願隊員，教那些不識字的志願隊員學印地文、烏爾都文及其他基本科目。下午我們打排球[⊖]。

以後限制逐漸加嚴了。監獄當局不准我們再離開我們的囚

⊖ 報紙上曾經登載過一個可笑的消息，說在我父親坐牢的時候，聯合省的省督哈科爾特·巴特勒爵士曾經送香檳酒給我父親。這個消息雖然被否認了，却仍然繼續流傳著。事實是：當我父親在監牢的時候，哈科爾特爵士沒有送任何一點東西給我父親，沒有人送香檳酒或其他的酒給他。實際上，我父親在一九二〇年國大黨採用不合作運動后就戒酒了，當時也沒有喝什麼酒。

房，去到大多数志願隊員被拘禁的地方。讀書班當然停止了。大概在这个时候我被开釋出獄。

我在三月初出獄，六七个星期后，到了四月中我又回到監獄里时，我看見情形大大地改变了。父亲轉到內尼監獄去了。在他走后不久，就頒行了新的規定。住在我原来住过的那所大織布房里的全部犯人被送到內監去关在大牢房里，各个牢房間不准互相来往。接見亲友和通信，每月只准一次。伙食比以前坏，虽然可以从外面得到补充。

在我所住的牢房里大約有五十个人，大家挤在一起，每个人的床相距只三四英尺。幸好牢房里的人我几乎全部認識，其中有許多是我的朋友。但是整个白天和夜晚沒有一点兒私生活，这种情形一天更比一天难以忍受。常常是大家众目睽睽地看着你，照例有一些令人苦惱和煩悶的小事，又沒有法子逃避它們，找一个安靜的角落。我們在公开的地方洗澡，洗衣，在牢房四周跑来跑去活动着，我們談話和辯論，直到后来所談所論的都是些陈腔濫調，談不出什么道理来。这种生活是家庭生活枯燥的一面，不过比枯燥的家庭生活更难过一百倍，并且缺少家庭生活所具有的优点，而且这一切又發生在各种不同种类，各种不同趣味的人中間。这对于我們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負擔，我常常渴想独居的好处。若干年后，我在牢里过够了独居和私生活，当时几个月內除間或遇着獄吏外，看不見一个人。我又生活在一种精神上很緊張的狀態中，但是这次我所渴望的却是和适当的人在一起的群居生活。我有时帶着羨慕的心情回想一九二二年在勒克瑙地方監獄的拥挤生活，但是我自己很清楚，在群居和独居二者之間作選擇时，我还是要選擇独居的，只要独居时，我至少能够讀書和写作。

我必須說明當時和我在一起的朋友都是些好人，我們相處得很好。但是我想我們有時彼此互相感到厭煩，希望遠離開朋友，過一點私生活。就我而言，過私生活最輕便的方法就是離開牢房，坐在空地上。那時正是雨季，天空時常有雲，所以坐在空地上不礙事。我冒着酷熱和間或小雨，盡量在牢房外消磨時間。

我躺在露天下面，仰望天空和浮雲，我比過去更加体会到天空和浮雲千變萬化的色彩是多麼美麗。

“注視千變萬化的雲彩，

啊，躺着多麼甜蜜，靜享空閑之樂。”

時間並沒有給我任何快樂，對於我只是一種負擔。但是當我把時間花費於注視雨季時刻變化的雲塊時，我感到愉快和輕鬆。我感到發現了什麼東西似的快樂，似乎逃脫了監禁的生活。我不知道當時的雨季為什麼會給我那樣大的影響。以前和以後的雨季沒有那樣使我感動過。我曾經看過並且欣賞山中和海上的日出和日落，陶醉在日出和日落的美境里，並且暫時被這種美境所感動。但是我認為這是很平常的事，很快就把念頭轉到其他的事上去了。在監牢里看不到日出和日落，看不見地平綫。在早晨很晚的時候，灼熱的太陽照到我們的牆上。監獄里沒有色彩，我們每天所看到的只是天天一樣的土色的牆和牢房的單調的景象，我們的眼睛也逐漸無神。它們渴望能夠看到光明、陰影和色彩。當雨季的雲塊愉快地飛過，表現出各種奇形怪狀和五光十色時，我以驚異而愉快的心情看得出神。有時雲塊散開，可以看到美妙的雨季現象，層層的深藍色，似乎是宇宙的一部分。

限制我們的禁令一天比一天多，戒律比以前更加嚴厲。政府掌握了我們的運動後，因為我們過去膽敢和它作對，盡量和我們為

难。采用各种新的戒律，以及实施这些新戒律的方法，引起了监狱当局和政治犯间的冲突。那时我们一起在监牢的有几百人，在几个月中，我们几乎全体不肯接见任何人，以表示抗议。当局显然认为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是捣乱分子，把我们当中七个人押到监牢里另一个地方去关起来，和主要的狱室隔得很远。被隔离的人中有普鲁绍坦·达斯·坦顿、玛哈德维·德塞、乔治·约塞夫、巴克利西那·夏玛、德伐达斯·甘地和我。

我们被押到一个比较小的监禁室，住在那里有许多不方便。但是总的说来，我倒喜欢换了一个地方。因为新的地方同住的人不挤，可以过比较更清静的个人生活，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或作其他的事。我们跟监狱里其他牢房的同事和监狱外面完全断绝了联系，因为这时当局禁止政治犯看报。

我们虽然看不到报纸，监狱外面仍然传来一些消息。我们通过每月来狱探视的亲友，通过通讯，也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的运动当时正处于低潮状态。动人的时候过去了，胜利似乎是很远很远的事。在监狱外面，国大党分裂成两派——赞成改变派和不变派。赞成改变派由达斯和我父亲领导，主张国大党参加中央参议院和各省参议会的选举，并且在可能时取得这些机构的控制权；不变派由拉贾戈帕拉查里领导，反对对原来的不合作纲领作任何改变。当然，当时甘地在坐牢。在运动高潮时期推动我们大家前进的高尚理想被琐碎的争吵和争权夺利的行为所破坏了。我们体会到在热情高涨和情绪激动的时候作些艰巨冒险的事比在热情减退后每日坚持下去容易得多。从监狱外面传来的消息使我们心灰意懒，再加以监狱里所产生的各种笑话，这更增加了生活中的苦恼。不过我们内心里感到满意，我们保持了

自尊心和尊嚴，我們作得很對，不管後果怎樣。前途很渺茫，不管將來情勢如何變化，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似乎會要把大部分的生命消磨在監牢里。因此我們自己互相談論。我特別記得有一次跟喬治·約塞夫談話，得出這種結論。從那個時候起，約塞夫和我們間的距離愈來愈遠，後來甚至嚴厲地抨擊我們的所作所為。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起我們在一個秋天晚上在勒克瑙地方監獄中的談話。

我們規定了工作和運動。我們的運動就是圍繞着監禁室兜圈子跑，或者像兩頭套在一起的公牛一樣，兩個人合作用皮吊桶從水井里打水來澆監禁所里的小菜園。我們大多數人每天紡一點東西。在冬季日短夜長的日子里，我主要的事就是讀書。典獄長每次來巡查時總看見我在讀書。我這樣一心一意地讀書似乎使他受不了。他曾經就這件事發表過意見，還補充說，就他而論，他實際上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完成了一般的閱讀！像他這樣不願意讀書對於他的上司，一位英國上校，防止麻煩思想的努力當然大有幫助，而且使他後來官運亨通，當了聯合省的監獄總監。

漫長的冬夜和明朗的印度天空使我們對於天上的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我們利用天象圖，找出許多星的位置。每天晚上我們等待這些星的出現，看見它們時感到遇見故人一樣的喜悅。

我們就是這樣消磨日子的，由日而周，由周而月。我們對於這種刻板的生活也逐漸習慣了。但是在外面，真正的担子卻落在我們的母親、妻子和姊妹這些女人的身上。她們等得發急，她們過着自由的生活，但她們心愛的人却在飽嘗鐵窗風味，相形之下，使她們心里難過。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我們第一次被捕後不久，警察開始常常去查問我們在阿拉哈巴的家——“極樂園”。他們去收取父親和我

被處的罰金。国大党的方針是不要交罰金。因此警察常常來扣押并且運走我們一些家具。我的女兒英迪拉，那時才四歲，她看見警察常常來拿走我們的家具，感到非常苦惱，向警察抗議，并且表示極大的不滿。我恐怕這些早年的印象會影響她後來對於整個警察的想法。

監獄當局用一切方法把我們跟一般非政治犯分開，把政治犯關在特監里。但是完全隔離是辦不到的，我們不時跟這些非政治犯接觸，從他們那里（也從我們親身的體驗中）認識了當時監獄生活的真實情況。那里充滿了暴行和貪污。伙食糟透了；我一再嘗一嘗，結果吃不下去。監獄里的看守人員都是些飯桶，薪水很低，但是他們有各種機會向犯人或其親友勒索，借此增加他們的收入。監獄手冊中所規定的各種監獄職員的職責很多，任何人都很難好好地完成這些任務。聯合省管理監獄的一般方針是完全不管改造犯人，或教犯人養成好的習慣，學有用的職業，其他各省的情形恐怕也是這樣。監獄中勞動的目的在使犯人筋疲力竭，吓倒犯人，使他盲目服從[⊖]。當局的想法是：犯人在監獄中經過這樣的折

⊖ 聯合省監獄手冊第九百八十七條規定：

“監獄中的勞動應當主要看作一種懲罰的手段，而不單是使犯人有事可做。獄中勞動要有很高的報酬這個問題也不值得重視。最重要的目的是：監獄中的工作應當是辛苦的、令人討厭的，使作壞事的人想起來就覺得可怕。”

這一條規定在監獄手冊新出的版本中已經刪除掉了。

可以把這種規定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中下述的類似條款比較一下：

第九條 保護社會的措施，其目的不在於使人遭受肉體上的痛苦，降低人的尊嚴；也不是為了報復或懲處。

第二十六條 判刑是一種保護的措施，不應當採用任何酷刑，不應該使犯人受不必要的痛苦。

磨，將來出獄後想起獄中生活仍然會心驚膽戰，就會避免再犯罪回來坐牢。

近幾年來，情形有些好轉。伙食比以前好些，衣服和其他方面也有所改進。這主要是政治犯出獄後在外面宣傳鼓動的結果。由於不合作運動，獄中看守人員的薪水大大地提高了，因為當局想用這種方法收買看守人員，使他們對政府繼續效忠。除此以外，當局也曾經企圖教年紀比較輕的犯人讀書和寫字。這些改革雖然值得歡迎，但對於解決根本問題毫無用處，舊時的精神仍然原封未動。

大多數政治犯也得忍受普通犯人的待遇。政治犯沒有特權，沒有其他特殊待遇。不過因為政治犯比普通犯人厲害、聰明，他們不容易被人利用，也不容易給榨出錢來。因此監獄中的看守人員不喜歡政治犯，一有機會，當政治犯違反監獄規則時，就嚴加懲處。一次，有一個名叫阿薩德的青年政治犯，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因為犯了規，獄官命令他脫光衣服，把他綁起來毒打一頓，鞭子下處，皮開肉爛，他高呼：“甘地萬歲！”打一鞭，叫一次，直到後來他昏了過去，不省人事。後來這個青年人成了印度北部恐怖分子的一個領袖。



第十四章 又一次出獄

監獄里的人常常想念許多東西，最想念的也許是婦女的声音和孩子們的笑声。在監獄中通常听到的声音并不十分悅耳。人們講話時总是粗声粗气并且帶着威胁的口吻，所用的字句非常粗野，而且多半是一些罵人的話。我記得有一次我感到有一种新的需要。那时我在勒克瑙地方監獄里，我忽然想起我有七、八个月沒有听见狗叫了。

我們在勒克瑙監獄里的政治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最后一天全部开釋。当时勒克瑙監獄里的“特等犯”人有一、二百人。凡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或一九二二年初判处一年以下徒刑的人早已滿期出獄了，留在監獄里只是刑期較長的人，以及少数第二次坐牢的人。这次突然获釋，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为事前沒有大赦的消息。省參議會通过決議，贊成大赦政治犯，政府对于这类要求一向很少加以理睬。可是这次情形不同，在政府看来，这次时机很好。国大党已經不再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動，国大党內部鬧得不可开交，留在監獄里的国大党有名人物不多，政府乐得順水推舟做一个人情。

跨出監獄的大門時总使人有一种寬慰和喜悅的感觉。監獄外面的新鮮空气，廣闊的場所，千变万化的街头景色，跟旧时的朋友重見，这一切都使人發生很大的感触，不由得有点兴高采烈。一出

監獄和外面的世界接觸，起初几乎有点歇斯底里的感覺。我們很高興，但這只是一時間的心情，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國大黨的政治情況十分令人氣餒。理想沒有了，代替理想的只是爭權奪利的把戲，各派互相競爭以求控制國大黨，他們所用的方法正是那種使敏感的人提起政治就搖頭的方法。

我當時傾向於完全反對參加參議會，因為在我看來，參加參議會後似乎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妥協的策略，並且繼續不斷地沖淡我們的目標。但是當時並沒有其他政綱向全國人民提出過。不變派強調“建設性的綱領”，實際上就是指社會改革綱領而言，這種綱領主要的優點在於它使我們的工作人員接近群眾。這是不會使那些相信政治行動的人感到滿足的；在直接行動失敗後主張採取議會活動是不可避免的。德希班都·達斯和我的父親是新運動的領導人，他們早就認為議會活動只是搗亂和反對的行動，而不是合作和建設的行動。

達斯一向主張參加立法機構，以便在立法機構里也進行民族鬥爭。我父親的看法和達斯大致相同。一九二〇年時他同意抵制參議會，一部分的原因是他放棄他個人的觀點，接受甘地的觀點。當時他想用全副精神參加鬥爭，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部接受甘地的方案。許多比較年輕的人都很想採用愛爾蘭新芬黨的策略，新芬黨在議會中獲得了議席後，拒絕參加眾議院。我記得在一九二〇年夏天我曾經催促甘地採用這種形式的抵制辦法，但是在處理這種問題時甘地堅持他自己的主張。當時穆罕默德·阿里參加基拉法代表團在歐洲。他回來後，對於所採用的抵制方法也表示遺憾；他是會贊成新芬黨的方法的。但是不管別人對這件事情怎樣想法都是無足輕重的，因為最後還得聽從甘地的意見。甘地是這個運動

的創始人，因此人們認為在細節方面必須讓甘地自由處理。甘地的主要反對理由是：他認為新芬黨的方法，除了和暴力有聯繫外，群眾對它的認識不如於脆號召抵制選舉那樣清楚。他認為當選後不參加參議會在群眾心目中會引起混亂。此外，我們的人一旦當選後他們就自然而然地跟參議會更接近，因而要叫他們不參加參議會是一件難事。我們運動中的紀律性和力量都還不夠，因此很難長期禁止我們的人參加參議會，政府可能通過參議會用各種直接和間接方法收買我們的人，那個時候就會動搖我們的人心。

這些論據都是很有力的，其中有許多在二十年代中期自主黨參加參議會的經驗中獲得了証實。人們不免想問問：假使國大黨在一九二〇年決定爭取參議會，會產生什麼結局呢？當時國大黨在基拉法委員會的支持下，毫無疑問幾乎可以在各省參議會和聯邦院中取得每一個選舉議席。今天（一九三四年八月）又重新談起了國大黨提出候選人參加聯邦院競選的問題，並且成立了議會局。但是一九二〇年以後發生了許多事，加深我們政治和社會機構中的裂痕，不管國大黨在將來的選舉中取得怎樣的勝利，這種勝利不可能是一九二〇年時可能取得的勝利。

我出獄後，有些人正在努力使敵對的派別達成諒解，我跟他們合作。我們的努力沒有什麼成績，我對於贊成改變派和不變派的政見也感到厭煩。我當時擔任國大黨聯合省委員會書記的職務，專心致力於國大黨的組織工作。由於過去一年中間的變動，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工作很努力，但是目的不明確。我不知道怎麼辦。不久在我面前出現了一個新的活動領域。在我出獄幾個星期後，我被勉強拉去主持阿拉哈巴市的工作。這次選舉很突然，在選舉前四十五分鐘，沒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或者可以說甚至沒有人想到

我。直到最后国大党才認為在国大党中我是唯一有胜利把握的人。

那一年全国各地的国大党領袖人物有些当了市政府主席。达斯当了加尔各答第一市長，維沙尔海·巴特尔任孟买市政会的主席，薩达尔·瓦拉拜·巴特尔任阿麦达巴德市的主席。联合省許多大城市的市政府的主席是国大党人。

我开始对各种不同的市政工作感兴趣，并且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市政工作上。有些市政問題引起了極大的兴趣。我研究了市政問題，并且雄心勃勃地計劃市政改革。后来我認識了像現在那样組成的印度市政府，很少有大胆改革的可能。当然工作可以做一些，机构可以整頓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努力。恰好在那个时候我在国大党中的工作更加繁重，我除担任省書記外，还被推任全国总書記。一个人兼任这些职务，我每天常常得工作十五小时，弄得精疲力竭。

从監獄出来回到家里，我看到的第一封信是当时阿拉哈巴高等法院审判長格利伍德·米尔斯爵士寄来的。这封信是在我出獄以前写的，但是很显然他知道我就要出獄。他的来信写得很亲切，要我常常去看他，我不免有点奇怪。我不大認識他。他是一九一九年才到阿拉哈巴来的，那时我逐渐放弃了律师業務。在他审案时我只出庭办了一件案子，这是我出席高等法院的最后一次。由于某些原因，他很亲近我，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我。他后来告訴我，說他当时認為我大有前途，他想好好地影响我一下，使我認識英国的观点。他的方法很巧妙。他認為，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許多英国人还是这样想，一般“極端派”的印度政治活动家所以反对英国，是因为他們在社会上遭受英国人的虐待。这就引起了憤慨、苦痛和極端主义。曾經有过这样的傳說，說我父亲之所以反对英国并且变

成極端派，是因為人家不讓他參加英國人的俱樂部，某些負責人物也一再重複這種傳說。這種傳說完全沒有根據，而且是對於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的曲解[⊖]。在許多英國人看來，這些事例，不管真實與否，都簡單而充分地說明了產生民族運動的根源。實際上，不論我的父親或我自己在這方面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苦要訴。作為個人來說，我們跟英國人來往得不錯，英國人對我們相當客氣，當然我們像一切印度人一樣認識我們印度人遭受英國人的壓迫，並對此感到憤慨。我得承認，一直到今天我跟英國人打交道還不錯，只有當官並且對我擺架子的英國人是例外。然而就在跟這種英國人來往時也不乏輕鬆之感。這其中的原因也許是我跟英國人之間共同點比在印度政治上跟英國人合作的自由主義派或其他的人更多。

格利伍德爵士想利用友好往來和坦白客氣的待遇來根本消除這種憤恨的根源。我會見過他好幾次。他常常以反對某些市政稅為借口來同我討論其他事情。有一次，他對印度的自由主義派大加攻擊，說他們是些膽小的、意志薄弱的投機分子，沒有品格，沒有骨氣。他的話很重而且充滿了輕視的口吻。他說：“你以為我們會尊敬這些人嗎？”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對我說這樣的話，也許他以為這種話會使我高興。接着他把話題轉到新參議會，他談起部長們以及這些部長們替國家服務的機會。教育是國家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之一。難道一個有自由行事的權力的教育部長不會有左右千千萬萬人命運的好機會嗎？他接着說：假如像你這樣有才智、有品格、有理想又有魄力實現理想的人出來主持一省的教育事業，難道不能

⊖ 參看第三十八章的腳注就可以了解這件事的詳細情形。

大有作为嗎？他并且向我保証說，他最近見到了省長，我可以完全自由決定我的政策。他說了這番話后，覺得太過分了，趕着解釋說，他當然不能正式替任何人承擔義務，他只是表示個人的意見。

格利伍德爵士採用外交和兜圈子的方法提出他的建議我認為有點滑稽。就我而言，參加政府當部長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實際上我是討厭的。不過在當時及後來若干年中，我常常渴望能夠有機會腳踏實地做一點積極的、建設性的工作。破壞、煽動、不合作等不能算是人類的正常活動。然而只有經過鬥爭和破壞，我們才能建設，這是我們命當如此。也許我們這些人中間有大多數人要把精力和生命用於進行鬥爭，而建設的事業則得由我們的兒女一代或孫兒一代來完成。

部長們在當時是不值錢的，至少在聯合省是這樣。在不合作運動時期內任職的兩個自由主義派部長已經下台了。當國大黨威脅要推翻現行制度的時候，政府利用自由主義派部長們來對付國大黨。政府很尊重他們，並且優待他們，因為政府在困難的日子裡把他們作為政府的支持者而宣揚是有好處的。他們也許認為政府給他們的尊敬和榮譽是他們理所應得的，而沒有認識政府之所以這樣敬重他們，只是為了對付國大黨的大舉進攻。一旦這種攻擊過去后，在政府的眼中這些自由主義派部長們的身價就一落千丈，過去的尊敬和榮譽也就轉瞬之間顯而易見地隨之消失了。部長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但是這種痛心對他們沒有什麼用處，他們不久被迫辭職。接着得找新人來當部長，然而找人也並不容易。參議會中少數自由主義派的人看見他們的同僚不客氣地被趕走，也表示同情，不願出來參加政府。其餘的人大部分是地主，受過相當教育的人非常少。國大黨抵制參議會，因此，各種不三不四的人乘

机而入。

曾經有过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也許在以后不久，有一个人被政府邀請在联合省当部長。据說这个人答复說，他并不自高自大認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自認是一个相当有才智的人，也許比一般人稍为强一点，他希望保有这种声誉。难道政府要他出来当部長并由此而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大傻瓜嗎？

这种抗議是有相当理由的。自由主义派的部長們見識淺薄，对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認識缺少远大的眼光，不过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內容貧乏。然而他們这些人具有一定的能力，办日常事务也能尽职。跟随他們一起在政府任职的人有些从地主出身，他們所受的正式教育非常狹窄。我認为他們只能算是識字的人，除此以外談不上什么。省長选用这些人来担任要职，其目的似乎在暴露印度人完全沒有办事的能力。关于这些人，我們很可以这样說：

“幸运提高了你的地位，

有了幸运，沒有办不到的事。”[⊖]

这些部長們不管受过教育沒有，他們有地主的支持，而且地主还能够替大官們举行漂亮的游园会。他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花掉他們从餓着肚子的农民那里所取得的金錢呢？

⊖ 理查德·加納特。



第十五章 怀疑和冲突

我忙于各种活动，企圖借此避免那些使我苦惱的問題，但是总逃避不了，我心里常常發生問題，自己对于这些問題也找不出滿意的答案。这个时候我的活动一部分是企圖逃避自己，而不像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那样全心全意地努力干一番。我走出了我的新天地，睜开眼睛看一看印度的情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發現許多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改变：新的思想、新的冲突。我所看到的不是光明而是混乱。我仍然信任甘地的领导，但是我开始更用批判的精神研究甘地所提出的綱領中的某些部分。甘地当时在坐牢，我們不能向他請教。当时在活动的国大党兩派——参議会派和不变派——都引不起我的注意。参議会派显然趋向于改良主义和立宪主义，我認为这条路走不通。不变派被認作甘地的忠实信徒，但是正像大师的多数弟子一样，他們过多地重視甘地主义的表面意义，反而忽視了甘地主义的精神。他們缺乏活动力，实际上他們大多数是些庸庸碌碌的主張社会改革的人。但是他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他們接近农民群众，而参議会中的自主派則完全忙于議会活动。

在我出獄后不久，达斯努力說服我贊成自主派的主張。我没有接受这种主張，虽然我当时自己也还弄不清楚到底应当怎么办。說起来很奇怪，而且是相当值得注意的，我父亲当时对自主党很热

心，但是他从来没有强求我或影响我接受自主党的主張，这也表现我父亲的特点。显然，假使我参加了他的运动，他会很高兴，但是他特别体谅我，在这个問題上，讓我自己作决定。

在这个时期內，父亲和达斯間产生了亲切的友誼，这种友誼超过了政治上的同志爱。这种温暖和亲密的友誼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年紀大的人發生亲密的友誼是比較少見的。父亲的交游很广，他善于跟人来往，但是他对于真正交朋友却很小心，而且在后来的年岁里他变成冷眼旁觀了。然而他和达斯之間的隔閡，似乎消失了，他們互相推心置腹。父亲比达斯大九岁，但身体比达斯好。他們兩個人同样受过法律訓練，操律师業时也很有成績。但這兩个人在許多方面都各异其趣。达斯虽然是一位律师，却也是一位詩人，具有詩人容易动感情的看法，他曾經用孟加拉文寫过美丽的詩。他是一个演說家，具有宗教的气質。我的父亲則比較实事求是，缺少詩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組織者，很少宗教气息。他一向是一个战士，随时准备着进行硬碰硬的回答。对于那些他認為是傻瓜的人，他一点也不容忍，至少不高兴这样做；对于反对派，他也不能容忍。在他看来，受了人家的挑战就得回敬一番。我父亲和达斯虽然在这些方面大不相同，但是他們合作得很好，互相补救了对方的缺点，使党获得了有力的領導。他們互相絕對信任，讓对方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宣言或声明，虽然沒有事前通知或商量。

这种人的因素在巩固地建立自主党，并使这个党在全国有力量 and 威信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党一开始就有分裂的傾向，許多有个人打算的投机分子認為經過参議会可以往上爬，紛紛参加党。此外，还有一些真正的稳健分子傾向于更进一步跟政府合作。这些傾向在选举后公开表現出来，立刻受到党領導人物

的抨击。我父亲說他将毫不迟疑地把党里“染上了病的部分砍掉”，而且他說得到就办得到。

从一九二三年起我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和快乐，虽然我在这方面用的時間不多。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在苦难的日子里，我的家人安慰我，保护我。在这方面，我深刻地感謝我的妻子，并且对自己的不上进感到慚愧。从一九二〇年起我的妻为了我勇敢地忍受了一切。她虽然很驕傲和敏感，但是她不仅容忍了我的妄想，而且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給我安慰。

从一九二〇年起，我們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些变化。生活比过去朴素得多，家中的佣人大大地减少了，但是使生活安乐的必需品并不缺少。我們把許多东西卖掉了——馬和馬車以及跟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协调的家具——卖掉这些东西，一半是为了清理多余的东西，一半是为了弄一点錢供日常的家庭开支。有一部分家具早已被警察拿去卖掉了。由于缺少家具和花匠，我們的房子失去整潔的外表，花园里弄得乱七八糟。几乎有三年沒有人照料房子和花园。父亲大手大脚用錢用慣了，不喜欢节省开支。因此他决定在有空的时候兼办一些在办公室就可以处理的律师業務，借此增加一点收入。虽然他空余的时间不多，可是他总能够賺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經濟方面我得依賴父亲，这使我不安并且相当不愉快。自从我放弃律师業以后，我实际上自己没有什么收入，只是有时分得極少的股息。我的妻子和我用錢不多。事实上，我們用錢这样少，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这是我在一九二一年所發現的事，使我感到十分滿意。穿印度土布，坐火車时买三等票，花錢很少。当时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不十分知道家庭中有許多零碎的开支，总計起来

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不过，我从来不担心沒有錢用，我以为在必要的时候我能賺足够的錢，我們用比較少的錢就可以过日子。

对于父亲，我們不是很重的負擔，甚至只要隱隱約約地提起我們依靠父亲生活这种事就会使父亲很难过。但是我总不喜欢我当时的处境，在接着以后的三年中間我經常考虑这个問題，可是想不出解决办法。我要找賺錢的工作并不很困难，但是接受这种工作后，我就得放弃，或者無論如何得减少我当时的社会活动。我那时把全部工作時間用于国大党工作以及市政工作，我不願意因为想賺錢而退出这种工作，因此我拒絕了大工業公司的邀請，虽然經濟上对我很有利。这些公司願意給我很高的报酬，这其中的原因与其說是为了我办事能干，不如說是为了想利用我的名字。我不願意这样跟大工業發生联系。回去重操律師業也不可能，我不喜欢律師業，而且这种心情繼續增長。

在一九二四年的国大党大会中曾經有人提議：总書記們应領薪水，我当时是書記之一，欢迎这个建議。我認為要一个人全部時間来工作而連生活費也不給他，这是不对的。否則就只好選擇一些自己有私人收入的人，而这种有空閑時間的大人先生們也許在政治上并不常常是好的，也不可能要求他們对工作負責任。国大党不会付很高的薪金，我們的报酬很少，但是在印度，人們对于从公款（虽然不是政府的錢）中領取薪金却有一种奇怪的、十分不合理的成見，父亲强烈反对我这样做。同我一起担任書記的一个同事，虽然他本人很需要錢，也認為接受国大党所付的薪金有失他的身份。因此我虽然不怕損失身份，准备領薪水，結果只好不領了。

我只有一次跟父亲談起这个問題，向他說明我不喜欢在經濟上依賴他。我尽量婉轉地輕描淡写地向他提出問題，以免傷害他


的感情。他对我說，假使我把我的時間，或者大部分時間用去賺很少的一点錢，而不去从事社会活动，那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只要用几天的工作就可以賺得我的妻子和我一年所要用的錢。这种話很有力量，但是我仍然不滿意。不过我繼續照着他的意見行事。

从一九二三年初到一九二五年底，我們都遇到这些家庭問題和經濟問題。在同时期內，政治形势發生了变化，我被动地卷入各种活动，在国大党中接受了負責的职务。一九二三年的情形很特殊。达斯是上次加雅會議的主席，因此他是全印国大党委員會一九二三年的当然主席。但是委員會中多数人反对他，并且反对自主政策，虽然这多数派的人数不多，兩派的力量相差無几。一九二三年夏天开始的时候，全印国大党委員會在孟买开会时，事情明朗化了。达斯辞去他的主席职务，一个人数很少的中間派出来組織新的工作委員會。全印国大党委員會中沒有人支持这个中間派，因此这个中間派只能在取得兩個主要政党之一的善意才能存在。这个中間派跟一个党联合就可以打敗另一个党。新主席是安沙利医生，我是許多書記中的一个。

不久我們同双方都發生麻煩。古甲拉特是不变派的据点，拒絕执行中央局的某些指示。同年晚夏，全印国大党委員會又在那格浦尔开会，那兒繼續坚持真理运动。代表中間派的工作委員會經過一段短促的、不光荣的活动时期后，就在这次會議上寿終正寢了。工作委員會不得不下台，因为它并不特別代表任何人，而又企圖欺負那些掌握国大党实权的人。工作委員會企圖用不服从紀律的罪名譴責古甲拉特，結果失敗了，因而辞职。我高兴地提出辞职，并且感到輕松。对于党內的勾心斗角我的經驗很少，就是这很少的一点經驗也使我够受了，某些国大党有名人物的陰謀，使我大

吃一惊。

达斯在这次會議上罵我“冷酷無情”，我想他的說法是對的，這是一個比較的尺度問題。跟許多朋友和同事相比較，我是冷酷無情的，可是我常常擔心怕過多的感情沖動或任性沖昏了頭腦。多年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冷酷無情”，我恐怕我在这方面獲得的成績只是表面的。



第十六章 那布哈插曲

自主派和不变派間的激烈斗争繼續着，自主派逐漸占上風。一九二三年秋季国大党在德里举行特別會議，这次會議标志自主派發展的新阶段。这次会后，我遇到一件奇怪的意外事。

錫克教徒，特別是其中的亞卡利派，在旁遮普省一再跟政府發生冲突。他們發起了复兴运动，自作主張地清洗教寺赶走了腐化的主持，把庙宇和財產据为己有。政府出来干涉，結果發生冲突。清洗教寺运动的起因一部分是不合作运动引起了一般人的覺悟，亞卡利派所采用的方法仿效了主張非暴力主义的坚持真理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曾經發生过許多糾紛，其中最主要的要算有名的格魯卡巴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几十个錫克教徒（其中有許多是退伍軍人）挨了警察的毒打，并不还手，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这种坚韧和勇敢精神使全国震惊。政府宣布教寺委员会为非法組織，斗争繼續了若干年，錫克教徒終於取得了胜利。国大党当然表示同情，并且有一个时期特別派了一个聯絡官駐在阿姆利則跟亞卡利运动保持密切接触。

我要講的事跟这个一般錫克运动沒有多大关系，不过这个事件毫無疑問地是由錫克教徒的騷动所引起的。旁遮普境內两个錫克邦（巴蒂亞拉和那布哈）的統治者間存在着严重的私人糾紛，最后由印度政府把那布哈邦的大君免职，任命一个英国行政官去管

理那布哈邦。这种行动引起了錫克教徒的憤慨，他們在那布哈邦境內和境外醞釀反抗。正在这个时候，那布哈邦內齋托地方举行宗教仪式，但英国行政官出来加以制止。为了表示抗議，并且繼續进行被打断了的宗教仪式，錫克教徒派了一批一批的人到齋托去。警察不准这些人去，毆打他們，逮捕他們，把他們押送到叢林中僻靜的地方去，放在那兒。我在報紙上有时看到了有关这种打人的消息。在特別會議后，我在德里知道了有一批人要到齋托去，我并且被邀去看看实际情况，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邀請。齋托就在德里附近，我去只不过損失一天的時間。另外有兩個国大党同事——馬德拉斯的亞·特·吉德万尼和克·遜塔农——陪我一起去。去的那一批人大部分結队而行。事先安排我們先到最近的火車站去，然后等这一批人快要到达的时候，設法沿路去齋托附近的那布哈边境。我們坐的是大車，到时还早，跟在那一批人的后面，和他們的队伍分开些。到达齋托地方的时候，警察阻止这批人前进，并且把由英国行政官签署的一道命令送給我，叫我不进入那布哈境，如果已經进入境內，就应馬上离开。吉德万尼和遜塔农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不过命令上沒有提及他們的名字，因为那布哈当局不認識他們。我們三人对警官說，我們并不是参加群众的队伍来的，我們只是来看看熱鬧的旁觀者，我們不想破坏那布哈邦的任何法律。而且我們既然已經身在那布哈邦的領土上，就不能說不进入那布哈邦的領土，因为我們显然不能突然搖身一变，無影無踪。从齋托开出的下一班車要几个小时后才開車，因此我們告訴警官，我們暫時留在那里。于是我們立刻被捕，被押送到拘留所里去。我們去后，群众队伍的遭遇和过去一样。

我們在拘留所里过了整整的一天，天黑的时候才把我們押送

到火車站。遜塔农和我共同帶上一副手銬，他的左手扣在我的右手上，手銬上有一根鐵鏈，由一个警察牽着我們走。吉德万尼也帶上手銬，跟在后面。把我們这样押过齋托城的街道使我强烈地想起一条狗被人牽着走路。我們在开始时感到惱火，后来認識了这种情势之可笑，也就处之泰然了。那天晚上过得不好。坐的是人很挤的三等慢車，午夜換了一次車，后来就到了那布哈拘留所。在这段時間內，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把我們送进那布哈拘留所为止，我們都帶着沉重的手銬。因为兩個人合帶一副手銬，所以一个人沒有另一个人的合作就不能行动。兩個人合帶一副手銬过了一整夜和一个半天，这种滋味我不願意再尝。

我們三个人在那布哈監獄里被关在一个最髒、最不衛生的牢房里，牢房狹小而潮湿，天花板很低，我們伸手可及。晚上睡在地板上，我常常惊醒，發現老鼠从我的臉上跑过。

兩三天后，我們被送到法院受审，审判的經過真是特別而且可笑，一天天拖下去。审判官似乎完全沒有受过教育。他不懂英文，我怀疑他是否能够写法院規定用的烏尔都文。我們仔細观察他一个多星期，在这个时期內，他沒有写过一行字。他要写东西的时候，总是叫法院的录事替他执笔。我們提出一些細小的請求，他当时不置可否。他收了我們的請求書，第二天拿出来，上面由別人簽署了意見。我們并不正式替自己辯护。我們在不合作运动期間养成了不在法院中辯护案件的習慣，因此虽然可以进行辯护，我們也認為辯护不好。不过我向法院提出了一篇長的声明，列举事实，并說明我对于那布哈办事的方法（特别是在英国統治下的那布哈）的意見。

我們的案件本来簡單得很，但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其間，忽

然發生了一個花樣。有一天下午，法官已經退庭了，我們仍然等候在那里。到了晚上七點鐘左右，我們被帶到另外一間房子里，那兒有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另外還有一些人。在齋托逮捕我們的那位警官也在那里，他站起來，開始發言。我問當時我們所在的那間房子是什麼地方，他們在玩什麼把戲。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們所在的那間房子是法院審訊室，我們正在以陰謀罪受審。這種審訊跟我一向所受的審訊完全不同，在這次審問以前，我們受審的罪名只是違反了不准進入那布哈境內的命令。事情很明顯，當局認為違反這種命令最重的判刑是六個月的徒刑，這種徒刑對於我們太輕了，因而必須以更嚴重的罪名起訴。說三個人進行陰謀未免不像樣，因此把一個跟我們毫無關係的人逮捕了，拿他來同我們一起受審。這個不幸的人是一個錫克教徒，我們並不認識他，不過我們在前來齋托時在路上看見他在田里。

我自己當過律師，看見他們這樣亂七八糟地審問陰謀案，不免大吃一驚。這個陰謀案完全是偽造的，但是為了面子關係不得不做一些官樣文章。我對承審官說，我們事先沒有得到通知，我們想設法辯護自己的案子。他對我的話，一點也不苦惱。那布哈地方辦事就是這樣。如果我們想請律師替我們辯護，我們可以在那布哈找一個律師。我說我也許要從外面請一個律師來，他們告訴我這是那布哈的法令所不允許的。我們還進一步了解那布哈審訊程序的特點。我們不耐煩地對審判官說，他喜歡怎樣辦就怎樣辦，我們不想參加這種審訊。不過我不能完全堅持這種決定。聽見他們講一些關於我們的驚人謊言，我們很難默不作聲，因此我們有時也發言表示我們對於証人的意見，我們的發言簡短，但很中肯。我們還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說明事實。這次審問陰謀的審判官比以

前的那个审判官能干得多，受过更多的教育。

这两个案件继续进行，我们每天希望出庭受审，因为这样可以暂时逃避龌龊的牢房。在这个时候，监狱长代表行政官向我们试探，他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表示歉意，保证离开那布哈，当局就可以撤消对我们的控诉。我们回答他，我们没有什么事需要表示歉意，反而是行政官应当向我們道歉。我们不准备提供任何保证。

在我们被捕后大约两个星期，这两个案子终于结束。这两个星期都是检察官在忙，因为我们并不替自己辩护。大部分时间花在等待上面，每次发生一点小困难就得宣布退庭或向幕后的上级——也许就是英国行政官——请示。最后一天检察官讲完话后，我们提出我们的书面意见。法庭宣布暂时退庭，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久回头继续开庭，带来一厚本用乌尔都文写的判决书。事情很明显，这样厚的一份判决书绝不会是在暂时退庭的时间里写出来的，一定是在我们提出书面意见以前就老早准备好了。审判官没有宣读判决书，只简单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违反了离开那布哈境的命令，被判处最重的六个月徒刑。

同一天，在阴谋案中我们被判处十八个月（也许是两年，我记不清了）的徒刑。两案合计，我们得坐两年或两年半的牢。

在审讯期间，我们看见一些事情，使我们认识印度邦政府的真相，说得更正确些，使我们认识英国统治一个印度邦的真相。整个程序是滑稽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准新闻记者或外面的人出席法院旁听。警察想作什么就作什么，常常不把审判官放在眼里，而且事实上违抗审判官的命令。可憐的审判官只好忍气吞声。可是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审判官那样，我曾经几次站起来，坚持要警察规矩些，听审判官的话。有时警察无礼地拿走文件，审判官

不能采取行动，維持法庭上的秩序，而一部分得由我們來替他做這種事。可憐的審判官的處境很為難，他怕警察，他似乎也有點兒怕我們，因為我們被捕的事已經在報上大事喧嚷了。假使像我們這些多少有點名聲的政治活動家也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很擔心那些名氣比較小的人們會遭遇到什麼命運。

父親了解一些關於印度各邦的情形，因此我在那布哈突然被捕使他大為不安。他只知道被捕這件事；其他消息一點兒也打聽不到。他焦急萬分，甚至打電報給印度總督，打聽我的消息。當局用各種方法阻止他到那布哈來探視我，但最後還是讓他到監獄里來看我。因為我自己不辯護，所以他不能幫我的忙。我請他回阿拉哈巴去，不要焦慮。他回去了，但留下一個我們的青年律師同事在那布哈看看審訊情形，這個律師名叫卡比爾·德夫·瑪拉維亞，他在那布哈法院中短短的經驗使他的法律知識增加不少。警察公開在法庭上試圖搶奪他手中的某些文件。

印度大多數邦的落后和半封建情形是有名的，它們實行的是個人專制政治，談不上能干和仁慈。那兒發生了許多怪事，很少宣傳過。但是它們辦事缺乏效率在某些方面減少了坏事，減輕了他們統治下不幸人民的負擔。因為它們辦事缺乏效率，政府軟弱無力，結果使暴政和邪惡也減少些。這並不是說暴政因此改善了，但其範圍和影響却小得多。英國直接控制印度邦後，這種平衡發生了變化。半封建狀態和專制政治仍然保存着，舊的法律和手續一般人仍然認為有效，所有關於限制個人自由，限制結社，限制發表意見的規定（這種限制無所不包）仍然存在，但是有了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改變了整個情況。行政機構加強了，辦事的效率也相當提高了，各種封建和專制的束縛也隨之而加緊了。英國的統治在一定時期

內一定会改变一些过时的旧習慣和方法，因为这些習慣和方法妨害政府的行政效率，阻碍英国的商業侵略。但在开始的时候，英国統治者充分利用这些旧習慣和方法，以加紧他們对于印度人民的控制，印度人現在不仅要忍受封建主义和專制政治的压迫，而且現在由一个比較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执行这种封建主义和專制政治，其所产生的痛苦印度人民也得忍受。

关于这种情形，我在那布哈邦看到一些。那布哈邦由一个英国行政官管理。这个行政官是印度文官的一員，他拥有專制者的全部权力，只受印度政府的监督。無論在任何时候总是引用那布哈邦的法律和程序作为取消人民最基本权利的理由。我們遭受封建主义与近代官僚机构的联合压迫，在这里封建主义和官僚机构只暴露了它們的缺点，而沒有發揮它們的長处。

审問完了，我們被判处徒刑。我們不知道判決書里面講些什么，但判处長期徒刑使我們得想一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們要求給我們几份判決書，法院要我們正式提出要求。

那天晚上在監獄里，監獄長把我們叫去，把行政官的命令給我們看。在这道命令里，行政官根据刑事程序法的規定，停止了我們的徒刑，并不附有任何条件。就我們而言，徒刑就算完了。監獄長另外拿出一道行政命令，也是行政官签發的，命令我們离开那布哈，今后沒有特別允許不准回来。我要求給我一份這兩道命令的副本，但是監獄長不肯。接着把我們押送到火車站釋放。我們在那布哈一个人也不認識。晚上城門关了。我們打听到不久有一班火車开往翁巴拉，就搭上这班火車。我从翁巴拉經德里到阿拉哈巴。

我从阿拉哈巴写信給行政官，要求他寄給我他的兩道命令的

副本，使我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也要求他給我兩個判決書的副本。他拒絕了我的要求。我告訴他，我也許要上訴，但是他堅持不肯。尽管我一再努力，我始終沒有機會拜讀把我和兩個同事判處兩年或兩年半徒刑的判決書。這種判刑我仍然逃不了，只要那布哈邦當局或英國政府想這樣做。


我們三個人就是這樣“停止徒刑”開釋了，但是我始終打聽不出在陰謀案跟我們一起受審的那個錫克教徒的下落。他大概沒有開釋。他沒有有勢力的朋友或公眾注意幫他的忙，因而像其他許多人一樣，被人遺忘留在監獄中。但是我們並沒有忘記了他。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不過我們能夠作的事情實在太少。教寺委員會也很關心他的案子。後來我們知道他是“駒形丸”事件中的一個人，曾經被判處長期徒刑，最近才出獄。警察把這種人放在外面不放心，因此把他牽連在對我們的誣告案中。

我們三個人——吉德萬尼、遜塔農和我——从那布哈監獄里帶走了一個不好的伴侶——傷寒病菌，我們每人都生了傷寒病。我的病相當重，有一個時期十分危險，但和其他兩個人比較，我的病在三個人中還算最輕的，我只在床上躺了三、四個星期，吉德萬尼和遜塔農兩個人則病了很長的時期。

關於那布哈事件，以後又發生了一件事。大概在六個多月後，吉德萬尼任國大黨派駐阿姆利則的代表，跟錫克教教寺委員會保持聯繫。該委員會特別派了一批人——五百人——到齋托去，吉德萬尼決定以觀察員的資格陪這批人到那布哈邊境去，他並不打算進入那布哈境。當這批人到達邊境的時候，警察向他們開槍射擊，死傷的人很多。當吉德萬尼前去援救受傷的人時，警察把他抓了去，這次沒有在法院對他起訴，只把他關在監獄里過了大半年，

直到他身体完全垮了才把他开释。

吉德万尼被捕和拘留，在我看来是荒谬地滥用行政权的一种行为。我写信给行政官（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英国人），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吉德万尼。他回信说吉德万尼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他违反了没有允许不得进入那布哈境内的命令。我不承认这个命令是合法的，我不认为逮捕一个援救受伤者的人是适当的，并且要求行政官把他所引为根据的命令寄一份给我，或者把这个命令公布。但是他拒绝了。我很想亲自到那布哈去，让行政官对付我像他对付吉德万尼一样。为了表示对同事的忠诚似乎需要这样做。但是许多朋友的想法不同，他们劝阻了我。我利用这些朋友的劝告作掩护，把他们的劝告作为一种借口以掩盖我自己的弱点。追根到底，我没有再到那布哈监狱去坐牢，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弱点，自己不願意去，对于这样在困难时期放弃一个朋友而不顧的行为，常常感到可耻。正如跟我们大家一样，我们常常因为临机应变而放弃了勇敢。



第十七章 科坎拿大会議和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

一九二三年国大党的年会是十二月間在南方科坎拿大城举行的。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任主席，他以主席的資格發表了很長的講話，他喜欢这样做。但是，他的講話很有趣。他追述穆斯林的政治認識和教派感情發展的經過情形，他指出一九〇八年以亞加·汗为首的伊斯蘭教代表团去見印度总督，結果第一次正式發表宣言，贊成單獨选举，这种行动是奉命行事，实际上是政府自己策动的。

穆罕默德·阿里大毛拉劝我在他任主席的期間担任全印国大党書記的职务，这是十分違反我的志願的。当我对于未来的政策沒有明确認識以前，我不喜欢担任行政工作。可是我不能拒絕阿里的要求，因为我們兩个人都認為假如別人来当全印国大党書記，也許不能够像我一样跟阿里很和諧地合作。阿里个性很强，有些人是他喜欢的，有些人是他討厭的，而我恰好是他所喜欢的一个人。我們互相敬重，关系非常密切。他深深地，在我看来是極不合理地相信宗教，我就不然。可是他的真誠、他充沛的精力和敏銳的智慧使我大为佩服。他有急智，有时挖苦人使人痛心，因此跟不少朋友鬧翻了。他不能够把俏皮話保守秘密，他总喜欢講給人听，不管發生什么后果。

在他任主席的期間，我和他的关系很好，虽然我們也有不少小

的分歧意見。我在全印国大党委員會中实行了新办法，叫人时只叫名字，不必叫名字前或名字后附加的一些尊称、荣誉头衔之类的称呼。在印度，这类称呼很多——聖雄、大毛拉、潘迪特、舍克、賽伊德、孟希、摩爾維，最近又还有斯利育特和希利，当然还有密斯特和艾斯夸尔。这些尊称常常用得太多，用得太濫，因而我想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但是我的想法行不通。阿里給我一封措詞激烈的电报，以“主席的資格”命令我恢复原来的办法，特别是在称呼甘地时必须称他“聖雄”。

我們之間常常發生爭執的另外一个問題是关于上帝的問題。阿里很巧妙地甚至在国大党的決議里也提起上帝，有时是为了表示感激，有时为了祈禱。我常常提出抗議，他大声斥責我不信宗教。說起来很奇怪，他总事后对我說，他深信我基本上是信仰宗教的，尽管我表面上的行为和言論不信奉宗教。我常常想他的这种說法到底有多少真理，也許这要看所謂宗教和信仰宗教的涵义是什么。

我避免跟阿里討論宗教問題，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只会增加惡感，也許会使他伤心。跟坚决信奉一种宗教的人討論宗教問題，实在是一个難題目。跟大多数穆斯林討論宗教問題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因为伊斯蘭教在思想上不允許他們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思想方面，穆斯林所走的是一条直而狹的道路，信徒不准偏左或偏右。印度教徒的情形稍有不同，虽然并不是常常不同。在实际中，印度教徒可能是正統派，耽迷于最陈旧、反动、甚至有害的習慣，可是他們通常都准备跟人家討論关于宗教問題的最激烈的思想。現代的阿利亞·沙瑪吉派一般沒有这种豁达开明的态度。他們像穆斯林一样，走着直而狹的道路。有才智的印度教徒有一种哲学傳

統，這種傳統雖然沒有在實際中發生影響，但是使他們對於宗教問題的看法不同。在我看來，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印度教徒內部很複雜，他們的看法和他們的習慣相差很大，有時甚至互相衝突。事實上，有人曾經說過，就宗教的一般意義而論，印度教很難算作一種宗教。但是印度教具有多么驚人的堅韌力、多么偉大的生命力。一個人甚至可以自稱是無神論者——例如古印度教哲學家夏伐卡就是這樣——但沒有一個人敢說他不再是一個印度教徒。印度教根深蒂固。我出身婆羅門，因此不管關於宗教和社會習慣我的言行是什麼，我似乎仍然是一個婆羅門。印度人仍然叫我潘迪特·某某，雖然我本人並不願意在我的名字上加上這個或其他榮譽稱號。我記得有一次在瑞士會見一個土耳其學者，在見面以前我曾經寄給他一封介紹信，在這封介紹信里我被稱作潘迪特·賈瓦哈爾·尼赫魯。當他見着我的時候，他感到驚訝，並且有點兒失望，因為他對我說潘迪特的稱號使他以為我會是一個上了年紀有學者氣味的紳士。

穆罕默德·阿里和我不討論宗教問題。可是他並不善於保持緘默。若干年後（我想是在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初），他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再抑制自己不講話了。有一天，我到他在德里的家裏去看他，他沖口而出地說要跟我討論宗教問題。我勸他不要這樣做，我說我們兩個人在這個問題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無論哪一個人都很难說服對方。但是他不肯罷休。他回答說：“我們必須談個明白。我想你以為我是一個有宗教狂的人。好，現在我就要證明給你看我並不是那種人。”他告訴我，他曾經深刻地、廣泛地研究過宗教問題。他指着書架，上面堆滿了關於各種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書，其中包括一些近代的著作，例如赫·喬·韋

尔斯的“上帝，看不見的国王”等。在大战期間他長期在監獄里把可蘭經讀過几遍，并且参考各种評注。根据这种研究的結果，他告訴我，他認為可蘭經所講的有百分之九十七完全有道理，就在可蘭經以外也可獲得証實。其余百分之三初看起来，是他的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不过他想一想，既然可蘭經中所講的道理有百分之九十七是对的，其余百分之三可能也是对的，难道他自己的理智对而可蘭經錯了嗎？他的結論是：可蘭經是对的，因此他承認可蘭經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他的这种邏輯并不能使人心服，不过我不願意跟他爭論。以后的事才真正使我惊奇。阿里說他相信任何人只要不存成見，抱着虛心接受的态度去讀可蘭經，他一定会相信可蘭經中所講的是真理。他說他知道甘地很用心地讀過可蘭經，因此他一定相信可蘭經所講的道理，不过由于自尊心的关系，他不肯承認这点。

穆罕默德·阿里在主席任期滿后就逐漸离开了国大党，或者如他自己所說，国大党离开了他。这是一个緩慢的过程，他繼續出席国大党和全印国大党委員會的各种會議，并且在几年中活动也積極。但是裂痕一天比一天扩大，双方愈来愈疏远了。也許不能把这件事归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是国内某些客观条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这是一种不幸的結果，使我們許多人难过。因为尽管在教派問題上存在着分歧的意見，但在政治問題上却很少不同的看法。阿里全心全意地支持爭取印度独立的斗争，正因为有这种共同的想法，所以在教派問題上常常能够和他达成双方都滿意的办法。他在政治上跟那些冒充代表教派利益的反动派毫無共同之处。

阿里在一九二八年夏天离开印度去欧洲。对印度而言，这是

一件不幸的事。当时各方正在努力解决教派問題，并且很快就会成功。假如穆罕默德·阿里在国内，很可能，事情的發展就会不同。但是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經發生了破裂，而他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对方。

兩年后，在一九三〇年我們很多人在坐牢，和平抵抗运动热火朝天。穆罕默德·阿里不理會国大党的决定，自己去参加圓桌會議。他去参加这种會議使我很伤心。我相信他自己心里也不好过，这可以从他在倫敦的活动中找到充分的証据。他感觉到他真正活动的地方是在印度参加斗争，而不是在倫敦参加沒有用处的談判。假如他能够回国，我相信他一定早就参加了那次斗争。他的身体很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人，过去几年中間，病一年比一年重。在倫敦时期，他本来急需休养和治疗，但是他很想有所成就，反而加重工作，这就使他死得更快了。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时，我正在內尼監獄里，这消息对于我是一个打击。

我最后一次跟他見面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拉合尔大会上。在那次會議上我以主席的資格講話。他不滿意我講話中的某些部分，并且提出严厉的批評。他看到国大党向前迈进，在政治上更積極了。他自己本来够積極了，因此他不高兴讓別人走在他的前面，他跟在后面。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我說：“我警告你，賈瓦哈，你現在的同事們將來会把你丢掉。在困难的时候，他們会把你弃而不顧。你自己的国大党人会把你送上絞刑架。”这是多么可怕的預言。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召开的科坎拿大會有一個原因使我特別感到兴趣，因为在这次會議上奠定了印度斯坦志願队的基础。在这以前，無論是为了进行組織工作，为了去坐牢，都有过志願队的組織。但是这些团体組織松懈，紀律性很差。恩·斯·哈迪克博

士想出一个主意，主張成立一个有严格紀律的全国志願队，加以訓練，在国大党总的领导下在全国工作。他硬請我在这方面跟他合作，我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种主意。这种工作在科坎拿大会議时就开始了。后来許多国大党領袖人物反对志願队使我很奇怪。有些人說这是一种脱离正规的危險作法，因为这使国大党内出現了軍事的因素，軍事力量也許会把非軍事的力量压倒！另外一些人似乎認为志願队所需要的紀律只是服从上面所發出的命令，其他就不需要什么紀律，甚至志願队员整步而行也不适宜。有些人的心里存在着这样的想法，他們認为成立受过訓練的志願队多少跟国大党的非暴力主义的原則不相符。可是哈迪克用全副精力进行这种工作，經過几年的耐心工作，他証明了受过訓練的志願队在运动中更有效率，更能执行非暴力主义的原則。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我从科坎拿大回来后不久，我在阿拉哈巴遇着一件新的事情。我現在只憑記憶写，因此可能把一些日期弄錯了。但是我想那年是貢布庙会年，在阿拉哈巴城恒河兩岸举行沐浴节。通常有为数很多的香客来参加，他們大部分在恒河与朱木拿河匯合的地方洗澡，这地方叫三河口，因为还有一条神秘的悉罗湿伐底河也和那兩条河匯合。恒河的河床約一英里寬，但在冬季河水枯涸，露出很寬的一塊沙灘，可供香客們露營。在这个河床里，恒河常常改道。一九二四年恒河水流的情况使群众在三河口洗澡会發生危險。由于采取了一些預防措施，限制了每次洗澡的人数，这种危險性就大大地减少了。

我并不关心这个問題，因为我不想在这些吉利的日子到河里去洗澡求得福气。我在报上看到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跟省政府發生爭執，省政府(或地方当局)發出命令，禁止在恒河与

朱木拿河匯流處洗澡。瑪拉維亞反對這種禁令，因為從宗教的觀點來看，整個問題就在於要在此匯流的地方洗澡。政府為了防止意外以免有人喪失生命而採取預防措施，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辦事的方法太生硬，引起了反感。

在貢布節那天，我一清早就到河邊去看，但是並不準備去洗澡。我到達河邊的時候聽說瑪拉維亞已經向縣長提出了溫和的最後通牒，要求縣長答應人們在三河口洗澡。瑪拉維亞很激動，空氣很緊張。縣長不答應。瑪拉維亞決定進行堅持真理的鬥爭，他在大約兩百人的伴同下，向匯流處走去。我對於事情的發展很感興趣，由於一時的衝動，參加了堅持真理派的隊伍。當局早已在空地上建立了障礙物，阻止人們到匯流處去。當我們達到木柵時，警察出來阻止我們前進，並且奪去了我們帶去的一個梯子。我們是信奉非暴力主義堅持真理的人，就在木柵附近的沙灘上平靜地坐下來。我們坐在那裡過了整個上午和一部分下午。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太陽更大，沙灘更熱，我們大家餓得更厲害，普通警察和騎警在兩旁監視我們。此外，正規的騎兵也在那裡。我們大部分人不耐煩了，主張想辦法。我相信當局也同樣不耐煩，並且決定干一下。騎兵奉到命令，立刻上馬。當時我認為（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確）騎兵準備向我們衝鋒，把我們趕走。我不願被騎兵追趕，而且坐得太久不耐煩了。因此我向坐在我附近的人建議越過木柵，我爬上去，馬上有幾十個人跟着爬，有些人甚至拉出了幾根樁，打開了一個通路。有人給我一面國旗，我把旗子插在木柵上，繼續坐在那裡。我看著人們爬上木柵或走過木柵，騎兵把他們推開，我感到很興奮，很快活。我必須說明騎兵在趕走人群時盡量避免傷人。他們揮舞他們的木棍，用木棍推人，但是避免給人以太多的傷

害。这种情形使我想起革命巷战的情景。

最后，我从木栅上下来，到木栅里面，热得很，我决定到恒河中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看见瑪拉維亞和其他的人仍然坐在木栅外面，这使我大为惊讶。这个时候，普通警察和騎警肩挨肩地站在坚持真理派的队伍和木栅之間。于是我繞道走出去又重新坐在瑪拉維亞的近旁。我們繼續坐在那里过了一些时候。我发现瑪拉維亞很激动。他似乎在努力压制某种强烈的感情。忽然他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很快地向警察和馬之間冲过去。就任何人来说，这种行动会使人奇怪；就瑪拉維亞那样一个年紀大、身体不好的人而言，这种行动簡直令人吃惊。我們跟着他冲过去。警察和騎警阻止我們一陣后就不再干涉。不久他們撤走了。

我們料想也許政府要對我們提起訴訟，但結果並沒有这样的事。政府大概不願意采取任何步驟对付瑪拉維亞，所以其余的小人物也就無事过去了。



第十八章 我的父亲和甘地

一九二四年初突然傳來甘地在監牢里病重的消息，接着他就被送進醫院動手術。全國都表示焦急，我們提心吊膽地等候消息。危險期過去了，全國各地的人源源不絕地到浦那去看甘地。他還住在醫院里，是一個被人監視的犯人，但是當局允許他接見為數有限的朋友。父親和我在醫院里看到了他。

甘地出醫院後並沒有回到監獄里。他正在養病，政府免除他未滿的刑期，把他開釋。他原來被判处六年徒刑，這個時候已經坐了大約兩年的牢。他到孟買附近海邊一個叫茹湖的地方去休養。

我們一家也到茹湖去，住在海邊一間小屋裡。我們在那兒過了幾個星期。這是我多年以來真正過得痛快的假期，我自由自在地游泳，在海灘上跑。但是我們住在那兒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過假日，而是為了跟甘地商量事情。父親要向甘地說明自主派的立場，假使不能取得甘地的積極同情，至少希望取得他的消極合作。我自己呢也很想把使我苦惱的一些問題弄清楚。我想知道甘地將來會採取什麼行動綱領。

就自主派而言，茹湖會談沒有能夠爭取甘地，甚至沒有怎樣影響甘地。雖然談話表面上很客氣、親切，但是沒有妥協。雙方承認對方有自己的不同意見，並且向報紙發表聲明，說明這一點。

我從茹湖回來後，感到有點兒失望，因為甘地沒有解決我的任

何疑难問題。甘地像平常那样不肯考虑将来，制定出長期綱領。他要我們繼續耐心地替人民作事情，为实现国大党建設性的社会改革綱領而努力，等待时机进行積極活动。真正的困难是：即令那个等待的时机到来了，难道不会發生曹里·曹拉类似的意外事件打破我們的計劃，又一次使我們中止行动嗎？甘地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关于我們的目標，甘地也完全說得不明确。虽然在这个問題上国大党当时不需要正式發表宣言，但是我們很多人認為我們自己应当心里有数。是我們要堅持獨立和某些社会改革，还是我們的領袖們只要取得比獨立和社会改革少得多的东西就准备妥協呢？几个月以前，在联合省會議上我在主席致詞中曾經強調爭取獨立的問題。这次會議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我从那布哈回去后不久召开的。那时我正在养病（我在那布哈監獄里得了病），不能出席这次會議。我虽然臥病在床，發高燒，仍然在床上把我的講演稿写好送到大会去。

我們有些人要求在国大党中把獨立問題搞清楚，我們的朋友自由主义派离开我們很远——也許我們要对此事負責——他們公开頌揚大英帝国的声势和力量，虽然这个帝国任意压迫我們的同胞，这个帝国的自治領把印度人看作奴隶，或者不准印度人入境。沙斯特里先生当了帝国的代表，德吉·巴哈杜尔·薩普魯爵士在一九二三年倫敦的帝国會議上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是我的国家使大英帝国具有帝国的尊严。”

自由主义派領袖和我們間的距离很大；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我們講不同的語言，我們的夢（如果說他們有夢想的話）沒有共同点。难道不需要把我們的目標弄明确嗎？

但是当时只有少数人有这种想法。大多数人不喜欢精确，特

別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就其性質而言，就是模糊的，并且有点兒神秘。在一九二四年开头几个月里，一般人主要地注意立法院和省参議會中自主派的行动。这些人过去高談“从內部来进行反对”，破坏参議會，現在他們准备怎么办呢？他們做出了一些好看的姿态。立法院否决了那一年的預算，并且通过了一个決議，要求召开圓桌會議，进行討論，以解决印度自由的条件。在德希班都領導下的孟加拉参議會也勇敢地决定减少供应。但是在立法院中，在各省中，印度总督和各省省長批准預算，因而这些預算变成了法律。有些人發表演說，立法团体中有时表現激动，自主派暂时兴高采烈，報紙上登了大字标题，除了这些，什么也沒有了。他們还能再做什么呢？他們可以重复他們的策略，可是人們看慣了，新奇的感觉减少了，激动的心情消失了，一般人逐漸习惯于总督或省長所批准的預算和法律了。下一个步驟当然是参議會中自主派办不到的，而得在参議会的會議室外解决。

一九二四年中，全印国大党委員會在阿麦达巴德开会。在这次會議上，出乎意料之外，甘地跟自主派之間發生严重的冲突，出現了一些戏剧性的場面。甘地表現了主动，他提議根本修改国大党的党章，改变关于选举和黨員的規定。按照党章原来的規定，任何人只要他贊成国大党党章第一条（这一条規定自主的目标与和平方法），并且繳納四安的党費就可以成为国大党的黨員。現在甘地要求对吸收黨員加以限制。他建議取消四安党費的規定，改为繳納一定数量的自己紡的紗。这是对成員权利的严厉的限制，是全印国大党委員會無法实行的。但是甘地一向的态度是：当他不同意党章中某些規定时，他并不重視党章的条文是怎样写的。我对于这种破坏党章的行为深为震动，我向工作委員會呈請辞去書記的职务。

不过后来發生了一些新的情况，我没有坚持我的要求。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討論甘地的建議案时，父亲和达斯先生猛烈反对。最后为了表示他們完全不贊成甘地的提案，他們和一大批拥护他們的人在表决提案前退出会场。在那个时候有些反对決議案的人仍然留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里。決議案获得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撤回，因为自主派退出會議，并且达斯和我父亲在这个問題上的态度又十分坚决，这两件事大大地影响了甘地。他的感情很激动。有一个委員無意中說了一句話使甘地很难过。他完全垮了。他显然十分伤心，他以十分动人的态度向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發表演說，有些人听了他的講話后感动得流泪。这是一种动人的、少有的場面[⊖]。

⊖ 上面这段話是我憑記憶在監獄中写成的。我現在發現我的記憶力有毛病，我忽略了这次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討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使人对于当时發生的实际情形获得一个錯誤的印象。使甘地感动的是关于一个年輕的孟加拉恐怖分子（戈平那什·沙哈）的決議案。这个決議案在会上提出，但是最后被否决了。我記得这个決議案譴責他的行为，但同情他的动机。在討論这个決議案时許多人發言。这些發言比決議案本身更使甘地难过，因为甘地認為从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国大党内有許多人并不認真看待国大党所宣布的非暴力主义，这使他很伤心。后来不久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写文章討論这次會議，他說：“关于这四个決議案，我都获得了相差不大的多数派的支持。但是我必須把它看作少数派，兩派的力量几乎不相上下。关于戈平那什·沙哈問題的決議案說明了这点。我所听到的發言，我事后所看到的結果和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在戈平那什·沙哈決議案提出后，尊严消失了。我不得不在这样的会上提出我最后的決議案。會議繼續开下去，我就觉得愈来愈严重了。我感觉好像要逃走借以避开那令人感到压迫的情景。我怕提出我手中的一个決議案……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把这一点說明得很清楚了，即沒有人有惡意。使我心上感到沉重的是有些人無意識地不負責任，輕視国大党的非暴力政策……竟然有七十一个国大党代表贊成这个決議案，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这件事情，以及甘地关于这件事的評論，是意味深長的，因为它表明甘地多么重視非暴力主义，表明甘地对任何反对非暴力主义的企圖的反响，尽管这种企圖是無意識的、間接的。甘地后来所做的許多事情基本上是起源于这种反响的。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的政策和一切活动的基础。

我始終沒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紡紗，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許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張。也許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黨員，只有相信他的建設性的土布計劃的人才能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們服从。他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搖了，开始跟別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間，甘地在这个問題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飄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認識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現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問題本身似乎并不很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規定要紡紗，未免有失原意。

我得出这种結論：甘地是在生疏的环境中活动，所以遭受困难。在他的坚持真理的直接行动的特殊領域中，他有非凡的本領，他的本能指导他采取正确的步驟。他也擅長使自己和其他的人在群众中为社会改革而埋头工作。他了解絕對战争或絕對和平，但是介乎这二者之間的东西，他就認識不清楚。自主派关于斗争和在参議会內部进行反对活动的計劃使他寒心。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想参加立法院，那他就应当抱着跟当局合作，改善立法的目的而去，而不应当是为了进行反对活动。如果不願意参加，那就留在外面。自主派的作法不是这样，因此甘地在和自主派打交道时感到困难。

最后还是甘地迁就自主派。紡紗的規定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原来規定的繳納四安的办法仍旧保留。甘地祝福自主派在立法院中工作，可是他自己則保持严格的超然态度。外面傳說甘地退出了政治活动，英国政府和它的官員們認為甘地的威望正在下降，他已經是强弩之末，不能起作用了。据說达斯和尼赫魯已經把

甘地赶到幕后，他們似乎控制着政治舞台。这种大同小异的話在过去十五年中間一再傳播着，每次傳播这种話时表明我們的統治者对于印度人民的感情是多么無知。自从甘地登上印度的政治舞台以后，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未减低过。恰恰相反，他的威信逐漸增高，这种过程現在仍然繼續着。群众有时也許不照甘地的意願办事，因为人性是有弱点的，但是群众的心里却充滿了对于甘地的善意。在客觀情况有利的时候，他們起来参加偉大的群众运动，否則他們就靜待时机。一个領袖人物不能像玩魔术那样舞动一下魔术棍就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个群众运动来。他可能利用已經發生的情况，他能够准备情况，但是他不能創造情况。

但是甘地在知識分子中的威信有时高，有时低，这是事实。他們在有前进热情的时候就跟着甘地走；在不可避免的反响来的时候，他們就采取一种批評的态度。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大多数知識分子对于甘地仍然畢恭畢敬。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沒有其他有效的綱領。自由主义联盟，以及类似自由主义联盟的各派如合作派算不得数，相信恐怖暴力主义的人在現代世界中沒有發言权，人們認為他們不能起作用，并且过时了。在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社会主义綱領，国大党的上層分子又害怕社会主义綱領。

我父亲和甘地的关系，除在一九二四年中短时期在政治上疏远之外，以后又重归于好，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尽管他們大不相同，但彼此十分互相尊重。他們所尊重的是什么？父亲曾經替一本收集甘地选文的小册子“思潮”写过一篇短序，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們初步了解父亲的心情。

他在这篇序言中写了下面的話：

“我听說过聖人和超人，但从来没有福气遇到过这样的人。我

得坦白承認我很懷疑世界上真正有这种人。我相信人，我相信英雄事迹。這本書內所講的‘思潮’起源于人，而且是英雄事迹，它們指出人性的兩大特点——信心和力量……

“自己沒有信心和力量的人問道：‘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結果呢？’結果是：‘或者胜利，或者死亡’。这种答案并不能解决他的問題……同时，謙遜的人物不屈不撓……抱着不可动搖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繼續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而忍受牺牲和痛苦。这种号召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引起了共鳴……”

他引用了英国詩人史温柏恩的兩行詩，結束他的序言：

“难道我們沒有优秀的人物，
掌握事物的人物？”……

很显然，父亲想強調指出，他不是把甘地当作聖人或超人而对他表示欽佩，他把甘地仍然当作人。父亲本人很坚强、不屈不撓，他羡慕甘地的坚强精神。甘地長得身材短小、体弱多病，但具有鋼一般的坚强性格、坚如岩石的精神，不管外面的压力怎样强大，他总不屈服。尽管甘地貌不惊人，赤着身体，系着腰布，但是他具有高贵和庄严的風度，使別人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他有意識地、从容不迫地表现出柔順和謙遜的样子，但是他很有力量和权威，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有时也非常独断專行，發号施令要別人服从。他那宁静深沉的眼睛能够吸引住人，慢慢地进行深刻的观察。他的声音清脆能够沁人心田，引起共鳴。不管听甘地講話的是一个人或一千人，他們都感到甘地的吸引力，感到跟甘地息息相通。这种感情跟智力沒有多大关系，虽然甘地并不完全忽視影响群众智力的工作。但是智力和理智却肯定是次要的。甘地在演說时能够使听众着迷，并不因为他善于雄辯，或者因为他用辞漂亮。他的語

言簡單中肯，很少用不必要的字。能够抓住听众的是他为人真誠、人格高尚。他給人以內心精力充沛的印象。也許別人對他的這種看法發展成了一種傳統，造成了一種適當氣氛。一個不知道這種傳統並且跟環境不調和的陌生者，也許不會着迷，至少不會着迷到同樣的程度。甘地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他爭取人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說是他解除反對者武裝的能力。

甘地雖然喜歡自然美，但對於人造的東西的美感和藝術技巧很少認識。有名的泰姬陵，在甘地看來只代表強迫勞動而已，此外沒有其他意義。甘地的嗅覺很差，但是他自己發現了一套生活藝術，使他自己的生活富有藝術性。每一個姿態都具有意義、優美而沒有虛偽的氣味。甘地沒有棱角，不露鋒芒，不帶一點兒庸俗氣味，而我國的中產階級卻不幸帶有濃厚的庸俗氣。甘地自己心里很寧靜，並以此影響其他的人，他在人生的崎嶇道路上，踏着堅定的、勇敢的步子前進。

跟甘地比較一下，我的父親就大不相同。但是父親也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莊嚴的風度，他所引用的史溫柏恩的兩行詩用來描寫他本人也很恰切。在他參加的任何集會中，他總是中心人物。正如後來一個有名的英國法官所說，不管排座的時候父親坐什麼席位，他坐的地方一定會成為主位。他既不柔順，也不客氣。他跟甘地兩樣，他很少饒恕抱不同意見的人。他有意識地獨斷專行，有些人對他表示極大的忠誠，也有人表示堅決反對。很難對他表示中立態度，要么喜歡他，要么討厭他。他的前額大，嘴唇緊閉，下巴堅定，很像意大利博物院中的羅馬帝王的半身塑像。許多在意大利的朋友看見他跟我們一起的照相時指出這種相同點。特別是在後來，他滿頭的銀白色頭髮——他不像我，他的頭髮一直到老年仍然

很多——使人感到庄严、高貴，这是我們在今天的世界中很难看到的。也許我对父亲有点偏好，但是在充滿弱点和鷄毛蒜皮的世界中，我不由得怀恋父亲的高尚品格。我四处寻找父亲那种高貴的風采和出色的力量，但是結果落了空。

我記得在一九二四年时曾經把父亲的一張照片給甘地看，当时甘地正在跟自主党角斗。在这張照片中父亲上唇沒有鬍子。在这以前甘地总看見父亲有鬍子。甘地看見这張照片馬上大吃一惊，很注意地看了很久，因为上唇沒有鬍子，就使嘴和下巴的严厉气味特別突出。甘地帶着苦笑說，看了这張照片后他認識了他的对手。父亲的眼睛以及因为常常大笑在臉上引起的皺紋使他的臉柔和了一些。但是他的眼睛有时也閃閃有光。

父亲喜欢联邦院中的工作，好像鴨子喜欢水一样。这种工作很适合他在法律和宪法方面所受的訓練。他跟坚持真理派及其支派不同，他知道怎样玩这套把戏。他使他的党保持严格的紀律，甚至劝說其他各派和个人支持他。可是不久他自己的人跟他为难。在自主党成立初期，这个党跟国大党内的不变派进行斗争，为了增强自己在国大党内部的力量，接納了許多不良分子。后来举行选举，这就需要經費。而經費的筹措只能靠有錢的人出錢。因此必須拉攏那些有錢的人，甚至邀請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当自主党的候选人。一个美国社会主义者曾經說过下面的話（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引用过这些話）：“政治这种把戏就是一方面对穷人講保护穷人，反对富翁，以爭取穷人的选票；另一方面，对富翁講保护富翁，反对穷人，以便富翁肯拿出錢来作竞选經費。”

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党。在联邦院和各省参議会工作需要每天跟其他更稳健的派别妥协，这样当然不能够長期保持前

进的精神和原则。党的纪律和热情逐渐低落了。意志比较薄弱的分子和投机分子开始捣乱。自主党侵入联邦院的公开目的是“从内部进行反对活动”。但是这种策略对方也能够运用，政府决定插手，在自主党内部组织反对派，制造分裂。政府用当高官及其他收买的办法引诱那些意志比较薄弱的人，他们只要愿意就行了。他们上钩以后，政府又用各种方式赞扬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政治家品质，以及他们做事入情入理令人愉快。这样就在他们周围制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这种气氛跟田野和市场里尘土多、纠纷多的气氛大不相同。

自主派的风气败坏了，各地都有个别人脱党投到对方去。父亲大声疾呼，痛加斥责，并且说到壮士断腕的话。不过这种威胁性的言论没有多大效果，因为那些变节分子急欲自动退出，不等待壮士来断腕了。有些自主派人士当了部长，有的后来在各省当行政参事官。有些人另外组成一派，自称“合作派”，这个名称原来是铁拉克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用过的。现在用这个名称的意义就是：有机会找到职务的时候就接受下来并且要好自为之。尽管发生这些脱党变节的事，自主党仍然继续奋斗，但是父亲和达斯先生对于情况的变化感到有点苦恼，对于他们自己在议会中似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感到一些厌倦。除了这种精神厌倦之外，当时印度北部印度教—伊斯兰教关系日趋紧张，有时还引起暴动，这也增加局势的困难。

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跟我们一起坐过牢的某些国大党人现在在政府中当了部长，做了大官。一九二一年政府宣布我们犯法，并且把我们判处徒刑，在那时的政府内有些自由主义联盟（旧日的国大党人）的人物。将来至少在某些省中我们会被自己的

旧同事逮捕下獄，加以取締。这些新部長和行政参事官做这种工作比以前的自由主义联盟更能干。他們認識我們，了解我們的弱点，并且知道怎样利用我們的弱点。他們很懂得我們的方法。他們对于跟群众打交道，对于群众的思想情况，都有一些經驗。正如德国的納粹党人一样，他們在变节以前曾經玩弄过革命方法，因此他們能够应用这种知識来镇压他們在国大党的旧同事，他們做这种工作比官方高級人士或無知無識的自由主义联盟部長們高明得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国大党在柏尔哥姆开会，甘地当主席。对他說来，当主席实际上是走下坡路，因为他一向是国大党的常任太上主席。我不喜欢他以主席的資格所發表的講話，我覺得他的講話平淡無奇，沒有啓發性。在會議結束时，由于甘地的提議，我又再一次被选为全印国大党委員會下一屆的執行書記。尽管我自己不願意，我逐漸成为国大党的半常任書記。

一九二五年夏天，我父亲的身体不好，气喘病使他难受。他把全家帶到喜馬拉雅山中的达尔浩西去，我后来也到那兒去陪他一个短时期。我們从达尔浩西旅行到喜馬拉雅山中深处滄巴地方。我們到那兒的时候是一个六月天，我們走山路有点兒疲倦。我們在那里收到了一封电报，知道齐塔·蘭詹·达斯死了。父亲呆坐了很久不說一句話，他十分悲痛。这对于他是一個殘忍的打击，我很少看見他这样伤心过。他的一位越来越亲密的同志突然死了，留下他一个人單獨肩負重担。这个担子一天天加重，他和达斯对这个担子和自己人的弱点都感到厭煩。达斯在法利德浦尔會議上的最后一次演說是一个有点兒疲倦的人的演說。

第二天早上我們离开滄巴回到达尔浩西，又从达尔浩西坐汽車到相隔很远的火車站，搭車去阿拉哈巴和加尔各答。



第十九章 教派主义猖獗

我从那布哈监狱回来后，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曾经患了一次伤寒病。就我来说，这次生病是一种新经验。生了病，或者因为发烧，身体虚弱而躺在床上，这种生活我过不惯。我的身体很好，我因此而自豪。我不满意在印度相当流行的多愁多病的态度。我虽然生了这场重病，但是因为年纪轻，平时身体好，所以渡过了难关。但在脱离危险期后，身体虚弱不堪，长期躺在床上，慢慢恢复健康。在这个期间，我感觉脱离了环境和我的日常工作，我以置身事外的态度看一切。我认为我脱离了树木，可以看见整个森林，我的心境比以前更加清明、更加宁静。我想凡是生过重病的人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或类似的经验。但是就我而言，这种经验是一种精神上的经验（我说精神上的经验，并不是狭义的宗教解释），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似乎超出政治活动的感情气氛之上，能够更清楚地看一看那些推动我行动的目标和力量。我的心境经过净化以后，我接着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我对于这些问题找不到圆满的答案。但是我更不赞同从宗教的角度去看生活和政治。关于我的这种经验，我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我不能够很容易地说明这种认识。这件事发生在十一年前，在我的心里现在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这种经验对于我和我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以后两三年中，我做工作时总带有那种超然的态度。

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当然是由于發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完全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跟我也格格不入。我早已提到过某些政治上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印度教—伊斯蘭教关系逐渐恶化，特别是在印度北部。在比較大的城市中發生过非常殘酷的暴动。猜疑和憤怒的气氛制造了新糾紛的原因，这是我們許多人以前沒有听見过的。在过去，常常引起冲突的一个原因是以牛祭神的問題，特别是在宰牲节那一天。此外，当印度教节日跟伊斯蘭教节日冲突的时候（例如当伊斯蘭教庆祝穆哈藍节的时候正是印度教的罗摩里拉节），情势也很紧张。穆哈藍节使人回想起过去一件悲惨的事，因而悲痛，流泪；罗摩里拉节則是一个快乐节日，庆祝善战胜惡。这两个节日不协调。幸好这两个节日大概每三十年才重相遇一次，因为庆祝罗摩里拉节用陽历，每年有固定的日期，而穆哈藍节則用陰历，跟着季节而变化。

但是現在出現了一个引起磨擦的新原因，这是一些經常存在、常常發生的事。这就是在伊斯蘭教清真寺前面演奏音乐的問題。穆斯林反对妨害他們在清真寺里祈禱的音乐或喧嘩。每个城市都有許多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每天祈禱五次，而街上人声嘈杂和游行的队伍（包括結婚和出丧）在所难免。因此冲突的机会經常存在着。特别是穆斯林在日落时举行祈禱，尤其討厭街上人声嘈杂和游行的队伍扰乱他們。恰巧这个时候正是印度教寺院举行晚上禱告，寺院里打着鐘。这就是印度教的献灯礼，因此印度教的献灯礼和伊斯蘭教礼拜之間的糾紛就更加严重了。

这个問題本来可以用互相体諒的精神，稍加調整就可获得解决，但是竟至引起仇恨和暴动，这似乎令人惊奇。不过宗教感情跟理智、体諒或調整不相干；当权的第三者能够利用甲方反对乙方的

时候，这种感情容易被人煽动起来。

人们容易夸大北部少数城市中所发生的这种暴动的意义。大多数城市和整个印度农村平安无事，并没有受这些暴动的影响。报纸当然对每一个小的教派冲突都加以渲染。在城市群众中，教派关系的紧张和愤慨情绪日益增加，这是事实。上层教派领袖不惜推波助澜，这见之于各教派的政治要求的更加强硬。由于教派关系的紧张，穆斯林中政治上的反动派多年来因实行不合作运动而退守待时，现在又出头露面，大肆活动，并且还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每天总有新的、牵涉更广的教派要求提出来，从根本上打击全国的团结和印度的自由。在印度教方面，主要的领袖人物中有些是政治上的反动派。他们以维护印度教的利益为名，实际上帮助了政府。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进行活动，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他们所强调的任何问题上取得胜利，他们只是刺激了全国的教派感情而已。

国大党的处境很困难。国大党对于全国的情绪很敏感，而且代表全国的情绪，这些教派感情必然会影响到国大党。许多国大党人是披着民族外衣的教派主义者。但是国大党领导机关立场坚定，就全体而论都拒绝跟教派政党，或任何教派团体联合，因为锡克教徒和其他更小的少数派也在大吹大擂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国大党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两头的抨击。

很久以前，在不合作运动开始的时候，或者更早些，甘地就已经规定了解决教派问题的方案。他认为只有多数派表示善意和宽宏大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而他准备同意穆斯林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他想争取穆斯林，而不同他们讨价还价。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他抓着有价值的现实。但是另外一些人自以为懂得各种东

西的市价，可是完全不知道任何东西的真正价值，他們坚持市場上做生意的办法。他們对于要买的東西所付的代价看得很清楚，覺得心疼，但是他們对于可能买到手的東西的价值却認識不清。

批評和責备別人很容易，对于自己的計劃失敗了則常常想找一些口實来解釋。难道失敗不是由于別人故意破坏，而是由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犯了錯誤嗎？我們責备政府和教派主义者，而政府和教派主义者則責备我們。当然政府和它的同盟者确曾有意地、不断地破坏我們。过去和現在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以在我們中間制造分裂为基础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帝国的慣用方法。这种政策的成功也就表明帝国比它們利用的人强。关于这一点，我們不能發牢騷，無論如何我們不应当感到奇怪。忽視这点而不加提防本身就是思想錯誤。

我們怎样提防呢？当然不在于討价还价，斤斤計較，采用市場上做生意的办法，因为不論我們提出什么条件，不論我們出价多高，常常有第三者比我們出价更高，而且办得到。如果全国或社会上沒有共同一致的看法，就不会有共同一致的行动去对付共同的敌人。假使我們只想到現行的政治机构和經濟机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加以改革，使其“印度化”，那就不会有建立联合行动的真正推动力量。大家的目的在于分贓，有权势的第三者不可避免地要左右一切，收买他們看中的人。只有考虑到不同的政治机构——尤其是不同的社会机构——才能替联合行动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我們爭取独立，其目的在于使人們認識我們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机构而奋斗，而不只是为了建立現行制度（自治領地位）的印度版（由英国在幕后控制）。自然，政治上的独立只是指政治自由而言，并不包括群众的社会改革或經濟自由在內。但是政

治上的独立表明我們摆脱英国金融界在經濟方面和財政方面對我們的束縛，这就使我們比較容易改变社会机构。这就是我在当时的想法。現在我想加以补充說明，我不認為政治自由可以不劳而获。当政治自由来到的时候，一定会帶來一些社会自由。

但是我們大多数領袖人物的看法仍然逃不出現行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之外。他們根据这种背景应付各种問題——教派問題和宪法問題——因此他們不可避免地上了徹底控制这个机构的英国政府的当。他們只能这样做，因为尽管他們有时也采用直接行动，他們整个看法屬於改良主义派而不屬於革命派。但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就能够圓滿解决印度政治、經濟和教派問題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新的情势需要革命的观点和計劃，需要革命的解决办法。但是在領袖人物中沒有人出来担負起这种任务。

我們在爭取自由的斗争中沒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这就毫無疑問地帮助了教派主义的發展。群众看不出他們的日常痛苦与爭取自主之間的显然联系。群众有时本能地进行很好的斗争，但这只是一种軟弱的武器，很容易用鈍了，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弃而不用。这里缺少理智，而且在反动时期，教派主义者不难在宗教名义的掩护下，利用这种感情。然而說起来很奇怪，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中的資產階級，利用宗教的神聖名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群众對他們的綱領和要求的同情和支持，而他們的这种綱領和要求不仅跟群众絕對不相干，甚至于跟中产階級的下層分子也不相干。每个教派所提出的要求归根結蒂就是要求职位，而中产階級中只有少数上層分子才能够取得这些职位。当然，他們也要求在立法机构中获得更多的席位，表示爭取政权，但是人們認為这只不过是爭取安插人的权力而已。这些偏狹的政治要求至多只是对中产階級少

数上層分子有利，却常常妨害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但是一些教派领袖人物巧妙地把这些偏狭的政治要求使人看起来似乎是那一个教派的群众要求，使这些要求带有宗教感情，借此掩盖这些要求内容的贫乏。

政治上的反动派就是这样以教派领袖的面目出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他们采取各种步骤的理由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教派偏见，不如说是由于他们要阻碍政治进步。在政治上，他们反对我们，而且说起来特别令人丧气，他们不顾一切反对我们。伊斯兰教的领袖人物说些令人极为吃惊的话，他们似乎丝毫不把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自由放在心上。印度教的领袖人物，虽然表面上在民族主义的招牌下说话，而在实际行动中却跟民族主义很少关系，不能够采取真正的行动。他们在政府面前卑躬屈节，但是这一切都徒劳而无功。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领袖都一致反对社会主义及其他类似的“颠覆性”的运动，关于特殊利益的建议，他们的立场总是一致的。伊斯兰教领袖说了许多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有害的话，做了许多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有害的事，但是作为一个集团，或单独个人，他们在政府和公众面前的所作所为都保有一定的尊严，对印度教的教派领袖就很难这样说了。

国大党内有许多穆斯林，其中包括许多能干的人，印度最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领袖也参加了国大党。许多参加国大党的穆斯林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穆斯林”，反对那些教派主义的伊斯兰教领袖。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获得一定的成功，穆斯林中有一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拥护他们。不过他们都是些中产阶级上层分子，没有朝气。他们埋头于自己的职业，跟群众失去了联系。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去接近自己的群众。他们只在客厅里开会，接洽事情，达成协

議。这一套作法，他們的对手——教派主义領袖人物——比他們高明得多。教派主义領袖人物慢慢地夺取了民族主义穆斯林的陣地，一个接着一个，迫使民族主义穆斯林逐渐放弃他們所主張的原則。民族主义穆斯林常常設法采用“兩害取其輕”的政策，以求避免进一步退却，并巩固自己的陣地。但是这种办法常常引起另一次退却，不得不再来一次“兩害取其輕”。到后来他們自己沒有什么本錢了。除了联合选举之外，他們沒有其他任何自己主張的基本原則，联合选举变成了这一派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后来因為他們执行“兩害取其輕”的政策，最后連这种基本的要求也不得不放弃了。因此，他們过去作为建立組織的基础和大吹大擂的原則和实践，現在一点都沒有了。事实上，他們除空名外，什么也沒有！

民族主义穆斯林这个团体的崩潰和消灭說起来是一回伤心的事（作为个人來說，他們这些人仍然是国大党的重要領袖）。这件事經過了好几年，直到今年（一九三四年）才宣告結束。在一九二三年以后，他們是一个强有力的团体，采取积极态度，反对伊斯蘭教教派主义者。实际上甘地曾經有好几次准备同意伊斯蘭教教派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中的某些要求（虽然他極不喜欢这些要求），但是他自己的同事，穆斯林中的民族主义領袖人物，坚决表示反对，使甘地的主張未能实现。

在二十年代的中期，人們曾經几次企圖用互相談判和討論的办法来解决教派問題，当时叫这种談判和討論为“团结會議”。最有名的一次會議是一九二四年由国大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在德里所召开的會議，那时正是甘地举行二十一天絕食的时候。在这些談判會議上，有許多老老实实想把事情办好的人，他們努力設法达成協議。这种會議通过了一些值得称贊的決議案，但是根本問題

并没有解决。这种会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不能靠多数票的办法求得解决，而只能靠大家取得实际上一致意见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各派内部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所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别人完全服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某些有名的教派主义者是否真正想解决问题，也值得怀疑。在这些人中间，有不少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们跟那些要求彻底改变政治的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立场。

但是真正的困难并不单是这个人或那个人退缩不前，困难的根源还深得多。锡克教徒当时也在大喊大叫他们的要求，因此在旁遮普地方就造成了一个特别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旁遮普事实上成了焦点，各派你怕我，我怕你，从此产生了意气 and 成见。有些省内的农业纠纷——如孟加拉省信印度教的地主和信伊斯兰教的佃农之间的纠纷——在教派纠纷的面貌下出现。在旁遮普和信德，银行家和比较有钱的人一般都是印度教徒，而借债的人多系从事农业的穆斯林，借债人受了放债人的残酷剥削，当然痛恨放债人，这种情绪助长了教派纠纷的气势。穆斯林一般是比较贫苦的，于是乎伊斯兰教教派领袖就利用穷光蛋对有錢人的仇恨，以达到教派斗争的目的。虽然说起来很奇怪，这种目的跟改善穷光蛋的地位毫不相干。正因为这些伊斯兰教教派领袖利用了穷苦人民的不满情绪，所以他们确实也代表一些群众意见，并且因而增加了自己的力量。从经济方面看，印度教教派领袖代表比较有钱的银行家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在一般印度教徒中很少有支持者，虽然有时也获得一般印度教徒的同情。

因此这个问题跟经济问题夹杂起来了，虽然一般人可惜没有认识这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发展成为各阶级间经济上更为明显的冲突。如果这种日子到来的话，现在这些代表各派上层阶级的教派

領袖一定会很快地弥补他們之間的分歧，来对付共同的階級敌人。就是在当前的情势下，要在政治上求得解决也并不困难，但是必須以沒有第三者活动为条件，而这个条件目前很成問題。

一九二四年在德里召开的團結會議剛剛結束，在阿拉哈巴就爆發了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冲突。就死伤人数而言，这次冲突不是一个大冲突，但是在自己的故乡發生这种糾紛，实在令人很难过。我同其他一些人从德里赶回时，騷动实际上已經完結了，但是这次冲突所引起的惡感和法院訴訟却拖了很長的时间。我忘記了这次冲突是怎样开始的。那一年，也許稍迟一些，在阿拉哈巴曾經因为庆祝罗摩里拉节發生糾紛。也許是由于限制在伊斯蘭教清真寺前演奏音乐。后来就停止举行庆祝以表示抗議，这种庆祝通常要举行大規模的游行。到現在，阿拉哈巴城已經有八年沒有庆祝罗摩里拉节了，这个对阿拉哈巴区几十万人說来是一年中間最重大的节日，几乎已經变成痛苦的回忆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曾經去看过庆祝这个节日的熱鬧情形，現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們多么兴奋。从各区，甚至从別的城市，来了很多人看熱鬧，真是人山人海。罗摩里拉节虽然是一个印度教的节日，但是这种在露天举行的庆祝会，也有穆斯林参加，到处都是快乐和兴高采烈的气氛。生意也很兴隆。若干年后，我長大成人了，再去看时就不感到兴奋了，游行的場面反而使我有點厭煩。我的艺术标准和娱乐标准提高了。但是我仍然看見群众是多么欣賞这种場面，这是他們狂欢的时候。現在阿拉哈巴城的孩子們(成年人更不用提了)有八、九年沒有机会看这种熱鬧，沒有机会在他們呆板的日常生活中过一天兴奋快乐的节日，而原因又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糾紛和冲突！当然宗教和宗教精神要負一大部分責任。多么令人扫兴啊！



第二十章 市政工作

我担任阿拉哈巴自治市工作有两年，但是对于这种工作我愈作愈不愿意。我的主席任期是三年。第二年开始不久我就设法摆脱这种职务。我曾喜欢过这种工作，并且为这种工作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并且获得同事们的好评。甚至连省政府虽然在政治上不高兴我，也表扬我的某些市政工作。不过我始终认为我受了很大的限制，不能够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

这并不是因为有人故意捣乱，事实上人们很愿意跟我合作。但是一方面在上政府，另一方面则市政人员和一般公众都漠不关心。由于政府所建立的整套严密的市政机构，我不可能实行根本的改变或革新。由于财政政策的规定，自治市经常要依赖政府。现行市政法不准根本改变税收或社会发展的计划，甚至那些法律所允许的计划也得经政府批准。只有乐观派认为来日方长才会有信心地要求和等待批准。在处理有关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时，政府办事很疲沓，手续很复杂，没有效率；但在限制或打击一个政敌时，就不疲沓，就很有效率了。这种对照是很显著的。

省政府中负责地方自治的部门是由一位部长主持的。但是通常这位领导天才完全不懂得市政或甚至任何公众事务。实际上他起不了作用，他所管的部门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是由印度文官处的常任官在那里干。这些人受了在印度的高级官员的影响，认为政

府主要是执行警察的职务。这种想法还受了專制的家長制度的影响，不認識大規模社会服务事業的必要。

政府常常是各自治市的債主，因此政府对于各自治市的看法，跟警察的看法很接近，是一种債主的看法。分期还債是否按时办到？各自治市是否有还債的能力？手中是否存有为数可觀的錢？这些全是必要的、有关的問題。但是政府却把更重要的問題忽視了，例如一个自治市有一些积极的事要作，如教育、衛生等，而不單是一个借錢和按时还債的組織。印度自治市所規定的社会事業少得可憐，就是这些少得可憐的事業在財政困难时也得减少，这时首先遭殃的是教育。統治階級自己对于市立学校并不感兴趣，他們的子弟去进更新的、費用高的私立学校，还常領到国家給的助学金。

大多数印度城市可以分为兩部分：人烟稠密的城市本区，和占地很广、滿是別墅、精舍的英国人通常叫作“文明区”的地区，这些別墅和精舍都有大院或花园。住在这“文明区”的是英国官員和商人以及一些印度中产階級的上層分子、自由职业者、官員等。自治市从市本区所得的收入比从“文明区”所得的多些，但是用在“文明区”的开支比用在市本区的开支大得多。因为“文明区”占地广，所以馬路多些，补路、打扫、洒水、路灯等的費用也多，而下水道、自来水、公共衛生等設備也得花更多的錢。而市本区則一直注意不够，而市本区中比較穷苦的地区几乎完全沒有人管，馬路少，巷道窄小，而且路灯暗淡，沒有适当的下水道和衛生設備。但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很有耐心地忍受这些缺点，很少發牢騷。即令有时發發牢騷，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不产生什么結果。所有大大小小的有名人物几乎全部住在“文明区”。

为了使負擔略为平攤一下，鼓励發展，我想实行地价稅。我剛

剛提出這個建議，一個政府官員（大概是縣長）就表示抗議，說這種提議違反了土地產權法的各項規定。這種地價稅顯然大部分要落在“文明區”內別墅主人們的肩頭上。但是政府完全贊成征收一種像入市稅的間接稅，這種捐稅打擊了商業，提高了物價（包括糧食在內），使貧窮的市民難於負擔。這種極不合理的、有害的捐稅雖然在較大的城市中逐漸取消了，但在印度大多數自治市中却是主要的收入。

我作為自治市的主席就得一方面應付不通情理而且獨斷專行的政府，這個政府辦事總是墨守成規，而且慢得很，並且堅決不肯加快步調，或走一條不同的路。另一方面我在自治市中的同事也大部是些墨守成規的人物，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理想主義者，工作熱情，但是整個說來，他們這些人沒有眼光，沒有改革或改進的熱忱。他們認為老辦法够好了，為什麼冒險去嘗試一些也許不會成功的試驗性的新辦法呢？甚至理想主義者和抱有熱情的人也逐漸向老一套的辦法屈服。但是只要談起提拔，委任差事就可以使人們精神振作。可是這種情形並不能提高辦事效率。

政府的決議、官員和一些報紙一再批評自治市和地方機關，指出它們的許多缺點，並從這裡得出教訓說民主制度對印度不適合。這些缺點是很明白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自治市和地方機關是在怎樣一種機構之內執行職務的。這種機構既不民主，也不專制，而是介乎二者之間，具有民主和專制的缺點。中央政府應當有監督和控制權，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只有當中央政府本身很民主並且接受公眾的要求時，中央政府的監督權和控制權才能跟代表民意的地方機構協調。如果不是這樣，結果就不外兩個：或者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衝突，或者是地方政府伏伏貼貼地服從中央政府，

而中央政府行使权力，但不負責任。这种情况显然不能令人滿意，并且脫离了人民控制的實質。甚至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多半看中央政府的面色，很少接近自己的选区。一般人大多不理睬市政委員會。真正的問題很少提交市政委員會討論，因为这不屬於市政委員會的职权範圍。市政委員會最为一般人所看得見的活动是收稅，而收稅这种工作不会使市政委員會更得人心。

地方机关的权限也受了限制，应当大加扩充。就像孟买市政会这样的大市政会的选举也受了很大的限制。以前曾經有人提出扩大选举的決議案，但市政会自己加以否决。实际上大多数市政会的人对于他們的現狀表示滿意，認為沒有理由加以改变或冒險取消。

不管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說来，我們的地方机关的成績和效率都不能算好，虽然它們也可以跟先进的民主国家的自治市相比較。它們通常并不腐化，只是办事沒有效率，它們的弱点就是引用私人，看法完全不对头。这些現象都是很自然的，因为要好好地实行民主就需要有見聞广的輿論和責任心。但是实际上我們到处都是極权主义的气氛，缺少民主政治的条件。我們缺少群众教育制度，沒有以知識为基础努力建立輿論。因而公共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轉移到个人問題、教派問題或其他鷄毛蒜皮的小事上去了。

政府和管理市政中主要注意于避免“政治”，看見任何对民族运动表示同情的決議案就皺眉头，市立学校中禁止采用帶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教科書，甚至民族領袖的像片也在禁止之列。不准挂国旗，否則解散自治市。最近几个省的政府采取共同行动，把国大党人从市議會和市委員会中赶出去。通常只要稍加压力就可以办到这点，政府方面以停發自治市教育津貼或其他津貼为威胁。在

有些地方，特別是加爾各答市議會，通過了法令，禁止因參加和平抵抗運動或其他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而坐過牢的人在市議會或委員會中任職。這種目的純粹是政治性的，並不是干不了工作或不適宜工作的問題。

這些少數例子說明了我們自治市和縣的議會有多少自由，它們很少民主氣味。這種禁止政治上的反對派參加地方事務（自然他們沒有直接到政府中服務）的企圖應當加以說明。據估計，在過去十四年中間先後坐過牢的有三十萬人。毫無疑問，除開政治以外，在這三十萬人中間也有一些最積極、最有理想的人物，最關心社會事業而忘我的人。他們精力充沛，朝氣勃勃，具有為事業而奮鬥的理想。因此政府各部門和公用事業單位可在這些人當中找一些品質優良的工作人員。但是政府用一切方法，甚至通過法令，禁止這些人擔任工作，並借此懲罰他們和同情他們的人。另一方面政府喜歡引用和提拔那些唯命是聽的人，反而埋怨說我們的地方機關辦事缺少效率。雖然說地方機關不應過問政治，但是政府並不反對地方機關進行擁護政府的政治活動。地方學校的教師為了害怕打破飯碗，不得不下鄉去替政府做宣傳工作。

在過去十五年中間，國大黨的工作人員曾經遭到許多困難。他們肩負了重大的責任，他們跟強有力和地盤鞏固的政府進行鬥爭，在這些鬥爭中並不是沒有成績的。這種實際鬥爭中的鍛煉使國大黨的工作人員有了自力更生的信心，提高了辦事的能力，有了堅持奮鬥的力量。這種鍛煉使國大黨工作人員具備了印度人民被極權政府長期壓迫所奪去的品質。當然，國大黨運動，也像一切群眾運動一樣，有一些不良分子在內——傻瓜、辦事缺少效率的人以及更壞的人。但是我相信一般國大黨工作人員似乎比其他具有同樣

資格的人更能干，更生氣勃勃。

关于这件事，有一点也許是政府和它的顧問們所不了解的。撤消国大党工作人員的一切职位，使他們找不到就業的机会，这种企圖是真正革命的人所欢迎的。大家知道，一般国大党人不是一个革命者。在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半革命行动后，他恢复了他原来的平淡無奇的生活和活动。他忙于自己的職業或地方政治。比較大的問題在他心里似乎逐漸忘記了，昔日的革命热情降低了。人發福了，喜欢过安全的生活。正因为中产階級出身的工作人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傾向，先进的和存心革命的国大党人一向努力阻止自己的同志参加議會和地方机关，或者接受使他們不能采取有效行动的全天工作。現在政府出来干涉，使国大党工作人員更难找到工作，这样国大党工作人員就可能保持他的革命热情，或者甚至提高他原来的革命热情。政府这种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国大党的。

做了一年多的市政工作后，我認为我并没有最有效地使用我的精力。我最多只能使工作快一点，稍为提高一点工作的效率。我不能够雷厉風行地实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改革。我想辞去主席的职务，可是委员会的全体委員都苦劝我繼續工作下去。他們对我很客气，我很难拒絕他們的要求。可是在滿兩年后我終於提出辞职。

这是一九二五年。在那年夏天，我的妻子生了很严重的病，在勒克瑙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那一年国大党在康波尔开会。我焦头爛額地在阿拉哈巴、康波尔和勒克瑙之間奔波（那时我仍然担任国大党总書記的职务）。

医生劝我的妻子到瑞士去繼續治疗。我很欢迎这个意見，因

为我想找一个借口使我自己也离开印度。我的心里糊里糊涂，看不出明确的道路。我以为假使我离开印度远一些，我就能够更正确地看问题，使我的心明亮些。

一九二六年五月初，我们从孟买搭船去威尼斯，我们三个人，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和我自己。同坐这只船的还有我的妹妹和妹夫朗吉特·潘迪特。他们早在我们想走以前就计划去欧洲旅行了。



第二十一章 在欧洲

經過了十三年多之久，我这次又回欧洲去。这十三年是战争、革命和重大改变的年代。我所認識的旧世界已經在流血和战争浩劫中灭亡了，一个新的世界等待着我。我原来计划在欧洲住六、七个月，頂多住到年底。但是后来我們实际上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九个月。

在这个时期內，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安靜和休息。我們大部分時間住在瑞士，在日内瓦，在蒙塔那一个山中疗养院。我的妹妹克里西娜从印度来，从一九二六年初夏起和我們住在一起，一直到我們离开欧洲时为止。我不能長期离开我的妻子，所以我只能到別处去作短期的游历。后来我妻子的身体好了些，我們到法国、英国和德国去旅行，不过到的地方不多。我們住在山頂上，冬天到处是雪，我觉得跟印度和欧洲完全隔絕。印度和印度所發生的事情似乎特別隔得远。我是一个站在很远地方的旁观者，我閱讀、观察、注意事变的發展，注視新欧洲的政治、經濟以及自由得多的人类关系，并設法了解这些問題。当我住在日内瓦的时候，我自然关心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的活动。

冬天来了，冬季运动吸引了我的注意。有好几个月我主要的工作和兴趣就是运动。我以前曾經溜过冰，但是滑雪却是新玩意儿，我被滑雪迷住了。学滑雪相当困难，要長时期才能够学会。但

是不管有多少挫折，我总是勇敢地坚持下去，而且很能享受滑雪的乐趣。

总的說起来，我的生活过得很平靜。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我妻子的身体逐渐好起来。我們很少遇見印度人。事实上，除了住在山上休养所里的少数人外，我們很少見到其他的人。但是在我們住在欧洲的一年零九个月期間里，我們遇到了一些印度流亡者和老革命家，他們的名字我早就听說过。

席瑪吉·克利西那伐瑪和他有病的妻子在日内瓦住在一幢房子的最高一層楼上。这一对老夫妇单独地生活着，沒有帮整天工的僕人，他們的房間霉臭，令人受不了，到处都是一厚層灰塵。席瑪吉本来很有錢，但是他不肯用。他为了省几分錢，宁願走路而不肯坐电車。他認為凡是去看他的人都是形迹可疑的，除了有相反的事实証明外，他認為去看他的人不是英国的特务人員，就是想打他的錢的主意的人。他的口袋里塞滿了他过去办的“印度社会学家”报，常常拿出来，帶着兴奋的心情指給人家看他十多年前所写的文章。他談起旧日的事情，罕普斯得的印度大楼，英国政府派各种不同的人去偵查他，他怎样發覺这些人，同他們斗智，弄得他們無計可施。他的房間里靠着牆排着許多書架，堆滿了書，書上滿是灰塵，似乎对着人發愁。地板上到处都是書和报纸，似乎有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沒有人管了。整个地方充滿了陰沉的气氛和頹廢的气味，生命在那兒似乎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生人。一个人走过那陰暗無声的走廊时，几乎感觉到在轉弯的地方就会碰到死神的影子。走出这房子后，呼吸外边的空气，才使人松了一口气。

席瑪吉想把他的錢安排一下，作为举办某种公共事業的基金，最好是用来資助在外国讀書的印度人。他建議我担任負責保管这

些基金的董事会的董事，但是我并不热心担负这种责任。我不想过问他的经济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表示太热心了，他会马上疑心我想要他的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传说由于德国通货膨胀，他受了很大的损失。

常常有一些有名的印度人路过日内瓦。到国际联盟去的人都是些官方人物，席玛吉当然不会去接近这些人。但是去参加国际劳工局会议的人也有一些有名的非官方人士，甚至一些有名望的国大党人，席玛吉总设法跟这些人见面。看看这些人的反应倒很有趣。他们总是感到为难，在公开场所设法避免跟席玛吉接触；在私下也总是托辞走开。因为席玛吉被人看作一个危险人物，跟他来往或同他在一起都不妥当。

因此席玛吉夫妇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孩子，也没有亲戚朋友，很难有什么社会关系，也很难有什么人跟他来往。他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人物，已经完全过时了。他跟现在时代不协调，世界向前进，把他放在一旁不加理睬。但是他的眼睛里仍然闪耀着旧日的的光芒，虽然我和他之间很少共同之点，可是我不能不对他表示同情和尊重。

最近报纸上说他死了，接着不久陪伴他在外国过长期流亡生活的终身伴侣——他的妻子——也去世了。据说她死后留下一大笔钱供在国外训练印度妇女之用。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人士，他的名字我常常听人说起，但是我第一次遇见他还是在瑞士，这个人就是拉加·马亨德拉·卜拉塔布。他曾是一个乐天派（我想他仍然是），完全生活在空想中，不肯接触实际。我第一次见着他时不免有点吃惊。他穿的服装很奇异，这在西藏高原或西伯利亚平原还可以，但夏天在瑞士的蒙特勒

却完全不适合。他穿的是半軍人式的服裝，俄国長靴，服裝上很多大口袋，裝滿了文件，照片等东西。其中有德国总理柏特曼—霍尔威格写的一封信，德皇签字的一张照片，西藏达賴喇嘛送的一幅字画，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文件和圖片。他的口袋里裝了这样多的东西，真令人吃惊。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在中国丢了一个裝重要文件的箱子，从那个时候起他認為把文件帶在身上比較安全。因此他的衣服上縫了那么多的口袋。

馬亨德拉·卜拉塔布曾經在日本，中国，西藏，阿富汗游历过，他講起这种經歷时滔滔不絕。他的生活变化多，講給人听了很有兴趣。他最近热心于他自己所成立的“快活社”，它的口号是“快活”。这个社在拉脫維亞（也許是立陶宛）显然有了很大的成績。

他对于宣傳工作的看法就是經常把上面印得有他的声明的明信片寄給在日內瓦和其他地方开会的人們。他的这些声明都由他本人签名，但是所签的名字是一个奇怪的長而且复杂的名字。他把馬亨德拉·卜拉塔布縮为簡写，另外加上許多名字，所加的每一个名字似乎代表某个他游历过的国家。他用这种方法強調他的国际性和世界性，在他的奇怪名字下面，他自称“人类的勤务員”。我們很难跟他認真，他似乎是中世紀小說中的人物，是一个走錯了路来到二十世紀的唐·吉珂德。不过他本人是絕對老实和非常認真的。

我們在巴黎見到了年老的卡瑪夫人。当她向你走来，注意看着你的面孔，用手指着你，不客气地問你是誰时，真是凶惡可怕。不管你怎样回答（也許她太聾了听不見你的話），她总有她的看法。而且她的这种看法即使不符事实，她也坚持。

我在意大利还在一个極短的时间內会見了阿貝杜拉摩尔維。

在我看来，他似乎很聪明，我所谓聪明，是指他懂得旧式政治上纵横捭阖那一套。他对于近代思想毫无接触。他提出建立“印度合众国”或“印度共和国联邦”的计划，这是一个解决教派问题很好的意图。他对我讲起他过去在伊斯坦布尔（当时仍然叫君士坦丁堡）的活动，我听了以后并不加以重视，所以不久就忘记了。几个月后，他见到了拉拉·拉吉巴特·拉伊，又把同样的故事重说一遍。拉吉巴特听了具有深刻的印象，并且为它担心。这些话中有些不合理的推论，在那年的印度参议院选举中起了很大作用。阿贝杜拉摩尔维后来去汉志，多年来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另外一个摩尔维，就是我第一次在柏林见着的巴卡杜拉摩尔维。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年纪大了，但热情可爱。他很朴素，并不十分聪明，但仍然努力吸收新思想，努力认识现世界。一九二七年他在旧金山去世，那时我们在瑞士。我听到他死的消息很难过。

在战时曾经成立了一个印度团体的人物那时有不少人在柏林，但是这个组织早就四分五裂了。他们自己内哄，互相猜疑，你疑心我出卖你，我疑心你出卖我。一般政治流亡者的命运似乎总是这样。在柏林的印度人有许多已经找到安定的中产阶级的职业而安居——这种情形在战后德国并不多，不再从事革命活动了。他们甚至逃避政治。

这个战时团体的故事很有趣。它的成员大部分是一九一四年不祥的夏天在德国各大学读书的印度学生。他们跟德国学生过一样的生活，唱德国歌，与他们一同游戏，一同喝啤酒，对德国文化表示同情和尊重。战争跟印度学生不相干，但是当时德国全国风行的民族主义歇斯底里不能不使他们感受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感情

确实是反英的，但是并不赞成德国。他们自己的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跟英国的敌人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另外一些有明确革命认识的印度人，取道瑞士前往德国。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请哈达亚尔去。哈达亚尔那时在美国西部海岸。几个月后，哈达亚尔去了，但在他到以前，这个委员会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团体。这种重要地位是德国政府替他们造成的，因为德国政府当然很想充分利用一切反对英国的情绪。印度人方面也想利用国际形势进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活动，他们并不肯为了德国的利益让自己被人利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给德国当局一些德国政府所急欲取得的东西，德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求于他们，这就使他们能够讨价还价。他们坚持要德国政府对印度的自由提出保证。德国外交部似乎跟他们订了正式条约，保证在战争胜利后承认印度的独立。就是有了这种保证和条件（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条件），印度人的组织才答应在大战中帮助德国。德国政府公开用各种方法表示对委员会的尊重，委员会的代表获得跟外国大使几乎相同的待遇。

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德国政府这样抬高他们，使他们受宠若惊，有些人的头脑发昏了。他们自认担负起了历史任务，从事划时代的伟大事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做过惊人的冒险事，从九死一生中逃出。在大战后期，他们的重要性显然降低了，德国政府开始不理睬他们。从美国来的哈达亚尔很早就被置诸闲散。他跟委员会搞不好。委员会和德国政府都认为他靠不住，静悄悄地把他推在一边。若干年后，当我一九二六—二七年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久住欧洲的印度人一提起哈达亚尔都表示非常痛恨，这使我很惊奇。哈达亚尔那时住在瑞典，我没有见着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終，在柏林的印度委员会亦随之而結束。这些人在他們的希望失敗之后，过的是枯燥無味的生活。他們賭大注，但是輸了。在战争期內他們声势赫赫，相形之下，現在的生活真是平淡無奇。但是就是要过稳定的平淡生活也不能要求就办得到。他們不能回印度，在战后，战敗了的德国不是一个容易生活的地方。生活是一場艰苦的奋斗。他們中間有少数人后来在英国政府的允許下回到印度，其他許多人只得繼續留在德国。他們的处境很奇特。他們显然沒有国籍。他們沒有正式护照，很难到德国境外去旅行。就是在德国境內居住也遭受許多困难，听任地方上警察的摆布。生活很不安定，很痛苦，每天都得操心怎样解决吃飯和住房的問題。

从一九三三年初起，假使他們不完全接受納粹的主張，納粹政府就增加了他們的困难。非日耳曼的、特別是亞洲出身的外国人在德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人只有規規矩矩才能活下去。希特勒明确地宣布他贊成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統治，很显然他想借此取得英国的好感，他無意鼓励任何英国政府不高兴的印度人。

我們在柏林会見了許多政治流亡者，其中有一个人叫昌巴克拉曼·比萊，他是战时团体中一个著名人物。他神气十足，年輕的印度学生給了他一个不恭敬的称号。他想的只是民族主义，从来不肯从社会方面或經濟方面去看問題。他跟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納粹鋼盔队搞得很好。在德国的印度人只有少数几个人跟納粹的关系不錯，他就是这少数人中間的一个。几个月后，我在監獄中在报上看到他死了的消息。

維命德南那什·恰托卜亞亞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他出身印度望族。他是一个能干可亲的人，平常一般人叫他恰

托。他常常發生經濟困難，衣服破舊不堪，每天吃飯也常常成問題。可是他仍然輕鬆愉快。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他比我高幾年級。我進哈羅公學的時候，他在牛津大學讀書。從那時起，他沒有回過印度。有時他想念故鄉，很想回國。他跟國內的聯繫早就斷絕了，如果他回到印度來，他一定感到不愉快，不協調。但是儘管在國外過了這樣長久的歲月，長期飄流，故鄉仍然吸引着他。沒有一個流亡者能夠逃避一般流亡者的毛病，這就是瑪志尼所說的心靈的創傷。

我在國外所會見的印度政治流亡者中大多數人沒有給我深刻的印象，雖然我欽佩他們的犧牲，同情他們的痛苦和現在所遭受到的困難，這些痛苦和困難都是實實在在的。我所見到的人不多，他們許多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只有很少數幾個人是我們聞名的人物，其餘的人則已經從印度局勢中消失了，被他們力求為之服務的同胞忘記了。在我所會見的少數人中間，在認識上給我好印象的只有維·恰托卜亞亞和蒙·勒·洛易兩個人。我在莫斯科見着洛易，匆匆地談了半個鐘頭。他那時是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後來他的共產主義脫離了正統派共產國際的共產主義。恰托不是一個正式的共產黨人，但是他傾向共產主義。現在洛易在印度坐牢已經三年多了。

此外在歐洲飄流的印度人還不少，這些人高談革命，提出驚人的、想入非非的建議和一些奇怪的問題。他們似乎是替英國特務機關工作的人。

自然我們也遇到許多歐洲人和美洲人。我們從日內瓦幾次去維紐弗地方訪問羅曼·羅蘭。第一次去還帶了甘地寫的介紹信。另外一個人物是年輕的德國詩人和戲劇家恩斯特·托勒，現在德

国在納粹統治下，他已經不是德國人了。還有一个人就是紐約公民自由協會的羅吉·鮑爾溫。我們在日內瓦結識了作家丹·戈卜爾·莫德基，他現在已經在美國住下了。

我在動身去歐洲以前曾經在印度見過牛津團契運動[⊖]的弗蘭克·布奇曼。他給了我一些關於牛津團契運動的宣傳品，我看了後不免感到驚奇。突然改變信仰、坦白自供和信仰復興主義的氣氛，這一切我認為跟人們的智慧不調和。我不了解為什麼有些顯然聰明的人會有這些奇怪的感情，並且受了這些感情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很奇怪。我在日內瓦又見着布奇曼，他邀請我到羅馬尼亞去參加一次牛津團契的國際聯歡會。我很抱歉不能去實地看一看他們的活動。我的好奇心仍然沒有獲得滿足。我在書報上知道牛津團契發展的消息愈多，我就愈加奇怪。

⊖ 布奇曼曾在英國牛津大學講道，宣傳“通過生活的改變來達到世界的改變”。

——譯者



第二十二章 印度的糾紛

我們到達瑞士后不久，英國就爆發了總罷工。我很興奮，當然我同情罷工的工人。幾天後總罷工垮了，消息傳來，對我個人是一個打擊。過了幾個月，我去英國住了幾天。礦工仍然繼續着他們的鬥爭，倫敦晚上處在半黑暗的狀態中。我很匆忙地參觀了一個礦區（我想是在德比郡）。我見到了男人、女人、孩子們憔悴的、瘦削的面孔，特別使我開眼界的是許多罷工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在法院中受審的情景。法官本人就是煤礦的董事或經理，他們審問礦工，根據緊急法令，以十分微小的罪名，將礦工定罪。有一個案件特別使我冒火：三四個婦女，懷中抱着孩子出庭受審，她們的罪名是曾經嘲笑過破壞罷工的工賊。這些年輕的母親和她們的孩子顯然過着痛苦和營養不良的生活。長期的鬥爭把她們的身體拖垮了，使她們痛恨那些從她們口中奪去她們的面包的工賊。

人們常常在書報上看到階級正義。在印度這是很平常不過的事。但是我想不到在英國也遇到這種公然破壞正義的行為。這使我大吃一驚。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驚奇，那就是罷工工人的普遍恐懼心理。警察和政府當局一定對他們施行了恐怖手段，因此罷工工人柔順地忍受惡意的待遇。經過長時期的鬥爭，他們已經弄得筋疲力竭，他們的精神快要垮了，其他工會的同志早就不管他們了。即令這樣，他們跟可憐的印度工人仍然有天大的不同。英

国矿工仍然有强大的組織，全国、事实上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同情他們，支援他們。这些是印度工人所沒有的。然而英国矿工和印度工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恐惧心理和受惊的神情。

那年正是印度联邦院和各省参議会举行三年改选一次的选举。我对于这种选举不感兴趣，可是选举中猛烈冲突的消息却傳到了瑞士。我听说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和拉拉·拉吉巴特·拉伊合作成立了一个新党，跟立法机构中的自主党或正规的国大党对抗。这个党的名字是民族主义党。新党和旧党到底在原則上有什么区别，我当时看不出来，現在仍然摸不清。实际上現在立法机构中的各种印度政党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實質上沒有什么差别。它們之間并没有真正的原則上的分歧。自主党第一次在参議会中起了新的积极因素的作用，它主張采取比其他政党更激烈的政策。但是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質上的差别。

新的民族主义党对于问题的看法更为稳健，比自主党更右傾。这个党完全是一个跟印度教大会密切合作的印度教徒党。由瑪拉維亞来领导这样一个党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个党几乎完全代表了他的态度。由于旧的人事关系，他仍然留在国大党内，可是他在認識上跟自由主义派或稳健派沒有什么不相同。他对于不合作运动以及国大党采取直接行动的新方法沒有好感，也不参加制定国大党的政策。虽然受人尊敬和欢迎，他并没有真正参加新的国大党。他不是国大党一个小規模的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的委員。他不执行国大党的决定，特别是关于立法机构的决定。他是印度教大会中最有威信的領袖，在关于教派事务的问题上，他的主張跟国大党的主張不同。他对于国大党有一种亲密的感情，因为从国大党一开始成立他就跟国大党有联系，而且他也傾向于爭取自由，

他認為只有國大黨真正腳踏實地作了些爭取自由的事情。因此他的心跟着國大黨，特別在鬥爭的時候；但他的頭腦却跟着另外一種人。這不可避免地繼續不斷引起他內心的鬥爭，有時使他企圖同時朝着兩個相反的方向前進。這就使人們感到混亂。不過民族主義就是一種混雜的集合體，瑪拉維亞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關心社會或經濟改革。他在文化方面、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都擁護舊的正統派制度。印度的王子、地主、收地租人都很有理由把他看作善意的朋友。他所要求（而且要求很熱烈）的唯一改變就是完全消滅外國在印度的控制。他在青年時代所受的政治訓練和所讀的書仍然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他用半靜止的十九世紀的眼光，用蒂·埃·格林，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格拉斯頓，摩萊的觀點，根據三四千年印度教文化和社会学的背景知識來看戰後變化很大的、革命的二十世紀。這是一種奇特的結合，充滿了矛盾，但是他相信他有能力解決這種矛盾。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在各方面從事公共活動，他建立了貝拿勒斯印度大學這樣大的事業，他辦事誠懇認真，講演動人，脾氣溫和，人品高尚很使人佩服，這些特點使印度大眾，特別是印度教徒敬愛他。雖然許多人在政治上不同意他的主張，不跟着他跑，但是仍然尊敬他。他的年紀大，資格老，他是印度政治上的元老，但是這個元老似乎有點兒過時，跟現代世界脫了節。他一發言就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許多人對他講話時所用的語言却不了解，或不加理睬。

因此瑪拉維亞不參加自主黨，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自主黨在他看來在政治上太前進了，並且有嚴格的紀律，必須遵守國大黨的政策。可是在政治和教派問題上，瑪拉維亞卻主張更右傾一些，要求更大的自由，他在新黨中實現了這些要求，這個黨就是他創立的和

領導的黨。

拉吉巴特·拉伊雖然也趨向右傾，趨向於更從教派的觀點看問題，他參加新黨卻不容易理解。那一年的夏天，我在日內瓦會見過拉吉巴特，從我們的談話中我沒有看出他準備採取積極態度反對國大黨。他後來為什麼這樣做了，我到現在仍然摸不清。不過在競選運動中，他提出了一些含糊其詞的指責，暴露他當時心中的打算。他指責國大黨的領袖人物勾結印度境外的人，陰謀在喀布尔建立國大黨支部。雖然人家一再要求他具體和詳細說明這種指責，他始終不肯這樣做。

我在瑞士讀印度寄來的報紙，看到拉吉巴特的指責時不由得大為震驚。我是國大黨書記，我知道我們組織所有的情形。在使喀布尔委員會加入國大黨這件事中，我自己曾起過作用（德希班都·達斯首先倡導這件事）。當時我雖然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指責的詳細內容，可是根據這些指責的一般性質，我可以說，就國大黨而言，這些指責是沒有根據的。我不知道拉吉巴特怎樣把這件事搞錯了。也許他相信各種謠言。我想他最近跟阿貝杜拉摩爾維談話後一定受了很大的影響，雖然這次談話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平常的地方。但是選舉是不平凡的現象，很容易打破常規，改變一個人的看法。我看得愈多，我就愈奇怪，我內心裡對於它們不民主的反感也就愈大。

撇開人的因素不談，由於全國教派糾紛情緒的發展，民族主義黨（或其他這樣的政黨）的興起，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穆斯林害怕印度教徒取得多數派的地位；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又認為穆斯林欺負他們，因而感到憤慨。許多印度教徒認為穆斯林的态度帶有很濃厚的威脅味道，企圖以跟另一方合作為威脅，勒索得一些特殊

权利。正因为这种原因，印度教大会就显露头角，因为它代表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印度教的教派主义反对伊斯兰教的教派主义。印度教大会的积极活动更进一步影响了和刺激了伊斯兰教教派主义，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使全国的教派糾紛情緒高漲。这个问题實質上是多数派和一个大的少数派之間的問題。但是說起来奇怪得很，在全国有些地方情况就相反。例如在旁遮普和信德，印度教徒与錫克教徒是少数派，穆斯林是多数派。这些省中的少数派害怕被敌对的多数派消灭，正如穆斯林害怕在印度全国被多数派的印度教徒消灭一样。說得更精确些，每一派中那些中产階級出身的想作官的人都深怕被別人赶走，而那些現在有权势的人又深怕激烈改革以致影响他們的既得利益。


由于教派主义的發展，自主党遭到困难。党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党员退出党去参加教派組織。党内一些信奉印度教的党员脱离了党去参加民族主义党。就信印度教的选民而言，瑪拉維亞跟拉吉巴特·拉伊携手合作是一种有力的結合，拉吉巴特在教派主义糾紛的中心地方旁遮普有極大的影响。在自主党或国大党方面，竞选的重担主要落在我父亲的身上。达斯已經不在那兒跟他一起担負这个責任。父亲喜欢战斗，無論如何他从未逃避过战斗。反对派的力量增長更使他把所有的力量用于竞选。他受到对方的重大打击，他也用重大打击回敬，双方都是硬碰硬，手下不留情。这次选举留下了一些痛心的回忆。

民族主义党获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可是这种胜利降低了联邦院的政治音調。重心更移往右边。自主党本身是国大党的右派。自主党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不惜讓一些可疑的人混进了党，因此使党的質量受損失。民族主义党也采用同样的政策，不过做得更

下流些，一些跟政治無關的雜七雜八的有頭銜的人物、大地主、工業資本家及其他人物都混進了民族主義黨。

一九二六年末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使全印度大為震驚。這件事說明教派的感情沖動會使人干出什麼事。斯瓦米·席拉德汗南達睡在床上被一個狂人刺死。一個人赤裸着胸膛對着廓爾喀人的刺刀向前沖去，這是怎樣的一種死亡啊！大約八年前，他作為阿利亞沙瑪吉教派的領袖，在德里向一大群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重要人物講道，要求大家團結，爭取印度的自由。當時那一群人向他高呼印度教—伊斯蘭教萬歲。在外邊的街道上，他們用自己的鮮血保證這個口號。現在他死了，被一個同胞殺死了，無疑，這個凶手自己認為作了一件好事可以使他上升到天堂去。

我常常欽佩人們為了正當的事業有勇氣忍受肉體上的痛苦，甚至於死。我想我們多數人都羨慕這種精神。斯瓦米·席拉德汗南達具有飽滿的大無畏精神。他身材高大雄偉，穿着教袍，雖然年紀大，背還沒有駝，眼睛閃閃有神，有時臉上現出對別人的弱點不耐煩或憤怒。我現在仍然記得十分清楚他的形象，而且這個形象不時出現在我的眼前！



第二十三章 布魯塞爾的被壓迫 民族大會

一九二六年快要完的時候，我恰好在柏林。在那里聽說不久要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被壓迫民族大會。我很喜歡召開這種會議，我寫信回國，建議印度國大黨正式參加布魯塞爾大會。印度國大黨批准了我的建議，並且委派我為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

布魯塞爾會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召開的。我不知道誰發起這次會議。那時柏林吸引了許多外国的政治流亡者和激烈分子。在這方面柏林逐漸趕上了巴黎。共產黨分子在柏林也很活躍。當時關於被壓迫民族採取某些共同行動，以及被壓迫民族和勞工中的左派採取某些共同行動的想法很流行。人們更加認識爭取自由的鬥爭，是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因此，共同討論，並且在可能時採取共同行動，是很好的事。擁有殖民地的國家——例如英、法、意大利等國當然反對召開這樣的會，但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不再是一個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德國政府對於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及附屬國境內的運動的發展表示善意的中立態度。柏林之所以成為從外國來的進步分子和不滿分子的中心，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活躍的是中國國民黨左派人物。當時國民黨正在全國占上風，舊的封建主義分子完全垮了，甚至帝國主義國家也不得不放棄過去那種作威作福和盛氣凌人的

態度。中國的統一和自由，似乎很快就會實現，而不能夠再拖延下去。國民黨由於勝利而洋洋得意，但是國民黨認識自己前面的困難，想利用國際宣傳來加強自己的地位。也許是國民黨的左派，跟國外的共產黨人和近乎共產黨的人合作，強調這種宣傳，借此提高中國在國外的地位，並加強國民黨左派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那個時候國民黨還沒有分裂成一些互相競爭，敵意很深的小派別。在表面上還表現出團結一致的樣子。

因此國民黨在歐洲的代表歡迎舉行被壓迫民族大會，也許他們跟其他一些人聯合發起這次大會。從一開頭，有些共產黨人和近乎共產黨的人就支持這個建議。但是總的說起來，共產黨分子都留在幕後。拉丁美洲當時正在反對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因而對大會表示積極支持和援助。那個時候，墨西哥的總統是個急進派人物，推行急進政策，墨西哥很想領導拉丁美洲集團，反對美國，因此墨西哥對布魯塞爾大會很感興趣。墨西哥政府沒有正式參加，但是派了一個有名的外交官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這次大會。

參加這次布魯塞爾大會的還有爪哇、印度支那、巴勒斯坦、敘利亞、埃及等國內民族組織的代表，從北非洲來的阿拉伯人，以及非洲的黑人。另外許多左派勞工團體派有代表出席。有幾個長期領導歐洲勞工鬥爭的有名人物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共產黨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在大會討論中占重要地位，他們不是以共產黨的資格，而是以工會和類似工會團體的代表的資格出席的。

英國的喬治·蘭斯伯里被選為大會主席，他發表了動人的演說。這件事本身就證明大會並不激烈，也不單跟着共產主義跑。這次集會對共產黨表示了友好態度，這是沒有疑問的。雖然在某些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可是似乎有些採取一致行動的共同點。

当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蘭斯伯里先生答应担任反帝大同盟这个永久組織的主席。但是他很快就对这种輕率行动表示后悔，也許因为英国工党中的同事們不贊成他的这种行动。工党当时是“英王陛下的反对党”，不久就要飞黃騰达，成为“英王陛下的政府”，將來要出任內閣大臣的人們不能够沾染危險的革命政治活动。蘭斯伯里先生以事忙不能兼顧为借口辞去反帝大同盟主席的职务，他甚至辞去反帝大同盟會員的資格。兩三个月前，蘭斯伯里的演說引起了我对他的尊敬，現在他突然改变了态度，这使我痛心。

有不少有名人物支持反帝大同盟，其中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孙中山夫人(宋庆齡女士)，大約还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宣布辞职，因为他不同意反帝大同盟对巴勒斯坦地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糾紛所表示的亲近阿拉伯人的态度。

布魯塞尔會議以及后来反帝大同盟在各地所开的委员会會議，帮助我認識殖民地和附屬国家的若干問題，同时也使我了解西方劳工內部的冲突。关于这种情形，我本来已經知道一些，我在書报上讀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我的这些知識沒有实际內容，因为我沒有亲自接触过这些实际情况。現在我有了这种接触，而且有时得应付反映这种內部冲突的問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領導劳工运动，我同情第三国际所領導的劳工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使我討厭。英国工党是第二国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而我們在印度亲身領教过英国工党的手法，而且領教够了。因此我自然而然地怀着善意，轉向共产主义。因为尽管共产主义有缺点，至少它不騙人，它不是帝国主义。这并不是理論上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优点知道的不多，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只有一点粗淺的認識。而这些認識以及在俄国

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共產黨人辦事專橫，他們所用的方法厲害而粗野，他們攻擊每一個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共產黨的這些作法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共產黨人也許會說，我的這種反應毫無疑問是因為我受了資產階級教育。

在反帝大同盟委員會開會時，關於一些小問題的爭論，我常常站在英美兩國委員這一邊，這是一件奇怪的事。至少在方法問題上，我們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點。我們都反對誇張的、冗長的決議案，這種決議案好像宣言。我們喜歡比較簡潔的文件，可是大陸的傳統反對我們的主張。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常常發生意見上的分歧。通常總是妥協了事。後來我們有些人回國，不能再出席委員會的會議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部和殖民部對於布魯塞爾大會的活動感到驚慌。英國外交部的有名作家安格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中對這次大會作了危言聳聽，有時是可笑的敘述。這次大會中也許有許多國際間諜，有些代表甚至代表各種特務機關。我們就遇到這類例子。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在巴黎時，曾經有一個法國的特務人員去看他，問他一些事情。這是一種友好的訪問。當他問完話後，他問這個美國人真不認得他嗎，因為他們以前曾經見過面。這個美國人注意看他好久，但總不認得他。這個特務人員這時才告訴這個美國人，說他們在布魯塞爾大會上遇見過，那時他是黑種人的代表，他的臉、手等全部塗黑。

反帝大同盟委員會有一次在德國科隆開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完後，我們被邀去附近的杜塞爾多夫出席一個關於聲援薩科—范塞蒂的會議。我們在會後回去的時候，警察要查驗我們的護照，大多數人身上帶着護照，但是我的護照留在科隆的旅館

里，因為我們到杜塞尔多夫城來只几小時。我身上沒有護照，就把我押到警察局，幸好在那里我見到了共患難的朋友——一對英國夫婦，他們也把護照留在科隆。我們在警察局等了大約一小時，在這時間內警察局也許打電話到科隆去問，後來警察局長客气地讓我們走了。


反帝大同盟後來更加傾向於共產主義，雖然就我所知，反帝大同盟從來沒有喪失它自己的個性。我只能用通訊的方法在遠處跟反帝大同盟維持聯繫。一九三一年，因為我參加了國大黨和印度政府在德里達成休戰的工作，反帝大同盟對我大發雷霆，把我逐出了反帝大同盟——更确切些說，通過決議案，把我開除了。我必須承認反帝大同盟的確大動肝火，但是它本來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解釋我的立場。

我父親於一九二七年夏天來到歐洲。我到威尼斯去接他，在以後幾個月中間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我們大家——父親、我的妻子、我的妹妹和我——一起於十一月間慶祝蘇維埃十周年紀念時到莫斯科去游歷過一次。這次時間很短，只在莫斯科住了三、四天，一切都是臨去前最後一會兒才決定的。不過我們很高興去走了一趟，因為這次參觀雖然是走馬看花也是值得的。它沒有，而且也不可能使我們充分認識新俄國，但是它給我們今後閱讀書報提供背景知識。就我父親而言，這種蘇維埃集體化思想是很新鮮的。他所受的訓練全部是關於法律和憲法方面，因而他很不容易跳出那個範圍。不過他在莫斯科所看見的事物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當第一次宣布西門調查團消息的時候，我們正在莫斯科。我們首先在一張莫斯科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幾天後，父親在倫敦的樞密院出現，辦理一件印度上訴案，約翰·西門爵士是他的同

僚。這是一件關於地主的老案子，多年以前在這件案子的早期我也經手辦理過。不過我早已不感興趣了。由於約翰·西門爵士的建議，我有一次陪我父親去和約翰·西門爵士商量事情。

一九二七年快要結束了，我們在歐洲居住的時間拖得太久了。假使父親不到歐洲去游歷，我們可能早些回國。我們原來計劃在回國的途中在東南歐、土耳其和埃及等地看一看。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了，國大黨下屆大會已經決定在聖誕節時在馬德拉斯舉行，我切望在開會前趕回印度。我的妻子、我的妹妹、我的女兒和我一行四人於十二月初在馬賽搭船赴科倫坡。父親則留在歐洲多住了三個月。



第二十四章 回到印度，投身 政治活动中

我从欧洲回国，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妻子的健康沒有完全恢复，可是比过去好多了，我不必再替她担心了。我自己觉得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过去那种常常使我苦惱的内心斗争和悲观失望情绪暂时消失了。我的眼界比以前广闊些，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似乎过于狭窄，不能解决问题。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需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沒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沒有社会主义机构，無論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到对世界上的事情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些，对于当前的世界，不管它怎样变化多端，比以前更能掌握。我讀了很多書报，不仅是关于时事和政治的書报，而且涉及其他許多使我感兴趣的问题，例如文化、科学方面的書报。我认为欧洲和美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發生的巨大变化，是一个很有兴趣的研究题目。苏联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缺点，却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而且苏联似乎給全世界带来了希望。在二十年代的中期，欧洲正在設法安定下去，大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我离开欧洲回到印度时，我感觉这种安定只是表面上的现象，欧洲和整个世界在最近的将来就要爆发重大的变化。

因此，使我们的国家准备应付这些世界事件——尽量使我們

随时有准备应付这些事件——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种准备主要是在思想方面。首先必需确立争取政治独立的目标。大家应该认识清楚这是我们唯一可能的政治目标，它跟关于自治地位含糊其辞而且令人思想上发生混乱的谈论根本不同。此外还有社会目标。在那个时候希望国大党在这方面走得很远，这种要求未免过高。国大党是一个纯粹政治和民族主义的组织，不惯于从其他方面考虑问题。不过事情总得开始做。在国大党外，在劳工界和青年人中间，这种想法容易推动些。为了这个目的，我想摆脱国大党的职务，并且还想在远处的农村中去住几个月，研究农村中的情况。可是这种想法未能成为事实，各种事情凑合在一起又把我拉回去参加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我们一到马德拉斯，我就卷入漩涡。我向工作委员会提出一批决议案——关于独立、战争危机、跟反帝大同盟建立联系等问题的决议案。工作委员会几乎全部接受了我所提出的决议案，并且把它写成工作委员会的正式决议案。我不得不把这些决议案在国大党的公开会议中提出，结果几乎全体一致通过，这使我感到惊奇。甚至像安妮·白山特夫人那种人物也拥护关于独立问题的决议案。这种全面的拥护很令人兴奋。可是我心里却感到不安，我认为人们也许没有认识这些决议案的真正意义，或者曲解了这些决议案。我的这种忧虑在国大党会议后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因为这次会后不久，关于独立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就发生了争执。

我所提出的这些决议案，跟国大党平日的决议案有些不同，代表一种新的看法。许多国大党人毫无疑问喜欢这些决议案，有些不大喜欢，但还不至于公开表示反对，也许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决议案，不管它讲些什么，关系不大。他们认为避免这些决议案

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这些決議，赶快討論其他更重要的問題，关于独立問題的決議当时并不是国大党方面重要的迫切要求（过了一兩年后情形就大不相同），而只是一种广泛的，日益發展的意見。

甘地当时在馬德拉斯，他出席国大党公开會議，但不参加制定政策。他是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不出席工作委員會的會議。自从自主党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就采取这种政治态度。但是工作委員會常常跟甘地商量，凡是作任何重要的事他事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对于我在国大党大会上所提出的決議案，到底贊成到什么程度。我以为他不喜欢这些決議案，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这些決議案講了些什么，而是在于这些決議案所表現的一般傾向和看法。可是甘地沒有批評这些決議案。我的父亲当时远在歐洲。

在国大党那次會議中就已經看出了关于独立問題決議缺少現實性。那次會議也討論了另一个決議案，这个決議案主張反对西門調查团，号召大家抵制这个調查团。此外还建議召开各党联席會議，草拟印度的宪法。事情很显然，稳健派从来沒有想到独立，他們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只是某种形式的自治領地位。而这些稳健派又是当时爭取合作的对象。

我又重新担任国大党書記的职务。这是有个人的考虑的：那一年国大党的主席安沙利医生是我的老朋友，此外，我所提出的許多決議案在大会中通过了，我应当負責促其实行。关于召开各党联席會議的決議部分地抵消了我的決議案的效果，可是还有許多仍然保留下来。我重新接受書記职务的真正原因是我害怕国大党通过各党联席會議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又退回去采取更稳健的、妥协的立場。●国大党似乎迟疑不决，輪流地从一个極端跑到另一極

端。我想在我可能办到的范围内，防止国大党退回到稳健的立场，坚持独立的目标。

在国大党每年开年会的时候常常引起一些附带的表演。国大党在馬德拉斯开会时，共和會議那年举行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我被邀请去当这个會議的主席。我自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而我喜欢这种會議。不过我也有点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誰在幕后搞这次會議，同时我也不願意自己跟那些突然生長的組織發生联系。不过我后来还是去主持會議，但是我接着就后悔，因为共和會議像其他許多會議一样，宣告流产了。我花了几个月的工夫，設法使會議通过決議，但結果沒有下文。我很惊奇，有許多人喜欢發起新事業，后来就置之不理，讓它自生自灭。有人批評我們，說我們不是具有坚持力的人，这种批評很有道理。

国大党會議閉幕了，我們还没有离开馬德拉斯就得了哈基蒙·亞瑪尔·汗在德里去世的消息。他曾經当过国大党的主席，是国大党的元老之一，不仅如此，他在国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一个稀有的地位。他完全是在旧的保守主义的生活方式中生長大的，跟現代的精神沒有接触，他深受莫臥兒王朝京城德里的文化的陶冶，他很講礼节，說話时从容不迫，有时也講些不动人的笑話。就他的表現而言，他是旧社会貴族的典型，他的面容和一举一动都帶有王室的高貴气，甚至他的臉也很像莫臥兒王朝帝王的縮影。这样一种人通常不喜欢忙乱的政治活动。在印度的英国人因新的煽动家的活动而头痛时，就渴望能够找到这种旧式人物。哈基蒙·沙哈勃在年輕的时候也跟政治毫無关系。他是名医世家的首腦，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忙于医务工作。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他經歷了一些事变，并且受了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安沙利医生

的影响，逐渐靠近国大党。后来所發生的事情——旁遮普宣布戒严，基拉法問題——大大地推动了他，使他贊成甘地的不合作办法。他参加国大党后給国大党帶來了很大的好处，他变成新制度与旧制度間的联系入，使旧制度拥护民族运动，跟新制度协调，加强了民族运动先鋒队的力量，并促进了他們內部的团结。他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更互相接近，因为双方都尊重他，深受他的榜样的影响。他变成了甘地的忠实可靠的朋友，他关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問題的意見就是最后的意見。我的父亲跟哈基蒙自然互相接近。

去年印度教大会中有些領袖人物攻击我，說我不了解印度教徒的意見，因为我的教育有毛病和我有“波斯”文化的一般背景。我有什么文化，或者是否真正有文化，我自己很难表示意見。不幸得很，波斯語作为一种語言而言，我是一窍不通。但是我父亲是在一种印度波斯文化气氛中長大的，这是事实。这种气氛是旧时德里宫廷在印度北部留下的遺產，現在的情况虽然改变了，德里和勒克瑙仍然是这种文化气氛的兩個主要中心。克什米尔的婆罗門具有适应环境的特殊才能，他們来到印度平原看見这种印度波斯文化当时很得势，他們就吸收这种文化，在波斯文和烏尔都文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后来英語和欧洲文化流行了，他們也就很快适应了这种改变的情势。可是一直到現在，在印度的克什米尔人中間还有許多有名的波斯文学者，我們可以举出兩個人：德吉·巴哈杜尔·薩普魯爵士和拉加·納倫德拉·那特。

哈基蒙·沙哈勃跟我父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們甚至發現兩家人过去有些关系。他們成为很好的朋友，互相称呼为弟兄。在他們的許多联系中，政治上的联系是最少的，在家庭生活習慣

方面，哈基蒙是非常保守的，他（或者可以说他的家人）不能摆脱旧时的习惯。在他家庭里，关于妇女深居简出的规定非常严格。但是说起来很奇怪，哈基蒙坚决相信一个国家的妇女如果不自由，这个国家就不能进步。他特别对我强调这一点，说他多么羡慕土耳其妇女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凯末尔的成功，主要靠了土耳其妇女。

哈基蒙·亚玛尔·汗的死对国大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就是说国大党失去了一个坚决的支持者。自哈基蒙死后，我们每次到德里去时，总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似的，因为德里是跟哈基蒙和他在比尔马南的家密切联系的。

在政治方面，一九二八年是内容丰富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很活跃。似乎有一种新的力量把人推着向前走，各种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也表现了一种新的活跃现象。也许这种变化在我长期出国的期间内就逐渐发生了。我回来后看到这种变化免不得认为变化太大。一九二六年初，印度仍然很沉静，消极，也许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运动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了一九二八年，印度似乎有朝气，很活跃，洋溢着被压制未得发挥的精力。这种现象到处都看得出，无论在产业工人中间、农民中间、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或一般知识分子中间都是这样。

工会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了，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于斗争性。常常爆发罢工，阶级觉悟提高了。纺织工业和铁路业组织得最好，其中最强大的、最先进的工会要算孟买的红旗工会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劳工组织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从西方带来了内部冲突和分裂的种子。印度工会运动刚

成立，就表現了分裂成互相競爭和敵對的派別。有些加入第二國際，另外一些支持第三國際。有些人的看法是穩健的改良主義，另外一些則公開主張革命，要求激烈改變。介乎這二者之間是各色各樣的意見，而且正如在一切群眾團體中一樣，存在着機會主義。

農民起來了，這在聯合省，特別在俄得地方更引起人注意，在這裡，佃農開會表示抗議的現象是家常便飯。農民認識，雖然新的俄得租佃法規定終身租佃，並且答應了很多東西，但是對於他們的痛苦生活，並沒有什麼改變。在古甲拉特地方，政府和農民間發生了大規模衝突，衝突的原因是政府企圖提高稅收。古甲拉特是一個自耕農區域，政府直接跟農民打交道。這次鬥爭是在薩達爾·瓦拉拜·巴特爾領導下的巴多里堅持真理運動。鬥爭堅持下去，使全印度表示敬仰。巴多里農民取得了很大勝利。可是這次運動的真正勝利却在它對於全印度農民所產生的影響。巴多里變成了印度農民的希望，力量和勝利的象徵。

一九二八年的印度還另外有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那就是青年運動的發展。到處都成立了青年團，開青年會議。這些團體和會議是各色各樣的，從半宗教團體到討論革命思想和方法的團體都有。不管它們的根源和背景如何，這些青年會議常常開始討論當前迫切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而且一般說來，它們傾向於徹底改變。

從純粹的政治角度來看，一九二八年突出的事情是抵制西門調查團及（抵制運動的建設方面）舉行各黨聯席會議。穩健派跟國大黨合作進行抵制運動，結果非常成功。不管西門調查團走到哪裡，群眾總表示反對，高呼“西門滾回去”。這樣廣大的印度群眾不僅認識了約翰·西門爵士的名字，並且認識兩個英文字，他們認得

的也仅仅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使西門調查团的人員寢食不安。曾經有人講起这样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西門調查团的人住在新德里西方招待所的时候，在夜間也听见“西門滾回去”的呼声。他們大为惱火，因为甚至在晚上也被人家这样追迫，不得安宁。事实上，这种声音是新德里附近荒凉地区野狼的叫声。

各党联席會議沒有經過什么困难就把宪法的主要原則解决了，这些原則是民主国会类型的原則，任何人都能够制訂这种原則。真正困难，而且也是唯一的困难在于教派或少数民族問題。各种極端教派团体都有代表参加了各党联席會議，因此要想达成協議就特別困难，这次會議是以前沒有結果的团結會議的重演。我父亲春天从欧洲回国，对于这次會議很关心。最后，作为沒有办法的办法，指派了一个委員會，由我父亲任主席，負責起草宪法，并且提出关于教派問題的全面报告。这委員會后来称为尼赫魯委員會，它所提出的报告称为尼赫魯报告書。德吉·巴哈杜尔·薩普魯爵士也是这个委員會的委員，他負責起草委員會报告的一部分。

我不是这个委員會的委員，但是因为我是国大党書記，有很多事跟这个委員會打交道。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为难的局面，因为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在于取得政权，紙上談兵，起草詳細的宪法完全不中用。我所感到的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这个混合的委員會不可避免地把我們的目標限制于所謂自治領地位，事实上还不及自治領的地位。就我而言，我認為这个委員會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委員會也許能够替教派問題的僵局打开一条出路。我并不希望达成协定或協議，根本解决這個問題。只有分散一些兴趣去注意社会問題和經濟問題，才能根本解决這個問題。但是假使相当多的人能够接受一个临时协定，也就可以促进局势的緩和，使人們轉而注意

其他問題。因為這種原因，我不願阻撓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我並且盡力幫助它。

勝利似乎很有把握。只剩下兩三個問題沒有解決，其中真正重要的是旁遮普，在那里存在着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三角糾紛。這個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中從一個新的觀點考慮旁遮普問題，並且引用人口分布的數字來支持它的建議。可是這一切都是徒勞而無功。雙方都抱有恐懼和猜疑，因而沒有採取消除最後一點隔閡的步驟。

各黨聯席會議在勒克瑙城開會，討論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書。這又使我們有些人感到進退兩難，因為一方面假使教派問題能夠解決的話，我們不願意妨礙它的解決；另一方面我們不準備在獨立問題上讓步。我們要求各黨聯席會議對這個問題不作決定，使每個參加這次會議的黨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自由行動——國大黨堅持獨立，比較更穩健的各黨派可以主張自治領地位。但是我父親一心一意地要通過報告書不肯讓步，在當時的形勢下他也不可能讓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中主張堅持獨立的一派人（這派人為數很多）要我代表他們在會上發表宣言，聲明凡是任何降低獨立目標的東西，都跟我們完全無關。但是我們也明白指出我們不想搗亂，因為我們不擬阻撓發出關於教派問題的宣言。

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採取這種行動，並不是很有效的。這充其量只是一種消極的姿態。在那一天，我們成立了印度獨立大同盟，這就使我們的態度有了積極的一面。

各黨聯席會議另外還給我一個更大的震動，那就是會議決定在建議的憲法中規定基本權利時，根據俄得地稅征收者的建議，增加一條，保證這些人的利益。整個憲法自然以私有財產的觀念為

基础。但是把半封建大田地的财产权作为宪法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我认为这是胡闹。这种行为使人们看得很清楚：国大党的领袖人物（非国大党人尤其是如此），宁愿跟大地主来往，而不愿跟自己内部比较进步的分子打交道。事情很明显：我们跟我们许多领袖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在这种形势下，我继续担任国大党总书记的职务未免有点荒唐。我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是印度独立大同盟发起人之一。可是工作委员会不同意我辞职，并且告诉我（也告诉苏巴斯·鲍斯，因为他亦以同样理由辞职），说我们可以继续印度独立大同盟的工作，这跟国大党的政策并不冲突。国大党早已宣布过赞成独立。这次我又同意不辞职。我很容易被人说服，撤回辞职书，这是令人奇怪的。这种情形发生过许多次，因为双方都并不真正喜欢闹翻，因此总采用一切借口加以避免。

甘地没有参加各党联席会议及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他甚至没有参加勒克瑙会议。

在这个时期，西门调查团四处奔走，而群众表示反对，高呼“滚回去！”有时群众跟警察发生小冲突。拉合尔地方所发生的事使事情露了头，引起了全国的愤慨。拉合尔所举行的反对西门调查团的示威，是由拉吉巴特·拉伊所领导的。当他站在路旁几千示威者面前时，一个年轻的英国警官用棍子打他的胸部。群众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拉吉巴特当然更不会这样做了。当他和和平平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跟许多同伴被警察痛打一陣。凡是参加街道示威的人都有跟警察发生冲突的危险。虽然我们的示威很和平，拉吉巴特一定知道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并且有意識地冒这种危险。警察打人的方式，以及他们过分的暴行使印度许多人大为震动。在那些时候，我们还看不惯警察的棍打，我们还没有因为一再

發生暴行而弄得麻木不仁。眼見着我們最偉大的領袖，在旁遮普最出名，最有威信的人，受到這樣待遇，這種行為真是荒謬之至，引起全國（特別是在印度北部）的憤慨。我們是多麼無可奈何。我們甚至不能維護我們領袖們的尊嚴，這是多麼可恥的事！

拉吉巴特胸部被打及他很久以來就有心臟病，這使他身體受到的損傷是很嚴重的。也許對於一個身體好的青年人，這種傷不算重，可是他既不是青年人，身體也不好。他幾個星期后就死了。跟這種傷勢有多少關係很難確定地回答，不過替他看病的醫生都認為這次被打受傷，使他死得更快。我想這次挨打，一方面肉體上受了傷，另一方面精神上也受了很大的刺激，這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感到悲憤，並不是因為挨打，個人受了恥辱，而是他挨打這件事也是民族的恥辱。

這種對於民族恥辱的認識使印度人感到痛心。不久他的死的消息傳來，人們把他的死跟他挨打的事聯起來，悲哀因而變成了憤怒。最好能夠認識清楚這點，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够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了解巴格特·辛格，了解他為什麼突然間在印度北部受人愛戴。指責一個人或一件事，而不去追求其中的根源或原因，這種作法很容易，但是很愚蠢。巴格特·辛格在以前並不出名。他出名並不是由於暴行或恐怖行動。恐怖分子在印度活動前前後後將近三十年，但是除了早期在孟加拉地方外，沒有一個恐怖分子享有巴格特·辛格那樣高的威信。他們跟巴格特·辛格相比差得很遠。這個顯著的事實不能加以否認，而必須加以承認。另外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就是：儘管恐怖主義有時爆發，但是它對於印度青年不再有真正的號召力了。由於十五年來強調非暴力主義，印度的整個背景改變了，使群眾對於把恐怖主義作為政治行動的一種

方法表示漠不关心，或者反对。甚至产生恐怖分子的下層中产阶級和知識阶層都深受国大党反对暴力主义的宣傳的影响。他們当中那些主張革命行动的活动和性急分子充分認識恐怖主义不能完成革命，他們認識恐怖主义是过时的、無用的方法，阻碍真正的革命行动。在印度，恐怖主义是一种正在消灭中的东西，这并不是由于政府的压迫，而是由于根本的原因和世界形势的發展，政府的压迫只能抑制或封鎖恐怖主义，但不能消灭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通常代表一个国家內幼稚的革命冲动。这个阶段过去后，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現象亦随之而过去。可能由于地方上的原因或个别压迫，恐怖行动可能还会繼續發生。毫無疑問，印度已經过了那个阶段，因此就是間或爆發恐怖行为的現象也会逐漸消灭。可是这并不是說在印度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暴力方法了。大部分人不再相信个人的暴力行动和恐怖主义，但是許多人仍然認為將來有一天，有組織的暴力方法是爭取自由所必需的，正如在其他国家常常必需的一样。目前这是一个理論問題，只有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解决。它跟恐怖主义的方法沒有关系。

巴格特·辛格的出名，并非由于他的恐怖行动，而是由于他似乎暫時維護了拉吉巴特·拉伊的尊嚴，并因此而維護了印度民族的尊嚴。他变成了一个象征。他的行动被人忘記了，可是这个象征却繼續存在着。不上几个月，在旁遮普的每个城市和乡村中，他的名字家喻戶曉，在印度北部其他地方也同样發生了这种現象，不过範圍小一些。有不少的歌是歌唱巴格特·辛格的，他在人民中威信之高是令人惊奇的。

在反对西門調查团的示威中挨打后不久的拉吉巴特·拉伊出席了全印国大党委員會在德里召开的會議。他仍然帶有伤痕，身

体沒有恢复。这次會議是在勒克瑙各党联席會議后举行的，討論了独立問題。我忘記了当时真正的爭論是什么，可是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發言很長，我指出国大党在革命观点(这种观点主張激烈改变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和改良主义的目标、方法之間加以選擇的时候，已經来到了。我的發言無關重要，我本来早就可能忘記了，可是拉吉巴特在委員會上答复了我的發言，并批評我發言中的某些地方，因而我現在还記得起这次發言。拉吉巴特的警告之一是說，我們不要希望英国的工党会有所作为。对我而言，这种警告是多余的，因为我并不佩服英国工人的正式領導团体。假使工党支持印度爭取自由的斗争，真正切实地反对帝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那会使我感到奇怪。

拉吉巴特回到拉合尔后就馬上重新批評我在全印国大党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并且开始在他所办的“人民”周刊上發表連載的文章，討論我的發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第一篇文章發表了。登載第二篇文章的下一期刊物还未出版，他就死了。他未写完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他最后發表的写作，我想起这篇文章总感到悲痛。



第二十五章 挨打的經驗

拉吉巴特·拉伊挨打，接着不久就死了，這兩件事使西門調查團后来所到各地所举行的示威运动更加激烈。西門調查團預計要到勒克瑙去，当地的国大党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准备工作，来“招待”西門調查團。在事前許多天就举行了游行、示威、會議，作为宣傳和將來实际行动的預演。我到勒克瑙去，并且参加过几次这种演習。这种預备示威运动很守秩序，很和平，获得了成功，使政府当局大伤腦筋。当局于是开始干涉，發出命令禁止在某些区域内游行。我就是在这方面获得一种新經驗，我嚐了警棍的滋味。

当局禁止游行，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妨害交通。我們决定不在这方面予人以口实，記得当时分为若干批，每批十六个人，各自走僻靜的道路到开会的地点去。严格說，这种行为是違反命令的，因为十六个人帶着一面旗就是一个游行队伍。我帶領一个由十六个人所組成的小队，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我的同事哥文·巴拉·潘特帶領另外一小队人跟着。我的那队人走了大約二百碼，路上冷清清的，我們忽然听見后面的馬蹄声。回头一望，看見二、三十个騎馬的警察，很快地向我們扑来。他們不久就来到我們面前，我們十六个人的小队伍一看見馬就散开了。騎警这时用警棍和槍柄打我們的志願队，我們的人向人行道逃走，有的甚至逃到小商店里去。警察追着去打他們。当我看見騎警的馬向我們冲来时，

我本能地想逃走以保安全，這是一種令人喪氣的景象。可是另外一種本能使我堅持在原地不動，在我後面的志願隊把警察的第一次衝擊打退了，我沒有受傷。突然間我發現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馬路當中，離開我幾碼以外，警察在追打我們的志願隊。我自動地慢慢向路旁移動，為了使自己不過於暴露目標。可是我又停下來不動，自己心裡在鬥爭，認為我這樣走開是不適宜的。這只是幾秒鐘的事情，可是我記得很清楚自己當時內心的鬥爭，以及由於自尊心而作出的決定，這種決定不能容忍我有臨陣脫逃的思想，表現自己胆小。可是胆小和勇敢的分別不明確，我也許可能站在胆小方面。正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一個騎警策馬向我沖來，手中揮舞着長棒。我對他說要打就打罷，我把頭轉向另外一方——這種本能的舉動是為了保全自己的頭和臉。他在我的背上重重地打了兩下。我感到頭昏眼花，全身發抖，可是我仍然站着，這使我驚奇和滿意。警察後來不久就撤退了，把我們前面的路隔斷。我們的志願隊重新集合起來，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潘特帶領的人也來到我們這裡，他們也遭警察毒打，我們大家一起坐下來，跟警察對峙。我們這樣坐了一小時左右，天黑了下來。一方面各種大官們聚在那兒商量應付辦法，另一方面，消息傳出後，大批群眾開始前來增援。後來官員們同意讓我們走原來所選定的路綫。剛剛向我們衝擊並且毒打我們的騎警，這時走在我們隊伍的前頭，好像是護送隊一樣。

我對於這件小事寫得很詳細，因為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影響。肉體上的痛苦早已忘記了，因為我很高興我的身體強壯經得起打。使我驚奇的一件事是：在這次事件中，甚至在我挨打的時候，我心底很明白，我自覺地研究我的思想感情。經過這次演習，我第二天早晨去參加更嚴重的考驗時就表現得很不錯。因為第二天上午是

西門調查團到達的日期，我們準備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

我父親當時在阿拉哈巴，我擔心他在第二天的報上看到我挨打的消息時，他跟全家人會着急。因此，我在晚間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一切都好，他用不着擔心。可是他確實放不下心，在午夜裡決定來勒克瑙。那時最後一班火車已經開走了，他只好坐汽車。在路上又遇到倒霉的事，當他走完一百四十六英里的路到勒克瑙城時已經是早上五點鐘了，結果弄得精疲力盡。

這時正是我們準備出發游行，到車站去的時候。前一天晚上發生的衝突哄動了勒克瑙城，太陽還沒有出來，很多人就向車站走去。從城內各處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小游行隊伍。由幾千人組成的基本隊伍從國大黨辦公處出發，四個人一排。我們參加基本的游行隊伍。當我們快到車站的時候，警察不准我們前進。車站前面有一塊空地，約半英里見方（這塊空地現在已經被新車站占用了）。我們就站在这塊空地的一邊排列起來，我們的游行隊伍停在那兒，也沒有企圖向前推進。那里到處都有步行警察，騎馬警察和軍隊。同情的旁觀者愈來愈多，這種人中有些人三三兩兩地在空地上推進。突然我們看見遠處有一群人移動，有長長的兩三行騎兵或騎警通過空地 toward 我們疾馳而來，將空地上零星無組織的人打倒或沖倒。騎馬的人疾馳向前沖鋒是一幅美景，可是這裡所演出的却是悲劇，許多老老實實的看熱鬧的人被馬沖倒。在騎警沖過去後，這些人躺在地上，有的動彈不得，有的受傷呻吟，整塊空地呈現出戰場的景象。可是我們沒有很多時間看這種場面或者想一想，因為騎警就快到我們面前，他們的前綫跟我們游行隊伍發生了衝突。我們堅守原地不動，騎警看見我們不屈服，不得不勒緊馬，以致馬的前蹄懸空，在我們的頭上舞動。接着步行警察和騎警就用棍子

打我們。这一次来势很凶，头一天晚上的那种神志清醒的状态不存在了。当时我只知道我必須坚守我的崗位，不应当屈服或臨陣脫逃。我被打得头昏眼花，有些怒不可遏，想还手打一下。我想我很容易把我面前的警官拉下馬來，我自己跨上去。但是長期訓練和紀律制止了我，我的手动也不动，只有在被打时用手保护我自己的臉。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方面任何进攻的表示，就会引起慘剧，使我們許多人遭受槍杀。

似乎經過一段長時間后，事实上也許只有几分鐘，我們的队伍开始慢慢地向后退，但队伍沒有散，这使我孤立，目标更暴露。我又挨了打，突然有人从后面把我抱起，离开了那个地方。原来是我的一些年輕同事以为警察这一下要把我打死，他們就采取这种方法保护我。

我們的游行队伍在原来的防綫后面約一百英尺的地方排列起来。警察也向后退，守住一条綫，和我們相隔約五十英尺。我們就这样停留在那兒，就在这个时候，那引起这次糾紛的西門調查团悄悄地离开了远远的、离我們有半英里多地的車站。可是他們仍然逃避不了黑旗和示威的人。过后不久，我們整队回到国大党办公处，才解散队伍。我回去看父亲，他在焦急地等我回去。

兴奋的时间过去了，我这时感到全身痛，疲劳得很。身体每一部分几乎都感到痛，到处是伤痕。幸好我的要害部分沒有受伤。我的許多同伴就不像我这样运气好，他們受了重伤。站在我旁边的哥文·巴拉·潘特，身高六英尺多，目标比較大，因而受伤很重，長期患病，腰也不能伸直，不能参加積極活动。經過这次事件后，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能力有了更高的看法。可是这次事件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并不是挨打，而是一些打我們的警察的面貌，

特別是警官們的面貌。打人大多是歐洲籍的警官們干的，印度警察比較溫和。那些打我們的警官們的臉上，充滿仇恨、杀气，甚至發瘋的氣味，沒有一點兒同情心，沒有一點兒人性！也許我們這方面的面孔也同樣難看，我們大部分是消極的，這當然不會使我們愛我們的對手，當然也不會增加我們面容的美觀。可是我們互相間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沒有個人的爭執，沒有惡意。我們暫時代表奇特和強大的力量，這些力量控制了我們，掌握了我們的心，喚起了我們的要求和感情，使我們變成它的盲目工具。我們盲目地鬥爭，不知道為什麼而鬥爭，不知道我們走向何處。行動使我們興奮，可是在興奮過去後，問題馬上提出來了：這一切鬥爭是為了什麼目的？為了什麼目的？



第二十六章 总 工 会

抵制西門調查團，与召开各党联席會議这两件事是一九二八年中在政治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我自己的兴趣和活动却大部分在其他方面。我担任国大党的总書記，忙于照顧和加强国大党的組織。我特別关心引导人們注意社会方面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在馬德拉斯會議上关于独立問題所取得的胜利必須加以巩固，尤其是因为各党联席會議表現了把我們往后拉的傾向。为了这个目的，我走了很多地方，在許多重要的集会上發表演說。我記得在一九二八年中我主持四次省代表會議（旁遮普省、馬拉巴省、德里省、联合省）和在孟加拉和孟买举行的青年团會議和学生會議。我随时訪問联合省的农村，間或向产业工人發表演說。这些講演的主要内容差不多是相同的，形式則根据各地的情况而变化，每次講話的重点則看听講的人的情形而决定。我在每个地方都講爭取政治独立和社会自由，并指出政治独立是实现社会自由的步驟。我想特別在国大党工作人員中和知識分子中傳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这些人是民族运动的骨干，而他們对于民族主义的看法非常窄狹。他們的言論強調旧时代的光荣，外国統治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所造成的損害，人民的痛苦，外国對我們不合理的压迫，为了民族的荣誉我們应当自由，为了祖国应当牺牲。这些熟悉的主题在每个印度人的心中都引起了同感，也引起了我自己所抱的民族主义

思想的共鳴，而且使我感动（虽然我并不盲目崇拜印度或其他地方的远古时代）。这些論調虽然仍然具有真理，但是因为講得太多了，变成了陈腔濫調，繼續不断地重复这些調子就不能够再去考虑我們斗争中的其他問題和重要方面。这些調子只培养了人們的感情，并不鼓励人們开动腦筋想一想。

在印度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我并不是先鋒队。事实上我相当落后，我只是痛苦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而同时許多其他的人則勇往直前，开辟了一条道路。就思想意識而言，工人的工会运动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多数青年团的組織也是这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印度就已經相当流行，不过人們对于社会主义的認識很模糊、混乱。甚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印度已經有个别的社会主义者，他們多数的想法是烏托邦派的想法，可是馬克思主义理論給他們的影响逐漸加深，有的人自認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义者。苏联国内的演变，特别是五年計劃，加强了印度的这种傾向，正如加强了欧洲和美洲的这种傾向一样。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作者，我的重要性在于我恰好是一个在国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国大党要人。許多其他国大党著名人物也开始有同样的想法，这在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中特別明显。在这个委员会中，我們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曾經設法制訂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綱領。联合省是一个地主和地稅征收者占势力的省，我們首先要解决的問題是土地問題。我們宣布現行的土地制度必須廢除，国家和种田人之間不应当有中間人。我們不得不慎重地向前进，因为当时印度的气氛还不习惯于这种思想。

一九二九年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更前进了一步，向全印国大党委员会提出建議，这种建議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建議。全印国大

黨委員會于一九二九年夏天在孟買開會，通過了聯合省決議案中的序言，因而接受了貫穿這整個決議案的社會主義原則。聯合省決議案中所規定的詳細綱領則留待以后再討論。許多人似乎忘記了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和聯合省國大黨委員會的這些決議案，以為社會主義這個題目在過去一年中間突然在國大黨內出現。全印國大黨委員會並沒有很好考慮過就通過了這個決議案，大多數委員也許並沒有認識清楚他們在干什么，這種說法倒是事實。

印度獨立大同盟的聯合省分會（全部是國大黨在聯合省的工作人員）很明確地表現了社會主義的傾向，比內部複雜的國大黨委員會更前進了一步。實際上，獨立大同盟的目標之一就是社會自由。我們原來希望在全印度建立一個強大的獨立大同盟組織，利用這個組織宣傳獨立和社會主義。不幸這個獨立大同盟除了在聯合省外沒有起多少作用，這使我很失望。這其中的原因不是國內沒有人表示擁護，而是因為獨立大同盟的大多數工作人員也是國大黨的重要工作人員。既然國大黨至少在理論上通過了關於爭取獨立的決議，他們就認為一切工作可以通過國大黨的組織去作。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獨立大同盟原來的發起人中有些人並不認真地把獨立大同盟看作應當大加發展的組織。他們把獨立大同盟看作對國大黨執行機構施行壓力或影響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選舉的手段。因此獨立大同盟就奄奄一息。國大黨更加活躍，吸收了一切活動分子加入了國大黨，獨立大同盟就更加削弱。一九三〇年和平抵抗運動展開後，獨立大同盟併入了國大黨，從此消滅了。

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九年，常常有人談起我將被捕的事。報紙上提起這件事，熟悉內幕情形的朋友常常私下向我提出警告，要我小心些，我不知道報紙上的談論和朋友們的警告到底

有些什么事实根据，不过这些警告使我心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我并不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不管我的前途如何，我无论如何不可能过一种安定的生活。我早些习惯于动荡不定、突然变化、坐牢等生活，就更好些。总的说起来，我精神上有了准备（我的家人精神上也有了准备，只不过比我自己差些），因此当真正被捕时我处之泰然，不至于像精神上沒有准备那样弄得手忙脚乱。因此关于我将被捕的謠傳并不是沒有好处的，这些謠傳給我的日常生活一种刺激，使我感到自由生活是宝贵的，多过一天这样的生活就等于多取得了一天的胜利。事实上，我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很活动，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我被捕为止。从这个时候起，我每次短期恢复自由后，总有点不安的感觉，住在自己家里，似乎是一个短期訪問的陌生者，行动很不安定，不知道明天我会發生什么事，經常担心要回到監獄去。

一九二八年快要結束了，加尔各答會議的日期一天比一天接近。我父亲要主持这次會議。他滿心都在想各党联席會議和他向这次會議所作的报告，想在这次加尔各答會議上通过这个报告。他知道我不同意他的想法，因为我不准备在独立問題上妥协，这使他很惱火。关于这件事，父亲跟我公开的爭辯并不多，可是我們之間彼此总有一种精神冲突的感觉，有一种各行其是的感觉。过去我們也常常有过意見分歧，这些重大的意見分歧使我們在政治上处在不同的陣营里。不过在这次事情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我們間的关系从来沒有像这次这样緊張过。双方都感到不愉快。在加尔各答會議上，父亲宣布如果他不能实现他的主張（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各党联席會議的报告），他就不肯当會議的主席。这种作法是很合理合法的，可是却使那些反对他但并不想把問題提

得那样尖銳的人們感到狼狽。在我看来，在国大党内及其他地方，有这样一种倾向：人們尽管批評，反对，但自己不肯負起責任。我們常常希望对方經過批評后就会改变他的方針，對我們有利，而不需要我們自己負責來干。当人家不要我們負起責任，行政機關大權在握又不負責（如像今天的印度政府）的時候，我們就只能批評（自然除了行動以外），而這種批評只能是消極性的批評。就是這樣，假使我們要使這種消極批評產生效果，我們在精神上就得準備一旦機會來到的時候，負擔起全部責任和控制權——控制政府各個部門，民政和軍務，內政和外交。只要求取得一部分控制權（例如自由主義派在軍隊問題上的主張），就等於承認自己不能辦事，使自己的批評失去了力量。

這種只批評，反对，但不肯負起批評和反对的後果的態度，就是甘地的批評者的態度。国大党内有些人不喜歡甘地的活動，並且嚴厲地批評這些活動，但是這些人並不準備把甘地驅逐出国大黨。這種態度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對於雙方都不公平。

在加爾各答會議上也發生過這樣的困難。雙方經過談判，宣布了一個妥協方案，可是後來失敗了。這一切都是撲朔迷離，不很有益的。加爾各答會議最近所通過的主要決議案，接受了各黨聯席會議的報告，但是暗示如果英國政府在一年內不同意憲法，国大黨就要恢復爭取獨立的行動。這等於提出緩期一年，是一個溫和的最後通牒。這個決議案毫無疑問從獨立的理想上后退了一步，因為各黨聯席會議的報告甚至沒有要求完整的自治領地位。可是從另一方面看，這個決議案也許是一個聰明辦法，因為它防止了国大黨內部的分裂，當時沒有人準備實行分裂。此外，這個決議案也保持了国大黨的團結，使它得以準備一九三〇年開始的鬥爭。

英国政府不会在一年內接受各党联席會議所提出的宪法，这是很显然的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这种斗争沒有甘地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結果的。

我在公开會議上反对这个決議案，不过我的反对只是半心半意的。結果我又当选为总書記！不管發生了什么事，我总設法留任总書記的职务。在国大党方面，我似乎是个儿朝元老，不論什么人当国大党的主席，我仍然是管理国大党这个組織的書記。

在加尔各答會議開幕前几天，全印总工会在煤矿区的中心吉里雅举行代表大会，我出席了开头兩天的會議，后来又回到加尔各答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工会代表大会，我基本上是一个外人，虽然我在农民中以及最近在工人中的活动取得了群众对我的一定威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改良主义派跟比較先进的革命分子間的斗争。主要的爭論問題是参加哪一个国际、参加反帝大同盟、泛太平洋联盟、以及派代表出席日內瓦的国际劳工局會議等問題。比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大会中兩派的想法根本不同。一派是旧的工会派，在政治上很稳健，对于政治势力干預工会事务表示怀疑。他們只主張采取工会行动，而且也仅限于小心謹慎的行动，其目的在于逐渐改善工人的状况。这一派以卓西为領袖，他常常代表印度工人出席日內瓦的會議。另外一派則比較激进，主張采取政治行动，公开宣布它的革命观点。这一派受了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的影响，但并没有被他們控制。孟买的紡織工人被这一派爭取过去了，并且在他們的领导下，举行过一次大規模的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在孟买新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紡織工会，这就是“紅旗工会”，它左右孟买的劳工情形。另外一个在进步派影响下的强大工会就是大印度半島铁路工会。

总工会从开始成立起，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卓西和他的亲信的手里，工会运动是由卓西建立起来的。激进派虽然在下层群众中比较有力，但很少有机会影响上层领导机关的政策。这是一件不能令人满意的事，也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激进派的人物很不满意，并且想争夺总工会的领导权。同时有一种不为已甚的倾向，因为害怕因此而引起内部的分裂。当时印度的工会运动还很幼稚，力量很弱，主要由非工人出身的领袖在主持。在这种情形下面，外面的人很想利用工人，这在印度的总工会和工会中很明显。然而，卓西在多年的工作中证明自己是一个健全的、老实的工会运动者。就是那些说他在政治上落后和稳健的人也承认他对于印度劳工运动的贡献。其他的人，不管是稳健派或激进派，就很少有人像他这样。

在吉里雅会议上，我同情激进派。可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对于总工会内部的斗争摸不着边际，所以决定采取超然态度。在我离开吉里雅后，总工会举行每年一次的选举。我在加尔各答知道我当选为下年主席的消息。稳健派提我为候选人，大概他们认为我最有把握击败激进派所提出的工人出身（铁路工人）的候选人。如果选举那一天我在吉里雅，我一定会退出，让那个工人出身的候选人当选。在我看来，突然由一个非工人出身的新人物去当主席实在不像话。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印度工会运动的幼稚和弱点。

一九二八年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和劳资纠纷，一九二九年仍然是这样。在这些罢工中，生活困难但斗志很旺的孟买纺织工人起了领导作用。孟加拉制麻厂爆发了总罢工。詹姆奢德城的铁工厂也举行罢工，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铁路工人也罢工了。詹姆奢德城马口铁工厂的斗争坚持了好几个月。尽管人们同情罢工工人，可是跟缅甸石油公司有联系的资方终于把罢工镇压下去了。

这两年中劳资纠纷很多，工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在战后的年代里，印度工业大赚其钱。在五、六年中，制麻和纺织工厂的红利每年平均在百分之一百以上，常常是百分之一百五十。这些巨大利润全部进入了老板们和股东们的口袋里，工人们仍然像以前一样痛苦。工资有时稍为增加一点，但通常被物价高涨抵消了。在工厂大发其财的时候，大多数工人住在破烂不堪的小屋里，他们的妻女几乎都没有衣服穿。孟买的情形够坏了，而更痛苦的是距离加尔各答宫殿只有一小时汽车旅程的制麻工人。在那里半裸着身体的、蓬头垢面的妇女，终日辛劳，所得无几，她们所赚的钱源源不绝流到英国格拉斯哥城和敦提城去，流到印度某些人的口袋里。

在繁荣的年代里，工业一帆风顺，虽然工人仍然一样工作，但受惠不大。一旦繁荣过去后，不容易赚得很大的利润时，重担就自然落在工人们的身上。过去赚的利润被人忘记了，事实上被花光了。现在利润不够，工业如何能维持呢？这就发生了工业中的动荡，爆发了劳资纠纷以及孟买的大罢工，使每个人都注意，使资本家和政府害怕。劳工运动在思想意识方面和组织方面都表现出阶级意识，斗争意志加强了，而且也危险。政治形势也发展得很快。劳工运动与政治形势虽然各走各的，没有联系，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平行的，政府对于未来形势的看法是不放心的。

一九二九年三月，政府突然打击有组织的劳工，逮捕激进派中某些最有名望的工作人员。孟买的红旗工会领袖，孟加拉、联合省和旁遮普等地的工人领袖被捕了。其中有些人是共产党，有些是接近共产党的人，有些则只是普通的工会运动者，这就开始了有名的米路特审讯案，前后经过了四年半。

为了替米路特案中的被告辩护，成立了一个辩护委员会，由我

父亲任主席，安沙利医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內)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任务很困难。筹款很不容易，有钱的人似乎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在劳工中做工作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当律师的人只有拿到人家的血汗钱后才肯替人辩护。我们的辩护委员会中有些名律师(例如我的父亲及其他一些人)，我们随时可以跟他们商量、请教，不花一文钱。可是他们不能够一次就在米路特住几个月。我们接洽的其他律师似乎把办理这件案子看作大赚其钱的机会。

除了参加米路特案的辩护工作外，我也参加其他一些案件的辩护工作——例如蒙·勒·劳案及其他案件。每一次我对于同行律师们的贪财，深为惊讶。第一次使我大为震动的事是：在一九一九年旁遮普戒严法审讯时，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律师坚持要收全部费用(这是很大的一笔费)，而他的当事人是戒严法下的受害者，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同行——律师，结果许多人没有办法，只得去借钱或卖东西来付律师费。我后来的经验更为痛苦。我们设法筹款，往往最贫苦的工人捐出几个铜子，而另一方面却把巨额支票付给律师。这是使人生气的事。整个过程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替一个政治案件或劳工案件进行辩护，结果总归是一样。像米路特这种审讯，需要从各方面进行辩护。

米路特案辩护委员会跟被告人打交道也遇到很多困难。他们中间有各色各样的人，需要各种形式的辩护，往往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就不一致。我们工作几个月后就把正式的辩护委员会结束了，可是我们仍然继续以个人的资格帮忙。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一天更比一天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一九三〇年，我们大家自己也进了监牢。



第二十七章 空中雷声

一九二九年的国大党年会准备在拉合尔城举行。经过了十年，国大党又回到旁遮普省来开会，人们回想起十年前——一九一九年的几个事件：雅利安瓦拉事件，戒严法及因此而引起的耻辱，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大会，接着就开始不合作运动。在这十年中间发生很多事，印度的面貌改变了，但是并不是没有类似的地方。政治上的紧张形势在增长，斗争的气氛很快地在发展，未来冲突的阴影笼罩着全国。

联邦院和各省参议会老早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只有其中少数人是例外。它们无聊地继续活动，替专制的政府粉饰太平，替有些人谈论印度国会提供口实，使它们的议员谋得补助。联邦院使人注意它的最后一举是它在一九二八年通过一个拒绝跟西門調查团合作的决议案，这一次算是成功了。

后来联邦院議長跟政府之間發生冲突。議長維沙尔海·巴特尔(自主党)由于他跟政府鬧独立，变成了政府的眼中釘，政府方面企圖削弱他的权力。这种事情引起了注意。但是总的說来，一般人所集中注意的是外边的事情。我父亲对于参议会的工作完全失望了，他常常表示这样的意見：在那一个阶段中，不能再希望从立法机关中获得什么东西。他自己也想在有机会的时候脱离这种机关。父亲虽然一切依照宪法行事，并且慣于講究法定程序和方法，

可是环境的压迫却使他得出这种痛苦的結論：在印度，所謂宪法規定的方法是不中用的。他自己加以解釋，說印度並沒有宪法，也談不上法治，因为一个人或一个掌握大权的集团可以任意頒布命令，正如一个变戏法的人从他的帽子里拿出一只兔子一样。就他的性情和習慣而言，父亲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差得很远。如果有資產階級民主的話，他一定是拥护宪法的台柱子。但是这里並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国会的作法又是假的，因此在印度談宪法就一天更比一天使他討厭。

甘地仍然有意避免政治，他只在加尔各答會議上有点活动。可是他跟局势的發展完全保持接触，国大党的領袖有事也常常跟他商量。甘地多年来的主要活动在于宣傳印度土布。为了这种目的，他在印度各地旅行。他輪流到各省去，訪問每一个重要的县，每个重要城市，也訪問僻远的农村。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轟动許多群众，需要事前作很好的安排才能實現他的計劃。甘地就是这样屡次在印度各地旅行，深入了解这样大的国家，从北方远到南方，从东部的山区，到西部的边海区。我想不起有任何其他人比甘地在印度走过更多的地方。

在以前，曾經有过偉大的漫游家，經常在走动，有那种有游历热的游客，但是他們的交通工具很慢，他們終身漫游赶不上一一年坐火車和汽車的旅行。甘地旅行时坐火車和汽車，可是他不限于火車汽車，他也走路。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深入了解印度和印度人，同时千百万人看見过他，亲自跟他接触过。

甘地于一九二九年来到联合省宣傳土布，他在这里过了几个星期，那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有时陪他几天。尽管我过去有过一些經驗，但每次看見甘地那样吸引群众时我不免感到惊

奇。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如哥拉克浦，来看甘地的群众真是人山人海，令人想起蝗虫群。当我们坐汽车经过农村时，每几英里就可以号召一万人到两万五千人，每天的主要集会在十万人以上。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大城市外，还没有广播设备，因此在这样人多的会上显然有许多人听不见甘地的讲话。也许这些群众本来就不希望听到什么。他们只要看见甘地就满足了。甘地向群众讲话时，通常很简短，避免过度紧张；否则就很难像这样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一天接着一天支持下去。

甘地在联合省旅行整个时期内，我没有自始至终地陪他，因为我并不能特别帮助他，多一个人陪着他也沒有多大意义。我不反对群众，但是我陪着甘地被人推来推去，自己的脚被人踏破（这是陪同甘地的人的通常的命运），实在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许多其他的事等着要做。不想把自己的活动限于宣传土布，鉴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宣传土布是一种比较次要的活动。甘地只忙于非政治性的问题，我对于他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颇不以为然，我始终摸不清他的思想根源。在那些日子里，他替土布宣传工作筹集经费，他一再说起他要替“穷人的上帝”或“穷人之神”筹一点钱，意思是说他想用这种钱帮助穷人找到职业，在农村工业中找到工作。在这句话的后面，似乎带有歌颂贫穷的意味，上帝特别是穷人的上帝，穷人是上帝的骄子。我想这是一般的宗教态度。我不能了解这种态度，在我看来，穷困似乎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加以反对和消灭，而不应加以鼓励。这种看法自然要攻击那种容忍和制造穷困的制度，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当然必须设法替穷困辩护。他们只想到缺乏，但是看不见世界上具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也许他们认为有钱的人和穷人会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每次我有机会跟甘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總強調有錢的人把他們的錢財看作替人民保管的財產；這是很陳舊的觀點，在印度和中古歐洲常常遇到這種觀點。我承認我完全不了解為什麼一個人會相信這樣的事，會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聯邦院變成無聲無嗅的東西，很少有人關心它的活動。但是突然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有一天巴格特·辛格和卜·克·杜德二人從旁聽席上向議場中投擲了兩顆炸彈。沒有人受重傷，也許正如被告後來所說，投炸彈的目的在於轟動聽聞，並不在傷人。

炸彈案的確在聯邦院內外都引起了轟動。這次投擲炸彈沒有造成重大死傷，但是恐怖分子的其他活動並不都像這樣。一個年輕的英國警官在拉合爾被人用槍打死，據說他曾經打過拉吉巴特·拉伊。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恐怖分子的活動似乎又重新爆發了。曾經發生過幾次陰謀案，未經審訊定罪就被關在監牢中或用其他方法被扣押的人數很快增加了。

在拉合爾陰謀案中，警察在法院審訊時為非作歹，因此引起了公眾的注意。為了對他們在法院中和在監獄中所受的待遇表示抗議，大多數犯人舉行絕食鬥爭。我忘記了這次絕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是後來事情擴大成為對待犯人——特別是政治犯——的問題。這次絕食運動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拖下去，在全國引起震動。因為被告們身體太弱，不能出庭受審，所以法院不得不一再延期審問。印度政府因而制訂法律，允許法院在被告或他的辯護人缺席時繼續進行審訊。印度政府也考慮了監獄中待遇犯人的問題。

絕食運動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我恰好在拉合爾。當局允許我

到監獄里去探視一些犯人，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第一次看見巴格特·辛格，也看見了雅蒂德南斯·达斯及其他少数人。他們都很虛弱，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够跟他們多談話。巴格特·辛格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識分子的臉，非常冷靜、沉着，似乎沒有一點兒憤怒的样子。他的表情和談話都很柔和，我想任何人絕食一个月后看起来都会是柔和的。雅蒂·达斯看起来更柔和了，溫柔得像一个年輕的女孩子。我会見他的时候，他很痛苦。后来他在絕食后的第六十一天死了。

巴格特·辛格的主要希望似乎在于能够会见他的叔父薩达·亞吉·辛格，或者至少能够打听到他叔父的消息。他的叔父于一九〇七年跟拉吉巴特·拉伊一起被放逐出国，多年就亡命国外。風聞他在南美洲安了家，但是始終沒有确实的消息。我甚至于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經死了。

雅蒂·达斯的死惊动了全国，并且把政治犯的待遇問題尖銳地提出来，政府指派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問題。根据这个委员会研究的結果，政府公布了新規定，將犯人分为三类。沒有把政治犯特別列为一类。新規定虽然答应改善待遇，但是事实上沒有什么改变，情况仍然是很令人不滿意的。

夏天和雨季快过去了，秋天就要来到，国大党各省委员会忙于准备选举国大党在拉合尔开代表大会时的主席。选举的过程很長，通常从八月起到十月。一九二九年时，大家几乎一致贊成甘地。希望甘地第二次当主席的要求并不会提高甘地在国大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因为甘地多年来实际上是一个太上主席。不过一般人認為既然斗争快要到来，甘地必然是这次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因此索性要甘地在这个时期任国大党法理上的领导人。此外，也找

不出其他的杰出人物来当主席。

因此，各省委员会推甘地任主席。但是甘地不肯接受。甘地的拒绝虽然很坚决，似乎还留有商量的余地，人们希望他能够重新加以考虑。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在勒克瑙开会，以便作出最后决定，一直到最后一小时，我们大家都仍然认为甘地会同意。可是结果他仍然不肯出任主席，最后由他提出我的名字。甘地这样坚决不干使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不免有点惊奇，并且感到恼火，因为这样一来使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处于一种困难的，容易得罪人的地位。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因为找不出其他的人，于是带着“算了罢”的精神，最后选举我任主席。

我以前很少感到过像这次选举时所感到的那种苦恼和被侮辱的心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认识当选主席的光荣，这是一种很大的光荣，假如我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当选，我将大为高兴。可是这次当选，我走的不是大门，甚至不是旁门，而是暗门，使人家莫名其妙地选举了我。他们硬着头皮，像不得不吃药一样，接受了我。我的自尊心受伤了，我几乎想拒不接受。幸好我压制了自己没有出丑，我带着沉重的心情静悄悄地走开了。

最喜欢这次选举结果的人恐怕要算我的父亲了。他并不完全喜欢我的政治立场，可是他很喜欢我，我有什么好事他总高兴。他有时也批评我，对我说话也有几分严厉，可是任何人如果想要保持我父亲对他的好感，绝不能在我父亲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当选主席，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光荣，也是很大的责任。儿子马上接着父亲当主席，这是希有的事。有人常常说我是国大党中最年轻的主席——我任主席时只四十岁。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郭克雷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艾卜勒·凯拉姆·阿萨德大毛拉

(虽然年纪比我大一点)当主席的时候也许还不到四十岁。可是郭克雷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被人家称为元老政治家之一，艾卜勒·凯拉姆·阿萨德大毛拉有很大的学问，他特别培养一种年高德劭的样子。政治家的风度并不是我的优点，也没有人说我有过多的学问，因此向来还没有人说我年纪大了，虽然我的头髮已经白了，面容也现出老相。

拉合尔大会的会期快到了。这个时候，事情逐步向前发展，似乎有它们自己的推动力，使得必然向前发展。个人不论怎样有本领，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人们有这种感觉：整个机器无情地开动，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齿轮而已。

也许为了阻止命运这样向前发展，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进步骤，印度总督欧文勋爵宣布即将召开圆桌会议，这个公告的措辞很巧妙，可以说它内容丰富，也可以说它言之无物，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后一种看法比较更合乎实际情形。即令公告中说了一些东西，跟我们所要求的还差得很远。总督的公告刚发表，就马虎而匆忙地在德里安排了一个“领袖会议”，邀请各方面的人物参加。甘地出席了。我父亲也参加了。维沙尔海·巴特尔(当时他仍然任联邦院的议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稳健派的领袖如德吉·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等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联合决议案，也可以叫联合宣言，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据说这些条件很关重要，必须履行。如果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就可以跟政府合作。这些条件[⊖]很充实，可能改变形势。

⊖ 这些条件包括(一)会议上的一切讨论应在承认印度享有完全自治领地位的基础上进行；(二)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三)大赦政治犯；(四)从现在开始，印度政府应在现行条件许可的情形下，尽量照着自治领政府的路线办事。

稳健派和激进派的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就国大党而言，这是一个让步。作为一个共同协议而言，这个决议案很成功，但是这里面却有严重的缺点。对于这些条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国大党方面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可或缺的，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合作。对国大党人而言，这些条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后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时特别声明接受这些条件的日期限于到国大党下次开大会时为止。对稳健派而言，这些条件是可以提出的最高限度的要求，但是不应当坚持这些条件以至拒绝合作。在他们看来，这些条件虽然很重要，并不真正是条件。

因此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虽然这些条件一条也没有实现，我们大部分人进了监狱，同时其他几万人也在坐牢，那些跟我们一起在宣言上签名的稳健派和合作派朋友跟监禁我们的人合作。

我们多数人担心会发生这种事，当然料不到真正发生时的程度。当时还抱着这样的希望：这种联合行动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国大党人，也希望同时能够限制一下自由主义派及其他人士不顾一切要跟英国政府合作的倾向。我们有些人十分不喜欢这个妥协性的决议案，我们还有一个更有力的动机，就是保持我们国大党内部的坚强团结。在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前夕，我们不能让国大党内部分裂。大家都知道政府不会接受我们所规定的条件，因此我们的地位会因而加强，我们很容易拉着右派人士跟我们一起走。时间很迫促，仅仅几个星期，十二月快到，拉合尔会议的会期接近了。

可是我们有些人把联合宣言看作苦药。就是在理论上暂时放弃要求独立也是错误的、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求独立

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可以讨价还价，而不是必要的、我們非此不能滿足的东西。因此我很迟疑，想拒絕在宣言上签名（苏巴斯·鮑斯已經坚决拒絕签名了），可是終于被人家說服签了名，这种举动就我而言，在过去并不是沒有过的。不过我事后仍然感到非常痛苦，第二天我想摆脱国大党主席的职务，并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給甘地。我不能說我对于辞职的想法很認真，虽然我十分难过。甘地回信安慰我，我自己經過三天的考虑，終于心平气和了。

在拉合尔大会开幕以前，曾經最后努力寻求使国大党跟政府能够达成協議的基础。安排了跟印度总督欧文勋爵見面。我不知道安排这次会見是誰提出的，不过我想維沙尔海·巴特尔是主动人。在这次会談中，甘地和我父亲出席，陈述国大党的意見。此外出席的人还有真納先生，薩普魯爵士和巴特尔議長。这次会談沒有結果。找不出共同之点，两个主要对方——政府和国大党——間的距离很大。因此国大党沒有其他办法，只好前进。在加尔各答所宣布的寬期一年快要滿了，就要明确地宣布国大党的目标在于爭取独立，并采取步驟，进行斗争以求达到这个目标。

在拉合尔大会开幕前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不得不处理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全印总工会在那格浦尔城开会，作为那一年的主席，我得出席主持这次會議。一个人在几个星期內要先后担任国大党大会和总工会大会的主席，这是不平常的事。我原来希望当国大党跟总工会中間的聯絡人，使双方更接近，使国大党更傾向社会主义，更無产階級化，使有組織的工人参加民族斗争。

这种希望也許是一种妄想，因为民族主义只有放弃它原来的立場才能大大地向社会主义和無产階級方面發展。但是我認為虽然国大党的观点是資产階級的观点，但是国大党在印度全国是唯

一有力的革命力量，因此工人應該幫助國大黨，跟它合作，影響它。但是工人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面目和思想意識。我希望由於事變的發展，以及由於參加直接行動的結果會自然而然地使國大黨的思想意識更激進，注意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國大黨近年來的發展是在農村和農民方面。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國大黨將來就會變成一個龐大的農民組織，至少變成一個農民占優勢的組織。在聯合省許多國大黨區委會中，農民的勢力已經很大，雖然領導權掌握在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手里。

這樣城市和鄉村之間就會永遠發生衝突，影響國大黨跟總工會的關係。這種情況的產生，還遠得很，因為現在的國大黨的主持者是一些中產階級人物，國大黨是由城市的勢力控制着。民族自由的問題一天沒有解決，民族主義就會壓倒一切，是全國最有力的主張。即令如此，我仍然認為促使國大黨跟有組織的工人接近是一件好事。在聯合省，我們甚至邀請全印總工會在聯合省的分会派代表參加我們國大黨省委員會的會議。許多國大黨人也積極參加工人的活動。

可是工人中的先進分子總避開國大黨，他們懷疑國大黨的領袖，認為國大黨領袖們的思想意識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從工人的立場來看，國大黨領袖們的思想意識的確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意識。國大黨——正像它的名稱所表示——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組織。

在一九二九年這一年中間，印度工會忙於一個新問題，英國委派了一個皇家委員會——華脫萊委員會——調查印度的勞工狀況。左派主張抵制這個委員會，右派贊成跟這個委員會合作，這裡還牽涉到人的問題，因為有一些右派領袖人物被邀參加這個委員

会。关于这件事，正如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我同情左派，尤其因为这是国大党的政策。在我们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直接行动斗争的时候，跟官方的委员会合作未免有点背理。

在那格浦尔工会大会上，抵制华脱莱委员会的问题是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其他几个争论的问题上，左派胜利了。我在这个大会上没有什么贡献。在劳工问题方面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生手，我还在摸索道路，因而有点迟疑。总的说来，我发言赞成比较进步的派别，但是我避免跟任何派别一致行动。我的作法与其说是一个主持大会的主席，倒不如说是一个说公道话的人。因此，总工会内部分裂，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稳健派组织，我在这些事情中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右派没有理由退出总工会，可是有些左派领袖逼人上梁山，给了右派分裂出去的口实。在左右两派的争吵中，中间派虽然人数不少，总觉得没有办法。假使中间派有正确的领导，就可能约束左派和右派，防止总工会内部发生分裂，即令不幸发生分裂，亦不致于产生后来所发生的不幸后果。

不幸分裂发生了，印度工会运动遭受了重大打击，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原气。政府已经开始打击劳工运动中的先进派，米路特案就是首先所采取的行动之一。政府继续进行这种压迫运动。资本家也认为有机可乘，向工人进攻。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已在一九二九年冬季开始了，因此而受到打击，再加以遭受各方面的进攻，自己的工会组织又闹得乱七八糟，这时印度工人阶级的处境真是十分困难，眼看着自己的情况一天更比一天恶化而无法可想。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总工会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共产党领导的一派分裂了出去。因此，在理论上，印度存在着三个总工会：稳健派的总

工会，原来的总工会，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实际上这三个組織都很薄弱，起不了大作用，它們互相爭吵使普通工人群众大不以为然。我从一九三〇年起大部分時間消磨在監獄里，跟这些工会糾紛沒有关系。在我出獄的短时期內，我听说曾經几次努力以求团結，可是沒有成功[⊖]。稳健派工会的力量由于铁路工人的加入而大大地增加，跟其他各派的工会相比較，稳健派工会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政府承認它們，并且接受它們关于日内瓦劳工會議所提出的建議。到日内瓦去走一趟的引誘，拉了一些工人領袖和他們的工会到稳健派工会那边去。

[⊖] 后来关于促成工会团結的努力比較有成績，現在各派工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合作了。



第二十八章 独立和独立以后

拉合尔会议在我的记忆里仍然很鲜明，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在一个时候我还是会议的中心人物。我喜欢回忆开会时忙乱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着的感情。我永远不能忘记拉合尔人民给我的盛大欢迎，这种欢迎的规模和热烈程度使我永志不忘。我认识得很清楚：这种洋溢的热情并不是对我个人表示好感，而是对于一种象征，一种思想表示拥护，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把某一个人认作是这种象征——虽然为时很短——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此我感到兴高采烈，洋洋得意。不过我个人的反应并不重要，这里牵涉着重大问题。整个气氛紧张、严重。我们的决定将不仅限于批评、抗议、或表示意见，而且要号召行动，这种行动一定会使全国震动，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

我们和我们的国家的遥远的前途到底怎样？没有人敢预测。最近将来的前景当然够清楚了，对我们和我们的亲人而言，这就是斗争和痛苦的前景。这种考虑使我们冷静一些，使我们认清我们的责任。我们投的每一张票表示我们向轻松、舒适、家庭快乐和朋友们告别，表示我们要去过寂寞的日子，肉体和精神都会感到痛苦。

大会几乎一致通过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案，通过为推动争取自由的斗争所采取的行动。在几千代表中间，投反对票的不

过二十人。真正付表决的是一个以修正案形式提出的枝节问题。这个修正案被否决了，公布了投票数字，并且宣布通过了主要决议案，这时恰好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旧的一年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加尔各答大会所规定的限期满了，采取了新的决定，准备进行斗争。机器已经开动了，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着手，什么时间着手。大会授权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计划和执行斗争，但是大家都知道真正决定要由甘地来作。

附近的边省有许多人出席拉合尔会议。在过去，边省的个别代表常常参加国大党的会议。数年来加法尔·汗都出席参加我们的讨论。在这次拉合尔会议上，从边省来的一大批青年人跟印度全国的政治思潮接触。他们受了影响，认识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是跟印度其他地方团结一致的，并且对这种斗争很热情。他们回去时把这种认识也带了回去。他们老老实实地埋头干，不像印度其他省的人那样喜欢空谈和诡辩。他们组织民众，宣传新思想。在这方面，他们获得了成绩。边省的人民虽然参加印度的斗争最晚，可是从一九三〇年起，他们在斗争中却起了杰出的作用。

拉合尔会议闭幕后不久，父亲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要求联邦院和各省参议会中的国大党人辞去他们的席位。几乎全体国大党人退出了这些机关，只有极少数的人拒不辞职，违反了他们在选举时所作的诺言。

我们对于前途的认识仍然很模糊。虽然国大党的会议上情形很热烈，但是没有人知道全国人民对行动纲领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被釜沉舟，不能走回头路。可是全国人民怎么想法，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为了开始运动，同时也为了看一看全国的民意，决定以一月二十六那一天为独立日，全国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

斗争。

后来，我們对自己所提出的行动綱領有很多怀疑，但是在热情的推动下，我們很想有所作为，等待事变的发展。一月上旬，我在阿拉哈巴，我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别的地方。那时正是一年一度的正月赛会，也许这是貢布庙会年，几十万男男女女源源不绝地来到阿拉哈巴——聖地“普拉雅克”（阿拉哈巴的古名），像朝聖一样，这里面包括各色各样的人——主要是农民、工人、店員、手工業工人、商人、企業家、自由职业者——代表印度各种信印度教的人。当我看见这么多人，看见这些人群在河边来来往往时，我不知道他們对于进行和平抵抗与和平直接行动的号召会有什么反应。他們中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或关心拉合尔大会的決議？几千年来，他們的祖先和他們为了信仰从印度的各个角落到恒河去洗澡，这种信仰力量多么强大！难道他們不能够把这种充沛的力量分一部分去进行政治和經濟行动，以求改善他們自己的命运？难道他們心里所注意的只是宗教仪式和傳統而不想一想其他的問題？当然，我知道这些其他問題是存在着的，多年来都在醞釀。正是由于群众中这些模糊思想的发展，过去十多年中間才爆發了一些騷动，并且改变了印度的面貌。这些思想存在着，并且有力量，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仍然發生了疑問，引起了一些目前不能回答的問題。这些思想傳播的範圍有多大？它們后面有多大的力量？它們有多少能力进行有組織的行动？有多大的持久力？

我們住的地方吸引了成群結队的香客，因为我們住在朝聖地巴拉德华吉附近，那兒在古代有一个簡陋的大学。在节日里，从早到晚人們到我們家里来。我想来的人大部分是为了好奇，想看一看他們听說过的有名人物，特別是我父亲。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

人关心政治，問一些关于国大党的問題，国大党作了什么决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們这些人自己有很多經濟困难，他們想知道怎样解决这种困难。他們很熟悉我們的政治口号，每天在我們的家中总听见人們談論这些口号。我每天接見若干批相繼來訪的人，簡單講几句话。他們每批人数有的二十人，有的五十人，有的一百人。但是因为來的人实在太多，这种接待办法后来也行不通，我只好向來訪的人行礼，不說一句话。就是这种方法后来也办不到，我只好避而不見。可是这一切都屬枉然。呼口号的声音愈来愈大，过道里站满了这些來訪的人，每一个門前和窗前都有人在探望，簡直不能工作，不能談話，不能吃飯，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不仅很煩扰，而且令人苦惱。可是他們仍然在那兒，这些人閃着眼睛望着你，充滿了热情，他們多少年来过着穷困痛苦的生活，可是他們仍然傾吐他們的感激和爱戴，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人类的同情心。他們这种丰富的感情和热誠不能不使人感到慚愧，表示敬畏。

我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那时恰好住在我家里，常常不能跟她談話，因为每隔四、五分鐘我就得出去对聚集在外面的的人群講几句话。每次講完話回来，总听见外面呼口号的声音和叫喊声。这位女朋友看見我的处境觉得好笑，而且她似乎認为我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事实上，人們主要是为了要看我父亲，但是他不在家，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应付一番。）她突然間轉过来問我喜不喜欢这种英雄崇拜？我是否因此感到驕傲？我迟疑了一陣，她誤認爲提出这种个人問題使我为难，向我道歉。她的問題絲毫沒有使我为难，不过我觉得这个問題很难回答。我心不在焉，我开始分析我自己的感情和反应，我發現我的感情和反应是很混杂的。

我几乎意外地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大的威信。知識階級称贊

我。男女青年認為我有几分英雄气概，在他們的眼里我似乎是傳奇式的人物。有人写了些以我为主題的歌，并且流傳着一些非常可笑的关于我的故事。甚至反对我的人也不时說我的好話，說我并不是沒有才能，并不是沒有誠意。

只有聖人或不近人情的怪物才能受了这样的恭維而無动于衷。然而我既不是聖人也不是不近人情的怪物，这一切使我的头腦不免有点發脹，并給我以信心和力量。我变得（我想像是如此，因为一个人很难由外面去观察他自己。）有点兒独断專行。但是我的自高自大作風并没有显著地發展。我对于我自己的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估計，我并不妄自菲薄，可是我也十分了解我的才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很認識我自己的缺点。自我檢查的習慣帮助我保持平衡，使我能用超然的眼光看跟我自己有关的事。公共生活的經驗告訴我，不良分子常常是出名的。名望并不一定是高尚品質或智慧的确切标帜。我是因缺点而出名呢，还是因为有成績而出名？我到底为什么出名呢？

不是因为我的学識上的造詣，我的学識并不卓越，而且学識也不可能树立名望。也不是因为作了所謂的牺牲，在今天的印度有成千成万的人受了更多的苦难，甚至作了最后的牺牲。我的英雄名誉完全是假的，我一点兒也不感到有英雄气概，而且我認為生活中的英雄态度和戏剧性的姿态实在可笑。說到傳奇式的生活，我应当說我是最少傳奇式生活的人。真的，我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勇气，可是产生这种勇气的背景是自尊心——一个人的自尊心、团体的自尊心、民族的自尊心——和不願意被人威逼作任何事情。

我对于自己的問題，找不出滿意的答案。于是我从另外一方

面去追查。我發現关于我父亲和我最經常流傳的故事之一是說我們每星期把襯衫从印度寄到巴黎去洗。我們曾經一再否認这种傳說，但是，傳說仍然繼續流行。我想不出比这种傳聞更荒唐的事情。如果有人摆貴族架子，把襯衫送到巴黎去洗，我想他一定要被人特別指出来是一个大寶貝。

另外还有一个虽經一再否認仍然盛傳的故事，据說我和威尔士亲王是同学，亲王在一九二一年到印度来时曾找过我，那时我在坐牢。事实上，我不仅沒有跟亲王同过学，而且也从来沒有会見過他或跟他說过話。

我并不是說这些或其他类似的傳說造成了我的名誉或声望，这种名誉或声望也許有更坚固的基础，可是在表面上看来，总有很濃厚的势利的气息，上面所講的傳說就足以証明这一点。不管怎样，人們总以为我平素所往来的是上等社会的人物，我所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現在我放弃了这一切，而放弃这一切总是引起印度人的注意的。如果是因此而造成了我的名誉，那我倒并不高兴。我喜欢积极的德行甚于喜欢消极的德行，为放弃而放弃，为牺牲而牺牲，我对之并不感兴趣。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智力和精神訓練）来看，我倒也重視消极的德行，正如一个运动員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必須过朴素有規律的生活。从事艰巨事業的人不管遭受怎样的打击，必須具有忍耐力和坚持力。但是我不喜欢苦行者对生活的看法，我不喜欢否定生活，或逃避生活的快乐和刺激。我沒有有意識地放弃任何我真正看重的东西，但是看重的观念也在改变。

我的朋友向我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答复。这个問題是：我因群众对我的英雄崇拜而自豪嗎？我不高兴这种英雄崇拜，而且想逃避它。但是我也習以为常，真正完全沒有人崇拜我时，

我又觉得若有所失。这真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不过总的說起来，群众满足了我某些内心的要求。一想到我能够影响群众，推动群众采取行动，我就觉得我有威信，可以左右群众，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取得权力的意志。就群众方面而言，群众也巧妙地控制着我，因为群众对我的信任和爱戴使我内心深深地感动，并且因此引起感情上的反应。我虽然是个人主义者，但是个性的障碍有时似乎消失了，我感觉到与其独善其身，到不如跟这些不幸的人一起倒霉。可是障碍很牢不易消除，我用惊奇的眼光，越过这种障碍，窥视这种我不了解的现象。

自高自大的情绪，像人体上的脂肪一样，无声无臭地一层又一层地堆起来，受影响的人本身并不感觉到每天都在发展着。幸好世界在动乱中，各种严重的打击，可以减少或完全粉碎这种自高自大。对于我们，近几年来在印度并不缺少这种严重的打击。实际生活和艰难困苦给了我们严格的锻炼。

在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幸运，我有家人、朋友和同志帮助我保持正确的看法，不至于失去精神平衡。各种社交活动，各自治市、地方机关及其他公共团体的演说以及游行等，对于我的神经和幽默感、现实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在这种场合里，讲的总是冠冕堂皇的话，每个人看起来总是十分庄严像煞有介事的样子，我几乎忍不住想笑，忍不住想伸出我的舌头或两脚朝天倒立起来，这样使这些面孔严肃的人惊讶，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在我为着我的名誉和印度公共生活的尊严，总是控制了我自己，通常言行合礼。但也不常常是这样。在人多的会议上，尤其是在我觉得特别难受的游行中，有时我也现出本色来。有一次群众举行游行向我们表示敬意，我突然离开游行队伍而混入人群中，留下我的妻子和其他一些

人坐在車里，跟着游行队伍走。


这样繼續不断地努力压制自己的感情，在公共場合表現出規規矩矩实在受不了，結果就使人在公共場合板着陰沉的面孔。也許是为了这种原因，在一本印度教徒办的杂志中，有人發表一篇文章說我活像一个信印度教的寡妇。我虽然欽佩旧式信奉印度教的寡妇，說我活像她們仍然使我大吃一惊。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在贊揚我，他認為我具有逆来順受，埋头苦干的美德。我希望我具有(实际上我希望信印度教的寡妇也具有)積極方面的美德，具有幽默和欢笑的能力。甘地曾經有一次对訪問他的人說，假如他沒有幽默的天才，他可能自杀了，或者干了自杀一类的事。我不会像甘地說的那樣严重，但是如果生活中沒有幽默和輕松的感觉，那我簡直受不了。

我的家人和密友常常拿我的声望和人家对我充滿着漂亮詞句的和夸大的恭維話(印度人的恭維話通常都是这样的)作为开玩笑的好題目。人們对于在民族运动中的有名人物总是大捧特捧，并給予一些冠冕堂皇的称号。我的妻子、妹妹和其他一些人总喜欢拿这些恭維話和称号不相干地講来講去。人家称我为“印度的珠宝”，“牺牲的象征”；这种輕松話使我得到安慰，緩和了那些板起面孔的公共集会的緊張空气。甚至我的小女兒也高兴这种玩意。只有我母亲很認真，人家拿她的心爱兒子开玩笑，她总不以为然。父亲覺得好玩；他善于靜悄悄地表示他深切的諒解和同情。

这些叫喊着的群众，呆板得令人生厭的公共活动，繼續不断的爭論，風塵僕僕的政治活动，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接触了我，虽然这种接触有时也刺痛了我。我真正的斗争是在我的內心里，是思想、欲望和忠心的斗争，是潜伏的內心跟外面环境的斗争，是內心

所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战场，各种势力互相竞争。我想逃避这种苦境，我努力追求和谐与平衡。为了这个目的，我急于采取行动。这就使我稍为感到安静；外面的斗争减轻了内心斗争的压力。

我坐在监狱里为什么要写这些呢？不论在监狱里或在监狱外面，所追求的东西仍然是一样。我写下我过去的感情和经验，希望借此获得安静和心理上的满足。



第二十九章 和平抵抗运动开始

独立日——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到了。这个日子像閃电一样显示出全国人民的热忱。全国各地举行盛大集会，和平地、庄严地宣誓（誓詞見附录）为爭取独立而斗争，在这些会上沒有演說，沒有訓詞。这次紀念会給甘地以必要的推动力量。甘地善于观察群众的情绪，他看到这种情形后，认为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經成熟。接着就很快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像一个向高潮發展的戏剧。

和平抵抗运动快要开始了，空气很紧张，我們回想起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运动，以及那次运动怎样在曹里·曹拉事件后突然停止了。跟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运动比較，群众現在比以前更守紀律，对于斗争的性质認識得更清楚些。人們相当了解斗争的策略，但从甘地的观点看来尤其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充分認識甘地对于非暴力主义是非常認真的。关于这一点，現在沒有人怀疑了；而在十年以前倒是有些人表示怀疑。尽管这样，我們怎样能够有把握說在某些地方不会自發地或由于陰謀而發生暴行呢？如果真正發生了这样的事，它对于我們的和平抵抗运动会發生什么影响呢？这个运动会像过去那样草草結束嗎？想起这种远景不免令人丧气。

也許甘地同样考虑过这个問題。不过就我跟他談話时所得的

片段印象，他所担心的問題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

甘地認為采取非暴力行动以改善現狀是唯一的正确方法，如果做得好的話，这种方法百無一失。是否应当补充說明，这种方法的实行和成功需要一种特别有利的气氛，如果外面的情况不适合的話，就不能够試用这种方法？从这里就引导出这样的結論：非暴力方法并不是在一切場合都适用的方法，并不是可以普遍应用，百分之百保險的方法。这种結論是甘地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坚决相信非暴力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百無一失的方法。因此他認為就是在外面的情况不利的时候，甚至在發生冲突和暴行的时候，也应当采用非暴力方法。甘地認為采用这种方法时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在方式上有所变化，但是如果根本停止这种方法就等于承認这种方法本身是失敗了。

也許甘地心里是这样考虑問題，不过我拿不穩他的想法。他給了我們这种印象：他的想法稍为有点不同，他認為和平抵抗运动一旦开始后，不应当因为偶然爆發的暴行而中止。但是如果暴行变成了运动的一部分时，那么这种运动就不再是一种和平抵抗运动，它的活动就应当加以限制或改变。这种保証給了我們很大的滿意。当前最大的問題是：怎么样？我們怎么样开始？我們应当采取什么有效的、适合客观情况的、为群众所欢迎的方式进行和平抵抗运动？关于这个問題，甘地透露了他的想法。

鹽突然变成一个神秘的字，一个有力量的字。准备反对鹽稅，破坏鹽法。我們有点迷惑，不怎么能够把民族斗争和鹽这个普通东西相适应。另外一个惊人的發展就是甘地宣布他的“十一点”。當我們高談独立的时候，提出一張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本身当然是好的）的要求表示有什么意义呢？当甘地用独立这

个名詞的时候，他的解釋跟我們的解釋相同还是不同呢？局势正在發展，我們沒有時間來爭辯這個問題。印度的政治形势每天都在演变，我們当时并不十分了然。同时整个世界的形势亦在迅速变化中，世界处在严重的經濟恐慌中。物价下跌，住在城市的人欢迎这种現象，認為好日子即將隨之而來，但是农民和佃戶却因此而起恐慌。

甘地跟印度总督交換了信函，接着就从沙巴馬蒂开始丹地食鹽进军运动。人們每天注視这个队伍的活动，全国的情緒高漲。全印度大党委員會在阿麦达巴德城开会，就几乎已經來到的斗争作出最后的安排。这次斗争中的领导人沒有出席，因为他当时已經跟着破坏鹽法的队伍出發了，他不肯回来。全印度大党委員會計劃如果有人被捕了应当怎样办，决定授权主席在全印度大党委員會不能开会时代表委員會行事，指派人代替被捕的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指定接替主席职务的人，这个人应具有同样的大权。各省，各地方的国大党委員會也給予他們的主席类似的大权。

这样就出現了所謂“独裁者”当权，代表国大党掌握斗争的局面。印度事务大臣，印度总督和各省省長对此大为惊慌，說国大党墮落了，竟至相信独裁制度，自然他們自己則是誠心誠意拥护民主政治的人。印度的穩健報紙間或也向我們宣傳民主政治的好处。我們默不作声（因為我們当时在坐牢）地听着，同时也感到惊异。再沒有比这个更無耻的欺人之談了。印度是处于一种絕对的独裁制度控制下，一切用命令行事，各种公民自由被取消了，而我們的統治者反而大言不慚地高談民主政治。就是在平时，印度什么地方有民主政治的影子？英国政府要維護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要压迫那些反抗它的权力的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它說

这种行为是民主政治的作法却值得纪录下来供后代的人考虑。

国大党必须考虑到将来它也许不能够照平日那样去活动，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国大党的各级委员会也许除了秘密活动外不能开会讨论问题，或采取行动。我们不鼓励秘密活动，因为我们想要十分公开地进行我们的斗争，借此保持我们的声音，影响群众。就是秘密工作也不能给我们多大好处，我们在中央，在各省，在各地方的领导工作人员一定会被捕。那么谁来继续支持下去呢？依照军队作战时的经验，我们就只好作出一些安排，委派新的指挥员去代替那些受伤残废的旧人了。我们不能在战场上坐下来开委员会的会议。过去我们曾经这样做过，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委员会全体被捕。我们没有远离火线可以安全办事的总参谋部，或一个远在别处有更大安全的内阁。由于我们斗争的性质，我们的总参谋部和我们的内阁必须设在最前线目标暴露的地方，在斗争的初期就被捕了。我们授给我们的“独裁者”的是些什么权力呢？把他们推选出来作为全国人民决心坚持斗争的象征，这当然是一种光荣，但是他们实际的权力只限于使自己去坐牢。这些“独裁者”只有在他们所代表的委员会因受不可抗拒的压力而不能开会时才能执行他们的职权，在委员会能开会的时候，“独裁者”就失去了他个人的权力，他不能够解决任何基本问题或原则，他只能影响这个运动的一些不关重要的表层。国大党的“独裁制度”实际上是走进监牢的踏脚石，这种过程一天天继续下去，新人物代替那些受伤残废的人。

我们作了这些最后安排后，就在阿麦达巴德向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同志们告别，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何时或怎样才能再相见，或者能否再相见。我们赶回我们的岗位，根据全印国大党委员会

的新指示，最后完成地方上的安排，正如奈都所說，收拾起我們的牙刷，准备去坐牢。

在我們回来的旅途中，父亲和我去看甘地。他那时跟他的队伍一起在江布沙，我們跟他一起談了几个鐘头后就分手了，我們看見他同他的一群人繼續走上他們的旅程，向鹽海前进。这就是我当时看見他的情形：他手中持着手杖，走在他的群众的前头，步伐稳定，面容和平然而很勇敢。这种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在江布沙的时候，我父亲同甘地商量后决定把我們在阿拉哈巴的老屋捐献出来，改名自主大楼，他回阿拉哈巴后就馬上宣布这件事，把老屋交給国大党的人管理，这幢大屋有一部分改为医院。他在那个时候不能够办理法律上的手續。一年半以后，我依照他的意願，成立了一个保管委员会負責保管这个产业。

到了四月間，甘地快到海濱，我們等待命令破坏鹽法，开始和平抵抗运动。我們的志願队已經受了几个月的訓練，卡麦拉和克里西娜（我的妻子和妹妹）也参加了志願队，并因此而改着男裝。志願队当然沒有武器，甚至連一根棍子也沒有。訓練志願队的目的在于使他們更有效地进行工作，使他們能够应付为数众多的人群。四月六日是民族周的第一天，这个民族周每年举行一次，用以紀念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事件——从坚持真理日到雅利安瓦拉事件。在这一天，甘地在丹地海濱开始破坏鹽法。三四天后，各地的国大党组织采取同样行动，开始和平抵抗运动。

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像把彈簧打开了，全国各地，在城市和乡村，人們都在紛紛談論制造食鹽的問題，并且想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制造食鹽的方法。我們在这方面的知識很少，因此我們广事搜集各种方法，散發傳單宣傳这些方法，搜集一些鍋盤，終于制造出

一些不好的鹽，我們興高采烈地把這種製造出來的鹽給人看，並且常常高價售出。說老實話，鹽的質量好壞並不重要，主要的問題是破壞公眾所討厭的鹽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成功了，雖然我們製造出來的鹽質量很差。我們回想起當甘地首先建議採用這種方法時，我們對這種方法能否生效表示懷疑，現在看見民眾這樣熱烈，制鹽運動像野火一樣蔓延全國，我們不禁感到慚愧。我們羨慕甘地影響群眾，使群眾組織起來採取行動的驚人能力。

我在四月十四日被捕，那時我正準備乘火車到中央省萊浦城去開會。當天我在監獄中受審，根據鹽法被判处六個月的徒刑。在事前我就預料到可能被捕，所以早就根據全印國大黨委員會所給予我的新權力，指定甘地在我出缺時擔任國大黨的主席，但是我恐怕甘地不肯答應，所以又指定了我的父親為第二個候補人。果不出我所料，甘地不同意，我父親就代行國大黨主席的職務。他的身體不好，可是他干這個運動很起勁。在起初幾個月，他強有力的領導，嚴格執行紀律，對於運動有很大的好處。運動固然得了好處，可是父親的身體却吃了大虧。

這些日子裡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事情，遊行，棍打，開槍，罷業，抗議有名人物的被捕，特別紀念，例如白夏華紀念日，加瓦利紀念日等等。抵制外國布和一切英國貨的運動在當時是很全面的。當我聽說我年老的母親和我的妹妹們在烈日下站在外國布店前面任糾察時，我大為感動。我的妻子卡麥拉除了參加糾察隊外，還擔任其他一些事。她積極參加阿拉哈巴城和各區的運動，我雖然多年來很了解她，對此我也不免大為驚奇。她的身體不好，可是她仍然整天在太陽下東奔西跑，表現出驚人的組織能力。我在監獄里模模糊糊地知道一點。後來我父親被捕來到監獄中，我才知道父

亲很賞識我妻子的工作，尤其是她的組織能力。父亲不喜欢我母亲或女孩子們在烈日中东奔西跑，可是除了有时加以規劝外，他也并不干涉。

在开始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消息是四月二十三日在白夏华所發生的事件，接着傳播到边省各地。無論在印度什么地方，在遭受机关槍扫射时表现出这样守紀律，这样和平的勇敢行为，一定会震动全国。在边省發生这种事情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个地区的帕坦人是以勇敢出名，而不是以和平的性格出名的。帕坦人这次在印度树立了一个稀有的榜样。在边省也曾經發生过加瓦利兵拒絕向平民开槍的事。他們拒絕开槍，因为有一个兵不願向手無寸鉄的人群射击，当然也由于同情民众。但是光是同情并不能常常劝使一个兵士拒絕長官的命令，抗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其后果是他所深知的。加瓦利兵之所以抗命（其他地方的軍隊亦曾發生过同样事情，不过外面的人不知道）也許由于誤認英国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兵士們只有抱有这种思想才胆敢本着他們的同情心和傾向行事。也許由于騷动及和平抵抗运动，有一个时期有些人認為英国的統治到了末日，这种想法影响了一部分印度軍隊。不久人們看清了这种想法在最近的將來不会成为事实，因而在軍隊中也就再沒有發生抗命的行动了。后来政府当局采取了措施，避免軍隊卷入糾紛中。

在这些日子里發生了許多新奇的事情，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妇女在民族斗争中的作用。大批妇女从家庭中跑出来，積極投身于斗争中，虽然她們不習慣于公众活动。在外国布店和酒店前担任糾察的工作中她們特別活躍。在許多城市，妇女曾單獨举行游行。就一般情况而言，妇女的态度比男子更坚决。在某些省，在某

些地方，妇女是国大党的“独裁者”。

不久，破坏鹽法只是一种活动，和平抵抗运动發展到其他方面。印度总督發布了各种命令，禁止某些活动，这种禁令便利了和平抵抗运动的發展。这种命令和禁令增多了，破坏它們的机会也随之而增加，和平抵抗运动就做这些命令所禁止做的事。主动权毫無疑問掌握在国大党和人民的手中。政府認為某个法令不能生效时，就由总督頒布新的法令。国大党工作委員會的許多委員被捕了，可是新委員代替了工作，因此工作委員會仍然照常工作。政府每頒布一个新的法令，国大党工作委員會就通过一个決議案，指示怎样对付这个法令。全国各地一律执行了这些指示，唯一的例外是关于出版报纸的指示。

当政府頒布法令进一步控制报纸，并要各报繳納保証金时，工作委員會号召民族主义者报纸拒絕繳保証金，停止出版。这对于办报的人而言是一件苦事，因为那时正是公众迫切要求看报上消息的时候。可是大多数报纸——有些稳健报纸是例外——停止出版了，因此引起了各色各样的謠言。可是这些停止出版的报纸不能長期坚持，外面的誘惑力太多，眼看着那些稳健派报纸搶了它們的生意，实在苦惱。因此大多数报纸又逐漸恢复出版。

甘地在五月五日被捕。在甘地被捕后，政府大举在西海岸搜查制造鹽的地方和貯存鹽的地方，在这些搜查中警察的殘暴說起来令人痛心。孟买的情形最令人注目，因为在那兒發生了大規模的罢業、游行和警察棍打的暴行。几个救治受伤者的急診医院也建立起来了。許多引人注意的事情發生在孟买，孟买是一个大城市，發生的事情很容易被人知道。在小城市和农村中所發生的同样重要的事情就很少有人知道。

我父亲在六月下半月帶着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到孟买去。他們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他們停留在孟买时期內，發生过几次最殘暴的棍打事件。这在孟买变得更流行。大約两个星期后，当瑪拉維亞和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委員率領一大群人行进时，警察出来阻难，結果跟警察对峙，坚持了一整个晚上。

父亲从孟买回来后，在六月三十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馬茂德。他們被捕的理由是：父亲是工作委员会的代理主席，馬茂德是工作委员会的書記，而工作委员会已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組織。他們二人都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我父亲的被捕，大概因为他曾經發表一个声明，說明兵士和警察在奉到命令向平民开枪时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声明純粹是法律問題，其中引証了英国政府在印度所頒布的关于这个問題的法律。但是政府当局仍然認為这个声明是一个挑衅的、危險的文件。

孟买之行弄得我父亲焦头爛額，从清早到深夜他忙得团团轉，他負責作出每一个重要的决定。他的身体本来就有毛病，这次从孟买回来真是筋疲力尽，他遵照医生的迫切劝告，决定馬上完全休息。他准备到莫苏里去，并且收拾了行裝。但是在他动身前一天，他来到內尼中央監獄，出現在我們面前。



第三十章 在內尼獄中

大約七年以後，我又回到了獄中。我對以往監獄生活的回憶，已經有些模糊了。我在本省的大監獄之一——內尼中央監獄里，這次是被單獨監禁，因此，我將體驗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監獄生活。我的囚營和那個容納大約兩千二、三百個囚犯的大囚營是隔開的。這是一個圓形的小囚營，直徑約有一百呎長，周圍的圓牆約有十五呎高。在這囚營的中央，是一座灰褐色的丑陋建築物，里面有四間囚房。我分配到相通的兩間，一間當作浴室和廁所，其餘兩間有好些時候沒有人住了。

我在外面度過了那種令人興奮而又很活躍的生活以後，現在感到相當寂寞和憂郁。我疲倦極了，在頭兩三天，睡了很久。炎熱的氣候已經開始了。我得到批准，晚上可以在我囚房外面，在房屋和圍牆之間的狹窄地帶露宿。我的床被用鐵鏈牢牢鎖住，惟恐我將它搬起帶走，更可能的是防我把它當作一種云梯，攀登囚營的圍牆。夜晚充滿了奇異的喧擾。當看守的囚犯，守衛着大圍牆，常以高低不同的聲調，互相呼喚，有時將他們的喊聲拖長，最後，像是一陣陣遠風的呼嘯。囚營中守夜的獄卒，繼續不斷地高聲查點他們看管的囚犯，並大聲報告一切平安無事。還有巡邏的獄吏，一晚上好幾次來巡查我們的囚營，高聲向值班的哨卒問話。由於我的囚營和其餘囚營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大部分聲音都隱隱約約地傳

来，最初也辨别不清究竟是些什么声音。我有时感到自己好像处在森林的边缘，听见农民正在大嚷大叫地阻止野兽践踏他们的田地；有时又似乎觉得森林本身和夜间出来活动的野兽，正在继续它们午夜的大合唱。

我弄不清究竟是由于我的幻觉还是事实，我感到一座圆形的围墙比一座长方形的更容易使人想起身受监禁。圆墙没有棱角，因而增加了受压迫的感觉。白天，这座墙甚至侵占了天空，使人只能瞥见它狭窄的一部分。我以忧郁的眼光，凝望着：

“那蔚蓝的一线，
囚犯们把它叫做苍天；
以及一片片的浮云，
鼓着银帆掠过晴空。”

夜晚，这座墙更加紧紧地包围着我，使我感到自己似乎住在井底里。不然，就是因为我所看到的那部分星光灿烂的天空不复是真的，而像是人造星仪的一部分。

我的囚房和囚营在全狱中通称为“狗窝”。这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旧名称。这座和其余囚房隔开的小囚房，原先是为了监禁具有特殊危险性、必须加以隔离的罪犯而建造的。后来，它被用来监禁政治犯等，这样可以将他们和监狱其余部分隔开。在我的囚营前面不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建筑物。当我第一次从囚房里瞥见它的时候，使我大吃一惊。它像是一个庞大的鸟笼，人在里面转来转去。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部人力抽水机，每次使用的人力有十六人之多。像人们逐渐习惯于一切事物那样，我对它也逐渐感到习惯了。但是，我总感到就利用人的劳动力来说，这是最愚蠢和最野蛮的方法之一。每当我在它旁边经过的时候，我总联想到动物园。

一連几天，不准我走出囚营去作健身操或其他活动。后来，允許我在清早，当天空几乎还是漆黑的时候出去半小时，在大圍牆下散步或者跑步。給我規定那么早的时间，目的是使我不接触到其他囚犯，或者不讓他們看見我。我喜欢到外面去活动，因为这样可以大大振奋我的精神。为了在我所掌握的短促時間內尽量加紧露天活动，我練習跑步，逐漸增加到每天跑步二哩以上。

我習慣在早晨很早就起床，大約在四點鐘，或者甚至三點半，那時天还很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夜晚睡得早，因为灯光不宜于多看書。我喜欢觀望星辰，有几个著名星座的位置会告訴我約略的时间。从我睡的地方，正好看見在圍牆上面閃爍的北極星。因为它經常在那个地方，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在运行不息的天空的圍繞中，它似乎象征着乐观的坚貞不屈的精神。

我有一个月沒有伴侶，但也并不孤独，因为在我的囚营里还有獄卒，当看守的囚犯，以及担任燒飯和打扫的囚犯。偶尔也有其他囚犯因事到这里来。他們大都是長期服刑的当看守的囚犯。在獄中，可以时常看到“終身犯”（被判無期徒刑者）。通常無期徒刑到二十年前后即算終止，但在当时的監獄中，有許多囚犯服刑已經超过了二十年。我在內尼獄中看到一种非常古怪的現象。囚犯在他們衣服的跨肩上挂着一塊小木牌，注明他們所犯的罪行和釋放的日期。在一个囚犯的木牌上，我看到他的釋放日期竟是一九九六年！在一九三〇年，他已經服刑了好几年。当时，他已經是个中年人了。我想也許他被判处了好几次徒刑，逐次累加起来，总数达到七十五年。

这些終身犯中，有許多人長年累月地看不見一个孩子、女人，或甚至于动物。他們和外界完全断絕了联系，和人間不再有任何接

觸。他們悻悻不平地沉浸在恐懼、報復和仇恨的思想中；忘卻了人世的幸福、溫情和歡樂，只在罪惡的籠罩下生活下去，到最後，憤恨也逐漸地沖淡了，生活變成毫無靈魂的東西，機械似的老一套。他們每人都一樣像自動機器似的過着日子，除了恐懼以外，沒有什麼感覺！獄中也時常替囚犯稱體重和量高度。但是人們怎樣去衡量在這種可怕的受壓迫的氣氛中，遭到摧殘，憔悴下去，以至枯萎的心靈和精神呢？人們反對死刑，大逞雄辯。他們的議論使我很感興趣。但是，當我看到將一生消磨在監獄中的長期痛苦，我覺得寧願將一個人判處死刑，也許比緩慢地、逐步地將他置之死地要好一些。有一次，一個“終身犯”到我這兒來，向我問道：“我們這些終身犯怎麼辦呢？自主是否會將我們從這個地獄中拯救出去？”

這些終身犯究竟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由於盜匪案而進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大批人，一次多至五十或一百個，集體被判徒刑。有些人可能犯了罪，但是我懷疑是否大部分被判徒刑的人都真正有罪？在這種案件中，人們容易受到牽連。一個告發者的証據，稍有一點証實，就足以構成罪狀。如今盜案日多，監獄的囚犯人數也年年增加。如果人們受飢挨餓，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法官和官吏對犯罪的增長高談闊論，但是却閉眼不看它明顯的經濟根源。

其次，還有農民。由於一些土地上的爭執，在农村里引起了一些衝突。互相毆鬥，有人因此死亡，結果許多人被判無期徒刑或者長期徒刑。時常整個一家所有的男子都因此下獄，留下婦女盡她們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在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屬於犯罪的類型。他們一般都是優秀的青年，無論在身心方面，都遠超過一般鄉民。如果對他們稍加訓練，略為將他們的興趣轉移到其他問題和工作

上去，那么这些青年都將成为国家的宝贵财产。

印度監獄中当然包括怙惡不悛的罪犯。这些人蓄意危害社会，对于公众是具有危險性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在獄中發現大批屬於善良类型的人，对于这些人——青年和成人，我可以毫不猶豫地予以信任。我不了解真正的犯罪类型和非犯罪类型的比例怎样。也許，在監獄部門中，甚至沒有一個人曾經考虑过这种区别。关于这个問題，紐約辛辛監獄的典獄長勞威斯，曾經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字。他說，据他所知，在他管轄的罪犯中，百分之五十并不是犯罪成性的；百分之二十五是由于环境的驅使；在其余百分之二十五中，可能只有一半，即占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罪犯才是蓄意危害社会的。大家熟悉，实际犯罪在大城市和現代文明的中心，比在落后的国家中更加盛行。美国的匪盜是臭名昭著的。辛辛監獄是一个以監禁一些最凶惡的罪犯而特別出名的監獄。然而，据它的典獄長的估計，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罪犯才是真正坏蛋。我認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在印度監獄中这种比例要小得多。如果实行較为合理的經濟政策，提供更多的就業和受教育的机会，那就会很快地使我們的監獄人去房空。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必須执行一个激烈的同时也会影响到我們整个社会組織的計劃。惟一的另外一套真正的办法就是英国政府正在实行的：增加它的警察力量，并扩大它在印度的監獄。在印度，被捕下獄的人数是惊人的。根据全印囚犯救助会秘書最近發表的报告，仅仅在孟买一省，一九三三年就有十二万八千人入獄。同年，在孟加拉省有十二万四千人[⊖]。我不知道所有各省的数字，但是如果兩省的总数超过了二十五万，全印

⊖ 請參閱“政治家”杂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度的总数很可能接近一百万。这个数字当然不代表监狱中的永久人数，因为有许多人都是短期服刑的。永久人数要少得多，但数目一定还很大。印度有几个主要的省份，据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管理机构。联合省就是属于拥有这种“光荣”称号的省份。它可能现在是，或过去是最落后、最反动的机构之一，从来没有把囚犯当作人来看待，也没有尽过点滴的力量来照顾或者提高他们的心志。联合省的机构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看管囚犯。那里极少发生越狱的企图。我怀疑在一万个囚犯中是否能有一个逃脱成功。

监狱最凄惨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十五岁以上的少年被关在狱中。他们大都是聪明伶俐的孩子，如果给以机会，可能很容易改邪归正。最近开始教给他们一些关于读和写的基本知识，但是照例还是非常不够，效率也低得可怜。这里很少有游戏或消遣的机会，任何报纸都禁止阅读，图书也不准看。在一天十二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内，囚犯被关在囚营或囚房里，在漫长的夜晚，无事可做。

探望每三个月才允许一次，通信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漫长时期。即使如此，许多囚犯也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他们 是文盲（实际上大部都是），他们必须依赖狱吏替他们写信，而后者又不热心额外增加自己的工作，通常是设法躲避。如果信写了，但因地址说得不切实，还是寄不到。探望更加困难，几乎一定要取决于对某些狱吏的贿赂。囚犯时常被转押到别的监狱中去，他们的亲友也找不到他们的下落。我曾经遇到许多囚犯，他们很多年来和家庭完全断绝了联系，也不了解家中情况。假如在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以后，探望总算盼到了，会见的情景也非常奇特。许多囚犯和探望他们的人，被安置在栅栏的两边，他们都想同时发言，两边是一片呼喊声。因此，原本可能从探望中获得的一点

人情温暖都完全化为泡影。

極少数的囚犯，通常在一千人中不过一个（欧洲籍囚犯是例外），享受着一些額外的特权，例如較好的食物以及次数較多的探望和通信。当几万个政治犯在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和平抵抗运动中被捕下獄后，这种特等囚犯的数目稍微增加了一些。虽然如此，但数目还是很少。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政治犯，包括男女，都受普通待遇，甚至沒有給予这种便利。

有些人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判無期或長期徒刑，时常受到長期的單独禁閉。我相信在联合省中，所有这样的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單独禁閉。通常，这种單独禁閉是对于違反監獄規則所施的一种特殊惩罚。但是就这些人（一般都是年輕的孩子）的情况來說，虽然他們可能在監獄中表现出模范的行为，但还是受到單独禁閉。因此，在法庭的判刑以外，又被監獄部門毫無理由地增加了一种額外的極其可怕的惩罚。这是非常荒謬的，而且也違背了法治。單独禁閉，即使是短期的，也是極其痛苦的事情；如果延長到好几年，簡直令人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慢慢地、繼續不断地頹喪下去，最后瀕于瘋狂；臉上流露出一种丧魂失魄的神色，或者像一个飽受惊吓的动物那样，滿臉帶着恐惧的表情。这是一步一步地摧毀精神，慢慢地支解心灵。即使一个人度过了这一关，他也变得反常，絕對不适合在世界上生存下去。但是問題却永远得不到解答——这个人究竟是否行为失檢或有犯罪行为？印度警察处理案件的方法一向是令人可疑的，在政治問題上，他們尤其是如此。

欧洲籍或欧亞籍的囚犯，不論他們的罪行和地位如何，总被列于較高的等級，可以得到較好的食物，較輕的工作以及次数較多的探望和通信。牧师每周一次的探望使他們接触到外界的事物。牧

師帶給他們附有插圖的幽默性的外國報刊。必要時，還可以和他們的家屬互通消息。

沒有人對歐洲籍囚犯享受的這些特權，表示嫉妒，因為它們實在很少。但是看到對其餘男女的待遇中，絲毫沒有任何對待人的標準，令人有點痛心。囚犯根本沒有被當作人來看待，因此，不論男女，也很少給予人的待遇。人們在監獄中看到國家機器實行壓迫時最不入道的一面。它是一部機器，無情地、粗暴地轉動着，碾碎卷入它掌握中的一切。監獄的規則是有意制定出來維持這部機器的。對於敏感的男女來說，這種毫無人性的統治是加於心靈上的一種酷刑和痛楚。我曾經看到長期徒刑的囚犯，有時忍受不住監獄中各方面的淒涼和陰暗，而像小孩似的嚶嚶啜泣。如果給他們一兩句在這種氣氛中很難聽到的同情和鼓勵的話，他們的臉上會突然現出快樂和感激的表情。

但是在囚犯中間，時常有表現仁愛和誠摯友誼的動人事例。一個瞎眼的“慣犯”，在服刑十三年以後獲得釋放。經過這樣漫長的時期，他一無所有地踏入一個陌生的世界。他同獄的囚犯都迫切地想給他幫助，但是他們的力量也都有限。一個囚犯把他存在監獄辦公室的一件襯衣送給他，另外一個送他一些其他衣服。第三個囚犯剛在那天早晨收到一雙新的皮涼鞋，他曾得意地把這雙鞋給我看。在獄中，這算是一件了不起的東西。但是，當他看到和他多年相處的瞎眼的伴侶赤腳出去，他情願將他的新鞋割愛。當時，我想在監獄中似乎比在外面有更多的友愛精神。

一九三〇年那年充滿了具有戲劇性的局勢和鼓舞人心的事變。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甘地具有的那種鼓動和激勵整個民族的驚人力量。這種力量幾乎能夠產生一些使人如痴如醉的作用。我

們回想到郭克雷对甘地的評語：他具有使凡人变为英雄的力量。和平抵抗运动，作为达到偉大的民族目标的行动方法，似乎本身已經証明了它的正确性。全国成長着一种坚定的信念，無論友人或反对者都認為我們已向胜利迈进。在运动中表現活躍的人們，充滿了一种异常兴奋的情緒。这种兴奋情緒甚至也有一些傳进了監獄。一般的囚犯說：“快实现自主了！”他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它，因为他們从私人利益出發，希望它能帶來一些好处。在市場上听到一些風声的獄卒也盼望自主快来；只有小獄吏变得更加有点惶惶不安。

我們在獄中沒有日報，但从一份印地文周刊上得到了一些消息。这种消息时常使我們陷入各种想像之中。例如猜想外面每天發生用木棍打人，有时开枪射击，紹拉浦宣布戒严令，对于携帶国旗的人，要判处十年徒刑。我們对全国各地的人民，特別对妇女，感到驕傲。我对我的母亲、妻子、妹妹以及許多堂姊妹和女朋友的活動，感到特別滿意。虽然我和她們分开，身在監獄之中，但是在一個偉大事業中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同志感將我們團結在一起，使我們彼此变得更加接近。我的家庭似乎扩大为一个更大的集团，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本色和亲密。我的妻卡麦拉使我感到驚訝，因为她的精力和热情竟克服了身体的孱弱，至少在某些时候，她并未因竭力活动而影响了健康。

当別人在外面面临危險和受苦的时候，我在獄中却比較安适。这种思想开始压在我的心头。我渴望出去，但不能如願，于是我把我的監獄生活改变成一种艰苦忙碌的生活。我每天大約化三小时在我的手紡机上紡紗，另外，还織布兩、三小时。这些都是我向監獄当局特別請求来的。我喜欢这些活动，它們使我忙碌，但并不过

度緊張，同時也不需要過多的注意力。它們安慰了我心里的狂熱。我閱讀很多的書，不然，就忙于打掃和洗衣服等。體力勞動是我自願做的，因為我的監禁是“單純的監禁”。


這樣，一面牽挂着外面的變化，一面忙于獄中日常事務，我在內尼獄中就把時間度過去了。當我看到一個印度監獄的活動，我感到它和英國在印度的政府並沒有區別。政府的這部機器有很大的效能，它加強了政府對國家的控制，但很少注意或者不注意國家的人材。表面上，監獄必須顯得很有效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事實。但是似乎沒有人想到監獄的主要目標，必須是改正和幫助那些被捕入獄的不幸的人們。而現在監獄所考慮到的卻是摧毀他們！因此，到他們出獄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有絲毫生氣。監獄是怎樣控制而囚犯又是怎樣看管和懲治的呢？這大多依靠囚犯自己。有些囚犯擔任獄卒或看守。由於畏懼，或者希望得到獎賞和特赦，他們被引誘去和監獄當局合作。在獄中，拿薪金的非囚犯出身的獄卒比較少。監獄中的警衛工作大都由當獄卒和看守的囚犯擔任，並且還布置了一套普遍的監視制度。囚犯被鼓勵去作密探，並且彼此監視。在囚犯中間，當然不准有任何組織或聯合行動。這很容易了解，因為只有將囚犯們分開，才能把他們控制起來。

在外面，在我們國家的政府中，情形亦正相同，不過規模更大，形式比較掩蔽些。在政府中，當獄卒或看守的囚犯的名稱不同。他們有煊赫的頭銜，更加華麗的制服。在他們身後，像在監獄中一樣，站着武裝警衛，隨時准备好武器來強迫人們服從。

監獄對於一個現代國家是多麼重要，多麼不可缺少啊！至少囚犯開始產生這種想法。在監獄、警察和軍隊的基本職能面前，政府許多行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職能顯得幾乎是表面文章。在監獄

中，人們开始体会到馬克思的理論，国家真正是压迫工具，被用来执行一个控制着政府的集团的意志。

我单独在囚房里住了一个月，不久便来了一个伴侶。他便是納瑪达·普拉沙德·辛格。他的到来給我一种安慰。两个半月以后，在一九三〇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我們的小囚营呈現出一种异常兴奋的景象。那天清晨，出乎意外地，我的父亲和馬茂德博士被送到这里来。他們兩人当天早晨在“極乐园”被捕，当时他們事实上还未起床。



第三十一章 耶拉伏达会谈

我的父亲被捕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这两件事是接着的，也可以说是紧接着的，工作委员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父亲便被捕了。这引起了外面一种新的发展：委员会如果开会，就将全体被捕。根据授予代理主席们的权力，委员会增加了代理委员，因此，就有几个妇女成为代理委员，卡麦拉便是其中的一个。

父亲入狱时，身体很不好，而在他被监禁的地方，环境又非常不舒适。在政府方面，这倒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们准备尽可能地来减少这些不舒适的地方。不过在內尼獄中，他们能够办得到的事情也很有限。我们四个人一同挤在我的囚营的四间小囚房里。典獄長曾經提議可以将父亲监禁在監獄的其他地方，在那里他可能住得稍为寬做一些。但是我们宁愿住在一起，这样，我们几个人能够亲自照顾他，使他生活舒适。

雨季刚刚开始，雨水有时从屋頂漏下来，滴到各处，因此，甚至在囚房里，要想保持完全干燥也并不十分容易。晚上，为了躲雨，在连接我们囚房的十英尺長、五英尺寬的小走廊上，安放父亲的床位总是成为一个問題。有时他还發燒。監獄当局最后决定另外修建一个寬敞的走廊和我們的囚房連在一起。这个走廊后来建成了，确实是一大改进。但是父亲却没有怎么享用，因为走廊建成不久，他便得到釋放。而我们繼續住在囚房里的人后来倒将它充分地利用了。

將近七月底的時候，盛傳薩普魯爵士和杰雅克爾先生正在努力促成國大黨和政府間的和解。我們從一份日報上看到這個消息，這份報紙是作為一種特殊優待給父親看的。我們在這份報上還讀到總督歐文勳爵和薩普魯及杰雅克爾兩位先生的往來信件，了解到所謂“和平使者們”曾經訪問過甘地。我們根本不瞭解什麼動機驅使他們主動地採取這種行動或者目的何在。後來，據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進行這件事情，是由于受了我的父親在被捕前幾天在孟買表示同意的一個簡短聲明的鼓勵。這個聲明是斯洛科比先生（當時倫敦“每日先驅報”駐印度的記者）在和父親談話以後起草的，曾經得到父親的同意。聲明[⊖]認為在政府同意接受許多條件的情況下，國大黨可能停止和平抵抗運動。這是一個籠統而具有試探性的聲明，同時並十分明確地表示，即使這些籠統的條件也必須等父親有機會跟甘地和我會商以後，才能考慮。我這年接任國大黨主席。我記得父親被捕後在內尼獄中，曾經把這件事情告訴過我，並說他匆忙中發表這樣一個籠統的聲明，覺得很遺憾，因為它可能被人誤解。事實上，它果然被誤解了，即使最確切，最明顯

⊖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潘迪特·穆狄拉爾·尼赫魯在孟買表示同意的聲明：“如果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雖然不能預料圓桌會議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可能提出的建議方案，以及英國國會對這些方案可能採取的態度，然而在某種情況下，却願意提出一種非正式的擔保，保證他們在不影響由於印度特殊需要和特殊條件所要求的，印度和英國的長期聯合所必需的以及圓桌會議可能決定的那種互相協調和轉移權力的條件的情況之下，將會支持在印度實現完全的責任政府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潘迪特·穆狄拉爾·尼赫魯將親自把這種擔保——或是從一個負責的第三方面人士那里得到不久將提出這種擔保的表示——傳達給甘地先生和潘迪特·賈瓦哈爾·尼赫魯。如果這種擔保在提出以後得到接受，就可能導致一般的和解，從而可以同時中止和平抵抗運動，停止政府現行的壓制政策，並且大赦政治犯；接着，國大黨也會在雙方同意的條件下參加圓桌會議”。

的声明也容易被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們所誤解。

在七月二十七日薩普魯爵士和杰雅克尔先生突然到內尼獄中来拜訪我們，并帶來甘地的短信。当天和第二天，我們和他們进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將我父亲累得筋疲力尽，因为事实上当时他正在發燒。我們反复商談爭辯，总不能了解彼此的言論和思想，因為我們在政治見解方面有很大的距离。很明显地，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要在国大党和政府之間达成任何和平是沒有絲毫希望的。我們在沒有同工作委员会的同事，特别是和甘地先行磋商以前，拒絕提出任何建議。我們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訴了甘地。

十一天以后，在八月八日，薩普魯博士帶着总督的答复重新来看我們。总督并不反对我們去耶拉伏达（浦那的監獄，甘地被監禁在那里）。但他和他的参议院不能允許我們會見巴特尔，阿薩德以及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委員，因為他們还在外面，并且还在进行積極反对政府的运动。薩普魯博士問我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准备到耶拉伏达去。我們回答在任何时候，我們都不反对，并且也不会反对去見甘地。但是由于我們不能見到其他同事，因此，我們对任何問題，都無法作出最后决定。当天的報紙（或許是头一天的報紙）登載孟买發生激烈棍毆事件，以及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員和代理委員維沙尔海·巴特尔、瑪拉維亞和薛尔万尼等被捕的消息。我們向薩普魯博士指出，这些行动对于事实毫無裨益。我們請他將我們这种看法明白地轉达給总督。但是薩普魯博士表示，如果我們能够尽早地和甘地會談，那也并無害处。我們在以前曾向他指出，如果將我們送往耶拉伏达監獄，和我們一同关在內尼獄中的同事——馬茂德博士也必須同去，因為他是国大党的書記。

兩天以后，在八月十日，父亲、馬茂德和我三人由專車从內尼

送往浦那。我們的火車在大站并不停留；我們通過大站時急馳而去，停在偏僻的小站。但是關於我們的消息還是傳到前面去了，廣大的人群聚集在我們停留的和不停留的車站上。在十一日深夜，我們到達浦那附近的寇基。

我們盼望能同甘地監禁在一個囚房裡，至少能和他早點見面。這是耶拉伏達典獄長已經安排好的，但是在最後一刻，他必須改變他的安排，因為他從陪同我們從內尼來的警官那裡接到了上級的某些訓令。典獄長馬丁中校不願意將這個秘密向我們透露。但是經過父親一些巧妙的盤問，我們終於明白這種用意是：除非薩普魯和杰雅克爾兩位先生到場，不然就不讓我們和甘地見面（至少在第一次），因為恐怕我們事先見面以後，態度可能強硬起來，或者比不見面時團結得更加緊密。因此，當晚和第二天整天及晚上，我們被分開監禁在另外一個囚營裡。父親對這種措施非常憤慨。為了和甘地見面，他從內尼趕來，而到了這裡又不准他和甘地見面，這使他煩惱不滿。十三日上午，通知我們薩普魯爵士和杰雅克爾先生來了，甘地已和他們在監獄辦公室內聚會，請我們前去。父親予以拒絕，經過各種解釋和道歉，才表示同意，但提出條件，要求必須先和甘地單獨見面。由於我們後來聯名提出請求，已經移到耶拉伏達監獄的瓦拉拜·巴特爾和陶拉特拉姆以及關在對面女監內的奈都夫人都被允許來參加我們的會議。當晚，父親、馬茂德和我搬到甘地的囚營中去，在我們逗留在耶拉伏達的其餘時間內，都住在那裡。在那幾天，巴特爾和陶拉特拉姆也遷到那裡居住，以便我們共同會商。

我們在監獄辦公室和薩普魯及杰雅克爾兩位先生進行的會議，繼續了三天，即八月十三、十四和十五日。我們交換了信件，

在其中陈述我們的意見，并說明停止和平抵抗运动及与政府合作所必需的最低条件。这些信件后来都在报纸上发表过。⊖

这些紧张的会议使父亲受到很大的影响。十六日，他突然發高燒。这就延迟了我們的归期。十九日晚上，我們仍乘專車动身回內尼。孟买政府尽一切可能替父亲安排一个舒适的旅行，即使在我們逗留在耶拉伏达的短促時間內，也注意到他的安适。我想起在我們到达耶拉伏达那晚上的一件趣事。典獄長馬丁中校問父亲想吃什么样的食物。父亲回答他吃些很簡單清淡的食物，接着，便一一列出从未起床喝的早茶一直到晚餐他所需要的各种食物（在內尼監獄时，我們每天总从家里送飯給他。）父亲天真坦率地开列出来的食品單，的确是些清淡的食物，但数量却很可观。在丽池大飯店或薩伏伊大飯店，这些食物很可能被当作普通和簡單的食物，因为父亲本人就是这样認為好。但是在耶拉伏达獄中，这个單子就显得古怪、近乎幻想、極其不合时宜。当馬茂德和我看到馬丁中校在聆听父亲列举这些繁多昂貴的食物时，臉上表現出来的表情，感到非常有趣。他曾經長期看管过印度最偉大、最著名的領袖，而他所需要的全部食物只是羊奶、棗子，偶然也許还要一些橘子。現在到他这里来的新型的領袖，作風却很不同。

在我們从浦那回內尼的旅途中，我們还是馳过大站，停留在偏僻的地方。但是人群較前更多，挤滿了月台，有时甚至挤在鉄軌上。特别是在哈达、依达西和苏哈普三地的情形更是如此，險些發生了事故。

父亲的病情很快地惡化。許多医生前来診視，其中有他自己

⊖ 包括这些最低条件的信件，附在本書附录(二)中。

的医生，也有省政府派来的医生。就他的情况来说，监狱显然是最不适宜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不能进行适当的医疗。但是当有些朋友在报上提議，鑒于他的病况，应该將他釋放的时候，父亲感到不安，因为他觉得人民可能以为这个提議是出于他的授意。他甚至拍电报給欧文总督，表示他沒有要求特別照顧予以釋放。但是他的情况，一天天地惡化。他迅速地減輕了体重，在体力方面和从前已判若兩人。在九月八日，他被釋放了，整整在監獄中住了十個星期。

他走以后，我們的囚房变成一个單調而沒有生气的地方。当他和我們在一起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为了增加他的安适而做的一些零碎事情。馬茂德、納馬达·普拉沙德和我整天忙于这种欢乐的工作。我停止了紡紗，布也織得很少，同時也沒有很多時間看書。現在他既然走了，于是我們又怀着沉重的心情，沒精打彩地恢复以往的生活。父亲被釋放后，甚至每天的报纸也停送了。四五天以后，我的妹夫朗吉特·潘迪特被捕了。他被送到我們囚营里，和我們同住。

一个月以后，在十月十一日，我六个月的徒刑期滿了，获得釋放。我知道自己不会有多大自由，因为斗争正在进行，而且日益激烈。“和平使者”——薩普魯和杰雅克尔兩位先生的企圖已經失敗了。就在我被釋放的当天，又宣布了一兩個法令。我高兴自己已經出獄，并且渴望能在我享受自由的短促時間內，做出一些著有成效的事情。

卡麦拉当时正在阿拉哈巴，忙于她在国大党内担任的工作。父亲在莫苏里治病，母亲和妹妹在陪着他。在我和卡麦拉到莫苏里去以前，我在阿拉哈巴忙碌了一天半。当时摆在我們面前的一

个大問題，即是否應該在農業地區展開抗稅運動。收租和納稅的日期已經迫近了，但由於農產品的價格大大下降，無論如何收租收稅是困難的。世界上經濟不景氣現象在印度是很明顯的。

作為总的和平抵抗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來說，並且單獨就抗稅運動本身的意義來考慮，現在似乎是開展抗稅運動的一個理想時機。地主和佃農顯然不可能從那年的收穫中付出全部稅收。他們如果原有積蓄，現在必須依賴這些積蓄，或者向人告貸。印度的地主通常總有些貯存可以依賴，或者也能够比較容易地向人告貸。一向在貧困和飢餓邊緣掙扎的一般佃農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依靠。在任何民主國家中，或者在農民適當地組織起來并占勢力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使他們繳付很多。在印度，農民的影響很小，只有在國內某些地方，國大黨代表他們說話。當然，當情勢發展到農民不能忍耐的時候，政府也隨時擔心農民起來暴動。但是他們世世代代以來，被訓練得幾乎能够毫無怨言地忍受一切。

在古甲拉特和其他一些地方，抗稅運動當時正在進行。但是這些運動幾乎完全是政治性的運動，是作為和平抵抗運動的一部分而開始的。這些地區是農民所有制占優勢的區域，自耕農直接和政府接觸，農民拒絕納稅會直接影響國家。聯合省的情況不同，因為我們這裡屬於地主和地稅征收者的區域，在耕種者和政府之間還有中間人。如果佃農停止繳納他們的地租，地主立刻受到損失。因此，便提出了一個階級問題。整個說來，國大黨是一個純粹民族性質的組織，包括許多中等地主也包括一些大地主。國大黨的領導人們對於可能引起這種階級問題或者可能刺激地主分子的事情極其畏懼，不敢進行。因此，在和平抵抗運動的最初六個月中，他們避免在農業地區號召普遍的抗稅運動，雖然在我看來，這方面

的条件似乎已經成熟。我并不害怕由这样运动或由其他情况所引起的阶级問題，但是我認為就国大党現有的性質而論，当时它不能贊助阶级冲突。然而它能够号召地主和佃农双方都不繳租稅。一般地主可能繳納政府向他們索取的稅收，但那是他們自己的过錯。

当我十月間出獄时，政治和經濟情况，在我看来，迫切地需要在农業地区开展抗稅运动。农民的經濟困难極其明显。在政治方面，我們的和平抵抗运动，虽然还在各地發展，但畢竟有些遜色。人民小批地，有时大批地繼續进入監獄中来，但整个气氛中的那股銳气已經消失。各个城市以及中产阶级对于罢業和游行已經感到有点厭煩。很明显地，运动需要一些东西来振奋一下，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而这些东西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以外，还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呢？因为在农民中間存在着雄厚的后备力量。这将重新成为一个关系到群众主要利益的群众性的运动，并且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将引起社会問題。

当我在阿拉哈巴短短的一天半時間內，我的同事們和我討論了这些事情。倉促通知以后，我們在当地召开了一次国大党省委員会的执行局會議。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以后，我們决定展开抗稅运动，准許在任何地区內实行。我們在本省任何地方都沒有宣布这个运动，执行局使运动对于地主及佃农同样适用，如果可能的話，以免引起阶级問題。我們当然了解主要的反应將来自农民。

我們阿拉哈巴地区接到这种准許采取行动的通知以后，准备进行第一个步驟。我們决定在一周以后召开本区的农民代表大会，以推动这个新的运动。我觉得出獄后第一天的工作就做得不錯。在这一天，我还在阿拉哈巴城召开了一个大規模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并作了很長的講演。后来我重行被判刑，就是为了这次講

演的緣故。

接着，在十月十三日，我和卡麦拉动身到莫苏里去，和父亲同住了三天。他略为好轉，我高兴他已度过危險期，并且日漸康复起来。我还能清楚地記得那宁静有趣的三天；回家团聚总是令人愉快的。我的女兒英迪拉和我三个小外甥女——我妹妹的女兒都在那里。我同孩子們一齐游戏，有时我們組成一个雄壯的队伍，雄糾糾地繞着房子游行，由年約三、四岁的最小的孩子領队，手里拿着旗帜，唱着我們的旗歌。那三天是我在父亲死于不治之病以前，和他一同度过的最后几天。

父亲預感到我不久將重新被捕，同时也許希望略为多見我几面，因此突然决定也回阿拉哈巴去。我和卡麦拉在十月十七日离开莫苏里，及时参加十九日在阿拉哈巴举行的农民大会。父亲准备在十八日，我們走后的一天，和其余的人一同啓程。

我和卡麦拉在归途中經歷了一个令人有些兴奋的旅行。在台拉·頓，几乎就在我离开当地的时候，一項根据刑事訴訟法第一四四条的命令送給了我。在勒克瑙，我們下車逗留了几小时，听說另有一个根据第一四四条的命令，正在那里等着我，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傳达給我，因为广大的人群使警官不能接近我。市政府介紹了我一番。接着，我們改乘汽車赴阿拉哈巴，沿途在各地停留，对农民集会講話。我們在十八日晚上到达了阿拉哈巴。

十九日早晨，听說又有一个根据一四四条签發的命令要傳給我！政府显然是急如星火地在追捕我，因此，我的日子也有限了。我迫切地希望能在重新被捕之前，参加农民大会。我們宣称这次大会是仅由代表們参加的非公开會議，不允許外人参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大会很能代表阿拉哈巴地区，就我記憶所及，約

有一千六百个代表出席。大会很热烈地决定在本地区开展抗税运动。在我们主要的工作者中间，存在着一些犹豫。有些人怀疑这种冒险行动是否能够成功，因为大地主施行恐怖手段的威力很大，并且又有政府予以支持。他们怀疑农民是否能够经得住这些考验。但是在出席大会的一千六百个各个类型的农民的心中，并不存在犹豫或怀疑，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是会上发言人之一。我不知道如果发言，就会违反根据第一四四条而签发的命令，而这个命令禁止我公开講演。

接着，我到车站去迎接我的父亲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車誤了点。他们一到以后，我就立刻离开他们，去参加一个由邻近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组成的公共集会。晚上八点以后，我和卡麦拉筋疲力尽地从这个会议归来。我盼望和父亲谈谈，我知道他正在等着我，因为从他归来以后，我们彼此几乎没有交谈过。归途中，在差不多已看到我家房屋的地方，我们的汽车被阻挡下来了。我当场被捕，被押到朱木拿河对岸内尼狱中我以前住的老地方。卡麦拉独自回到“极乐园”，将这个新发生的事告诉正在等待着我的家人。当晚鐘鳴九下的时候，我重新踏进内尼监狱的大门。



第三十二章 联合省的抗税运动

离开内尼监狱八天以后，我又回去，和馬茂德、納馬达·普拉沙德及朗吉特·潘迪特在原先那个囚房里重又聚在一起。几天以后，我在狱中受审，被控告几项罪状。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根据我在释放后一天在阿拉哈巴发表的那篇演说中的各节。如同我们一向所采取的态度，我没有替自己进行辩护，但却在法庭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四项（甲），我因叛乱罪被判处十八个月的严厉监禁和五百卢比的罚款；根据一八八二年通过的盐法，我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和一百卢比罚款；并且根据一九三〇年第六个法令（我忘记这究竟是关于那方面的法令），我又被判处了六个月徒刑和一百卢比的罚款。由于最后两项作为一项执行，总的徒刑是两年严厉监禁。此外，如拖延缴纳罚款，还要额外增加五个月的徒刑。这次是我第五次服刑。

我再被逮捕并判处徒刑，对于和平抵抗运动的进展在短期间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运动稍为振作了一下，显出更大的活力。这大部分得归功于父亲。当我被捕的消息由卡麦拉告诉他以后，他受到一些不愉快的震动。但他几乎立刻振作起来并拍着他面前的桌子说，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做一个病夫了。他将健康起来，像一个健康的人那样工作，再不懦弱地向疾病低头。这是一个勇敢的决断，但不幸没有一种意志的力量能够克服或者根除已经深入膏肓

的痼疾。但是在短期間內，这种决心却引起了显著的变化，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感到惊讶。自从他到耶拉伏达去以后，在过去几个月中，他吐痰带血。但在他下了决心以后，这种现象突然停止，接连几天未再出现。他因此而感到高兴。当他到狱中来看我时，带着一些得意的神情，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但不幸这是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因为他后来大量咯血，病又重发。在这个期间，他以衰老的精力工作着，推动了全印度的和平抵抗运动。他和来自各地的许多人会商，发出详尽的指示。他决定了一个日子（在十一月中我生日那一天），举行一次全印度的庆祝，将促使我被判徒刑的那篇演讲中触犯当局的几段，拿来在公开集会上朗诵。当天发生了无数起棍殴和强迫驱散游行集会的事件。据估计，仅仅在那一天，全国各地约有五千人被捕。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诞辰庆祝。

由于父亲有病，像他这样负起责任并大量消耗精力，对他是很不利的，我请求他完全休养。但是我认识到他在印度不可能得到这种休养，因为他的心永远关注着我们斗争的起伏，并且不可避免地人们会来向他请教。因此，我建议他到仰光、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去作一次短程的航海旅行。他对这个意见表示相当赞成。于是我们替他安排，让一位当医生的朋友陪他同去。他抱着这个目标前去加尔各答，但是他的健康状况慢慢地变得严重，因此不能再作远行。他在加尔各答近郊逗留了七个星期，全家都在那里和他聚在一起。只有卡麦拉大部分时间还留在阿拉哈巴，做国大党的工作。

我进行和抗税运动有关的活动，可能加速了我这次重新被捕。事实上，我在紧接着农民大会结束的那个特殊日子里，当农民代表还留在阿拉哈巴的时候，遭到逮捕，对运动说来，是再好不过了。

他們的热情因此而增長，將大會的決議幾乎傳到了區里的各個農村。在幾天以內，全區都已知道抗稅運動已經展開，各地對運動都有歡欣鼓舞的反應。

當時，我們的主要困難是彼此間的联系——使人們知道我們正在做些什麼，而我們又要他們做些什麼。報紙由於害怕受到政府的懲罰或封閉，不發表我們的消息；印刷廠不承印我們的傳單和通知；信件和電報受到檢查，時常中斷。我們可以採用的惟一可靠的联系方法就是派遣信差傳送急件。即便如此，我們的信差還時常被捕。這種方法化費很大，並且需要做許多組織工作。我們的組織工作做得還相當成功，各省中心經常和總部以及它們主要地區的中心保持着接觸。在城市中，傳播任何消息並不困難。許多城市每天或每周發布復寫的非正式的新聞簡報，銷路總是很大。在城市中，公開通知的方法之一就是擊鼓；但結果擊鼓的人總是被捕。這並不要緊，因為人們對逮捕並不躲避，總是由他們捕去。所有這些方法適合於城市，但對農業地區並不很實用。我們依靠信差和復寫的通知來和主要的農村中心保持着某種接觸，但這並不令人滿意，因為要使我們的指示傳到遙遠的農村，很費時間。

在阿拉哈巴舉行的農民大會克服了这个困難。代表們事實上來自區里的各個重要村庄，當他們分頭歸去時，把关系到農民的新決議以及我因此而被逮捕的消息帶到了全區。他們一千六百人成了抗稅運動得力的和熱情的宣傳員，因而保證了運動初期的勝利。毫無疑問，在該區的全体農民最初不會繳稅，除了由於遭到恫吓，不得不繳外，也絕對不會再繳。當然，沒有人敢於預言當他們面臨官吏或地主的強暴和恐怖手段時，他們忍受的能力會變成怎樣。

我們要求拒絕繳稅的呼喚是同時發給地主和佃農的。在理論

上,它不是阶级性的呼吁;事实上,大部分地主,甚至有些同情民族斗争的地主,确实缴纳了税。他们受到的压力很大,同时也会失去较多的东西。但是佃农的立场坚定,拒不缴付,因此,我们的运动事实上成了抗租运动。运动从阿拉哈巴区扩展到联合省的其他一些地区。在许多地区,运动并未正式通过或宣布,但事实上,佃农拒不交租,许多情况是由于物价跌落,佃农根本没有力量缴付。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和大地主,接连几个月没有广泛采取恐吓反抗的佃农的行动。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并无把握,因为一方面他们面临和平抵抗运动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经济萧条又造成了农业的困难。两者互相结合起来,而政府又一向惧怕农村中的动荡不安。同时圆桌会议正在伦敦举行,他们也不愿增加在印度的困难,或者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强有力”的政府的姿态。

就联合省说来,抗税运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它将我们斗争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业地区,从而给予运动以新的生命,并将它建立在更广泛、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然我们那些城市居民已经感到厌倦,我们那些中产阶级的工作人员很明显地变得有些松懈,但是运动本身在联合省却和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强大或者甚至更加强大。在其他省份,从城市向农村,从政治争端向经济争端的转移,却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因此这些地区继续为城市所左右,并由于中产阶级分子的厌烦而进一步受到了损失。甚至在运动中一直起着卓越作用的孟买市也开始有些消沉。在孟买或其他地方,反抗当局的行动会继续进行下去,逮捕也会继续发生,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表面文章,有机的因素已经消失。这也很自然,因为长期使群众处在革命的高潮中,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这仅是几天的事情,但是和平抵抗运动却有显著的能力将这个期限延长

到許多个月，并且甚至在这以后，还能在低潮中無限地繼續下去。

政府的压制日益增加。直到現在一直相当出色地坚持活动的国大党地方委员会，青年联盟等，被宣布为非法并受到镇压。在监狱中，对政治犯的待遇变得更加恶劣。当有人被释放后不久，重又被判徒刑回到狱中，政府感到特别愤怒。这种在惩处下并不屈服的精神，损伤了统治者的自尊心。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初，联合省的监狱里发生了几起鞭打政治犯的事件，表面原因是由于違反了监狱纪律。这个消息传到内尼监狱我们那里以后，使我们感到愤慨，因为，在我看来，即使对待最坏类型的恶犯，施行鞭打也是一种不良的刑罚，而以此来对待年轻敏感的青年，和作为違反纪律的处分，簡直是野蛮行为。（从这以后，我们对于这种行为以及印度許多更恶劣的事情都习惯了。）我们囚房里的四个人写信给政府，指出这点，在大約两周以后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决定采取一些明确的步骤来表示我们对鞭打的抗議，同时对遭受这种野蛮行为的被害人表示同情。我们决定实行三天——七十二小时的完全絕食。就絕食本身来说，这个期限并不算久。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习惯于絕食，不知道怎样度过。我以往絕食很少超过二十四小时。

我们度过那次絕食，并未遭到任何大的困难。我很高兴發觉这并不如我所担心的那样痛苦。在这次絕食的整个过程中，我很愚蠢地繼續剧烈的运动——如奔跑、跳躍等等。我并不觉得这样做会给我多大好处，特别是因为在这以前，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在这三天中，我们每人的体重減輕了七、八磅。此外，在内尼监狱的前几个月中，我们每人体重还減輕了十五磅到二十六磅。

除了我们的絕食以外，在外面由于反对鞭打事件，还掀起了一场相当大的風波。我相信联合省政府曾經指令监狱部門在將來不

要再濫施这种体罰。但是对这些指令并没有遵守多久，一年多以后，在联合省及其他省份的监狱中，鞭打的事件还是層出不窮。

除了这些偶尔發生的惊扰外，我們在獄中过着平靜的生活。这里的气候宜人，因为阿拉哈巴的冬天是很可爱的。朗吉特·潘迪特迁到我們囚房里来住，算是我們的一个收穫，因为他对园艺很有研究。不久，我們那个黯淡無光的囚营充滿了花朵，变得丰富多彩。他甚至能在那塊狹窄有限的空間里，布置了一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場！

我們在內尼监狱的生活中，值得欢迎而且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觀望飞机从我們头上掠过。阿拉哈巴是东方和西方一切大的航空綫的停靠站之一。飞往澳洲、爪哇和法屬印度支那的巨型飞机通过內尼时，几乎直接从我們头上掠过。在往来于巴达維亞的飞机中，以荷蘭的客机最为富丽堂皇。如果碰巧的話，我們在冬天清早有时可以看到一架飞机，这时天还未亮，滿天星斗。这架巨型飞机上灯火輝煌，头尾亮着紅灯。当它在清晨漆黑的天空陪襯下飞掠过去的时候，确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也从某个监狱轉押到內尼来了。他被分开监禁，不在我們囚房里，但是每天見面。我在獄中見到他的次数也許比在外面还要多些。他是一个饒有風趣的伴侶，充滿着活力，并具有年輕人的那种好奇心。他在朗吉特的帮助下，甚至开始學習德文，显示出他有惊人的記憶力。当鞭打囚犯的消息傳來时，他正在內尼獄中，他非常憤慨，曾經写信給本省的代理省督。嗣后不久他便病了，因为他受不了监狱环境的寒冷。他的病轉重了，必須送到城里医院去并在刑滿以前先行釋放。幸而他在医院中恢复了健康。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元旦，傳來了卡麥拉被捕的消息。我很高興，因為她渴望能追隨她的許多同志入獄。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她和我的妹妹以及許多其他婦女是男子的話，她們早就被捕了。但在以往，政府尽可能地避免逮捕婦女，因此，她們長久以來能夠逍遙法外。現在她竟如願以償了！我想她一定很高興。但是我又擔心，因為她的身體一向孱弱，我怕監獄的環境會給她很多痛苦。

當她被捕的時候，當時在場的一個新聞記者請她發表談話。她不加思索地、幾乎不自覺地發表了下列表現她的特性的簡短聲明：

“我能夠步我丈夫的後塵，感到不勝愉快，並引為驕傲。我希望人民能夠不屈不撓地繼續進行鬥爭。”

假如她曾經思考一下的話，也許她不僅僅談這些話而已。因為她自命是維護婦女權利，反對男子專橫的先鋒。但是在當時一剎那之間，作為一個印度妻子的特性在她心上占了上風，使她甚至忘卻了男子的專橫。

我的父親住在加爾各答，健康狀況很不好。但是卡麥拉被捕和被處徒刑的消息驚動了他，他決定回到阿拉哈巴去。他派遣我的妹妹克里西娜立刻回到阿拉哈巴，幾天以後，他和家里其他人也接着來了。一月十二日，他到內尼獄中來探望我。我快有兩個月沒有見到他了。看見他時，我感到很難掩飾自己的震驚。而他似乎並不感到他的容貌引起了我的憂慮，告訴我說他比最近在加爾各答時要好得多。他的臉浮腫，但他似乎以為這是由於某些暫時的

原因。
他那種臉色使我不安，臉完全不像他的了。在我心中開始滋長着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擔心他面臨着真正的危機。我一向認

为他健康强壮，想不到他会死。他素来对于死亡置之一笑，并以此作为笑料，他告诉我们他还有更长的日子要活。最近，我发现每当他年轻时代的老朋友去世时，他总产生一种寂寞孤单的感觉，感到自己孤零零地被遗留在陌生的伴侣中，甚至预感到即将来临的末日。但是通常这种情绪转眼就过去了，他充沛的精力又奔放起来。我们家庭里的人对他富有风趣的性格、无限的热情是如此熟悉，因而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他活着的世界。

他那种神色使我忧虑，我心中充满了各种预感。但是我还未想到眼前他会有什么危险。当时，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也不好。

这时正是第一届圆桌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对它最后的大吹大擂和故作姿态感到兴趣（当然，在这种兴趣中难免没有一些蔑视）。那些演说、辞令和讨论看来并不真实，并且也是枉费心机。不过有件事显得很突出：那就是甚至在我們国家受到最痛苦的考验的时刻，当全国男女都表现得很英勇时，在我们同胞中间还有一些人漠视我们的斗争，而给对方以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明白，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怎样在民族主义的骗人幌子下进行活动，那些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们又怎样企图将来就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名义下，保持住既得利益。圆桌会议显然是这些既得利益的渊藪。他们中间许多人反对过我们的斗争；有些人沉默地袖手旁观，然而时常提醒我们：“他们等着，随时准备参加。”但是当伦敦向他们一招手，等待的期限便突然结束。他们成群结队地赶去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免受到损失，并且想在将来可能实现的更大利益中分肥。由于他们认识到国大党日益左倾，而群众对国大党的影响也日益增加，因此加速了他们投奔伦敦。他们本能地感

覺到，如果在印度產生根本的政治變革，這就意味着各種群眾因素將占絕對優勢，至少也會變得重要。而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將加緊進行激進的社會改革，從而會危害到這些既得利益。印度既得利益集團從它們認為可怕的前途退縮回來，轉而反對任何深刻的政治改革。它們要使英國繼續留在印度，成為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以保持現存的社會組織和既得利益。這就是藏在堅持自治領地位後面的真實思想。一位著名的印度自由主義聯盟領袖有一次和我紅臉了，因為我堅持主張，作為和英國和解的一個主要部分就是英國駐軍必須立刻從印度撤退，而印度軍隊必須在印度民主力量的控制下。他甚至說，即使英國政府對這點表示同意，他也要盡一切力量來反對。由此可見，對於任何形式的民族自由所需要的這種明顯而重要的前提，他表示反對，決不是因為在現實環境下難於實現，而是他認為不合需要。可能有人認為這一部分是由於對外來侵略的恐懼，而他希望英國軍隊能夠保護我們不受到這種侵略。我們姑且不論是否存在這種侵略的可能性，但對於任何有氣節的印度人來說，要求外國人的保護就是一種可恥的想法。我並不認為這是希望把英國強大的軍隊留在印度的真正理由。需要英國人留在印度，其目的是為了保存印度既得利益集團來反對印度人民自己，反對純粹的民主，反對群眾運動的高漲。

因此，印度圓桌會議的代表們——不僅那些公認的反動派和教派人物，而且甚至那些自命為進步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的人們——在他們和英國政府之間找到了許多共同點。民族主義，在我看來，的確成為一個兼包並蓄的名稱，如果它既包括那些為了推進爭取自由的鬥爭因而在印度被捕下獄的人們，同時又包括那些和我們的獄吏握手言歡，亦步亦趨，共同商討一致政策的人們。在

我們国家中，还有一些勇敢的民族主义者，他們口若悬河，从各方面去鼓励独立运动，告訴我們中心問題在于自主，号召他們的同胞甚至不顧牺牲地去推进运动。幸而运动并未帶給他們損失，反而增加了他們的營業和利潤。当許多人被捕下獄或遭到棍毆时，他們仍坐在會計室里点他們的錢財。后来，当激进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冒險时，他們便改唱低調，痛斥这些“極端分子”，而和对方訂立契約和协定。

我們对圓桌會議的所作所为并不真正关心或重視。它离开我們很远，显得渺茫而不真实。而斗争却在我們这里的城鎮乡村中进行。我們并不幻想我們的斗争能够迅速結束；我們对前面的危險也沒存有僥幸的想法。但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变却使我們对于我們民族的力量及持久力树立了某种信念。我們就是以这种信念来面对未来的。

十二月或一月初發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們非常痛心。沙斯特里先生在英国爱丁堡（我想他是該城的荣誉公民）發表的演說里，提到在印度和平抵抗运动中被捕入獄的人們时，流露出一些蔑視。那篇演說，特别是在当时的那种場合下發表，完全损伤了我們的感情。因为虽然我們在政治見解上和沙斯特里先生有很大的距离，然而我們对他是尊重的。

藍姆賽·麦克唐納先生以他一貫友善的演說来結束圓桌會議。这篇演說似乎委婉地吁請国大党放弃它的越規行动，而和他們握手言欢。大約在这个时候——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国大党工作委員會在阿拉哈巴举行會議。这篇演說及呼吁随同其他事項一并予以討論。当时我在內尼獄中，获釋后才了解到會議的情况。父亲当时剛从加尔各答回来，虽然病重，还坚持要求委員們在他床

旁聚會，討論這個問題。有人建議，贊成向麥克唐納先生有所表示，并緩和和平抵抗運動。這使父親大為激動，他在床上坐了起來，宣稱不達到民族獨立目標，他決不妥協，即使只剩下他一個人，也要繼續鬥爭下去。這種激動對他很不利，由於他的體溫突然增高，醫生最後將客人請開，讓他一個人休養。

大部分由於父親的主張，工作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毫不讓步的決議。在這決議發表以前，薩普魯爵士和沙斯特里先生拍給父親一份電報，通過父親，請求國大黨在他們獲得機會參加討論以前，不要作出任何決議。他們已經在歸途中。回電中大意說，工作委員會已經通過一項決議，但在薩普魯和沙斯特里兩位先生回來參加討論以前，暫不在報上發表。

我們在監獄中對外面這些發展并不了解。但是我們知道有些事情已在着手進行，因而感到相當煩悶。更使我們難以忘懷的，是一月二十六日——獨立日一周年紀念——即將來臨，我們不知道怎樣進行慶祝。據我們事後了解，在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群眾集會來慶祝這個日子，會上重新肯定了獨立決議，並通過同樣性質的“紀念決議”[⊖]。組織這次慶祝是件出色的工作，因為我們沒有報紙、印刷廠的便利，同時也不能利用郵電。在全國城鄉無數地方，大致在同一時間舉行的大集會上，以有關各省的特殊語言通過了一項相同的決議。大多數集會都是在不顧法律禁止的情況下舉行的，因而被警察強迫驅散。

一月二十六日，我們在內尼獄中回顧過去的一年，並瞻望新的一年。當天上午，突然接得通知說，我的父親的病況嚴重，我必

⊖ 這個決議附在附錄(三)中。

須立刻回去。打听之后，知道我已被釋放。朗吉特也陪我一同回去。

当晚，許多人从印度各个監獄中釋放出来。这些都是国大党工作委員會的原任和代理委員。政府給我們一个机会聚会，讓我們考虑当时的形势。因此，無論如何，当晚我也会得到釋放。父亲的病况使我的釋放提前了几小时。卡麦拉經過了短短二十六天的監獄生活，当天也从勒克瑙監獄中釋放出来。她也是工作委員會的一个代理委員。



第三十三章 父亲的死

我这次见到父亲，距离他在一月十二日来内尼监狱看我已有两个星期了。当时他的容貌使我震惊，而他现在的情况更加恶化。他的脸甚至较前更加浮肿，谈话有些困难，神志也不是一直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意志依然如故，并能坚持不变，因而使他的身心还能照常活动。

他看到朗吉特和我感到高兴。一两天以后，朗吉特（他这次回来，并不属于被释放的工作委员会委员之列）被送回内尼监狱。这使父亲烦恼。他不断地要他来，并且埋怨说，许多人从印度遥远的地方来探望他，而他自己的女婿却被隔开。医生对父亲这种固执的要求表示忧虑，因为这显然对他没有好处。三四天以后，我想是在医生的建议之下，联合省政府释放了朗吉特。

一月二十六日，就在我被释放的当天，甘地也从耶拉伏达狱中释放出来。我迫切地希望他来阿拉哈巴。当我将他被释放的消息告诉父亲时，我发现他也渴望和甘地见面。就在第二天，甘地在参加孟买空前未有的盛大群众欢迎大会以后，便启程前来，深夜抵达阿拉哈巴。父亲等待着他，还未入睡。他的到来，以及他的简短谈话对父亲起了显著的安慰作用。对我母亲来说，他的来临，也带来了宽慰。

这时，被释放的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和代理委员们闲散无事，正

在等待开会的指示。他們許多人對父親很關懷，想立刻到阿拉哈巴來。因此，決定將他們全體人員召集到阿拉哈巴開會。兩天以後，來了三、四十人，就在我家隔壁自主大樓舉行會議。我時常出席這些會議，但是由於我的心緒太亂，也不能積極地參加，現在對他們作出的決議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猜想這些決議是贊成繼續進行和平抵抗運動的。

在來到這裡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中間，有許多人剛從獄中釋放出來，同時預感到不久將重新被捕，因此，希望來探望父親，想和他作最後一次的會面；也可能是向他作最後一次話別。他們在早晚間三三兩兩地來看他。父親堅持坐在安樂椅上接待他的老同志們。他坐在那裡，身材顯得魁偉，臉上不帶什麼表情，因為他的面部浮腫，不能傳出他的表情。但是，老朋友魚貫而入，同志們此去彼來，他的眼中射出了光芒，表示認識他們，微微點頭致意，並合掌致敬禮。雖然他不能多說話，但有時也說幾句，甚至在這個時候，還保持以往的風趣。他坐在那裡，像一隻受了致命傷的獅子，奄奄一息，但還是威風凜凜。當我望著他的時候，我難以設想他在思索什麼。是否他對我們的活動已經不再感到興趣？他有時很明顯地在掙扎，企圖抓住將從他掌握中失去的東西。這種鬥爭一直繼續到最後，而他並不屈服，有時還能極其清楚地和我們談話。即使當他由於喉頭收縮，言語不清，難以使人了解的時候，他還把他想講的話寫在紙上。

他對在我家隔壁舉行的工作委員會會議絲毫不感興趣。如果在兩星期以前，這些會議會使他興奮，但是現在他覺得自己和這些事情已經隔得很遠了。他對甘地說：“聖雄，我不久就要離開你們，來不及看到獨立自主了。但我了解你們已經勝利，不久將獲得自

主。”

来自其他城市和省份的大部分人都已經回去。留下了甘地。少数亲密的朋友和近亲以及他的老朋友——安沙利、比德汗·昌德拉·劳、吉弗拉·梅达三位著名医生，他一向說他已將他的身体委托給他們三位保管。二月四日早晨，他似乎略为好轉，我們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將他轉送到勒克瑙去，因为当地有特殊的X光医疗的便利，而阿拉哈巴沒有这种設備。当天，我們用汽車把他送走，甘地和一大群人跟随在我們后面。我們緩慢地駛行，然而他还是感到非常疲倦。第二天，他似乎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但却有一些煩躁不安的征象。第三天清晨，二月六日，我守在他的床旁。他度过了一个痛苦不安的夜晚。突然，我看到他的臉色变得平靜，消失了那种掙扎的神情。我以为他已經入睡，感到高兴。但我母亲的感覺比較敏銳，她大叫一声，我回轉身来，請她不要惊扰父亲，因为他已經睡着了。但这是最后的長眠，他再也不会苏醒了。

当天，我們用汽車將他的遗体运回阿拉哈巴。我就坐在这輛車里，由朗吉特駕駛，車中还有父亲生前寵爱的僕人哈里。在我們車子后面，是一輛載着我母亲和甘地的汽車以及其他汽車。整整那一天，我茫然若失，对一切事情都摸不着头緒，同时，一系列的事变和广大的群众也使我無法进行思考。在倉促通知以后，在勒克瑙聚集起来的广大群众前来吊唁；接着从勒克瑙迅速地赶回阿拉哈巴，沿途我坐在用一面我們的国旗裹起来的遗体旁边，車上还飄揚着另一幅大國旗；到达阿拉哈巴时，沿途几里路都聚集着前来悼念的广大人群。在家里举行了一些仪式以后，在一股巨大的人流护送下，前去恒河河岸。在那个冬季的日子里，当暮帷籠罩着河岸时，熊熊烈火焚化了对我們这些和他極其亲密的人以及对印度千

百万人民具有無限意义的遗体。甘地对广大群众发表了簡短动人的講話，然后，我們默默無語地慢慢归去。当我們孤單凄凉地回到家里的时候，星辰已經出現，在高空燦爛地閃爍着。

几千封慰問的函电寄来給我和我的母亲。印度总督欧文勋爵夫妇也給我母亲一封措詞亲切的信电。这許多善意和同情使我們的悲痛略为減輕了一些。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甘地就在我們身边，这給我們無限的安慰，使我母亲和我們所有的人能够承受我們生活中的一大危难。

我簡直难以相信父亲已經和我們永別了。三个月以后，我和我的妻子及女兒到了錫蘭，共同在魯瓦拉·埃利耶度过了几天平靜安寧的生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忽然想起它对父亲也很相宜。为什么不請他来呢？他一定很累了，休养一下对他会有好处。我几乎要拍一个电报到阿拉哈巴去給他。

当我們从錫蘭回到阿拉哈巴后，有一天邮局送来一封怪信。寄給我的信封上的字迹是父亲写的，上面盖了無數不同的邮局的邮戳，并貼着無數的邮票。我惊异地將它拆开，發現这确是父亲写給我的信，写信的日期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封信在一九三一年夏天交到我手中。因此，在旅程中前后費了五年半的时间。这封信是父亲当我和卡麦拉于一九二六年赴欧前夕在阿麦达巴德城写的，原本寄到孟买，由我們搭乘的意大利輪船劳埃德号轉交。显然，它沒有及时寄到，后来又輾轉寄到好些地方，可能被耽擱了好久。直到最后，遇到某个办事認真的人，又將它轉寄給我。很奇怪地，这是一封告别的信。



第三十四章 德里协定

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天，几乎就在他闭目的那个时刻，一大群出席圆桌会议的印度委员回到孟买。沙斯特里先生、萨普鲁爵士也许还有其他几位我回想不起的人物直接来到了阿拉哈巴。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早已在那里。于是，在我们住所举行了几次私人会议，会上报告了圆桌会议的经过。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沙斯特里先生完全出于自愿地对他在爱丁堡发表的讲话表示遗憾。他还说他一贯很受环境的影响，同时对他自己的“善于饶舌”也常控制不住。

关于圆桌会议，这些代表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我们还不知道的重要情况。他们倒是告诉了我們各式各样的幕后阴谋，以及某某勋爵私下的言论或某某爵士暗中的活动。我们的这些印度自由主义联盟的朋友们，一向使我有这种感觉，即他们比较重视和高级官员的私人谈话以及关于这些官员的闲话，而不那么重视原则问题或印度局势的实际情况。我们和这些自由主义联盟的领袖们的非正式讨论，毫无结果。我们以前认为圆桌会议的决议毫无价值，这次得到了证实。当时有人（我忘了是谁）建议甘地应该写信给总督，请求会见，以便和他作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甘地表示同意，虽然我并不认为他期望得到很大的收获。但是，在原则上，他一向愿意主动地去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由于他对自

己立場的正义性，具有絕對的信念，因此，他希望能够說服对方；但是也許他的目的不仅限于从理智上去进行說服。他一向寻求心理变化，打破憤怒和疑惧所造成的隔閡，覓取引起別人善意和高尙感情的途徑。他知道如果产生了这种变化，說服对方就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不能使人悅服，对抗情緒也会減輕，冲突的緊張局面也会緩和下来。当他亲自去同对他抱有敌意的人們周旋时，他获得多次的胜利；令人驚訝的是，他純粹依靠性格的魅力將一个敌对者爭取过来。許多对他进行批評和嘲笑他的人也給他这种性格所感化，而变得对他崇拜，即使繼續对他进行抨击，但其中已不再有絲毫嘲弄的意思。

由于了解自己具有这种力量，甘地常常欢迎和跟他意見不同的人們会晤。但是，在私人的或次要的問題上，和个人接触是一回事；和一个不屬於个人范疇的对象如代表胜利的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去周旋，又是另一回事。甘地認識到这点，因此，他去和欧文勋爵会谈时，并不抱有奢望。和平抵抗运动还在繼續进行中，虽然由于盛傳和政府举行非正式談判而緩和下来。

会見的事很快就安排好。甘地前去德里，临行告訴我們說，如果他能和总督認真討論任何临时解决方案，他会通知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到那兒去。几天以后，我們全体人員被邀到德里去。我們在当地逗留三个星期，每天开会，进行漫長而又令人疲劳的討論。甘地常和欧文总督会晤，有时也間隔三四天，可能由于印度政府正和倫敦的印度事务部交換意見。有时，明明是很微小的事情，甚至某些字眼，也会使会谈停頓。例如关于和平抵抗的“中止”一詞就是一个例子。甘地一貫表示和平抵抗不能完全“停止”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惟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中止”。欧文勋爵反对

“中止”這兩個字，要求使用含有終結意義的字眼，這點甘地不能同意。最後，決定採用了“停止進行”字樣。此外，關於抵制外國布店和酒店的問題，也進行了漫長的討論。我們將大部分時間消磨在考慮締結協定的臨時措施方面，很少注意到根本問題。也許當時認為這些根本問題可以等到以後達成臨時解決方案，而日常鬥爭停止下來之後，在更加有利的環境下再去考慮。我們認為這些會談可以導致休戰，接着，再對實際爭論的問題繼續商談。

德里在那些日子裡吸引了各式各樣的人物。那兒有許多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他們對我們的保持緘默，表示有些不滿。他們對我們說，他們從新德里秘書處那方面得到的關於甘地—歐文會談的消息，遠遠超過從我們這裡得到的，這確是事實。其次，還有許多上層人物趕來向甘地致意，因為現在這位聖雄不正是吉星高照嗎？有趣的是，這些對甘地和國大黨一向疏遠，並且時常痛斥他們的人，現在趕來彌補既往。國大黨似乎已經揚眉吐氣了。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發展，無論如何，對國大黨及其領袖們保持友好關係，總比較妥當。但是，一年以後，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另一種變化，他們叫囂對國大黨及其一切活動深惡痛絕，並且宣稱已經和國大黨毫無關係。

甚至教派人物也為這些事變所驚動，有些擔心他們在未來的政府中不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們許多人來見聖雄，向他提出擔保，表示他們非常願意在教派問題上妥協，並且只要甘地採取主動，則達成協議將不會有困難。

地位高低不同的人們絡繹不絕地湧到甘地和我們大部分人住宿的安沙利醫生家裡來。我們在空閒時候，冷眼旁觀這些人，很感興趣，並且也增加了閱歷。好幾年來，我們所接觸到的主要是城鄉

的貧苦人民，以及被嚴禁在監獄中的人們。現在這些來拜訪甘地的飛黃騰達的紳士們使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善于隨機應變的一面。因為不論他們在什麼地方發現了權勢和成就，他們便笑逐顏開地趕去阿諛奉承。他們許多人都是印度英國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差強人意的是，他們對於可能在印度產生的任何其他政府，也將會同樣堅決地予以支持。

在新德里的那些日子裡，我經常陪着甘地在清晨散步。通常這是人們能有机会和他談話的唯一時間，因為一天的其餘時間被分割得很零碎，每分鐘都被安排好去會見某人，或作某事。有時，甚至清晨散步的時間，也被用來接見通常是來自國外的訪問者，或者為了私人問題前來請教的朋友。我們談到很多關於過去、現在、特別是將來的問題。我回想起某次談話中，他對國大黨前途的一種看法，使我很驚訝。我以為，在獲得自由以後，像目前這樣的國大黨將自行消滅，而他卻認為國大黨在下列條件下應該繼續存在，即：國大黨通過一項自我約束的條例，規定所有黨員不得在國家機關中接受一個有報酬的職務；如果任何人想在國家機關中獲得這樣一個擁有權力的職位，必須退出國大黨。我現在回憶不起他怎樣產生這種想法，但是蘊藏在這種主張後面的全部思想，就是認為國大黨處於超然無私的地位，能夠對行政機構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門施行巨大的道義上的壓力，從而督促它們不脫離正軌。

這是一種奇異的想法，令人難以理解，而且它本身也有許多困難。在我看來，這樣一種組織——如果能夠設想的話——將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所利用。能夠實行與否，暫且不論，但它確實能幫助人們了解甘地的一些思想背景。甘地的思想和現代政黨的概念完全相反，因為現代政黨的建立，其目的在於奪取政權，以便按照

某种預定的計劃去改造政治和經濟機構；另一方面它和今天常見的这样一种政党的概念也截然不同，因为这种政党的活动像湯納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尽量用恩惠收买人。

甘地对民主政治的概念确实是唯心的。它和通常意义的人数、大多数或代議制毫無关联。它建筑在服务 and 牺牲的基础之上，并且主張使用道义上的压力。在最近一次談話中[⊖]，他为民主主义者下了一个定义。他自称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我認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貧苦的人們融为一体，渴望自己不比他們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自覺地去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資格这样自称。”他进一步闡述民主政治說：

“應該認識到的是，国大党享有一种民主性質的威信和影响，这并非由于它每年开会时所吸引来的代表和来宾的人数，而是由于它作出了不断增長的貢獻。西方的民主政治，如果还未証明已經失敗的話，也正受到了考驗。但願印度以它在民主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就作为明証，来發展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科学。

“腐敗和虛伪不應該再像今天那樣不容置疑地成为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應該將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够代表他們想要代表的那些人的精神、希望和志願的話，那末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我認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發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給人們，而必須来自內部。”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这的确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但很奇怪，它和共产主义者对民主政治的概念，却有些类似，因为后者

⊖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

也帶有形而上学的色彩。有些共产主义者自称能代表群众的真正需要和願望，即使群众本身可能对他們都不了解。對他們來說，群众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他們所要代表的恰恰就是这种概念。但是兩者类似的地方畢竟有限；在見解和途徑方面，特别是在方法和暴力方面，却存在着較大的差异。

不論甘地是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确实代表了印度的农民群众；他是千百万人民自觉的和潜在的意志的精华。也許，他不仅是代表而已，而是这些千百万广大人民理想的化身。当然，他不是普通的农民。他是一个具有最深邃的智力、优美的情操，高雅的趣味和廣闊的眼界的人。他練达人情，然而本質上却是个苦行者，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感情，使他們升华起来，納入精神境界。他是一个巨人，像磁鉄似地吸引着人民，博得热烈的爱戴和皈依——所有这些特点与一个农民毫無共同之处；同时也絕非一个农民所能比拟。然而，他又是一个偉大的农民，以农民的观点去观察事物，以农民的蒙昧去对待人生的某些方面。但是，印度是农民的印度，因此，他对他的印度了如指掌，感应着它最微弱的波动，能够准确地、几乎本能地判断形势，并且擅長在最恰当的心理时机采取行动。

不仅在英国政府的眼中，并且在他自己的人民和他最亲密的人們的眼中，他都是一个疑問和謎！今天，也許在別的国家中，他已經过时了，但是印度似乎还理解，至少还欣賞这种高談罪惡、超脫和非暴力主义的屬於宗教上先知类型的人物。印度神話充滿了偉大苦行者的故事。他們以严格的自我牺牲以及强加諸自身的苦修，筑起一座“善行的山”，威胁到一些小神的統治，并且顛复了現存的秩序。当我看到甘地那种从某些取之不尽的精神来源产生出

来的惊人的精力和内在的力量时，我常想起这些神话。他显然和世界上的凡人迥然不同，他是一个与众不同，尘世罕见的人物。当他注视我们的时候，他的眼中常常射出一种不可知的神色。

印度，即使是城市的印度、新的工业的印度也带有农民的烙印。它很自然地将这个和它如此相像而又如此不同的儿子当作一个偶像和爱戴的领袖。他使古老而行将遗忘的回忆复活起来，让印度瞥见它自己的灵魂。被目前这种深重的灾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印度，企图从对过去及将来的微弱的哀诉和渺茫的幻想中，求得解慰。而他却在这时凛然出现，将希望带给它的心灵，把力量贯注到它遍体鳞伤的躯体上，因而前途变成了诱人的图景。像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真纳斯一样，它既回顾过去，又瞻望将来，设法将两者融为一体。

我们许多人已经摆脱了这种农民观点，对旧的思想、习惯和宗教已经感到陌生。我们自命是现代人物，从“进步”、工业化、较高的生活水平和集体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认为农民观点反动，有些人赞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这类人的数目还在增加。我们怎样在政治上追随甘地，在许多场合下，变成他的忠实的信徒？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对于不认识甘地的人，任何回答也不可能使他满意。个性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东西，是一种能够控制人们灵魂的奇异力量，而甘地却有这种丰富的力量。对于所有前来接近他的人，他时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吸引人们，但是归根结蒂，还是理智上的信服使人们和他接近，并使他们和他结合在一起。他们不同意他的人生观，甚至他的许多理想。人们往往是不了解他的，但是他所建议采取的行动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并在理智上能为人们了解和领会。在我们软弱的政治所造成的那种懈怠的

長期傳統下，任何行動都會受到歡迎。帶着道義光芒的勇敢而有效的行動，不論對於人們的理智和感情，都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他一步步地使我們信服行動的正義性。我們追隨着他，雖然，我們並不接受他的哲學。將行動和導致行動的思想分割開來，也許不是一個恰當的辦法，以後會引起精神上的鬥爭和痛苦。我們模糊地希望，既然甘地在本質上是一個主張行動而對變幻的環境又很敏感的人，他會沿着我們認為正確的道路前進。無論如何，直到現在，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如果將來要分道揚鑣，那末現在便去想它也很愚蠢。

這一切表明我們在思想上對這些問題並不清楚明確。我們常常覺得，雖然我們可能更合乎邏輯，可是甘地比我們更了解印度。一個能博得這種熱烈擁護和愛戴的人，本身必定具有某種符合群眾需要和願望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說服他，我們覺得同樣可以說服這些群眾。按照實際情況看來，似乎可能將他說服，因為儘管他有農民觀點，他是一個天生的反抗者，一個主張巨大改變的革命家，任何對於後果的恐懼都不能阻擋他前進。

他對我們懶惰和人心渙散的人民進行了教育，促使他們工作，他不是使用強迫的辦法或物質上的引誘，而是用和藹的表情，溫柔的語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樣！遠在一九一九年印度堅持真理運動的初期，我記得孟買市的吳瑪·索巴尼稱他為“受愛戴的奴隸頭”。從那時到現在的十幾年以來，變化多端。吳瑪沒有能夠活到現在，目睹這些變化。但是我們這些比較幸運的人卻能夠懷着歡欣鼓舞的心情從一九三一年頭幾個月回顧既往。一九三〇年，對我們來說，確是充滿奇蹟的一年，而甘地似乎以魔術師的玄妙手法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貌。沒有人會愚蠢地認為我們已經最後戰勝了英

国政府。我們欢欣鼓舞的情緒和政府沒有多大关联。我們對我們的人民，對我們的婦女、青年、兒童在運動中的表現感到驕傲。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收獲，在任何時間，對任何人民來說，都是值得珍惜的；而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受奴役和受壓迫的民族來說，更加值得寶貴。我們熱望這種收獲永遠也不會消失。

甘地一向對我個人異常親切和關懷，我的父親的病故促使他對我特別接近。他經常耐心地听取我的意見，盡量滿足我的希望。這確實使我感到，也許我和幾個同事能夠繼續不斷地影響他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他自己說過，當他摸索到這樣一條道路時，他準備一步步地走去。當時，我覺得他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基本的社會主義立場，因為在我看來，要擺脫現行制度下的暴力、邪惡、浪費和痛苦，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道路。他不同意的可能是方法，而不是理想。當時，我那樣想，但現在我認識到，在甘地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目標之間，還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讓我們重新來談一下一九三一年二月間德里的情況。甘地一歐文會談一直未停，後來便突然停止。甘地接連幾天沒有接到總督的邀請，我們覺得會談已經破裂。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準備離開德里，回到他們各個省去。在離開以前，我們共同會商未來的計劃及和平抵抗運動（理論上還在繼續進行中）。我們確信只要會談的破裂明確宣布以後，我們再沒有機會見面和共同會商。我們等候逮捕。我們聽說，而且似乎也可能，政府將對國大黨展開凶猛的攻勢；這種進攻比我們直到目前所遭受過的要猛烈得多。因此，我們舉行了在我們看來是最後一次的會議，通過了在將來指導運動的各項決議。其中有一項決議具有一定意義。直到現在為止，遇到代理主席被捕時，往往由他指定接任人選，同時對工作委員會內

的空額也采取同样指派人选的办法。代理工作委员会很少展开工作，同时，对任何事情，也很少有权采取主动，唯一能办得到的事情便是进监狱。然而，这种办法经常带有一种危险性，即：这样继续不断的辗转接替，可能使国大党丧失了正确的立场，这样，它将面临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因此，德里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来不再指派代理主席或代理委员。只要原来的委员会中委员们（或委员）还未被捕入狱，他们就执行全委员会的职权。当他们一齐被捕入狱，便不再有执行职务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带点夸张的口气宣称，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委员会的职权将授予全国各个男女，我们号召他们毫不妥协地斗争下去。

这个决议，对于继续进行斗争来说，是一个大胆的指示，同时也没有留下妥协的漏洞。这个决议也考虑到，我们总部和全国各地保持接触，并且经常向它们发出指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知名之士，他们都公开地进行工作，随时随地会被捕。在一九三〇年，曾经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网，靠它发出指示，收回报告并进行视察工作。这种办法进行得很顺利，说明我们能够很成功地组织这类秘密情报工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不适合我们的公开运动，同时甘地对此也表示厌恶。在总部未发出指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将继续进行工作的责任委托给各地人民，否则他们会无可奈何地专等上级的指示而不进行工作。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会发出指示的。

因此，我们通过了这项决议以及其他决议（由于后来的事变，一项也没有发表或生效），并整装待发。正在这个时候，欧文勋爵又来邀请，会谈继续进行下去。

三月四日晚上，我们等候甘地从总督官邸回来，一直等到半

夜。他在清晨二時左右回來了，喚醒了我們，說已達成一項協議。我們看了草案。我對草案的條款大部已經了解，因為我們時常討論它，但是就在这个草案的開頭，有關保證等問題的第二條[⊖]使我大為震驚。我對這項規定毫無思想準備，當時我無話可說。接着，大家都去睡了。

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木已成舟，我們的領袖既然已經束縛了自己，即使我們不同意，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把他推翻？和他決裂？宣布我們的分歧？這樣做可能使個人得到一些滿足，但對最後的決定，並無影響。和平抵抗運動至少暫時是停止了，因為當政府能夠宣稱甘地已經同意了一項協定的時候，甚至工作委員會現在也不能將它推動起來。我和其他同事十分願意中止和平抵抗，並和政府達成暫時的協定。我們誰也不願意將我們的同志送回監獄，或者由於我們的緣故而使得幾千個被關在獄中的人不能出來。監獄並不是我們過日子的好地方，雖然，我們可以訓練自己去適應它的環境，對它的種種折磨處之泰然。此外，甘地和總督進行三周多的談話，這使全國人民相信，協議不久即可以達成，而最後的決裂必然使大家失望。因此，我們工作委員會全體人員堅決贊同達成臨時和解（顯然不能再進一步），假如我們並不因此而喪失任何重要的陣地。

對我來說，我對引起大的爭端的許多問題，並不關心。有兩個問題比一切其他問題更使我感到興趣。第一是我們獨立的目标決

⊖ 德里協定（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第二條：“關於憲法問題，未來的討論範圍（在陛下政府同意下）指明是進一步考慮在圓桌會議上討論的關於成立印度立憲政府的計劃。在圓桌會議的計劃中，聯邦占一個主要部分；印度的責任和保留，或為了印度利益對下列各項所進行的保證，例如國防、外交、少數民族的地位、印度財政上的借貸和履行義務，亦同樣是主要部分。”

不應該放鬆；第二是协定對我們聯合省農村形勢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的抗租抗稅運動得到了巨大勝利，某些地區簡直沒有收到稅。農民情緒高漲。世界農業情況和農產品價格每況愈下，農民無力繳付稅款。我們的抗稅運動是具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性質的。如果我們和政府達成臨時協定，和平抵抗運動必將中止，抗稅運動的政治基礎亦將消失。但是，經濟方面的情況、價格的猛跌以及許多農民無力繳納稅款的情況，又怎樣辦？甘地將這點明白地告訴了歐文勳爵，表示抗稅運動雖將中止，但是我們不能勸導農民繳納無力負擔的稅款。由於這個問題是屬於地方性質的問題，因此，不能和印度政府詳細討論。但它向我們保證各省政府將樂於和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並願盡一切力量來減輕農民的痛苦。這是一個空洞的保證，但在那種情況下，也難于得到更加明確的保證。因此，這個問題暫時就這樣處理了。

另外一個有關我們的目標的重要問題——我們的獨立問題——依然存在。我從協定的第二條中看出，甚至這點也似乎岌岌可危。難道我國人民一年來的英勇奮鬥不就是为了這個目標嗎？難道我們一切英勇的言行就這樣結束了嗎？一再重復的國大黨的獨立決議和一月二十六日的誓言也就這樣完結了嗎？那是三月里的夜晚，我躺在床上沉思，心中無限空虛，感到好像已經失掉某種珍貴的東西，而且几乎是無法挽回。

“世界就這樣地完結，
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嗚咽啜泣。”



第三十五章 喀喇蚩大会

甘地間接地了解到我的苦惱，第二天早晨約我陪他散步。我們作了一次長談，他企圖使我信服我們并未喪失任何主要權益，同時也絲毫沒有放棄原則。他對協定的第二條進行了一種特殊的解釋，使它符合於我們的獨立要求，他主要是依靠第二條中“為了印度的利益”這幾個字。這種解釋，在我看來，是很勉強的，因此不能說服我，然而他的談話却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協定的優點，暫時撇開不談。我告訴他，像他這樣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做法使我驚異不止；從而使我感到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種未知的因素。雖然我們十四年來保持着最密切的關係，然而我對於這種因素却一點也不能理解，這使我感到十分擔憂。他承認在他身上確實存在着這種未知的因素，並且表示自己無法加以控制，同時也難以預測它的後果。

一兩天內，我猶豫徬徨，無所適從。當時已談不到反對或阻止締結那個協定，因為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理論上和它脫離，雖然事實上是接受了。這樣做法可能使我個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但對較大的問題又有何幫助呢？如果爽爽快快地接受既成事實，同時像甘地那樣對協定進行最有利的解釋，那豈不是更勝一籌嗎？甘地在緊接着協定締結以後會見記者時，便強調這種解釋，同時也強調我們完全維護獨立。在他會見歐文

勋爵时，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因此，不论在当时或未来都不致引起误解。他还向欧文勋爵声明，如果国大党派遣任何代表出席圆桌会议，它只能根据这个基础，并且还要提出这个要求。欧文勋爵当然不能承认这个要求，但承认国大党有提出这个要求的权利。

因此，在我经过很尖锐的思想斗争和肉体痛苦以后，决定接受协定，并且全心全意地为它而工作。在我看来，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

协定前后，在甘地和欧文勋爵进行会谈的过程中，他曾经吁请释放和平抵抗运动囚犯以外的政治犯。和平抵抗运动的罪犯，根据协定本身的规定，将被释放，但是另外还有几千人，包括审讯后判罪的以及未经过控告、审讯或判罪而被监禁的政治犯，还留在狱中。这些政治犯中许多人被这样监禁了好多年。全印度，特别是深受影响的孟加拉省，对于这种不经审讯而予以监禁的措施一直感到非常愤慨。像“企鵝島”中（说不定是在“德雷福案”中）的参谋总长一样，印度政府相信没有证据便是最好的证据。没有证据就使人无法反证原证的不确。政府认定这些政治犯是属于激烈类型的实际的或可能的革命分子。甘地吁请将他们释放，但并不坚持要将此列入协定中，而是由于感觉到为了缓和政治紧张局势，同时使孟加拉省的气氛更加正常起见，迫切需要释放他们。但是，政府对这点不能同意。

政府也不同意甘地坚决吁请减免巴格特·辛格的死刑。这点也和协定本身无关，甘地单独提出这个坚决要求，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印度人民的情绪都很激昂。但是他的呼吁毫无结果。

我回想起约在这时发生的一件怪事，使我深入了解到印度恐怖集团的心理状态。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出狱后不久，我父亲去世

的前后几天。一位陌生的客人到我家来拜訪我，自称是昌德拉錫克哈·阿薩德。我以往从未見過他，但远在十年以前，却曾經听到过他的名字。在一九二一年不合作运动时，他参加运动，脫离了学校，被捕下獄。当时，他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監獄中，由于違反了某种紀律而受到鞭撻。后来，他逐渐投靠恐怖分子，成为印度北部恐怖分子中的著名人物之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籠統地听人傳說的，我对这些流言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当我接見他时，感到出乎意外。由于我們的釋放使全国普遍期待政府和国大党可能达成某种協議，因此，促使他来看我。他想了解，如果和解实现以后，他的集团是否能够得到任何和平生活。他們是否还会被当作不法之徒来看待？是否还会对他們四处悬賞追捕？使他們永远处在被判絞刑的威胁中？是否能够准許他們从事于和平的職業？他向我表示，就他本人以及他的許多同伙的情况來說，他們現在已經相信純粹的恐怖手段是徒勞無益的。但是，他也不会相信印度可以完全依靠和平的手段获得自由。他認為在未来的某个時間內將會發生剧烈的冲突，但这并不是恐怖主义。就印度的自由問題來說，他已經否定了这种恐怖主义。接着，他又問我，由于他一直受到通緝，沒有机会安定下来，今后如何是好。据他所說，最近發生的許多恐怖行为，完全是出于自衛。

我很高兴从阿薩德那里了解到人們对于恐怖主义的信念已經逐漸消失，关于这点，后来我也得到了証实。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集团的观念，事实上的确已經成为过去。个别偶發的行动，也許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报复行为或个人失常，而不是导源于普遍的概念。当然，这不是說原来的恐怖分子和他們的新伙伴已經轉变成非暴力主义的信徒，或是英国統治的崇拜者。但是，他們已經

不像以往那样从恐怖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我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确实存在着法西斯思想。

我企图向阿萨德解释我的政治活动的哲学，并设法使他信服我的见解。但是，我没有回答他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现在他将怎么办？按照实际情况看来，大概不会出现什么新的局面，从而能够使他或他的同伙得到任何和平安定的生活。我所能提出的建议只是：他应该利用他的影响去防止将来再发生恐怖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只能对更大的事业以及他自己的集团造成损失。

两三周以后，当甘地—欧文会谈正在进行时，我在德里听说阿萨德在阿拉哈巴被警察开枪击斃。他白天在公园里被人认了出来，受到大队警察的包围。他企图以一棵树作为掩护来保卫自己；双方开枪，他在打伤一两个警察以后，被警察打死。

我在临时协定达成以后不久，便离开德里，前去勒克瑙。我们立即采取步骤来停止全国的和平抵抗运动。整个国大党组织都以惊人的纪律性响应了我们的新指示。在我们队伍中有许多人表示不满，还有许多煽动家，因而我们无法迫使他们停止以往的活动。但是就我所知，广大的组织毫无例外地在行动上接受了新的任务，虽然也有许多人对这点提出了批评。我们对本省的反应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抗税运动在本省某些地区正在壮大。我们首先的任务是使和平抵抗运动的囚犯获得释放。每天都有几千人被放出来，不久以后，只剩下一些悬而未决的案件，属于这类的囚犯还留在狱中。当然，被释放人员中并不包括几千个政治犯以及由于进行激烈活动而被处徒刑的囚犯，他们尚未得到释放。

这些获得释放的囚犯，当他们回到家乡时，自然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悬旗结彩、举行游行集会以及发表演说和致欢迎词都

是常有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很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和以往相比，这种变化就显得很突然，那时候警察經常帶着木棍，强迫解散集会游行。警察感到有些不安，也許因为在我們許多从監獄出来的人中間，产生了一种胜利的情緒。这种胜利的情緒沒有多大理由，但是人們出獄总会产生一种兴奋的情緒(除非这种情緒在獄中已被摧毀)，而当大批人被釋放时，这种兴奋的情緒会更加高漲。

我在这里提到这个事实，因为政府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这种“胜利的姿態”，产生了很大的反感，竟然作为一种控訴向我們提出！这些人生長在并且一向生活在惟我独尊的气氛之中，他們頭腦中对政府的概念便是武力压迫，他們在人民中間既無基础也無支持者，对这些人來說，再沒有比削弱他們所念念不忘的威信更使他們痛苦的了。就我所知，我們从来沒有考虑过这个問題，因此，当我们后来了解到政府官員从上到下对人民这种傲慢态度充滿憤怒，并認為他們的尊嚴受到損伤的时候，感到非常驚訝！作为政府喉舌的那些報紙至今对这个問題还未罢休。即使在事过境迁已經三年半的今天，他們談到那些無法無天的日子，几乎还是余悸未尽；按照他們的說法，当时国大黨員得意洋洋地来来往往，好像他們获得了一个偉大的胜利。政府以及它的新聞界的朋友們的这种叫囂，給我們一种啓發，它說明了他們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狀態之中，又忍受着什么样的自我克制，結果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复杂心理狀態。我們同志們举行了若干次游行，發表了一些演講，竟然会使他們受到这样的刺激，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事实上，当时在国大党一般黨員中間，并不存在着“打敗”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想法，在領導方面更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但是，我們对于本国人民的牺牲和勇敢，却产生了一种胜利的感觉。我們对

于全国人民在一九三〇年所采取的行动,有点兒感到驕傲;它加强了我們的自尊心,給我們帶來了信念,即使我們中間最小的志願隊員一想到这里,也会挺起胸膛,昂起头来。我們同时还感到这种引起举世矚目的偉大努力,曾給英国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使我們更加接近我們的目標。所有这一切,与打敗政府毫不相干,事实上,我們許多人充分了解到政府在德里协定中还略占上風。我們若干人指出說,我們距离自己的目标还很远,前面还存在着艰巨的斗争,結果还被政府的朋友指責为战争販子,并責备我們違反了德里协定的精神。

在联合省,我們現在面临着农村問題。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和英国政府合作,因此,我們立刻和联合省政府进行接触。經過一个漫長的时期之后——十多年来,我們沒有和他們商談过公事,我拜訪了本省的一些高級官員,和他們討論农村問題。我們并且就這個問題彼此写过許多信。国大党省委員会任命領導人員之一——哥文·巴拉·潘特为特別聯絡人員,經常和联合省政府保持着联系。农村危机、农产品价格的猛跌以及一般农民無力繳付租稅等事实为政府所承認。問題是應該怎样减少,这方面的主动权操在省政府手里。一般說来,政府只和地主打交道,而不和他們的佃农接触,因此,租稅需要地主来減輕或者免除。但是,如果政府不免除地主一部分租稅,地主也拒絕免除他們佃农的租稅。無論如何,他們对于减免佃农的租稅向来是不热心的,因此还是需要政府来作决定。

国大党省委員会通知农民,抗稅运动已經結束,他們应尽自己的力量繳付租稅。但是委員会作为他們的代表,曾經要求大量免租。政府在長時間內沒有采取行动。也許由于省督馬尔科姆·海

萊爵士休假或負有其他特殊使命的緣故，这件事情受到了阻碍。实际情况需要迅速的深入的行动，但代理省督及其僚屬迟迟不願就這個問題表明态度，而宁願將它擱起，等到馬·海萊爵士夏天回来以后再說。这种迟疑不决和拖延的态度使得原本困难的局面更形惡化，結果使佃农受到了很大痛苦。

德里协定以后，我的健康稍失常态。在監獄时，我已感不适，接着，父亲去世所帶來的震动，以及德里談判期間的長期緊張，对我健康的影响确实是太大了。但在我去参加喀喇蚩大会时，我的健康略有恢复。

喀喇蚩远在印度的西北部，交通不便，一部分地区被沙漠地帶將它和全国其余地区隔开。但是它却从远方吸引来广大的人群，真正代表着当时全国的情緒：对于日益增長的印度民族运动的力量产生了一种鎮靜而深刻的滿意心情；对于一直能够胜任愉快地响应向它所提出的重大号召，并且能够以服从紀律的牺牲精神充分尽到責任的国大党組織，感到驕傲；对于我们人民树立了一种信心；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并不过分的欢騰情緒。另一方面，又对摆在我們前面的巨大問題和危險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責任感；我們的言論和決議現在都成为全国性的行动的先声，因而，不能輕易發表或通过。德里协定，虽然为絕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并不得人心；人們惟恐这种协定会使我們对局势进行各式各样的妥协，因为它似乎模糊了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各种問題的明确性。在大会开幕的前夕，巴格特·辛格被处决，这是激起大会人員憤懣情緒的一个新因素。这种情緒在印度北部特別显著，而喀喇蚩由于在北部，因此，从旁遮普省吸引来了广大的群众。

甘地在喀喇蚩大会上比在以前任何一次大会上获得了更大的

个人胜利。大会主席薩达尔·瓦拉拜·巴特尔是印度最著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并且由于他在古甲拉特的领导获得成就而享有威信，但是在大会上还是甘地最出风头。出席大会的还有一大队由阿卜杜尔·加法·汗率领的从边省来的紅衫党很受欢迎，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总博得人们欢呼，因为印度人民对他们从一九三〇年四月以来在巨大挑衅面前所表现的那种奇异的、鎮靜的勇敢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紅衫党这个名称使有些人誤以为他们是共产党或左派劳工。事实上，他们的名称是“真主的僕人”。这个組織和国大党联合起来（后来，在一九三一年，他们成为国大党組織的組成部分）。他们之被称为紅衫党，完全是由于他们穿着相当原始的紅色制服。他们的綱領是民族主义性質的，也涉及到社会改革，但未包括經濟政策。

喀喇蚩大会的主要決議是关于德里協定和圓桌會議。由于決議是从工作委員會中产生的，我当然予以接受。但是当甘地請我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动議的时候，我犹豫不决。由于它違反我的心願，我最初加以拒絕，接着便又感到这似乎是一种軟弱而难令人滿意的立場。我應該表示贊成或反对，而不應該拖延不决，使人们紛紛猜測。几乎就在最后一刻，距离決議將被提到大会上去的前几分鐘，我才决定將它提出。在我的演說中，我向會場上的广大人群坦白陈詞，說明我的感受，以及为什么我全心全意地接受那个決議，并吁請他们也予以接受。那篇演說，是临时乘兴从内心傾吐出来的，在措辞方面毫未加以修飾，但結果比我平时仔細准备的許多其他演說都要成功得多。

关于其他決議，我也曾發表演說，特别是关于巴格特·辛格的決議和关于基本权利及經濟政策的決議。后者使我特別感覺兴

趣，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包含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反映出国大党内的一种新的见解。直到现在为止，国大党仅仅考虑到民族问题，并且除了一般鼓励农村手工业和国货运动外，一向避免接触经济问题。在喀喇蚩大会决议中，国大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很短的一步，主张将重要的工业及服务性的事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贫苦人们的重担，相应地增加富有的人们的负担。但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几乎对那个决议的所有内容，都能轻易地接受下来。

这个温和而平淡无奇的决议显然使得印度政府那些大人物在绞尽脑汁地加以猜测。也许，他们甚至会像平时那样独具慧眼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金钱暗暗地流入了喀喇蚩大会，收买了国大党的领袖们。他们生活在一种狭窄的政治圈子里，和外界完全隔离，同时四周为一种秘密的气氛所包围，因此，他们在接受事物方面，总是喜欢倾听神秘的和虚构的故事。接着，这些故事，通过他们宠信的报纸，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零星点滴地透露出来，并且暗示只要揭开幕帷，还能够看到更多的内幕。他们时常以这种经过政府同意的熟练方式来谈论喀喇蚩大会关于基本权利的决议。据说某个与共产党有关的神秘人物草拟了这个决议，又说决议中较大的一部分内容在喀喇蚩大会上强迫我接受，然后我便向甘地提出最后通牒，要他接受，否则他就会在德里协定问题上遭到我的反对，而甘地为了笼络我，只好接受下来，在大会闭幕那天，强迫议案委员会和大会予以通过。

就我所知，这位“神秘人物”的名字并未直接提出来，但无数的暗示也说明了他究竟是誰。由于我自己不习惯采用神秘的、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我觉得不妨说出这位人物，他似乎就是蒙·勒·

劳。如果讓在西姆拉和德里的大人物們了解劳以及任何其他帶有“共产主义傾向”的人們对于那个純潔的喀喇蚩決議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倒是一件有益的事，并且也会引起別人的兴趣。他們可能感到驚訝，假如他們了解任何一个像劳那样的人物对于決議表示相当蔑視，因为在后者的眼光中，这个決議是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的典型产物。

就甘地先生來說，我很荣幸地能在以往十七年中对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至于談到我向他提出最后通牒并和他討价还价，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可能互相迁就；在某个特殊問題上也可能产生分歧，但在我們相互关系上，絕對不会采取市場上那种討价还价的方式。

我們早就准备使大会通过这种性質的決議。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好几年来就鼓动过这件事情，并企圖促使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接受一个社会主义的決議。在一九二九年，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經使得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原則。接着，便發生了和平抵抗。在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当我在德里每晨和甘地散步时，在談話中我曾提到這個問題。他贊成在經濟問題上应有一个決議，叫我在喀喇蚩大会上提出這個問題，并起草一个決議案，然后交給他审閱。我在喀喇蚩大会上照他的囑咐做了，他又提出各种修改和建議。他希望我們兩人在提請工作委员会审查以前，能在措辞方面取得一致意見。因此，我不得不草拟好几个草案，这就耽擱了好几天，并且別的事情使我們也很忙碌。最后，甘地和我同意了一个草案，提交給工作委员会，后来又送到議案委员会。对議案委员会來說，这的确是一个新議題，有些議案委员会委員感到惊异。然而，議案在委员会及大会上都順利地得到通过，嗣后轉給国大党全

印委員會，讓它按照議案的規定作進一步的闡述和補充。

当我起草这个議案时，有时我向那些經常到我篷帳里来的各种人物征求意见。但是劳和此事毫無关系，因为我很明白他对議案不会贊同，而且还会耻笑。

在我来喀喇蚩的前几天，我在阿拉哈巴遇見了劳。他有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們的住所。虽然我并不知道他还在印度，但由于我在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見過他，因此，立刻認出他来。他在喀喇蚩也見過我，但会面時間可能未超过五分鐘。在以往几年中，劳写过許多文章，从政治上来对我进行攻击，时常也使我受到一些損失。在我們之間，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見，然而我还是为他所吸引。后来，当他被捕，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尽我微薄的力量（确实是很微薄的力量）去給他帮助。我为他所吸引，因为他具有惊人的智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孑然一身，为所有的人所抛弃。英国政府对他当然追捕；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他也不感兴趣；而在印度自称为共产党的人們又斥責他是叛徒。我知道他在苏联住过多年，和共产国际有过密切关系，以后便跟他們脫离，也許是被迫脫离。其中經過我从前不知道，至今还是不清楚，只是模糊地了解他現在的見解，以及他和正統的共产党員之間的分歧。但是，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几乎被一切人所抛弃，使我感到难受，因此，我違反自己一向的習慣而参加了“辯护委員會”。从一九三一年夏天以来，距离現在已有三年多的時間，他一直在獄中，被單獨監禁，身体也不很好。

喀喇蚩大会的最後一項議程就是选举新的工作委員會。这本来由国大党全印度委員會选出，但根据慣例，現任主席的建議（和甘地、有时和其他同事会商以后方始提出）將被全印度委員會采納。在喀喇蚩大会上进行的工作委員會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意外的

結果，当时，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全印委员会里有些穆斯林委員反对这个选举，特別反对其中一个提名（穆斯林）。也許，他們因为他們的集团無人被选中而觉得受到輕視。在一个包括十五个委員的全印委员会中，显然不可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而真正的爭执完全是屬於旁遮普省个人的和地方性的問題，其中情况我們并不了解。結果，那个表示异議的集团逐渐地离开了旁遮普的国大党，加入了一个“阿拉尔党”。旁遮普省的一些最活躍、最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工作者也参加了这个組織，并拉去許多旁遮普省的穆斯林。这个組織主要是代表中产階級下層分子，和伊斯蘭教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成为一个强大的組織，比那个老弱的代表上層分子的伊斯蘭教教派組織要强大得多，因为后者沒有基础，徒有其名而已。阿拉尔党不可避免地会傾向教派主义，但是由于他們和广大伊斯蘭教群众保持接触，因而成为一个帶有模糊的經濟观点的活躍团体。他們后来在印度各省，特別是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克什米尔，經濟惡果和教派主义很奇怪地而又很不幸地混淆在一起。阿拉尔党的一些領袖退出国大党，对于旁遮普省的国大党是一个严重的損失。在喀喇蚩，我們还不了解这点，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才慢慢地認識到。当然退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国大党工作委員會选举不滿。那仅是預示嗣后發展的征兆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深刻一些。

當我們大家都在喀喇蚩的时候，傳来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康波尔發生暴动的消息，接着又接到格·斯·維雅西被害的报告。維雅西是在准备帮助暴民时被害的。这些恐怖而野蛮的暴动是非常惡劣的，維雅西的死比任何問題更足以証明这一点。国大党中了解他的人很多，对于我們联合省所有的人來說，他是最亲爱的同

志和朋友。他勇敢無畏，富有遠見而又足智多謀，从不氣餒，埋頭苦干，不求名位，不出風頭。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他自願將他的生命貢獻於他所熱愛並為之服務的事業，但現在愚蠢之徒竟然奪去他的生命，使康波爾及該省喪失了一顆最燦爛的寶石。當噩耗傳來時，喀喇蚩的聯合省本部被抹上一層陰影，光榮似乎已經消逝。但是，他如此堅決地面對死亡，而又死得如此光榮，使人為他感到驕傲。



第三十六章 南方休假

我的医生竭力劝我稍作休养，并出外换换环境，因此，我决定到錫蘭去住一个月。印度虽大，但并不能使人真正得到机会去改换一下环境，或者得到精神上的休息，因为不论我走到哪里，我总可能遇见共同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们，而那些老问题又会缠住我。錫蘭是距离印度最近的地方。于是，我便和我的妻子卡麦拉及女儿英迪拉到錫蘭去。自从我们在一九二七年由欧洲归来以后，这是我第一次休假，也是我和我的妻子、女儿第一次安静地共度假期，而很少受到打扰。此后，再也没有遇到这种休假机会，有时，我怀疑是否将来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在錫蘭，除了在魯瓦拉·埃利耶度过两周外，我们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好好的休息。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对我们的款待和友情，简直使我们应接不暇。这一切善意使人感到很愉快，但有时也令人不安。在魯瓦拉·埃利耶，成群结队的劳动者、茶园工人等每天步行许多英里路，来到我们这里，带来了情意深厚的礼物，例如野花、蔬菜和自制的牛油。通常，我们甚至不能一同交谈，仅只相视微笑。我们的小屋里充满了他们从贫困生活中节省出来的宝贵礼物。我们将这些礼物转送给当地的医院和孤儿院。

我们游览了錫蘭島上许多名胜古迹、佛教寺院以及茂盛的热带森林。在安紐拉哈布拉寺院，我非常喜爱一尊古老的释迦佛坐

像。一年以後，當我在台拉·頓監獄時，在錫蘭的一位朋友寄給我一張這尊佛像的照片。我將它放在我的囚房里小桌子上，它成為我敬愛的伴侶。佛像那種剛毅寧靜的容貌使我得到安慰，並給我力量，幫助我克服了多次的意志消沉。

釋迦佛一直對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對於這種吸引力，我覺得難以分析。但是，這不是宗教方面的吸引力，我對佛教的教義並不感覺興趣。吸引我的是他的人格，正如基督的人格非常吸引我一樣。

我在寺廟里和公路上，遇見許多佛教僧人，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受到尊敬。幾乎他們所有的人的突出表情都是流露在臉上的那種安詳和寧靜、那種超脫塵世憂慮的表情。一般說來，他們的臉上並不帶着智慧，在他們的容貌上看不出內心劇烈鬥爭的痕迹。對他們來說，人生好比是一條平靜的河流，慢慢地流入大海。我帶着一些羨慕的心情看着他們，心中微微興起一種念頭，渴望能找到一個地方，躲避人事的紛紜。但是我很明白我的命運和他們不同，注定要在暴風驟雨中度過這一生。對我來說，人間根本找不到一個避難所，因為我內心的激動正如外面的狂風暴雨那樣猛烈。假如我偶然發現自己在一個安全的海港里，不再受到狂風的襲擊，難道我在那裏會心滿意足嗎？

在短暫的時間內，海港是很可愛的。人們能夠躺在沙灘上幻想，陶醉在迷人的熱帶風光里。錫蘭和我當時的情緒正融成一片，而這個海島的美麗景色也使我充滿了喜悅。我們一個月的假期轉眼便過去了，臨別時，真感到不勝依依。對這個地方和它的人民的許多回憶現在又涌現在眼前；在獄中漫長而空虛的日子里，這些回憶安慰了我的寂寞。有件小事還留在我的記憶中，這事發生在查

夫那。一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攔住了我們的汽車，說了一些表示歡迎的話。这些男孩热情的帶着期待神色的臉望着我們，接着，他們中間有个孩子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劈头便說：“我不会动摇”。那个年輕开朗的臉龐和那双充滿着坚决意志的明亮眼睛，至今还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他是誰；也探听不到他的下落。但我相信他会忠实于他的諾言，当他面临着人生困难的問題时，不会动摇。

从錫蘭，我們前往印度南部，一直走到它南部尖端的科摩林角。那里一切都异常平靜。接着，我們經過了特拉凡哥尔、柯欽、馬拉巴、买索尔、海得拉巴——大部都是印度的土邦，其中有几个是它們中間最进步的，有几个是最落后的土邦。特拉凡哥尔和柯欽在教育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屬印度，买索尔可能在工業方面占先，海得拉巴几乎是一个原封未动的封建遺迹。我們到处受到人民和官方的接待和欢迎，但在欢迎后面，我意識到官方的焦虑，恐怕我們的訪問会使人民产生危險的想法。当时，买索尔和特拉凡哥尔两个邦似乎給予一些公民自由权和政治工作的机会。在海得拉巴，甚至连这点都根本不存在。虽然在我們四周尽是殷勤的招待，但我还是觉得沉悶和窒息。后来，买索尔和特拉凡哥尔政府，甚至撤消了它們以往所許可的公民自由权和政治活动。

在买索尔邦的班加罗尔城，我在一个广大的集会上將一面国旗升到一根巨大的鉄柱上去。我离开当地不久，这根鉄柱被弄得粉碎。买索尔政府將悬挂国旗看作是違法行为。对我升起的国旗竟然这样侮辱和蔑視，使我頗为痛心。

今天，在特拉凡哥尔，国大党甚至已被認為是非法团体，沒有人再能够替它發展普通黨員，虽然在英屬印度，自从和平抵抗运动

停止以來，現在國大黨已經合法存在了。由此可見，買索爾和特拉凡哥爾兩個邦正在摧殘一般的和平政治活動，撤消它們以往所給予的某些便利。它們開倒車了。海得拉巴不需要開倒車，或者撤回這些便利，因為它從來就沒有向前邁進一步，或者提供這種便利。在海得拉巴，政治性的集會從來就沒有舉行過，甚至社會性或宗教性的聚會都被懷疑，必須得到特殊准許才能舉行。那里根本沒有名副其實的報紙。為了防止腐蝕的細菌從外面傳來，許多在印度其他地方出版的報紙，也被禁止入口。這種排斥政策嚴厲到甚至禁止言論穩健的刊物。

在柯欽，我們參觀了所謂“白色猶太”區，看到了在他們古老神堂里舉行的一種禮拜。這個小的居住區是個很古老奇特的居住區，人數日趨減少。據說他們現在在柯欽住的那塊地方，很像古代的耶路撒冷。該地確實有種古色古香的氣氛。

我們沿着馬拉巴海岸還參觀了一些市鎮，當地的居民主要是屬於敘利亞教會的基督徒。很少人了解到：遠在耶穌基督降生以後的第一世紀，早在歐洲接受它以前，基督教便傳到了印度，並且在南印度奠定了巩固的基礎。雖然這些基督徒的宗教領袖在安狄奧契或敘利亞的其他地方，但他們信奉的基督教事實上是土生土長的，和外界沒有多大聯繫。

在南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景教徒地區。他們的主教告訴我說，信奉景教的人共有一萬人。我曾經錯誤地認為景教徒早被其他教派所同化，而不知道他們曾經在印度發展過。據說景教在印度一度曾經得到相當廣泛的信仰，北面一直傳到貝拿勒斯。

我們到海得拉巴去，專門是為了拜訪奈都夫人及她的兩個女

兒——巴德瑪佳和萊拉瑪妮。在我們逗留當地期間，她家里舉行了一次小型的婦女聯歡會，介紹我的妻子和當地婦女見面。卡麥拉顯然是向她們講演。也許，她談到婦女爭取自由、反對男子制定的法律和習慣的鬥爭（這是她最愛談的題目），並勸告婦女們對她們的丈夫不要過份順從。這次講演，在兩三個星期以後，還引起了一場有趣的余波。一個苦惱的丈夫從海得拉巴寫信給卡麥拉說，自從她到該城去過以後，他妻子的行為變得乖張了。她不像以往那樣聽話，使他稱心如意，相反地，却同他爭辯說理，甚至採取一種盛氣凌人的態度。

從孟買乘船前往錫蘭的七周以後，我們又回到了孟買。我立刻重新投入了國大黨政治活動的漩渦。工作委員會開會討論下列重要問題：印度急劇變化的形勢；聯合省農民問題的僵局；阿卜杜爾·加法爾·汗領導下的“紅衫黨”運動在邊省的驚人的發展；孟加拉省處於極其緊張不安、人民憤怒一觸即發的狀態之中；永遠存在着的教派問題；國大黨黨員和政府官員間關於許多問題的地方性的小衝突，互相指責破壞德里協定。最後，還有那個一再提出的問題：國大黨在第二屆圓桌會議開會時，是否應有代表參加？甘地是否應該出席？



第三十七章 休战期間的摩擦

甘地是否應該到倫敦去出席圓桌會議？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但得不到明確的答案。無論是誰，即便是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或甘地本人，不到最后一刻也不會知道，因為這個答案要依靠許多因素來決定，而新的事情又經常使局勢發生新的轉折。在這個問題及其答案後面，存在着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

代表英國政府及接近政府人士的人們一再告訴我們說，圓桌會議已經確定了憲法的綱領，這幅圖畫的主要輪廓已經勾劃出來，剩下來的事情只是對它進行描繪而已。但是國大黨卻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就它來說，這幅圖畫必須在一幅幾乎空白的畫布上從頭描繪。不錯，根據德里協定，關於聯邦基礎的問題已經獲得同意；關於保證的概念也已經得到接受。我們中間許多人很久以來就認為聯邦制是解決印度憲法問題的最好辦法，但是，我們贊成這種辦法並不意味着我們接受第一屆圓桌會議所規劃的那種特殊聯邦制。聯邦制和政治獨立及社會改革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使得保證的概念和聯邦制相吻合，則會產生更大的困難。一般說來，保證的意義就是指主權的實際削減，所幸後面附加的“為了印度的利益”那句話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克服了這個困難，雖然這種辦法也許並不很成功。無論如何，喀喇蚩大會曾經說明：一個可以得到接受的憲法，必須規定全權處理國防、外交和財經政策，以及

在承担債務以前，审查印度对外負債問題（大部分指英国）。而关于基本权利的決議，也指明某些必需实现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所有这一切和圓桌會議的許多決議，以及印度行政方面的現行機構，都是不一致的。

国大党和政府在見解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而在当时看来，很难趋于一致。国大党中很少有人期望国大党和政府能在圓桌會議上达成任何協議。甚至一向抱着乐观看法的甘地，对前途也不存多大希望。但是他从不絕望，决心要努力到底。我們大家都認為不論成敗，繼德里协定之后，必須进行这种努力。但是有兩個重要考虑可能阻碍我們去参加第二届圓桌會議。首先，只有当我们有充分自由在圓桌會議上陈述我們的全部意見，而沒有人以大局已定或其他理由作为借口来阻止我們这样做，我們才去出席。其次，我們也可能受到印度情况的阻碍而不参加圓桌會議。一种导致和政府的冲突，或者使我們面临严厉的鎮压的形势，可能在这里形成。如果印度产生了这种情况，而我們老家失火的話，那末，我們的任何代表，如果不顧家里失火，而在倫敦書生似地高談宪法等等，就会显得莫名其妙。

印度的形势迅速地發展下去，在全国，特别是在孟加拉省、联合省和边省都可以看出这种迹象。在孟加拉，德里协定很少改变原来的情况，緊張局势依然如故，并且每况愈下。有些和平抵抗运动的囚犯已被釋放，但是几千个名义上不屬于这个范畴以內的政治犯还被关在獄中。被拘禁者还繼續被监禁在監獄或拘留所里。新的逮捕也时常發生，罪名是由于發表了“叛乱性的演說”，或有其他政治活动。人們普遍感覺到政府的进攻方兴未艾。对于国大党來說，孟加拉問題，由于恐怖主义的存在，已成为一个極其困难的

問題。和正常的国大党活动以及和平抵抗运动相比，这些恐怖活动，不論在範圍和重要性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們却轟動一時，引起很大的注意。它們還使得国大党的工作在其他許多省份里难以进行，因为恐怖主义造成了一种气氛，不利于和平的直接行动。恐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府最严厉的镇压，而这种镇压对于恐怖分子和非恐怖分子几乎都是一視同仁的。

警察和地方行政当局不会不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別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活动感到不滿的其他人士。許多被拘留者，很多年来，未經过控訴、审讯或判罪而被监禁到現在，可能他們真正犯的罪并不是恐怖活动，而是其他有效的政治活动。他們对任何問題都沒有机会提出証明或反証，甚至还了解他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們沒有在法庭上受过审讯，可能因为警察提不出足以判处他們徒刑的充分証据，虽然，如所周知，英国—印度的反对国家治罪法已經周密得無以复加，使人很难逃脫它們那种严密的法網。时常，一个人由法院宣布無罪开釋，接着立刻重新被捕，此后便当作一个被拘留者看管。

国大党工作委員會会面对着孟加拉錯綜复杂的問題，感到一筹莫展。这个問題經常使它感到棘手，而某些关于孟加拉的事情，又經常以各种形式，被提到它的面前。它尽最大的力量来加以处理，但它也十分了解，問題並沒有真正地解决。因此，它只好相当軟弱地听其自流。就它所处的地位而言，也难說除此以外，它还能做些什么。工作委員會的这种态度在孟加拉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当地产生一种印象，認為国大党领导机关以及其他各省漠視了孟加拉，以致在困难的时刻里，似乎被人遺弃。这种印象是完全錯誤的，因为全印度对孟加拉人民充滿了同情，只是不知道如何將这种同情

变为有效的行动。此外，印度各个部分还必须解决自己的困难。

在联合省，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省政府对这个问题敷衍应付，拖延减租减税的决定，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驱逐农民和扣押财产的情况。当我们在锡兰时，这里的强迫收租曾酿成了两三次农民暴动。暴动本身并不算大，但不幸造成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死亡。甘地曾经去内尼塔尔（也是当我去锡兰的时候）和联合省省督马尔科姆·海莱爵士讨论农村形势，没有多大结果。当政府宣布削减租额时，这与人们的期望也相去甚远，因此，在农村地区，发生了继续不断的并且日益扩大的骚动。随着地主和政府对农民增加压力，几千个佃农被逐出田园，他们微薄的财产遭到没收，因此，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它就会变成大规模农民起义。我想佃农没有任意进行暴力活动，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大党的努力，但是佃农却遭到许多横暴的待遇。

农民这种骚动和遭遇却有光明的一面。由于农产品价格很低，比较贫苦的阶级，包括农民在内，除非他们的财产全部遭到没收，都比长久以来所得到的食物要多。

在边省，如同在孟加拉的情况一样，德里协定并没有带来和平。那里经常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政府对一切都采取军事措施，以特别法律、法令和严厉的惩罚来对待轻微的犯罪。为了反抗这种实际情况，阿卜杜尔·加法尔·汗领导了一个伟大的运动，不久便被政府看作一个可怕的人物。这个身高六呎三吋、年富力强的帕坦人迈开大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去建立“红衫党”的中心。无论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走到哪里，他们总留下了红衫党的痕迹，不久全省都布满了“红衫党”的支部。他们是一个完全和平性质的组织，尽管他们受到含混的诽谤，但是任何一件指责他们施

用暴力的控訴都沒有獲得証實。但是，不管他們這個組織是否是和平的，在他們後面却存在着戰爭和暴力的傳統，同時，他們又處在動蕩不安的邊疆，因此，當一個有組織紀律的運動迅速成長起來，並和印度民族運動保持密切的聯繫的時候，政府感到十分慌張。我並不假定政府一直相信它的和平的、非暴力主義的事業。即使他們相信，他們對它還是產生一種恐懼和煩惱的反應。它代表着很大的實際和潛在的力量，因此，政府很難冷靜地去看待它。

這個偉大運動的眾望所歸的領袖是阿卜杜爾·加法爾·汗——他又被人稱為“阿富汗人之光”，“帕坦人之光”以及“邊省的甘地”。他在邊省極孚眾望，因為他沉着地、堅持不懈地進行工作，不怕困難，也不畏懼政府所採取的行動。他根本不是通常所謂的政治家，他對政治上的機巧權術一無所知。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光明磊落的人，厭惡無謂的紛擾和空談，期望在印度獲得自由的前提下，使邊省人民也獲得自由，但是對於憲法及法律上的討論則不甚了解，也不發生興趣。不管為了達到什麼目的，必須採取行動，甘地教導人們使用一種和平的行動方法，使他感到興趣。為了行動，必須進行組織工作；因此，他不再辯論，也沒有對他的組織草擬出許多規章，便開始去進行組織工作，結果，得到顯著的成就。

他特別接近甘地。最初，由於他的拘謹並且不願拋頭露面，他和甘地並不接近。後來，他們必須見面商談各種問題，因此，相互間的接觸增加起來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帕坦人接受了非暴力主義思想，在理論上對於這種思想的接受遠遠超過了我們中間許多人。由於他信仰這種思想，因此，他便力圖使他的人民認識和平的重要意義，儘管是在受到挑釁的情況下也應如此。如果說邊省人民已經放棄了使用暴力的一切思想，那是荒謬的，正如說任何一

省的一般人民已經放弃了这种思想，是同样的荒謬。群众是受感情冲动支配的，誰也不能預言在他們情感冲动的时候，会做出什么事来。但是边省人民在一九三〇年和以后的几年中所表現的自我遵守紀律的精神，是令人驚訝的。

政府官員和我們那些非常懦弱的本国人士对这位“边省的甘地”都側目而視。他們不相信他的話，总認为他鬼計多端。但是，过去若干年中，他和其他边省同志們已經同印度其他地方的国大党工作者非常接近。在他們中間，已經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同志感和相互的尊重和关心。阿卜杜尔·加法尔·汗多年以来一直为国大党中人士所了解和敬爱。但是他已超过了一个个别同志的地位，在印度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日益成为英勇不屈的人民——我們共同奋斗的同志們——的勇敢和牺牲的象征。

远在我听到阿卜杜尔·加法尔·汗以前，我已經認識了他的兄弟汗·薩希卜博士。当我在劍桥大学时，他在倫敦聖托馬斯医院習医。后来，当我在倫敦学法律的时候，我和他成为亲密的朋友。在倫敦时，彼此沒有一天不見面。我回印度时，他留在倫敦，繼續住了好多年，在战时当过医生。后来，我在內尼獄中又見到了他。

边省的“紅衫党”和国大党合作，但他們是一个独立的組織。这是一个特殊的局面，兩者真正的联系是通过阿卜杜尔·加法尔·汗。在一九三一年夏天，工作委員會和边省領袖們对这个問題，作了充分的考虑，决定將“紅衫党”吸收到国大党内来。“紅衫党”运动从而成为国大党組織的一部分。

甘地希望在喀喇蚩大会后立刻到边省去，但政府对此并不鼓励。在以后几个月中，当政府官員責难“紅衫党”的行动时，他再三要求准許他亲自前去了解情况，但未成功。我要前去，也未得到同

意。由于德里協定的緣故，我們也不便違反政府明白表示的意願而到邊省去。

工作委員會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教派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新問題，雖然它能以新奇玄妙的姿態重新出現。圓桌會議當時給它一種額外的重要性，因為英國政府顯然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將其他一切問題置於從屬地位。會議的委員，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選他們主要是為了強調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著重於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的利益。政府甚至公然地、挑釁似地拒絕指派任何民族主義的穆斯林領袖。甘地認為如果由於英國政府的緣故，使會議剛開始時就在教派問題上糾纏不清，那末真正的政治經濟問題將不會得到適當的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他去出席會議，也不會起什麼作用。因此，他向工作委員會提出，只有在有關方面之間事先對教派問題達成某種諒解，他才能夠去倫敦。他這種預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委員會否定了他的主張，決定他不能僅僅由於不能解決教派問題的理由而拒絕去。委員會曾嘗試和各教派的代表進行協商，提出一個建議性的解決方案，但沒有得到很大的成功。

在一九三一年夏天，除了許多次要問題以外，這些問題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幾個大問題。我們繼續不斷收到全國各地國大黨地方委員會送來的指責，指出地方官員破壞德里協定的行為。其中比較重要的由我們轉給政府，而政府反過來控訴國大黨員違反德里協定。控訴和反控訴就這樣一來一去，後來，它們都曾經在報上發表過。不用說，結果並沒有改善國大黨和政府間的關係。

然而，關於這些小問題的摩擦本身並沒有多大重要性。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揭露了一種基本沖突的發展，這種沖突的發展不決

定于个人，而是由于我們民族斗争的性質和我們农业經濟缺乏平衡而引起来的，因此，沒有根本的改革，不能使它消灭，也不能以妥协的办法求得解决。我們的民族运动最初是由于我們上層中产階級企求寻找自我表現、自我成長的途徑而开始的，在这后面还存在着政治和經濟的迫切要求。它扩展到下層中产階級，在农村中形成了力量，于是，开始推动农民群众，因为整个說来，农民感到甚至越来越难以維持他們悲慘的最低生活水平。旧的自足自給的农村經濟久已絕迹。附屬於农业的农村輔助工業，曾經減輕了一些加于土地上的負擔，但現在也沒落了，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关系，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不能和新兴的机器工業进行竞争。土地的負擔增加，印度工業成長的速度太慢，因而不能使这种狀況得到多大改变。負擔过重的农村，在工具簡陋，并且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抛到世界市場中去，結果只好听人摆布。它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它的生产方法落后，它的土地制度終于造成土地的不断分割，因而無法实现根本的改进。因此，农村各个階級，包括地主和佃农，除了在短促的繁荣时期以外，每况愈下。地主企圖將負擔轉嫁到佃农身上，而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不断貧困化使他們参加到民族运动中去。农村無产階級，在农村地区的大批無地的劳工也被吸引到运动中来。对于所有这些农村中的各个階級，“民族主义”或“自主”意味着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这种改革將会解除或減輕他們的負擔，并且会使無地的农民获得土地。这些願望在农民方面或参加民族运动的中产階級領袖方面，都未明白地显示出来。

一九三〇年的和平抵抗运动，恰巧和世界工农业的大衰退相配合，这是运动的領袖們在最初所未預料到的。农民群众深受到

这次衰退的影响，因而投向国大党及和平抵抗运动。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在伦敦或其他地方草拟冠冕堂皇的宪法，而在于根本改革土地制度，特别是柴明达区域的土地制度。柴明达制看来确实已经过时了，并且它本身也毫不巩固。但是英国政府，就它所处的地位来说，不敢贸然对这种土地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甚至当它任命皇家农业委员会时，它在交办事项的条件中，还规定了禁止讨论土地所有制或佃地制。

因此，冲突存在于印度当时实际情况的本质方面，而不能以空话或妥协手段使之消灭。只有土地的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姑且不谈其他重要的民族问题），才能解决那个冲突。要想通过英国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临时办法可能暂时减轻痛苦；严厉的镇压可能吓退和制止冲突的公开表现，但两者对于问题的解决，均无帮助。

英国政府，据我猜想，如同大多数政府一样，以为印度的纠纷是由于“煽动者”造成的。这是一个完全愚昧的见解。印度在以往的十五年中，得到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博得印度千百万人的爱戴，甚至于崇拜；他似乎将自己的意志在多方面加诸印度身上。在印度近代史中，他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然而比他更加重要的却是那些似乎盲从他的命令的人民本身。人民是主要的角色，而在他们后面推动他们前进的是伟大的历史要求，这种历史要求为他们准备了条件，听候他们领袖的号召。如果没有那种历史背景和政治及社会的迫切要求，就没有那个领袖或煽动者能够鼓动他们行动起来。甘地作为一个领袖的主要美德，就是他能够本能地感觉到人民的脉搏，能够知道发展和行动的条件在什么时候成熟。

一九三〇年，印度的民族运动一度和在全国成长的社会力量

配合起来，因此，它获得一股偉大的力量，产生了一种现实感，好像自己确实随着历史一步步地前进。国大党代表着民族运动，这股力量反映在国大党威信的提高上。这是不易觉察、难以估量并且無法闡明的东西，然而它又确实存在。农民当然趋向国大党，并給它真正的力量；下層中产阶級形成了它战斗队伍的骨干。甚至为这种新的气氛所困惑的上層资产阶級，也認為和国大党保持友善关系比較妥当。印度絕大部分棉紡織厂都在国大党規定的担保事項上签了字，不敢做出可能引起国大党不滿的事情。当人們在倫敦第一屆圓桌會議上爭論一些細致的法律問題时，实际力量似乎慢慢地、不知不觉地移到代表人民的国大党手中。这种幻觉，甚至在德里协定以后，还在增長，这倒并不是由于自吹自擂的演說，而是由于一九三〇年及以后所發生的事变。事实上，最能够感到前途困难和危險的人們，也許还是国大党的領袖們，他們小心翼翼，不敢低估这些困难和危險。

这种对国内成長着双重权力的模糊感觉，自然使政府觉得非常刺激。事实上，这种感觉并無真正的根据，因为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当局手里。但是毫無疑問地，这种感觉在心理上是存在着的。对于一个唯我独尊、不可动搖的政府來說，这种局面是不能允許存在的。真正触怒他們的是这种微妙的气氛，而不是后来他們所指責的那些在农村中的演說和游行。因此，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国大党不会自动地“切腹自杀”，而政府又不能允許这种分庭抗礼的气氛存在，并且还准备將国大党摧毁。由于第二屆圓桌會議的緣故，这种冲突給拖延下去了。英国政府，由于某种原因，迫切希望甘地能到倫敦去，因此尽可能地避免做出妨碍甘地前往倫敦的事情。

然而，这种冲突的預感繼續增長，我們能够感到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在德里协定簽訂不久，欧文勋爵离开了印度，由威灵頓勋爵接任总督。傳說新任总督是一个严酷頑强的人，不像前任总督那样容易妥协。我們有許多政治家承襲了一种从人事而不从原則方面来考虑問題的“自由主义”的習慣。他們認識不到英国政府的全盤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不决定于总督的个人見解。因此，更換总督不会也不能引起任何变化。但是，在新旧总督交替的时候，政府的政策由于形势的發展而逐漸有所改变。民政部里的官僚尚未批准和国大党締結的协定，以及和它进行的交涉。他們所受的一切訓練，以及对政府威权的看法，都与这件事情不能相容。他們認為和甘地的近乎平等地来往，已經增加了国大党的影响以及甘地的威信，現在大概是挫他一些威風的时候了。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但在当时，还未了解这种見解是印度民政部所創造的。不管是由于何种原因，政府强硬起来了，并加强了控制，似乎用古代預言家的話告訴我們說：我的小手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用普通鞭子来懲罰你們，我將用有刺的鞭来懲罰你們。

但是懲罰的时机还未来到。如果可能的話，国大党是要出席圓桌會議的。甘地兩次到西姆拉去和总督及其他官員进行長談。他們討論了許多爭論点，特别是关于边省的“紅衫党”运动和联合省的农村形势，除了孟加拉以外，这两个問題似乎最使政府感到煩惱。

甘地从西姆拉邀請我前去該地，我因而也有机会会見一些印度政府的官員。我的談話仅限于联合省。这些談話都很坦率，潛藏在一些微小的控訴和反控訴后面的真正冲突也討論到了。我記得当时他們告訴我說，政府在一九三一年二月里准备至多在三个

月以內將和平抵抗运动彻底消灭。他們已經准备好镇压的机器，只要將它推动一下，按一按电鈕便行了。但是，由于他們在可能的情况下，宁願采用協議解决的办法，而不願用强迫手段，因而尝试了双方会商的方式，最后促成了德里协定。如果協議沒有达成，电鈕永远都在那里，可以随时按的。他們似乎暗示，如果我們举止不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按电鈕的。这一切都談得非常客气和坦率。我們双方都了解，不論我們怎样說和做，冲突是無法避免的。

一位高級官員对国大党頌揚了一番。当时，我們正在討論範圍較广的非政治性的問題。他告訴我，除了政治以外，国大党对印度做出了一个偉大的貢獻。通常对印度人的指責，就是責备他們不是良好的組織者。但在一九三〇年，虽然国大党遇到許多困难和反对，但还做了出色的組織工作。

就出席圓桌會議的問題來說，甘地第一次去西姆拉訪問，对此事尚未作出决定。第二次訪問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周。無論如何，总要做出最后决定，但是他还难以下定决心离开印度。他看到在孟加拉、边省和联合省面前存在着的糾紛，除非他得到某种关于印度和平的保証，他不願意去。最后，和政府达成了某种協議，具体表現在一个声明和互相交換的信件中。这在最后一刻完成，使他能赶上載着出席圓桌會議代表的輪船。从某种意义說来，这时已經过了最后一刻，因为最后的一班火車已經开出。于是从西姆拉到喀尔喀安排了一班專車，其他火車都耽擱下来，以便讓專車通过。

我陪甘地从西姆拉到孟买。在接近八月底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我在孟买和他揮手告別，輪船載着他駛向阿拉伯海和遙远的西方。从此，我們便一別兩年。



第三十八章 圓桌會議

一个自称在印度和在倫敦圓桌會議上見過甘地先生多次的英國新聞記者，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這樣寫道：

“在莫爾登號輪船上的那些領袖們都知道，在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內部有一個反對甘地先生的陰謀。他們了解，當時機一旦成熟，國大黨可能將他開除出黨。但是，國大黨也許會由於開除甘地先生而開除它二分之一的黨員；而這二分之一的黨員就是薩普魯爵士和杰雅克爾先生希望吸收到自由主義聯盟中去的。他們從不掩飾他們認為甘地先生是‘糊塗’的。如果一個‘糊塗’的領袖能夠帶來一百万‘糊塗’的信徒，那他還是值得爭取的。”[⊖]

⊖ 引自格·波爾頓所著的“甘地的悲劇”一書。這段引語是我從評論本書的文章中摘錄來的，因為我至今還沒有機會讀到原書。我希望不致因此而委屈了作者和引語中所提到的人物。……寫完上面的話以後，我讀到了原著。波爾頓先生的許多言論和推測，據我看來，是完全不合理的。同時有一些事實上的錯誤，特別是關於工作委員會在德里協定談判期間及其以後所做和未做的事情方面有錯誤。此外，還有一個離奇的假定，如說瓦拉拜·巴特爾先生和甘地先生競爭，在一九三一年獲得國大黨主席的職位，從而奪取了國大黨的領導權。事實上，在以往十五年中，甘地先生在國大黨內（當然也在全國以內），是一個比任何國大黨主席還要重要的人物。他是內定主席的人，他的建議一貫得到採納。他一再拒絕擔任主席，而寧願讓他的一些同事和助手出來擔任。我做國大黨主席完全是由於他的關係。事實上是他當選，但他退讓，竭力促成我當選。巴特爾先生被選為主席是由於一種不正常的情況。當時，我們剛剛出獄，國大黨各地方委員會還是非法團體，不能按照一般情況進行工作。因此，工作委員會便作主選舉了喀喇蚩大會的主席。整個委員會，包括巴特爾先生在內，請求甘地先生接受主席職位，

我不知道这段引語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代表于一九三一年前往倫敦的薩普魯爵士、杰雅克尔先生以及圓桌會議其他委員們的意見。但是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印度政治的人，不論是記者还是“領袖”，竟然說出这样的话，倒确实是件惊人的事情。我讀到这段引語时，感到驚訝，在这以前，我甚至沒有听人暗示过这件事情。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中。

誰是陰謀者？他們的目的何在？人們有时傳說主席巴特爾和我屬於工作委員會中的極端派，所以，我猜想，我們一定被列在陰謀領導者之中。也許在全印度，甘地再沒有一個比巴特爾更加忠誠的同事了。巴特爾在工作中表現得堅強不屈，然而他對甘地個從而能在未來形勢緊急的一年中，成為國大黨的名義首腦，因為他當時已經是實際首腦。但甘地不同意，堅持要巴特爾當主席。我記得當時有人向他指出，他想永遠做一個墨索里尼，而使別人成為臨時的國王和有名無實的元首。

在這個注釋里，不可能對波爾頓先生的其他各種誤解，一一予以糾正。然而，我倒願意提到一件多少和個人有關的問題。波爾頓先生似乎相信我父親政治生活的轉折點就是他未被選入一個歐洲人的俱樂部；這件事使他不但變成激烈派，而且避免接觸英國社會。雖然這個故事時常被一再提起，但完全是真實的。事實本身並無重要意義，但為了釋疑起見，我在這裡要說明事實。當我父親當律師的早幾年中，他成為當時阿拉哈巴高級法院大法官約翰·艾吉爵士的一個寵信的人。約翰爵士建議我父親參加阿拉哈巴俱樂部（歐洲人的俱樂部），並要親自替他提名。我父親感謝他的好意，但指出這會引起麻煩，因為許多英國人會由於他是印度人而不同意，並且可能投票反對，同時任何一個下屬也會投反對票，在這種情況下，他寧願不提出申請。約翰爵士甚至建議他可以請阿拉哈巴區駐防軍司令官附議我父親的提名。然而，最後，這件事被擱下了，我父親的名字並未提出，因為他明白表示不準備冒險，以免受到侮辱。這件事非但沒有使他憎恨英國人，反而使他和約翰爵士接近起來，在以後的年月里，他和許多英國人的友誼及聯系也加深了。這事發生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轉變成激烈的政治家和不合作運動者，還是在大約二十五年以後的事情。他的轉變並不是突然的，不過旁遮普省的戒嚴法加速了轉變的過程，而甘地先生在適當時機的影響也促成了這種轉變。即便在當時，他並未故意斷絕和英國人的社會關係。但是由於英國人大部分都是官員，因此，不合作運動與和平抵抗運動不可避免地會使這些關係中斷。

人，对甘地的理想和政策，却是忠心耿耿的。我不能自称同样接受这些理想，但我却很荣幸能和甘地最密切地在一起工作。因此，如果说要阴谋反对甘地，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那真是危言耸听。对整个工作委员会来说，情形也确实如此。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是他所创立的；他和少数同事协商以后，内定了委员会的委员，而选举本身只是形式问题。工作委员会的骨干包括曾在其中工作多年的委员，他们几乎已被认为是常任委员。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见解和性情方面的不同；但是由于多年来共同相处、共同担负重任、面对共同的危险，因而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彼此之间产生了友谊、同志爱和相互的关怀。他们不仅结成了一个集团，而且形成了一个有机组织。因此，难以想像其中任何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施展阴谋。甘地支配着委员会，每个人都向他请教。多年以来的情况便是如此；而在一九三一年，当我们的斗争获得一九三〇年的巨大胜利以后，这种情况甚至变得更加显著。

工作委员会内部的“极端派”企图将甘地“开除出党”的目的究竟何在？也许有人以为他被看作一个过分妥协的人物，因而成为一个障碍物。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哪里会有斗争？哪里会有和平抵抗和不合作运动？他是活生生的运动的一部分；真的，他就是运动本身。就这个运动来说，一切都依靠他。当然，民族运动不是他创立的，同时也并不依赖任何个人；它有更深厚的根源。但是，以和平抵抗作为象征的运动的特殊斗争阶段，却完全依靠着他。如果和他分手，那就意味着结束这个运动，而重新建立新的基础不论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而在一九三一年，对任何人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有趣的是，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们中间有些人在一九三一年

进行陰謀，要把甘地从国大党内逐出。我們向他略为暗示就够了，何必还要进行陰謀？他仅仅微露退休之意就足以使工作委員會和全国人民感到煩惱。他在我們的斗争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只要想到他可能和我們分离，就会使人难受。我們經過再三犹豫以后，才讓他去倫敦，因为在他离开印度期間，印度的重担將落在我們身上，对于这种情况，我們并不欢迎，我們習慣將重担轉移到他的肩头上。對我們工作委員會內外的許多人來說，我們和甘地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而使我們感到即使和他在一起遭受失敗，似乎也比和他分开而得到某种暫时的胜利要好一些。

甘地是否“糊塗”，我們讓自由主义联盟的朋友們去決定。他的政治見解有时很唯心，并且也很难理解，这些都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是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實踐家，一个偉大的勇士，一个能时常采取行动的人。如果“糊塗”能产生这些实际效果，那么这种“糊塗”也許并不次于那种始終跳不出書房和狹隘的小圈子的“实际政治”。不錯，他几百万的信徒都是“糊塗”的；他們对政治和宪法都一無所知；他們只能从他們天生的需要、他們的衣食住和土地方面来考虑問題。

我永远感到很奇怪：在觀察人情世故方面有經驗的著名外国記者怎么在印度問題上常常犯錯誤。这是否由于他們在童年时代所形成的那种不可磨滅的印象，即認為东方完全不同，因而不能以一般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否則，就英国人來說，这是否由于帝国思想在作祟，因而限制了他們的眼界，歪曲了他們的見解？他們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会深信不疑，不論这些事物是多么不可靠，因为在神秘的东方，任何事情都被認為是可能的。他們出版書籍，其中有时也包含精辟的考查，确切的觀察，但其中也滲杂着令人驚訝的錯

誤。

我記得正当甘地在一九三一年去歐洲前夕，我讀到倫敦一家報館當時駐在巴黎的著名通訊員所寫的一篇文章。這是一篇關於印度的文章，其中他提到一件事情，據他所說，這事發生在一九二一年不合作運動期間，當時威爾士親王正訪問印度。據說，聖雄甘地在某地（也許是在德里），未經通報便富有戲劇性地突然闖到親王面前跪下來，抱住親王的腳，淚下如雨地懇求親王把和平賜給這個不幸的國家。我們沒有一個人，甚至包括甘地本人，曾經聽說過這個奧妙的故事。我寫信給這個記者，向他指出了這點。他表示遺憾，但還說這個故事是他從可靠的來源方面採訪來的。令我驚訝的是，他未經過任何調查，竟然會相信一個表面看來就非常不可能而且凡是对甘地、國大黨或印度稍有了解的人也都不會相信的故事。不幸在印度確實有許多英國人，儘管他們在印度居住了多年，對印度、對國大黨或者對甘地都毫不了解。這是一個荒誕無稽的故事。假定杜撰一個故事，說坎特伯雷大主教突然闖到墨索里尼面前，倒立起來，懸空舞動雙腿，表示歡迎，那倒也許可以同上面這個故事比美。

最近一家報紙的報道又敘述了另一種類型的故事。據說甘地獲得巨額經費，約有幾百萬鎊，秘密地將它保存在朋友那里，而國大黨正在追查這筆款子。國大黨惟恐甘地從黨內退出以後，便會失去這筆存款。這個故事一聽就覺得荒謬，因為甘地從未私自或秘密地保存經費，不論他收到多少錢，他都全部繳給公共組織。他有經紀人那種仔細核算賬目的本性，所有他募來的款項都經過公開
•••
核對。

這種謠傳也許是根據國大黨在一九二一年所募得的那筆人所

共知的一千萬盧比的傳說。這筆款項聽起來很大，但分布到印度全國並不算多。它是用來創辦國立大學和學校，發展農村工業，特別是織布業，開展救濟印度賤民工作以及執行許多其他建設計劃的經費。大部分款項已經列入確定用途，現在雖未動用，但將來會有特別用途。款項的其餘部分留給各個地方委員會，充作國大黨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經費。不合作運動以及嗣後幾年來國大黨工作的經費都是由這筆款項支付的。甘地教導我們，同時全國的貧困也讓我們了解，應該以極有限的經費來進行我們的政治運動。我們大部分工作都完全是志願性質的，即使有報酬，款數也少得難以維持生活。我們最幹練的工作人員——需要養家的大學畢業生，所得的報酬還不及英國的失業津貼。我懷疑，不論在什麼地方開展的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或勞工運動所花的經費，是否能像國大黨在以往十五年領導的運動所花費的那樣少。除了在和平抵抗時期，當國大黨是個非法團體的情況外，國大黨的一切經費和賬目都逐年公開核算，沒有任何秘密。

甘地以國大黨唯一代表的身分去倫敦出席圓桌會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我們決定不額外再派代表。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們希望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時期，在一个需要機智地應付局勢的時候，能把我們最優秀的人員留在印度。我們認為儘管圓桌會議在倫敦舉行，重心還在印度，而在印度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將在倫敦獲得反響。我們想要制止意外的發展，使我們的組織保持健全狀態。然而這並不是我們只派遣一個代表的真正理由，如果我們認為需要而且適當的話，我們一定會派遣其他代表。我們是故意不這樣做的。

我們參加圓桌會議，並不是為了無休止地去討論憲法的細微

末节。在当时那个阶段，我們对这些細节不感兴趣，只有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和英国政府达成某种協議时，我們才能考虑細节。真正的問題是授予一个民主的印度以多少权力。任何一个律师几乎都能够在事后对細节問題进行起草并加以解决。国大党在这些基本問題上的立場相当簡單，对于这点，也沒有多大余地可以爭辯。我們認為庄重的办法就是讓一个代表——我們的領袖——前去解釋这种立場，表明它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如果可能的話，爭取英国政府予以接受。我們知道这很困难；就当时的情形看来，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們也沒有其他途徑。我們不能放弃那个立場以及我們的原則和理想，对于这些，我們曾經宣誓，并且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由于特殊的机会，在这些問題上找到協議的基础，其余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在我們之間已經确定，如果达成这种協議，甘地会立刻通知工作委員會的一些甚至全部委員前去倫敦，以便我們能够参与詳尽的談判工作。我們随时准备听候召喚。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乘飞机赶去。因此，我們能够在应邀的十天以內，和他見面。

但是，如果在基本問題上，未能达成起碼的協議，那就不会产生进一步詳細協商的問題，同時也不需要額外派遣国大党代表去参加圓桌會議。因此，我們決定只派甘地出席。工作委員會另一位委員，奈都夫人也出席了圓桌會議，但不是以国大党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她被邀以印度妇女代表的資格出席會議，工作委員會同意她以这种身分前去出席。

但是英国政府在这个問題上，并不准备迎合我們的希望。他們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問題的考虑，而把會議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無关宏旨的問題上面。即使在考虑重大問題时，政府也会

束手不前，拒絕使自己受到約束，而答應在將來考慮成熟以后再表示意見。他們的王牌當然就是教派問題，他們充分利用這張王牌，使它在會議上壟斷一切。

會議中大多數印度成員和官方的這種策略亦步亦趨，其中大部分人是心甘情願，有些人是勉為其難。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除了代表自己以外，不能代表任何人。他們有些人有才干，並且受人尊敬；但是其他許多人就談不到這些。整個說來，他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代表着印度的最反動的勢力。他們如此落后和反動，以致那些在印度表現得很溫和謹慎的印度自由主義聯盟的人，在他們中間都會顯得是進步分子。他們代表着印度的各個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和英國帝國主義相勾結，並且希望從它那裡得到發展和保護。最引人注目的代表是來自教派問題上的各種“少數”和“多數”集團。這包括一些上層階級的頑固派，他們是以彼此之間從來不能取得一致而出名的。在政治方面，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派，他們的唯一興趣似乎就是在教派問題上取得勝利，即使這樣會犧牲政治上的進步。事實上，他們宣稱只有當他們的教派要求獲得滿足以後，他們才會同意獲得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同時也極其清楚地表明了一個被奴役的民族能夠墮落到什麼程度，以及他們怎樣為帝國主義者所擺布。當然，不能說印度人民是由這群殿下、勳爵、爵士以及其他高等人物所代表。圓桌會議的成員是由英國政府指派的，從政府本身的觀點來說，它選得適當。僅僅從英國當局能夠這樣利用和玩弄我們的事實來說，就足以表明我們人民的軟弱，表明政府可以非常容易地躲避他們的鋒芒，讓他們互相抵消力量。我們的上層階級還被帝國主義統治者的思想所蒙蔽，並為它效勞。這是由於他們看不透徹的緣

故，还是他們明知它真正的意义但由于畏惧印度的民主自由而故意接受呢？

在这个各种既得利益——帝国主义的、封建的、財政的、工業的、宗教的、教派的——的聚会上，英屬印度代表团的领导很恰当地照例由阿加·汗掌握，因为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恰巧概括了所有这些利益。由于他三十多年以来，和英帝国主义及英国統治階級有密切的勾結，并且主要住在英国，因此，他能够徹底了解并能代表統治者的利益和观点。在圓桌會議上，他本来可以成为英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干练的代表，但他却是代表印度的，这对事实是一个諷刺。

在那个會議上，我們的处境極其不利。虽然我們并不希望从會議得到多大收获，但我們却驚訝地并且日益不滿地注意着會議的进行。我們看到：企圖接触民族和經濟問題的努力少得可憐亦复可笑；各种协定、陰謀和姿态；我們自己的同胞中有些人和英国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携手合作；对次要問題进行無休止的討論；故意將一切真正重要的問題攔在一边；繼續不断地陷入一切大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摆下的圈套；彼此爭吵，其中又穿插着一些宴会和互相吹捧。一切都是生意經——大职位，小职位，給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英籍印度人、欧洲人的职位和席次；但所有职位都是給予上層階級的，群众不能問津。机会主义比比皆是；不同集团像餓狼似地往来逡巡，等候獵物——在新宪法下的贓物。自由的真实观念已經变成大規模的生意經——即所謂“印度化”——在軍隊、文官等方面給印度人更多的职位。沒有人从独立、真正的自由、將权力轉移給一个民主的印度以及解决印度人民面临的任何重大迫切的經濟問題方面来考虑。印度英勇地斗争难

道就是为了这种生意經嗎？难道我們不需要把这种烏烟瘴气改变成美妙的理想和牺牲的晴朗气氛嗎？

在那个富丽堂皇、人物众多的大厅里，甘地孤零零地坐着。他的服裝，或者由于他不修边幅，使他和所有其他人士显得不同，但是他和他们周圍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們在思想观点方面的差异甚至更大。他在那个會議上所处的地位極其困难，我們远在印度的人不知道他怎样能够忍受。但是他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下去，再三寻求达成協議的某种基础。他所表示的那种特殊态度，突然將教派怎样真正掩盖政治反动势力的真相揭露出来。他对于为了参加大会的穆斯林代表的利益而提出的許多关于教派的要求表示不滿。他認為，他那些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同事們也同样認為，有些要求对于自由民主是一种障碍。但是，他还提議，假如會議的穆斯林代表能在政治問題上，即独立問題上和他及国大党携手合作的話，他对这些要求会毫無異議地全盤接受。

这个提議是一个个人提議，因为就他所处的地位，他不能使国大党受到約束。但他答应竭力促使国大党予以同意。凡是了解他在国大党内地位的人們不会怀疑他会得到国大党的贊同。然而，这个提議并未得到接受，事实上，讓阿加·汗来代表印度的独立，也是有些难以想像的事情。这表明真正的困难倒不是屬於教派性質的，虽然教派問題在會議上显得很重大。政治反动势力阻碍了一切进步，而將它自己隱藏在教派問題的后面。英国政府仔細挑选出席會議的人选，結果搜罗了这些政治反动分子；同时由于控制了議程，他們使教派問題成为主要問題，而这个問題在聚集在會議上的那些頑固分子之間，是根本不可能达成協議的。

英国政府达到了目的，从而表明它不但还有物質力量来保持

它的帝国，并且还有机巧权术將帝国主义的傳統繼續維持一个时期。虽然圓桌會議既不代表印度人民，亦非衡量印度人民力量的尺度，然而印度人民是失敗了。他們所以失敗，因為他們對自己爭取的目標缺乏思想上的認識，很容易被人引入歧途和讓人躲開他們的鋒芒；他們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并沒感到自己的力量強大得足以拋開阻礙他們前進的既得利益；他們所以失敗，因為他們的宗教感情太濃，並且引起了教派主義的情緒；總之，他們所以失敗，因為他們還不夠強大，不夠進步，因而無法取得勝利。

圓桌會議的本身并不存在成功或失敗的問題。雖然原來對它就沒有寄托多大希望，然而，它却造成了不同的後果。前次會議，即第一屆會議在印度或其他地方很少引起注意，因為和平抵抗運動集中了人們的注意力。由英國政府選派去參加一九三〇年會議的代表們，時常在黑旗和不光彩的口號下出發。但在一九三一年，一切都不同了，其所以不同是因為甘地以國大黨的代表和有千百萬信徒的領袖的身分前去出席的。這使會議提高了威信，印度以較大的興趣，注視會議的進行。任何失敗，不論其原因何在，現在都會對印度不利。我們那時才了解為什麼英國政府那樣重視甘地出席會議。

儘管會議存在着陰謀、機會主義和徒勞無益的波折，但對印度來說，會議本身並不是失敗。會議原就註定要失敗，印度人民對它的失敗，沒有責任。但是會議却轉移了全世界對印度真正問題的注意，而在印度本身，造成了失望消沉的情緒和一種屈辱感。它使反動勢力在印度有機會重新抬起頭來。

印度本身的事變會帶給印度人民成功或失敗。強大的民族運動，並不會因為遠在倫敦施展的機巧權術而消逝。民族主義代表

中产階級和农民真正的直接的需要，他們企圖依靠运动来解决他們的問題。因此，运动或者是能够成功，完成它的使命，讓位于其他能够引导人民在进步和自由的道路上繼續前进的运动，或者它就暫時被强力鎮压下去。这个斗争在印度不久就会来到，結果它会暫時受到挫折。第二屆圓桌會議，并不能給这个运动多大影响，但它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利于运动的气氛。



第三十九章 联合省农村中的糾紛

作为国大党总書記之一及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我接触到全印度的政治，有时也必須到一些地方去旅行，虽然我尽可能地予以避免。由于我們所負的担子和責任增加了，工作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越来越長，最后發展为每次开会兩星期的例会。这种會議不再仅限于通过关于提出批評的決議，而是要指揮一个广大而多面的組織的無数不同性質的建設性活动，并且每天要解决困难的問題，全国性的冲突是否發生，决定于对这种困难問題的处理。

然而，我的主要活动是在联合省。当地的农村形势吸引了国大党的注意。国大党联合省委員會由一百五十多个委員組成，每兩三个月举行一次會議。它的执行局由大約十五个委員組成，时常开会，并且負責它的农村部門。

在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这个执行局任命了一个專門的农村委員會。有趣的是，有几个地主一直同执行局及这个委員會保持着突出的联系，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經過他們的同意。事实上，我們省委員會本年的主席（从而也是执行局和农村委員會的当然主持人）薛尔万尼就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地主家庭。执行局的秘書長斯里·普拉卡沙和几个重要委員，也是地主或地主家庭的成員。其余的委員是中产階級的專門職業者。在我們省执行机关里，簡直沒有一个佃农或貧农的代表。在我們的区委員會里有农民，但

是經過各層选举，最后組成省执行局时，他們很少不被淘汰。省执行局是一个完全由中产階級知識分子所控制而帶有強烈的地主成分的組織。因此，不論怎样說，它不是一个極端派的組織，在农村問題方面，絕對不是如此。

我自己在省里的地位仅仅是执行局和它的农村委員會中的一个委員。在我們商討問題和进行其他工作中，我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我絕對沒有起过領導作用。事实上，沒有人可以說是在我們省里起了領導作用，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習慣于采取联合的、集体的行动，素來強調組織而不是个人。当年的主席是我們暫时的首腦，代表着我們，但甚至他也沒有特殊的权力。

我在当地还担任国大党阿拉哈巴区委員會的委員。这个委員會，在它的主席普魯紹坦·达斯·坦頓的领导下，在推动农村形势的發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一九三〇年，它帶头开展本省的抗稅运动。这并不是因为阿拉哈巴区是遭受农业蕭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俄得的地稅征收者地区的情况更坏。但阿拉哈巴区的組織較健全，政治覺悟較高，因为阿拉哈巴城是一个政治活动的中心，許多杰出的工作人員时常訪問四周的农村。

紧接着一九三一年三月的德里协定以后，我們赶快派遣工作人員，并發出通知到农业地区去，通知农民和平抵抗及抗稅运动已經停止。从政治立場方面來說，要他們繳租，并不存在阻碍，我們劝导他們繳納。但是我們还說，鑒于农产品的价格大跌，我們認為應該使他們得到大量免租。我們提議我們彼此應該共同努力实现这种免租。即使在通常的时候，田租时常也是几乎难以忍受的負擔；随着物价的跌落，簡直不能繳納全部，甚至接近全部的田租。我們同农民代表举行会談，同时，提出一个暫定性的提案，建議一

般削減百分之五十，在某些地区还超过这个数目。

我們企圖將农村問題同和平抵抗的一般問題完全分开。無論如何，在一九三一年，我們只想从經濟角度来考虑這個問題，將它和政治分开。但这是困难的，因为兩者無論如何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而且过去是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我們，作为国大党的一个組織，肯定也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我們打算暫時起一种农民协会的作用（控制协会的却不是农民，甚至是地主！）但是，我們不能同时、也不会希望放弃我們的政治特性，政府把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看作政治性的行动。未来的和平抵抗的迹象也出現在我們面前，假如这个实现的話，毫無疑問，經濟和政治將會并駕齐驅。

尽管有这一切明显的阻碍，我們从德里协定时期以来，始終努力使农村問題和政治斗争分开。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德里协定并未使农村問題結束，我們要使政府和人民对这点完全清楚。在德里会谈过程中，我相信甘地曾向欧文勋爵担保，即使他不出席圓桌會議，他也不会在此間繼續和平抵抗。他会要求国大党給會議一切机会，看看产生什么結果。但是，即使在当时，甘地也声明这种担保对于任何我們被迫进行的地方性的經濟斗争，并不适用。当时，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摆在我們所有的人面前，因为在联合省已經采取了有組織的行动；事实上，全印度的农民都受到同样影响。在西姆拉会谈时，甘地曾經重复这点意見，在發表的信件[⊖]中

⊖ 下列函件是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西姆拉協議的組成部分。

甘地先生給印度政府內務部長艾默遜先生的信。

“亲爱的艾默遜先生：

收到你今天的来信及附来的新草案，特此致謝。柯瓦斯吉爵士也將你所建議的修改草案通知了我。我和我的同事們仔細地研究了這個修改草案，我們准备在附加下列按語的条件下予以接受：

也曾經提到。在他动身去欧洲的前夕，甘地說明除了圓桌會議和政治問題以外，国大党可能需要在經濟斗争中保护人民的，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他并不热中于这种斗争；他希望避免它；但是如果不能避免的話，必須將它开展起来，我們不能抛弃群众。他的論点是，适用于一般和政治的和平抵抗的德里协定，并不妨碍进行这种斗争。

我所以談到这点，是因为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及其领导者一

在第四节中，我不能代表国大党同意政府所采取的立場，因为我們認為由于执行解决方案而造成的損害，在国大党看来，沒有得到补救时，必須对案情进行調查，因为在德里协定尚未批准期間，和平抵抗已經中止。但是，倘若印度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無意进行这种調查，我和我的同事們也不反对保留这项条款。但結果会产生下列情况：虽然国大党对于‘以前提到的关于它本身利益的其他事項’不会强求进行調查，但如果不幸抱怨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国大党認為在缺乏調查的情况下，必須以防御性的直接行动的形式来覓取某种改善方法时，那末国大党縱然在和平抵抗已經中止的条件下，亦將有采取这种补救方法的自由。

我無需再向政府担保国大党將会一貫地避免采取直接行动，而以商討、說服等办法覓取补救。为了避免將來任何可能發生的誤会，或对国大党提出破坏信义的指責起見，需要在这里將国大党的立場予以說明。如果現在的商談得到圓滿的結果，我想公报和这封信以及你的复信將会同时發表。

甘地謹啓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于西姆拉。’

艾默遜先生給甘地先生的复信。

“亲爱的甘地先生：

对你今天的来信，特此回复，并致謝意。你表示在你来信所提出的意見的条件下，会接受公报草案。总督已經了解国大党对于它以往提到的那些事項，無意强求进行任何調查，同时也了解虽然你担保国大党將一貫地避免采取直接行动，而以商討、說服等办法来覓取补救，但希望国大党表明他們未来可能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的立場。我声明总督同意你所表示的不采用直接行动的希望。至于政府的一般立場，我請你參閱总督閣下在八月十九日給你的信。我得声明，公报和你今天的来信以及这封复信，將由政府同时公布。

艾默遜謹啓

西姆拉，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被指責重新開展抗稅運動，從而破壞了德里協定。對於提出這種指責的人說來，這是很方便的，因提出這種指責是在那些被指責而可能答辯的人們都被關在獄中，而一切報刊又受到嚴格檢查的時候。撇開聯合省委員會在一九三一年從未開展抗稅運動這點不談，我希望說明的是，即使進行這樣一個為了經濟目標，而與和平抵抗無關的運動，也根本不是破壞德里協定。至於就運動本身的价值來說，它是否應該進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農民有權開展這種運動，正如一個工廠的工人由於不滿經濟待遇有權舉行罷工一樣。這是我們從德里協定到西姆拉會談一貫的立場，政府對這點不但了解，而且表示尊重。

一九二九年及其以後的農業衰退的到來，使得一直不斷惡化的形勢達到了高潮。在以往許多年中，世界農產品價格趨向上漲，而附屬於世界市場的印度農業，也同樣有這種趨勢。全世界工農業發展方面的不平衡，促使各地農產品上漲。在印度，由於這些價格的上漲，政府的稅收及地主的地租也隨同上升，因此，實際耕種者並未從這種價格上漲中得到利益。整個說來，除了某些得到特惠的區域以外，農民的情況日益惡化。在聯合省，地租增加的速度比稅收要快得多，在本世紀頭三十年中，兩者增加的比例大約為五比一（憑我的記憶）。因此，當政府從土地獲得的收入大量增加了的時候，地主的收入則增加得更多，而佃農和以往一樣，還是在飢餓中掙扎。甚至在價格下跌或發生自然災害——旱災、水災、蝗蟲、冰雹等——的地區，地租和稅收仍維持原定的數目，某些削減也是在很勉強的情況下給予農民的，並且也只限於一季。地租的標準在豐年已屬過高；在其他情況下，農民不向高利貸者求援，簡直無法過活。農民所負的債務日益增加了。

农村中所有各个阶级——地主、自耕农、佃农都受到高利貸者的盤剝。后者在現狀下，对原始的农村經濟起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作用。他充分利用这种作用来替自己謀利，增加他对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人們的压榨，但对他却几乎沒有任何限制。法律給他援助，他憑票据索取并获得高利貸的本利。土地逐漸地从許多小地主及自耕农那里轉到高利貸者手中。他暴發起来，成为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大地主和豪紳。以往一向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現在几乎成为金融地主的农奴。佃农的地位甚至更坏。他也成为金融地主的农奴，否則，他只好加入日益扩大的被剝夺了土地的無产阶级队伍。金融家或銀行家就这样發展成为土地所有者，但他們与土地及佃农并無直接联系。他們通常住在城市，繼續他們的金融業務，而將征收地租的事情委托給代理人，后者办事，像机器那样的冷酷無情和毫無人性。

农民負債的繼續增長本身就証明了土地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巩固。絕大多数群众，不論在体力或物質財富方面都毫無剩余，沒有抵抗的力量，而在飢餓的边緣上生活着。他們經不起任何不幸的意外。一場傳染病的流行就会吞噬几百万人的生命。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据官方任命的省銀行調查委员会的估計，印度（包括緬甸）农民負債达到八十六亿盧比。这个数字包括地主、自耕农和佃农的負債，但其中以实际耕种者的負債为主。政府的貨幣政策完全对貸款阶级有利，从而又增加了負債人的重担。因此，不顧印度的强烈反对，將盧比匯价規定为一先令六便士，而不規定为十六便士，等于將农民負債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或是約十亿零七千万盧比[⊖]。

战后物价一度上漲以后，接着便逐漸地、繼續不斷地下降，农

民情况日益惡化。除了这一切以外，又增加了一九二九年及其以后的經濟大灾难。

我們一九三一年在联合省的斗争就是要使地租和物价相适应；换言之，即地租应该减低到以往物价和一九三一年同样低的时候通常繳納的数目。三十年前，約在一九〇一年，情况大致如此。这是一个粗略的試行办法，不容易实行，因为佃农有許多等級——有佃权的、無佃权的和轉租佃权的等等，受苦最深的还是最低級的佃农。唯一的其他試行办法，同时也是最公平的办法，就是計算佃农在扣除生产費用和生活費用之后的繳租力量。但是按照后一种試行办法，不論生活費用压得怎样低，印度大部分租地将变成毫無經濟价值，因为一九三一年联合省的几个实例表明，許多人如果不变卖財產（如果还有可卖的話），或者借高利貸，就根本不能繳租。

我們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最初的嘗試性的提議是：对一切有佃权的佃农，一般削減百分之五十；对境况更坏的佃农削減的百分比应该更高。当甘地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到联合省来拜訪省督馬尔科姆·海萊爵士时，他們之間的意見有些分歧，不能取得協議。不久以后，甘地向联合省的地主和佃农發出呼吁。在对后者的呼吁中，他要求佃农尽可能地繳租，建議削減田租的数字較高于我們以前提出的数字。我們省委员会接受了甘地的数字，但于事無补，因

⊙ 印度农民負債达到八十六亿盧比的数字也許估計过低，無論如何，在以往四、五年中，这个数字增加不少。根据旁遮普省銀行調查委员会在一九二九年的估計，关于旁遮普那部分的数字是十三亿五千万盧比。根据旁遮普省負債救济法案特別委员会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提出的报告說：“农民負債很大。据一般估計有二十亿盧比。”这个新数字几乎超过銀行調查委员会估計数字的百分之五十。如果其他省分农民負債的增長率与此相同，則全印度农民現在（一九三四年）負債的数字应该超过了一百二十亿盧比。

为政府不同意。

省政府的处境也很困难。土地稅是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它讓稅收化为烏有或大量削減,那它非面临破产不可。另一方面,它又極害怕农民暴动,希望尽可能地大量削減地租来平息农民的情緒。但是要想兩者兼顧,那是不容易的。在国家和耕种者之間,又有柴明达。从經濟观点来說,柴明达是一个無用而且不合需要的累贅。本来是可以牺牲柴明达来保护并帮助国家及耕种者的,但是,就英国政府的性質来說,为了政治原因,它不能把依附着它的少数階級之一疏远起来。

最后,省政府宣布对地主及佃农都削減稅收。这种削減是根据某种复杂的制度,最初也不容易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削減的数目显然是很不够的。此外,削減部分仅涉及到当年应繳的租稅,对于佃农的旧欠或旧債,則只字未提。很明显,如果佃农無力繳納目前半年的地租,他更不能偿付往年的旧欠或旧債。通常,地主总習慣將所繳的款項去抵偿宿欠。这种办法,在佃农看来,对他是很危险的,因为他随时都能够被地主以部分未繳欠款作为借口,来对他进行控告或夺去他的土地。

国大党的省执行机关陷于極其困难的境地。我們相信佃农遭到很不公平的待遇,然而,我們在这方面又無能为力。我們不想承担劝告佃农拒絕繳租的責任。我們一再重复說,‘他們应当尽力繳租,并对他們的不幸,表示一般的同情,企圖給他們鼓励。我們同意他們的看法,即索取的租稅,即使在削減以后,對他們来說,还嫌过高。

施行压力的机器,不論合法或非法的,都开始行动起来。几千人被控告,要沒收他們土地以偿欠租;他們的乳牛、小牛和私人

財產被扣押，而且还遭到地主代理人的毆打。大部分佃农繳付了部分欠租，据他們說，这在当时已达到他們所能繳納的最大限度。按照某些人的情况来看，也許他們还能够多繳一些，但根据絕大部分佃农的情况，这很明显地是一个重担。繳納部分租稅以后，他們并没有得到挽救。法律繼續施行压力，毫不容情地碾碎陷入它罗網中的一切。即使部分欠租已經繳納，耕地还是被判沒收；牛羊及私人財產还是繼續被扣押和拍卖。如果佃农分文未付，他們的情况也不致于更坏，事实上可能还要好些，因为他們至少省了那笔錢。

大批人到我們这里来訴苦，告訴我們他們按照我們的意見尽力繳租，但結果却落得这样下場。仅仅在阿拉哈巴区，就有好几千人被沒收耕地，对其他几千人又进行了某种控告。国大党区委员会办公处整天为頹喪的群众所包围。我自己的家也同样被圍。我时常想跑开，找个地方，甚至不論什么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这种可怕的苦境。到我們这里来的許多佃农身上都帶着伤痕，据說是給地主代理人毆伤的。我們將他們送到医院去治疗。他們怎么办？我們又怎么办？我們写了很長的信給联合省政府。我們委员会任命哥文·巴拉·潘特为我們的联络官，和在內尼塔尔或勒克瑙的省政府保持接触。他經常不断地写信給政府。我們的省委员会主席薛尔万尼有时也写信去，我也如此。

随着六、七月間雨季的到来，又产生了另一个困难。那时正值耕地播种季节。被夺去土地的佃农是否就这样閑坐着，眼看自己面前的田地荒蕪下去呢？对一个农民來說，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在很多場合下，沒收耕地仅仅是在法律上和字面上的沒收，而非事实上的迁讓。法庭的判決已經公布，但

并無其他措施。佃农是否会因耕地而構成非法侵占财产的罪狀，从而引起小規模的暴动？农民眼看別人耕种他們以往种的土地，也感到很难忍受。他們到我們这里来征求意见，而我們又能替他們出些什么主意呢？

当我和甘地在那年夏天去西姆拉时，我向印度政府一个高級官員提出了这个困难，問他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他会給农民什么忠告。他的回答使他現出了原形。他說如果有一个被夺去土地的农民問他这个问题，他就干脆拒絕答复！甚至他也不准备直截了当地告訴农民不要去耕地，虽然农民在法律上已被夺去土地。他高高在上地坐在西姆拉，輕而易举地發号施令，好像是在处理数学上的一个抽象問題。他和在內尼塔尔的省政府內的头子們都不接触人，也看不到人民的疾苦。

在西姆拉，政府告訴我們應該給农民的唯一忠告便是：他們應該繳納全部租稅，或者是尽力繳付。我們几乎事实上成了地主的代理人。我們确实說过这一类的話，如要求他們尽力繳付租稅等等。当然，我們还告訴过他們不要卖掉牛羊，或者再去借債。我們已經看到了这种后果。

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这是一个可怕的夏天，它使人感到很緊張。印度农民忍苦受难的能力是惊人的，而他一直忍受着超过他所应忍受的磨难——旱灾、水灾、疾病以及經常而难熬的貧困。当他不能再忍受的时候，他便安靜地、几乎毫無怨言地随着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倒下去，死了。这就是他得到解脫的办法。和他曾經遭受过的周期性的严重苦难相比，一九三一年的情况就算不得什么了。但是，一九三一年的事变，在他看来，并非自然所安排的不可知的、應該逆来順受的定数中的一部分；他想这是人为的結果，因

此，他对此表示憤恨。他接受的新的政治教育現在产生效果了。對我們來說，一九三一年的這些事變也是特別使人痛苦的，因為我們要負一部分責任。難道農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大部分依照我們的勸告嗎？然而，我却相信，如果不是我們經常給他們幫助，農民的境況会更加惡劣。我們將他們團結起來，他們始終是一種值得考慮的力量，因此，他們得到了他們在相反的情況下所不能得到的較多的免租額。即使他們遭受了那樣可怕的壓力和虐待，但對這些不幸的人來說，却還是常見的。不同之處一部分是在程度方面（現在是比較多了），另一部分是在公開宣傳方面。通常地主代理人虐待一個佃農，甚至對他施行酷刑，在农村里几乎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除非受害人因此死亡，在外地的人們也很少會知道。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因為我們的組織和農民新的覺悟使他們團結起來，將一切災害報告給國大黨的辦公處。

夏季一天天地過去，企圖強迫收租的辦法和高壓的行為都減少了。現在使我們為難的是處理大批被奪去土地的佃農的問題。對他們該怎樣辦？我們催促政府幫助他們領回土地，因為絕大部分田地還空着。更重要的是關於未來的問題。直到現在為止，所答應的減租額只限於上一季，至於將來，則毫無決定。從十月起，征收下一季的租稅將要開始。屆時將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是否還會經歷同樣的可怕情況？省政府任命了一個小委員會，由政府官員和一些在地方行政會議內當委員的地主組成，讓它來考慮這個問題。其中沒有農民的代表。到最後一刻，當委員會事實上已經開始工作的时候，政府才邀請哥文·巴拉·潘特代表我們去參加該委員會。潘特認為在那樣晚的時刻，重要決定已經作出，不值得再去參加了。

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也任命了一个小委员会，让它收集以往和现在的各种农业方面的资料，并对现存情势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长报告，其中包括关于联合省农村情况的精辟调查，以及关于农产品价格猛跌所造成的恶果的分析。他们的建议包括远大的计划。这份报告印成书籍出版，由哥文·巴拉·潘特、拉菲·阿马德·基德威和文卡泰什·纳拉扬·迪瓦里三人签署。

远在这个报告发表以前，甘地已去伦敦出席圆桌会议。他临行颇为犹豫，而造成他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便是联合省的农村形势。事实上，他几乎已经决定，如果他不到伦敦去出席圆桌会议，他要到联合省来，专门处理这个复杂问题。在西姆拉和政府举行最后会谈时，在讨论其他事情中，也谈到联合省的问题。在他启程赴英以后，我们使他充分了解情况的发展。在头一两个月中，我每星期经常寄航空信和平信给他。在他逗留英国的后期，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经常写信给他，因为我们希望他不久便会回国。他告诉我们，他最迟在三个月以内，即在十一月内回国。我们希望在那时以前，印度不致发生危机。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他离开印度期间避免危机，不和政府发生冲突。但当他归期延迟，农村形势开始迅速发展时，我们拍给他一份很长的电报，告诉他最近的发展，并指出我们将被迫表示态度的情形。他回电说他对此事无能为力，在当时也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嘱咐我们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下去。

工作委员会也得到国大党省执行机关的详细报告。我在那里经常把直接得到的情况告诉他们。但是，当事情变得严重时，委员会也和我们的省委员会主席薛尔万尼及阿拉哈巴区委员会主席坦顿会商。

政府的农村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报告书，提出了某种建议案，但

是它既复杂又籠統，并且留下許多問題讓地方官員处理。整个說来，它所建議的減租額大体上比較上季为大，但我們觉得还是不够。我們对于建議案所根据的原則及其实施办法都表示反对。除此以外，报告書只涉及到將来的問題，而对旧欠、債務以及大批被夺去土地的佃农的問題都置之不顧。我們將怎么办呢？难道还像我們在春夏兩季那样，只劝导农民尽力繳租，而得到同样的后果么？我們已經看到，那种劝告是最愚蠢的，不能再重复了。农民或是努力將新規定的租額全部繳清，假如他們能够办到的話；不然，現在就根本不付，等待發展。繳納一部分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佃农的財力耗尽了，同时也失去了土地。

我們国大党省执行机关詳尽确切地考虑了这个立場后决定：政府的建議案，虽然較它在夏季提出的減租办法有所改进，但就其現有的內容來說，还不宜于接受。当时还有可能使建議根据农民的利益再作修改，于是，我們就在这方面去督促政府。但是，我們感觉希望很小，而我們企圖避免的冲突却似乎相当迅速地来到了。省政府和印度政府对国大党組織的态度不断改变，并且愈来愈严厉。我們寄去長信，只得到簡短的答复，要我們和地方官員接洽。政府的政策显然是不給我們絲毫帮助。政府感到为难和不滿的是，国大党的威信可能会由于政府核准农民減租而提高。政府由于長久的習慣，只能从威信方面来考虑問題，而当它想到群众可能將減租归功于国大党时，它便感到刺激，因此，它要尽可能地来避免这点。

就在这个时候，我們从德里和其他地方接到报告，說印度政府正准备对整个国大党运动發動一次大进攻。小手指現在变得更加頑強了，用有刺的鞭来懲罰我們。我們甚至接到許多关于这种进

攻的詳細情况报告。我想大概是在十一月里，安沙利医生给了我（另外还给了国大党主席維沙尔海·巴特尔）一封信，証实了我們以前所接到的許多报告，并且特別詳細地陈述了即將在边省和联合省实行的法令。我相信，在孟加拉省已經实行一个新法令，不然，就是行將实行，好几个星期之后，安沙利医生的信甚至連細節都得到了充分的証实，当时新的法令頒布了，好像是为了应付新局势似的。根据一般推測，政府因圓桌會議出人意外地延長了会期而展緩行动。他們希望在圓桌會議上彼此甜言蜜語、空話連篇的时候，避免在印度进行大規模的鎮压。

因此，形势愈来愈緊張。我們大家都感到事变不顧我們的心願而向前發展，誰也不能阻止它走上注定的道路。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准备自己来迎接这些事变，个别和共同地在人生戏剧——多半是悲剧中，扮演我們的角色。但是我們还希望甘地在武力冲突的幕帳揭开以前会回来，肩負起和平或战争的責任。在他离开印度期間，我們誰也沒有准备去負起那种重担。

在联合省，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步驟，在农业地区引起了騷动。减租通知分發給佃农，說明准許減去的租額，但又威胁說，如果現在应繳的租額不在一个月（有时限期还要短）內繳清，减租將會取消，以法律手續追納全数，后者意思是指沒收土地，扣押財產等等。往常，佃农一向在兩三个月里分期繳租。現在，甚至連这种慣常的期限都取消了。整个农村突然面临危机，佃农手里拿着通知，东奔西走，抗議、訴苦并向人求教。在政府或他們的地方官員方面來說，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威吓。我們后来听說这并不是当真的。然而，它却大大地减少了和平解决的机会，而不可避免地一步步引向冲突。

現在农民和国大党必須很快地加以抉擇；我們不能拖延到甘地回来才作決定。我們將怎样办？我們給农民什么劝告？我們明知道他們許多人無能为力，难道我們能够据理要求农民在限定的短期內繳付所索取的租稅么？还有他們的旧欠又將怎么办？即使他們繳了大部分租額，或甚至付清本季的租稅，但也可能被用来偿付旧欠，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們不会遭受沒收土地的危險么？

国大党阿拉哈巴区委员会和它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表示抗議。它作出決定：它不能劝导农民繳租。但是，它得到通知，在它沒有得到省执行机关和全印度工作委员会的正式批准以前，不得采取任何进攻的步驟。因此，这件事情被提到工作委员会，薛尔万尼和坦頓都出席了會議，为省和区說明情况。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只涉及到阿拉哈巴区，而且这是一个純粹經濟性質的問題。但是我們認識到在当时的政治緊張状态下，這個問題可能产生深远的后果。是否應該准許阿拉哈巴区委员会劝导农民暫時不付地租或稅收，而等待进一步的协商和更好的条件？这是范围狹窄的爭端，我們想以此为限，但是否能够做到？工作委员会希望在甘地归国以前尽一切力量避免和政府破裂，特別要在一个可能發展为階級爭端的經濟問題上，避免破裂。委员会在政治上虽然是进步的，但在社会方面并非如此，它不願提出佃农对地主的問題。

由于我有社会主义的傾向，因此，在經濟和社会問題方面，不能算作一个妥当的顧問。我自己感到工作委员会應該認識：联合省的局势是如此緊張，甚至我們比較温和和右傾的委員也为事实所迫而采取行动，虽然他們并不情願。因此，我欢迎我們省的薛尔万尼及其他人員出席委员会的會議，因为薛尔万尼（我們省委员会主席）并不是一个过激人物。他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原是国大党内

的一个右翼分子，在今年年初，他对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的农村政策，抱有成見。但当他自己成为委员会的首腦，不得不負起重担时，他才認識到我們沒有其他出路。省委员会嗣后所采取的每个步驟，都經過委员会和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而且事实上，时常是通过他这个主席的。

因此，薛尔万尼在工作委员会會議上的呼吁，对委員們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比我所能产生的要大得多。委員們非常犹豫，但覺得無法拒絕，于是授权联合省委员会可以在任何地区准許停付地租和稅款。但在同时，他們力劝联合省人民尽量避免这个步驟，而和省政府进行談判。

談判进行了一个时期，但很少結果。我相信，阿拉哈巴区的减租額已稍有增加。在平常的情况下，可能会达成一項和解，或至少避免公开冲突。双方分歧的范围正在縮小。但是环境与一般情况不同，政府和国大党双方都感到無法避免即將来临的冲突。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每个步驟，似乎都表示有意在布置障地。政府的这种准备工作能够并且也确实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和完成的。我們的力量完全依靠人民的意志。这不能用秘密活动来准备或提高。我們中間有些人——我便是后来被政府指責的人們中間的一个——常在公开演講中一再重复說：爭取自由的斗争并未結束，我們在最近的將來將不得不面临許多艰难困苦。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对此作好准备。因为这个緣故，我們被指責为战争販子。事实上，在我們中产階級的国大党工作者方面，显然有不願正視事实的心理，而希望以种种方法避免冲突。甘地尚在倫敦，这也分散了一般看报的人的注意。但是，尽管知識分子这样被动，事态还是繼續向前發展，特別是在孟加拉、边省和联合省；在十一月里，許多人都

开始了解危机是日益迫近了。

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惟恐在冲突发生时来不及应付仓卒的事变，所以在内部进行了一些布置。阿拉哈巴区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大会，通过一项暂时性的决议，说明如果不能得到更好的条件，他们不得不劝导农民停付地租和税款。这个决议大大地触怒了省政府。它把决议当作宣战的理由，拒绝再和我们进行任何交涉。这种态度又在国大党省委员会方面引起反应，委员会把这当作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于是加紧自己的准备。在阿拉哈巴，又举行了一次农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更强硬、更明确的决议，要农民停付租税，以等待进一步的交涉和更好的条件。即使在当时，以至最后，所采取的态度也并不是进行“抗租”运动，而是进行争取“公平合理的租税”运动。我们继续要求谈判，而对方却傲然拒绝。阿拉哈巴决议对地主和佃农同样适用，但我们明白，事实上它只适用于佃农和一些小地主。

这就是联合省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的形势。与此同时，孟加拉和边省的事变也酝酿成熟。在孟加拉，已经实行了一项范围极其广泛的新法令。所有这些都是战争的而非和平的征兆。于是便产生了下列问题：甘地何时归来？他是否会在政府发动它准备已久的大进攻以前到达印度？否则，他是否会在抵达印度时发现他的同事已被关在狱中，而斗争已经开展？我们知道他已在归途中，将在本年最后一周到达孟买。我们每个人、在国大党总部或各省的每个杰出工作人员都要在他归来以前避免这个斗争。即使从斗争本身来看，我们也希望和他会见，得到他的忠告和指示。这是一个我们无能为力的竞赛，主动权操在英国政府手里。



第四十章 休战状态的终止

尽管我忙于联合省的事情，我久已渴望去访问其他两个多事的地方——边省和孟加拉省。我想前去实地研究情况，并访问老同事们，因为我和其中许多人快有两年没有见面了。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想对这两省人民的英勇精神以及他们在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表示敬意。边省我暂时不能够去，因为印度政府不同意任何著名国大党人前去访问，而我们鉴于政府不同意，也不愿去，因此，便形成了一种僵局。

在孟加拉省，局势日益恶化。虽然这个省很吸引我，但我在行前还是犹豫不决。我知道我在当地必定无能为力，并且对实际情况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在孟加拉国大党两派人物之间存在着令人惋惜的长期纠纷，久已使外地的国大党人有所戒心而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惟恐被卷入任何一方。这是一种软弱无力、掩耳盗铃的政策，对于缓和孟加拉的形势或是解决它的问题，都没有帮助。在甘地去伦敦后不久，有两件事情突然使全印度的注意力集中在孟加拉的形势上。这两件事发生在赫其里和吉大港。

赫其里是一个监禁拘留犯的特别拘留监狱。根据官方的宣布说，狱中曾经发生暴动，拘留犯袭击管理人员，后者被迫开枪，结果，一个拘留犯被击斃，很多人受伤。当地官方事后立即进行调查，把管理人员这次开枪及其后果的一切责任，都加以开脱。但

是，調查報告中却有許多离奇的特点，同时，某些和官方調查報告不符的事实也泄露了出来，因此，大家强烈要求官方进行更詳尽的調查。孟加拉省政府，一反印度官方的慣例，任命一个由高級司法官員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这是一个純粹官方的委員會，但它却收集証据，充分考虑事实，調查結果認為責任在拘留監獄的管理人員方面，过錯大部应由他們負責，并且開槍是不應該的。由此可見政府以前关于这件事情所發表的公報，完全是捏造的。

赫其里这次事件的經過，並沒有有什么特殊之处。但不幸这种事件或意外在印度并不少見。人們常在報上讀到“監獄暴動”，以及关于赤手空拳、無力自衛的囚犯們在獄中受到武裝警衛橫暴鎮壓的消息。赫其里事件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暴露了，而且由官方暴露了政府关于这种事件所發表的公報的片面性，甚至虛假性。以往，这些公報沒有多大信用，而現在它們完全被戳穿了。

赫其里事件以后，印度各地許多監獄出了事，監獄管理人員有时開槍，有时用其他武力。很奇怪的，在这些“監獄暴動”中，似乎只有囚犯受伤，而官方几乎照例發布公報，譴責囚犯們行为不当，替管理人員开脫。管理人員很少受处分。一切申請进行詳細調查的要求，都被断然拒絕，而認為一个部門的調查已經足夠。政府显然从赫其里事件中吸取了很好的教訓，即它感到进行真正大公無私的調查是不妥当的，而最好的法官便是被告本人，人民也应该吸取赫其里事件的教訓，即要認識到政府公報只会告訴我們政府要人民相信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真相。关于这点，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吉大港事件严重得多了。一个恐怖分子開槍打死了一个穆斯林警官。接着便發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間的冲突。然而，这次

冲突的意义显然不仅限于这点，它和通常教派间的冲突有所不同。很明显，恐怖分子的行动和教派主义并無关联；这个行动是針對一个警官而發的，倒沒有注意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不过事后确实發生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間的冲突。这些冲突怎样产生以及原因何在，都还没有弄清楚，虽然負責的公众人物已經提出了很严重的控告。暴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屬于一定集团的其他人士，如欧印混血种人——主要是鉄路职员——和其他政府职员参与其间，据说他們肆行大規模的报复行动。杰·姆·森—古普塔和孟加拉其他著名領袖对于吉大港事件都發表特別声明，要求調查，甚至要提出誹謗案的控訴，但政府宁願不采取这种步驟。

吉大港这些多少有点特殊的事变，使人密切注意到两种危險的可能性。恐怖主义受到了許多不同观点方面的譴責；甚至現代的革命策略也对它譴責。但是它可能产生的后果之一却一直使我感到特別畏惧，这便是零星的和教派的暴行在印度蔓延的危險。我并不是一个畏惧这种暴行的“胆小的印度人”，虽然我实在对它感到厭惡。然而，我确实感到在印度，破坏性的力量还是很大，而零星的暴行一定会增强它的力量，从而会使得建立一个統一而有紀律的国家的过程，变成比現在要困难得多的任务。当人們在宗教的名义下，或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升入天堂而杀人时，如果使他們习惯于恐怖暴行的观念，那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政治謀杀是惡劣的。然而，政治恐怖分子还可以理喻，可以被爭取过来，走其他道路，因为他所努力的目标，大概还是屬于人世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民族。宗教性的謀杀更加惡劣，因为它涉及到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人們对于这种事情，甚至無法理喻。有时兩者之間的分界

綫，非常微妙，几乎是难于划分，政治謀杀，由于唯心主义的关系，变得帶有半宗教的性質。

在吉大港發生的恐怖分子杀死警官的事件及其后果，使人很清楚地認識到恐怖活动的危險的可能性，以及它可能对印度統一和自由的事業帶來的巨大損害。事后發生的那些报复行为也使我们了解法西斯手段已在印度出現。从那时以来，特别是在孟加拉，曾經發生許多关于这种报复行为的事例，而法西斯精神無疑地已在印度的欧洲人和欧印混血种人中間流行起来。有些依附英帝国主义的印度人也感染了这种法西斯精神。

奇怪的是恐怖分子們自己，或其中許多人，也有这种法西斯观点，不过它的方向不同。恐怖分子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和欧洲人、欧印混血种人以及上層階級的印度人的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針鋒相对。

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到加尔各答去了几天。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忙碌，除了私下和个人及团体会見以外，还得在一些群众會議上演講。在所有这些会上，我都講恐怖主义這個問題，企圖說明它对印度的独立是多么錯誤、無益和有害。我並沒有辱罵恐怖分子，也沒有像我們某些自己很少企圖去做一点勇敢或冒險行为的本国人士那样，称他們为“胆小鬼”或“懦夫”。我总觉得將一个时常冒着生命危險的男子和妇女称为懦夫，是一件極其愚蠢的事情。上述男女对此的反应是，他們更加蔑視这些怯懦的批評者，因为他們只站在远处嚷叫，而不能做出任何事情。

我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晚，在我該去車站前不久，兩個青年前來訪我。他們很年輕，年紀大約在二十岁左右，臉色蒼白，帶着一種神經質的表情，眼睛炯炯發光。我不認識他們，但很快地便猜出

他們的來意。他們對我反對恐怖暴行的宣傳，感到非常憤怒。他們說這對青年會產生一種壞的影響，他們不能容忍我這樣的干涉。我們展開了一些爭辯；但由於我動身的時間已近，彼此爭論得很匆促。我想我們的聲音是提高了，脾氣也發作起來，我告訴他們一些冷酷的事實；當我離開他們時，他們最後警告我說，如果我在將來對自己的言行還繼續不檢點的話，他們會以對付別人的手段來對付我。

我便這樣離開了加爾各答。當我那晚躺在車中鋪位上的時候，這兩個青年激動的臉使我久久不能遺忘。他們充滿了生命力和充沛的精力；只要他們走上正路，將會變成多么有用的人材！我很懊悔自己很匆忙地而且相當粗暴地去對待他們，我希望當時能有機會和他們長談。也許，我能夠說服他們，讓他們把自己光明而年輕的生命貢獻於其他方面，例如為印度和為自由而服務，在這方面，不會沒有表現英勇和自我犧牲的機會。嗣後這些年來，我時常想起他們。我從未查出他們的姓名，再也找不到他們的下落；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已經死了；或是被關在安達曼群島上的監獄里。

這時已是十二月。第二屆農民大會在阿拉哈巴開幕，接着，我便匆匆南去卡納塔加，以實踐我很久以前向我“印度斯坦西瓦達爾”老同志哈迪克博士所作的諾言。“西瓦達爾”是民族運動的志願隊組織，一直是國大黨的輔助團體，雖然它的組織是分開的。然而，在一九三一年夏天，工作委員會決定把它全部吸收到國大黨的組織里來，使它成為國大黨的志願隊部。這件事情實現以後，哈迪克和我被任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達爾”的總部還繼續在卡納塔加省的赫勃列地方。哈迪克因為“達爾”有關的各種職務，便勸我到當地去。於是，他陪我在卡納塔加游覽了幾天。我對各地人民深

厚的热忱，感到惊奇。在归途中，我訪問了以戒严法出名的城市紹拉浦。

在卡納塔加的游历，对我來說，是一場临別表演；我的演說变成了最后的离歌，这些演說或多或少地是一种攻击性的，大概并不美妙动听。从联合省傳来的消息是很确切而且清楚的，政府已經进攻，并且攻势凶猛。在我由阿拉哈巴赴卡納塔加途中，我和我的妻卡麦拉曾去孟买。她又患病，我在孟买替她接洽医疗。就在孟买，几乎就在我們剛从阿拉哈巴到达以后，我們听說印度政府已經对联合省頒布了一項特別法令。政府决定不等待甘地抵达印度，虽然他已在航程中，不久便会到达孟买。新法令据說是对付农村騷动的，但它范围極其广泛，使一切政治和公共活动都变成不可能了。它甚至規定父母和监护人由于他們兒女及被保护人的罪过也应受处罰。这是一种違反聖經的措施。

大約就在这个时候，我們讀到据說是甘地去羅馬接見“意大利日报”記者談話的报道。这使我們感到意外，因为他不会在羅馬隨便接見記者并發表这种談話。我們仔細研究以后，發現許多字句不像他說的，即使在甘地的否認傳來以前，我們已經明了，接見記者談話的經過不会像發表的那種情况。我們認為他的談話一定被歪曲了。接着，便傳来了他否認这次談話的有力声明，并說他在羅馬根本沒有接見任何記者。很明显地，有人在作弄他。但使我們驚訝的是，英国的報紙和公众人物不相信他的声明，而且还以輕蔑的口吻，称他为騙子。这使我們感到可恨亦复可惱。

我迫切地想取消在卡納塔加的旅行回到阿拉哈巴去。我感到我應該和我的同志們一同在联合省。当本省多事的时候，而我远在外地，使我感到痛苦。但是，我决定按照預定去卡納塔加的計劃

办事。在我从孟买回来时，有些朋友劝我留在孟买等候甘地回来，因为他恰恰在一周以后便可到达。但是这不可能。从阿拉哈巴传来了坦顿及其他人士被捕的消息。此外，我们的省大会规定在那周在依达瓦举行。因此，我决定到阿拉哈巴去，六天以后，如果我还自由的话，再回到孟买来会见甘地，并参加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我让卧病未愈的卡麦拉留在孟买。

甚至在我抵达阿拉哈巴以前，在奚沃基车站，一项根据新法令签发的命令传达给我。在阿拉哈巴车站，又把这项命令的副本传达给我；在我家里，又第三次把命令传达给我。很明显，他们办事很仔细，怕出漏洞。命令将我幽禁在阿拉哈巴的市区以内，并告我不得参加任何公众集会，或任何社交活动，不得公开演说，或在报上或印刷品中撰写任何文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限制。我发现同样的命令也传达给我的许多同事，其中包括薛尔万尼。第二天早晨，我写信给签发这项命令的县长，告诉他我已接到命令，但却通知他，关于我准备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不能遵照我从他那里接到的命令。我将以日常的态度进行我日常的工作。在进行这种工作的过程中，我计划不久便回孟买去接甘地，并参加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因为我是该会的书记。

一个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联合省大会决定在那个星期在依达瓦举行。我从孟买回来，本想建议延迟会期，因为它和甘地到达的日期有些冲突，同时也想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但是在我回到阿拉哈巴以前，联合省政府给我们的主席薛尔万尼一封措词武断的公函，询问我们的大会是否会讨论农村问题，如果讨论的话，他们就要禁止开会。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显然就是要讨论震动全省的农村问题；如果开会而不讨论这个问题，那真可笑之至，

并且是自己同自己开玩笑。無論如何，我們的主席或任何其他人都無權約束大會。撇開政府的威脅不談，我們有些人本想展緩會期，但政府這種威脅却引起一種變化。我們許多人在這種事情上相當固執；當我們想到對政府要唯命是聽時便感到不愉快。經過長期辯論以後，我們決定委曲求全，將會議延遲。我們這樣決定，可以說是幾乎不顧任何代價使得已經開始的衝突在甘地回來以前避免發展下去。我們不想使他面對一種他無法控制的形勢。儘管我們延期舉行省大會，但在依達瓦，還出動了大批軍警，一些分散的代表們被逮捕，在當地舉行的國貨展覽會也被軍隊沒收。


我和薛爾萬尼決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離開阿拉哈巴前去孟買。薛爾萬尼被特別邀請去參加工作委員會會議，以便商討聯合省的局勢。我們兩人都接到根據新法令簽發的命令，禁止我們離開阿拉哈巴市。新法令據說是用來對付阿拉哈巴農業地區，以及聯合省其他區域的停止繳租活動的。政府禁止我們訪問這些農業地區的用意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很明顯地，我們不能在孟買市煽動農民；新法令如果真是用來對付農村形勢的話，應該對我們離開本省表示歡迎。自從新法令頒布以來，我們的一般政策是自衛性的，我們避免和它衝突，雖然曾經發生過個別不遵守命令的行動。就聯合省國大黨來說，很明顯地，他們至少在現在要避免或延遲和政府的衝突。薛爾萬尼和我將去孟買，在那里，甘地和工作委員會會考慮這些問題。沒有人會知道——當然我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們可能做出什麼最後決定。

所有這些想法使我認為我們將被准許前去孟買，而在字面上違反幽禁命令，至少暫時會得到政府的寬容。但是，我內心里並不這樣想。

当我们上车后，我们在当天晨报上读到对边省颁布的新法令，以及加法尔·汗和汗·萨希卜博士等被捕的消息。不久，我们乘的火车——孟买邮车——突然停在一个平常不停靠的小站——依拉达冈。警官们上车来逮捕我们。一辆押送囚犯的车子在铁道旁等着，我和薛尔万尼被送上这辆紧闭的囚车，一路颠簸地前往内尼监狱。警察长是个英国人，他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早晨来逮捕我们，脸上显得快快不乐。我担心由于我们的关系，使他的圣诞节大煞风景。

于是，到监狱去！

“让你暂时离开幸福，
在短促的日子里受些痛苦。”



第四十一章 逮捕、特种法令 和剥夺人权

在我們被捕后兩天，甘地抵达了孟买，直到那时，他才了解最近的发展。他在倫敦听到孟加拉的特别法令，使他心緒非常繚乱。現在，他發現新鮮的聖誕节礼物——联合省和边省的法令正在等着他，而他在联合省和边省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已經被捕。大局似乎已定，一切和平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但是，他还在努力寻找出路，为此，他企圖和总督威灵頓勋爵进行一次会談。他从新德里方面得到通知說，这次会見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是：他不得談論最近在孟加拉、联合省和边省發生的事变，以及新的法令和根据法令而进行的逮捕。（我憑記憶写了这些話，手边沒有总督答复的全文。）除了这些被禁止討論的震动全国的議題以外，人們無法理解究竟还有什么問題，在官方看来，甘地或任何国大党領袖應該和总督商談的。現在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决心要粉碎国大党，不准备和它打交道。工作委員會除了采取和平抵抗以外，沒有其他道路。他們等候随时被捕，但在他們被迫离开以前，他們想对全国产生一种領導作用。即使如此，通过的和平抵抗的決議还是暫時性的。甘地又去嘗試去会見总督，他發給总督第二个电报，要求無条件的会見。政府的答复是把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加以逮捕，并令全国开始严厉的鎮压。很明显，不論別人要

不要斗争，但政府对此却感到迫切需要，并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們被关在監獄中，所有這些消息都是模糊地、斷斷續續地傳到我們這裡。對我們的審訊，延至新年舉行，因此，我們以听候審訊者的資格，比一個囚犯得到更多的會見機會。我們聽說，關於總督是否應該同意會見甘地這點，外間正在議論紛紛，好像同意與否都真有关系似的。這個會見問題沖淡了其他一切問題。據說歐文勛爵一定會同意這次會見，而如果他和甘地會見，一切都會得到圓滿解決。我對於印度報界對時局所持的這種極其膚淺的看法以及他們對事實的忽視，感到驚訝。難道印度民族主義和英帝國主義——歸根結蒂，兩個無法調和的東西——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能夠縮小到個人一時的私見么？難道兩種歷史力量的沖突能夠給彼此的微笑和相互的禮貌所消滅么？甘地是被迫採取行動的，因為印度的民族主義不能切腹自殺，或是在重要問題上心甘情願地去服從外國的指令；英國駐印總督必須採取特別行動來對付這種民族主義的挑釁，努力保護英國的利益。至於當時總督是誰，絲毫沒有區別。歐文勛爵的行動可能完全和威靈頓一樣，因為他們都不過是英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僅能在既定的路綫上做些無關宏旨的改動而已。事實上，歐文勛爵後來成為英國政府中的成員，他和官方在印度所採取的步驟完全有關。以英國在印度所實行的政策而去頌揚或指責個別總督，在我看來，是極愚蠢的事情。我們沉湎於空談的這種習慣，只能是由于對實際問題的茫然無知，或是对它們故意規避。

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是個值得注意的日子。在這一天，爭論和商討都停止了。那天清早，甘地和國大黨主席瓦拉拜·巴特爾

被捕，未經審訊而被当作国事犯監禁起來。同时又頒布了四項新法令，將極廣泛的權力授予地方官員和警官。人民權利不復存在，當局可以任意逮捕人和扣押財產。這是對全印度宣布的一種戒嚴狀態，其適用範圍的廣狹以及程度的深淺均由地方當局酌量情況決定。[⊖]

在一月四日那天，我們在內尼監獄中根據所謂聯合省緊急權力法令受審。薛爾萬尼被判六個月嚴厲監禁和一百五十盧比罰款；我被判兩年嚴厲監禁和五百盧比罰款（如不繳納的話，額外增加六個月徒刑）。我們的罪行是相同的；我們接到被幽禁在阿拉哈巴市的同樣命令；我們由於企圖一同前往孟買，而同樣違反了這個命令；我們在同一項條款下，一同被捕並受到審訊，但我們的判決卻不相同。我和他的行動有一個不同之處，即我曾寫信給縣長，通知他我將不顧法令限制而去孟買；薛爾萬尼沒有發過這種正式通知，但他預定離開阿拉哈巴的計劃同樣是眾所周知的，並且報上也曾提到。緊接着判決以後，薛爾萬尼詢問審判官，他的判決較輕是否由於考慮到教派問題的關係，結果引起哄堂大笑，而審判官卻感到很狼狽。

在一月四日那個命定的日子裡，全國發生了許多事變。在阿拉哈巴市，距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廣大群眾和軍警發生了衝突，照常有木棍襲擊，造成了傷亡。監獄充滿了和平抵抗的囚犯。最初，這些囚犯被送到各區監獄，而內尼監獄和其他大的中央監獄只收容各區監獄容納不下的囚犯。後來，所有監獄都人滿了，於是便設立大的臨時監獄。

⊖ 印度事務大臣薩繆爾·霍爾爵士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下議院宣稱：“我承認我們核准的法令非常嚴峻，它幾乎包括印度人民生活的一切活動。”

极少数几个人被送到内尼监狱的小囚营里来。我的老同伴纳马达·普拉沙德和朗吉特·潘迪特以及我的堂弟穆汗拉·尼赫鲁同我们聚在一起。在我们六号囚房这个友谊小团体里，意外地加入了阿鲁维哈尔，他是从锡兰来的一位年轻朋友，刚从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回来。我的妹妹曾经嘱咐他不要加入我的示威运动；但在一时热情的冲动下，他参加了一个国大党的游行。接着一辆囚车便将他送到监狱中来。

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从工作委员会开始，一直到省委员会及无数的地方委员会。随同国大党，一切和它联盟的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組織都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合会、进步的政治組織、国立大学、学校、医院、国货公司及图书馆。这些名单确实惊人，每个主要省份都包括几百个名字。全印度的总数一定会达到几千。这些被宣布为非法的团体的数目本身就是赞扬国大党及民族运动成就的证明。

我的妻子还在孟买，卧病未起，她悔恨自己不能参加和平抵抗。我的母亲及两个妹妹都热烈地投入了这个运动。不久，两个妹妹都被关到监狱中来，每人被判一年徒刑。零星片断的消息经常通过新来的人传给我们，或者通过准许我们阅读的当地周刊传来。我们对于外面发生的许多事情，只能猜想，因为新闻检查很严，报纸和通讯社经常面临被罚巨款的危险。在某些省份里，甚至连提到被逮捕或被判决的人的名字都算犯罪。

因此，我们坐在内尼狱中，和外面的斗争隔开，然而又千丝万缕地和它連結在一起。我们忙于织布、读书或其他活动，有时也谈论其他事情，但经常想到监狱围墙外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身在斗争之外，然而又在其中。有时，我们很紧张地盼望着；或是对某

些錯誤的事情感到憤怒，對於軟弱和庸俗的行動覺得厭煩。有時，我們又超脫得出奇，能夠冷靜地、平心靜氣地觀察實際情況，感到當雄厚的力量正在行動起來，以牙還牙的行為也正在進行的時候，微小的個人錯誤和弱點都無關重要。我們懷疑明天將會對鬥爭、騷動、高貴的熱忱、殘酷的鎮壓和可恨的怯懦帶來什麼結果——所有這一切的前途如何？我們往何處去？未來被隱匿起來，使我們不能看到，而它被隱匿起來也好；就我們來說，甚至現在也部分地被遮蓋起來。但是我們卻了解：在現在和未來都會有鬥爭、苦難和犧牲。

“人們明天將在原野上重新作戰，
鮮血會把桑瑟斯古城染紅；
海克特和艾杰斯又將踏上沙場，
觀戰的海倫會佇立在城頭。

我們會默默地死去或轟轟烈烈地戰鬥，
時而盲目地樂觀，時而看不見前途；
我們希望貢獻出我們生命的一切，
但永遠不會知道靈魂行將如何。”[⊖]

⊖ 馬休·阿諾德的詩。



第四十二章 胡說八道

在一九三二年头几个月中，除了其他事項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当局胡說八道非常起勁。官員們，从上到下，大言不慚地說他們是如何善良温和而国大党是如何罪大惡極并且兴風作浪。他們代表民主，而国大党却贊成独裁。国大党的主席难道不是被人称为独裁者嗎？他們在为了实现一个正义事業的热情的支配下，忘記了一些小事，例如頒布各种法令，剝夺一切自由，封閉报纸和出版社，未經审讯便监禁人民，沒收资产錢財以及每天發生的許多古怪事情。他們也忘記了英国在印度的統治的基本性質。政府的部長們（我們本国人）滔滔不絕地說国大党在监牢中“別有用心”，而他們却为公共的利益辛勤地工作，享受的待遇不过是每月几千盧比的微薄薪金。下級官吏們不仅判处我們重刑，并且还这样来教訓我們，有时还辱罵国大党以及和国大党有关的个人。甚至薩繆尔·霍尔爵士以他身为印度事务大臣的庄严崇高的地位，竟然會說，尽管狗在狺狺地叫，但旅行队依然前进。他暫時忘記了狗已被关在獄中，不能輕易吠叫；而那些还在外面的狗也被帶上了有效的口罩。

最出人意外的是，康波尔教派暴动的責任却推到国大党身上。这些可怕的暴动情况已經被揭露出来，而政府却一再宣称国大党要对它負責。就事实經過來說，国大党在这次暴动中起了惟一的

正当作用，它最高贵的兒子之一在其中牺牲了，引起康波尔各个集团和教派的悲悼。国大党喀喇蚩會議，接到暴动的消息以后，立刻任命了一个調查委員會，进行最周密的調查。經過好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委員會發表了長篇报告，但立刻給政府禁止，印刷出版的报告也遭到沒收，据我猜想，且被銷毀了。这种封鎖調查报告的企圖并没有促使我們官方評論家和英国人經營的报纸不再时常重复說暴动是由于国大党工作的緣故。毫無疑問，在这件以及其他事情上，真理最后总会胜利，但有时謊言在最初总占优势。

“謊言在达到一切目的以后，終会消灭；
真理是偉大的，它会胜利，
但是到那时候，誰也不会管它是否胜利。”

我認为这种歇斯底里的战争心理状态的表現是非常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誰也不能期望真理和自我克制还能存在。但是这种心理似乎出人意料之外，就它剧烈的程度和無所顧忌的态度來說，也令人驚訝。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印度的統治集团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們过去是如何地在克制自己。他們的憤怒也許并不是由于我們的任何言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們自己以前担心失去帝国的畏惧变成了现实。对于自己力量具有信心的統治者們不会像这样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这种情况和另一种情况的对比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一切都很沉寂。但这种沉寂并不是由于自發的庄严的克制而产生的沉寂，而是由于監獄、恐惧和無所不包的檢查所造成的沉寂。如果沒有这种强迫的压制，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样也会产生歇斯底里似的發泄、以及夸大事实和謾罵。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一个發泄的地方——这便是各个城市时常出版的非正式的新聞刊物。

在印度，由英國人經營的英印報紙也興致勃勃地投入了這種低級宣傳，它們談論出並且揭露了許多思想，這些思想也許很久以來已經形成，但是却秘密地加以控制。通常，他們對自己的言論，總要謹慎一些，因為他們的讀者是印度人。但是在印度發生的危機却掃除了一切束縛，使我們看到一切英國人和印度人的思想。在印度，只有很少幾家英印報紙，它們逐漸地衰亡了。所剩下來的一家，就它登載的新聞和一般的編排印刷來說，都是高級刊物。它們發表的關於世界大事的重要文章，雖然一向代表保守觀點，但是却寫得很精辟，顯示出對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從新聞報紙的標準來看，毫無疑問，它們也許是印度最好的報刊。但是在印度政治問題上，它們的水平便突然下降。它們對於這些問題的处理變得非常片面，而在危機時期，這種偏袒時常變成歇斯底里似的，而且庸俗不堪。它們忠實地代表着印度政府，它們經常為政府所作的宣傳是非常狂妄的。

和這些少數出色的英印報紙相比，印度報紙的質量常常是很低的。它們的財源有限，而在報館老板方面，也很少設法去加以改進。它們每天很困難地維持下去，而那些不幸的編輯們的日子也并不好過。這些報紙的編排印刷的質量很差，它們登載的廣告時常也是最俗惡不堪的。它們對待人生和政治的一般態度流於多愁善感，並且充滿歇斯底里。我猜想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是個多愁善感的民族；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使用的工具（指英文報紙）是一種外國語言，因此，不容易寫得簡練而有力。但真正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所有的人由於長期遭受壓迫和奴役，處於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中，因此在各種抒情的地方都洋溢着情感。

在印度人辦的英文報紙中，就編排印刷和新聞業務來說，也許

以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報”最為出色。它總令人想起一位高貴的老處女，非常拘謹端莊，在她面前說句髒話，就會使她暈厥。它顯然是生活優裕的資產階級的報紙。它不敢正視生活的陰暗面，以及人生的坎坷、波折和沖突。還有幾種論調穩健的報紙也有這種“高貴的老處女”的標準。它們達到了這種標準，但缺乏“印度教徒報”的特徵，結果，在各方面都極其枯燥。

政府顯然對進行這次打擊準備得很久，它想要使這次打擊在一開始便尽可能地徹底和沉重。在一九三〇年，政府經常企圖以新的法令來應付不斷惡化的形勢。當時主動權操在國大黨手中。一九三二年的方式不同了，政府一開始便全面進攻。根據許多全印度和各省的法令，一切可能的權力都准予施用；組織被宣布非法；房屋、財產、汽車以及銀行存款都被沒收；公共集會和遊行遭到禁止；印刷出版完全被控制起來。另一方面，和一九三〇年的情況不同，甘地這時確實希望避免和平抵抗，而工作委員會中大部委員也抱有同樣看法。有些委員，連我在內，認為不論我們怎樣不願意，鬥爭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應該準備。而聯合省和邊省日益增長的緊張狀態，也使人民注意到即將來臨的沖突。但是，整個說來，中等階級和知識分子這時並沒有從鬥爭方面來考慮問題，雖然，他們也不能完全忽視這種可能性。他們總希望這個鬥爭在甘地回來以後可以避免；這種希望很明顯地產生了這種思想。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初，主動權肯定是操在政府方面，而國大黨總是處在防禦地位。許多地區的國大黨地方組織的領袖們對於促成頒布法令和進行和平抵抗的迅速發展感到意外。儘管如此，國大黨的號召還是得到了顯著的反應，同時參加和平抵抗的也不乏其人。事實上，我認為毫無疑問，一九三二年對於英國政府的抵

抗远超过一九三〇年，虽然在一九三〇年，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抵抗表现得更加明显公开。縱然在一九三二年人民表现出这种更大的忍受力量，以及保持着特别和平的态度，但是他们最初表现的鼓舞前进的精神却远不及一九三〇年。这好像我们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参加斗争。在一九三〇年，斗争带着光彩，而两年以后，这种光彩便略见逊色。政府以它所掌握的一切力量来对付国大党；印度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中，而国大党始终没有真正夺回主动权或任何行动自由。第一个打击就使得国大党和它的许多资产阶级同情者——它以前的主要支持者——惊惶失措。他们的钱囊受到袭击；很明显的，那些参加和平抵抗运动的人们，或者是给运动任何帮助的人们，不但会失去他们的自由，也许会丧失他们所有的财产。对于我们在联合省的人们来说，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国大党在联合省是一个穷人的组织。但是在大城市中，例如孟买，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对于商人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破产；对于专门职业的人们来说，这会使他们受到莫大的损失。仅仅施展这种威胁（有时这种威胁也成为事实），就能使这些富裕的城市阶级噤若寒蝉。我后来了解，有一个胆小但很富裕的商人，除了也许偶尔捐些钱外，很少过问政治，但警察却恫吓要罚他五十万卢比，并且还要判处他长期徒刑。这种威胁相当普通，同时也并非空谈，因为警察在当时拥有一切权力，而每天都有威胁变成行动的实例。

我并不认为任何国大党人有权来反对政府采取的步骤，虽然，从文明的标准看来，政府对待一个完全非暴力运动所使用的强暴和压力确是最可恶的。如果我们采用革命的直接行动的手段，不论它是怎样非暴力性质的行动，我们必须等待一切反抗。我们绝对不能够在客厅里闹革命，但是许多人却想两者得兼。对于一个

試用革命手段的人來說，他必須準備犧牲他所有的一切。因此，闊綽和富裕的人們很少成為革命者，雖然個別人物在飽經世故人們的眼光中被當作傻瓜，并被他們稱為他們那個階級的叛徒。

對於沒有汽車、銀行存款或其他財產值得沒收，而又肩負鬥爭真正重擔的群眾，當然還要使用其他方法去對付他們。政府各方面行動所表現的殘酷性的一個有趣實例，便是鞭策那群可以稱為“政府派”的人們（借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的一個名稱）行動起來。他們有些人最近開始和國大黨拉攏，因為不知道未來將會怎樣發展。但是政府對於這種態度卻不能容忍，消極的忠誠根本不夠。像以頒布戒嚴法出名的柯柏所說的那樣，當局“只能容許絕對的、積極的和明確的忠誠。政府不能僅僅依靠它的臣民道義上的默認而得到生存。”一年以前，勞合·喬治先生在提到他的老同事們——參加國民內閣的英國自由黨領袖們——的時候，把他們叫做“適應環境而改變顏色的多變爬蟲的標本”。印度的新環境不能容許中立色彩，因此，我們本國人中有些人便帶着得到官方准許的那種最鮮明的色彩出現，並且以歌聲和宴會來表明他們對我們統治者的愛戴和崇敬。他們不必害怕各種法令、無數的禁例以及戒嚴法和日落歸家法；因為官方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所有這一切都是用來對付那些不忠誠並且要進行叛亂的人們，而忠誠的人們沒有理由自相驚擾。因此，他們能夠相當冷淡地觀察周圍的騷動和衝突，沒有他們許多同胞的恐懼心理。他們也許可能同意契洛伊（“忠實的牧羊女”一書中的人物）的話，當她說道：

“因為我根本擺脫了一種恐懼的根源，
我不會再受到侮辱，
我真是心甘情願呵！”

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認為国大党在斗争中利用妇女，讓她們去塞滿監獄，希望妇女会得到較好的待遇，或較輕的徒刑。这是一种荒謬的說法，好像人們喜欢把他們的妇女投入監獄。在通常情況下，女孩和妇女積極参加运动是違背她們父亲、兄弟或丈夫的意願的，或者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他們的完全同意。但是，政府却用長期徒刑和監獄中的惡劣待遇來制止妇女。在我妹妹們被捕和被處徒刑后不久，一些年輕的女孩子，大都是十五、六岁左右，在阿拉哈巴开会，討論她們能做些什么工作。她們沒有經驗，但是充滿了热忱，需要別人指導。當她們在私人家里开会时，遭到逮捕，每人被判兩年严厉監禁。這是一件小事，是印度全国各地每天發生的許多事件之一。大部分被判刑的女孩和妇女，在監獄里受到很大的折磨，甚至比男子所受的还坏。我听到許多令人痛心的事例，但是我所看到的最出人意外的記錄便是密拉宾写的，叙述她和其他和平抵抗囚犯在孟买一个監獄里的經歷。

在联合省，我們的斗争集中在农村。由于代表农民的国大党施行不断的压力，官方曾經允許减免相当数目的租額，虽然我們并不認為这已經足够。紧接着我們被捕以后，又宣布了額外的免租。奇怪的是，宣布减租沒有早些实现，因为不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那种情況下，我們也难于立即予以拒絕。但是当时政府迫切希望这些免租不要归功于国大党，所以他們一方面要粉碎国大党，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給农民免租，使他們安靜下来。可以看出，凡是在国大党压力最大的地方，免租額也最高。

这些免除的租稅，虽然数目相当大，並沒有解决农村問題，但是确实大大地緩和了局势。它們緩和了农民的抵抗，从我們更大范围的斗争看来，当时削弱了我們的力量。那个斗争給联合省几

万农民带来了苦难，许多农民完全破产。但是那个斗争的压力却给几百万农民带来了几乎是在现有制度下最高的免租额，使他们免除许多痛苦（和平抵抗及其余波的后果，撇开不谈）。给予农民的这些季节性的免租为数不多，但我相信，即便如此，也大部由于国大党联合省委员会代表农民所作的坚持不断的努力。一般农民暂时得到好处，但是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人们已经在那个斗争中牺牲了。

当联合省的特别法令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颁布时，曾同时颁布一个解释法令的声明。这个声明，以及随同其他法令颁布的声明，包含许多真假参半的言论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企图以此作为宣传。这全是最初那些低级宣传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机会答复，或甚至驳斥它们明显的错误。政府曾经有过一个极明显的企图——想把谎言加在薛尔万尼身上，但恰恰给他在被捕以前所制止。政府这些声明和申辩读起来真是妙不可言。它们表明了政府是怎样语无伦次，神经是怎样紧张。有一天，我读到西班牙波旁王朝查理三世关于把耶稣会员驱逐出境时所颁布的命令，我不得不想起印度的英国政府的法令以及颁布命令的理由。在一七六七年二月颁布的命令中，西班牙国王替他的行动辩护说，这是“由于和我在臣民中间维持服从、安谧和公道的职责有关的极其严重的原因，以及存在朕心里的其他迫切的、正义的和必要的原因。”

因此，颁布这些法令的真正原因是存在总督或者他的参事们的帝国主义者的心理，虽然这些原因非常明显。官方宣布的原因帮助我们了解印度的英国政府正在使之完善的新的宣传技术。几个月以后，我们听说半官方的小册子和传单广泛地分发给一切农业地区，其中各种曲解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并且特别暗示说国

大党造成农产品的跌价，使得农民受到这么多的损害。这倒是对于国大党力量的一种奇特的恭维，把它说得竟然能够促成世界的不景气！但是这种谎言却坚持不断地、积极地散播出去，希望国大党的威信可能因此受到损失。

尽管如此，联合省一些主要区域的佃农对于和平抵抗的号召的反应还是很好，而和平抵抗不可避免地又同关于公平合理的田租及减税的纠纷交织在一起。这是比一九三〇年更加巨大、更有纪律的反应。关于这个反应，还有件很幽默的事情。我们听到一个关于一群警察前去雷巴列里区的巴古里亚村庄的有趣故事。他们由于这个村庄拒不缴租而去没收动产。这个村庄比较富裕，村里农民是有些气节的人。他们极其有礼地接待了收税官和警官，接着把所有房屋的门打开，请这些官员随意行动。牛羊等被没收了一些。接着，村民们请税官和警官们吃药酱，使这些家伙狠狠地、羞愧地退去。但这是很难见到的例外事件，不久以后，便很少见到这种幽默、仁慈和人情了。可憐的巴古里亚村，并不能由于它的幽默而逃脱对于它的骨气的惩罚。

在这些特殊的区域里，佃农好几个月拒绝缴租，也许直到夏初，征收才逐渐开始。这当然引起了大批人被捕，但这些逮捕几乎也是不顾政府的政策而进行的。一般说来，逮捕限于特别工作人员和村庄的领导人物。其余的人仅仅受到殴打。殴打在官方看来比监狱和开枪还好。不论什么时候需要，就能重新使用，并且殴打发生在遥远的农业地区，很少引起外地的注意；也不会增加囚犯的庞大数目。大批剥夺土地、扣押财产、变卖牛羊和财产的情况当然也发生了。佃农极其痛苦地看到他们拥有的微薄的财产被拿走，而以荒谬的价格被变卖掉。

自主大樓隨着全國各地無數建築物一同被政府所沒收。在自主大樓里經營的國大黨醫院的一切貴重的設備及材料也被沒收。這個醫院一連幾天停止診療，但是在鄰近的公園里却設立了一個露天施藥處。後來，這個醫院，更妥切地說，這個施藥處，遷到和自主大樓連接的一座小房屋里去，它在那里經營了大約有兩年半的時間。

根據一些傳說，我們的住所“極樂園”也正由政府接收，因為我拒絕繳納一筆巨額的所得稅。這筆稅是在一九三〇年根據我父親的收入而征收的，但我父親那年由於和平抵抗的緣故並未繳付。一九三一年，在德里協定以後，關於這件事情，我和所得稅當局曾經有過爭論，但最後，我同意繳付，並且也確實付了一部分。就在這個時候，法令頒布了，因此，我決定不再付了。在我看來，如果我一方面要求農民拒絕繳付租稅，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去繳所得稅，那就是極其錯誤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我預計我們的房屋將為政府所扣押。對於這點，我是非常不情願的，因為這意味着我的母親將被迫遷出；我們的書籍、文件、各種器具以及許多我們由於私人和情感上的原因而珍愛的東西，將會落到陌生人的手中，也許會遺失掉；我們的國旗將被降下而掛上英國國旗。但是，我們房屋將被沒收這件事情對我又具有吸引力。我覺得這會使我更加接近被剝奪土地的佃農，使他們振奮起來。從我們運動的觀點看來，這確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但是政府並不這樣決定，也沒有過問我們的房屋，也許是由於他們考慮到我的母親；也許是因為他們正確地估計到沒收房屋會刺激和平抵抗的發展。好幾個月以後，我一些零散的鐵路股票被發現了，由於我拒不繳付所得稅而被扣押。在這以前，我和我妹夫的汽車也被扣押，並且被拍賣了。

这头几个月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使我非常痛心。这就是各个自治市和公共团体，特别是据说拥有绝大部分国大党员的加尔各答市政会降下了我们的国旗。国旗是在警局和政府的压力之下降下来的，因为它们威胁如不照办，将采取严厉行动。这种行动也许是指停止自治市地位或处分它的委员。既得利益的组织往往胆小怕事，它们那种做法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却使我们痛心。国旗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我们珍惜的许多事物的象征，在国旗下面，我们曾经多次宣誓要保卫它的荣誉。用我们自己的手把国旗降下来，或者在我们的命令下将它降下来，似乎不但是背叛了我们那个誓言，而且几乎成了一种褻瀆行为。这是人们精神上的屈服，对真理的否定，在优势的物質力量面前，对是非的顛倒。像这样地屈服下来的人们便减低了民族气节，损伤了它的自尊心。

人们并不期望他们像英雄那样去赴湯蹈火。对于任何一个人，如果由于他没有站在前綫，冒着被捕下獄，或遭受苦难損害的危險，便責备他，那是錯誤而且荒謬的。每人都有許多責任和义务要担当起来，誰也沒有权利坐在一旁对他評头品足。但是在幕后袖手旁觀或者进行工作是一回事；而否定真理，或者否定自己認為是真理的事情那就是更加严重的事了。自治市的委員們，在他們被人要求去做任何違反民族利益的事情时，可以辞职。而通常，他們宁願保持自己的职位。

“但是，蜜蜂只要停留在花蕊，便不再發出营营的声音——

因此，民主党一旦得到地位，也就啞口無言！”[⊖]

⊖ 托馬斯·莫尔的詩。

如果由于任何一个人在突如其来的几乎使他無法忍受的危机时期所做的事而去批評他，那也許是不公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再表明，最勇敢的人有时也会气馁。更早一些，在一九一二年的铁丹尼克号輪船失事的巨大不幸事件中，从来沒有被人当作懦夫的著名人士，竟用賄賂海員的办法来逃命，而讓別人淹死。不久以前，莫洛城堡号輪船上的火灾揭露了可耻的情况。誰也不知道，在同样的危机面前，当自己原始的本能压倒理智和自我克制时，会做出什么事来。因此，我們也不要責备別人。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們去注意那种脫离正軌的举动，同时在將來要謹慎从事，不讓那些在最紧要的关头动摇和气馁的人們去掌握国家大事。更加恶劣的是对于这种胆怯的举动，还企圖进行辯护，并把它叫做正确的行为。这真是比胆怯的举动本身还要严重的罪过。

敌对力量之間的一切斗争大部都依靠士气和胆量。甚至最殘酷的战争也依靠这两个因素。福煦元帅說：“战争到最后还是以胆量致胜。”在一个非暴力主义的斗争中，更加需要胆量和士气。不論是誰，如果由于他的举动而損害了那种士气，并且动摇全国人民的胆量，那他对于这个事業，就造成严重的損害。


几个月过去了，每天帶來好和坏的消息。我們在各个監獄中使自己适应枯燥而單調的生活。独立周——四月六日至十三日——来到了。我們了解在这一周内会發生許多异常的事变。当时也确实發生了許多事变，但对我來說，一切事情在一件事面前都变得無关紧要。在阿拉哈巴，我的母亲参加了一个游行，游行队伍后来被警察阻攔，并遭到棍击。在它被阻攔时，有人給我母亲一張椅子，她就在路中游行队伍的前面坐着。專門照顧我母亲的一些人，包括我的秘書，被捕了。接着，警察便以木棍襲击。我母亲从

椅子上被打倒了，头部一再受到棍击，伤口流血，昏倒在路旁，参加游行的人則被驅散。不久，她被扶了起来，由一个警官以汽車送回“極乐园”。

当晚在阿拉哈巴，到处謠傳我母亲已經畢命。憤怒的人群集合起来，忘却了和平及非暴力主义，前去襲击警局。警察向他們开枪，結果釀成一些死亡。

在这个事件發生几天以后，当我听到所有这些情况的消息时（我們有一份周刊），我無法忘怀我那年老体弱的母亲滿身血污地倒在塵土飞揚的路上的情景。我不敢肯定，如果我当时在場的話，我將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我的非暴力主义究竟会使我忍受到多大程度？恐怕我忍受的程度有限，因为那种情景必然会使我忘去十几年来我所受的長期教育；我会很少考虑到对于个人或民族的后果。

我母亲慢慢地痊愈起来，当她在下一个月到巴勒里監獄探望我的时候，她还裹着綳帶。但是，她却充滿着欢乐和驕傲的情緒，由于她和我們那些志願的男女青年們共同受到棍击。然而，她的痊愈仅是表面的。在她那种年齡所受到的巨大震动，似乎使她的健康狀況完全失常，一些老毛病重又变得严重起来，而一年以后，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



第四十三章 在巴勒里和台拉·頓 兩獄中

在內尼監獄六個星期以後，我被轉押到巴勒里區監獄。我的健康狀況重又變壞，使我很煩惱的是，體溫天天上升。在巴勒里獄中度过四個月以後，當夏天的氣溫幾乎達到最高點時，我又重被調開，這回是到一個比較涼爽的地方去，在喜馬拉雅山麓的台拉·頓監獄。我在那里連續住了十四個半月，幾乎一直到我兩年刑期屆滿的時候。通過接見親友、接到來信和閱讀經過挑選的報紙，我當然知道外面的消息，但是我對外面發生的許多事情完全失去聯繫，僅僅模糊地了解一些主要的事情。

在我被釋放後，我忙于處理一些私事和應付當時的政治局勢。在享有大約五個多月時間的自由以後，我又重來監獄，到現在還在這里。因此，在以往三年中，我大部時間都在獄中，與世隔絕，很少有機會使自己詳細了解在這個期間內所發生的一切事變。關於甘地出席的第二屆圓桌會議，究竟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至今還是極其模糊。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機會和他談論這個問題，也沒有和他或別人討論在這以後所發生的許多事情。

關於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這兩年，我所了解的情況還不足以使我詳細敘述我們民族鬥爭的發展。但是我熟悉這個舞台和背景，同時也了解演員，並且，對於所發生的一些小事，也有一種本能

的品鑒能力。因此，我对这个斗争的一般过程，还有清楚的概念。在头四个月左右，和平抵抗运动坚强有力地并且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接着，便逐渐衰落，但偶尔也突然高涨起来。一种直接行动的斗争，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处于革命高潮。它不能停留不动；它必然高涨或低落。和平抵抗运动经过最初的兴旺时期以后，便慢慢地低落下来，但它能在低潮中长期进行下去。国大党全印度组织，虽然被宣布为非法，但还是相当成功地在继续工作。它和它的各省工作者继续保持联系，发出指示，收到报告，偶然也给予经济援助。

各省的组织也继续工作，获得或多或少的成绩。我不大知道其他省份在我被关在狱中那几年的情况，但是在我得到释放以后，我却搜集到一些关于联合省活动的资料。国大党联合省办事处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都经常继续工作，直到国大党当时的代理主席在甘地的劝告下第一次停止和平抵抗运动时为止。在这个期间内，时常发指示给各区，经常出版印刷或复写的简报，时常视察各区的工作，并把津贴发给那些担任“民族服务”工作的工作者。这种工作大部分必然是秘密工作；但负责这个办事处以及其他事项的省委员会书记总是以这种身份公开工作，直到他被捕、免职或由人继任为止。

我们在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二年的经验证明，我们很可能在全印度组织一个秘密的通讯网。我们没有花费很大力量，虽然受到一些反对，但却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很多人觉得秘密工作与和平抵抗的精神不相符合，而且对群众的觉悟会起一种沮丧作用。秘密工作，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开群众运动的一个小部分，是有用的，但是，特别当运动衰落的时候，总是经常存在着一种危险，即

群众运动为少数不太有效的秘密活动所代替。甘地在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宣告一切秘密活动不合需要。

农民的抗税运动，除在联合省外，还一度在古甲拉特和卡納塔克展开。在古甲拉特和卡納塔克兩地，自耕农拒絕向政府繳付租稅，因而受到很大的損害。国大党曾經作了一些努力来帮助受难者，并救济农民由于被剝夺土地和沒收財產而引起的痛苦，虽然这些努力做得还是不够。在联合省，国大党省委员会并没有这样設法来帮助被剝夺土地的佃农。本省的問題大得多（佃农的人数比自耕农人数多很多），区域也广闊得多，而省委员会的財力却很有限。我們簡直不可能去帮助由于运动而受害的几万农民，同时，我們也难以把他們和經常在飢餓边缘上掙扎的广大农民区别开来。如果只救助几千农民，那会引起麻煩和反感。因此，我們决定不給予經濟援助。我們在最初便將事实向农民說明。我們的立場完全为他們所諒解。令人惊讶的是，他們毫無怨言地忍受了許多苦难。当然，我們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設法帮助一些个别的农民，特别是被捕下獄的工作者的妻子和兒女。这个不幸的国家貧困到如此地步，甚至連一个盧比一个月的生活都說是意外的幸福。

在整个这段期間內，联合省委员会（当然也是被禁止的团体）繼續把往常那微薄的津貼付給它享有薪金待遇的工作者；如果他們被关进監獄，則維持他們的家庭，因为他們所有的人都輪流下过監獄。这是省委员会預算中的一項重要开支。其次，便是印刷和复写宣傳品及簡报的費用；这也是一笔大的費用。旅費是另一項主要开支，对于經濟情况比較拮据的各个区域也必須補助一些。虽然有这些以及其他开支，但在一个反抗强大而且防御森严的政府的剧烈群众斗争的期間，联合省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

三三年八月底的二十个月中的总支出，大約有六万三千盧比，即每月約有三千一百四十盧比（这个数字未包括阿拉哈巴、亞格拉、康波尔、勒克瑙等力量雄厚、比較富裕的一些区委員会的个别开支）。联合省，就整个省來說，在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始終站在斗争的最前綫；我認为，就所得的結果来看，它的費用少得惊人。把这个为数不大的数字和省政府鎮压和平抵抗的特別开支对比一下，是有趣的。我猜想（虽然我不了解）在其他主要的国大党省份中，有些省的开支要大得多。但是，从国大党的观点看来，比哈尔甚至是一个比它鄰近的联合省更加貧穷的省份，然而它在斗争中却起了輝煌的作用。

因此，和平抵抗运动逐漸地衰落，然而它还繼續出色地坚持下去。它逐步地失去群众运动的性質。除了政府的严厉鎮压以外，它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当时甘地为了哈里真問題在进行第一次絕食。这次絕食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但是却引导它向另一个方向發展。为了实际目的，和平抵抗运动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停止进行，最后是結束了。此后，它在理論上的繼續进行超过了事实上的进行。毫無疑問，即使沒有將它停止，它也会逐漸地衰亡。印度由于受到橫暴严厉的鎮压而一蹶不振。整个国家的精神力量暫時已經枯竭，不能再振奋起来。还有許多人能够个别地繼續和平抵抗运动，不过他們是在某种人为的气氛下进行工作的。

我們在獄中听說一个偉大的运动这样慢慢地衰亡下去，是不愉快的。然而，在我們中間，很少有人期望能得到一个迅速的胜利。如果群众运动鎮压不下去，就总有發生突然事变的偶然机会。但这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預料到一个長期的斗争，其中有起伏

進退，並且交錯着許多僵持階段，而群眾在紀律、聯合行動和思想意識方面也逐漸增強。在一九三二年早期，有時我幾乎害怕得到迅速的巨大勝利，因為它似乎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種妥協，使“政府派”和投機分子佔據上風。一九三一年的經驗是富於啓發性的。有價值的成功應該是在人民一般都有堅強的力量和明確的思想，足以利用這種成功的時候實現。否則，群眾進行鬥爭，作了犧牲，而在緊要關頭，別人逍遙自在地插進來坐享其成。這種嚴重的危險也存在着，因為在國大黨本身，對於我們想要實現什麼樣的政府和社会制度，還存在着許多不正確的想法和不明確的概念。事實上，有些國大黨人並不想把政府的現行制度改變多少，而是簡單地把“國貨”來代替政府中的英國或外國的成份。

純粹的“政府派”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的第一个信條便是服從國家的威權，不論其性質如何。但是甚至連自由主義派和合作派也幾乎全部相信英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因此他們偶爾發出的批評，也完全沒有效果和價值。如所周知，他們是無條件的遵守法律主義者，因此，他們不能歡迎和平抵抗運動。但是，他們却變本加厲，或多或少地站在政府方面。他們對於各種人民權利完全受到壓制，幾乎一言不發，而且還相當惶恐地旁觀着。這不僅是和平抵抗運動被政府反擊和鎮壓的問題，而是一切政治生活和公眾活動被禁止的問題，對於這些，卻沒有一點反對的聲音。一向維護這些自由權的人們已經卷入了鬥爭中去，他們由於在政府的壓制下拒不屈服而受到處罰。其他人被吓得俯首貼耳，很少提出批評。即使在提出溫和的批評時，也是帶着迫不得已的口吻，並且還痛斥國大黨和繼續鬥爭的人們。

在西方國家中，已經建立了一種維護公民自由權的堅強的輿

論，對於這些自由權的任何限制，都會引起反感和反對（也許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了）。有許多人，雖然他們自己不準備參加有力的直接行動，但極重視言論、著作、集會、結社、人身、出版的自由，不斷地為這些自由宣傳，因而有助於制止國家侵犯自由的傾向。印度的自由主義派自稱在某種程度上承繼了英國的自由主義（雖然他們除了名稱以外與後者毫無共同之處），原本可以期望他們對於這些自由權的壓制在思想上進行一些反抗，因為他們也受到這種損害。但是他們並沒有起這種作用。他們不會像伏爾泰那樣說：“我完全不同意你們的話，但我至死也會保衛你們發言的權利。”

也許責備他們這種情況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從未顯示自己是民主或自由的戰士，同時他們還必須面對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如果發言不慎便會帶來麻煩。如果觀察一下那些有悠久歷史的熱愛自由者——英國自由黨人士和英國工黨的新社會主義者——對於印度的鎮壓的反應，那會更加恰當一些。他們企圖相當冷靜地來觀察印度的景象，不論這種景象怎樣使人痛苦，而且有時顯然對於“曼徹斯特衛報”一個記者所說的“應用科學方法的鎮壓”感到滿意。最近英國國民內閣企圖通過一項叛亂法案，引起很多批評，特別是自由黨黨員和工黨黨員提出很多批評，其理由包括下列兩點：這種法案限制了言論自由，並且授權地方官員簽發搜查令。每當我聽到這種批評時，我對它表示同情，同時也想到印度的現狀。今天在印度執行的法律，比英國叛亂法案所要通过執行的幾乎要惡劣一百倍。我不知道在英國怕犯小錯的英國人怎樣會在印度若無其事地鑄成大錯。英國人使他們的道德標準符合他們的物質利益，並把一切有助於他們帝國主義計劃的一切事情看作正直行動的這種驚人妙訣，確實一向使我驚訝而且佩服。墨索里尼

和希特勒，由于侵犯自由和民主，而受到他們出于誠意和义憤的斥責；但在印度，同样侵犯和剝夺自由的行为却被他們同样誠懇地認為是必需的事情，并提出最崇高的道义理由来表明他們那种真正無私的行为要求他們采取上述行动。

当印度全国燃燒着烽火，而全国男女的灵魂受到考驗的时候，远在倫敦的上流人物聚集一堂，起草印度的宪法。在一九三二年举行了第三届圓桌會議，并設有許多委員會。联邦院的許多委員鑽营那些委員會的委員位置，从而可以假公济私。一大群人享受公費待遇前去倫敦。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又出現联合委員會和印度籍的顧問。慈善为怀的政府又替这些前去作証的人們安排好免費旅行。許多人迫切要为印度服务，便享受公費待遇，重又远渡重洋，据說，有些人为了想多得些旅費甚至斤斤較量。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們，被印度群众运动的活动所吓倒，而在英帝国主义的保护下会集倫敦，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印度人在祖国卷入生死斗争的时刻表现出这种行为，这使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損伤。不过从某个观点看来，我們很多人認為这是好事，因为我們認為（现在看来是錯誤的）从此它便一下子把印度的反动分子和进步分子区分开来。这种划分有利于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使一切有关的人会更加明白，只有通过独立，我們才能够有希望来面对社会問題并解除群众所負的重担。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这些人不但在他們日常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都使自己和印度群众隔离得很远。他們和群众沒有联系，不了解群众，不知道驅使他們甘願牺牲和受苦的那种內在要求。对于这些杰出的政治家，现实只包括一个东西——英帝

国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既然不能顺利地加以反抗，因此，不论痛快也罢，勉强也罢，应该把它接受下来。他们似乎从未想到如果没有群众的热情，他们不可能解决印度问题，或者拟成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宪法。杰·阿·斯宾德先生在他最近写的“现代简史”中提到一九一〇年爱尔兰联合会会议企图结束宪法危机的失败。他说政治领袖们企图在危机中设法起草宪法，正像人们当房屋已经着火的时候企图要对房屋保险一样。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在印度燃烧起来的大火远远超过一九一〇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大火。即使火焰已经熄灭，但是余烬还会燃烧很久，像印度追求自由的意志那样激烈和难以扑灭。

在印度官方人士中，横暴精神有了惊人的发展。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印度主要是被英国人当作一个警察国家来统治的。甚至趾高气扬的文官的表情也是军人气概；并且还经常带着一种敌对军队占领外国被征服土地的姿态。这种心理由于现行制度受到挑衅而发展起来。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偶发的恐怖行动助长了官方这种横暴，并给官方某些借口来为它的行动辩护。各种法令和政府政策把巨大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和警察，因此，印度实际是在警察统治之下，没有任何限制。

印度一切省份或多或少地都经过这次严厉镇压的灾难，但以边省和孟加拉省所受的损害最大。边省主要是一个军事区域，对它是按照半军事性质的条例来进行统治的。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红衫党”运动使得政府极其烦恼。军事纵队明目张胆地在“綏靖”全省，并对付一些“顽固的村庄”。在全印度，以巨额集体罚款加于村庄，有时加于城市（特别在孟加拉），已经成为惯例。前来进行镇压的警察时常驻在各地。当警察大权在握，不受任何限制的

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暴行。我們对于这些維持法律和治安的人們的不法行为和破坏治安的行为，掌握有若干典型的事例。

孟加拉有几个地区呈现出最异常的景象。政府將所有居民（确切地说，印度教居民）当作敌人看待，任何人——男女以及从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男女青年——都必须携帶身份証。此外，还有整批地监禁人民，規定服裝，管制或封閉学校，禁止騎自行車，行动必須向警局报告，夜間戒严，实行日落归家法律，軍事巡邏，进行警察鎮压，集体罰款以及許多其他規則或条例。大部地区处于不断戒严的状态之下，居民比暂时出獄而受到严密監視的男女好不了多少。从英国政府的观点看来，所有这些奇异的規定和条例是否必要，用不着我来判断。如果是不必要的話，那末政府必須对于压迫和侮辱整个区域的居民，以及使他們遭到很大損害的严重罪过負責。如果必要的話，那末，这确实是对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所下的最后判断。

这种横暴精神甚至加到我們那些在監獄中的人們身上。囚犯等級的划分是个諷刺，时常对于那些被列入較高等級的囚犯也施行酷刑。很少数的人被分到較高的等級，許多敏感的男女必須忍受經常使人痛苦的环境。政府的政策似乎是故意使得政治犯的命运比一般囚犯要坏。一个監獄总监甚至發出秘密通知給一切監獄，指示它們必須“严厉对待”和平抵抗囚犯[⊖]。鞭打成为时常施用的監獄懲罰。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印度事务次官在下議院报告說：“薩繆尔·霍尔爵士知道，一九三二年在印度有五百

⊖ 这个通知的日期是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內容如下：“監獄总监督促各監獄長及所屬人員注意：对于和平抵抗运动囚犯不得給以优待。屬於这类的囚犯应按其原有地位加以看管，并須严厉对待。”

以上的人由于与和平抵抗运动有关而遭到鞭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对于違反監獄紀律而發生的許多鞭打事件，还不清楚。在一九三二年，当时常發生鞭打事件的消息傳到我們監獄里的时候，我想起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为了反对一兩次鞭打事件所提出的抗議以及举行的三天絕食。当时我对鞭打的殘酷，感到震惊，現在我还是震惊，內心存在着隱痛，但是我并不認為我應該重新抗議和絕食。我覺得对这件事情更加無能为力了。不久以后，对于殘酷的感觉也迟鈍了。只要一件坏事長久繼續下去，人們对它会逐渐習慣的。

最艰苦的劳动分配給我們獄中男子去做，例如磨粉、榨油等等，使他們的遭遇尽量地無法忍受，从而引誘他們悔过，向政府提出保証以后得到釋放。这对監獄当局來說，算是一大胜利。

这些監獄中的懲罰大部分落在那些憎恨暴力和侮辱的青少年头上。他們是朝气蓬勃的好孩子，充滿着自尊心、活力和冒險精神，也就是在英国公学或大学里会受到各种鼓励和称贊的那种类型。在印度，他們年輕的理想和自尊心却使得他們鐐鑿入獄，遭受單独監禁和鞭打。

我們妇女在獄中的命运，想起来是特別令人难受而且痛苦的。她們大部是中产階級妇女，習慣于依賴生活。她們的主要痛苦是由于生活在一个为了男子利益并且为男子所統治的社会所制定出来的許多压制和習俗之下。自由的呼声对于她們一直具有双重意义。她們投身于斗争的積極性和表现的活力無疑地是导源于希望摆脱家庭奴役地位的那种模糊而不自覺的，但同时又是强烈的願望。除了少数人以外，她們被列为一般女犯，与最下流的女犯关在一起，时常处于可怕的环境之中。我某次被关在一个女囚營隔壁

的囚房里，中間有座牆將我們隔開。在那個女囚營里，除了其他女犯外，還有一些女政治犯，其中之一曾經是我的女房東，我曾經在她的房子里住過。一座高牆將我們隔開，但并不妨礙我很驚愕地聽到女犯看守的咒罵。我們的朋友對於這種咒罵却不得不忍受。

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對政治犯的待遇很明顯地比兩年以前，即一九三〇年，要惡劣得多。這不能僅僅是由于個別官員一時的心血來潮，唯一合理的推斷似乎是：這是政府故意執行的政策。即使撇開政治犯不談，聯合省監獄部門這些年來便以反對一切帶有人道意味的事物而出名。我們從一個無可懷疑的來源，得到一個關於這方面的有趣事例。有一位訪問監獄的貴賓——他是一位高貴的爵士，不像我們這樣的叛徒和叛亂販子，而是政府樂於尊重的人——某次曾到獄中來訪問我們。他告訴我們幾個月以前，他訪問過另一個監獄。在他的視察報告中將獄吏稱為一個“富於人道作風的嚴正長官”。這位獄吏請求他不要談到他的人道主義作風，因為這在官場中是不足為訓的事情。但是這位爵士卻堅持他的意見，因為他不能設想獄吏會由於他這種說法而受到任何損害。結果這個獄吏不久便被調到一個遙遠而偏僻的地方去了。這等於是給他的一種處罰。

有些被認為特別凶惡無情的獄吏卻得到遷升和官爵。敲榨勒索在監獄中成為如此普遍的現象，因而沒有人能夠潔身自好。但我和我許多朋友的經驗是：在監獄職員中，敲榨最凶的人，照例就是那些裝作嚴格遵守紀律的人。

我在監獄內外，都很幸運，幾乎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對我都很有禮貌並且給我照顧；即使在我也許不應該得到這種待遇的時候，也是如此。然而，監獄中有件事卻使我和我的家人感到很痛苦。

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卡麦拉和我的女儿英迪拉曾经一同到阿拉哈巴区监狱探望我的妹夫潘迪特。她们毫无过错，但却受到狱吏的侮辱，被他赶了出去。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难过，而省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也使我震动。为了避免使我母亲可能受到狱吏的侮辱，我决定放弃一切探望。当我在台拉·頓监狱中，大约有七个月，没有接见过亲友。



第四十四章 獄中心情

我們兩人——哥文·巴拉·潘特和我——一同由巴勒里監獄被轉押到台拉·頓監獄去。為了避免群眾可能因此而舉行示威遊行，監獄當局沒有讓我們在巴勒里本地，而是在五十哩外的一個偏僻的車站去上火車。我們在夜晚被秘密地用汽車送往車站。經過好幾個月的幽禁生活以後，當我乘車在涼爽的夜晚風中馳行的時候，我感到極其愉快。

在我們離開巴勒里監獄以前，曾經發生一件小事，當時使我感動，現在回想起來，還恍如就在眼前。巴勒里監獄的警察長，是一個英國人，當時，他也在場。就在我上汽車時，他帶着相當羞澀的表情交給我一包東西，據他告訴我說，那裡面有一些舊的德文畫報。他說他聽到我正在學習德文，因此，他把這些畫報帶來送給我。在這以前，我從未見過他，嗣後也未再見面，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這種誠摯而關切的舉動以及促使他採取這種舉動的善意，使我感動，並且使我對他非常感激。

在那深夜的漫長旅途中，我靜靜地思考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關係，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官方和非官方、以及掌握威權的人們和必須服從的人們之間的關係。多麼深的一條鴻溝將這兩個民族分割開來，而他們又是如何地彼此猜忌和厭惡！但是相互間的不了解更甚於這種猜忌和厭惡，因此，任何一方都有些畏懼對方，

在对方面前經常存着戒心。对于任何一方來說，对方似乎显得是乖張暴戾、不可接近的人物，任何一方都沒有認識到在这种假象后面，存在着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誠懇和藹的性情。英国人，作为印度的統治者，握有委任官职的巨大权力，因而吸引到他們周圍許多奴顏婢膝的鑽营职位者和投机分子，于是他們便根据这些敗类来評价印度。印度人把英国人只看作官吏，認為他們像机器那样的沒有一点人性，并且还具有企圖維持既得利益的一切貪求。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和他作为一个官吏或軍隊中的一分子在自己情感冲动的支配下所做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啊！士兵們在上級命令的指揮下变得頑固起来，泯灭了他們的人性，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开枪打死那些善良無辜的、从未伤害过他們的人們。因此，我想一个沒有勇气去伤害一个人的警官同样也会在第二天去指揮那向無辜人民所进行的棍击。在那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看成个人，也不会把他打倒在地上的或是开枪射击的人群，当作个人来看待。

只要人們把对方看作群众或人群，人与人之間的联系似乎就不存在了。我們忘記了人群也是由許多个人組成的，他們就是那些有爱和恨的感情，并且忍受着苦难的男女和兒童。如果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是坦白的話，他也許会承認他認識一些相当文雅的印度人，不过他們只是例外，整个說来印度人是一群可惡的东西。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会承認他認識的有些英国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除了这些少数人以外，英国人是一群气焰囂張、凶狠殘酷、徹头徹尾的坏蛋。奇怪的是，任何一方为什么不根据他接触到的个人，而根据他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的其他人，来評价另一个民族呢。

就我个人來說，我是很幸运的，几乎一貫得到我本国人 and 英国人的优待。即使那些逮捕我的或是把我当作一个囚犯輾轉押送的

獄吏和警察對我也很客氣。由於這種人情溫暖，衝突中的許多痛苦和監獄生活的折磨都得到減輕。我本國人給我這種待遇是不值得奇怪的，因為我在他們中間建立起來一些威信。即使對英國人來說，我是一個人，而不仅仅是群眾的一分子。我想由於我在英國受過教育，特別是我曾經在英國公學念過書，因而使我和他們更加接近。因此，不論我的公共活動在他們看來是多麼邪惡，他們不得不把我當作一個多少是按照他們的方式教養出來的人。當我把得到的待遇和我許多同事的待遇相比時，我時常由於這種特殊待遇而感到有些不安和羞恥。

儘管我有這一切有利的條件，監獄畢竟還是監獄，它那種令人窒息的气氛有時几乎令人無法忍受。甚至監獄的空氣中都充滿着橫暴、卑劣、敲榨和虛偽；這里面不是阿諛奉承，便是惡聲咒罵。一個敏感的人經常處於一種緊張狀態之中，無關緊要的小事也會使他煩惱。一封信傳來的一點壞消息，或是報上刊載的某條新聞都几乎會使人暫時感到焦慮或憤怒。在監獄外邊，總可以在行動中找到安慰，還有各式各樣的趣味和活動來使得身心保持平衡。在監獄里，人們找不到出路，感到抑郁壓制，對於一些事變，不可避免地會採取片面的、相當歪曲的看法。在監獄里生病更是特別痛苦的事情。

然而，我設法使自己習慣於監獄中的日常生活，並且以運動和相當緊張的腦力工作來保持自己的健康。不論這種工作和運動在外面的價值如何，但在監獄中，它們成為不可缺少的東西，因為不然的話，人們在身心方面就不能維持正常的狀態。我遵守一個嚴格規定的時間表，為了保持我的精神，我尽可能地繼續許多日常的生活習慣，例如每天刮臉（我被允許保存一片刮臉用的刀片）。我

提到这件小事,是因为人們通常連臉都不刮了,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松懈下来。經過一天疲劳的工作以后,我在晚間感到筋骨松散,很想睡觉。

时光就像这样一天接着一天、一周接着一周、一月接着一月地过去了。但有时,一个月很难熬,老是过不完,或者像是过不完。有时,我对于几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都感到厭煩和憤慨,例如对我獄中的同伴,对獄吏,由于監獄外面的人們所作和未作的某些事情而对这些人、对英帝国(这是一种永远不变的情緒)、最主要的还是对我自己,感到厭煩和憤慨。我会变得非常神經過敏,很容易受到監獄生活所形成的各种情緒的影响。所幸我会很快地摆脱这些情緒。

会见亲友的日子在監獄里是值得庆祝的日子。人們是多么渴望它,等待它,并且計算着日子来盼望它! 随着会见的兴奋心情的消失,便产生不可避免的反应,和空虚寂寞的感情。如果由于某些使我煩惱的坏消息或其他原因,使会见并不圓滿,像有时發生的情况那样,我在会见以后便感到苦惱。在会见亲友时,当然有獄吏在場,但在巴勒里監獄时,有兩、三次除了獄吏以外,还有一个監獄調查委员会的人員在場。他帶着鉛筆和紙張,恨不得把談話的每个字都記錄下来。我对这感到非常厭煩,因此这几次会见完全失敗。

接着,由于我母亲和妻子在阿拉哈巴監獄会见亲戚时所受到的,以及事后从政府方面所受到的待遇的緣故,我便放弃了这些接見亲友的宝贵机会。約有七个月之久,我没有接見過亲友。这段时间,对我來說,是一段凄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結束,当我决定重新会见亲友,而我家里人来看我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得無以复加。我妹妹的小孩也来了,当一个最小的孩子像她平时那样想爬

到我的肩头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经过长期盼望和人们接触的心情以后，家庭生活的亲切使我的情绪大为波动。

在会见停止期间，从家里或从其他某个监狱（我两个妹妹都在狱中）里来的两周一次的信件，变得更加宝贵，更加使我迫切地盼望。如果在约定的日子没有收到信件，我便烦恼；然而在信件确实来了以后，我几乎又是迟迟地不愿把它拆开。我把它拿在手里玩弄，好像人们对待已经到手的有趣事物的心情一样，而在我内心深处又有一些担忧，唯恐信里含有任何可能使我烦恼的消息或关于其他方面的新闻。在监狱里写信和接到来信，总会严重地扰乱了和平宁静的生活。它们引起了一种动荡的感情，在这以后的一两天内，人们胡思乱想，很难把心集中到每天的工作上去。

在内尼监狱和巴勒里监狱，我有好几个同伴。在台拉·顿监狱，最初有哥文·巴拉·潘特、卡西浦地方的肯瓦·阿南德·辛格和我三个人。但是潘特在两、三个月以后，由于六个月的刑期届满而被释放。后来，有两个其他的人和我們在一起。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我所有的同伴都离开了我，只剩下我一个人。直到我在八月底得到释放时为止，我大约有八个月的时间在台拉·顿监狱里过着孤独的生活，除了每天和某些监狱管理人员有几分钟的时间说话以外，找不到任何人谈话。这并不是专房单独监禁，然而和它也相差不多，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凄凉的日子。所幸我已经继续会见亲友，这些会见使我得到一些安慰。我猜想，也许是由于一种特殊优待，我被准许接受外面赠送的鲜花，并保存一些照片，这些东西都给我很大的愉快。通常，鲜花和照片都是被禁止的，曾经有几次不准我接受赠送给我的鲜花。企图将囚房美化起来的打算也得不到鼓励，我记得有个监狱的监狱长曾经反对过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同

伴布置盥洗用具的方式。監獄長叫他不要把自己的囚房布置得美觀和“奢華”。這些奢華的東西是：一把牙刷、牙膏、墨水、髮油、刷子和梳子，也許還有一兩件其他小物品。

人們在監獄里，開始珍惜生活上一些小物品的價值。人們的所有物非常少，也不容易得到增加或替換，人們緊緊地保持住這些東西，把在外面會扔到廢紙簍里的零碎東西都收集起來。即使在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占有和保存的時候，人們也不會沒有財產的觀念。

有時對於人生的美妙事物，會產生一種欲望，例如身體上的舒適、美好的環境、朋友間的聚會、饒有風趣的談話以及和兒童們的游戏……看到報紙上一張繪畫或照片，會使得以往的岁月和年青時代無憂無慮的日子历历如繪地現在眼前，引起一種思念故鄉的心情，結果這一天就過得煩躁不安。

我每天總紡一點紗，因為少量的體力勞動使我感到安慰，同時對於過分的腦力工作也是一種休息。但是，我做的主要事情還是讀書和寫作。我不能得到所有我需要的書，因為既有限制又有檢查，而檢查人員又總是不很稱職。斯賓格勒著的“西方的衰亡”受到禁止，因為書名看起來帶有危險性和煽動性。不過，我也不該抱怨，因為總起來看，我有不少種類的書。在這方面，我似乎又是享受特權的人，我許多同事（甲等囚犯）想要得到關於時事問題的書籍，總遇到最大的困難。在貝拿勒斯監獄里，據說連其中載有英國政府提出的憲法提案的官方白皮書，都被禁止，因為這本書涉及到政治問題。英國官員熱心推薦的唯一書籍便是宗教性的書籍或小說。奇怪的是，英國政府十分珍愛宗教，而對於各式各樣的宗教也是大公無私地給以鼓勵。

当最普通的人民自由在印度受到剥夺的时候而去谈论囚犯的权利问题，是不合时宜的。然而这个问题却值得考虑。如果一个法院判处一个人徒刑，是否由此便可推论不但他的身体并且他的思想都应该受到监禁？为什么囚犯的思想不应该得到自由，即使他们的身体受到监禁？印度负责管理监狱的人们，对于这种问题，毫无疑问，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接受新观念和系统思想的能力一向是有限的。不论在任何时候，检查书刊都是非常恶劣的措施，并且是愚蠢而带有宗派情绪的办法。在印度，由于对书刊检查，使我们不能看到许多现代文艺书籍以及进步的报刊杂志。被禁止的图书名单范围很广，并且还时常扩大。除了所有这一切以外，囚犯们还受到第二重的单独检查，因此，囚犯们不能看到在监狱外面能够合法地购买和阅读的书籍和报纸。

不久以前，这个问题在美国纽约著名的辛辛监狱中被提出来了，因为在辛辛监狱里共产党出版的报纸受到禁止。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反共情绪是很强烈的，尽管如此，监狱当局还是同意囚犯能够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任何出版物，其中包括共产党的报纸杂志。辛辛监狱长唯一不同意的刊物就是漫画，因为他认为这种刊物有煽动性。

当实际上绝大多数囚犯不准订阅任何报纸或获得文具的时候，来讨论印度监狱里的思想自由这个问题，是有点滑稽的。这不仅是一个书刊检查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禁止的问题。只有甲等囚犯（在孟加拉，是一级囚犯）才照例被准许得到文具，不过，即使属于这些等级的囚犯，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准许得到报纸。准许阅读的日报是经过政府选定的。乙、丙等囚犯，不论是否政治犯，都不准有文具。乙等囚犯有时能够得到文具，但这是一种特殊的

权利，时常被取消。甲等囚犯和其他等級囚犯的比例也許是一比一千，在考虑印度囚犯待遇时，这些甲等囚犯可以抛开不管。但是應該記住，即使这些受到优待的甲等囚犯們，在閱讀書刊報紙方面，比最文明国家中的普通囚犯所享有的权利还要少得多。

对于其余囚犯，即一千个囚犯中間的九百九十九个，一次只准許給他們兩三本書，但由于条件如此，他們也不能經常利用这种特权。写作或对閱讀的書籍作些摘要筆記，都是囚犯們不准做的危險事情。这种故意阻碍智力發展的措施是很奇怪的，同时也說明了一些問題。从改造一个囚犯，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观点来看，應該接近并且照顧到他的心灵，使他學習文化和某种工作技能。但这种观点也許是印度監獄当局从来沒有想到的。毫無疑問，联合省就很明显地缺乏这种观点。最近曾經嘗試教授監獄中的男孩和青年學習写作和閱讀，但是这些企圖根本沒有产生效果，負責人員也毫不称职。有时，据說囚犯們厭惡學習。我自己的經驗却恰恰与此相反，我發現許多到我这里來學習的囚犯对于學習閱讀和写作都十分热心。我們經常教授那些到我們这里來的囚犯，而且他們也努力學習；有时当我在夜半醒來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中間有一兩个人在他們囚房里坐在微弱的燈光下准备第二天的功課。

于是，我便埋头閱讀我那些書籍，从这类看到那类，但經常总是坚持閱讀那些“沉悶的”書籍。小說使人的心神渙散，我看得不多。有时我由于看書太多而感到厭倦，便开始写作，我給我女兒一系列的按照我的历史順序撰写的信件，在我整整兩年的刑期內，一直使我忙碌着。这些信件的写作对于維持我心智的健全，有很大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我生活在我所描写的过去事迹中，几乎忘

却了監獄環境。

游記總是受到我的歡迎，例如玄奘、馬可孛羅、巴士達等古代的旅行家的記載，和現代旅行家如橫渡中亞細亞沙漠的海定以及在西藏探險覓奇的羅瑞奇的游記。此外，還有畫冊，特別是關於山脈、冰川和沙漠的畫冊也為我所歡迎，因為人們在監獄里迫切想看到廣闊的空間以及海洋和山脈。我有幾本關於白嶺、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的美麗畫冊，時常翻閱它們，而在我囚房或囚營的溫度達到華氏一一五度或以上時，我便注視着冰川的畫片。地圖也是令人興奮的東西。它引起人們對於曾經游覽過的地方的回憶以及對於想去游覽的地方的夢想。人們渴望重游在以往日子裡常去的地方，並且迫切地想去訪問在地圖上代表着大城市的那些誘人的標記和黑點；想穿過代表山脈的那些帶有陰影的地區，想橫渡代表海洋的藍塊，想去觀賞世界上的美妙景色，視察變化中的人類的鬥爭和衝突——想做所有這一切事情的願望占據我們的整個心靈，而且擺脫不開。於是，我們匆忙地、憂郁地將地圖擱在一邊，回到我們周圍那些熟悉的圍牆，以及我們每天過的那種枯燥的生活。



第四十五章 監獄里的動物

我在台拉·頓監獄里的小囚房或房間里度過了十四個半月的生活。我開始感到好像自己幾乎成為這個囚房的一部分。我熟悉它每個細小的地方，知道粉白的牆壁上、高低不平的地板上以及椽木被蟲蛀蝕的天花板上的每個斑點和凹洞。在囚房外面的小院子里，我把綠草復蓋着的小丘和碎石頭當作老朋友看待。我在囚房里並不孤單，因為幾群黃蜂也住在那裡，許多蜥蜴在椽木後面做了窠，夜間出來覓食。如果思想和感情能夠留在物質的環境之中，那末，就在那間囚房的空氣里一定也充滿着思想和感情，同時它們一定也會牢牢地留在那個狹小空間的每件物品上。

我在其他監獄里有較好的囚房，但在台拉·頓獄中，我享有一種特殊待遇，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寶貴的。監獄本身很小，我們被監禁在監獄圍牆外面，但仍屬監獄場地的一座舊監房里。這個地方小得連走動的余地都沒有，因此，我們得到准許早晚可以出去走走，在門前大約一百碼的距離以內來回散步。我們還在監獄的場地以內，但是由於走出圍牆散步我們便看到不遠地方的山脈、田野和公路。這對我並不是一種特權；所有被監禁在台拉·頓的甲、乙等囚犯都享受同樣待遇。在場地以內，在監獄圍牆以外，還有一個小建築物，叫“歐洲人的監房”。這座監房沒有圍牆，在囚房里的人能夠清楚地看到外面的山脈和人們的生活。監禁在這里的歐洲

籍的囚犯等，也得到准許每天早晚在監獄門前散步。

只有一个曾經被長期監禁在高大圍牆里面的囚犯，才能体会到在外面散步和看到廣闊的景色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价值。我喜欢到外面去散步；即使在季节風期間，当一連几天下着傾盆大雨，必須在深到膝蓋的積水中走的時候，我也不放棄這種散步。在任何地方，我對於出外散步都表示歡迎，但是在这里能够看到附近高聳入云的喜馬拉雅山却是一件額外的快事，因而大大地減輕了監獄中的寂寞。当我沒有親友探望，在好几个月內都过着孤独生活的漫長時期內，我能够看到我心愛的高山，这是很幸运的。我从囚房裡望不見山，但它却占据了整个心灵，我永远感到它就在我附近，在我們之間似乎不知不覺地产生着一种親密的關係。

“众鳥高飛盡，
孤云獨去閑，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

我怕我不能像詩人李太白那樣，說我甚至對於山也永遠不會感到厭倦；但是看到喜馬拉雅山是不可多得的經驗，通常，我由於它在我的附近而感到很大的安慰。它以雄偉磅礴的、堅定不拔的氣勢和無數歲月以來積累的智慧傲然注視着我，嘲弄我各種不同的情緒，並且安慰我狂熱的心灵。

台拉·頓的春天是很可愛的，它的期限比南方平原要長得多。在冬天，幾乎所有樹木的葉子都脫盡了，只留下光禿的枝椏。使我驚訝的是，甚至監獄門前四棵蒼郁的菩提樹都幾乎脫盡了樹葉。它們枯萎而淒涼地矗立在門前，直等到春風重新帶給它們溫暖，將生命的信息傳送到它們內部深處的細胞。接着，便可以看到菩提樹

和其他樹木里產生了一種顫動，同時一種神秘的氣氛將它們籠罩起來，好像幕後正在進行着秘密活動。於是，我會驚奇地發現所有的樹上都出現了綠色的嫩芽。這是一種令人歡樂而喜悅的景象。接着，樹上很快便長滿了繁密的綠葉，在陽光中閃爍，並且隨着微風顫動。從幼芽到樹葉的突然變化是多麼神妙啊！

以往，我從未發現初生的芒果樹葉帶有像紅葉那樣的紅褐色，這和克什米爾山上秋天景色非常相似。但是它們不久便改變顏色，變成了綠色。

季節風時期內的雨水總受到我們的歡迎，因為它驅散了夏天的炎熱。但是，人們所得到的好東西也會過分。台拉·頓是雨水較多的地區之一，在季節風時期開始以來的頭五、六個星期以內，我們得到五十或六十吋雨量。我局促地坐在狹小的房間里，同時還要躲避從天花板上滴下的或是從窗口濺進來的雨水，感到很不好受。

秋天也是可愛的，同時冬天，除了下雨以外，也同樣可愛。在雷雨交加，寒風刺骨的時候，人們渴望能有一個較好的住所，享受一些溫暖和舒適。有時還落冰雹，比石彈還大的冰雹落在波形鐵板製成的屋頂上，引起巨響，好像隆隆的炮聲。

我特別記住一個日子，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從早到晚都是大雷雨，氣候寒冷。從肉體上來說，這是我在獄中度過的最痛苦的日子之一。到了晚間，天突然轉晴，當我看到鄰近的大小山脈被復蓋着一層厚雪的時候，我的一切憂郁都隨之消失。第二天——聖誕節，天氣清朗可愛，白雪皚皚的群山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色。

由於不能進行正常的活動，我們便更加注意着大自然的變化。

我們也注意我們遇到的各種動物和蟲類。由於我變得更加善於觀察，我發現在我的囚房和外面的小園地里，住着各式各樣的蟲類。我認識到就在我抱怨生活寂寞的時候，在那個乍看似乎是空曠冷落的院落里卻充滿了生命。所有這些蠕行的、爬行的或飛翔的蟲類都在那里生活；它們毫不干擾我的生活，我也沒有理由去干擾它們。但是我和臭蟲蚊子，在某種程度上和蒼蠅，卻進行着不斷的战斗。對於黃蜂，我採取容忍的態度，它們有好幾百只住在我的囚房里。當一只黃蜂，我想是無意地，螫傷了我以後，在我們之間曾經發生一場小小的衝突。我在憤怒之下，企圖把它們全部消滅，但是它們卻英勇地進行抵抗來保衛它們臨時的家，其中也許保留着它們的幼蜂。因此，我便停止原來的打算，決定在它們不再干擾我的情況下，不再過問它們。在這以後的一年多時間內，我便在囚房里這些黃蜂的包圍下生活着，它們沒有再來襲擊我，我們彼此相安無事。

我不喜歡蝙蝠，但對它們卻不得不容忍。它們在暮靄中悄悄無聲地飛着，人們只有在它們掠過正在轉黑的天空時才能看見它們。這真是怪物，我怕它們。它們好像在人們臉前一吋距離以內飛掠過去，我總擔心它們會咬我。大蝙蝠——狐蝠在較高的空中飛過。

我經常按照時間去觀察螞蟻、白蟻以及其他蟲類。我也觀察蜥蜴，它們在晚間爬出來，悄悄地捕獲獵物，彼此追逐，極其可笑地擺動着它們的尾巴。通常，它們避免捕獲黃蜂，但有兩次，我看見它們很謹慎地去捕黃蜂，捉住黃蜂的頭部。我不知道它們避免蜂螫的行動是故意的還是偶發的。

其次，還有松鼠，附近如果有樹，它們便聚集成群。它們胆子

很大，敢跑到我們身邊。在勒克瑙監獄時，我經常好幾個鐘點一動不動地坐着看書。有只松鼠沿着我的腿爬上來，坐在我的膝蓋上，東張西望。接着，它的眼光看到我的眼睛，發現我並不是一棵樹，或是它所假定的東西。一霎間，它吓呆了，接着，便一溜煙地逃走。小松鼠有時會從樹上掉落下來，它的母親會來找它，把它卷成一個小球似的，帶回安全的地方。有時，小松鼠會找不到家。我有一個同伴，收留了三只迷路小松鼠，把它們飼養起來。它們很小，因此便產生了怎樣飼養它們的問題。但是，由於採取了一種聰明的辦法這個問題卻解決了。一支自來水筆的橡皮管上加了一些棉花便成為一個有效的飼養瓶。

在我到過的所有監獄里，除了阿爾摩拉的山中監獄以外，都充滿了鴿子。它們有幾千之多，夜晚飛得滿天都是。有時獄吏開槍把它們打下來，作為食物。此外，當然還有雲雀。它們到處都是。有一對雲雀在我在台拉·頓的囚房門上搭了個窠，我一直飼養它們。它們變得很馴良，如果耽擱了它們的早晚飯的話，它們會停留在我身邊，大聲鳴叫地向我索食。看到它們那種表情，聽到它們焦急的叫聲，使人感到很有趣。

在內尼監獄里有幾千只鸚鵡，大多數都住在我囚營圍牆的縫隙裡面。看到它們彼此求愛，總會引起人們興趣。有時為了爭奪一只雌鸚鵡，在兩只雄鸚鵡之間展開了劇烈的爭吵，而这只雌鸚鵡卻冷靜地坐在一邊，等候衝突結束，準備把它的寵愛給予勝利者。

台拉·頓監獄有各種鳥。它們活潑的啁啾和囀鳴交織成一種經常的大合唱，而壓倒一切聲音的卻是鳴鳩的哀鳴。在季節風時期及以前，鳴鳩飛來了，不久我便了解為什麼它會有這個名字。不論晝夜，天晴或下雨，它繼續不斷地重複老調，使人驚訝。我們看

不到很多這樣的鳥，通常，只能聽到它們鳴叫，因為我們小院子里沒有樹木。但是，我經常看見鷹和鳶在高空自在地翱翔着，有時突然撲下來，接着又讓自己隨着一陣疾風飄去。時常會有一群野鴨從我們頭上飛過。

在巴勒里監獄里有一大群猴子，而它們那種滑稽的姿態總值得人們一看。有件小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只小猴子設法從牆上爬到我們的囚營里來，但是卻不能重新爬上牆去。獄卒、一些當看守的囚犯和其他囚犯把它捉住，用一小塊布條縛住它的頸部。這小猴子的父母（據我猜想）在高牆的頂端看到這一切情況，大為憤怒。它們中間有一只巨大的猴子突然跳下來，幾乎一直衝進圍繞着小猴子的人群里來。這是一種極其勇敢的行動，因為獄卒和當看守的囚犯手里握有棍棒，四處舞動，而且棍棒的數量也不少。但是，不顧一切的勇敢行動得到了勝利，人群吓得四散而逃，將木棍都丟在地上。这个小猴子也被救回去了。

我們時常也遇到不受欢迎的动物。在我們的囚房里，特別是在大雷雨以後，時常發現蝸子。我從來沒有被它們螫過，確是奇事，因為我在最隱想不到的地方遇到它們，例如在我的床上，或者在我剛拿起來的書本上。我曾經把一條顏色特別黑，看上去特別惡毒的一條蝸子放在瓶子里養了一些時候，用蒼蠅等來喂它。後來，當我用一塊布條把它連瓶子一同掛在牆上，它設法逃脫了。我不希望讓它逃脫，因此，徹底清理了我的囚房，到處尋找它，但是，它卻無影無蹤了。

在我的囚房或附近，也發現了三、四條蛇。關於其中一條的消息傳了出去，在報紙上便成了頭條新聞。事實上，我歡迎這種生活上的調劑。監獄生活非常枯燥，凡是能解除這種單調生活的一切

事物都會受到歡迎。這倒並非我欣賞或者歡迎蛇，不過它們並沒有使我像別人那樣地害怕。當然，我也怕蛇咬，如果我看見一條蛇的時候，也會保衛自己。不過，我沒有被吓得倒退的感覺，或是对它非常畏懼。蜈蚣使我害怕得多；但是害怕的程度還趕不上本能的反射作用。在加爾各答的阿利波爾監獄里，我在半夜醒來，覺得有個東西在我腳上蠕動。我打開我的手電，看到床上有只蜈蚣。我本能地、極其迅速地從床上跳下來，幾乎撞到囚牆的牆壁。那時，我充分認識到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是怎么回事。

在台拉·頓監獄，我看到一只新動物，或者說對我是新奇的動物。我站在監獄門口和獄吏談話，就在這時，我們看到外面有個人帶着一個奇怪的動物。獄吏把他叫來，我看到這是一只介乎蜥蜴和鱷魚之間的動物，約有兩呎長，並且有腳爪和鱗。這個奇怪而生氣勃勃的動物，盤成一種最特殊的形狀，變成一個結，它的主人用一根竿子穿過這個結，就這樣高興地把它提着。他叫它“波”。當獄吏問他這個動物對他有何用處，他滿臉笑容地回答說，他準備用它來作咖喱醬！他是一個住在森林里的人。後來，我閱讀弗·吳·錢賓所著的書“在陽光和陰影下的森林”時，發現這只動物就是穿山甲。

囚犯，特別是被判長期徒刑的囚犯，由於感情沒有寄托而感到最大的痛苦。他們時常飼養寵愛的動物來求得感情上的滿足。普通的囚犯不得飼養它們，但是當看守的囚犯却有較多的自由，而獄吏慣常也不反對。所養的最普通的動物是松鼠，同時出人意外的，還有貓鼬。監獄里不准養狗，但養貓似乎倒受到鼓勵。有只小猫曾經和我做了朋友。它是一個獄吏養的，當他調職的時候，把它帶走了。我很想念它。雖然獄中不准養狗，我在台拉·頓獄中却偶然地和幾條狗結了不解之緣。有一個獄吏帶來一只母狗，不久，他被

調職，便把這只狗留下不管了。這條可憐的狗變得無家可歸，睡在溝渠裏面，靠吃獄卒倒出來的剩飯過活，經常挨餓。因為我被監禁在監獄外面的囚房裏，於是，它便到我這裏來乞食。我開始經常地喂它，它在溝渠下面生了一群小狗。許多小狗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三只，我便喂着它們。有一隻小狗病了，性情變得暴躁起來，給我許多麻煩。我仔細地看護着它，有時一夜起床十餘次去照顧它。它終於好了。我很高興，由於我的照顧，把它救活了。

我在獄中接觸到的動物遠超過我在外面所接觸到的。我一向喜歡狗，並且也養了幾隻，但是由於其他事情需要我注意，因此我不能給它們妥善的照顧。在監獄裏，我很感謝它們和我作伴。一般說來，印度人不願把動物當作寵愛的家畜飼養起來。奇怪的是，儘管他們以一般的非暴力主義的哲學來對待動物，然而他們時常卻對動物很不關心，很不仁慈。即使就那種受到寵愛的動物——母牛來說，雖然它得到許多印度教徒的尊敬，幾乎是崇拜，並且時常因為它而引起毆鬥，然而它並沒有得到仁慈的待遇。崇拜和仁慈並不是永遠一致的。

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動物來作為他們野心或性格的象徵，例如象徵美國和德國的鷹；象徵英國的獅子和猛犬；象徵法國的斗鷄；象徵舊俄的熊。究竟這些庇護國家的動物把民族性改造到什麼程度？這些動物大都是凶惡好鬥的猛獸。如果一個按照他們面前這些動物的榜樣而成長起來的民族，有意識地去模仿它們，採取侵略別人的態度，恐嚇並掠奪別人的話，那也是不值得奇怪的事情。如果印度教徒，由於庇護他的動物是母牛的緣故，而變得和善並採取非暴力主義的態度，那同樣也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斗 爭

在外边，斗争仍然继续进行。勇敢的男人和女人继续用和平方法反对一个强有力的、根深蒂固的政府，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不会有什么成就。继续不断的，而且日益加厉的压迫，暴露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本质。关于这一点，现在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了，人们看得很清楚，在我们看来，这是好现象。刺刀胜利了，可是一个伟大的战士曾经说过：“你可以利用刺刀作任何事情，可是不能坐在刺刀上。”我们认为：我们宁可被人这样统治，而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在精神上卑躬屈节。就肉体而言，我们身在监狱之中，当然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在监狱里我们仍然在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而且比在监狱外服务得更好。难道我们可以由于自己的脆弱，牺牲印度的前途而救自己个人吗？人的活力和做事的力量是有限的，许多人在肉体方面残废了，死了，或者掉队，甚至背叛了事业。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事业仍然向前发展。只要人们仍然抱有明确的理想和大无畏的精神，就不会失败。放弃了原则，否定了自己的权利，向恶势力屈服，那才是真正的失败。医治自己造成的创伤比医治对手所给予的创伤需要更多的时间。

对于我们自己的弱点和世界上的混乱，我们常常感到厌倦，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成就也感到一定的自豪，因为我们的人民表现

得很好，自己是這種英勇人民中的一員，當然得到安慰。

在和平抵抗的年代里，曾經兩次企圖舉行國大黨的公開會議，一次在德里，一次在加爾各答。事情很明白：一個非法組織不能夠正常地、平安無事地開會，任何舉行公開會議的企圖必然會跟警察發生衝突。事實上，這些會被警察用警棍沖散了，許多人被捕。這些集會特別令人注意之處是印度全國各地來了幾千代表出席這種非法集會。從聯合省來的人在這兩次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很高興。我的母親堅持要去參加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在加爾各答召開的會議，在她去加爾各答的途中在阿桑索爾被捕，被扣押在當地監牢裡好幾天，同她一起被捕的有潘迪特·瑪拉維亞及其他的人。我的母親體弱多病，她這次所表現的精力使我大為驚異。在她看來，監牢算不得什麼，她經歷了更痛苦的考驗。她的兒子，她的兩個女兒以及她所心愛的其他人長期坐在監牢裡，留下她住在那幢大屋裡，實在難受。

鬥爭的調子逐漸減低，以後在一個低的水平上穩定下來，很少有令人興奮激動的事情，當然有時隔了很久也發生一些動人的事。這時我的思想轉而更多地注意其他的國家，我在監牢裡尽可能地注視和研究當時處在經濟危機中的國際形勢。我拚命多讀關於這個問題的書，書讀得越多，我對於這個問題就越感興趣。印度的問題和鬥爭變成了整個世界局勢演變中的一部分，是各國國內和國際間政治與經濟勢力所進行的偉大鬥爭的一部分。在這種鬥爭中，我與日俱增地同情共產黨方面。

我早就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蘇聯使我很感興趣。蘇聯有很多事情我不喜歡——例如殘暴地取締一切反對的意見，什麼事情都要搞成一模一樣，在執行政策時採用不必要的暴力（這是

我个人的意見)。但是在資本主义世界也有不少暴力和取締的行為，我更加清楚地認識我們的这个貪得無厭的社会和财产制度的基础是暴力。沒有暴力，它就不能維持長久。当大多数人迫于飢寒而不得不服从少数人的意志，使少数人享受更大的荣誉和利益时，一点点政治自由是沒有什么用处的。

資本主义世界和苏联都采用暴力，可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暴力似乎是这种制度內在的东西；而苏联的暴力虽然不好，其目的則在于建立一种以和平与合作为基础的新制度，使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苏联虽然犯了一些錯誤，可是克服了極大的困难，在建立新制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績。当全世界其他国家遭受經濟危机，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現退步的时候，苏維埃国家却在我們的眼前努力于建設一个偉大的新世界。在偉大的列宁領導下的俄国，眼睛看着未来，所想的也是未来的事情，而其他国家則被过去弄得麻木不仁，努力于保全过去时代的廢物。中亞細亞落后地区在苏維埃政权下所获得的極大进步，特別使我感动。因此，兩者比較一下，我贊成苏联，苏維埃国家的存在和它所树立的榜样，在暗淡的、凄凉的世界里是一种光明的、令人兴奋的現象。

苏联的成功或失敗，在試驗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方面而言，虽然非常重要，但是这种成功或失敗并不影响共产主义理論的正确性。布尔什維克党人可能犯錯誤，或者甚至由于国内或国际上的原因而失敗，可是共产主义理論可能是正确的。在这种理論基础上，盲目地仿效苏联是不对的，因为这种理論的运用依賴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發展。除此而外，印度或其他国家都可以从布尔什維克党人的成功以及不可避免的錯誤中获得經驗教訓，这对于自己是有好处的。也許布尔什維克党人走得太快了，因为

他們处在敌人的包圍中，害怕外来的侵略。假使步調放慢一些，农村中所遭受的痛苦有許多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里發生一个問題：把变革的步調放慢些能否产生真正根本性的結果呢？在根本的机构需要改变的紧急关头，任何关键性的問題是不能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的。不管后来的进步怎样慢，开头的第一步必須跟現行制度一刀兩段，因为現行制度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务，变成了未来进步的障碍。

在印度，只有革命計劃才能解决土地和工業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問題，解决全国其他每一个当前的重大問題。劳合·乔治先生在他的“战时回忆录”中說道：“没有什么錯誤比用跳兩次的方法跳过一个深淵更严重。”

撇开苏联不談，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哲学替我解决了不少疑難問題。就我而言，历史有了新的意义。馬克思主义的解釋使历史大放光明，历史的發展是有一定的規律和目的的，虽然不是自覺的。过去和現在虽然有很多痛苦，未来却充滿了希望，当然还会有許多危險。这种完全脫离了教条主义的看法，以及馬克思主义科学的观点使我深感兴趣。不錯，苏联及其他地方的正式共产主义中有許多教条，而且常常組織取締异端的运动。这种行动似乎令人惋惜。当然这种行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苏維埃国家里發生了巨大的急剧变革，如果讓反对派發展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失敗。

大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机和不景气似乎証实了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他各种制度和理論还在暗中摸索，唯有馬克思主义提出了相当令人滿意的解釋，并且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法。

随着这种認識的加强，我感到一种新的兴奋，和平抵抗运动沒

有成功在我心中所造成的意志消沉逐漸減少了。世界難道不是很快地朝着所希望的目的前進嗎？這裡存在着戰爭與災難的嚴重危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是在行動。沒有停滯。我們的民族鬥爭是這種較長的旅程中的一個階段，壓迫和痛苦正好鍛煉我們的人民進行未來的鬥爭，逼着他們研究這些使世界動蕩的新思想。消滅了這些弱點後，我們就會變得更強大，更有紀律，更有鍛煉。時間是對我們有利的。

因此，我用心研究在俄國、德國、英國、美國、日本、中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及中歐等地所發生的事情，努力想認清這些錯綜複雜的時事。我很留心注意每一個國家怎樣單獨地努力設法，以及這些國家怎樣共同努力設法，度過危機。國際會議企圖解決政治和經濟困難的努力一再失敗，裁減軍備會議勞而無功，這種情形使我想起來我們自己的一個小的但是很傷腦筋的問題——教派問題。雖然怀着極大的善意，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儘管大家認為失敗會導致世界性的災難，歐美的大政治家還不肯互相合作。問題的看法錯了，有關的人們不敢走正確的道路。

在考慮世界上的困難和衝突時，我在某種程度上忘記了我自己個人的和我國民族的苦難。我有時甚至感到高興，因為我生在世界歷史上這種偉大的革命時代。在即將到來的偉大變革中，我也許不得不在我自己的國家里起一點作用。在另外一些時候，我覺得全世界上衝突和暴力的氣氛令人喪氣。特別令人難受的是眼看著一些聰明人，男的女的都有，他們看慣了人們的墮落和奴役，他們的心麻木了，不再憎恨苦難、貧困和不人道的行為。在這種令人透不過氣來的道德氣氛中，有組織的胡說八道盛極一時，好人反而不聲不響。希特勒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褐色恐怖給人們一個

極大的震動，我自己安慰自己說這只能是暫時的現象。人們不免認為人类的努力沒有用处。整个机器盲目地开动，机器中的一个小齒輪能够做什么呢？

但是仍然是共产主义的人生哲学給了我安慰和希望。怎样在印度实行呢？我們还没有解决政治自由的問題，民族主义的看法很流行。我們会不会同时一躍而获得經濟自由呢？或者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在時間上——虽然二者相隔的時間很短——还得有先后呢？全世界和印度所發生的事情把社会問題推到了前列，政治自由的問題似乎不能再跟社会問題分开。

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的政策使社会上的反动階級站在反对政治独立的队伍里。这种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我欢迎印度的各階級、各派別表现出更明确的分野。可是其他的人也認識这件事的意义嗎？很显然許多人不認識这点。某些大城市中的少数正統派共产党人反对民族运动，他們对民族运动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这些都是确实的。有組織的劳工运动，特别是孟买的劳工运动是一种組織松懈的社会主义性質的运动，在較小的範圍內，加尔各答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不过这种劳工运动已經四分五裂，遭受了經濟恐慌的打击。模糊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已經在知識分子中間，甚至在头脑清楚和政府官員中間傳播着。国大党内比較年輕的人过去慣于讀布賴斯所著的关于論民主政治的書，讀莫萊、基斯、瑪志尼的作品，現在在有机会的时候都讀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書。米路特陰謀案大大地推动了人們去注意这种新思想。此外，世界危机使人們不得不加以注意。到处都可以看出一种研究事物的新精神，对于現行制度抱怀疑和挑战的态度。这种思想發展的总方向是很明白的，不过进行得很温和，还缺少自信

心。有些人跟法西斯思想勾勾搭搭。还缺少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識。民族主义仍然是主导的思想。

在我看来，在未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以前，民族主义仍然是突出的要求。正由于此，国大党在印度一直是最先进的組織（除开某些劳工界外），同时也是最强大的組織。在过去十三年中間，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在喚醒群众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績。尽管国大党具有模糊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但它对于革命已尽了力。国大党还没有丧失它的作用，而且在社会要求代替民族主义要求以前，国大党不会丧失它的作用。因此，将来在思想方面和行动方面进一步的活动，虽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但主要得运用国大党。

我认为脱离国大党就等于使自己脱离全国最主要的要求，削弱我們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浪费精力去进行無效的冒险行动。但是像现在这种成分的国大党会采取真正激烈的社会解决办法嗎？假如向国大党提出这个问题，结果一定会使国大党四分五裂，或者至少会使许多人离开国大党。如果问题弄得更清楚，如果一个組織严密的团体（不管在国大党中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能够坚持激烈的社会綱領，这种分裂本身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值得欢迎。

但是在现在，提到国大党就是指甘地而言。甘地准备做什么？在思想意識方面，甘地有时表现得非常落后，可是在行动方面，他是印度近代最偉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不能够用普通的尺度去衡量他，普通的邏輯規律对他也不适用。但是正因为他在压根兒是一个革命者，决心为印度的政治独立而奋斗，因此在未实现独立以前他必然毫不妥协地發揮他的作用。在这种过程中，他会动员群众發揮偉大的力量，同时我也希望他本人会一步一步地向社会目标前进。

印度和印度以外的正統派共产党人多年来猛烈地抨击甘地和国大党，硬說国大党的領袖抱有各种卑鄙的动机。他們在理論上对于国大党思想意識的批評有許多是中肯的，有理由的，而且后来的事情也部分地証實了这些批評。早期共产党对于印度政治总形势的分析后来事实証明非常正确。但是一旦撇开一般原則，深入談到詳細問題时，特别是談到国大党的作用时，他們就出了很大的偏差。印度的共产党人数少，影响也不大，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去宣傳共产主义的科学知識，說服人們信仰共产主义，而主要从事于攻击別人。这种行为影响了他們自己，使自己吃了大亏。大多数共产党人慣于在劳工地区工作。在这些地区里，通常只要几个口号就可以爭取工人。可是單純叫口号对于知識分子就不够了，而共产党人还没有認識，在今天的印度，中产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最革命的力量。事实上，許多知識分子傾向共产主义，可这并不是这些正統派共产党人工作的成績。这些知識分子虽然傾向共产主义，他們跟正統派共产党人之間还存在着一條鴻溝。

共产党人認為国大党領導人物的目标在于对政府施用群众压力，以便在工業和商業方面取得对印度資本家和地主有利的讓步。他們說国大党的任务在于“帮助孟买、阿麦达巴德、加尔各答等地方的厂主和金融家，压制农民、下層中产階級以及产业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不滿情緒。”他們認為印度的資本家在幕后对国大党工作委員會發号施令，要它組織一个群众运动，而在群众运动發展得太广泛成为一种危險时，則要停止群众运动，或者轉移群众运动的目标。他們認為国大党的領導人物并不是真正要英国人滾蛋，因为需要英国人来控制和榨取飢寒交迫的广大印度人民，这种工作是印度中产階級自己認為不能胜任的。

共产党人竟然会相信这种想入非非的分析，真是令人惊奇。可是他们既然相信这种分析，他们在印度失败之惨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根本错误似乎在于他们用欧洲劳工运动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民族运动。他们看见欧洲的工人领袖一再出卖劳工运动，他们就认为印度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印度民族运动显然不是劳工运动或无产阶级运动，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其目的不在于改变社会制度，而在于争取政治独立。你可以批评这种目标，说它不够远大。你也可以攻击民族主义，说它过时了。但是你接受了这种运动的基本认识后，你就不应该信口开河地说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不努力设法推翻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出卖了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要这样做。国大党内部有些人（这种人一天比一天多）主张改变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可是他们不能代表国大党发言。

印度的资本家阶级（不是大地主和地稅征收者）因为民族运动抵制英国货及其他外国货，提倡国货，大发其财。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一个民族运动都主张抵制外国货，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事实上，在和平抵抗运动期内，在我们宣传抵制英国货的时候，孟买的纺织工业竟大胆地跟英国兰开夏的资本家订立协定。从国大党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公然出卖民族事业的行为，国大党并且表示了这种意见。孟买厂主在联邦院中的代表当我们大多数人在坐牢的时候攻击国大党和“极端派”。

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过去数年中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就是从国大党和民族主义的观点看，也是可耻的。渥太华协定也许暂时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可是就整个印度工业的利益而言，这个协定并不妙，它加强了英国资本和工业对印度工业的控制。这个协定对群

众不利，而談判这个协定的时候，我們的斗争正在进行，成千成万的人被关在监牢里。在談判这个协定时，每个自治領都逼使英国承認了最严厉的条件，唯有印度向英国白送礼。在过去数年中間，有些冒險的商人犯法經營金銀生意，使印度大吃其亏。

大地主和地稅征收者在圓桌會議时完全反对国大党，在和平抵抗运动期內，他們自始至終公开承認跟政府站在一起。正是他們帮助政府在各省通过了鎮压法令。联合省參議會中大多数地主參議員投票反对釋放因参加和平抵抗运动而被捕的人。


說甘地是因为受了群众的压力才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三〇年發起表面上很积极的运动，这也是绝对錯誤的。当然群众的活动是有的，但是無論在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三〇年，都是甘地主动地推动了运动的發展。一九二一年时他几乎是一个人單槍匹馬地推动国大党进行不合作运动。在一九三〇年时，如果他稍为表示拒絕，就不会發動任何积极的、有效的直接行动的运动。

这种对个人的愚蠢的、没有什么根据的批評是很不幸的，因为这种批評使人們忽視了真正的問題。攻击甘地的誠意，結果只是害了自己，危害了自己的事業，因为在印度千百万人的眼中，甘地就是真理的象征，稍为認識甘地的人就一定会知道甘地是多么誠心誠意地努力想做好事情。

印度的共产党人跟大城市的产业工人有联系。他們不了解农村，跟农村也很少联系。产业工人虽然重要(这种重要性將來还会增加)，可是跟农民相比，他們就得退讓一步，因为印度今天的問題是农民問題。另一方面，国大党的工作人員广泛地散布在农村中，在通常情況下，国大党必然發展成为一个广泛的农民組織。农民在實現了他們当前的目标后，很少是革命的，將來有一天在印度会

發生城市对乡村、产业工人对农民的問題。

我很荣幸跟多数国大党領袖和工作人員保有密切的联系，我不可能希望找到比他們更好的人。可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我跟他們的看法不同。有些事在我看来似乎很明白，可是他們却不認識，不了解，这就常常使我感到煩躁。这并不是由于缺乏智力，而是由于我們的思想意識不同。我認為要突然消除我們間的分歧是很困难的。这里牽涉到不同的人生觀，而这种不同的人生觀又是逐漸地、不知不覺地形成的。光是責备对方不会有什么用处。社会主义包含对于人生及其問題的一定的心理上的看法，它不仅是單純的邏輯問題。其他的一些看法也是根据遺傳、教养、过去和現在环境的影响。只有生活本身以及生活的痛苦教訓迫使我們走上新的道路，最后使我們改变我們的想法（这是更困难的）。也許在这种过程中我們能够尽一点力。也許“采取了某些方法企圖避免某种命运，但結果反而正好遭遇到这种命运”。



第四十七章 宗教是什么？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發生了一件惊人的事，它打破了我們獄中和平的、單調的生活。消息傳來說，甘地不贊成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关于允許賤民階級單獨選舉的決定，他決定“絕食至死”。這種行動是多麼令人震驚！突然間，我的頭腦中涌出了各種各樣的想法，在我面前出現了各種可能性和各種意外事件，完全打破了我寧靜的心情。整整有兩天，我完全迷糊了，看不出有任何出路。每次想到甘地這種行動可能產生的結果時，我心里非常沉重。個人的關係非常影響我，我帶着苦悶的心情在料想：也許不能再看見甘地了。我最近一次遇見他是一年以前他搭船到英國去的時候。難道那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嗎？

當時我對甘地為了一個枝節問題——選舉問題——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感到不快。這對於我們的自由運動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這不會使人們至少暫時忘記了更重大的問題嗎？如果甘地實現了他當前的目標，使賤民階級聯合進行選舉，這不會引起一種想法，認為已經取得了某些勝利，暫時不需要爭取什麼了嗎？甘地的行動難道不等同於承認，而且一半也是接受關於賤民階級的決定和政府的計劃嗎？這種行動跟不合作運動與和平抵抗運動相符合嗎？我們已經進行了英勇的努力，作了很多犧牲，我們的運動難道就從此無聲無臭地消失了嗎？

我不滿意甘地从宗教方面感情用事地處理政治問題，並且一再提起上帝。他似乎還說上帝規定了絕食的日期。樹立這種榜樣多麼糟糕！

假如甘地死了，印度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印度政局如何演變呢？前途似乎很暗淡。每次想起這點時，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想了又想，思想異常混亂，我感到憤怒、絕望，我又敬愛引起這次事件的甘地。我不知道怎樣辦，對人常常耍態度，尤其是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發脾氣。

接着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這使我在感情上起了很大的波動，經過這次波動後，我心里比以前平靜些，並且覺得前途似乎並不怎樣暗淡。甘地知道在適當的時候作正確的事，他的行動——我認為沒有理由——不僅在選舉問題上，而且在我們的民族鬥爭中也許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即令甘地死了，我們爭取自由的鬥爭仍然要繼續進行。因此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應當有所準備。我打定了主意，即令甘地死了我也不動搖，這樣我就冷靜多了，準備應付一切。

接着傳來了消息，全國各地鬧得天翻地覆，印度社會群情激昂，賤民制度似乎失敗了，我想坐在耶拉伏達監獄里的甘地真是一個魔術師，他知道怎樣打動人們的心。

我接到甘地打來的電報。這是我被判刑後第一次收到他的函電。我很高興經過這樣久終於收到他的函電。他在这封電報里說道：

“在這些痛苦的日子裡，我常常想起你。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見。我多麼重視你的意見，這點你是知道的。看到英杜和沙魯普的孩子們。英杜看來很快活，人長胖了些。一切都很好。盼電復。

并借此向你表示我的敬意。”

甘地在絕食的痛苦日子里，在他心事重重的时候，竟然提起我的女兒和我妹妹的孩子們去看他，并說我的女兒長胖了，这真是奇特的事，这也表现了甘地的特点。（当时我的妹妹也在监牢里，孩子們都在浦那城讀書。）甘地似乎絕不会忘記生活中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小但意义重大的事。

我也听说选举問題已經获得解决办法。典獄長很客气，允許我回甘地一封电报。我在这封电报里說道：

“收到了你的来电，并且听说已經获得了解决办法，这使我很高兴。听到你决定絕食的消息后，我起初精神上很痛苦，思想上很混乱，但是后来乐观的情緒占上风，我又恢复了平靜的心情。为了被压迫的阶级，任何重大牺牲都不算过分。判断自由应当以最下層的人有自由作标准。可是我恐怕其他問題掩盖了我們唯一的目标。我不能从宗教的观点下判断。危險在于別人会利用你的方法。可是我如何能够向魔术师提意見呢。謹向你表示我的敬意。”

在浦那签订了“协定”，英国首相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协定，并相应地修改了他原来的决定。絕食停止了。我很不喜欢这些协定和協議，可是我欢迎浦那协定，虽然它的内容是例外。

激动的事情过去了，我們又重新恢复了監獄中的單調生活。关于哈利真运动以及甘地从監獄中进行活动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里，我不大高兴。毫無疑問，廢除賤民制度，提高不幸的被压迫阶级地位的运动已經获得了很大的推动，这并不是由于签订了协定，而是由于全国各地所引起的情緒。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和平抵抗运动受了損失，这也是很明显的。全国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

其他問題上去了，許多国大党工作人員也轉而注意哈利真运动。也許大多数这种人想找到一个借口，轉而从事比較安全的活动，不至于有坐牢的危險，或者更坏一些，挨棍打、财产被沒收的危險。这是很自然的事。要求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随时准备忍受極大的痛苦，准备家破人亡，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可是眼看着我們的偉大运动这样慢慢地消亡，自然令人难过。和平抵抗运动仍在进行，間或也举行群众示威，例如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的加尔各答国大党大会。甘地当时在耶拉伏达監獄坐牢，可是当局允許他接見人，对哈利真运动發出指示。这些事情減輕了他坐牢的痛苦。这一切使我气馁。

几个月后，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甘地开始他二十一天的絕食。我听到这消息后，起初感到震动，但是我認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就不以为奇了。事实上，我不高兴那些劝甘地放弃絕食的人，因为甘地已經打定了主意要絕食，并且公开宣布了这种决定。我不理解这次为什么要絕食。如果甘地事前征求我的意見，我一定極力反对。可是我十分尊重甘地的話，我認為如果有人劝甘地食言，这是不对的，这虽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是这种事对于甘地却極端重要。所以我虽然不高兴，仍然忍受了。

甘地在开始絕食前几天写了一封信給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因为他要求我回信，我就回了他下面这封电报：

“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对于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能够表示什么意見呢？我觉得我好像处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唯一的人所共知的指路碑。我在黑暗中摸索，可是我跌跤了。不論發生什么事情，我总常常想起你，敬爱你。”

我完全不贊成甘地这种行为，可是又不想伤害他的感情，这种

作法我自己也反对。我回他的电报不会使他高兴，現在他既然决定絕食，也許会因此死了，我應該尽可能鼓励他。小事情在心理上会引起很大影响，他必須努力不要因絕食而死。我認為我們應該有勇气应付任何事变。如果甘地不幸因絕食而死，我們也应有所准备。因此我另外打一封电报給甘地：

“你現在开始进行你的偉大事業，我願意再一次向你表示我的敬意，并向你保証我現在看得更清楚，不論發生什么，事情都会順利，你会胜利。”

甘地安然度过了这次絕食。在絕食的第一天，当局就釋放他出監獄。由于甘地的劝告，和平抵抗运动中止了六个星期。

我注意观察甘地絕食在全国所引起的激动，我更加摸不清楚絕食在政治上是否是正确的方法。这种行为完全是信仰复兴主义，清醒的思考完全不起作用。整个印度（或者極大部分）帶着尊敬的心情眼巴巴地看着聖雄，期望他做出一連串的奇迹，打破賤民制度，实现自主，而自己則什么事也不做。甘地也不鼓励別人自己想一想，他所坚持的只是純潔和牺牲。我覺得我跟甘地在精神上一天比一天更疏远，虽然我在感情上十分欽佩他。他的政治活动常常由一种不犯錯誤的本能支配着。他对于行动有很銳敏的判断力，可是这种信仰方法是訓練一个民族的正确方法嗎？也許暫時可以生效，但時間長了会产生什么結果呢？

我不了解甘地如何能够承認（他似乎承認了）現行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暴力和冲突为基础的。我內心里也在进行斗争，弄得我焦头爛額。我知道我出獄后，一定会出岔子。我覺得孤孤單單的，無家可归。我爱印度，并且为印度尽了力，但是对于我，印度似乎是一个陌生的、不容易了解的国家。我不同意我的同胞的

精神和想法，这是我的不对吗？就是跟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我也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隔膜，我不能够消除这种隔膜，就退回到我自己的小天地。旧世界似乎包围着他们，这是一种过去了的思想意识、希望 and 要求的旧世界。而新世界的来临遥遥无期。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世界已经死去了，
另一个世界则难产尚未诞生——
找不到一个棲身的地方。”

印度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各自夸耀他们的宗教，为了维护自己宗教的真理，有时不惜打得头破血流。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宗教——或者至少是有组织的宗教——所表现的这种现象，引起了极大的厌恶，我常常加以谴责，并且想把它一扫而空。宗教似乎经常倡导盲从和反动，主张教条和顽固，维护迷信、剥削和既得利益。可是我十分知道宗教内容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供给人类深刻的内心要求，否则宗教为什么能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无数痛苦的人获得安慰和宁静呢？难道这种宁静只是由于盲从和不怀疑而来，像一只船停在港内，不受大海上风暴的袭击因而觉得安然自得，或者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在某些情形中，宗教的内容确实还有更多的东西。

可是有组织的宗教不管它过去的情形怎样，在今天大部分只有空洞的外形，没有真正的内容。格·克·徹斯特敦先生把宗教（不是他自己所信奉的那种宗教，而是别人所信奉的宗教！）比作一个化石，外表像一个动物，或有机体，里面有机的实质完全消失了，它只保存了生物的外形，而内部则充塞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令

原来有价值的东西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可是却被其他有害的东西包围了。

东方的宗教是这样，西方的宗教也是这样。英国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它無論从那一方面說都不是一种宗教。这种說法也部分适用于有組織的基督新教，英国教会做得太过火了一点，变成了国家的一个政治部門[⊖]。

当然有些信徒是品格高尚的人，可是令人注意的事是英国教会努力替英帝国主义服务，使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披上道德的和基督教的外衣。英国教会設法从最高的道德标准替英国在亞洲和非洲的掠夺政策辯护，認為不論什么事情，英国人总是对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英国教会帮助造成了这种自以为公正的态度，还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态度的产物。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上处境不如英国那样好的国家常常攻击英国人，說他們是伪君子——“背信弃义的英

⊖ 在印度的英国教会几乎跟政府分不清楚。由政府付給薪水的牧师們（錢是从印度稅收而来），正像高級官員一样代表英帝国。就整个英国教会而言，它在印度政治上是一种保守的反动力量，一般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普通教士往往完全不知道印度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也不願意設法去了解。他所关心的只是揭發异教徒的罪惡和缺点。当然也有許多突出的例外。查理·安德魯就是印度再忠实不过的朋友，他对印度高度的热情和服务精神，以及深厚的友誼令人感到愉快。浦那地方的耶穌服务团中有一些优秀的英国人，他們的宗教信仰使他們了解事物，为人服务，而不是以恩人自居。他們老老实实地，無私地为印度人民服务。另外还有一些印度人所尊敬的英国教士。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上議院發言时，提到一九一九年孟得戈—蔡姆斯福改革案的导言，說“他有时認為發表这个宣言似乎太輕率了，这是战后輕率采取的寬大的姿态之一，但是已經規定了的目标不能撤回。”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教会的首腦竟然对于印度政治抱这样極端保守的看法。印度輿論認為完全不够味的行动，并因此而产生了不合作运动以及不合作运动所發生的后果，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看来，却是“輕率”的、“寬大”的。在英国統治階級看来，这是一种安撫人心的政策，毫無疑問，这种寬大的想法——甚至認為太輕率从事——使他們自鳴得意。

国”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流行的指責——这种指責也許是由于看見英国的胜利而吃醋。事实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有資格指責英国，因为它自己的紀錄也是同英国一样不光彩的。有意識地裝出伪善样子的国家沒有英国人屡次所显示的那种后备力量。英国人所采用的那种“宗教”很明显地在这方面帮了英国人的忙，因为这种宗教使英国人在处理有关本身利益的时候减少了道德方面的敏感性。其他的民族和国家的所作所为，往往比英国人更糟糕，可是他們沒有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把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說得冠冕堂皇。我們大家都很容易看出別人的过失而忽視了自己的过失，也許英国人在这方面特別出色[⊖]。

基督新教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想具有現世以及来世最好的东西。就現世而言，它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可是从宗教观点来看，基督新教作为一种有組織的宗教是脚踏兩只船而失败了，宗教逐步讓位給感情和大資本家的利益。羅馬天主教由于坚持旧的东西而逃脫了这种命运，只要旧的东西存在，羅馬天主教就会兴盛。在今天，羅馬天主教似乎是西方各国唯一活着的宗教（按宗教的特定意义來說）。在我坐牢期內，一个天主教朋友寄給我許多关于天主教的書和教皇的文告，我讀起来很有兴趣。研究这些書后，我了解为什么天主教对于許多人有控制力。正像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一样，天主教使人逃出怀疑和內心冲突，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

⊖ 我最近注意到一件事，它表明英国教会怎样間接地影响印度的政治。联合省基督教徒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康波尔举行全省代表大会时，招待委员会的主席埃·維·达維德先生說道：“作为基督教徒，我們的宗教信仰要求我們効忠于英国国王，他是我們宗教的保护者。”这就是說支持在印度的英帝国主义。达維德先生更进一步表示他同情英国頑固的保守分子关于印度文官制度、警察以及所建議的整个宪法的某些意見，他們認為这种宪法会使印度的基督教会遭遇危險。

所，向人保證來世過較好的生活以補足現世生活中的缺點。

我不能夠以宗教為避難的地方。我寧願冒驚濤駭浪的風險。對於來世和死後的情形，我也不感興趣。今生的問題已經使我够忙了。傳統的中国觀點，基本上屬於道德方面，但是非宗教的，或者帶點宗教懷疑色彩，這種觀點對於我很有吸引力，雖然在把這種觀點應用到生活方面時我不同意。我所感興趣的是“道”，這是所遵循的道路，立身處世之道；如何認識生活，不是否定生活，而是接受生活，適應生活，改進生活。可是通常的宗教觀點不關心現世。在我看來，通常的宗教觀點似乎是清楚思想的敵人，因為這種觀點的基礎不僅在於毫無異議地接受某些固定的、不可改變的理論和教條，而且也在於思想和感情。這種觀點跟我在精神上所想的大不相同，它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閉着眼睛無視現實，深恐現實跟它原有的想法不同。這種觀點很狹窄，不能容忍其他意見和思想，它以自己為中心，只顧自己，常常被自私自利者和機會主義者利用。

這並不是說信奉宗教的人都不是道德和精神很高尚的人。這是說宗教觀點不能幫助，反而妨害一個民族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進步，如果只用現世的标准，而不用來世的标准來衡量道德和精神的話。宗教通常追求上帝，信仰宗教的人對於自己的解放比對於社會的利益更關心。神秘學者想擺脫自我，而在這種過程中常常深陷於自我的思想中。道德标准跟社會需要無關，而是以抽象的罪惡論為基礎。有組織的宗教常常變成一種特權，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反對改變，反對進步的反動勢力。

早期的基督教會並未幫助奴隸改善他們的社会地位。由於經濟条件的关系，奴隸變成了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倫敦的主教曾經寫過一封信給美國南部殖民地的奴隸主，這封信表明了二百

年前(一七二七年)教会的态度。

主教在这封信里写道：

“基督教和信奉福音并不改变财产，也不改变任何属于民事关系的义务；在这些方面，对人而言，没有什么改变。基督教所给我们的自由是从罪恶和魔鬼的束缚中的解脱，从人的贪求、情欲的控制中的解脱。至于人们的地位，不管以前是被人控制的或自由的，并不因为受了洗礼，变成基督教徒而有所改变。”[⊖]

今天，没有一种有组织的宗教肯这样赤裸裸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可是它对于财产，对于现行社会制度的态度，基本上却是一样。

文字本身是一种不完备的表达工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任何语言中，恐怕没有其他的词比“宗教”这个词更容易被不同的人给以不同的解释。在听到或读到“宗教”这个词时，没有两个人的看法是相同的。一提到宗教，就会令人想起仪式、圣书、信徒、教条、道德、尊敬、爱好、恐惧、憎恨、慈善、祭祀、苦行、斋戒、节日、祷告、古代历史、结婚、死亡、来世、骚动、头破血流等等。这些混杂的思想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使人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宗教”这个词丧失了明确的意义（如果本来有的话），只能引起混乱和不断的争论，认识完全不同。如果不用这个词，采用其他意义比较明确的词——如宗教学、哲学、道德、伦理、精神性、形而上学、责任、仪式等等——那就好得多。当然这些词的意义很模糊，可是比“宗教”的解释明确些。一个极大的优点在于这些词还没有像“宗教”那样带有浓厚的感情。

什么是宗教呢？（尽管“宗教”这个词显然有缺点，我仍然用这

⊖ 这封信摘自林豪德·尼布尔的“有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第七八页，这是一本非常动人而有趣的书。

个詞) 宗教也許包含个人內心的發展, 他的認識向着某种好的方向發展。这种方向是一种什么方向仍然有待于爭論。不过就我所知, 宗教強調这种內心的改变, 認為外表的改变只是內心發展的表現而已。毫無疑問, 这种內心的發展能够对外部的环境产生極大的影响, 而外部环境同样也对內心的發展产生極大的影响。內心的發展和外部环境互相影响。在現代工業發达的西方各国, 外部的發展大大地超过了內心的發展。但是并不能因此像有些东方人所想的那样, 認為由于我們在工業方面落后, 我們的外部發展很慢, 我們內心的發展就大些。这只是一种自己安慰自己, 并对自己的自卑感聊以解嘲的幻想。也許个人能够超出形势和环境, 在內心方面达到極大的高度。但是就团体和民族而言, 必須具有一定的外部發展才能發生內心的發展。一个有經濟困难, 每天为了生活而弄得焦头爛額的人, 很少能够有高度的內心認識。一个被压迫、被剝削的階級不能够有內心的进步。一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受人控制, 受限制和受剝削的民族絕不能有內部的發展。因此, 內部的發展需要外部的自由, 需要适当的环境。在努力爭取这种外部自由, 改变环境, 消除內部發展的障碍时, 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有害于所抱的目标。在我看来, 当甘地說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时, 他心中有这种想法。但是手段必須产生目的, 否則手段就会白費勁, 也許还会在內部和外部引起更大的退步。

甘地曾經在他的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 “沒有人能够脫离宗教而生存。有些人自夸他們的理智, 說他們跟宗教不相干。这正像一个人說他呼吸, 可是沒有鼻子。”甘地繼續說: “我追求真理, 这使我接近政治。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而很謙虛地說, 那些說宗教跟政治無关的人不懂得宗教的意义。”如果甘地說多数主張生活和政治不

应跟宗教有关系的人对“宗教”这个词的解释与他的解释不相同，这种说法是比较更正确些。事情很明显，甘地用“宗教”这个词时的解释——主要属于道德和伦理方面——跟宗教批评者的解释不同。同是一个词，可是各人的理解不同，这就使互相了解更加困难。

约翰·杜威教授对于宗教所下的定义，信奉宗教的人不会同意。杜威认为宗教“使人对于生活中所发生的个别的、变化着的现象获得真正的认识”，或者换一个说法，“一个人有了某种理想的目的，深信这种目的具有一般的和永久的价值，他不怕困难和个人损失的危险为实现这种目的而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在本质上都是属于宗教方面的。”如果把这种活动认为是宗教，当然不会有人表示异议。

罗曼·罗兰发展了宗教的解释，这种解释也许会使得有组织的宗教的正统派惊惶失措。他在他的“朗克利西纳的生平”一书中写道：

“……有许多人跟宗教信仰无关，或者自己认为跟宗教信仰无关，可是事实上他们生活在一种超理性的意识状态中，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理性主义。只有思想的本质，而不是思想的目的，才决定思想的来源，并且帮助我们确定这种思想是否从宗教而来。如果这种思想不怕一切困难，诚心诚意地准备忍受任何牺牲而去追求真理，那我就认为它是宗教，因为它预先相信人类努力的目标比现实社会的生命，甚至比整个人类的生命更高。当怀疑本身从真正的情理出发，表示力量而不是表示弱点时，那么这种怀疑就参加宗教精神大军的前进行列。”

我不敢说我具备了罗曼·罗兰所规定的条件。不过我准备接受这些条件，参加这个大军。



第四十八章 英国政府的“双重政策”

哈里真运动在甘地领导下继续进行着，甘地在耶拉伏达监狱中时领导这个运动，出狱后也领导这个运动。当时许多人要求取消进入寺庙的障碍物，并且有人在联邦院中提出了这种法案。国大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在德里沿门访问联邦院的议员们，请他们投票赞成“进入寺庙法案”。甘地通过这位领导人向议员们发出呼吁。和平抵抗运动仍在进行，人们继续去坐牢，国大党与联邦院相对立，国大党的议员们退出了联邦院。余留下的议员以及补缺的议员们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他们反对国大党，拥护政府。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帮助政府通过压迫人民的法律，使政府法令中某些临时紧急措施变成经常性的东西。他们接受了渥太华协定，在德里、西姆拉、伦敦等地跟大人先生们交游，跟随人们一起感谢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并且热烈希望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双重政策”取得胜利。

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甘地发出那样的呼吁不免使我惊奇，尤其使我惊奇的是拉贾戈帕拉查里的积极活动，拉贾戈帕拉查里在几个星期以前是国大党的代理主席。和平抵抗运动自然受了这些活动的影响。尤其使我难过的是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甘地或任何国大党领袖鼓励这种活动，是不道德的；对于在监狱中的人或坚持斗争的人，简直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过我知道甘地

对于问题的看法不同。

政府当时和以后对于“进入寺庙法案”所表示的态度很足以说明问题。政府千方百计地跟主张这个法案的人为难，一再拖延，鼓励人们反对这个法案，最后宣布政府本身反对这个法案，把它抛弃了。政府对于印度各种社会改革的措施所采取的态度，跟这种态度大致相同；并且在干涉宗教的借口下，阻碍了社会进步。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政府批评我们社会上的坏事，并且鼓励别人这样做。“沙达禁止童婚法案”变成了法律，可是后来的情形说明政府是多么讨厌实行任何这种措施。一个政府可以随便公布法令，订出新的罪名，规定各种处罚，把成千成万的人以破坏法规的罪名关进监狱，这样的政府当然害怕实行像沙达法案这样的正规法律。这个法案的初步影响就是反而增加了童婚——法案的目的在于限制童婚——因为法案规定了六个月的宽限期，许多人就因而大钻空子。后来发现这个法案多少是个笑话，政府不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法案置之不理。政府丝毫没有正式宣传这个法案，农村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法案是怎么回事。他们只从乡村中印度教传教士或伊斯兰教传教士那里听到一些歪曲的解释，这些传教士本人很少了解正确的事实。

英国政府这样容忍印度社会上的丑恶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偏爱这些丑恶。英国政府并不太关心消除这些丑恶，因为这些丑恶并不妨害英国统治印度和榨取印度的资源。除此以外，主张社会改革常常有得罪人的危险，英国在政治方面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因而不愿再自寻烦恼。但是从社会改革者的观点来看，情况恶化了，因为英国人日益成为这些丑恶的不声不响的保护人。这是因为英国人跟印度最反动的分子关系很密切。由于反对英国统

治的运动發展了,英国人不得不寻求盟友。今天,坚决拥护英国在印度的統治的人是走極端的教派主义者以及宗教中的反动分子和愚民主义分子。从政治、經濟、社会等方面来看,伊斯蘭教教派組織是出名地反动。印度教大会也不相上下。但是在这种倒退竞赛中,印度教大会远落在薩納坦派之后,薩納坦派在宗教方面主張極端的愚民政策,在政治方面則大吹大擂地拥护英国的統治。

如果英国政府沒有动静,沒有采取步驟去宣傳沙达法案,执行沙达法案,为什么国大党或其他非官方团体不去宣傳沙达法案呢?英国批評者以及其他的外国批評者常常提出这个問題。就国大党而言,国大党在过去十五年中間,特別是一九三〇年以后,就为了爭取民族自由,跟英国統治者进行了激烈的生死斗争。其他团体沒有实力,跟群众沒有联系。抱有理想、具有气节和在群众中有声望的人——不論男的、女的——都被吸引到国大党里面来,大部分時間消磨在監獄里。

其他的团体最多只能由少数人通过決議,而这些人又害怕跟群众接触。它們斯斯文文地活动——例如全印妇女协会——缺少積極宣傳的精神。除此以外,这些团体也受了政府关于取締一切公共活动的法令的影响,不能够活动。戒严法摧毀了革命活动,同时也打击了文明和最文明的活动。

国大党和其他的非官方团体不能够对社会改革多尽一点力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們正在进行民族主义的斗争,这吸住了我們的注意力,在我們沒有取得政治自由以前,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正如蕭伯納所說的:“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好像一个有毒癩的人,他無法去想其他的事……对于一个国家來說,沒有比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負担更大的了,民族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被压制的自然机

能受痛苦的征候而已。被征服的国家在世界的前进中失去了它们的地位，因为它们除了努力恢复民族自由，以便结束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外，便什么都不能做。”

过去的经验证明尽管臣民当了部长，在现今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推动社会的进步。政府中的惰性常常帮助了保守分子，几十年来英国政府消灭了积极性，实行了专制的，或者像它自己所說的那样，家长式的统治。英国政府不赞成非官方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活动，并且怀疑人家别有用心。尽管哈里真运动的组织者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这个运动有时也跟官方发生冲突。我相信如果国大党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宣传运动，提倡多用肥皂，也一定会在许多地方跟政府发生冲突。

我以为如果国家把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要群众接受社会改革并不是困难的事。但是外国统治者常常疑神疑鬼，在说服群众时不肯深入。如果取消了外国统治，首先实施经济改革，那么一个能干的政府就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具有远大影响的社会改革。

我们在监狱里的人并不是除了社会改革，沙达法案以及哈里真运动之外就不想其他的事。哈里真运动妨害了和平抵抗运动，这使我感到苦恼。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的时候，和平抵抗运动中中止了六个星期，我们焦急地等待局势更进一步的发展。这种中止给运动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因为不能拿民族斗争开玩笑，随便发动，随便中止。甚至在运动中止以前，运动的领导还很软弱无力。开了小型会议，传出了各色各样的谣言，不利于积极工作。国大党有些代理主席是值得钦佩的人物，可是要他们指挥积极斗争未免有点要求过份。他们这种人暮气太深，只图摆脱困难的地位。上层分子的这种动摇和举棋不定，已经引起了不满，可是很难用有组织

的方式表示这种不滿的情緒，因为所有各种国大党組織都早已被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

接着便是甘地的二十一天絕食，当局釋放他出獄，和平抵抗运动中中止六个星期。絕食过去了，他慢慢地恢复健康。到了六月中旬，和平抵抗中止期又延長了六个星期。在这个期間，政府並沒有放松它的进攻。安达曼群島上的政治犯（在孟加拉因革命暴动而被定罪的人被押送到安达曼群島）因待遇問題而进行絕食，其中有一二人因絕食而死，另外一些人則奄奄一息。在印度，有些人在会上講話，抗議安达曼群島上發生的事情，結果这些講話的人自己也被捕并且被判处徒刑。我們不仅遭受痛苦，甚至当政治犯沒有其他办法表示抗議，只能进行絕食，因而死亡时，也不准我們訴苦。几个月后，到了一九三三年九月（当时我已經出獄），有些人联名發表宣言，要求給安达曼群島上的犯人更人道的待遇，最好是將他們轉押在印度監獄中。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查·弗·安德魯斯，以及其他許多有名人物，这些人中大部分跟国大党沒有关系。印度政府的內务部長很不滿意这个宣言，并且激烈批評这些签名的人同情犯人。后来，孟加拉省把同情犯人的行为看作一种应受处罰的罪行。

在和平抵抗运动第二次中止六个星期滿期以前，我們在台拉·頓監獄中听到消息，知道甘地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这次會議到了二、三百人，接受甘地的意見，停止了群众性的和平抵抗运动，允許个人的和平抵抗行动，禁止一切秘密方法。这种决定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可是我也不特別表示異議。停止群众性的和平抵抗运动只是承認和稳定現行形势而已，因为在实际上当时已經沒有群众运动。秘密工作只是我們繼續进行斗争的托辞，鑒

于我們这种运动的性質，秘密工作常常使人心涣散。当然为了發出指示，保持联系，这就需要一定限度的秘密工作，可是和平抵抗运动本身不能保守秘密。

浦那會議沒有認真討論当前的形势和我們的目标，这使我惊奇，同时也使我难过。經過了將近兩年的激烈冲突和压迫，国大党人又聚集在一起。在这兩年中間，在全世界，在印度都發生了許多事情，包括英国政府發表关于宪法改革建議的白皮書在內。在这个时期內，我們被迫忍住不表示意見，而同时却有人在那里不断地进行歪曲的宣傳，把問題弄得模糊不清。不仅政府的支持者，而且有一些自由主义派分子及其他分子一再揚言国大党放弃了它爭取独立的目标。我認为在这个时候，国大党至少应当強調自己的政治目标，重新使人們認識清楚这种目标，如果可能的話，除了政治目标之外，还应当提出社会和經濟的目标，浦那會議沒有这样做，这次會議只討論群众性的和平抵抗运动和个人的和平抵抗活动到底哪个好，秘密和公开哪一种好。同时也跟政府进行了奇怪的关于“和平”的談判。甘地打了一封电报給印度总督，要求会見总督，总督回电拒絕了甘地的要求。接着甘地又打第二封电报給总督，談起“光荣的和平”。当时政府正在洋洋得意地用各种方法鎮压人民，安达曼群島上的人正在絕食而死，到什么地方去追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和平呢？不过我知道，不管發生了什么事，甘地总是提出和平建議。

政府雷厉風行地进行鎮压，严格地实行各种取締公共活动的特別法令。一九三三年二月我父亲逝世周年时准备举行的紀念会也被警察禁止，虽然这次会是国大党以外的人組織的，原定由稳健的德吉·巴哈杜尔·薩普魯爵士来当主席。政府为了使我們認識

它將來的恩惠，提出了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文件，讀了這個文件後使人喘不過氣來。根據白皮書的建議，印度變成一個光榮的印度國，各邦的封建代表在中央擁有左右一切的力量。各邦內部的事務，外邊不能過問，不折不扣的專制政治仍然繼續施行。真正的帝國鏈環——債務的鎖鏈，使我們永遠受英國金融家的控制，英格蘭銀行通過一個儲備銀行控制我們的通貨和幣制政策。這些使英國的既得利益獲得了堅固的保證，而且還將增加一些新的利益。我們的收入大部分落在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口袋裡。各種帝國機關——我們太喜歡這種機關了！——將繼續不受人控制或染指，訓練我們實行進一步的自治。各省實行自治，可是省長是一個心腸慈善的、大權獨攬的獨裁者，由他來管理我們。高高乎在上的還有最高獨裁者——總督——他有全權，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要取締什麼就取締什麼。這充分表現了英國統治階級管理殖民地的才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欽佩和羨慕印度總督是有其道理的。

這個憲法把印度緊緊地束縛着。這還不算，英國另外還提出了“特殊責任”、保證等來限制印度，使這個苦難的國家動彈不得。尼維爾·張伯倫先生道破了此中秘密，他說：“他們用盡他們的力量想出了人類的智慧所能想出的保證，借以保護這些建議。”

這還不算。為了這些恩惠，我們還得付出重大的代價，開始時一次總付幾千萬盧比，以後每年還得付款。不付充足的款我們是不能享受自主利益的，我們原來以為印度窮得要命，擔負的担子已經夠重了，希望獲得自由，減輕這種重擔。群眾要求自由，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可是現在看來担子却還得加重。

英國用它地道的英國作風，一本正經地提出這種關於印度問

題的滑稽解決方案，并且宣傳英國統治者是多么慷慨，說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帝國自願地把這種權力和機會給一個附屬的民族。在英國，主張這種方案的人跟那些認為這種方案太慷慨了因而表示反對的人爭論得很激烈。在三年中間舉行過三次圓桌會議，若干次委員會和協商會，英國和印度之間來來往往地進行交涉，結果就是這樣。

到英國去商量並沒有完。英國議會中的聯合特種委員會準備討論關於印度問題的白皮書，印度人以證人和旁聽者的資格去參加這種討論，當時另外還有許多委員會在倫敦開會，在幕後有許多人爭着要當委員，因為當了委員後就可免費到倫敦去，並且住在那兒自己用不着花一文錢。勇敢的人並不因為白皮書內頑固的規定而灰心，他們願意冒坐船和坐飛機的危險，以及住在倫敦的更大危險，企圖用他們的口才和說服力，去改變白皮書中的條文。他們知道並且說這種工作幾乎是沒有希望的，可是他們不是在困難面前逃避責任的人，他們要坚持表示他們的意見，即令沒有人聽他們講話。有一個合作派的領袖在其他的人全部走了後仍然堅持到底，大概他在倫敦訪問了當權人物，跟這些人進行了社交活動，借此向這些當權人物說明他要求的是些什麼政治改革。當他後來回到印度後，人們很想知道他此行的結果如何，他說他具有瑪拉塔人特有的堅韌性，拒絕放棄他的工作，因而留在倫敦，堅持到底以表示他的意見。

我回想起我父親常常抱怨說他的合作派朋友沒有幽默感，他常常因為說一些開玩笑的話而跟他們發生爭執，因為這些人完全不懂得幽默，父親不得不解釋一番，安慰他們，這是一種麻煩的事。我想起了瑪拉塔人過去和現在在我們民族鬥爭中所表現的戰鬥精

神，想起了偉大的、英勇的鐵拉克，他雖然失敗了，但並不屈服。

自由主義聯盟分子很不喜歡白皮書。他們也不喜歡在印度每天發生的鎮壓行動，有時（雖然很少）甚至抗議這種鎮壓行動，不過他們鄭重聲明他們譴責國大黨及國大黨的一切活動。他們間或向政府建議釋放一些在監獄中有名的國大黨人，他們只能想到他們認識的人。自由主義聯盟與合作派所提出的理由是：社會安寧現在已經不再有危險，所以某某人應當恢復自由。如果這個人在釋放後仍然為非作歹，政府隨時可以重新逮捕他，而且這樣做也更有理由。英國也有人根據同樣的理由要求釋放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某些委員，或釋放某些特殊人物。我們很感激那些當我們坐牢時對我們表示關心的人們，但是我們有時也有這樣的感覺，如果這些好心腸的朋友不來過問我們的事，那就更好。我們不懷疑他們的用心，可是他們完全採取了英國政府的看法，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存在着一條很大的鴻溝。

自由主義聯盟分子很不喜歡印度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他們對這些事很不高興，可是他們怎麼辦呢？要他們採取有效的行動去反對政府是不可想像的。僅僅為了保存他們自己作為一個單獨的組織，結果他們就不得不更加脫離群眾，脫離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更和右派接近，結果使他們的思想意識跟政府的思想意識很難分別。他們人數少，在群眾中間沒有影響，因此對於群眾鬥爭關係不大，但是在他們中間有些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人物。這些人物和整個自由主義聯盟以及合作派在道義上支持政府的政策，因此在嚴重的危機時幫了英國政府很大的忙。自由主義聯盟不切實地抨擊政府的壓迫以及各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有時甚至表示同意和贊許，這也就是對政府的壓迫和非法行為有利的。政府在全國進行

殘酷的、空前的压迫，而且很难提出理由加以辯护，在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联盟和合作派对这种压迫却給予道义上的支持。

自由主义联盟領袖們說白皮書很坏。怎么办呢？一九三三年四月自由主义联盟在加尔各答开会时，自由主义联盟中最著名的領袖斯里尼瓦沙·沙斯特里先生說尽管宪法改革多么不能令人滿意，自由主义人士仍然应当实行。他說：“現在不是袖手旁觀，讓事情自流的时候。”很显然，他所想到的唯一行动就是接受人家所提出的东西，并且努力实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他接着加以补充：“如果我們有智慧、經驗、节制、說服力、鎮靜的影响、真正的效率——如果我們具有这些优点的話，現在就是最充分表現这些优点的时候。”加尔各答“政治家”报对这說法的評論是：“漂亮話”。

沙斯特里先生有很好的口才，喜欢像演說家一样用漂亮的字句。但是他容易被自己的热情冲昏头腦，他的字句所产生的魔力使別人，甚至使他自己也摸不清楚他到底在講些什么。現在我們不妨研究一下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加尔各答所發表的声明，当时和平抵抗运动仍然在进行。撇开基本原則和目的不談，在我看来有兩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不管發生什么事情，不管英国政府怎样侮辱、压迫和剝削我們，我們必須忍受。根本不能够規定出一條我們不能再前进进一步的界限。蚯蚓可以翻身，但是如果印度人听沙斯特里先生的劝告，印度人就不能翻身。在他看来，沒有其他的办法。他認為服从和接受英国政府的决定就等于是一种宗教（如果我可以“宗教”这个不幸的詞）。这是命运，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只好屈服。

这里应当指出沙斯特里先生并不是就一个已經明确的形势表

示意見。“宪法改革”还在醞釀中，虽然可以料想到这种改革很坏。如果他这样說：尽管白皮書中的建議很坏，鑒于当时的情形，如果真正通过成为法律，我贊成实行。如果是这样，他的劝告不管好坏，总跟当时的事实有关系。沙斯特里先生更进了一步，他說尽管宪法改革多么令人不滿意，他仍然認為他的劝告有效。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宪法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根本問題，可是在这个根本問題上，沙斯特里先生却准备無条件地拥护英国政府。在我看来，我很难理解任何人、任何党派怎样能够对于未来看不清的事情采取这种承担义务的态度，除非是完全沒有原則，沒有任何道义或政治标准，而是一律服从統治者的命令。

使我注意的第二点純粹是策略問題。在制訂新改革的長途旅程中，白皮書只是一个阶段。在政府看来，这是一个重要阶段，可是今后还有許多阶段，也許在这种过程中白皮書中的建議会有一些修改，使白皮書好一些，或者坏一些。这些修改如何，要看各方面給英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怎样而决定。在这种斗争中，英国政府为了爭取印度自由主义联盟分子的支持，也許不得不郑重考虑，修改原来的建議，使这些建議更寬大些，或者至少反对把建議修改得更坏。現在在接受或拒絕这些新改革，实行或不实现这些新改革的問題提出以前，沙斯特里先生就冒然發表这种明确表示立場的宣言，这使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它可以完全不理睬印度的自由主义联盟，不存在爭取他們的問題。甚至于把他們推出去，他們也不会跟政府断絕关系。从自由主义联盟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我認為沙斯特里先生在加尔各答的演說是非常坏的策略，对于自由主义联盟的事業是有害的。

关于沙斯特里先生这篇旧演說我写了这許多，并不是因为这

个演说本身很重要，也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联盟会议的关系，而是因为我想了解自由主义联盟领袖们的思想情况和心理状态。他们是一些能干的、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抱着最大的善意，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此外，我在监狱中还读到沙斯特里先生的另一篇演说，这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这篇演说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浦那地方法印度公僕会（他是这个会的会长）发表的。他在这篇演说中指出：如果英国的势力突然撤退，那么印度的政治运动就会出现一个党仇视、迫害和压迫另一个党的危险。另一方面，容忍一向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特点，如果能更好地跟英国合作建设印度的前途，那么印度就更会出现容忍精神。我当时在坐牢，因此只能看到加尔各答“政治家”报上所发表关于沙斯特里先生演说的摘要。“政治家”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学说，我们知道蒙吉博士也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据说沙斯特里先生在演说中还提到俄国、意大利、德国摧残自由的情形，以及这些国家内所发生的非人道暴行。

当我读到这篇演说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沙斯特里先生关于英国和印度的看法跟“死硬派”的英国保守党的看法非常相同。当然在细节方面有些不同的看法，可是思想意识基本上是相同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可以用类似的词句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不会损害他的政治信仰。可是沙斯特里先生是自由党的左派，是自由党领袖中最能干的人。

我完全不能接受沙斯特里先生对于历史的看法，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特别是对于英国和印度的看法。也许没有一个英国人以外的外国人会接受他的这些看法。许多开明的英国人可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他戴着英国统治阶级的有色眼镜看世界，看他自己

的国家。可是令人注意的是他在演說中沒有提到在过去十八个月中間印度每天所發生的以及在他發表演說時正在發生的特殊事件。他談到俄国、意大利和德国，可是对于他自己国家里的殘酷压迫和摧殘自由的行为却一字不提。由于严密的新聞檢查，許多事情被封鎖，他也許不知道边省和孟加拉所發生的可怕的事情（拉舍德拉·巴布最近在就任国大党主席时把孟加拉發生的事情称之为“孟加拉的暴行”），可是难道他忘記了印度所受的痛苦，忘記了他的同胞为了爭取生存和自由正在跟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嗎？他难道不知道各大地区的警察統治、跟戒严差不多的情况、紧急法令、絕食、監獄中的痛苦嗎？他难道不認識他所贊揚英国的容忍精神和自由已經在印度被英国自己摧殘了嗎？

他是否同意国大党的看法，這個問題并不重要。他完全有权利批評和指責国大党的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印度人，作为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作为一个感覺銳敏的人，他对于他的男女同胞們的高度勇敢和牺牲表示什么态度呢？当我們的統治者摧殘印度的时候，难道他不感到痛苦嗎？成千成万的人拒絕向一个高傲的帝国的压力屈服，情願自己家破人亡，自己亲爱的人吃苦头，而不願意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一切难道对于他是不足輕重的事嗎？我們在監獄里和在監獄外面都現出很勇敢的样子，我們笑，可是我們笑里常常帶着眼泪，我們的笑声有时接近哭声。

一个勇敢、剛正的英国人維利尔·埃尔夫文先生把他的反应告訴了我們。他在談起一九三〇年時說道：“看到整个民族努力摆脱精神上的屈服，發展大無畏精神的真正尊严，这是一种美妙的經驗。”他还說：“在坚持真理斗争中，大多数国大党志願队表現了令人惊异的遵守紀律的精神，这种遵守紀律的精神，有一位省長曾經

慷慨地提出証明……”

斯里尼瓦沙·沙斯特里先生是一位能干而且感觉銳敏的人，他的同胞很尊敬他。說他在这种斗争中不会有同样的反应，不会同情他的同胞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們期望他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取消各种公民自由和各种公共活动。人們更希望他和他的同事亲自到受害最重的地区——孟加拉和边省——去看看，并不是去帮助国大党或和平抵抗运动，而是去揭發和制止政府和警察的暴行。其他国家內爱好自由和公民自由的人常常这样做。他沒有这样做；当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对付印度人并且取消了一般的自由权利时，他沒有制止政府；他沒有去查明所發生的事情，反而贊揚英国人的自由和容忍的精神，而这两种优点恰好是英国在印度的統治中完全沒有的。他在道义上支持英国統治者，因而鼓励了英国統治者的压迫行为。

我相信这不会是沙斯特里先生的本意，他沒有認識他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是他的演說的确發生了这种影响，这是絲毫沒有疑問的事。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呢？

对于这个問題，我还没有找出恰当的答案。我只能說自由主义联盟的領袖們完全脫离了他們的同胞，跟現代思想完全脫了节。他們所讀的是陈旧書籍，完全看不見印度人民，而陷于一种孤芳自賞的境地。我們进了監獄，身体失去了自由，可是我們的心却很自由，我們的精神沒有消沉。这些自由主义联盟的領袖自己制造了精神上的監獄，在里面兜圈子，找不到出路。他們崇拜現狀，当事物發生了变化（世界在改变中，事物一定会發生变化）后，他們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怎样办，沒有理想，沒有道德标准。就我們而言，我們每个人都要求进步，或者被人推着前进。在这个積極活动的世界

中，我們不能夠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向前進。自由主義聯盟的人害怕改變，害怕運動。他們被周圍的驚濤駭浪嚇倒了，他們沒有力量向前進，因而隨波逐流，抓着每一個他們能夠抓住的救命機會。他們變成了印度政治上的哈姆雷特，“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考慮越多，就越打不定主意，永遠猶疑不決，三心二意。

“這是亂七八糟的時代。

我生不逢時，負起匡救時代的責任。”

自由主義聯盟的“印度公僕”周刊攻擊國大黨人在和平抵抗運動後期想去坐牢，進了監牢後又想出來。這個刊物帶着憤慨的口氣說，這就是國大黨的唯一政策。自由主義聯盟的辦法顯然是派一個代表團到英國，看看英國政府部長們的顏色，等待和祈求英國改換政府。

的確當時國大黨的政策主要在反抗緊急法令及其他壓迫措施，這當然會產生被捕下獄的後果。在長期鬥爭後，國大黨和印度民族精疲力盡，不能再對政府施加有效的壓力，這也是真實的事。但是在这里却有一個實際的和道義的考慮。

印度所經歷的赤裸裸的壓迫就統治者而言是一種代價很高的事。甚至對於統治者，露骨的壓迫也是一種痛苦的震撼神經的苦事，因為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赤裸裸的壓迫最後會削弱他們的基礎，會繼續在被壓迫的人和全世界面前揭露他們的統治的真正性質。統治者寧願裝出溫和的樣子，來掩蓋他們的高壓手段。要政府去對付那些不顧後果始終不肯向政府屈服的人，的確是一種令人苦惱的而且歸根結蒂是有害的事。因此，反抗壓迫措施的個別行動有它的價值，因為這種行動會加強人民的信心，動搖政府的威信。

道義方面的考慮尤其重要。索洛曾經在一段著名的文章里說

过这样的话：“当有人無辜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主持正义的人也应准备去坐牢。”这种忠告也許不是自由主义联盟及其他的人所願意听的，可是我們許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認為在現狀下的道义生活是不可容忍的，即令撇开和平抵抗运动不談，我們許多同事常常被关在监牢里，国家机器經常压迫我們，侮辱我們，帮助剝削我們。我們在自己的国家里行动受人猜疑，被人釘梢，被人監視，我們的言論被記錄下来，其目的是害怕它違反到处都存在的叛乱法，我們的信件被拆开檢查，我們常常有被禁止作某些事或逮捕的危險。我們只有兩条路可走：或者是忍辱地向国家的权力屈服，向精神上的墮落和否認真理屈服，为了在我們看来是卑鄙的目的而使我們的道德墮落；或者是进行反抗，并承当因此而引起的后果。沒有人喜欢去坐牢，或自找麻煩。可是監獄常常比其他的办法好些。正如蕭伯納所写的，“人生中唯一真正的悲剧是被有个人打算的人利用去追求你知道是卑鄙的目的。其余一切的东西最坏也不过是倒霉和死亡而已，只有被有个人打算的人利用去追求卑鄙的目的才是痛苦、奴役和人間地獄。”



第四十九章 長期徒刑結束

我出獄的時間快到了。我因為“表現好”獲得了減刑的待遇，把原來判處的兩年徒刑減短了三個半月。我本來很平靜的心情——或者可以說因為過慣監牢生活，感應遲鈍的心情——由於快要出獄了，反而感到不安。我出獄後應當做什麼呢？這是一個難題，我很难回答這個問題，這就減少了因為要出獄而感到的喜悅。但這也只是一時的感情，我長期被壓制的精力正躍躍欲試，我很想出獄。

一九三三年七月底傳來了杰·姆·森—古普塔突然逝世的消息，這是令人不安的痛苦消息。我們不僅在國大黨工作委員會中共事多年，關係親密，而且在劍橋讀書時也早有來往。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劍橋，那時我是大學一年級的学生，他剛剛取得學位。

森—古普塔在拘留中死了。他一九三二年初從歐洲回國，被加上了國事犯的罪名，在孟買未下船時就被捕。從這個時候起就變成一個犯人或被拘留的人，他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壞。政府給他各種便利，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他病情的發展。在加爾各答替他舉行葬禮的時候，是群眾示威和對他表示尊敬的好機會，孟加拉人長期被壓制的痛苦心情至少暫時獲得了一個發泄的機會。

森—古普塔死了。另外一個國事犯蘇巴斯·鮑斯由於多年被監禁和坐牢而把身體弄垮了，政府終於允許他到歐洲去治病。維

沙尔海·巴特尔也臥病在欧洲。另外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受不了監獄生活对身体的折磨和出獄后的不断活动而把身体弄垮了，或者死了。还有不少人，虽然表面上改变不大，可是內心里却受了深刻的精神錯乱的痛苦，并且由于被迫过着不正常的生活，因而养成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緒。

森一古普塔的死使我清楚地認識全国暗中所受的这种可怕痛苦，我很难过。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我的身体还算好，尽管国大党的活动很紧张、很不正常，总的說来，我的身体还算好。我想一部分是由于我的身体原来就很好，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保养我的身体。在我看来，疾病、身体虛弱、發胖都是不好的現象，我多运动，多呼吸新鮮空气，飲食朴素，帮助了我避免这些現象。我的經驗是这样：印度中产階級所生的病有極大一部分是因为飲食不当而引起的，吃的东西太油腻而且吃得太多（这里仅指那些有錢能够过这种浪费生活的人而言）。疼爱孩子的母亲常常給孩子吃了过多的糖果和其他好吃的东西，結果造成孩子終身消化不良的毛病。孩子的衣服也穿得太多。在印度的英国人似乎也吃得太多，虽然他們吃的东西油腻少些。大概他們从老的一輩人学到了經驗，改良了他們的飲食，而老一輩人通常吃很多热的、味道很濃的东西。

我并不考究吃东西，我只避免吃得太多，避免油腻的食品。像所有克什米尔的婆罗門人一样，我們这一家人是吃肉的。我从童年起就吃肉，虽然我并不十分喜欢肉。一九二〇年不合作运动开始后，我放弃了肉食，变成一个素食者，一直到六年以后我去欧洲时还是吃素的。到了欧洲，我又吃肉。从欧洲回印度后，我又恢复吃素。从这个时候起，我多多少少是吃素的。吃肉似乎也适合我

的口胃，但是我逐漸討厭吃肉，吃肉給我一種粗野的感覺。

在我的健康不好的時期內——主要是一九三二年在監獄中的時候——每天發燒，這樣過了好幾個月，我非常着急，因為這傷害了我一向認為我的身體很好的虛榮心。我不像過去那樣，自己認為生氣勃勃，精力充沛，而是感到面前呈現着一個日益枯竭的陰影，這種感覺在我說來還是第一次。我並不特別怕死，但是精神和肉體慢慢地變壞却是另外一回事。事情證明我的這種恐懼心理太過分了，我設法免除了些小毛病，對身體健康加以控制。在冬季里長期曬太陽幫助我恢復了我對於自己健康的信心。監獄中的同伴們穿着大衣圍着圍巾還冷得發抖，而我卻赤膊坐在太陽下曬太陽。這種辦法只有冬季在印度北部才實行，在其他地方太陽一般是太熱了。

我特別喜歡一種運動，那就是兩手的手指交叉，放在頭的後面，把肘放在地板上，然後兩腳朝天，把身體直立起來。我認為這種運動對身體很好。我特別喜歡這種運動所產生的心理效果。這種有點令人發笑的姿勢增加了我的幽默感，使我對於生活中的幻想採取一種更加容忍的態度。

我的健康很好，我認為在身體方面我是幸福的，這就幫助我度過監獄生活中有時不可避免的消沉情緒，同時也幫助我適應監獄內外改變中的環境。我曾經遭遇過許多驚險事，當時好像要使我驚慌失措，可是出乎意料，我總很快就恢復了鎮靜。我想表明我的頭腦清醒的主要事實就是我不知道頭痛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沒有失眠過。我沒有患過文化人常患的這些病。我的眼力很好，雖然我讀書和寫作用眼過度，有時監獄中光綫很不好。去年一位眼科專家看到我的眼力好而表示驚訝。八年前他曾經說過我在一兩年

內就得戴眼鏡。結果他大錯特錯了，我到現在仍然沒有戴眼鏡。雖然這些事情建立了我頭腦清醒的名譽，可是我得聲明，有些人始終不變地保持着清醒的頭腦，這使我不免吃驚。

在我等着出獄的時候，監獄外開始了新形式的和平抵抗運動——一個人的和平抵抗行動。甘地決定起帶頭作用，他詳細地通知了政府當局後，於八月一日開始想對古甲拉特農民宣傳和平抵抗運動。他馬上被捕，被處徒刑一年，重新押入耶拉伏達監獄。我很高興他又回到監獄來。可是接着發生了新的麻煩。甘地要求像過去那樣從監獄中繼續進行哈里真運動，政府拒絕他的要求。突然間我們聽說甘地為了這個問題又重新開始絕食。這似乎未免小題大做。我完全不能理解甘地的這種決定，雖然也許在他跟政府爭論時他完全有道理。我們愛莫能助，只好旁觀，有點兒莫名其妙。

絕食一個星期後，甘地的健康很快就變壞了，他被送到醫院里，他仍然是一個犯人，政府不肯在哈里真問題上讓步。甘地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在過去幾次絕食中他保有這種意志），讓他的身體壞下去。末日似乎快到了。他向人告別，規定了他身邊所有的東西的處理辦法，把有些東西送給護士。可是政府不願意讓甘地死在他們的手上，就在那天晚上突然把他釋放了。這剛剛來得及救了甘地的性命。倘使再多過一天，也許就太晚了。甘地之得救，大部分功勞應屬於查·弗·安德魯斯，因為他曾違反了甘地的勸告，匆匆忙忙地趕到印度。

在這個期間我於八月二十三日從台拉·頓監獄搬到別的地方去，在幾個地方的監獄住了一年半後又回到內尼監獄。正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我的母親突然生病送到醫院去了。我在一九三三

年八月三十日从內尼監獄中被开釋，因为我母亲的病情严重。在通常的情况下，我要在九月十二日徒刑期滿后才能被釋放。現在提早在八月三十日出獄，省政府又把我的刑期减少了十三天。



第五十章 訪問甘地

我出獄后馬上趕到勒克瑙城去看我母亲的病，我同她一起过了一些日子。我在監獄里过了一个相当長的时期，現在出獄后我觉得有点孤独并且不了解环境。我發現在我坐牢期內我的生活几乎停滯了，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世界却在繼續前进，繼續变化，这未免使我吃惊。这种情形是我們大家都同样感觉到的。孩子們和男女青年們長大了，結婚，生孩子，死亡；愛和恨，工作和休息，悲劇和喜劇。生活中的新兴趣，新的談話題目。在我所看到和听見的东西中常常有些使我感到惊奇的成分。生活似乎前进了，把我丢在后面。这不是一件完全愉快的事。我很快就得使自己适应环境，可是我不觉得有这样做的要求。我認为我只是暫時在監獄外面玩玩，不久就得回到監獄里，因此何必費力去适应一些我很快就要离开的东西呢？

在政治方面，印度是相当平靜的。一切公共活动受到政府控制和压迫，捕人的事也不时發生。可是这个时候印度的不声不响却是耐人寻味的。这种不声不响是經歷殘酷的压迫后，由于精疲力竭而产生的，并且帶有惡兆，这种不声不响常常包含重大的意义，是从事压迫的政府所不能理会的。印度是理想的警察国家，警察思想存在于政府各方面的活动中。表面上，一切反对的行动被取締了，到处布滿了偵探和特务，全国志气消沉，人心惶惶。任何

政治活动——特别是农村中的政治活动——都立即受到摧殘，各省政府用尽方法把国大党人驅逐出市政府和地方机关。根据政府的规定，凡是因从事和平抵抗运动而坐过牢的人都不适于在市立学校教書或在市政府中担任职务。政府对市政府施用很大的压力，并且威胁着說如果不把有罪的国大党人革职，就要停止津貼。一个臭名远揚的例子就是加尔各答市行政机关所發生的压迫行为。我相信，以后孟加拉政府通过法律禁止市行政机关雇用任何因政治活动而被判过刑的人。

关于德国納粹暴行的报道在英国官員和印度的英国报纸方面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影响。他們用来辯护他們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他們自鳴得意地指出：如果納粹来对付我們的話，我們的处境就会更坏些。德国納粹党人树立了新标准，新纪录，当然很不容易跟他們竞争。也許我們的处境会更坏些；我很难判断，因为我不掌握过去五年中在印度各地所發生的事情的全部事实。在印度的英国政府認為它的右手不应当知道左手作了些什么，因而每次都拒絕了进行公平調查的要求，虽然这种調查多半偏向政府方面。我認為一般英国人的确憎恨殘暴行为，我不能想像英国人像德国納粹那样公开歌頌暴行。英国人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也有点兒难为情。可是不管我們是德国人，英国人，或印度人，我們的文明行为的外表是很薄的，一旦动了感情，这种外表就脫落了，露出一些不好看的東西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受了暴行的痛苦，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在休战后封鎖德国这件事中可以看到。这次封鎖使德国遭受严重的飢餓。一个英国作家說这次封鎖是“任何国家所作的最無意义的、最殘暴的、最可怕的暴行。”在印度，人們还没有忘記一八五七年和一八五八年中所發生的事情。當我們的利益受到

威胁的时候，我們忘記了我們的好教养和社会礼节，謊言变成了“宣傳”，暴行变成了“科学的镇压方法”，为的是维护“法律和治安”。

这不是个人或那一个民族的过失。在类似的情况下，每个人多少都会这样做。在印度，在每一个受外国控制的国家里，都存在着一种威胁統治者的潜在力量，有时这种威胁表現得更明显，更危險。这种威胁常常發展了統治者軍事方面的效力和罪行。在过去几年中間，我們在印度看見了这种高度發展的軍事效力和罪行，因为我們的威胁加强了，能产生实际效果。可是在一定的範圍內我們常常不得不忍受印度这种軍事想法。这是帝国所产生的一种后果，使有关的双方都墮落了。印度人方面的墮落是很明显的，其他方面的墮落比較微妙，可是在發生危机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第三类，它不幸兼有这两类墮落的特点。

我在監獄中有很多空閑時間讀高官們的演說，讀他們在联邦院和參議會中对于問題的回答，讀政府的声明。我發現在过去三年中間在这方面發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一天更比一天明显。这些官样文章的口气逐漸变得咄咄逼人，正好像軍隊中一个班長对他所管的一班人訓話。孟加拉省米德那浦專区的專員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或十二月間所發表的演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言論表現了一个共同調子，那就是失敗者應該倒霉。非官方的欧洲人——特別是在孟加拉非官方的欧洲人——比官方人士更过火，他們的言論和行动暴露出明显的法西斯傾向。

暴露这种暴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在信德地方公开絞死几个犯人。信德地区犯罪的案件增加了，为了杀一儆百，該地当局决定公开行刑，供給各种便利要人們去看，据說这次去看行刑的有好几千人。

我出獄后研究了印度的政治和經濟情形，覺得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地方。許多同志仍然在監牢里，政府仍然繼續捕人，各種緊急法令仍然在實行，政府的檢查摧殘了報紙並且打亂了我們的通訊。我的一個同事拉菲·阿馬德·基德威因為他的信被檢查很冒火。檢查信件的人有時把信壓下，使收信的人過期很久才收到，有時信件遺失了，因而打亂了他跟別人的約會。他想要求檢查信件的人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可是寫信給誰呢？檢查員不是一個公開的官員，他也許是干秘密工作的偵探人員，政府方面甚至沒有公開承認有這些人員，沒有公開承認這些人的活動。拉菲·阿馬德解決了這個困難問題，他寫信給檢查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就是他本人！這封信果然达到了他所想的目的地，以後他的來往信件有了改進。

我不想回到監獄里去。我坐牢坐够了。可是在現行形勢下，除非我退出各種政治活動，我就沒有法子逃避監牢。我不打算放棄政治活動，因此我認為我一定會跟政府發生衝突。說不定政府會在什麼時候命令我做某些事情，或者不要做某些事情，那時我的本性就會反抗被迫奉命行事。政府企圖吓倒和威脅印度人。我沒有什麼辦法在比較廣的方面有什麼活動。可是無論如何我個人可以拒絕被吓倒和被威脅向當局屈服。

在我回到監獄去以前，我要辦妥一些事情。首先要照料母親的病。她恢復得很慢，她躺在床上一年了。甘地在浦那絕食后正在休養，我很想去看他。我有兩年多沒有見着他。我也想去盡量跟各省的同事們見面，不僅討論印度當前的政治形勢，而且也討論國際形勢和我自己心中的想法。那時候，我認為世界在很快地走向政治和經濟的災難。我們在制訂我們的綱領時應當記住這點。

我的家事也急待处理。我一直完全忽視了家事。自从父亲去世以来，我始終沒有整理他的文件。我們家里的开支大大地削減了，可是支出仍然超过收入。只要我們繼續住在那所屋子里，就很难再进一步緊縮家中的費用。我們家中不用汽車，因为这超过了我們的經濟能力，而且政府随时可以扣押。我面临着經濟困难，同时又收到一大堆要求經濟援助的信（檢查員把这种信無阻難地給了我）。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十分錯誤的印象，特別是在印度南部，以为我是一个有錢的人。

我出獄后不久，我的妹妹克里西娜訂了婚。我很想在我被迫离开以前早些办理她的婚礼。她在監獄里服滿一年徒刑后，提早了几个月出獄。

母亲的病好些后，我就到浦那去看甘地。我很高兴又会見甘地，他虽然身体很虛弱，可是恢复得很快。我們作了長談。我們的人生觀，我們对政治和經濟的看法的分歧很大。我很感激他慷慨地尽可能来迎合我的观点。我們的通訊(后来發表了)討論了存在于我心中的一些更廣泛的問題。当时虽然用的詞句很含糊，可是总的傾向很明白。我很高兴甘地声明必須取消既得利益，虽然他強調应当采用說服方法，而不应当用強迫方法。在我看來，甘地主張的某些說服方法跟客气的体諒人的強迫方法相差不远，因此我們的意見分歧不大。像以前一样，我当时認為甘地虽然討厭考慮模糊的理論，事实会使他一步一步地認識根本的社会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甘地是一种特异人物。他是維利尔·埃爾文先生所謂的中古时代的天主教聖人，同时也是一个实际的領袖，跟印度的农民息息相通。很难預料他在緊急关头会轉向哪方面，但是不管他轉向哪一方面，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我們看來，甘地也許會走

錯路，可是總是一條直路。跟他一起工作當然是好的，但是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只得各走各的路。

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發生。我們正在進行民族鬥爭，和平抵抗運動在理論上仍然是國大黨的綱領，雖然這種運動只限于個人。我們必須繼續鬥爭，並且努力在人民群眾中間，特別是在有較高政治覺悟的國大黨工作人員中間，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以便將來另一次宣布政策時，我們可以大大地前進。同時，國大黨是一個非法組織，英國政府正設法粉碎國大黨，我們必須應付這種進攻。

甘地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個人問題。他怎麼辦呢？他的處境困難。假如他再去坐牢，就會發生同樣的哈里真特權問題，政府大概不會讓步，因而甘地就得再次絕食。會重演這一套嗎？甘地拒絕向病囚暫釋政策屈服，他說如果他为爭取這種特權而再度絕食的話，即令當局將他釋放了，他仍然要繼續絕食。那就是說絕食到死而後已。

他可能採取的第二個辦法是在服徒刑期內（他還得再過十個半月才滿期）不去惹事生非，再被判處徒刑，而用全副精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時他跟國大黨工作人員見面，在必要時候，給他們出出主意。

他對我提出的第三個可能的辦法就是他在一定時期內完全退出國大黨，讓他所稱呼的“年輕的一代”來當家。

第一個辦法結果會使甘地餓死，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建議採用這個辦法。國大黨已被當局宣布為非法組織，因此第三個辦法很不適宜。因為其結果可能是馬上取消和平抵抗運動及各種形式的直接行動，恢復合法及憲法活動；或者是使國大黨被取締而陷于孤立，甚至脫離甘地而孤立，更進一步被政府粉碎。此

外，沒有那一派肯接管一個不能開會討論政策的非法組織。經過這樣選擇，我們決定採用甘地所提出的第二個辦法。我們大部分人不喜歡這個辦法，我們知道這對於留下來和平抵抗運動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如果領導人自己退出戰鬥，許多熱情的國大黨工作人員就不會拚命干。可是似乎也沒有其他的出路。甘地因而自己宣布了這件事。

甘地和我一致認為（也許原因不相同）取消和平抵抗運動的時機沒有到，即令在低潮時期，我們也應繼續進行鬥爭。除此以外，我主張把人民群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學說和世界形勢方面去。

在歸途中，我在孟買停了幾天。我很幸運在孟買看到了猶大·山卡的舞蹈。我很欣賞這次出乎意料之外的眼福。多年來，劇院、音樂、電影、無線電廣播等，我都無緣，就是在我出獄的短時期內，我也因專心於其他的活動而無暇及此。我一直只看過一次有聲電影，只知道電影明星的大名，而沒有看過他們的電影。我特別想戀劇院，我很羨慕外國的新作品。就是在我出獄後，在印度北部也很少有機會看到好戲，因為很少有好戲可看。我相信孟加拉、古甲拉特、瑪拉蒂的戲劇有了進步；可是印度斯坦戲劇就不是這樣，現在或者應當說過去（因為我不知道最近的情形）是非常粗糙，缺少藝術性。有人對我說，印度的電影（無聲的和有聲的）大部分的艺术手法不高。它們通常是一些小歌劇或傳奇劇，以古代印度歷史或神話為根據。

我想這些電影是城市人民所最欣賞的。這些粗制濫造的電影跟民歌、民間舞蹈，甚至農村中的戲劇中所保存的藝術性有顯著的差別。在孟加拉、古甲拉特和在南方，可以意外地發現農村中的老

百姓一般都是不自覺地愛好藝術。中產階級的情形就不相同。他們似乎失去了根基，沒有愛美的傳統。他們贊揚在德國和奧地利大量印制的沒有價值的畫，有時甚至拉維·伐瑪的畫。他們愛好的樂器是有簧的小風琴。（我生平的希望就是把禁止這種討厭的樂器作為自主政府首要的事情之一。）在勒克瑙及其他地方的大地稅征收人員的家里可以看到跟藝術不協調以及破壞藝術的東西。這些人有的是錢，而且喜歡出風頭，講排場，使看見的人心中作嘔。

最近有一種藝術方面的覺醒，這種運動是在泰戈爾這一家的倡導之下影響了印度全國各地的。不過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到處受限制，到處受壓迫，而且經常生活在一種恐懼氣氛中的時候，藝術怎麼樣能夠繁榮呢？

我在孟買會見了許多朋友和同志，他們有些最近剛剛從監獄里被釋放出來。那兒的社會主義空氣很濃厚，對於國大黨上層分子最近的情況深表憤慨。甘地把形而上學的觀點應用到政治方面，這種作法受到了嚴厲批評。我對於這些批評，大部分表示同意。不過我知道得很清楚，鑒於我們當時的處境，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除了堅持下去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任何取消和平抵抗運動的企圖不會使我們松一口氣，因為政府必然繼續進攻，我們切實工作必然因此被捕下獄。我們的民族運動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要么被政府鎮壓下去，要么強迫英國政府接受我們的意志。這就是說我們的民族運動到了經常有被政府宣布為非法運動的危險的階段。作為一個運動而言，即令和平抵抗運動取消了，民族運動也不能夠走回頭路。繼續和平抵抗運動在實際工作中不會有多大的差別，不過它表示一種精神上的反抗行動，這是很有價值的。在鬥爭進行中比在鬥爭暫時結束人心渙散的時候更容易傳播新的思想。

不进行斗争，那就得对英国政府及参议会中的宪法行动采取一种妥协态度。

处境很困难，选择办法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很能体会同事们内心的斗争，因为我自己曾经面临过这种斗争。我在孟买发现有些人想把高尚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不活动的护身符，这种情形我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有些人自己很少活动，反而批评那些实际负责进行斗争的人是反动派，这未免使我生气。这些空谈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攻击甘地，说他是反动派的魁首，提出各种在逻辑上没有什么毛病的理由。可是事实仍然是事实，事实是这个“反动派”知道印度，了解印度，几乎代表印度农民，震动了印度，这是所谓的革命者没有做过的事。甚至他最近的哈里真运动已经轻微地，但是不可抵抗地打击了正统派的印度多神教，根本动摇了印度多神教的基础。整个正统派团结一致反对甘地，把甘地看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虽然甘地对他们很客气。甘地善于发挥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水面上的波纹一样向外扩大，影响千百万人。不管你说是反动派或革命派，他改变了印度的面貌，使一个卑躬屈节和人心涣散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骨气，建立了群众的力量和觉悟，使印度问题成为一个世界问题。撇开目标和形而上学的意义不谈，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或者说和平抵抗运动——是甘地对于印度，对于全世界特殊的、有力的贡献。毫无疑问，这种运动特别适合印度的情形。

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老老实实的批评，应当尽量充分地公开讨论我们的问题。甘地突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这种讨论，这是不幸的。有一种完全依赖他，由他来作决定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有认识地接受目标和方法，

依靠在这种基础上(而不是在盲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与纪律,才能向前发展。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不能说他沒有可以被别人批评的地方。可是当批评变成不活动的护身符时,那就有点不对头了。如果社会主义者这样做,那必然引起大家的责难,因为群众是根据行动判断人的。列宁说过这样的话:“以梦想未来的轻松任务为名而拒绝当前艰难任务的人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說,这就意味着沒有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发展,而是以梦想为名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发展。”

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主要讀的是关于討論工业無产阶级的文献。在某些特別地区——如孟买、加尔各答附近——有大量的工厂工人。但是在其余地方,印度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不能够用解决产业工人的办法来解决或有效地处理印度問題。民族主义与农村经济是印度的主要問題,而欧洲的社会主义很少討論这些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的情形比較接近印度,可是在俄国發生了最特殊的事情,期望在其他地方重演这些事情是不合理的。我固然相信共产主义的哲学帮助我们認識和分析任何国家的現狀,并且进一步指出向前进步的道路。可是不考虑到事实和情况而盲目地运用共产主义的哲学,那就未免有点濫用这种哲学,对不起这种哲学了。

生活究竟是一件复杂的事。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有时使人悲观失望。人們的看法不同,或者对于問題的看法相同的同志会得出不同的結論,这种事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用冠冕堂皇的詞句和高尚的原則掩盖自己的弱点,那就容易被人怀疑。一个人企圖向政府提供保証和諾言,或者采取其他可疑的行动以求逃避监狱生活,并且还居然有臉批评別人,这种人一定会損害他

所鼓吹的事業。

孟买是一个大国际城市，有各色各样的人。一位著名人物在他对政治、經濟、社会 and 宗教的看法方面表现了面面俱到。作为一个劳工領袖，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方面，他自称为民主主义者。在宗教方面，他拥护印度教大会，他答应保护旧宗教和社会風俗習慣，阻止立法機構的干涉。在竞选的时候，他是薩納坦派所提出的候选人。他認為这样多方面的活动还不够累，用他多余的精力来批評国大党，攻击甘地是反动派。他联合其他少数人組織了一个国大民主党，这个党与民主毫無关系，它跟国大党的唯一联系就是它攻击国大党。后来为了找更多的活动地方，他以劳工代表的資格出席日內瓦的劳工會議。鑒于他的这些活动，人們不免以为这位大人先生可以出任根据英国的方式所建立的“国民”內閣的首相。

很少有人有过这样的活动和看法。在批評国大党的人中間，有許多人在各方面活动过，而且参預过許多事。其中有些人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們侮辱了社会主义。



第五十一章 自由主义联盟的观点

在我到浦那去見甘地的期間，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到印度公僕會去。在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內，該會的一些會員向他提出了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他作了回答。該會會長沙斯特里先生沒有出席，會員中也許是最有才干的孔茨魯先生也不在，但有几个資望較高的會員在場。我們當時在場的几个人越听越感觉驚訝，因为所提的問題都是关于那些最瑣碎的事情，大都涉及甘地以前要求和总督會談以及总督的拒絕。在一个到处都是問題的世界里，當他們自己国家正在进行一个爭取自由的艰苦斗争而几百个組織被宣布为非法团体的时候，难道这就是他們所能想到的唯一重要的問題么？農業危机和工業蕭条造成了普遍失業。在孟加拉省、边省和印度的其他地区，發生了可怕的事变，思想、言論、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遭到剝奪；此外，还有許多其他国内和国际問題。但他們所提的問題只限于無關紧要的事件，以及总督和印度政府对于甘地請求會見可能产生的反应。

我強烈地感到好像自己走进了一个修道院，住在这里面的人們已經長期和外界断絕了有效的联系。但是，我們这些朋友都是活躍的政治家、具有長期为公众服务和牺牲的經歷和才干。他們和少数其他人士形成了自由主义联盟的真正骨干，而自由主义联盟內的其余的人則是一群立場模糊不定的人物，他們有时想要參

加政治活动以便博得人们的注意。他们中间有些人，特别是在孟买和馬德拉斯兩地，簡直和政府官員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国家所提出的問題，就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發展的尺度。这个国家遭受失敗的原因时常是由于它沒有替自己提出正确的問題。我們在教派之間分配席次問題上所浪費的时间、精力和耐性，或是根据教派裁決書組織党派，并因此而进行的無益爭論，以致抛开了最主要的問題——所有这些都是表明我們政治落后。同样，那天在印度公僕会向甘地提出的那些問題，也反映出該会和自由主义联盟人士的奇异的心理状态。他們似乎沒有政治或經濟原則，也沒有广闊的眼界。他們的政治似乎是屬於客厅或宮廷政治那种类型——只注意高級官員將會做些什么或不做什么。

“自由主义联盟”这个名称容易使人产生誤会。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个名称代表某种經濟政策——自由貿易，放任政策，等等——以及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某种观念。英国自由党的傳統是建立在經濟基础之上的。对于貿易自由和摆脱英王独占及橫征暴斂的要求引起了对于政治自由的要求。但是印度的自由主义联盟却沒有这种背景。他們并不信仰自由貿易，几乎全体都是保护貿易主义者，同时，像最近事变所表明的，他們也很少重視人民权利。他們和那些半封建的專制的印度土邦有密切联系，并且給它們普遍的支持，而在这些土邦里甚至連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萌芽都不存在，因此，这就使他們和欧洲类型的自由党有所区别。事实上，不論把自由主义派这个名称怎样解釋，印度的自由主义联盟，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派，最多只是在一些枝节問題上表現是自由主义派而已。他們究竟是什么派，也很难說，因为他們根本沒有坚定的明确的思想基础，人数虽少，但彼此的見解却不相同。

他們只有在否定事物方面，才表現出自己的堅強意志。他們到處看到錯誤，企圖對它規避，希望這樣就會找到真理。在他們看來，真理確實永遠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由於他們批評他們認為極端的一切事物，從而使他們產生一種感覺，認為自己是善良、溫和和誠懇的。這種批評一切的方法幫助他們避免了痛苦的艱巨的思想過程，並且使他們不得不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他們中間有些人模糊地感覺到資本主義在歐洲並沒有完全成功，而且正處於困難的境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又顯然是惡劣的，因為它攻擊既得利益。也許在將來他們會找到某種神秘的解決辦法，某種中間措施，而同時既得利益也會得到保護。如果產生一個關於地球是扁的還是圓的爭論時，他們也許會痛斥這兩種極端的看法，而姑且提出一種建議說，地球可能是方的或是橢圓形的。

對於一些瑣碎而無關緊要的問題，他們很起勁，大驚小怪地喧嚷不休。他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避免解決根本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需要根本解決的辦法，以及在思想行動方面的勇氣。因此，自由主義聯盟的成功和失敗都無關重要，它們不涉及原則問題。自由主義聯盟的主要特征和獨有的特色，如果能夠這樣提法的話，便是在一切方面，不論其好壞，都表現穩健的態度。這是一種人生觀，而那個老名稱——穩健派，對他們也許是最恰當不過了。

“我把我的一切榮譽都歸於穩健，
保王黨叫我民主黨，而民主黨又叫我保王黨。”[⊖]

但是，不論穩健怎樣可愛，它並不是光輝燦爛的美德。它造成人們的遲鈍，因此，印度的自由主義聯盟不幸變成一個“黯淡無光

⊖ 引自亞歷山大·波普的詩。

的团体”——他們的神色陰沉严肃，他們的文章和談話枯燥乏味，并且缺少幽默感。当然，这也有例外，而在这些例外人士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薩普魯爵士。他在私生活方面确实表現得一点也不枯燥乏味或缺少幽默感，甚至会欣賞別人对他开的玩笑。但是，整个說来，自由主义联盟这个集团代表资产階級世界及其一切庸俗的特点。阿拉哈巴“导报”——自由主义联盟的首要报纸，在去年發表了一篇富有啓發性的社論，其中談到偉大不凡的人物总会替世界帶來禍害，因此，它宁願拥护那些平凡庸碌的人物。由此可見，它对自由主义联盟的庸碌本色是直認不諱的。

稳健和保守主义以及企圖避免冒險和突然变化的願望时常是随同老年以俱来的不可避免的特点。它們对于青年似乎不很合适。但是，我們是一个古老的國家，有时它的孩子似乎生下来就萎靡不振，毫無鋒芒，并且帶着老年的一切特征。但是，即使这个古老的國家現在也被变革的力量所震撼，而温和的見解在这种力量面前也变得迷惑起来。旧的世界正在消逝，自由主义联盟所擅長的一切美妙的論理也不能更改这种趋势，正如他們和暴風雨、洪水或地震进行爭辯的情况相同。旧的假定使他們失望，而他們在思想行动方面又不敢去探求新的途徑。韋特海德博士在論述欧洲傳統时說：“这个傳統全部为下列錯誤的假定所歪曲，即假定每一代在實質上都会在支配它上一代生活的条件下生活着，同时它也会把这些条件遺傳下去，同样地去塑造它下一代的生活。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不适用这个假定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期。”韋特海德博士的分析过于温和，因为也許那个假定永远是錯誤的。如果欧洲傳統是保守的話，我們的傳統不知道要更加保守到什么程度。但是，历史的动力，在变革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很少注意到这些傳統。我們

一筹莫展地看着我們計劃的失敗并且將它的失敗归咎于別人。正如海阿德先生指出的，这是“最可怕的錯覺，即假定人們的計劃遭到任何失敗，肯定不是由于他們自己思想上的錯誤，而是由于別人的故意破坏。”

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这种可怕的錯覺的影响。有时我想甘地对它也不能避免。但是我們至少还在行动，并且企圖和生活保持接触，用不怕犯錯誤，繼續工作的办法来减少这种錯覺的力量而摸索前进。但是，自由主义联盟却受到这种錯覺的最大影响，因為他們由于害怕行动越規，而不敢行动；由于害怕失足，而寸步难移，他們脫离与群众的一切有益的联系，而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狹小的精神世界里。沙斯特里先生在一年半以前，曾經警告过他那些自由主义联盟人士不要“坐而觀变”。那个警告含有比他自己可能認識到的更多的真理。由于他一向从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这个角度来考虑問題，因此，他的意思是指正由各个官方委员会醞釀的宪法改革。但自由主义联盟的不幸是：正当他們本国人民向前迈进的时候，他們却在那里坐而觀变。他們惧怕他們本国的群众，宁願和这些群众分开，而不願和我們的統治者分手。結果他們在本国土地上成了陌生者，生活向前迈进，却把他們抛在后面，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嗎？當他們的同胞为了生活和自由进行劇烈的斗争的时候，不用怀疑自由主义联盟究竟会站在战場的哪一边。他們从戰場的那一边向我們提出善良的劝告，并且大言不慚地对我們說教。他們在历届圓桌會議和各个委员会上和英国政府的合作，对于政府來說，是一个寶貴的道义因素。如果他們拒絕和政府合作的話，情况一定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會議中，有一次甚至連英国工党都拒絕参加，然而，我們的自由主义联盟却并不如此，尽管有

些英国人向他們呼吁不要参加，他們还是去了。

我們在不同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不同的目标，全都是稳健派或極端派。如果我們十分重視任何事物的話，我們可能对它产生強烈的感情，对它采取極端的态度。否則，我們能够表示一种寬厚的容忍，一种超脫的稳健，这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掩盖了我們对它的冷淡。我曾經了解，当有人提出建議，主張將土地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消灭的时候，稳健派中間最温和的人士也变得气势凶凶、很極端。我們那些自由主义联盟的朋友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闊綽和富裕的人們。他們有本錢去等待独立，不必因此而兴奋起来。但是，任何关于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革的提議却使他們大为震动，不能再保持稳健或优閑的理智的态度。因此，他們的稳健事实上仅限于他們对待英国政府的态度；他們希望，如果他們保持一种充分尊敬政府和妥协的态度，那末政府也許会听从他們講的話，作为对他們这种举动的回报。因此他們不可避免地必須去接受英国观点。藍皮書成为他們热心研究的書籍，欧斯金·梅所著“国会規程”以及諸如此类的書籍成为他們經常的讀物，一个新發表的政府报告引起他們的兴奋和猜測。从英国归来的自由主义联盟領袖們对于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譯者)內的偉大人物的行为發表了神秘的談話，因为白厅是自由主义联盟、合作派以及其他类似集团的英灵殿。在过去，据說善良的美國人死了以后会到巴黎去，因此，善良的自由主义联盟人士的灵魂有时也会在白厅附近徘徊。

我所写的是关于自由主义联盟人士的話，但是我所写的話也同样适用于我們国大党內的許多人。甚至更加适用于合作派，因为他們的稳健程度已超过了自由主义联盟。在普通的自由主义联盟人士和普通的国大党人之間，存在着許多分歧，然而分界綫并不

清楚明确。从思想意識方面来看，在进步的自由主义联盟人士和稳健的国大党人之間，沒有多大差別。但是，由于甘地的关系，每个国大党人都和本国的土地及人民保持着一些联系，并且投身于行动，因此，他已經摆脱掉一种模糊的、帶有缺陷的思想意識所造成的某些后果。但是自由主义联盟人士的情况却并不如此：他們和新旧兩方面都失去联系。作为一个集团來說，他們代表着一种正在衰亡的团体。

我想，我們中間許多人已經失去了旧有的無神論者的感情，同时又沒有得到新的真知。我們不会看到“普罗底尤斯[⊖]从海底出現”或“听到年老的特賴頓[⊖]吹起他那弯曲的号角”。同时我們中間也很少有人能够幸运地——

“在一粒沙里看見一个世界，
在一朵野花里找到天堂，
在手掌中握住無限，
在瞬息間得到永恒。”

不幸的是，我們中間許多人不会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不会去听它在我們耳际發出的微弱的呼声，也不会因为接触到它而感到兴奋和激动。这种时代已經成为过去。但是虽然我們不能像我們所習慣的那樣去观察大自然的瑰丽，然而我們企圖在人类的光荣和悲剧中，在它的偉大理想和內心的激动中，在它的痛楚和失敗中，在它的冲突和折磨中，更重要的是在它对于一个偉大命运的信念以及这些夢想的實踐中去探求大自然的瑰丽。對我們來說，这是对于进行这种探求所引起来的一切痛苦的某种慰借，我們时常

⊖ 希臘神話中变幻無定的海神。——譯者

⊖ 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魚的海神。——譯者

因此而达到超脱人生那些渺小事物的境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进行这种探求，他们已经把自己和旧有的道路割裂开来，而现在又找不到一条道路可走。他们既不梦想，也不行动。他们对于像伟大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这种人类的伟大变革，毫无了解。长期受到压制的人类要求所产生的复杂的、迅速的、残酷的爆发，使他们感到畏惧。在他们看来，巴士底狱至今还未陷落。

时常有人以满腔义愤的口吻说：“爱国主义并不是国大党的独占品。”这种论调一再重复，毫不新颖，令人有些生厌。我希望没有一个国大党人曾经宣称要独占这种感情。我确实没有把它当作国大党的一个独占品，我倒愿意把它当作一件礼品去赠送给任何对它感到需要的人。它时常被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用来作为掩护，它的种类多得足以适合一切口味，一切利益和一切阶级。如果犹大[⊖]今天还活着的话，无疑地他也会以它的名义来掩护他的行动。爱国主义已经不敷要求了：我们需要更加崇高，更加广阔和更加高贵的东西。

稳健本身也同样不敷要求了。自我克制是好的，它是我们的文化的标尺，但是，在这种自我克制后面，必须有需要克制和约束的东西。人们的命运一向是，现在也还是去控制暴风雨，驾驭雷电，使烈火及奔腾的江河为人所利用，但是最困难的还是去控制和约束使人们堕落的情欲。只要人们一天不能控制住他们的情欲，他们也就一天不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对于那些并不行走的腿和已经瘫痪的手，难道还需要我们去加以束缚么？

我忍不住在这里引用坎培尔写的关于几个南非小说家的四句

⊖ 出卖耶稣的叛徒。——译者

詩。它們似乎對於印度各個政治集團都同樣適用：

“他們讚美你們寫作時表現的堅決的自我克制，
對於你們這種精神，我當然也贊同。
你們可以稱心如意地使用勒馬的韁繩，
但是不馴的野馬究竟在何處？”

我們那些自由主義聯盟的朋友們告訴我們說，他們遵循着中庸的狹窄道路，在國大黨和政府兩個極端之間前進。他們自命為雙方過錯的裁判者，庆幸自己免于這種過錯。他們力求保持公正，我猜想他們會像象征正義的肖像那樣閉住或遮起自己的眼睛。這是否僅僅由於我的幻覺，我才感到自己回到古代，聽到人所共知的呼喚：“司克里普斯和法利賽……你們這些盲目的引導者呵……你們怕犯小錯，結果反而鑄成大錯！”



第五十二章 自治領地位和獨立

在以往十七年中規劃國大黨政策的人大都出身于中產階級。不論他們是自由主義派或國大黨人士，他們都出身于同一階級，並且是在同一環境中長成的。他們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結交的朋友都是相似的，並且最初在他們公开宣稱的兩種資產階級理想之間也沒有多大區別。但是，在氣質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开始將他們分开，同时他們也开始注視着不同的方向——前者更加趨向政府和富有的上層的中產階級，后者則趨向下層的中產階級。兩者的思想意識还是相同，目标也沒有差別，但是在后者的背后，現在却有許多商人和从事比較低下職業的职工以及失業的知識分子在推動着它。他們的論調有了改变：它不像以前那樣地謙恭文雅而變得粗獷激烈。由于他們缺乏采取有效行動的力量，所以他們便从强有力的語言中进行一些發泄。穩健分子为这种新發展所吓倒，便退了回去，企圖从隱居生活中求得苟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層中產階級在國大黨中还是很有力量，虽然在人数方面，小資產階級却占有优势。他們被吸引来，不仅是因为他們期望在民族斗争中获得成功，而且因为他們想在这个斗争中求得內心的滿足，他們企圖借此来恢复他們失去的自豪感和自尊心，重新建立他們受到損伤的尊严。这是通常的民族主义的迫切要求。虽然它是所有的人的共同点，然而，穩健分子和極端分子在氣質方面的差別就在

这点上变得明显起来。下層中产階級逐漸地开始在国大党中占据优势地位，后来，农民的势力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国大党日益成为农村群众的代表，因此，將国大党和自由主义派划分开来的鴻溝便变得更加寬广，从而使得自由主义派几乎不能了解或体会国大党的观点。上層階級的客厅里的人物去了解住在簡陋的茅屋或土房里的人們是不容易的。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双方的思想意識还是屬於民族主义和資產階級范疇的；所不同的是程度方面，而非性質方面。有許多始終留在国大党内的人，如果参加自由主义派集团，也同样很恰当。

許多世紀以来，英国人把印度当作他們拥有的一种按照旧的英国形式建造的龐大別墅。他們是拥有房产权的紳士，占用了这幢別墅中舒适的房間，而印度人却被派到僕人住的下房、食物貯藏室和厨房里去。正如每幢正规的別墅里的情况一样，在那些下房里存在着一种固定的体統——总管、管家、厨子、侍从、女僕、跟班等等——并且在这些人中間維持着严格的次序。但是在这幢別墅的上房和下房之間，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鴻溝。英国政府把这种措施强加到我們头上是不值得奇怪的；但是看来确实令人驚訝的是，我們或我們中間大部分人却把它当作我們生活和命运中的自然和必然的安排而接受下来。我們养成了这种別墅里的一个忠心奴僕所有的那种心理状态。有时，我們受到了难得的榮譽——我們被請到客厅里去喝杯茶。我們最大的野心就是想成为一个有体面的人，个别地被提升到上房里去。英国人在印度所获得的这种心理上的胜利，比較在武力或外交方面所获得的任何胜利都更加重大。正如古代智者所說的那樣，奴隶們开始有奴隶般的思想。

时代已經变了，这种別墅类型的文明，不論在英国或印度，人們現在已經不乐意接受了。但是，在我們中間，还有人希望死守在僕人的下房里，把奴僕穿的制服当作值得驕傲的东西。其他人士，如自由主义派人士，把那种別墅全盤接受下来，欣賞它的建筑風格和整个建筑物，但是希望他們自己能够一个个地去代替它的主人。他們把这种办法叫做印度化。在他們看来，問題是改換現有行政機構的顏色或至多是来一个新的行政機構。他們从来沒有想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他們对自主的理解就是一切照常，仅只改換較深的顏色。他們只能想到这样一种前途，即他們或像他們那样的人会扮演主角，去代替英国的高級官員；同时，旧有的职务依然保存，如政府部門、立法机关、商業和工業部門，印度文官处維持不变；王子們还是住在宮里，有时穿着华丽的服裝或狂欢节的裝束出現，使臣民們對他們佩帶的一切光彩夺目的珠宝留下深刻印象；地主們一方面要求特別保护，另一方面却又压迫他們的佃农；高利貸者用他們的錢袋来束縛地主和佃农；律师照常得到訟費；上帝依然住在天堂里。

他們的观点主要是以維持現狀作为基础，而他們所希望的改变几乎可以称为个人的改变。他們希望依靠緩慢地博得英国人的善意的办法來实现这些改变。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的整个基础都是建立在英帝国的繼續存在和稳固上面的。由于他們把这个帝国看作至少在一个相当長的時間內是不可动搖的，所以他們使自己去适应它，不仅接受它的政治和經濟的观点，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它的道德标准，而所有这些观点和标准全是为了維持英国統治的繼續存在而制定出來的。

国大党的态度根本不同，因为它追求一个新的国家，而不仅是

一个不同的行政机构。这个新国家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于一般的国大党人来说，可能并不十分明确，同时对于这种国家的看法可能也有分歧。但是，在国大党内的共同立场（也许少数稳健分子除外）是认为现存的情况和方式不能，同时也不容许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实行根本的改革。这便是自治领地位和独立之间的区别。前者设想到同样的旧机构，它有許多有形和无形的纽带，将我们束缚在英国的经济制度上面；后者给我们，或应该给予我们自由去建立一个适合于我们环境的新机构。

这并不是一个对于英国和英国人民怀有坚决而不可妥协的对抗情绪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不顾一切地和他們决裂的问题。如果经过以往所发生的事件以后，在印度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恶感，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泰戈尔说：“威权的横暴毁坏了钥匙，而使用鹤嘴锄。”启发我们心灵的钥匙早已毁坏了，一味对我们使用鹤嘴锄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英国人产生偏爱。但是，如果我们自称要献身于印度和人类的更加伟大的事业，我们就不能让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即使我们有这种倾向，甘地在以往十五年中给予我们的那种严格训练也会禁止我们这样去做。我现在正坐在一个英国监狱里写这篇文章，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的心里充满着焦虑，我在这段单独监禁期间所受的痛苦也许超过我以往在狱中所受的痛苦。我的心里时常充满了对于各种事变的愤慨和憎恶，然而，当我坐在这里深刻反省的时候，我查不出任何反对英国或英国人民的愤恨。我憎恶英帝国主义，恨它强加在印度的措施；我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憎恶并且仇恨英国统治阶级剥削印度的方式。但是，我并没有要英国和全体英国人民对于这些情况负责，即使我要他们负责的话，我也并不以为这会有多大区别，因为对于整个民族

發怒或責備他們是有点愚蠢的。他們和我們同样是环境的牺牲品。

就我个人來說，我在思想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因而永远不能和它完全分开。同时，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擺脫我在英国学校和大学里所养成的那种思想習慣以及在对其他国家和生活进行一般評價时所使用的标准和方法。我的一切偏爱（除了政治方面以外）都是傾向于英国和英国人民的；如果我变成一个所謂对英国統治印度的坚决的反对者，那也几乎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我們反对的以及我們不能心甘情愿地对它妥协的就是这种統治和控制，而不是英国人民。讓我們尽一切可能来和英国人民及其他外国人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我們在印度需要新鮮空气和新鮮而重要的思想，以及有益的合作；因为我們已經变得太暮气沉沉了。但是，假如英国人以一只老虎的身分前来印度的話，他們不能希望得到友誼和合作。对于帝国主义这只老虎，只有給以最猛烈的反抗，而今天我們的国家必須来对付这只凶恶的野兽。馴服森林中的野虎，使它脫去天生的野性是可能的，但是，当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勾結起来，驟然襲击一塊不幸的土地的时候，而想去馴服它們，那就沒有这种可能性了。

無論是誰，如果說他或他的国家不会妥协，那末这种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句蠢話，因为人生經常迫使我們去妥协。如果把这种說法应用到另一个国家或民族，那它就成为愚蠢透頂的說法。但是，当它被应用到一种制度或一种特殊的环境时，它就含有真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妥协也就超出人們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印度自由和英帝国主义是兩個不可調和的东西，既非戒严法令，亦非世界上一切甜言蜜語所能使它們調和起来，或使它們結合起来。只

有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逐出，才能創造允許印度和英国真正合作的條件。

人們告訴我們說，在日益互相依賴的現代世界中，獨立是一種狹隘的信條，因此，由於我們要求獨立，我們便是企圖開倒車。自由主義派，和平主義派，甚至英國的所謂社會主義者都提出這種辯解，責備我們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並且附帶向我們建議說，通過“英聯邦”，可以達到更加充實的民族生活。奇怪的是為什麼在英國条条道路——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通向維持帝國的目標。托洛茨基說：“一個統治國想要維持現狀的願望時常偽裝成一個優于‘民族主義’的東西，正如一個戰勝國想要保持戰利品的願望很容易採取和平主義的形式。因此，麥克唐納在甘地面前，感到好像他自己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我不知道，當印度獲得政治自由時，它將變成什麼樣子或將做些什麼。但是，我確實知道在它的人民中間，那些在今天維護民族獨立的人們，也會維護最廣泛的國際主義。對於一個社會主義者來說，民族主義毫無意義，甚至在國大黨的先進隊伍中也有許多非社會主義者成了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如果我們今天要求獨立，那並非是希望孤立。相反地，我們極其願意，隨同其他國家，將一部分獨立獻給一個真正的國際組織。任何帝國主義制度，不論它有怎樣動聽的名稱，總是這種組織的敵人，世界合作或世界和平是不能通過這種制度來實現的。

最近的情況在全世界表明，各種帝國主義制度是怎樣由於獨裁和經濟帝國主義而日益使自己孤立起來。我們沒有看到國際主義的成長，而是看到相反的過程。其原因不難發現，它說明現存的經濟秩序日益衰弱。這種政策的結果之一便是：雖然這種政策在

实行独裁的区域里促进了更大的合作，但是它也意味着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隔絕。对于印度，如我們从渥太华及其他決議中所看到的，它日益减少我們和其他国家的联系和接触。我們变得甚至比从前更加依賴英国工業。这种政策，撇开它在各方面所造成的直接危害不談，它的危險性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見，自治領地位似乎是导向于孤立，而不是更加广泛的国际往来。

但是，我們的朋友——印度的自由主义派人士，却有一种通过英国的有色眼鏡来观察世界，尤其是观察他們自己国家的惊人妙訣。他們沒有嘗試去了解国大党所發表的言論，以及發表这种言論的原因，却去重复英国人对于独立的老調，如說独立比自治領地位来得狹隘，并且也不如后者那样激励人心。国际主义，對他們來說，等于是白厅，因為他們对于其他国家根本茫然無知，部分原因是由于語言上的困难，但是因為他們对于漠視其他国家并不感到不安，所以他們甚至变得更加無知。他們当然憎惡在印度采取直接行动，或实行任何激进的政治。但是，奇怪的是，他們領袖中有些人并不反对在其他国家中实行这种政策。他們能够远远地对这种政策表示欣賞和欽佩。今天西方国家的有些独裁者却得到他們思想上的崇拜。

名称是容易引起人們誤会的，但是我們在印度面临的真正問題是：我們的目標究竟是要實現一个新国家呢，还仅仅是一个新的行政機構。自由主义派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他們仅只需要一个新的行政機構，并且甚至把它当作一个遙远的、逐步實現的理想。“自治領地位”这些字样时常被提起，但是他們眼前的真正目标却表明在“集中責任”这些神秘的字眼里。他們不要那些光明正大的字眼：权力、独立、自由、自主，因为这些字眼听起来富有危險性。

律師的術語和方法使他們更加感到興趣，即使它們不可能使群眾振奮起來。歷史上有無數實例，敘述個人和集團為了信仰和自由而面臨危難，冒着生命危險。但是是否有人會因為“集中責任”或任何其他法律術語而故意犧牲一餐飯或睡得不够安穩，那就值得懷疑了。

這就是他們的目标，而這個目标不是依靠“直接行動”或任何其他激烈行動的方式去實現，而是像沙斯特里先生所說的那樣，是依靠“智慧、經驗、穩健、說服力、平穩的影響和真實的效率”的表現而去實現。他們希望我們依靠自己良好的舉動和工作最後來促使我們的統治者放棄權力。換句話說，他們今天反抗我們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厭惡我們那種盛氣凌人的態度，那就是因為他們懷疑我們的能力，或是由於上述兩種原因。這似乎是對於帝國主義和當前形勢的一種相當天真的分析。英國著名作家湯納教授曾經寫了一段中肯而有風趣的文章，討論關於在同統治階級合作的情況下逐步獲得權力的看法。他的文章指的是英國工黨，但對於印度，甚至更加適用，因為在英國至少還有民主制度，在那種制度下，大多數人的意志在理論上是表現出來的。湯納教授寫道：

“洋蔥是可以一片一片地吃的，但是，你就不能一塊一塊地剝掉一只活老虎的皮；老虎把一個人活活地解剖，它先下手剝你的皮……”

“假如有任何國家，它的特權階級是傻瓜的話，那末這種國家絕對不是英國。如果認為以機智的手腕及和藹的態度來提出工黨的主張就能夠騙得特權階級的相信，使他們以為這也是他們的主張，這種想法是不能實現的，正如企圖威吓一個精明的律師放棄他握有地契的不動產的情況一樣。金融寡頭集團包括一些迎合別

人、狡猾、硬干、具有自信心的人，這些人在窮途末路時會變成亡命之徒。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利益在什麼地方，並且要使得這些利益不會喪失掉……如果他們的地位受到嚴重的威脅，他們會利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一切辦法，例如利用貴族院、王位、報紙、軍隊叛變、財政危機、國際困難，以至像報紙在一九三一年抨擊英鎊問題時所表明的那樣使用逃往國外的流亡者危害自己國家的陰謀詭計來保护自己的利益。”

英國工黨是一個強大的組織。它有職工會作為後盾，而職工會擁有幾百萬繳納會費的會員，一個高度發展的合作組織，同時在自由職業者中間還有許多會員及同情者。英國有以普選作為基礎的民主議會制度和關於人民自由的悠久傳統。儘管如此，湯納先生還認為——同時最近的事變也証實他這種意見的正確性——工黨不能希望僅僅依靠微笑和說服力去獲得真正的權力，縱然這兩種方法是 useful 而且合乎需要的。湯納先生指出即使工黨在下院中獲得大多數席次，它在特權階級的反對下還是沒有力量進行任何根本的改革，因為特權階級擁有這麼多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財政的以及軍事的堡壘。在印度，情況很不相同，這點不需要再指出。這裡沒有民主制度或民主傳統，相反地，我們卻有一種頒布法令，實行獨裁統治，剝奪人身、言論、著作、集會及出版自由的成規。自由主義派人士在他們背後也沒有任何堅強的組織，因此，他們不得不仅仅依靠他們的微笑。

自由主義派人士強烈反對任何“違背憲法的”或“非法的”活動。在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里，“合乎憲法”一詞含有廣泛的意義。憲法控制法律的制定，保護自由，限制行政機構，並且規定在政治和經濟組織方面實現改革的民主方式。但是在印度，根本沒

有这种宪法，上述詞彙也沒有这种含义[⊖]。在这里使用这个詞彙仅仅是介绍一种对于今天的印度并不相称的观念。說来也怪，“合乎宪法”这个詞彙在这里时常用来支持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武断行动，不然，就用来当“合法”解释。如果我们限制自己只用“合法”和“非法”兩詞，那就要好得多，虽然这两个名詞的含义也很模糊，并且每天也在变化。

一項新法令或新法律便造成了新的罪名。参加公共集会可能是一种違法行为；骑自行车、穿某种服装、日落时不回家、沒有每天向警局彙报也同样是違法行为——所有这些以及無数其他行为今天在印度的某些地方都成了違法行为。某种行为在印度的某一地区可能是違法行为，但在另一地区則不是違法行为。当这些法律能够讓一个不負責任的行政机构在最匆忙的情况下公布出来，“合法”这一名詞仅仅表示那个行政机构的意志而已。通常对于这种意志，不論人們是否情願，总得服从，因为不服从的后果是不妙的。但是，如果任何人說他会永远服从这种意志，那末，就他的活动來說，这就等于他对独裁或不負責任的威权的可耻的屈服，抛弃了他的良知，而且也永不可能获得自由。

今天，在每个民主国家里，都正在进行一种爭論，即：根本的經濟改革是否能按照通常的办法，通过現有的宪法机构予以实现。許多人認為这不能办到，而必須采用某种非常的革命方法。这种爭論的結果对于我們在印度的目标是沒有关系的，因为我們根本沒

⊖ 杰出的自由主义派領袖、“导报”的总編輯錢达瑪尼先生在联合省委员会批評英国国会关于印度問題的特別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时，強調在印度沒有任何立宪政府。他說：“宁願服从現在这个不合宪法的政府，而不願服从未来的更加反动、更加不合宪法的政府。”

有宪法工具来实现我們所希望的那些改革。假如白皮書之类的文件被制定出来的話，那末宪法在許多方面的进展將會完全停頓。除了采用革命或非法行动以外，別無出路。到那时，人們將怎么办？难道放弃一切实行改革的打算，而听任命运的摆布么？

今天在印度的形势甚至更加特殊。行政机构能够而且确实阻止或限制一切形式的公开活动。任何活动只要在它看来对它是具有危險性的，便遭到禁止。因此，一切有效的公共活动都能被它制止，像以往三年中被制止的情况一样。对于这种措施的屈服意味着放弃一切公共工作。这是一种不可能采取的立場。

誰也不能說他会永远沒有差錯地进行合法的行动。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可能产生人們由于受良心驅使而不得不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况。在一个專制独裁的統治下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会时常發生；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丧失了一切道义上的根据。

自由主义派人士說：“直接行动是和独裁而不是和民主相結合的。希望实现民主胜利的人們必須避免直接行动。”这是一种混乱的思想和不正确的論調。有时，直接行动——例如工人罢工，甚至可能是合法的。但也許这是指政治行动。在今天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国，有什么行动是可能的呢？只有可耻的屈服，否則就只有进行非法的革命行动。在那里怎样能够实行民主政治呢？

印度的自由主义派人士时常談到民主政治，但他們許多人并不希望接近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派最杰出的領袖之一，艾雅尔爵士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說：“国大党在主張召开国民議會时，过分信任群众的智慧，而对于参加历届圓桌會議的人們的誠懇和能力却給以过分不公正的評价。我很怀疑国民議會是否能有更好的作为。”因此，艾雅尔爵士对民主政治的觀念是和“群众”脫离的东西，

它是更加适合于由英国政府指派的一群“誠懇而有才能的人們”的。此外，他还頌揚白皮書，因为他虽然对它“并不完全滿意”，但“他認為全国人民对整个白皮書加以反对是不智的行为”。因此，我們似乎根本沒有絲毫理由来証明为什么在英国政府和艾雅尔爵士之間不應該有最完美的合作。

国大党撤銷和平抵抗当然为自由主义派所欢迎。他們將自己远远避开这种“愚蠢而未經過考虑的运动”的行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們向我們說：“我們难道沒有早就这样說过么？”这是一种离奇的論調。因为我們是站起来进行英勇斗争而被打下去的；因此他們教訓我們的就是：站起来是件坏事情，爬行是最好而又最安全的办法，因为趴在地上就不可能被人打倒，自己也不会跌交。



第五十三章 新旧印度

印度民族主义憎恨外国统治是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去接受英国的帝国思想。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仅仅尝试去批评它的某些表面形态。在学校或大学里讲授的历史、经济及其他课程都完全是按照英国的帝国主义观点写成的，强调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无数缺点，以及英国人的美德和高贵的命运。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种歪曲的见解，即使当我们本能地对它抗拒的时候，我们还是受到它的影响。最初，我们在精神上摆脱不掉它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事实或理论，因此，我们便到宗教的民族主义中去寻求安慰，以为至少在宗教和哲学的领域内，我们并不亚于任何其他民族。我们处于不幸和屈辱的地位，以下列那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即：虽然我们沒有西方外表上那种光辉灿烂的景象，但是我们却有更加宝贵、更有价值的真正内在的东西。维佛卡南达等人以及西方学者对我们古老的哲学的兴趣，又使我们增加了一些自尊心，并且激起我们对我們过去的那种潜在的自豪感。

我们逐渐地开始怀疑，并且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英国人关于我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的说法，然而，我们还是在英国人的思想意识的范畴内去思想和工作。如果一件事情是坏的，它就被称为“非

英国的”；如果一个英国人在印度的行为失檢，过錯是他的，而不是制度造成的。但是，关于英国統治印度的这种批判性資料的搜集，尽管作者們存在着穩健的觀點，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它替我們民族主义建立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础。因此奈奧諾写的“貧困和在印度的非英国的統治”一書以及罗密西·杜德和迪格拜等人所著的書籍对于我們民族主义思想的發展也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对于印度古代历史的进一步研究，發現印度在远古时代曾經有过燦爛的高度文明的时期。我們非常滿意地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們还發現英国統治印度的实际情况和他們的历史書籍要我們相信的很不相同。

我們对于英国关于历史、經濟以及在印度的行政機構的說法增加了抗拒的情緒，然而，我們还繼續在他們思想意識的範圍內活动。这是整个印度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情况。这也还是今天自由派集团、其他小集团和許多穩健的国大党人士的立場，他們有时在情感上發展了，但在理智上还生活在十九世紀。因此，自由主义派人士不能了解印度自由的觀念，因为兩者是不能調和的东西。自由主义派人士幻想他們会逐步地达到較高的职位，处理更多的更重要的文件。政府機構会像以往那样順利地工作着，只是他們处在中心地位了，而在幕后則有英国軍隊，在需要时会給他們帮助，但又不过分进行干涉。这就是他們关于帝国範圍以內的自治領地位的觀念。这是一种不可能實現的天真的想法，因为取得英国保护的代价是印度的屈从。即使保护并不降低一个偉大国家的自尊心，我們也不能既得到保护而又保持着独立地位。韋特爵士(他并不是印度民族主义的維護者)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Θ中說道：“他(印度人)仍然相信英国会替他阻擋灾难，只

要他一天抱着这种幻想，他就甚至一天不能奠定他自己的自治理想的基础。”很明显，他指的是自由主义派人士或者属于反动的和教派的类型的印度人，因为当他担任印度联邦院主席的时候，他多半一定是和他们保持接触的。这不是国大党的信念，更不是其他进步集团的信念。然而，他们同意韋特爵士的说法，即：如果不抛弃掉这种幻想，不让印度自己去面对灾难（如果这是它的命运的话），那就根本得不到自由。英国对印度的军事控制全部撤销以后，那才是印度自由的开始。

印度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陷入英国的思想意识是不值得奇怪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人经过二十世纪那种激动人心的事变和变化以后，还继续受到那种幻想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中，英国统治阶级是世界上的贵族，长期拥有财富并获得成功和威权。这种长期以来的事实和训练给英国统治阶级带来了贵族政治的某些优点和弱点。我们印度人能够以下列想法来安慰自己，即：我们在过去一世纪又四分之三的时间内大大地帮助这个超等的国家，为它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训练。他们像许多民族一样开始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把他们的帝国看作地上的天国。假如他们的特殊地位得到承认，他们的优越感没有受到反抗，那末只要对他们没有损害的话，他们会表现得很仁爱而且乐于助人。但是如果对他们反抗的话，那就成为对天道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成为一种必须加以铲除的深重罪恶。

西格弗莱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文章，讨论关于英国人心理的这一面[⊖]。

⊖ 韋特爵士：“东方和西方的未来”。

⊖ “二十世纪的英国危机”。

“由于世襲的統治習慣，并且拥有大量財富，結果便造成了一种貴族式的态度，奇异地認為自己具有一种可以統治其他民族的神聖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英帝国的优势已經被否定的时候，还繼續在強調着。上世紀末的青年一代……因此便無意識地認為这种成就是他們的功劳……”

“把这种解釋問題的方法指出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一系列特別微妙的事情中，这种解釋正說明英国人的心理反应。人們不会不注意到这点，即英国人認為这些困难的根源是外来的因素。最初，他总是把錯誤推到某一个人身上，因此，如果这个人要想进行自我改造，那末英国便可以重新繁荣起来了……他永远是本能地要去改变別人，而不改变自己！”

如果这是英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般态度，那末这种态度在印度是最明显不过了。在英国处理印度問題方面存在着某些蠱惑人的地方，即使这种处理的办法使人感到非常可恨。那种由于永远認為自己正确、認為自己胜任愉快地肩負起一个偉大的重任而产生的坚定的自信，那种对于他們种族命运和他們自己那种帝国主义所树立的信念，以及那种对于反抗真实信念基础的不信仰的人和罪人所产生的蔑視和憤恨——这些态度都帶有某种宗教氣質。像古代的宗教裁判官一样，他們不顧我們在这方面的願望而要拯救我們。他們在这笔道德买卖上意外地得到了利益，因此証明“誠实是上策”这句古老格言的真理。印度的进步同促使印度适应帝国主义計劃以及按照英国人的模型来塑造高等印度人，变成了同一回事。我們越是接受英国的理想和目标，我們便愈加适合“自治”，只要我們一旦表明并且担保我們只有在符合英国願望的条件下使用自由的时候，自由便屬於我們。

我想印度人和英国人对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实际情况大概不会有一致的看法。这也許是自然的。但是当英国高級官吏，包括印度事务大臣在內，任意胡謔印度今昔的情况，并發表毫無事实根据的言論时，确实令人震惊。特別令人奇怪的事情便是：英国人民，除了一些專家等以外，对于印度是多么無知。假如他們掌握不住事实，那么他們不能了解印度精神的程度，不知道要大多少？他們侵襲她的身体，把她占有，但这是使用暴力的霸占。他們不了解她，也不打算去了解她。他們从未正視她的眼睛，因为他們的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而她由于感到羞耻和屈辱也把自己的眼光低垂下来。經過几世紀的接触，他們还像陌生人一样地彼此面对着，互相充滿了厭惡。

而印度虽然貧穷和衰落，她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高貴和偉大；虽然負着古老傳統和現今苦难的过重的担子，眼皮有些倦累，她还有“从內心發展到肉体的美，每个微小的細胞里都蘊藏着奇异的思想、玄妙的幻想和細膩的感情”。在她伤痕斑斑的身体的背后和里面，人們仍然能够瞥見她灵魂的高貴。她經歷了漫長的世紀，在旅途中搜集了很多智慧；她和陌生者进行交易，并把他們吸收到自己的大家庭里来；她曾經目睹光荣的时代和衰頹的岁月，忍受过屈辱和深沉的悲哀，同时也見過不少奇觀；但是她在漫長的旅程中，始終牢守着她远古的文化，从这里面汲取力量及生命力，并且和其他国家共同享受。她像一个鐘摆那样摆上摆下。她依靠思想上的勇敢敢于嘗試去攀登天堂，探求它的奥秘，然而她也經歷过地獄深淵的悲慘經驗。虽然她可悲地积累了那种纏住她、压倒她的迷信和墮落的習慣，她从未完全忘掉她几个最聰慧的子孙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在“奥义書”中所給她的灵感。他們那种永不靜止的、永远进

行奮鬥和探討的敏銳的心灵从未企圖把盲目的教條當作寄託，或者因為按照常規那樣去遵守刻板的形式或教儀及信條而變得自滿。他們不是要求個人從現在的痛苦中得到解脫或是在未來的天堂里占一席之地，而是要求光明和醒悟：“將我从不真的境界引導到真的境界；從黑暗引導到光明；從死引導到生。”[⊖] 即使在今天還被千百萬人每天背誦的最著名的“伽耶特里曼特拉”祈禱文中，人們的祈願也是要求得到知識和啓發。

雖然她在政治上時常遭到分裂，她的精神卻永遠保衛着一個共同的遺產，並且在她的分歧中總經常存在着驚人的統一[⊖]。像一切古老的國家一樣，她是善與惡的一個奇異的混合體，但是善的一面被隱匿起來，必須加以探求，而衰頹的氣氛卻顯而易見，她那炎熱的無情的陽光將惡的一面暴露無遺。

在意大利和印度之間，存在着某些相似的地方。它們都是古老的、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雖然意大利和印度相比，是一個新的國家，而印度卻是一個幅員更廣大的國家。它們兩個在政治上都有過分裂的局面，然而意大利這個觀念，如同印度這個觀念一樣，從未消失，並且在它們一切的分歧中，統一始終占着主導地位。在意大利，統一多半是一種羅馬的統一，因為那個偉大的城市在意大利處於首要地位，並且是統一的泉源和象徵。在印度，便沒有這樣一個單獨中心或首要城市，雖然貝拿勒斯不但對印度來說，

⊖ “奧義書”，i, 3, 27。

⊖ 參閱韋特爵士所寫的“東方和西方的未來”：“在印度的一切矛盾中的最大矛盾便是：在這種分歧中存在着更大的統一。這種統一乍看並不明顯，因為它在歷史上沒有能在促使印度團結成爲一個國家的政治團結力中表現出來。但它是一個如此偉大、如此強大的現實，以致印度的伊斯蘭教地區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在它的勢力下而深受到它的影響。”

并且对东亚来说，可以称为东方的不朽之城。但是贝拿勒斯和罗马不同，它从来没有同帝国发生关系或想到俗世间的权力。印度的文化遍及全印度，因此在整个国家中没有一部分可以称为这种文化的中心。从科摩林角到喜马拉雅山中的亚玛兰那和巴德里那特，从特华格到浦里，传播着同样的思想，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它的反响不久便会达到国内偏僻的地方。

正如意大利把文化和宗教的礼物赠给西欧一样，印度也把同样的礼物赠给东亚，虽然中国同印度一样古老和值得尊敬。即使当意大利在政治上萎靡不振的时候，在整个欧洲的血管里都还可以感到意大利的生命力。

将意大利叫做“地理名词”的是梅特涅，许多自许的梅特涅把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印度。奇怪的是，甚至它们在这两个大陆上的地理位置也有相似的地方。更加有趣的是英国和奥地利的对比，二十世纪的英国不是拿来比作十九世纪的奥地利吗？她是同样地骄傲显赫，不可一世，但是她的力量泉源正在枯竭，衰亡现象也深入到她巨大机构的内部。

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不能避免下列这种倾向，即以人的形象来形容一个国家。这是习惯和早年联想的力量。于是印度变成了印度母亲。她是一位美丽的妇人，年纪很老，但容貌却永远年轻，带着忧郁的眼光和憔悴的神色；她受到异族和外来者的蹂躏，呼唤她的儿女去给她保护。这些情景激起了无数人的感情，驱使他们采取行动，并为她牺牲。然而印度主要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他们看起来并不美丽，因为贫困是不美丽的。我们想像中的美丽妇人难道就是代表工厂和农村里的那些赤身驼背的工人么？或是代表好多世纪以来，骑在群众头上，剥削他们，把残酷的习惯加在他们身

上，甚至將其中許多人變為不可接觸者的那群少數人么？我們企圖以我們想像的東西來掩蓋真實情況，想從現實逃往夢想的世界。

但儘管有這些不同的階級和他們相互的衝突，印度還有一個將他們團結起來的共同的聯繫。人們對於這種聯繫的堅持性、強韌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感到驚訝。什麼是這種力量的源泉？這不僅是由於惰性和傳統的消極力量與重量，雖然它們一向是巨大的。還有一種積極的維持現狀的原則，因為它成功地抗拒強大的外來影響，並且吸收那些起來和外來影響進行鬥爭的內部力量。然而雖有這些力量，它却不能保存政治自由或是設法實現政治統一。後面這兩點似乎被認為是不值得花費力量的事情；它們的重要性遭到了愚蠢的忽視，我們由於這種忽視的緣故而受到痛苦。有史以來，舊的印度理想從未頌揚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並且輕視金錢和以牟利為業的階級。光榮和財富並不相輔相成，光榮至少在理論上是給與那些很少以金錢報酬的形式來替社會服務的人們。

古老的文化沒法度過許多次猛烈的風暴，但是，雖然它還保持着它的外形，但它已失去真正的內容。今天，它正默默地拚命抵抗一個新的萬能的敵人——資本主義西方的商業文明。它會給這個新來的敵人所擊敗，因為西方帶來了科學，而科學又把食物帶給幾百萬飢餓的人民。但是西方對於這種殘酷的文明的罪惡也帶來了一種抗毒素——即社會主義的原理、合作化的原理和為公共福利而替社會服務的原理。這有些像舊的婆羅門的服務觀念，但是它意味著一切階級和集團的婆羅門化（當然不是宗教上的意思），以及階級區分的取消。印度不得不穿上新衣，因為舊的已經破碎了，而可能在她穿起新衣時，她已將它剪裁成這種式樣，從而使它適合於現狀和她的舊的思想。她所採納的觀念必須有她本國的風味。



第五十四章 英国統治的实际情况

英国統治印度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我怀疑任何一个印度人或英国人是否能够对这長期的实际情况作一番客观而冷靜的觀察。即使这是可能的話，那末如果要去衡量心理上的和其他精神方面的因素，那將是更加困难的事情。人們告訴我們說，英国的統治“給予印度一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一个在整个次大陆上握有絕對权力的政府”[⊖]。它建立了法治制度和一個公正而有效率の行政機構；它把西方关于議會政府及个人自由的观念傳到印度来；并且“由于它把英屬印度改变成一个單一的国家，它使印度人具有一种政治統一的观念”，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的萌芽。这是英国人的看法，其中有許多真实情况，虽然法治和个人自由好多年來已經不存在了。

印度对这时期的觀察着重于許多其他因素，指出外国統治帶給我們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害。观点如此不同，以致有时恰恰是英国人所称贊的事情，却受到印度人的譴責。如同安南达·柯馬拉斯瓦美博士所描述的那樣：“英国統治印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使印度人民所蒙受的最大的損害，在外表上成为幸福。”

事实上，上世紀前后在印度所發生的变化是东方和西方的大

⊖ 上述引語是从一九三四年国会联合委员会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报告中摘录来的。

多数国家共同经历过的世界性的变化。工业制度在西欧以及后来在世界其余地区的成长，紧接着便替世界各国带来了民族主义和强有力的单一政府。英国人首先打开印度通往西方的门户，把西方工业制度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输入印度，这些都是他们的功劳。但是在这以后，他们便阻遏印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直到环境迫使他们放手。印度本来已是两种文化——即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和她本身创造的、向远东传播的东方文化的汇合点。而现在，从更遥远的西方却传来了更加强大的第三种推动力，于是印度便变成各种新旧观念的焦点和战场。毫无疑问，这第三种推动力会得到胜利，从而解决印度许多原本存在的问题。但是，英国人虽然亲自帮助把这种力量传到印度来，但又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他们阻碍我们的工业发展，从而延迟我们的政治发展，保留他们能在印度找到的一切落伍的封建的或其他的残余。他们甚至阻止我们的变革，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我们改进法律和习惯，让它们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使我们无法摆脱它们的枷锁。资产阶级在印度的成长并非由于他们的好意或帮助。但是在他们把铁路和工业制度的其他产物介绍到印度来以后，他们便不能把改变的巨轮停顿下来；他们只能阻碍它，使它变得迟缓。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印度政府的庄严机构建筑在这种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自从一八五八年英王取得东印度公司全部领土的最高统治权以后的这个时期以内，印度在教育 and 物质方面的进步，比它悠久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在它能力范围以内所能达到的进步，都要更加巨大。”[⊖] 这种论调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明显。

⊖ 引自一九三四年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我們还时常听說，自从英国統治开始以来，印度文盲实际上日趋减少。但即使这种說法完全是正确的，那也只是將現在的工業时期和以往时期相比而已。在上世紀中，由于科学和工業制度的發展，几乎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內，教育和物質方面的进步都很巨大。对于任何这种国家都可以肯定地說，这种进步比“它悠久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在它能力范围以內所能达到的进步，都要更加巨大”。虽然，也許那个国家的历史和印度历史相比，可能不算悠久。如果我們說，在这工業时代，即使沒有英国的統治，我們無論如何也会得到这种技术进步，那末，我們是否强詞夺理呢？事实上，假如我們將我們的命运和許多其他国家相比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假定說，由于我們現在必須抵抗英国人自己对于这种进步的阻碍，不然，我們这种进步会更加巨大呢？鐵路、电报、電話、無綫电等并不能算作英国統治的优惠和恩典。这些东西是必要而值得欢迎的，因为英国人恰巧是首先將它們輸入印度的人，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他們。但是即使这些工業制度使者到我們这里来，主要也是为了增强英国的統治。它們應該是国家血液循环的脉絡，可以振兴商業，运输产品，并將新的生活及財富帶給千百万人。不錯，最后是会有这样結果的，但它們却是为了另一种目的——即加强帝国的控制和夺取英国商品的市場——設計出来，并且为它服务的；同时它們也已經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完全贊成工業制度以及最近的运输工具，但有时，当我匆忙地越过印度平原的时候，那些縱橫交錯的鐵路，在我看来，几乎像是一条条禁錮印度的鐵鏈。

英国統治印度的觀念就是依靠警察力量来維護国家的觀念。政府的任务是保护国家，其他工作全不过問。政府的財政工作只管軍費、警察、行政管理、債務利息的开支。公民在經濟方面的需

要沒有得到照顧，甚至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被牺牲。人民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需要，除了極少数的几項以外，完全遭到漠視。在其他国家中，財政开支的觀念已經变了，它設立义务普及教育、改善公共衛生、照顧貧民和低能者，对工人的疾病、养老、失業等施行劳动保險，但在印度，政府对于这些几乎完全不予考虑。它不能随便支付这些开支，因为它的稅收制度是最不合理的，对于收入少的人所征收的稅收比对于收入較多的人要多得多，它花在防衛和行政方面的开支極其浩大，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家收入。

英国統治的特点就是把力量集中在一切足以增强它对印度进行政治和經濟的控制的事务上面，其余事情都是附帶性質的。如果他們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他們可以把这些成就当作自己的功劳，但是印度人民对于这点却不能額手称庆。統一是件好事情，但在被奴役下得到的統一却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專制政府的强大可能替人民帶來更大的負擔；同时，警察力量，虽然無疑地有許多用处，但却能够，并且时常也是被用来压制恰恰是它要保护的人民。罗素在最近的著作里把現代文明和古希臘文明比較以后，这样写道：“把希臘文明和我們的文明相比，它唯一重要的优点就是警察的效能不高，因而使得大部分好人能够逃脫。”

英国在印度拥有的最高統治权替我們帶來了和平，而印度經過莫臥兒帝国崩潰以后所發生的那些騷乱和不幸以后也确实需要和平。和平是寶貴的东西，它对于任何进步都是必要的；当和平實現的时候，我們表示欢迎。但是甚至和平也可以用过高的代价买到，我們能够得到墳墓里的永久和平，和一个鳥籠或監獄里的絕對安全。和平也可能是人們由于陷入無法改善自己的絕望中产生的

和平。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給人們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給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战争是可怕而且需要避免的事情，但是它确实發揚某些美德，这些美德，按照心理学家詹姆士的說法，就是：忠誠、团結、坚韧、英勇、良知、教育、創造性、儉約、健康和毅力。由于这个緣故，詹姆士企圖找到一个在精神上和战争相等的东西，这种东西沒有战争的恐怖，但会在一个社会里發揚上述的各种美德。也許假如他听到不合作运动及和平抵抗运动的話，他会感到他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東西，这个东西是一种和战争相等的屬於精神上的、和平的东西。

考虑历史上的各种假定和可能性是徒劳無益的工作。我确实相信，讓印度和科学的、工業的西方接触是件好事情。科学是西方的偉大貢獻，印度就缺乏科学，而印度沒有科学，注定是要衰亡下去的。但我們接触的方式是不幸的，然而，也許只有使用一系列的劇烈的震动，才能把我們从麻痹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从这一点来看，奉行新教的、个人主义的、盎格魯薩克遜种的英国人是适合的人选，因为他們和其他西方人比較，和我們更加不同，也能够給我們以更大的震动。

他們給予我們政治上的統一，这是我們需要的东西，但是，不論我們是否得到这种統一，印度的民族主义也必定会成長起来，要求这种統一。阿拉伯世界今天已經分裂成为許多个別国家——独立的、受保护的、被托管的等等——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要求阿拉伯統一的願望。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因为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加以阻碍的話，阿拉伯民族主义会大部得到这种統一。但是，正如在印度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的目的是鼓励分裂的傾向，制造少数民族問題，来削弱和部分地抗拒民族主义的迫切要求，从

而造成一种借口，使帝国主义国家繼續留在当地，并假装成一个公正無私的裁判者。

印度的政治統一作为帝国發展的一个副产品而意外地得到的。后来，当这种統一和民族主义結合起来并向外国統治进行挑战时，我們便看到統治者故意助長分裂和宗派主义，这些都是我們未来进步的巨大阻碍。

自从英国人进入印度以来，已是一个很長的时期了，他們已經做了一百七十多年的統治者！像所有的專制政府那样，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按照他們的心願来塑造印度。在以往这些年中，世界已經变得面目全非——例如英国、欧洲、美国和日本。十八世紀大西洋沿岸的那些并不引人注意的美洲殖民地在今天变成一个最富有的、最强大的、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內完成了惊人的改革；而在苏联的广闊土地上，直到昨天，沙皇政府的統治还在压制并扼杀一切發展，而今天却跳动着新的生命，在我們眼前建設一个新世界。在印度也發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和它在十八世紀的情况很不相同，它有了铁路、灌溉工程、工厂、学校和大学，龐大的政府机构等等。

然而，尽管印度有了这些变化，它今天的面貌如何？它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受到远方的外国人的統治，它那种偉大的力量受到压制，不敢自由呼吸；它的人民貧困得無以复加，寿命短促而且不能抵抗疾病和疫癘；文盲普遍存在；广大地区缺乏一切衛生医疗设备；在中产階級和一般群众中，失業現象达到惊人的程度。人們告訴我們說，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家、空談家或惡棍的口号，必須把整个人民的福利当作考驗的标准。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驗，而在这种考驗下，印度今天呈现出

一种極其可憐的景象。我們看到在別的国家中实行失業救济、減輕困难的偉大計劃，而对于我們千百万失業人民及普遍的永久的痛苦，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我們也看到关于各国建造房屋的計劃，但是对于我們那些住在土屋里或無家可归的几亿人民，哪里有他們的房屋？当別的国家在教育、衛生、医疗救济、文化和生产方面突飞猛进的时候，我們停滯不前，或者沒精打采地像蝸牛那样緩慢地向前爬行，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們对于这些国家的命运不該表示羡慕嗎？俄国經過短短十几年的惊人努力以后，几乎在她广闊的土地上消灭了文盲，并且建立了一种和群众生活保持联系的优良的新式的教育制度。落后的土耳其，在凱末尔的领导下，在普及文化方面也获得巨大的进步。实行法西斯制度的意大利，在它事業剛开始的时候，便大力扫除文盲。教育部長真迪尔号召“对文盲展开正面攻击。这种侵蝕我們国家的惡毒的疫癘必須迅速而猛烈地予以消灭”。这是坐在客厅里的人們听不入耳的粗話，但它却表明了这种思想后面的信心和精力。我們这里的人比較文雅，使用更加圓滑的辞句。我們小心翼翼地前进，把我們的精力消耗在調查委员会和專門委员会上面。

人們責备印度人談的过多，做的过少。这是公平的評語。但是，我們对于英国人那种組織專門委员会和調查委员会的無穷的能力，难道不可以表示惊讶嗎？每个專門委员会和調查委员会，在長期的辛勤工作以后，总發表一份研究性的报告。这是“一个偉大的国家文件”，受到充分的贊揚，接着便被人束之高閣。因此，我們既有前进和进步的名声，又有停滯不前的好处。荣誉得到了滿足，既得利益也安然無恙。別的国家討論如何前进，我們却討論如何約束、限制和保衛自己，以免我們跑得太快了。

一九三四年国会联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說在莫臥兒王朝时代，“帝王的奢华成为人民貧困的尺度”。这是一个公正的觀察，我們今天难道不可以使用这同样的尺度嗎？今天的新德里和总督府是何等的富丽堂皇？而省督們又是何等的豪华奢侈？所有这一切都是和人民惊人的赤貧相对照的。这种对比使人痛心，敏感的人們怎样能够对它忍受，是有点令人难以想像的。今天的印度是隱藏在帝国的一切光輝燦爛的外表后面的一个悲惨世界。在許多补綴起来的外表后面，不幸的小资产阶級越来越受到現代环境的压榨，其次便是工人，他們在極端貧穷中过着悲惨的生活，再次，还有作为印度象征的农民，他們的命运“生来就是漫無止境的黑夜”。

“給漫長岁月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
他倚着鋤头凝視着大地，
他的臉上刻划着时代的空虚，
他的背上負荷着世界的重担。

*

从这悲惨的形象里看到受难的时代，
那酸痛的眼反映出时代的悲剧，
从这悲惨的形象里看到人类遭到遺弃，
掠夺，褻瀆，并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那哭喊正是对世界的創造者的抗議，
而这抗議也是一个預言。”[⊖]

如果把印度所有的灾难都推到英国人的身上，那是不合理的。这个責任必須由我們担負起来，不可加以推卸；把我們本身弱点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归咎于別人，那是不恰当的。一种專权的

⊖ 这两节詩引自美国詩人埃·馬克汉姆的詩：“荷鋤的人”。

政府制度，特別是在外國人統治下的政府制度必然會助長屈從的心理，企圖限制人民的精神界限。它必然會摧毀許多青年時期最好的優點——進取心、冒險精神、創造性和勇氣，而鼓勵卑怯、墨守成規、諂媚和奉承上司等惡習。這種制度不能養成真正的服務精神，以及對於公務和理想的忠誠；它挑選出最缺乏公益心的人們，這些人的唯一目標就是在世界上混日子，讓我們來看看英國人在印度吸引到他們周圍的到底是哪一個階級的人！他們中間某些人有聰明才智，有能力做出優良的工作。他們由於在別處找不到機會，便流入政府機構或半政府性質的機關里工作，逐漸地消沉下去，變成僅僅是這架大機器里的組成部分，他們的心灵也就被約束在呆板的例行公事的範圍以內。他們養成了官僚主義的特點——“具有事務人員的充分學識和應付公事的外交手腕”。他們最多不過對於公務具有一種消極的忠誠，沒有也不可能有熾烈的熱情。在外国政府下，這種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除了這些人以外，大部分的小官員都是不值一提的人物，因為他們只懂得諂媚上司，欺壓下級。這種缺點不是他們的，而是這種制度給予他們的那種訓練所養成的。假如奉迎上司和重用親友成為風氣，像時常發生的那種情況，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他們在工作中沒有理想，他們經常擔心失業和隨之而來的飢餓，他們主要關心的事情就是保住他們的飯碗，並替他們的親友找個職位。當暗探和那種最卑鄙的人——告密者——在暗地活動的時候，要想發展一個民族具有的那種比較值得想望的美德，是不容易的。

最近的形勢發展使得那些敏感而有服務精神的人們甚至更難以參加政府工作。政府不需要他們，他們除了為經濟情況所迫也不願和政府保持過分密切的關係。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担負帝国重担的是白种人而非棕种人。印度有各种帝国机关来維持帝国的傳統，并且有足够的保护机构来保护他們的特权，据說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印度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利益和这些机构的明显的利益及發展是怎样結合起来的呢？假如印度文官处的任何特权或优厚的职位被取消的話，人們就会告訴我們說，这样做法結果会引起腐敗無能的現象。假如印度医疗局的預定的职位减少的話，那末这就会“威胁印度人民的健康”。不用說，假如軍隊中的英国成員受到影响的的話，那末我們就会面临各式各样可怕的危險。

我想下列那种說法含有某些真理，即：假如上級官員突然离开，把他們领导的部門交給他們下屬去管理的話，效能必然减低。但这也是因为整个制度是这样建立的，下級人員根本不是最有才能的人，并且也不要求他們担負責任。我相信，在印度有許多优秀的人材，如果采取适当的步驟，在相当短的时间內，这些人材就可以使用。但这种办法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我們政府和社会的情况。这等于建立一个新国家。

事实上，人們告訴我們說，不論我們在宪法机构方面实行何种改革，那些保衛和庇护我們的偉大机关的严密組織將維持原样。它們是政府神聖的奧秘的祭司，捍衛着它的庙堂，禁止那些凡夫俗子闖进聖地。當我們逐漸地使自己配得上享受特权的时候，它們会把幕帳一一揭开，直到將来的某个时代里，甚至最神聖的东西也会在我們的惊异和景仰的眼睛前面出現。

在所有这些帝国机关中，印度文官处居于第一位。印度政府工作成績的好坏，大都依靠着它。人們时常告訴我們关于这个机关的許多优点，而它在帝国組織中的崇高地位几乎是有口皆碑。它

在印度那种不容抗拒的具有威权的地位和这种地位赋予它的那种几乎是專制的权力,以及它所得到的充分贊美和吹嘘,对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精神平衡都不一定完全有好处。我虽然很欽佩印度文官处,我恐怕还得承認無論就个人或整体来說,它特別容易沾染那种旧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新的毛病——瘋癲症。

如果要想否定印度文官处的优点,那是徒劳無益的,因为我們是不准忘去它的优点的。但是关于这个机关已經有人說了这么許多歌功頌德的話,因此,我有时感到看一看真面貌也是需要的。美国經濟学家魏伯倫曾把特权階級称为“要用金錢去維持的階級”。我想如果把印度文官处以及其他帝国机关称为“要用金錢去維持的机关”,那也同样符合实际情况。这些机关都是非常浪費的奢侈品。

英国議會的前工党議員格拉汗姆·波尔少校是一个对印度問題很感兴趣的人,前不久在“現代評論”中写文章說:“关于印度文官处是最干練、最有效率的机关这一点,从来沒有人加以反駁。”因为在英国常有类似的說法,并为人們所相信,所以这就很值得研究。对于那些容易被人推翻的事情,做出这样断然肯定的評論,总是不妥当的。波尔少校猜想这种說法从未受到人們反駁,那他是大錯特錯了。这种說法时常受到反駁,很久以前,甚至格·克·郭克雷先生对于印度文官处也曾有过严厉的批評,一般印度人,不論他是国大党黨員与否,都一定会反对波尔少校的看法。然而,很可能在双方的意見中都有正确的部分,双方考虑到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印度文官处的能力和效率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假如这种能力和效率是从增强英国在印度的帝国,并且帮助它来剝削印度这个观点来衡量的話,那末,印度文官处的确可以自称工作做得

不錯。然而，假如把印度群众福利作为衡量的标准，那末它显然是失败了。当人们看到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他们与群众之间存在的广大距离，这种失败甚至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这些群众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而他们所得到的各种不同的薪金归根结蒂也是这些群众供给的。

整个说来，如果说这个机关保持着一定的标准，那是一点也不错的，虽然这种标准必然是一种平庸的标准，有时会排斥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除此以外，对于任何这类机关，不能再有所企求了。这个机关主要是集中了英国公学的精神，并且具有这种学校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虽然现在印度文官处里的许多人员都不是公学出身的）。虽然它保持着一种优秀的标准，但它却强烈反对不墨守成规的行为，而个别人员的特殊才能被埋没在日常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害怕表现得与众不同而不能显示出来。其中有許多满腔热忱的人员，许多人具有服务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只是为帝国服务的观点，印度却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就他们所受的訓練与所处的地位来说，他们也只能那样做。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周围都是外国的并且时常是对他们表示不友善的人，所以他们便联合起来，保持一定的标准。为了维持种族和职位的威信，就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因为他们握有大部分专制权力，他们憎恨一切批评，把批评看作主要的罪恶之一。他们越来越变得偏激、狭隘和盛气凌人，养成了專橫的統治者的缺点。他们自滿而又自負，狭隘而又固执，在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停滯不前，根本不适合于进步的环境。当那些比他们更有才能，更能适应环境的人们来解决印度问题时，他们表示憤恨，侮辱他们，压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去阻碍他们。战后的事变引起了动蕩的环境，他们便一筹莫展，無法适应。

他們接受的那種有限的偏狹的教育也沒有使他們來適應這種緊急而又新奇的局勢。長期的專橫統治使得他們腐敗了。他們作為一個集團來說，握有實際的絕對權力，只是在理論上受到英國議會的 control。艾克頓勳爵告訴我們說：“權力是有腐蝕性的，絕對的權力有絕對的腐蝕性。”

整個說來，他們在他們有限的範圍以內還是可靠的公務人員，相當勝任地、樸實無華地進行日常工作。但是，他們受的既是這樣的訓練，因此遇到完全出乎意外的局勢便手足無措，縱然他們的自信心、有条不紊的本性和團結精神可以幫助他們度過眼前的難關。著名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騷動暴露了英國的印度政府的無能和“笨拙”，但是許多類似的騷動還沒有公開出來。甚至他們對於和平抵抗運動的反應都是粗魯的。開槍和用木棍毆打可以暫時壓服反抗者，但這種做法並不解決任何問題，並且損害了他們想要保護的那種優越感。他們依靠暴力來對付正在發展的和採取攻勢的民族運動，是不值得奇怪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帝國就是建築在暴力之上的，而且也從未教育他們用別的方法來對付反抗。但是使用過分而不必要的暴力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對於局勢完全控制不住，並且也已失去他們平時似乎具有的那種自我控制和約束。他們時常喪失了膽量，甚至在他們公開發言中，也流露出歇斯底里。以往的那種堅定的自信心也不復存在了。一個危機無情地把我們所有的人的面目都暴露出來，同時也無情地把我們那些隱藏最深的弱點發掘出來。和平抵抗運動就是這樣一種危機和考驗，而無論在哪个陣營里——國大黨或政府——簡直很少有人完全通過這次考驗。勞合·喬治先生說，在危機中，真正的大勇的男女數目是不多的，而“其餘的人在危機中，却是無足輕重的。在晴天

看去像是高峰的山崗，很快地就会被凶猛的洪水淹沒，只有最高的山峰浮現在水面上”。

印度文官处对于所發生的事变，在理智和感情方面都沒有准备。他們許多人員原先所受的訓練是古典式的訓練。这种訓練給予他們一定的文化和魅力。这是一种旧世界的态度，适合于維多利亞时代，但与現代环境却格格不入。他們生活在自己的那个狹隘而帶有局限性的世界里，这既非英国，又非印度，而是英印混合的世界。他們根本不了解現今社会里那些产生作用的力量。虽然他們令人可笑地假定自己是印度群众的监护人和保护者，他們却很少了解这些群众，对于新兴的激进的資產階級，甚至了解得更少。他們根据圍繞他們左右的那些阿諛者和求职者去衡量印度人，而把其余的人当作煽动者和不肖之徒加以排斥。他們对于全世界战后的变化，特别是在經濟範圍內的变化知識極其貧乏。他們墨守成規，以致使自己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代表的那个秩序在現代条件下已經过时了，并且作为一个集团來說，他們越来越接近特·斯·伊利奧特在“空洞的人”中所描写的那种典型人物。

然而，只要英帝国主义繼續存在一天，那种秩序也会繼續存在一天，而这种秩序还是十分强大，并且拥有干練机智的領袖。英国的印度政府好像是一个蛀牙，不过它还是牢牢地嵌在牙肉里。它使人痛苦，但还不容易把它拔出来。这种痛苦还会繼續下去，甚至越来越变得剧烈，一直要等到牙齿被拔出来，或者自行掉落。

公学这个类型甚至在英国也曾經得势过，但今天却沒有像以往的那樣地位，虽然它在公共事务中还有显著的作用。在印度，它更加不合时宜，根本不能同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相适应或进行合

作，同时，更加不能同那些社会改革者进行合作。

在印度文官处里，当然也有許多英国籍和印度籍的杰出人物，但是只要現在的制度存在一天，他們的杰出才能將被用于对印度人民并無益处的目标。这个机关里的一些印度人員受公学精神的熏陶如此之深，以致变得青出于藍。我想起曾經遇見過印度文官处里的一个年青的印度人，他对自己的評价很高，但不幸我却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他向我指出他的机关的許多优点，最后提出了那种無法回答的、偏袒英帝国的論点——难道英帝国不比羅馬帝国或成吉思汗和鉄木耳的帝国好一些嗎？

印度文官处首先認為他們極其干練地完成了任务，因此，他們便竭力強調着他們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却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印度是貧穷的話，那末过錯在于它的社会習慣、它的商人和高利貸者，最重要的，在于它广大的人口。而最大的金融財主——英国的印度政府却被輕易地忽略过去。我不知道他們对于这样广大的人口提出了什么办法，因为虽然一般說来灾荒、傳染病和高度的死亡率在削減人口方面帮忙很大，但人口还是非常众多。节育的办法曾經提出来，我个人完全贊成傳播关于节育的知識和方法。但是使用这些方法的本身需要給群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某种程度的普及教育，以及在全国各地設立無数的医疗站。在現有条件下，节育方法根本不是群众所能使用的。中产階級能够从节育方法中得到益处，我想他們使用节育方法越来越广泛了。

但是这种人口过多的議論却值得进一步的注意。今天，在全世界的問題不是缺少粮食或其他必需品，而实际上是缺少消費粮食的人，或者換句話說，那些有需要的人却没有力量購買粮食等等。即使单独就印度的情况來說，它也并不缺少粮食，虽然人口增

長，糧食供應也在增長，而且增長的比例要超過人口增長的比例。此外，曾被大事宣傳的印度人口的增長，和西方大多數國家相比，速度要低得多（以往十年的情況除外）。不錯，在將來這種差別還會大些，因為各種力量趨向於減少或甚至停止西方國家中的人口增長。但是這種限制人口增長的因素不久也會制止印度人口的增長。

只要印度獲得自由，並且準備按照自己的心願去建設新生活時候，它必然會需要優秀的兒女來實現這個目標。優秀的人材總是少的，而在印度由於在英國統治下缺乏機會的緣故，人材更加稀少。我們在許多公共事務部門，特別在那些需要專門技術和科學知識的部門中，需要許多外國專家的幫助。在那些曾經在印度文官處或其他帝國機關里服務的人們中間，將有許多印度人和外國人為新的秩序所需要，並會受到它的歡迎。但我敢肯定一點，即：只要印度文官處的精神在我們行政機關和公共事務中普遍存在，那末，在印度的新秩序就根本不能建立起來。那種獨裁主義的精神是和帝國主義相結合的東西，不能和自由並存下去。它不是把自由壓倒，便是自己被自由所掃除。它可能只適合於一種類型的國家，那就是法西斯類型的國家。因此，在我們能夠按照新的秩序着手真正的工作以前，像現在那樣的印度文官處和類似機關必須完全消滅，這點在我看來是十分必要的。這些機關里的個別人員，假如他們願意並且能夠勝任新的工作的話，將會受到歡迎，但是也只限於新的條件。很難設想他們會得到像今天付給他們的那種荒謬的高薪和巨額津貼。新的印度必須要有那些真誠而又幹練的工作人員來替它服務，這些人對於他們服務的事業具有真誠的信仰，並且想要做出成績，他們是為這種事業給予他們的愉快和光榮，而不是為了高薪的吸引，而來工作的。金錢的動機，必須減少到最低限度。我

們期求于外国援助者的地方很多，但我猜想最不需要的便是那些沒有技术知識的行政官員。像这样的人在印度并不缺乏。

我以前曾經談过印度自由主义联盟和类似他們的集团怎样在关于印度政府的問題上接受了英国政府的看法。这在政府各部門的問題上特別明显，因为他們大声疾呼的是贊成“印度化”而不是把各部門和国家机构的精神及性質加以根本改变。这是一个重要問題，在这方面不可能予以讓步，因为印度自由的获得不但需要撤退英国軍隊及撤銷各部門，而且要消灭那鼓舞他們的独裁精神，压低他們的薪金和特权。在制定宪法的时期，有过不少关于保衛的議論。如果这些保衛是为了印度利益的話，他們尤其應該規定印度文官处以及类似机关不應該在現有的形式及享有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存在下去，并且也不應該和新宪法發生任何关系。

甚至更加神秘、更加可怕的机关就是所謂軍政处。我們对它不能批評，一句話也不能說，因为我們对于这种事情又懂得什么呢？我們只好毫無怨言地去繳納重稅。不久以前，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印度总司令菲力普·契伍德爵士在西姆拉的国会里演說时，用辛辣的軍人語言要求印度政治家注意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不要干涉他的事情。当談到对某議案提出修正案的动議者时，他說：“难道他和他的朋友們以为像英国人那样一个久經战争鍛煉和具有丰富战争經驗的民族、一个用刺刀尖端建立起帝国，并且一直用刺刀維持这个帝国的民族，会因为受了坐在安乐椅上的批評家的批評，而丧失掉上述經驗給予一个民族的战争智慧么？”他还談了許多其他有趣的評論。我們听說他曾經仔細地写好他的講演稿，演說时按照底稿宣讀，否則我們还会誤会他說那些話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哩。

当然，如果一个外行要和一位总司令去爭辯軍事問題，那是不恰当的。然而，即使一个坐在安乐椅上的批評家也应有資格說几句话。可以設想，在以刺刀来保护帝国的人們和在自己头上一一直憑空悬着閃光的刺刀的人們之間，利益是不同的。印度的軍隊可能用来保护印度利益或保护帝国利益，兩者可能不同，或甚至互相冲突。一个政治家或坐在安乐椅上的批評家經過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后，也可以怀疑杰出的將軍們要求享有不受干涉的自由是否合法。在大戰时，他們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但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他們在各个軍隊中——英国、法国、德国、奥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軍隊——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一团糟。英国著名的軍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利德尔·哈德上校，在他写的“世界大戰史”中說，在大戰的某一阶段中，当英国軍隊攻打敌人时，英国將軍却發生內哄。国家的危难并没有使得思想和努力統一起来。他繼續說：“这次大戰粉碎了我們对偶像的信仰，以及以为偉大人物与众不同的那种英雄崇拜的信念。領袖还是需要的，也許是更加需要的，但是因为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也是普通人，这就会保證我們不会对他們抱有奢望或过分地信任他們。”

那位著名的政治家劳合·乔治先生在他的“大戰回忆录”中，对于参加世界大戰的陸軍將領和海軍將官們的缺点和严重錯誤，作了动人心魄的描述。这些严重錯誤断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英国和它的盟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是經過一条“血迹斑斑的曲折道路而得到的胜利”。高級將領在派遣軍隊及应付局势方面所作的魯莽不智的处理，使得英国瀕于崩潰，而它和它的盟国之所以得救大部是由于它們的敌人犯了难以令人置信的錯誤。这就是这位偉大的英国战时首相所描写的情況，他还說明他恨不得使用外

科手术的办法,把一些意见,特别是关于建立护航制度的提議裝进澤利柯勋爵头脑里去。至于法国霞飞元帅,他似乎认为这位元帅的主要优点就是他有一种使人产生力量的坚强的容貌。“这就是苦惱的人們在困难中本能地去寻找的那种容貌。他們錯誤地認為智力就产生在下顎那个地方。”

但是劳合·乔治先生的主要批評是針對着英国最高指揮部本身和总司令海格陆军元帅的。他表明海格勋爵怎样由于他那种出奇的虛荣心以及拒絕政治家等的劝告,而把重要事实隱瞞起来不讓英国內閣本身知道,使得英国軍隊在法国遭受一次最大的慘敗。甚至当他面对失敗的时候,他还頑固到底,在帕斯欽达勒和堪姆布萊伊的可怕的泥地上,繼續了好几个月的錯誤的进攻,直等到一万七千多軍官战死或奄奄一息,四十万英勇的英国士兵变成了“伤亡人数”。“無名英雄”們今天在他們死后受到了表揚,这是好事;但他們的生命是不值錢的,当他們活着的时候,却很少得到照顧。

政治家,如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是时常会犯錯誤的。但是民主的政治家对于人和事必須敏銳易感;他們經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設法改正。軍人是在不同的气氛中教养出来的,在这种气氛里,威权統治一切,批評是不容許的。因此,他憎惡別人的劝告,而当他犯錯誤时,他便一錯到底,并且坚持不改。对他來說,下顎比心或头脑还要来得重要。在印度我們的長处是培养出一种混合的类型,因为民政机关人員本身是在一种半軍事性質的威权和自負的气氛下成長起来并生活着的,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軍人的下顎和其他美德。

我們听说軍隊的“印度化”的过程正在推进中,再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印度將軍甚至可能在印度舞台上出現。大概在不到一

百年以後，印度化的過程可能就會有相當大的發展。人們容易產生懷疑，為什麼英國在危機到來的時候，在一兩年之內便建立起來一支有百萬人的強大陸軍。如果英國有我們的教練官，也許它會更加謹小慎微地前進。當然，在這種充分訓練的軍隊準備作戰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概早已結束了。人們也會想到俄國的蘇維埃軍隊幾乎在未經任何訓練的情形下發展起來，迎擊並且戰勝了許多軍隊，今天成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戰鬥隊伍之一。他們顯然沒有那些“久經戰爭鍛煉和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軍們的指導。

我們現在在台拉·頓有一個軍事學院，出身紳士家庭的見習生正在那裡接受訓練，以便將來擔任軍官。聽說他們在操練時，神氣十足，毫無疑問，他們會成為優秀的軍官。但是，我時常懷疑，如果這種訓練不配合着技術訓練，它將達到什麼目的。步兵和騎兵在今天和羅馬方陣軍的效用差不多，同時在空戰、瓦斯彈、坦克車及重炮的時代里，來福槍也不見得比弓箭優越多少。他們的訓練者和教官無疑地是了解這點的。

英國統治印度的實際情況怎樣呢？當它的缺點乃是由於我們的弱點所造成時，我們還去責備誰呢？假如我們不接觸變革的巨流，而留在逆流中，變得利己而且自滿，並且像駝鳥那樣忽視其他地方發生的事變，那末我們這種做法就危險了。英國人隨着世界新的推動力的浪潮到我們這裡來，代表着連他們自己也不了解的那種巨大的歷史力量。難道我們還要抱怨那把我們連根拔起並且四處拋擲的旋風么？難道我們還要抱怨那使我們冷得發抖的寒風么？讓我們和過去以及對它的爭論一刀兩斷，而去面對未來吧。我們必須感謝英國人帶來的寶貴的禮物——科學及它豐碩的果實。然

而，我們却难以忘記或者冷靜地觀察英国的印度政府所制造的分裂、阻碍进步、反动、宗派主义以及机会主义的因素。这对我們也許是一种必要的考驗和挑衅。印度必須經過火的洗礼，將那些衰弱的、污穢的、腐朽的东西加以消除、鍛煉和焚毀以后，它才能得到新生。



第五十五章 文明結婚和字体問題

一九三三年九月中旬，我在浦那和孟买住了一个星期以后，便回到勒克瑙去。我的母亲还在該城的医院里，病况并未迅速好轉。卡麦拉也在勒克瑙，虽然自己身体不好，还想侍候我的母亲。我的两个妹妹常从阿拉哈巴来度周末。我在勒克瑙住了兩、三个星期，我在那里的空余時間比在阿拉哈巴要多一些，因为我的主要工作便是每天到医院里去看我母亲兩次。我利用空余的时间替报纸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全国各地广泛登載。这一系列以“印度往何处去？”为題的文章，曾經引起人們相当大的注意，因为我在这些文章里討論到有关印度局势的世界大事。后来，我听说这些文章在德黑蘭和喀布尔甚至被譯成波斯文發表。对于接触最近局势發展和西方現代思潮的人們來說，这些文章并没有任何新穎或独到的見解。但在印度，由于我們人民把精神都集中到国内的事变，因此很少注意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他們对我的文章的欢迎，以及許多其他現象，都說明他們正在扩大自己的眼界。

我母亲在医院里住得厭煩了，因此，我們决定把她送回阿拉哈巴去。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我妹妹克里西娜的婚約剛剛宣布。我們决定在我突然重新被捕下獄以前，尽快地举行婚礼。我不知道自己能在外面住多久，因为和平抵抗还是国大党的正式綱領，而国大党本身以及几十个其他組織依然是非法团体。

我們確定在十月的第三个星期在阿拉哈巴举行婚礼。这是一个不遵照宗教仪式举行的婚礼。我对这点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我們也只好这样办。这是两个不同种姓之間的婚姻，因为一方是婆罗門教徒，另一方是非婆罗門教徒，而在現行的英国頒布的印度法律下，宗教仪式不能使这种婚姻生效。所幸最近通过的普通婚姻条例解决了我們的困难。这个条例共有两种，而第二种——使我妹妹婚礼生效的那一种——限于印度教徒及信仰与印度教有关的人，如佛教徒、耆那教徒和錫克教徒才能适用。如果双方中有任何一方生下来不屬於这些教門，以后也沒有信奉的話，那末第二种条例就不适用，而必須遵照第一种条例。第一种条例要求双方声明廢弃一切重要宗教，或者無論如何也要声明他們不屬於这些宗教。这种毫無必要的声明廢弃的手續是非常討厭的事情。許多人，即使他們沒有宗教傾向，也对这种声明表示反对，因此，便不能利用這項条例。各种宗教中的正統派反对一切足以便利互相通婚的改革。結果，人們迫不得已，不是声明廢弃，便是在表面上宣称改教，以便符合法律規定。就我个人來說，我是鼓励互相通婚的，但是不論是否鼓励通婚，現在很需要一种准許通婚的普通婚姻条例，它适用于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們，准許他們自由通婚而不必声明廢弃或改变信仰。

我妹妹的婚礼並沒有什么鋪張，而是很簡單的。我一向就討厭印度婚礼的那种排場。因为我母亲有病，更重要的是因为和平抵抗还在繼續进行，并且許多同志仍在獄中，所以任何鋪張都是極不适宜的。我們只邀請了一些亲戚和当地的朋友。我父亲的許多老朋友感到很不愉快，因为他們以为我是故意不請他們，其实是一种誤会。

我們發出的小請帖是用拉丁化的印度斯坦語寫成的。這是一種改革，因為這種請帖一向是用梵文字體或波斯字體寫的。至於用拉丁字體來寫印度斯坦語，除了在軍隊和教會方面以外，幾乎沒有人知道。我這次使用拉丁字體，是一種試驗性質，我想看看各方面的人對它有什麼反應。它的反應有好壞兩方面，但大部分人是贊成的。接到這種請帖的人原來不多，如果發請帖的範圍更廣泛一些，反應必定會更不好。甘地對我做的這件事情，表示不贊成。

我使用拉丁字體，並非因為我是這種字體的信徒，雖然它很久以來就使我感到興趣。這種字體在土耳其和中亞細亞的成就給我深刻的印象，而為它辯護的明顯的理論也很有力量。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使我信服；而即使能使我信服的話，我也十分了解在今天的印度，它簡直沒有被人接受的機會。所有集團——民族主義的、宗教的、印度教的、伊斯蘭教的、舊的和新的——都會給它最猛烈的反對。而這種反對，在我看來，也並不是僅僅由於情感方面的原因。字體的改變，對於任何一種擁有豐富的歷史的語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改變，因為字體是它的文學的一種最密切的組成部分。字體一改變，字形隨之改變，而字音、字義亦發生變化。於是，在新舊文學之間，便產生一種無法克服的障礙，而舊的文學便成了一种死了的外國語言。在沒有值得保存的文學的家裡，可以冒險實行字體改革。在印度，我不能設想進行這種改革，因為我們的文學不但是豐富而寶貴的，而且和我們的歷史和思想不可分開，同時和我們群眾的生活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強迫實行這種改革，那將會變成一種殘酷的活體解剖，並且會阻礙我們在普及教育方面的進步。

但是這個問題，在今天的印度，甚至已經不是學術性的問題了。我們的字体改革的下一步，在我看來，是采用一種可以在脫胎于梵文的語言——印地語、孟加拉語、馬拉地語、古甲拉特語——中通用的字体。就現在的情況來說，這些語言的字体是由同一來源演化出來的，彼此之間沒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不難創造一種共同的字体。這樣就會使得這四種偉大的姊妹語言彼此更加接近了。

我們的英國統治者在全世界繼續不斷地傳播的關於印度的神話之一，便是說印度有幾百種語言——確數我已經忘記了。還說有調查結果可以證明。令人感到極其驚訝的是，簡直沒有一個英國人，把這幾百種語言中的一種學得相當好，雖然他們在印度已經住了一輩子。他們把所有這些語言都歸成一類，稱之為“Vernacular”，即奴隸的語言（Vernacular 這個字是從拉丁文 Verna 來的，即土生奴隸的意思），而我們有許多人竟貿然不覺地採用了這種術語。奇怪的是，何以英國人在印度住了一輩子而沒有把印度的語言學好。他們在“西崽”和“阿媽”的幫助下，發展了一種混合語，即不三不四的印度斯坦語，而他們卻把它當作是道地的印度語言。正如他們從他們的下屬及阿諛者那里去了解印度生活的事實，他們從他們家里的僕人那里去了解關於印度斯坦語的知識一樣，而這些僕人必然會對這些大人先生們說混雜的語言，惟恐他們不懂其他語言。他們似乎完全不了解，印度斯坦語和其他印度語言都有高度的文學價值，並且也有豐富的著作。

如果根據調查所得，說印度有兩、三百種語言，我相信根據這種調查，德國大約有五、六十種語言。我從未想到有誰會指出這件事實作為德國的不統一和不一致的證明。事實上，調查表將各式各樣極不重要的有時僅在幾千人中間流行的語言都列舉出來；有

时由于便于科学研究起見，在分类时将方言也当作不同的語言。在我看来，就印度的地理区域來說，它的語言倒是少得出奇的。和欧洲的一样地理区域相比，它的語言之間的关系是更加密切地接近的，但是由于文盲广泛存在，因而共同的标准沒有發展起来，而方言却形成了。印度（緬甸除外）的主要語言是印度斯坦語（分为两种，即印地語和烏尔都語）、孟加拉語、古甲拉特語、馬拉地語、泰米尔語、泰拉加語、馬拉雅拉語和加拿語。假如再增加阿薩密語、奧里薩語、信地語、普什圖語和旁遮普語，那末除了某些山区和森林地帶的部落民族以外，全国的語言都已包括进去了。在这些語言中，屬於印度—雅利安系的語言，流行于印度整个北部、中部和西部，相互間有着密切关系；而在南部流行的特拉維迪恩系語言，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受了梵文的影响很大，并且充滿了梵文的詞彙。

上述八种主要的語言，都有古老而寶貴的著作，而每种語言今天都流行在一个明确的、划分清楚的广大区域内。因此，从說一种語言的人数来看，这些語言都屬於世界主要語言之列。說孟加拉語的有五千万人。至于說印度斯坦語——包括它的各种派系——的人，我猜想（我这里沒有数字）在印度有一亿四千万人，而在全国各地能部分懂得这种語言的人数也很多[⊖]。这样一种語言显然是有着極大的可能性的。它建立在梵文的坚固的基础之上，并且和波斯語有密切关系。因此，它能从两种丰富的泉源中吸取詞彙。当然，近年以来，它也能从英語中吸取詞彙。南方特拉維迪恩系語言的地区，是印度唯一几乎完全不懂印度斯坦語的部分，但是当地人民却在努力学习。兩年以前（一九三二年），我看到一个在南方教授印地語的私人义务团体的数字表。自从它成立以来，在以往十四年中，据說單在馬德拉斯区，經過它的努力，已經有五十五万人

学会了印地語。在这种根本沒有得到国家支援的义务推行下，这种成績是惊人的，而許多学会了印地語的人們自己又成为这种語言的傳播者。

印度斯坦語將成为印度的共同語言，关于这点，我絲毫也不怀疑。事实上，它今天在日常应用方面的情况已大致如此。但由于对字体（梵文字体或波斯字体）所产生的愚蠢的爭論，以及这两派在使用这种既非过分梵語化又非过分波斯語化的語言方面的所产生的錯誤努力，这种語言的發展受到了障碍。对于这种字体的困难，簡直無法解决，因为它会引起人們激动的情感，除非正式采用两种字体，准許人民使用其中之一。但是必須努力制止極端的傾向，并且按照通用的口語，去發展一种中間的文学語言。随着群众教育的發展，这种語言將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現在那些被假定为文学格調裁判者的中产階級小集团，是非常狹隘和保守的，各有各的

⊖ 下列数字是拥护印度斯坦語的人供給的。我不知道这些数字究竟是根据一九三一年最近一次的調查，还是根据以前一九二一年的調查。我猜想是指后者，而目前的数字定会証明下列各項的数字有了很大的增加。

印度斯坦語(包括西部的印地語、旁遮普語和拉加斯坦語)……	139.3 (單位百万)
孟加拉語……	49.3
泰拉加語……	23.6
馬拉地語……	18.8
泰米尔語……	18.8
加拿語……	10.3
奧里薩語……	10.1
古甲拉特語……	9.6

总計…… 279.8

别的几种語言，如普什圖語、阿薩密語和緬甸語，在語言和地域上完全不同，因此未列入本表內。

特点。他們抱住古老的形式不放，這些形式已經失去生命，並且和他們自己的群眾或世界文學也沒有什麼關聯。

印度斯坦語的發展和傳播，是不應該，也不會跟印度其他偉大語言，如孟加拉語，古甲拉特語，馬拉地語、奧里薩語以及南部的特拉維迪恩系語言的繼續使用和豐富化發生衝突。這些語言中，有些比印度斯坦語更加靈敏活潑，它們在它們各個地區里，在教育和其他方面，仍然應該當作正式語言。只有通過這些語言，教育和文化才能够在群眾中間迅速地傳播。

有些人猜想英語大概會成為印度的混合語言。在我看來，除了少數上層階級知識分子的情況以外，這是一種幻想。它和群眾的教育與文化毫無關聯。英語可能越來越變成一種在技術上、科學上、商業往來上、特別在國際接觸上所使用的語言，而今天的情況部分已經如此。為了和世界上的思潮及活動保持接觸，我們中間許多人必須學習外國語言。我希望我們的大學應該鼓勵學習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如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及意大利語。這並不是說，不注意英語，但是假如我們對世界有個平衡的看法的話，我們就不能將自己限于英國的現象。我們在思想觀點方面，由於集中于某一方面和某一觀念的緣故，已經變得很不平衡，即使我們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們，對他們在印度問題上已經給英國人的觀點約束和限制到什麼程度這一點，也沒認識清楚。

但是，不論我們怎樣鼓勵學習其他外國語言，英語還是我們和外界接觸的主要工具。這是應該的。在以往幾代中，我們設法學習英語，而且在這方面得到相當大的成功。如果現在把它廢除，不去充分利用這種長期的訓練，那是愚蠢的。英語今天無疑地是最廣泛流行的、最重要的世界語言，並且超過了其他語言。它可能日

益成为国际往来及無綫电广播的工具,除非“美国語言”把它代替。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傳播关于英語的知識,同时也需要把它尽可能地学好,但是如果我們像今天很多人那样地花費过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英文比較微妙的地方,那末,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个人可以这样作,但如果把它当作大多数人的理想,那就是把一种不必要的負擔加在他們身上,并且阻碍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进步。

我近来对于“基本英語”感到很大的兴趣,我觉得把英語極端簡化的办法有很大的前途。我們需要大規模地教授这种基本英語,而不教授标准英語,因为后者可以讓專家和專業学生去研究。

我个人願意提倡使印度斯坦語接受和同化許多来自英語和其他外国語言的詞彙。这是需要的,因为我們缺乏現代名詞,同时吸收熟悉的詞彙总比从梵語、波斯語、阿拉伯語中創造新的难解的詞彙要好一些。主張語言純潔的人反对使用外国詞彙,但我認為他們是非常錯誤的,因为丰富我們語言的方法就是使它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同化从其他語言中来的詞彙和觀念。

在我妹妹婚礼后不久,我碰巧到貝拿勒斯去訪問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希瓦·普拉沙德·古普塔。他已經患病一年多了。他在勒克瑙監獄时,突然染上麻痺症,从那时以来,他健康的恢复一直很慢。在我訪問貝拿勒斯期間,一个小的印地文学团体請我講演,我和它的委員們作了一次愉快的非正式談話。我告訴他們我对專家們談論我不太了解的問題,很感躊躇,但是我还提了一些意見。我批評了印地文著作中慣有的那种复杂而华丽的語言,它們充滿了难懂的梵文,矯柔造作,并且墨守古代形式。我大胆建議放弃这种写給特种对象看的宮廷式的文体,印地文作家應該有意識地为群众写作,并且使用群众了解的語言。与群众的接触会給語言以

新的生命和純朴，而作家們本身也會得到群眾的感情方面的力量，從而寫出更好的作品。我還建議說，如果印地文作家更加注意西方的思想和文學，他們會從那裏面得到很大的益處；同時翻譯歐洲語言的古典作品以及關於現代思想的著述也是需要做的工作。我還說到也許現代的孟加拉語、古甲拉特語和馬拉地語在這些問題方面要比現代的印地語更前進一些，而近年以來，孟加拉語的創作確實要比印地語多些。

我們對於這些問題，進行了友好的談話，接着我便告辭了。我根本沒有想到我的談話會送給報紙發表，但是當時在座的某人卻送了一份報道給印地語報紙。

接着，印地語報紙對我猛烈攻擊，責難我竟敢批評印地語，而且在把印地語和孟加拉語、古甲拉特語、馬拉地語對比時，使印地語相形見绌。他們稱我為無識者——我在那個特殊問題上也確實如此——使用許多更刻薄的話來壓制我。我沒有時間參加這種爭論，聽說它繼續了好幾個月，一直到我重新入獄時為止。

這件事對我是一種啓發。它說明了印地文人和新聞記者們的過度敏感，以及他們拒絕正視一個對他們抱有善良希望的人所提出的稍微坦率一些的批評。自卑感顯然是在那裏作祟，自我批評根本不存在，批評的標準也很低。一個作者和他的批評者往往傷和氣，彼此指責個人的動機。整個觀點是狹隘偏激的資產階級的观点。新聞記者和作者似乎是為了他們彼此和為一個小圈子而寫作，忽視了廣大群眾和他們的利益。當他們的園地如此廣闊和誘人時，這點在我看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並且也是很不幸的浪費人力。

印地文學有着優秀的歷史，但是它不能依靠自己的過去永遠

存在下去。我确实相信它有一个偉大的前途，而印地新聞學在印度亦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印地語不能擺脫掉狹隘的慣例，勇敢地面向群眾，那末它的文學和新聞學都不會有很大的進步。



第五十六章 教派主义和反动势力

大約在我妹妹結婚的時候，傳來了維沙爾海·巴特爾在歐洲逝世的消息。他已經患病很久了，並且也正因為他有病，他才從印度監獄裡被釋放出來。他的逝世令人傷心。當我們想到我們那些久經考驗的領袖們一個接一個地在我們鬥爭中間像這樣地離開了我們的時候，我們感到極其悲痛。大家對維沙爾海有許多頌揚，但大部分都是強調他掌握議會的才能以及他擔任國民議會主席的成就。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一再重複這些事情卻使我厭煩。難道印度缺少善于掌握議會的人或是能夠干練地擔任議長的人么？我們接受的那種律師訓練就能夠使我們勝任這種工作。維沙爾海的功勞遠超過這一切——他是一個為了印度自由而奮鬥的偉大的、不屈不撓的戰士。

當我在十一月訪問貝拿勒斯期間，我被邀請去向印度大學的學生演說。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請，於是便在該大學副校長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主持下的大集會上作了演說。在我演講時，關於教派主義，我說了很多話，我以嚴厲的措詞去指責它，特別痛斥了印度教大會的活動。這並不是事前已有準備的攻擊，但好久以來，各個集團的教派主義者的日趨反動的活動，使我心裡充滿了憎恨，因此，當我興致勃勃地談論這個問題時，這種憎恨的情緒便流露出來一些。我有意強調印度教的教派主義者的反

动本质，因为我在信奉印度教的听众面前批评穆斯林是無的放矢的。当时我未想到在瑪拉維亞主持的集会上批评印度教大会是不妥当的，因为瑪拉維亞本人就是这一派的骨干。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瑪拉維亞最近和它沒有多大关系，看来几乎好像印度教大会里面新起的那些跋扈的領袖們已經把他排挤出来。当他是印度教大会的領袖之一时，尽管这一派有其教派主义，它在政治上还不是反动的。但最近这种新发展却越来越明显。我确信瑪拉維亞和它沒有有什么关系，而且也一定反对过它。然而，如我后来所認識到的那样，我不适当地利用他的邀請發表使他为难的言論是不对的。我对这点感到抱歉。

我对我犯的另一个愚蠢的錯誤，也同样感到抱歉。有人邮寄给我一份決議案，据说这是最近在阿吉米尔由一个印度教的青年組織所通过的。这个決議案是非常令人起反感的，我在貝拿勒斯演說中提到了它。事实上，根本沒有任何組織通过这样的決議案，我們都上了一个大当。

我在貝拿勒斯發表的演說摘要报道出去以后，引起了一場騷动。虽然我一向習慣于这种叫囂，但我对印度教大会領袖們的猛烈攻击却感到十分驚訝。这些攻击大都是对个人的攻击，很少接触到爭論的問題。他們的行为超越了常規，不久，我对他們这种行为也感到高兴，因为他們給我一个机会，能讓我發表关于這個問題的意見。在以往几个月中，即使当我在獄中的时候，我已經遏制不住心中积压的意見，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這個問題是个黄蜂窩，虽然我对黄蜂已經司空見慣，但是要投入那种降低到謾罵程度的爭論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現在我没有其他办法了，于是便写了一篇在我看来是言之成理的关于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教派

主义的文章，揭露出何以甚至兩者都不是真正的教派主义，而是隱藏在教派主义假面具后面的政治和社会的反动势力。我恰巧有一些关于教派領袖們的各种談話和演說的零碎剪报材料，这都是我在監獄里搜集起来的。事实上，我占有这么許多材料，因而感到很难把它們压缩到一篇报纸論文里去。

我这篇文章在印度报纸上广泛刊载。但說来也怪，在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教派主义者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都沒有反应，虽然在我的文章里对它們兩方面都談得很多。印度教大会領袖們，曾經用各式各样最剧烈的話斥責我，但現在却一声不响了。在伊斯蘭教方面，穆罕默德·伊克培尔爵士糾正某些关于第二届圓桌會議的事实，此外，他对我的議論也只字不提。在我給他回答的时候，我建議制宪會議應該决定关于政治和教派的問題。后来，我又写了一兩篇关于教派主义的文章。我感到很兴奋，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所有这些文章为人們所欢迎，并且因为这些文章对于那些想进行思考的人們产生了显而易見的影响。当然，我并不幻想我能够施用魔术来消灭潛藏在教派主义精神后面的偏激的感情。我的目标是指出教派主义的領袖們是同印度和英国最反动的分子勾結在一起的，并且实际上反对政治进步，甚至更加反对社会进步。他們的一切要求和群众毫無关系，而仅仅是要替上層的小集团帶來某些發展。我准备以这种理論为根据，繼續进行攻击，正当此时，我又重新入獄。至于时常重复的印伊兩教團結的呼吁，虽然無疑地有其用处，但在我看来毫無价值，除非我們作些努力去了解这种不團結的原因。然而，某些人似乎幻想只要时常重复誦念这个咒語，團結終久就会出現。

如果追溯从一八五七年暴动以来英国关于教派問題的政策，

那是件有趣的事。这种政策在基本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种阻止印伊兩教團結，并且挑撥它們互相冲突的政策。在一八五七年以后，英国人对穆斯林的压迫要比对印度教徒来得厉害些。他們認為穆斯林更加激进，更具有战斗性，并且由于穆斯林沒有忘記他們近年来在印度的統治，因此，便显得更有危險性。穆斯林并且还不接受新的教育，在政府机关里占的职位也不多，所有这些都使得穆斯林成为被怀疑的人物。印度教徒比較更加接近英語和机关事务員的工作，似乎显得更加馴服一些。

当时新的民族主义是从上層人物——上層階級中說英語的知識分子——中間發展起来的，而这就很自然地限于印度教徒，因为穆斯林在教育方面是很落后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呼声是用一种極其微弱而卑下的口吻發出来的，然而它还是沒有博得政府的好感。他們决定給穆斯林更多的鼓励，使他們不去接近新的民族主义的綱領。就穆斯林的情况來說，缺乏英国教育的本身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这种障碍会逐渐地消灭。英国人很有远見地来替他們安排前途，而在这个任务中英国人又受到了一位杰出人物——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的帮助。

賽伊德爵士对他的伊斯蘭教同胞的落后状态，特别是教育方面的落后，感到煩惱。同时他对穆斯林在英国政府眼光中得不到寵信并且缺乏势力，也感到痛苦。正如他許多同时代的人那样，他是一个非常崇拜英国的人，而訪問欧洲似乎給他極其强大的影响。十九世紀后半期的欧洲，尤其是西欧，正达到它文明的高峰，在全世界占有無可抗衡的地位，而一切使它偉大的特点都極其明显。上層階級安全地守着他們的所有物，并且还使之增加，不用担心反抗会得到胜利。这是上升的自由主义和对偉大的命运有坚定信心

的时代。因此，如果前往欧洲的印度人为这种辉煌的景象所迷惑，那也是不值得奇怪的。更多的印度教徒初次到欧洲去，回国时却成为崇拜欧洲和英国的人。他们逐渐地看惯了那种繁华现象，最初的惊奇也慢慢消失了。但是，就赛伊德·阿麦德·汗爵士的情况来说，这种最初的惊奇和迷惑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一八六九年，他访问英国时写信回国，叙述他获得的印象。他在一封信里说：“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虽然我并不宽恕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粗暴无礼，以及他们把印度人当作畜牲而加以极端蔑视，但是我认为他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也没有多大的错误。我倒并不是在夸奖英国人，老实说，印度人不论地位高低，是商人还是小店主，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文盲，和英国人在教育、态度和人格方面对比一下，就好像一个骯脏的畜牲和一个仪表堂堂的、精明强干的人相比一样。英国人是有理由把我们印度人看作迟钝的畜牲的……我在这里已经看到的以及每天看到的情况，完全超出了一个印度人的想像以外……一切能在人类找到的优美的东西，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已经由万能的尊主赐给欧洲，特别是英国。”[⊖]

没有人能够再给英国人和欧洲以更高的赞美了。很明显地，赛伊德·阿麦德·汗爵士是获得了极深刻的印象。也许他使用这种强烈的语言和夸大这种对比的目的是想把他自己的人民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诱导他们向前迈进一步。而他相信这一步必须是朝着西方教育的方向走去；如果没有这种教育，他的伊斯兰教同胞会变得更加落后，更加衰弱。英国教育意味着政府机关的工作、

⊖ 这段引语摘自汉斯·科恩的“东方民族主义史”一书。

安全、势力和荣誉。因此，他將自己的一切精力都集中到这种教育上面去，企圖爭取他的伊斯蘭教人民来接受他的想法。他不願意有来自其他方向的主張来分散注意，因为要克服穆斯林的惰性和犹豫已經是十分困难的工作了。由印度教的資產階級發动的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萌芽，在他看来，正足以分散注意，因此他便反对。印度教徒，因为接受西方教育早五十年，因此能够任意批評政府，但他却希望在他的教育事業上依靠政府的充分合作，所以他不打算采用任何不成熟的步驟，使这个計劃遭到危險。因此，他不理采剛誕生的国大党，而英国政府是万分願意鼓励他这种态度的。

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决心集中精力使穆斯林受到西方教育，無疑是正确的。沒有这种教育，他們就不能够在建立印度的新型的民族主义中，产生任何有效的作用，同时也注定要落在受过較好教育并有較强經濟地位的印度教徒的后面。穆斯林当时不論在历史上或思想上对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沒有准备，因为他們不像印度教徒那样，並沒有把資產階級發展起来。因此，賽伊德爵士的活动，虽然在外表上是很穩健的，但却遵循着正确的革命方向。穆斯林还在封建的、反民主的思想的籠罩下，而印度教的新兴的中產階級已經开始从欧洲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兩者都是極其穩健的，并且依靠英国的統治。賽伊德爵士的穩健是少数富裕穆斯林所屬的地主階級的穩健。印度教徒的穩健是那些寻找工業和投資的出路的專門職業者及商人的穩健。这些印度教的政治家景仰英国自由主义的偉大人物格拉斯頓和伯賴特等等。我不知道穆斯林是否也是如此。也許他們尊敬英国的保守党和地主階級。格拉斯頓事实上是他們所厭惡的人物，因为他一再痛斥土耳其以及亞美尼亞的大屠杀。而因为狄斯雷里似乎对土耳

其更友善一些，他們——当然是少数对这些問題感觉兴趣的人們——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产生偏爱。

今天閱讀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的某些演說令人感到惊异。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在勒克瑙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批評并譴責国大党的稳健要求。当时国大党恰恰正在举行年会。賽伊德爵士說：“……假如政府攻打阿富汗或者征服緬甸的話，那末批評这种政策并不是我們分內的事情……政府設立了一个参議會来制定法律……为了成立这个参議會，政府从各省挑选出那些最熟悉行政管理 and 人民情况的官員，和一些按照他們的高級社会地位而有資格在这个議會中占一个席位的人。有人可能会問：为什么要按照社会地位而不按照才能来挑选他們呢？……我問你：难道我們的貴族会願意讓一个下等种姓或出身微賤的人——即使他是学士或碩士并且具有必要的才能——处在高于他們的权力地位，并且有权来制定影响到他們生命財產的法律嗎？决不会的！……只有一个出身于世家名門的人，总督才会把他当作同僚，視如兄弟，邀請他参加宴会，在宴会上說不定他会跟公爵和伯爵一同进餐……我們能說政府在采取立法方式方面的行动不尊重人民意見嗎？我們能够說我們沒有参加立法工作嗎？那是絕對不能說的！”[⊖]

这就是印度“伊斯蘭教的民主”的領袖和代表所說的話！即使是奥德省的地稅征收者或是亞格拉省、比哈尔省或孟加拉省的大地主今天是否会敢这样說，那也值得怀疑。然而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的这种論調也并非独一无二。国大党中的許多演說在今天念起来也令人感到同样稀奇古怪。但是很清楚，当时印伊兩教間

⊖ 引自汉斯·科恩的“东方民族主义史”一書。

問題的政治和經濟方面是：新興的、在經濟上力量較大的中產階級（印度教）多少受到部分的封建地主階級（伊斯蘭教）的反抗和阻礙。印度教的地主却時常跟他們的資產階級保持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們對中產階級的要求保持中立，甚至還表同情，而這種要求也時常受到他們的影響。英國政府總是偏袒封建分子。雙方的群眾和下層的中產階級根本同他們都沒有關係。

賽伊德爵士突出而強烈的個性使印度的穆斯林留下深刻印象。阿里迦學院成為他的希望和企求的有形象徵。在一個過渡的時期里，進步的推動力量可能不久便失去原來的作用，而被減低到只起限制的作用。印度的自由主義聯盟就是這樣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們時常提醒我們說他們是舊的國大黨傳統的真正繼承者，而我們這些後起的人都是半路插進來的人。這完全不錯。但是，他們忘記世界已經變了，舊的國大黨傳統已經隨着去年積雪的溶化而消失，現在只剩下回憶而已。賽伊德爵士的使命，當它最初出現的時候也同樣是恰當而需要的，但是它不能成為一個進步社會的最後理想。如果他在二、三十年後還活着的話，他可能把他的使命移到另一個方向。或是其他領袖能夠重新解釋他的使命並使它適應正在變化的環境。但是賽伊德爵士的成就以及對他個人的尊敬都使得別人難以擺脫舊的信念。不幸的是，印度的穆斯林特別缺乏具有突出的才能並能指出新的出路的人。阿里迦學院做了很好的工作，造就了許多有才能的人，改變了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整個品質，但是它還是不能完全跳出在它成立時所定的規範——封建精神統治了它，一般學生的野心就是想得到政府工作。在精神境界里去探求奇蹟，或是对星辰的奧秘進行探索——這都不是期望一個學生去做的事情。如果他得到一個代理收稅員的位置，

他便心滿意足了。由于使他想到他是偉大的伊斯蘭教民主制度中的一分子，他的自尊心得到了安慰，而为了証明这种同教的关系，他得意地在自己头上帶上了紅帽——土耳其氈帽。而这种帽子，土耳其人自己不久以后也完全不戴了。当他担保自己获得他的不可割讓的民主权利，而这种权利又使他能够糊口并且又能同他的伊斯蘭教弟兄一同祈禱的时候，他便不再憂慮印度的政治民主是否存在了。

这种狹隘的觀點以及热中于政府工作的願望并不限于阿里迦学院和其他地方的伊斯蘭教学生。在天生就不帶冒險精神的印度教学生中，这种情况也同样明显。但是环境迫使他們許多人脫離了常規。他們人数太多，由于沒有充分的职位，所以他們成为被社会擯斥的知識分子，轉而变成民族革命运动的骨干分子。

当二十世紀最初几年的事变帮助英国政府扩大印度穆斯林和声势浩大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間的裂痕时，印度的穆斯林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的政治使命所起的限制作用。瓦倫廷·齐罗尔爵士在一九一〇年在他所著的“印度的騷动”一書中写道：“可以断然肯定地說，整个印度的穆斯林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把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同英国統治的巩固和永久存在看作是屬于一体的。”政治預言是危險的。在瓦倫廷·齐罗尔爵士写了这話的五年之內，伊斯蘭教知識分子努力冲破限制他們前进的枷鎖，使他們自己和国大党并肩前进。在十年之內，印度穆斯林似乎已經超过了国大党，事实上給它以領導。但是这十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年，其間經歷了世界大战，战后遺留下一个破碎的世界。

然而，瓦倫廷·齐罗尔爵士在表面上有一切理由做出他那样的

結論。阿加·汗以穆斯林領袖的身分出現，仅只这个事实就表明了穆斯林們还牢守着他們的封建傳統，因为阿加·汗并不是一个資產階級領袖。他是一个極其富有的王子和一个教派的宗教首領。从英国观点看来，由于他和英国的統治階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人物。他有广泛的修养，大部時間住在欧洲，过着一个像富有的英国大地主和运动家的生活。因此，他个人在教派或宗派問題上的看法决不是持狹隘观点的。他对穆斯林的領導意味着伊斯蘭教地主階級和正在成長的資產階級同英国政府勾結起来。教派問題在实际上是次要的，显然是为了主要目标的利益而被強調起来。瓦倫廷·齐罗尔爵士告訴我們，阿加·汗使总督明多勋爵深刻了解“穆斯林对于孟加拉分割所造成的政治局势的看法，以免倉促地向印度教徒作出政治上的讓步，从而使得印度教的多数占了上風，因为这对于英国統治的穩固以及对于具有不容爭辯的忠誠的少数穆斯林的利益，都是同样危險的”。

但是在这表面上和英国政府的勾結的后面，其他力量正在产生作用。新兴的伊斯蘭教資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对現存情况感到不滿，而被吸引到民族主义运动方面去。阿加·汗本人注意到这点，并以特有的語言向英国人提出警告。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爱丁堡評論”上撰文劝告政府放弃分割印伊兩教的政策，而將兩教中的穩健分子团結成一个共同的陣营，从而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来对付年輕的印度（包括印伊兩教）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傾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制止印度政治变革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对穆斯林的教派利益。

但是阿加·汗或英国政府并不能阻止伊斯蘭教資產階級趋向

民族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当新的領袖們崛起，阿加·汗便似乎退居幕后了。甚至阿里迦学院也改变了它的性質，在新的領袖中，最有势力的是阿里兄弟，兩人都出身于阿里迦学院。姆·阿·安沙利医生、艾卜勒·凱拉姆·阿薩德大毛拉及許多其他資產階級領袖現在在穆斯林的政治事务中开始产生重大的作用。真納先生在更穩健的程度上也产生了同样作用。甘地把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真納先生除外)和一般穆斯林都吸收到他的不合作运动中去，他們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的事变中起了一种領導作用。

接着，反动势力便卷土重来了，在印伊兩教中的教派主义的和落后的分子开始从退隱生活中出現。这是一种緩慢但繼續不断的過程。印度教大会主要是由于教派問題的緊張局面，初次获得某种显要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对国大党并不能有很大影响。伊斯蘭教的教派組織比較更順利地重新获得它在伊斯蘭教群众中的某些原有的威信。即使如此，一群很坚强的伊斯蘭教領袖始終和国大党在一起。英国政府同时对于那些在政治上反动透頂的伊斯蘭教教派主义領袖們給以一切鼓励。印度教大会看到这些反动分子的成功，便开始和他們在反动行为方面竞赛，从而希望得到政府的好感。在印度教大会里的許多进步分子被驅逐出去或自动脫离。它越来越傾向于上層中产階級，特别是高利貸者和銀行家。

双方的教派主义政客們，对于議會席位的百分比爭辯不休，只想到推荐职位权，而这种权力只有在政府中握有权势才能得到。这是一个为中产階級知識分子爭取职位的斗争。很明显地，职位是不够分配的，因此，印伊兩教的教派主义者对这就發生爭執，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处于防禦地位，因为他們已經获得大部分現有的

职位，而伊斯兰教教派主义者总是越要越多。在这种争夺职位的斗争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冲突，这并非完全是教派主义的冲突，但却影响教派问题。整个说来，印度教徒在旁遮普省、信德省和孟加拉省，是比较富有的城市高利贷者；而穆斯林在上述三省中却是比较贫穷的农村负债者。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时常是经济冲突，但它总是被抹上一种教派主义的色彩。在最近几个月中，在关于减轻农民——特别是在旁遮普省——负债的重担的各省提案的辩论中，这点变得非常明显。印度教大会的代表坚持反对这些提案，而袒护银行家。

印度教大会，在批评伊斯兰教教派主义时，一直强调它自己的无可指责的民族主义。穆斯林组织表明自己带有极大的教派主义色彩，这已为所有的人所明了。印度教大会的教派主义却并不这样明显，因为它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下伪装起来。当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解决办法恰巧损害了上层阶级的印度教徒的利益时，它便遇到了考验，而在这种考验中，印度教大会一再经不起考验。对于信德省的分割，他们为了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违背多数人的明白愿望而坚决反对到底。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教派主义者双方的反民族主义和反动，在圆桌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英国政府坚持任命那些肯定属于教派主义的穆斯林，而这些穆斯林在阿加·汗的领导下，甚至使自己同英国公共生活中最反动的——不但从印度的观点，而且从一切进步集团的观点看来——最危险的分子勾结起来。当人们看到阿加·汗及他的集团和劳合·乔治勋爵及他的集团的密切关系时，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更进一步，在圆桌会议上同欧洲协会和其他组织缔结协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为这个欧洲协

会在印度一向是而且现在还是印度自由的最頑强的、最囂張的敌人。

印度教大会的代表們对于这个行动的反应是，要求对自由实行一切限制（特别是在旁遮普）——即为了英国人利益的保护措施。他們企圖在向英国政府提供合作的尝试中胜过穆斯林。由于沒有获得任何結果，他們便抛弃他們自己的工作，并背叛自由的事業。穆斯林至少还以庄严的口吻說話，印度教的教派主义者甚至連这点都不顧了。

在我看来，突出的事实是，印伊兩教双方的教派主义領袖們都代表着一小撮上層階級的反动集团，而这些人又利用群众的宗教热情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在印伊双方，都尽一切努力来压制并避免考虑經濟問題。这些問題不能再被压制的时候不久便会到来，到那时候，双方的教派主义領袖都会無疑地重复阿加·汗在二十年前提出的警告，要求稳健分子团結在一个共同的陣营里来反对激进的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經变得明显起来了，因为不論印伊兩教的教派主义者們怎样公开地彼此攻击，他們在議會及其他場合却进行合作并帮助政府通过反动的議案。渥太华就是將这三者联合起来的环节之一。

同时，有趣的是，阿加·汗和保守党中極右翼的密切关系还在繼續發展。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是劳合·乔治勋爵主持的英国海軍联盟宴会上的貴宾。他全心全意地支持进一步增强英国海軍的提案，而这个提案是劳合·乔治勋爵在布列斯托尔保守党年会上提出来的。一个印度領袖对于帝国的国防和英国的安全关心到这种程度，以至他在增强英国武装力量方面甚至比鮑尔温先生或“国民”內閣更进一步。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平的利益。

在下一个月中，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据说在伦敦非公开地放映了一部电影，其目的是“把伊斯兰教世界和英国王位结合在永恒的友谊之中”。我们听说，在这个场合里的贵宾又是阿加·汗和劳合·乔治勋爵。看来似乎阿加·汗和劳合·乔治勋爵在帝国事务中已经几乎是难解难分了——两人心心相印，正如杰雅克尔先生和萨普鲁爵士在我们国家政策方面难解难分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两人会商极其频繁的这几个月中，劳合·乔治勋爵带头对在朝的保守党领导者和国民内阁进行猛烈的和无情的攻击，指责他们所谓给以印度过多援助的缺点。⊖

近来，在某些伊斯兰教教派主义的领袖们的演说和谈话里有一种有趣的发展。这并没有丝毫真正的重要性，但我怀疑是否很多人也这样想法，然而它却表示了教派主义者的心理状态，并且这种发展也得到显著的注意。所强调的是印度的“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之间的完全不可调和性。从这里得到的不可避免的推论就是（虽然不敢这样大胆地说出来）英国人必须永远留在印度主持公道，替这两种“文化”担任裁判。

少数印度教的教派主义领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然而所不同的是，由于他们处在多数的地位，他们希望他们那种“文化”最后会得到胜利。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以及“伊斯兰教国家”——这些字眼引起了对于以往历史的有趣的回忆和对现在及将来的幻想！在印度的伊斯兰教国家——一个国家中间的国家，不是完整的而是模

⊖ 最近成立了一个由一些英国贵族和印度穆斯林所组成的协会，以巩固并发展这些极端反动分子的联合。

糊的、分散的和不确定的。在政治上，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在经济上，它是不可思议的，不值得加以研究。然而它却给我们一些帮助去了解在这后面的心理状态。在中世纪及其后，有些这样分隔而不可混合的“国家”曾经一同存在过。在奥斯曼苏丹的早期的君士坦丁堡，每个这样的“国家”分别存在，并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例如拉丁基督教国家，正统基督教国家和犹太国家等等。这是治外法权的萌芽，而这种法权在最近时期对于许多东方国家变成了噩梦一般地可怕。因此，谈论到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等于说除了宗教上的联系以外，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意味着现有意义下的国家不得发展；它意味着现代文明必须抛弃，我们必须恢复到中古时期的方式；它意味着不是专制的政府便是外国政府；最后，它只意味着一种情感的心理状态和不正视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愿望而已。情感能使逻辑性紊乱起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它似乎不合理便对它忽视。但是这种伊斯兰教国家的观念仅是少数人幻想的虚构品，如果不是由于报纸给以宣传，很少会有人听到这种说法。即使有许多人相信它，但当它一接触现实，它还是会化为乌有的。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的观念也同样如此。甚至民族文化的时代也将迅速地消逝，世界将变成一个文化单元。国家可以保持下去，并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保存着他们那些特殊的东西——语言、习惯、思想方法等等，但是机器时代和科学，由于迅速的旅行，经常地供给世界新闻以及无线电、电影等等，会使他们越来越统一起来。谁也不能反抗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只有一个粉碎现代文明的世界巨变才能够真正使它受到阻碍。在传统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生哲学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这些差异，

当这两种人生哲学同现代科学的和工业的人生观相对比时，也辨認不出来了，因为在后者和前两者之間存在着广大的鴻溝。今天在印度的真正斗争不是在印度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間的斗争，而是这两者和现代的具有征服性的科学文化間的斗争。那些希望保存“伊斯蘭教文化”的人們，且不論“伊斯蘭教文化”是怎么回事，不必对印度教文化表示憂慮，而是應該抵抗从西方来的巨大力量。我个人毫不怀疑，一切反抗现代科学的、工业的文明的努力，不論是伊斯蘭教的还是印度教的，都注定要失敗，而我將毫不惋惜地来看这些失敗。当铁路等在印度建造起来时，我們的選擇已經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被决定了。賽伊德·阿麦德·汗爵士，当他开办阿里迦学院时已經代替印度的穆斯林作了選擇。但是，我們誰也不能在这个問題上真正做出任何選擇，除非是下列那种選擇，即一个快被淹死的人必須抓住能挽救他生命的东西。

但是这种“伊斯蘭教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对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等的偉大事業的一种民族的回忆？它是語言，还是艺术和音乐？抑或是習慣？我想不起任何人談到现代的伊斯蘭教艺术或伊斯蘭教音乐。曾經影响印度的伊斯蘭教思想的两种語言是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特别是后者。但是波斯語的影响并不包含宗教因素在內。波斯語言和許多波斯習慣及傳統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傳來印度，在所有印度北部地区留下了强烈的影响。波斯是东方的法蘭西，將它的語言和文化傳給它的一切鄰居。这对于我們印度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共同的寶貴的遺產。

对于伊斯蘭教民族和国家以往成就的驕傲，也許是伊斯蘭教最强有力的系帶之一。难道有人会对穆斯林表示嫉妒各民族的这种高貴記錄嗎？只要他們对它怀念，对它珍惜，誰也不能把它夺

去。事实上，这种过去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遗产，也许因为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说，感到一种共同的联系将我们团结起来去反抗欧洲的侵略。我认识到每当我读到在西班牙或十字军时阿拉伯人的冲突，我总永远对他们寄与同情。我企图做到公正客观，但是尽管我企图这样做，而当亚洲人民被牵涉到的时候，我内在的亚洲人的本性总会影响我的判断。

我竭力设法了解这种“伊斯兰教文化”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我承认我没有成功。我在印度北部发现少数受到波斯语言及传统的影响的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观察群众的情况，“伊斯兰教文化”最明显的象征似乎是：一种既不太长又不太短的裤子，一种刮或剪鬍髭的特殊方法，但是又让鬍子继续留着，一种带有特殊猪鼻梁的尖梁鞋，而相应的印度教习惯则是束一条“拖提”，束一个顶髻，穿一种不同的尖梁鞋。事实上这些区别大部是城市里的区别，它们有消灭的趋势。伊斯兰教农民和工业工人同印度教徒很难区别开来。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很少蓄髭，虽然阿里迦学院学生还喜爱戴红色无边的土耳其氈帽（这叫作土耳其帽，虽然土耳其人已经不戴了）。伊斯兰教妇女穿起“纱丽”慢慢地从深闺中出来和人们接触。我自己的嗜好和某些这样的习惯无法调和，我不喜爱留鬍髭或顶髻，但我不希望把我的嗜好强加于别人，我必须承认，就鬍髭来说，当阿曼努拉在喀布尔开始彻底解决这种习惯的时候，我很高兴。

我必须承认，那些一直向后回顾的、一直想抓住从他们手中滑去的东西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造成了一种非常凄惨的景象。我不希望指责或否定过去，因为在我们的过去，有许多极其美丽的东西。我毫不怀疑这些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些人企图抓住

的不是美丽的东西，而是沒有价值的，时常还是有害的东西。

近年来，印度的穆斯林一再受到震动，他們的許多深为珍爱的观念也被粉碎。土耳其——伊斯蘭教的維護者，不但結束了印度在一九二〇年曾經为它进行英勇斗争的“穆斯林争取自由权运动”，而且繼續采取脱离宗教的步骤。在新的土耳其宪法中有一条规定，說明土耳其是一个伊斯蘭教国家，但是为了避免任何誤会起見，凱末尔巴夏在一九二七年說：“宪法中关于土耳其是一个伊斯蘭教国家的規定是一种妥协，一有机会就会取消。”我相信以后他会按照这个暗示采取行动。埃及，虽然更加謹慎一些，也采取同样的道路，使它的政治和宗教划分开来。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除了阿拉伯本身，因为它更加落后一些。波斯在回顧它伊斯蘭教以前的时期，去寻求文化上的灵感。不論在何地，宗教都退到幕后，而民族主义却以激进的姿态出現。而在民族主义的后面，又有从社会的經濟的角度来談論問題的各种主义。至于“伊斯蘭教国家”，“伊斯蘭教文化”，那还有什么东西存在？它們在將來是否会在印度北部，在英国人的仁爱的統治下欢騰地存在着？

假如进步等于个人对構成政治的一切采取一种更加寬广看法的話，那末，我們的教派主义者和政府却故意地、坚持地把与此相反的东西当作目标——即使得这种看法变得狹隘起来。



第五十七章 难 关

再度被捕并被判刑的可能性一直威胁着我。当时正在实施特别法令，而国大党本身又是一个非法组织，真的，还不只有可能性而已。由于英国政府的处境，同时由于我的处境，对我的镇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个无时不在的形势影响了我的工作。我不能安定下来进行任何工作，而我又急于要尽可能多赶完一些工作。

同时，我并不希望惹祸上身，在很大的程度上，我避免从事可能使我被捕的活动。省内外许多地方都邀请我去作一次旅行。我拒绝了这些邀请，因为任何这种演说旅行只会是一个煽动性运动，会突然遭到制止。当时我并没有一个折衷的办法可行。在我为了某个其他原因而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如与甘地以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晤谈——我都在公开的大会上演说，而且都是畅所欲言。在赞浦尔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集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德里的集会也是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最盛大的集会之一。这些集会的成功的确已令人明白：政府是不会容许它们时常重演的。德里的集会一结束后就谣言泛滥，说我即将被捕，然而我却安然回到阿拉哈巴，中途并在阿里迦稍停，对当地伊斯兰大学的学生作了演说。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主张：在政府企图压制一切有效的政治工作的时候，从事非政治性的公众活动。我发现在国大党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想以从事最简单的活动来求得摆脱政治工作的

避难所，这些活动本身虽然也不無可取，但是与我們的斗争却很少有关联。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觉得在当时不应受到鼓励。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我們国大党联合省工作人員在阿拉哈巴举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局势，并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决定。国大党的省委会是一个非法的团体，我們的目的在于会見，而不在于要触犯法律，所以我們沒有正式地召集省委会。可是我們召集了在獄外的全部委員与其他一些挑选出来的工作人員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會議。我們这些集会虽然是私下举行的，但是并無秘密可言，我們直到最后的一刻都不知道政府是否会来干涉。我們在这些集会上对世界局势給予了極大的注意——如大蕭条、納粹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我們要求同志們將印度的斗争与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件联系起来認識。會議最后通过了一項社会主义性質的決議，确定了我們的目标，同时表示反对撤消和平抵抗运动。每一个人都十分明白，和平抵抗运动沒有普遍开展的可能，即令是个人的和平抵抗运动也随时可能告吹，或者在非常受限制的規模上繼續下去。可是当政府的攻势与特別法令还在繼續的时候，撤消和平抵抗运动对于我們也很少有差別。所以，作为一种姿态，我們决定繼續进行正式的和平抵抗运动，同时实际上却指示我們的工作人員不要越軌，免遭逮捕。叫他們繼續进行他們的正規工作，如果在其間遭到逮捕，那么就从容地接受。特别是叫他們恢复与农村的接触，查明地租的豁免与政府的镇压給农民的处境帶來了什么后果。当时沒有發动一个抗租运动的可能性。这个运动在浦那會議后已經正式予以撤消，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是無法恢复的。

这个綱領是一个温和而無刺激性的綱領，沒有一点公然違法

的东西在內，但是我們知道它是会导致逮捕的。我們的工作人員一到乡村里就被逮捕了，并完全冤枉地被控以鼓吹抗租运动（在实行特别法令时，这也構成一条罪狀）而加以定罪。在我許多同志被捕以后，我有到这些农村地区去的打算，可是其他一些活动要求我加以注意，我只得將此行拖延下去，后来時間拖得迟，就不便进行了。

在这一段时期中，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曾經兩度聚会商討全印度的局势。工作委員會本身已經不在活动，这不是因为它是个非法的团体，而是因为根据甘地在浦那會議后的提議，国大党所有的委員會与机关都中止了活动。我由于出獄以后拒絕遵守这种克己性的戒律，坚持以国大党的总書記自居，所以处境很特殊。可是我不过是在空中活动。沒有合适的机关，沒有工作人員，沒有副手，虽然能和甘地有所磋商，而他却为了哈里真的工作又一次忙于盛大的全印旅行。在他旅行到贊浦尔与德里的时候，我們設法赶上了他，并且和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进行了磋商。他們明白地將各委員之間的分歧表露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难关，沒有一条出路能使每人都認為滿意。在主張撤消和平抵抗运动的人与反对撤消和平抵抗运动的人之間，甘地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他贊成后一种步驟，运动就像以前一样繼續着。

国大党竞选进入立法機構的問題，国大党人有时也談論到，虽然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当时对这一点并不很感兴趣。這個問題在当时还談不上；它显然是个时机尚未成熟的問題。“改革”至少在兩、三年以內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当时並沒有联邦院要重新选举的話。我个人在理論上并不反对竞选，同时我心里確認，时机一到，国大党是必須参与其事的。可是在当时提出這個問題只不过

会分散注意力而已。我认为，我们将斗争继续下去，就会使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得到澄清，同时使妥协分子无法占上风。

与此同时，我继续将文章与声明送往报界。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文章的语调放得委婉些，因为它们是为了要发表出去，而检查官和各种法律像章鱼的触角一样远布到四处。即令我准备冒险，印刷者、出版者与编辑也不会愿意。总的说来，报界对我很好，在许多方面对我都破格通融。可是也不是经常如此。有时候有些声明与整段的文字也被禁止发表，有一次有一篇我费了相当气力的长文章始终一点也没有发表出来。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一家大报的主笔来看我。他告诉我，他曾将我的一篇声明送给加尔各答各报的总主笔，征询他的意见，由于总主笔不许可，这篇声明就没有能够发表。这位“总主笔”就是政府委派的加尔各答报刊检查官。

我在一些对报界的谈话与声明中，大胆地对某些团体与个人作了猛烈的批评。这种做法遭到了不满，部分地由于有一种想法（甘地促使了这种想法的散布），认为攻击国大党是不会遭到任何回击的危险的。甘地本人在这一方面就是一个典范，在不同的程度上国大党的领导人也都效法他，虽然有时候也不尽然。我们通常拘泥于模糊而貌似虔诚的字句，这就使得我们的批评者有机会带着他们漏洞百出的论据与投机取巧的策略蒙混过去。双方都避免触及真正的問題，很少有真诚的、针锋相对的讨论，如像西方国家内——法西斯主义国家除外——的情况一样。

有一位我所尊重的朋友写信给我说，我对报界发表的一些声明，其强劲是使她有些惊讶的——我几乎变得“愤世嫉俗”了。这是不是我的希望遭到“挫折”的结果呢？我不禁怀疑。部分地说，

确是如此，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我们大家都受到挫折。就个人来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正确。可是我沒有十分意識到这种情感，因为我个人並沒有遭受镇压与失敗的感觉。自从甘地在政治上为我所認識以后，我至少向他學習了一件事：不要由于惧怕后果而將我的看法压抑在自己心內。这个習慣——在政治範圍內遵从它（在其他範圍內遵从它会更加困难而危險）——已常使我陷于煩惱，可是也帶來了大快人心的东西。我想，正是因为这样，我們許多人才消除掉真正的內心怨憤与最惡劣的挫折感。如果一个人知道有許多人都是以亲切的心情想念着他，这也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的，也是对失敗主义与挫折感的强有力的解毒剂。我認為，最可怕的感觉莫过于孤單，为人所遺忘。

可是，即令如此，一个人在这个奇怪而不幸的世界上，怎么能沒有一种挫折感呢？我們常常会感到一切都錯乱了似的；即令我們繼續向前，可是看着四圍人物的氣質，种种怀疑也不禁要油然而生了。我想，我对許多事件与情况，甚至对于一些人和团体，生气与憤懣的时候是够多的了。最近我开始日益憤恨对人生的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态度忽視重大的問題，認為提及它們是不妥当的，因为這些問題触及人們的錢包或者偏爱。虽然怀着所有这些憤懣情緒、挫折感和“憤世嫉俗”的習气，我覺得我总還沒有失去嘲笑我自己与別人干的笨事的本能。

我有时候对人們对一个仁爱的上帝的信念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而这个信念却能無恙地存在；为什么灾难与不仁都被認為是对这种信念真誠与否的考驗。吉拉德·霍浦金斯写的令人喜爱的詩句在許多心胸中引起共鳴：

“你确实是公正的，主啊！如果我和你爭執的話；

可是，主啊！我所申辯的也是公正的。
为什么作孽的人一帆风顺？
而我的一切努力却归于破灭？
即令你是我的仇敌，啊，我的朋友，
我怀疑你是否会打击与挫折我
比现在更厉害些？
啊，酒徒与色鬼比我这终生为你效力的人，
主啊！悠閒而得意得多啊……”

对进步的信念，对一个事业的信念，对理想的信念，对人性善良的信念与对人的命运的信念——不都是和对一个上帝的信念几乎相关联的吗？如果我们想以道理与逻辑来解释它们，我们马上就会陷入困惑的境地。可是我们内心总有想把握住这种希望与信念的念头，因为失去了这种希望与信念，生命就无异是一块没有绿洲的荒原。

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其效果甚至使工作委员会中的一些同志感到不安。他们也许还能毫无怨言地容忍我，就像几年来我进行这一宣传时一样，可是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惊动了国内的既得利益阶级，所以我的活动就不再被认为是无害的了。我知道，我的一些同志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一直认为，作为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完全的自由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而不将国大党也牵扯在里面。我在发现工作委员会一些委员并不认为我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是吃了一惊的。我等于将他们放在自相抵触的地位上，他们对这一点是感到愤恨的。可是叫我怎么办呢？我是不会将我所认为我工作中重要的部分抛弃了的。如果两者之间有矛盾的话，我是宁愿辞离工作委员会的。可是在工作委员会

还是非法的、甚至还不能正規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怎能辞职呢？

后来我又一度面临这一困难問題——我記得那是十二月底的时候——当时甘地从馬德拉斯写了一封信給我。他寄給我“馬德拉斯邮报”上的一条剪报，上面刊载着一个对他的訪問記。訪問者曾向他問及我，他的回答几乎是為我的活动辯解，他并表示对我的正直有信心，認為我不会使国大党牵扯到这种新奇的道路上。我对于这样談論我，并不特別高兴，可是使我大伤腦筋的是在这篇訪問記的后段甘地为地主制度辯护。他似乎認為这是农村与国民經济中一个很可取的部分。这是使我十分惊讶的事，因为地主制和地稅征收制現在已很少有辯护人了。在全世界上，它們都已遭到破坏，甚至在印度大多数人也認為它們是不会存在多久的了。甚至地稅征收者与地主也欢迎这个制度的結束，如果他們从中能得到足够的賠償的話。[⊖] 这个制度的确是日薄西山了。可是甘地还在支持它，并且还說到什么受托制等。我再想一想，他与我的观点是相去很远的，我怀疑我將來还能和他合作多久。我是不是必須留在工作委員會里呢？这个問題当时沒有得到解决，几个星期之后，由于我又重新入獄，問題便变得不相干了。

我的家务事花費了我很多的时间。我母亲的健康繼續在好轉，可是很慢。她仍然不离床褥，但是似乎已脫离險境。我注意了一下我那久受忽視因而一团糟的財務問題。我們的費用一直远超过我們的承担能力，而当时并沒有一个显然可行的削減我們費用的

⊖ 普·恩·泰戈尔先生——全孟加拉土地所有者會議接待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他的演說中說：“如果地主的土地像在愛爾蘭那樣在給予地主以足够的賠償的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就我个人來說，当这一天來到的时候，我是沒有什麼遺憾的。”應記住，孟加拉的地主由于永久占用法の実施，生活强于沒有这一办法的地区的地主。普·恩·泰戈尔先生关于国有化的意見似乎有点模糊。

方法。我倒不迫切要使收支相抵。我差不多已在预料我将有一日身无分文。金钱和财物在现代的世界上是够有用的了，可是对于一个想作长途旅行的人来说，却往往成了一个负担。叫有钱的人参加有危险的事业，是很困难的；他们总是害怕失去他们的财物与产业。金钱与财产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将它拿走，甚至没收的话？所以我几乎想将我仅有的一点也不要。我们的需要很少，而我自信有能力赚得足够的钱。我最关怀的是不让我母亲在晚年遭受种种不适或者生活水平显著的降低。我也考虑到，我女儿的教育不应受到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她有必要在欧洲留学一段时期。此外，我妻子和我都没有特别需要钱的地方。或者只是我们这样想而已，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缺钱的时候。我确信，一旦缺钱的时候来到了，我们是不会感到愉快的。我一直保持的一种挥霍行为是很难割弃的，那就是买书。

为了改善眼前的经济情况，我们决定将我妻子的珠宝饰物，我们所有的一些银器及其他类似物件，以及整车的零碎什物卖去。卡麦拉并不乐意舍弃她的珠宝饰物，虽然十多年来她一件也没有戴用过，而且一直放在银行里。可是她要想把它传给我们的女儿。

当时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在阿拉哈巴地区乡村中，我们的工作不断地被捕，虽然他们所从事的都是无罪的活动。看来我们有必要到这些乡村中去继承他们的工作。拉菲·阿马德·基德威，我们国大党联合省省委会很有才干的书记，也被捕了。一月二十六日——独立日——就要来了，这是不可不予理会的。自从一九三〇年以来全国各地不顾特别法令与禁令，每年都照常举行纪念。可是谁来领导呢？怎样加以领导呢？当时除了我以外，甚至在理论上也已经没有一个旁的人作为全印国大党的领导者在进行

活动了。我和一些朋友商議了一下，几乎全都同意应当有所表示，可是对应如何表示这一点，却没有一致的意見。我發現有一种总的傾向，那就是避免会导致大規模逮捕的任何活动。最后，我發出了一个簡短的呼吁，号召适当地庆祝独立日，庆祝办法由各地区自行决定。在阿拉哈巴，我們筹划在全地区进行一次相当广泛的庆祝。

我們認為，独立日庆祝的組織者將會在当天被捕。在我再度入獄以前，我想到孟加拉去一趟。这一方面是去会見那里的老同事，但是真正的目的在于向数年来苦难深重的孟加拉人民表示慰問之意。我很清楚，要是說到帮助他們，我是無能为力的。同情是沒有多大用处的，可是却深受欢迎，孟加拉格外地有一种孤立感，有一种在危难的时刻为印度其他地区所遺弃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沒有根据的，可是它确在那里存在着。

我还得和卡麦拉到加尔各答去一趟，以便在那里向我們的医生詢問关于她的治疗問題。她的健康一直远不能說正常，可是我們兩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想不去理会它，想把任何要我們在加尔各答或其他任何地方長期逗留的治疗办法拖延下去。我們希望在我尚在獄外的短暫期間，兩人尽可能在一起。我認為，在我再度入獄以后，她將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看病的。現在被捕看来是迫在眉睫的了，我觉得，至少在加尔各答的訪医求治我要在場；其他的可待以后再說。

所以我們——卡麦拉与我——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去加尔各答。我們想及时赶回来参加我們的独立日各項集会。



第五十八章 地 震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我正站在阿拉哈巴我們屋前廊檐下向一群农民演說。一年一度的正月賽会开始了，成群的來訪問我們的人終日絡繹不絕。我突然感到兩腿不穩，几乎要站立不住了。我抓住了旁边一根柱子。門戶开始砰砰地响起来了，附近的自主大楼傳來一陣隆隆的声音，那里的瓦片紛紛从屋脊上滑下来。由于沒有經歷过地震，我起初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一会儿就明白了。我对这个新奇的經驗相当感到好玩，有趣。我繼續向农民們講話，并且开始將地震的情由告訴他們。我的老姑母在一段路以外高喊着叫我赶快跑离房子。我感到这个主意很荒唐。我对这个地震并不很在意，同时無論如何我总不能抛掉楼上臥病在床的母亲和在楼上大約正在收拾行裝的妻子，去为自己找个安全之所。震动連續了好一会儿才逐漸消失下去。它給了大家几分鐘的談話資料，接着似乎就被遺忘了。我們当时不知道，也沒有猜想到那兩三分鐘对比哈尔省和其他地区千百万人有什么意义。

那天晚上卡麦拉和我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去，我們一点也不知道，那夜的火車將我們帶过了地震的南部地区。第二天加尔各答对此浩劫还很少有消息。又过了一天才开始傳來了一些消息。第四天我們才对这个灾难得到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們忙着进行我們的加尔各答日程。那里有許多医生須要去

再三訪問，最后決定卡麥拉在一、兩個月以后再回加爾各答接受治療。那里還有許多長期沒有見面的朋友和國大黨同事須要去看。我經常都有一種可怕的遭受壓制的感覺。人們似乎什么都怕得去做，以免惹來麻煩；他們遭受的痛苦太多了。當地報紙比印度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謹慎些。這里像印度其他地方一樣，對未來的工​​作抱有懷疑與混亂的看法。正是這種懷疑，而不是什麼畏懼，才使得有效的政治工作無法開展起來。已經明顯地發生了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同時還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傾向——所有這些都相當模糊而且彼此都有相通之處。要想在這些團體之間劃條明確的界綫是很困難的。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對恐怖運動多作考察，對於這個運動，當時官方是深為注意的，同時也在大事加以張揚。從我所獲得的情況看來，它並沒有任何政治意義，同時恐怖團體中的老成員對它也已毫無信心。他們已在考慮要改變路綫。可是，對政府在孟加拉的行動所懷的憤恨使得各處個別的人越出了常軌，為仇恨而干起來。事實上，這種仇恨的念頭在雙方都是占支配地位的。在個別恐怖分子方面，這一點是夠明顯的了。在政府方面，態度也偏重於要叫仇恨繼續下去，而遠不是冷靜地處理每一個反社會事件，有時還進行一些報復，並加以鎮壓。任何一個面對着恐怖行動的政府，是一定會和它進行鬥爭並且企圖將它鎮壓下去的。可是對於政府來說，冷靜的控制是比對犯罪者與無辜者不分皂白地採取過火行動要得體些，尤其是對於無辜者，因為他們總是占大多數的。也許在這種威脅面前保持冷靜與鎮定是並不容易的。恐怖行動是日見其少了，可是發生的可能性却經常存在，這就足以叫和它周旋的人枕席不安的了。顯然，這種行動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疾病的征象。只治理征象而不治理疾病本

身，是徒勞無功的。

我相信，許多據說與恐怖分子有勾結的青年男女實際上為秘密工作的魅力所誘惑。秘密和危險對於秉性好冒險的年輕人總是有吸引力的；他們所嚮往的是要了解內幕，要想知道這些大嚷大叫為的是什麼，要想知道幕後是些什麼人。這是偵探小說所以吸引人的地方。這些人並不想干點什麼，確實不是想干件恐怖事情，可是只要和警方眼中的嫌疑犯廝混在一起，就足以使他們自己也成為嫌疑犯了。不久，他們就可能陷身在政治犯的行列中，或者在一個拘留營里，假使不遭到更壞的命運的話。

我們聽說，法律與秩序是英國統治印度中足以自豪的成就之一。我的本性是完全擁護法律與秩序的。我喜歡生活有紀律，不喜歡無政府、無秩序和無效率。可是痛苦的經驗使我懷疑國家和政府強加在人民頭上的法律與秩序的价值。有時候，人們為法律與秩序所付出的代價是太大了，法律不過是當權集團的意志，秩序不過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恐懼的反映而已。有時候，所謂法律與秩序真不如說是無法律無秩序還恰當些。任何一個以普遍的恐懼為基礎的成就都很难說是一個可取的成就，一個以政府的強制機構為根基、離了它就活不了的“秩序”，與其說是文明統治不如說是軍事占領。我發現，在詩人迦羅罕那千年以前寫的克什米爾史詩“王河”中，那個反復用來作法律與秩序解的詞，是正義與無所恐懼，而統治者與政府的責任就在於維持這個法律與秩序。法律不只是法律而已，秩序則是人民的無所恐懼。這種灌輸無所恐懼的思想比起將“秩序”強加在驚慌失措的人民的頭上，要可取多少啊！

我們在加爾各答過了三天半，在此期間，我在三個公開的集會上發表了演說。如我過去在加爾各答所做的一樣，我譴責了並且

駁斥了恐怖行动，接着我談到政府在孟加拉所采取的措施。我是怀着滿腔真誠而發言的，因为我深为省中發生的事件的报告所震动。使我最感痛苦的是在对全体居民不分皂白地进行镇压的时候，人类尊严遭受蹂躪的情况。政治問題虽然紧迫，却次于这个关于人的問題。我这三篇演說構成了我日后在加尔各答受审时的三条罪狀，而我現在所受的判決也是由此而来的。

从加尔各答，我們前往散蒂尼克坦拜望詩人泰戈尔。和他見面一向是件快事，現在既然来得这么近，很想和他見一面。我以前曾到过散蒂尼克坦兩趟。卡麦拉这次則是初来，她特別要来看看这个地方，因为我們想把女兒送到这里来。英迪拉不久就要进大学了，她未来的教育問題使我們感到麻煩。我完全反对她进正規的官办或半官办大学，因为我厭惡它們。籠罩着这些大学的整个气氛是种官派、沉悶而專断的气氛。这些大学过去無疑曾經造就过优秀的男女人才，將來也还会造就人才。可是这样一些例外并不足以使这些大学免于受到压抑与窒息青年各种优良本能的譴責。散蒂尼克坦大学沒有这一弊端，所以我們选中了它，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不如其他大学那么現代化，設備也赶不上。

在回来的路上，我們在巴特那停留了一下以便和拉金德拉·巴布討論地震后的救济問題。他正好出獄不久，所以就当仁不讓地領头做起非官方的救济工作来了。我們的到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我們的电报一封也沒有交到他的手里。我們原来預备和卡麦拉的兄弟同住的房子只剩下断壁殘垣，而它原来是一幢很大的兩層磚造建筑。所以我們像其他許多人一样住在露天里。

第二天我去訪問穆柴法尔浦。当时离地震已整整七天了，可是除了一些大街上以外，瓦礫几乎都还没有清除掉。在清扫这些

街道的时候，不断發現尸体，有的姿态有奇特的表情，好像要擋开正在崩場的牆壁或屋脊似的。瓦礫堆是一个予人印象很深的恐怖景象。幸免于难的人都懾于他們所遭受的令人胆裂的經歷而变得傻了似的。

我回到阿拉哈巴就立刻組織起劝募錢款与实物的运动，我們——国大党人与非国大党人——全都热心地干了起来。有些同志認為，由于地震，独立日的庆祝应当延期。可是另外一些同志和我看不出为什么連一場地震也要影响我們的計劃。所以一月二十六日，我們在阿拉哈巴地区的乡村中举行了許多集会，在城市中举行了一个集会。我們的成功大于我們的預料。大多数人都推測会發生警察的干涉与逮捕，也确有小規模的干涉。可是，使我們甚为惊讶的是，我們安然开完了会。在一些乡村中和某些其他城市中，也發生了逮捕的事件。

从比哈尔回来后，我随即就地震發表了一項声明，最后呼吁捐款。我在这个声明中批評了比哈尔政府在地震后最初几天內的懈怠。我的本意不在于批評地震地区的官吏，因为他們所要应付的局面恐怕是最有魄力的人也要感到伤腦筋的，可是抱憾的是我的一些措辞也可以解釋为對他們的批評。但是我确实强烈地感到比哈尔政府的中樞首先就沒有显出很大的能力来，尤其是在清除瓦礫这件事上，而这是可以拯救出很多生命的。蒙吉尔一城就死了成千成百的人，三个星期以后我还看見大量的瓦礫仍然堆在那里，一动也沒有动过，虽然在几英里以外的塔麦尔浦就住着成千的铁路工人，他們是可以在地震的灾难發生后几小时以內就用来清除瓦礫的。地震十二天以后还挖出了活人来。政府为了保护财产，立即采取了步驟，可是对于援救被埋着的人，却沒有这样迅速。这

些地区的市政当局已不在执行职务了。

我認为我的批評是有理由的，我后来知道，地震地区絕大多数人民都同意这个批評。可是無論有理由与否，这个批評是真誠的，同时用意不在責备政府而在督促政府。并没有一个人譴責政府在这一方面是故意作孽或疏忽。这是一个奇特而难以抵擋的局面，錯誤是可以原諒的。就我現在所知(因为我一直在監獄中)，比哈尔政府后来以很大的努力和效能进行了地震灾难后的恢复工作。

可是我的批評却引起了別人的不愉快，不久比哈尔一些人發表了一項頌揚政府的一般性啓事，作为一种反击。地震及善后工作的需要几乎变成了次要的事情了。更重要的事情是政府遭到了批評，它的忠誠的臣民必須出来为它辯护。这是印度一种普遍現象的一个有趣的例子——这种現象就是对批評政府的反感，而这在西方国家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是一种武人心理，这种心理是不能容忍批評的。英国在印度的政府及其全体高級官員，就像英王一样，是不会犯过錯的，任何認为他們有过錯的暗示都是“犯上”罪。

奇怪的是，这种对于無能与無用的責难所引起的憤恨远甚于对暴政与專制的指控。对于暴政与專制的指控也許足以使指控人陷身獄中，可是政府已經习惯于这种事情，因而并不真正在意。这也許还可以說是对一个霸道的民族的一种恭維。可是被人說成無能和無魄力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深深地刺伤了他們的自尊心；它动搖了英国在印度的官吏以救世主自居的妄想。他們好似英国国教的主教一样，責难他的行为与基督教徒不相容是可以安然容忍的，可是說他愚蠢与無能，那他就要發怒而进行反击了。

在英国人中間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还时常被确認為一种無可辯駁的真理，那就是：如果印度的政府有了改变，英国的影响削

弱了或者取消了的話，結果將是一個壞得多、無能得多的政府。根據這種信念，激進派和有開明思想的英國人懷着滿腔熱忱聲稱，好政府不是自治政府的代用品，如果印度人執意要搞成一團糟，就讓他們搞去吧。我不知道在英國影響消除以後，印度會發生什麼情況。大半要看英國人如何撤離，那時候由誰來管理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國內與國外的情況而定。我完全能想見一種由英國人協助而形成的局面，它將比我們今天所有的任何東西都更無用，而且總的說來更壞些。因為它將具有現有制度的一切弊害而沒有它的長處。我更易于想見一種不同的局面，它從印度人的觀點看來，會比今天我們所有的任何東西都要更有效而有益些。國家的強制機構可能不是這樣有效率了，行政機構也可能不這樣堂皇了，可是在生產上、消費上，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體質、精神與文化水平上將有更大的效率。我相信自治對於任何民族都是好的。可是我不準備犧牲真正的好政府來接受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如果要想確立自己的威信，必須最終地走向一個為群眾服務的好政府。這是因為我相信，英國在印度的政府，不論它在過去有些什麼可夸耀的，今天已經無法組織一個好政府來提高群眾的各項水平了。我感到它在印度已經失去了過去的用途，變得老而不死了。為印度爭取自由的唯一真正理由就在於：可以指望有一個更好的政府，人民群众的水平將能提高，工業和文化將獲得發展，而帝國主義統治所必然會帶來的恐懼和鎮壓氣氛將消除。英國政府和印度文官處雖然有力量將它們的意志強加在印度的頭上，卻沒有辦法或能力來解決印度今天的難題，更不要說未來的難題了，因為它們的基礎和根據是全都錯的，同時它們與實際也失去了聯繫。一個政府或者統治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才能，或者代表着一個將逝的秩序，是無法長

期將意志强加于人的。

阿拉哈巴地震救济委员会派遣我去訪問地震受灾地区并报告当地所采取的救济工作的方法。我立刻独自自动身前往。我在这些受到灾害的土地上四处奔走了十天。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旅程，在这段时间內我睡得很少。从早上五点钟几乎到午夜，我們都無时不在忙着，有时乘着汽車在龟裂而皺折的道路上奔馳，有时遇到桥塌了而道路又因地平面的变动而陷在水下时，就乘小船前进。市鎮上到处一片瓦礫，道路破爛不堪，有的像被一只巨手扭弯了，有的隆起得比兩旁房屋的基石还要高，叫人触目惊心。水和沙石曾从这些道路上巨大的裂口中涌出，將人和牲畜冲走。除了这些市鎮，連一向有比哈尔花园之称的北比哈尔平原也是一片荒凉与破落的景象。有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沙石、大片大片的水、巨大的裂縫和許許多多小坑口，沙石和流水都是从那里面冒出来的。乘飞机飞过这个地区的一些英国官吏說，它和战时及战事初結束时法国北部的战場有些相似。

那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經驗。地震以猛烈的兩边摆动开始，將每一个站着的人都撞倒了。接着来了上下震动和巨大的轟隆声和反响声，犹如大炮一齐發射或者成百架飞机掠过天空一样，接着許多地方水从巨大的裂縫和坑口中涌了出来，一直漲到十至十二英尺深。所有这一切大概只持續了三分鐘或三分鐘略为多一点的时间就逐漸平息下去了，可是这三分鐘已經够可怕的了。無怪乎許多目睹的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在許多城市中，到处是房屋倒塌的声音，流水四处汹涌，空气中布滿塵埃，几碼以外就看不见人。在农村地区塵埃不那么大，可以看得較远些，可是当时并没有冷眼旁觀的人在那里。幸免于难的人都惊惶万分地直躺在地上或

者不住地滾动。

地震十天以后挖出了一个十二岁的活着的小孩子（我记得是在穆柴法尔浦），他受了極大的震惊。当他被崩塌的东西撞倒而封闭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世界已经完了，而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在穆柴法尔浦，正当房屋倒塌、四周成百的人紛紛死去的地震时刻，一个女嬰誕生了。年輕而沒有經驗的父母心神錯乱了。但是据我得悉，母女兩人后来都平安而幸福。为了紀念地震，嬰兒取名叫卡姆波·德維(Kampo Devi)。

蒙吉尔城是我們旅行所到的最后一地。我們走了許多路程，几乎到了尼泊尔的边境，我們看見了許多令人难过的景象。我們已經看慣了大規模的廢墟和殘破景象了。但是当我們看見蒙吉尔这个富饒的城市所遭受的徹底毀灭时，我們对那慘狀張口結舌，战栗不已。我永远也忘記不了那恐怖的景象。

在整个地震地区，無論在城市中或者乡村中，都可以痛切地感到居民之間沒有一點自救。也許城市中的中产階級在这方面最有罪过了。他們全都等待着旁人——政府或者非官方救济機構——来援救他們。其他願意出来服务的人認為，工作就是在人們中間發号施令。这种無从救起的感觉無疑一部分是出于地震的恐怖所造成的頹丧情緒，而这种情緒是会逐漸减退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从比哈尔其他地区及别的省份赶来的大批救济人員的勁头和能力。这些青年男女有效的服务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同时許多救济組織虽然是分散地进行工作，它們之間却有很大的合作。

在蒙吉尔，我大力号召加紧挖掘和清除瓦礫的自救运动。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些迟疑，可是它却成为一件成功的事。救济

組織的全体領導人都拿着鐵鍬和籃子出去挖了整整一天，我們挖出了一個小女孩的屍體。我在那一天離開蒙吉爾，可是挖掘工作仍然繼續下去，當地許多人都參加了，收到了很好的成果。

在所有的非官方救濟組織中，以拉金德拉·弗拉沙德為首的中央救濟委員會是最重要的了。這決不純粹是一個國大黨的組織，它已發展成為一個全印度的組織，代表着許多團體和捐助人。國大黨在鄉村中的組織都聽它調度，這是它的一個很大的方便。除了古甲拉特和聯合省一些地區以外，沒有哪一省中國大黨工作人員和農民的联系比得上比哈爾了。事實上，那裏的工作人員大多是農民出身；比哈爾是印度主要的農民省份，甚至它的中產階級都和農民有密切的联系。有時候，我作為國大黨的書記去視察國大黨比哈爾省省委會的機構的時候，以尖銳的語言批評了我們認為他們在管理機構上無效率與懈怠的地方。那裏有一種寧願坐着而不站着、寧願躺着而不坐着的傾向。那個機構是我所見過的最簡陋的一個，因為他們想不要通常機構的附屬部門來進行工作。我雖然對機構作了批評，可是我十分清楚，從國大黨的观点看來，這一省是全國最熱忱而忠心的省份之一。國大黨在那裏沒有吹噓過，可是它却獲得了農民堅決的支持。甚至在國大黨全印委員會內，比哈爾的委員也很少在某件事情上採取過跋扈的態度。他們對自己置身在委員會里，似乎有點吃驚。可是在兩個和平抵抗運動中，比哈爾的成績都是輝煌的。就在後來的個人和平抵抗運動中，它也是做得很好的。

救濟委員會利用這一個良好的機構來和農民接觸。在鄉村地區沒有其他一個機構，甚至包括政府在內，能夠這樣有用。救濟委員會和國大黨比哈爾組織兩者的領導人都是拉金德拉·巴布，他

是比哈尔众望所归的首領。他外貌像一个农民，他是一个典型的比哈尔土地上的子孙。乍見面并不給人什么印象，除非注意到他那敏銳而坦率的眼睛和誠懇的面容。人們不会忘記那个面容和那双眼睛的，因为真理透过它們望着你，并且对于它們是無可怀疑的。由于像个农民，他也許在眼界上有点狹窄，从現代世界的观点看来有点嫌不够老于世故；可是他的杰出才能，他的無限率直，他的充沛精力和他对爭取印度自由的事業的忠誠，都是使他不只在他自己省內而且也在全印度受人爱戴的品質。沒有一个人在印度任何一个省內能完全像他在比哈尔那样处于一个一致公認的領袖地位。很少有其他人——如果有的話——可以說比他更徹底地領會了甘地精神的真諦。

有他这样一个人来領導比哈尔的救济工作，真是值得庆幸的；同时由于对他的信賴，全印度各地將大量的金錢源源寄来。他虽然體質衰弱，可是仍然全力进行救济工作。他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每个人都来向他請教，結果他操劳过度。

我在地震区域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剛要动身以前，十分驚訝地看到了甘地的一項声明，說地震是对歧視賤民的罪孽的懲罰。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震动的言論，所以我欢迎并且完全同意泰戈尔对它的回答。真难設想一个比这更加与科学相抵触的說法了。关于感情状态和心理活动对物体的影响，也許今天連科学也不会絕對地武断。內心的震动可能使一个人消化不良或者有其他更坏的后果。但是認為人类的一个風俗或者缺点会对地壳的运动有所影响，这是叫人惊愕的事。罪孽与神罰的概念以及人对宇宙現象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說法把我們拖回到几百年以前去了，那时候“异教徒裁判所”在欧洲横行，它們因为乔尔丹諾·布魯諾科学的

異說而將他燒死，并且將許多女巫處以火刑。甚至在十八世紀的
美國，波士頓首要的神學家都認為馬薩諸塞州的地震是由于避雷
針的冒瀆神明而引起的。

但是如果地震是神明對罪孽的懲罰，我們如何能知道我們是
因為什麼罪孽而受到懲罰的呢？啊呀，我們該贖償的罪孽多着呢！
每個人都可以有他所偏愛的一種解釋；我們可能是由于屈服于異
族的統治而受到懲罰，也可能是由于容忍了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制
度而受到懲罰。杜布漢加的大君——大塊地產的業主——在金錢
上來說地震的主要受害之一。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對地主制
度的天罰。這種說法比說比哈爾一些無辜的人民代替南印度人民
歧視賤民的罪孽受了難，也許要中肯些。為什麼地震不發生在歧
視賤民的地方呢？英國政府也許可以說，這個災難是神明對和平
抵抗運動的懲罰，因為事實上受地震損失最大的北比哈爾，在爭
取自由的鬥爭中是最積極的。

我們可以照這樣無休止地推測下去。於是又自然地會發生這
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去干預上帝的作為呢？為什麼要想以我
們人道的努力來減輕神的旨意所造成的後果呢？同時我們開始懷
疑為什麼上帝要與我們開這麼一個殘酷的玩笑：他使我們滿身是
缺陷，他以羅網和陷阱包圍着我們，他創造了一個悲慘而殘酷的
世界，他造出猛虎和羊羔，而他又要懲罰我們。

“當星星投射出箭戟般的光芒
它們的淚水洒遍上天的時候，
他會看着他的造物而發笑嗎？
他造了羊羔，也造你嗎？”

在巴特那的最後一晚，我和許多從各省聚集到此地為救濟工

作服务的朋友們一直熬到深夜。联合省有許多代表在那里，我們一些优秀的同志都在那里。我們討論了一个当时使我們为难的問题：我們应当从事地震的救济工作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說，政治活动至少要撤退相同的程度。救济工作非常紧迫，我們不能馬虎地处理，可是完全投身在其中又会使积极的政治活动長期陷于停頓，那對我們省在政治上必然会有坏的影响。虽然在国大党的圈子里人是很多的，可是起作用的人在数目上总是有限的，也是难以割舍的。然而地震的善后工作的需要也不能忽視。以我來說，我不打算完全投身于救济工作。我覺得做这个工作是不会缺人的，可是从事更危險的活动，人就很少了。

所以我們談論到深夜。我們討論了上次的独立日，为什么我們有些同志被捕了，而我們却逃脫了。我大笑着告訴他們，我已經十分穩当地發現了武力政治的秘密。

二月二日我回到阿拉哈巴家中，感到旅行之后倦累不堪。十天辛苦的日子使我的形容枯槁如鬼，我的家人看着都吃了一惊。我想开始为阿拉哈巴救济委员会撰写我的旅行报告，可是睡意压倒了我。在接着的二十四小时中，我至少睡了十二小时。

第二天下午，卡麦拉和我吃完了午茶，普魯紹坦·达斯·坦頓剛来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正站在廊檐下，只見一輛汽車駛来停下，里面走下来一个警官。我立刻知道我的时候到了。我迎着他走去，說道：“我已經等了你好久了。”他有一点抱歉的样子，說这不能怪他。拘票是从加尔各答来的。

出獄五个月又十三天，現在我又要回到幽居独处的生活中去了。可是真正的負担并不在我的身上，像以往一样，它得由妇女們来承担——那就是我病中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妹妹。



第五十九章 阿利波尔监狱

“良辰一去才有多久？
我仍然又像薊草上的花球，
任憑輕風的吹蕩，
誰會友情地指示我方向？”

——罗伯特·勃朗宁

当天晚上我被送到加尔各答。一輛大囚車把我从豪拉車站押到拉尔·巴沙尔警察局。关于加尔各答这所有名的警察总局的文章我已經看过很多，这会兒我朝四下里一望，很觉有趣。我看見为数很多的欧洲警佐和巡官，显然比在北印度任何一所警察总局里的要多得多。那些警察好像差不多都是从比哈尔或联合省的东部各区来的。很多次我坐着大囚車往返法庭，或是从一个监狱押到另一个监狱，总有他們一些人陪着我。他們滿臉是極不痛快的神情，厭惡自己的職業，显然对我是深表同情的。有时他們的眼里还含着眼泪。

起初我被关在省监狱里，从那里被提到省审判長法庭去受审。我这回是初次經驗。审判室和整个建筑与其說像一座公开法庭，不如說更像一座被包圍的堡壘。除了几个新聞記者和照例必有的律師之外，附近不許放一个外人进来。出庭的警察人数相当多。这些安排显然不是專門为我准备的，这是照例文章。在我被帶进审

判室的時候，我得走過一條很長的過道（在審判室里），過道頂上和兩邊都釘上嚴密的鐵絲網。走進這裡好像穿過一個籠子似的。被告席離審判官的坐位很遠。屋里擠滿了警察和穿着黑袍的律師。

對於法庭審訊，我是司空見慣了的。以前我許多次受審是在監獄里舉行。可是那裡總看到一些朋友、親戚和熟識的面孔，而且整個氣氛也比較輕鬆一點。警察通常不露面，也沒有像籠子那樣構造的東西。這裡却大不相同了。我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們和我毫無共同的地方。這群人的外貌並不動人。恐怕穿黑袍的律師全體都是不美觀的，而違警法庭的律師似乎另有一付特別不討人喜歡的面孔。最後我总算在那黑色行列里認出一個熟識的律師的面孔，可是他又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在開審前坐在外面陽台上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寂寞和孤獨了。當時我的脈搏的跳動一定有點急促，心裡也沒有像過去受審時那樣的鎮靜。當時我吃了一驚，認為甚至像我這樣一個對審訊和判罪有着多次經驗的人在那種情況下竟會反應失常，那麼年輕而無經驗的人將會感覺多么緊張呢？

一坐到被告席上我反感覺好得多了。跟往常一樣，這裡沒有人提議給我辯護，我宣讀了一篇簡短的聲明。第二天是二月十六日，我被判刑兩年。於是我的第七次監禁開始了。

回顧我五個半月釋放在外的時光，我感到相當心滿意足。那一段日子還算利用得不錯，我总算辦完了幾件正事。母親的病已有轉機，已經脫離了目前的險境。妹妹克里西娜結婚了。我女兒的日後教育問題已經安排妥當。家庭和經濟的困難我已經解決了一些。許久沒過問的私事也都料理了一下。在公眾的事情方面，我明白當時誰也不能有多大作為。但在堅定國大黨的態度以及引

導黨在若干程度上從社會和經濟方面去看問題這方面，我至少出了一點力。我在浦那同甘地的通訊以及後來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已經產生了影響。關於教派問題我所寫的文章也產生了好的效果。而且在兩年多之後我又會見了甘地同其他友人和同志；我自己已經準備為另一個時期貢獻一生的精力了。

我的心頭還留下一個疙瘩，就是卡麥拉的病體。我當時還不知道她的病已很重，因為她有一個脾氣，非到搞垮身體，否則還是要堅持下去。但是我已很擔心。我一面卻又希望：既然我在牢里，她正好一心一意去治病。等我出獄時，她要治病就比較困難了，那時她是不願意和我長久分開的。

我還有另外一件憾事。我抱憾我沒有到阿拉哈巴區的農村去過一次。許多青年同事因為執行我們的指示最近在那裡被捕了，我覺得沒有跟隨他們到那個區里去似乎對他們是背信棄義的。

我又被囚車帶回監獄。路上我們遇着許多正在行軍中的軍隊，他們配備着機槍、裝甲車等等。我從囚車的小洞里睜見了他們。當時我想，好難看的裝甲車啊，好難看的坦克。它們使我想起來前期的怪物，像恐龍一類的東西。

我從省監獄轉移到阿利波爾中央監獄，這裡我被安置在一間大約十英尺長九英尺寬的小牢房里。牢房前面有一個廊檐和小院。小院四周是矮圍牆，大約有七英尺高。從牆上望過去我看到一種奇怪的景象。各色各樣的怪房子——一層的、兩層的、圓形的、長方形的、有奇形怪狀的屋頂的房子——從四面八方樹立起來，高矮不等。好像這些建築是一幢一幢增加的，為了利用空間隨便湊起來。它們有點像一付拼圖板，或者像未來派異想天開的作品。可是我所說這一切建築都是有條不紊地安排好的，以一座高塔（這是為基督

徒的犯人們設的教堂) 为中心, 其他建筑从这里向外分布开去。因为这是城市監獄, 所以面积受到限制, 一英寸地皮都得加以利用。

在我最初看到四周圍那些异想天开的建筑, 神智还没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又看见一种可怕的景象。正对着我的牢房和院子有两根烟囱吐着烏黑的濃烟, 有时風把烟向我吹来, 几乎把我熏死。这两根是監獄厨房的烟囱。后来我对典獄長建議要他供給防毒面具应付这种攻势。

玩賞阿利波尔監獄紅磚房子那样一成不变的景色而且吞吸着厨房烟囱的烟气, 这种情景一开始就使人不愉快, 日后的憧憬也不見得动人。院子里沒有树木, 也沒有青草。除了每天的烟末外, 地面上鋪得平整干淨, 光秃秃地毫無生气。我只看見隔壁院子里一两棵树木的树頂。在我入獄的时候, 树上光秃秃地沒花沒叶, 但逐漸就發生了奇异的变化, 树枝上到处鑽出了細小的嫩芽。嫩芽中間出現了叶子, 叶子長得很快, 欣欣向荣的綠色盖滿了光秃的树枝。这是可喜的变化, 連阿利波尔監獄也显得生气勃勃。

有一棵树上有一个鳶鳥的巢引起我的兴趣, 我常常注視着它。小鳶鳥正在生長, 學習动作。有时它們迅速而且准确地突然飞下, 从犯人的手里, 几乎从他的嘴里攫取面包。

从日落到日出 (差不多是这样) 这段時間我們都被关在牢房里, 漫長的冬夜真是不容易过呀。我对連續几小时的讀書或写作感觉疲倦, 于是就在小牢房里踱来踱去, 只走上短短的四、五步就得回头。我想起动物园里的狗熊在籠里来往走动的情形。有时在我特別感觉厭倦的时候我就采用我那心爱的治疗法: “倒立”!

每天在天才黑的时候相当安靜, 城市的喧囂常常傳送进来, 如電車、留声机的声音, 或者远处的歌声。这种輕微、遙远的音乐是

很好听的。但是入夜却反而不安靜了，因为值班的警衛来回走动，而且每小时总要来做一次檢查。監獄官帶着灯到各处巡視，看看我們有沒有人逃跑。每天早晨，也可說是夜里三点鐘吧，总有一陣大騷动，这是一陣強烈的磨擦和洗刷的声音，原来是厨房里的人在开始活动了。

阿利波尔監獄也像省監獄似的有許多看守人、警衛、監獄官和干事。這兩個監獄容納的人數大約等于內尼監獄的人數，即二千二百到二千三百，但每個監獄的職員人數恐怕比內尼監獄的要多一倍以上。这里有許多歐洲籍的看守人和退伍的印度陸軍軍官。显然，大英帝国在加尔各答的措施比在联合省更加紧严，也更加糜費。帝国威力的标志和永久的遺痕表現在高級官員降临时，犯人必須喊的口号。口号是“向政府致敬”，喊的声音拖得很長，喊时还做出某种动作。犯人喊口号的声音每天有好几次从院牆外傳过来，特别是在典獄長每天走过的时候。我对着那堵七英尺高的院牆，正好望見典獄長經過时他打的那把官傘的頂子。


像“向政府致敬”这种特别的口号和那附帶的动作难道是古代的遺物嗎？我不清楚。或者是哪位敏悟的英国官員的發明吧？这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它是英国人的發明，因为它帶着十足的英一印腔。幸亏这个口号除了在孟加拉和阿薩姆外，沒有傳播到联合省的監獄，可能也沒到其他省份。这样被强制地向政府的威力高喊敬礼，在我看来似乎是極端的屈辱。

在阿利波尔我看到有一件改进的事情，使我感到高兴。这里普通犯人的伙食比联合省監獄的好得多。关于監獄伙食这方面，联合省比其他許多省份都要差些。

短短的冬季不久过去了，春季也如飞似地过去，于是夏季开始

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我是一向不喜欢加尔各答的天气的。甚至在那里才过几天就感到厭膩和無精打采。監獄的情形当然更加惡劣，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毫無一点起色。在那样的气候里沒有地方鍛練身体以及長時間的禁閉，大概有点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我的体重很快下降。我是多么憎恨一切鉄鎖、門門、獄欄和壁壘啊！

在阿利波尔一个月后，我获准在院外鍛練身体。这个改变是很合我意的，我可以早晚都沿着正面牆壁来回散步。逐渐地我对阿利波尔監獄和加尔各答的气候習慣了；甚至连厨房的黑烟和劇烈的騷动也变成了可以忍受的討厭东西。可是我的心又被別的事情占据着，憂愁满怀，因为外面傳来了不好的消息。



第六十章 东方和西方的民主

我在阿利波尔被判罪以后不准再看报纸，这使我大吃一惊。在审讯期间我收到加尔各答的日报“政治家”，可是审讯结束的第二天就停送了。在联合省，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级犯人或第一类犯人准许看一种日报（由政府选择）。其他大多省份都是这样，因此我满以为孟加拉省也有同样情形。可是这里却以“政治家”的周刊代替日报来给我。这种周刊分明是给已经回到英国的退休官员或商人看的，上面登载的也许是对他们有兴趣的印度新闻简报，但根本不登国外消息，使我在这方面形成严重的脱节，因为我是一向密切注意国外消息的。幸而我获准看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的周刊，这才使我对欧洲和国际事务保持接触。

我在二月里被捕和受审讯，那时欧洲正发生动荡和激烈斗争。法国掀起了骚乱，引起法西斯暴动和“国民”政府的组成。更加糟糕的是奥地利的陶尔斐斯总理枪杀工人，摧毁了奥国社会民主的伟大堡垒。奥地利这场流血案的消息使我深感颓丧。这个世界成了多么可怕的血腥场所啊！人类为了保全他们的既得利益变得多么野蛮啊！法西斯主义好像正在整个欧洲和美洲发展。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时候，我曾经幻想他的政权决不能持久，因为他没有提供解决德国经济困难的办法。因此在法西斯主义弥漫各地的时候，我曾经安慰自己，说它是反动力量在临死前的挣扎。随之而来的

一定是掙脫枷鎖。但我又开始怀疑，是不是由于我的希望才产生这种思想呢？是不是已明显看出法西斯浪潮很容易或很快就会退却呢？即使环境已不容許法西斯專政存在下去，难道法西斯專政不会拿它們的国家来孤注一擲，而会甘心屈服嗎？如果發生冲突，它的后果又是怎样呢？

同时，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正在蔓延开来。西班牙，那个新兴的“正直人的共和国”——有些人把它称之为“曼徹斯特衛报”式的政府——已經大大地向后倒退，陷入反动的深渊。它的正直的自由党領袖們所講的一切漂亮話都沒有能阻止它向下溜去。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表明它毫無能力来应付現代的环境。它依靠語言和詞藻，以为語言和詞藻可以代替行动。当危机来到的时候，自由主义簡直像放映完了的电影一样黯然消逝了。

我讀了“曼徹斯特衛报”上关于奥地利悲剧的几篇社論，感到濃厚的兴趣和欣賞。“从这场流血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奥地利呢？一个被欧洲最反动的集团用步槍和机槍所統治的奥地利。”“但是，如果英国主張自由，那么英国的首相为什么很少說話呢？我們听見了他对独裁政治的贊揚，听見了他說独裁政治如何‘保全民族灵魂’，如何‘赋予新的憧憬和新的力量’。但英国的首相总該談一談暴政才是，無論它發生在哪个国家，这种政治常常殘害肉体，而殘害灵魂則更是常事，更加殘酷。”

如果“曼徹斯特衛报”主張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当自由在印度遭遇摧殘的时候，它就很少說話了呢？我們遭受的也不仅是肉体的痛苦，而且还有特別殘酷的灵魂上的折磨。

“奥地利的民主虽然被摧毀了，可是它是在奋起抵抗中倒下去的，这是它永久的光荣，因此产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迹，在未来的岁

月里，有一天它会把欧洲的自由精神重新鼓动起来的。”

“不自由的欧洲已經停止呼吸了；再沒有健康的精神往返交流了。空气已經逐漸悶人。只有激烈的動蕩，或感情的迸發，以及左右的冲击才能避免即將到来的心理癱瘓……从萊茵河到烏拉尔，欧洲变成了一座大監獄。”

多么动人的詞句呀，它激起了我內心的反响。但我不明白：对于印度又是怎么样呢？“曼徹斯特衛報”或者那些的确生存在英国的許多热爱自由的人怎么对我们的命运竟然漠不关心呢？他們在別处激昂慷慨譴責的东西，怎么在我們这里就熟視無睹呢？有一位偉大的英国自由党領袖受过十九世紀的傳統教育，生性謹慎，說話檢点，二十年前在大战前夕曾經說过：“我宁願看見我們这个国家从历史上一笔勾銷，而不願默默無言地看到强力战胜法治”。好一个大胆的想法，講得也很动听，因此英国成百万的勇敢青年一致表示拥护。但是，如果一个印度人敢于說出像阿斯奎斯先生所說的話，他会遭遇到怎么样的命运呢？

民族心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們大多数人总以为自己是多么公平無私，犯錯誤的总是別人，別的国家。我們心里暗暗相信自己不同別人一样，这个差别往往因为礼貌关系我們不便強調而已。如果我們幸而生为一个帝国种族的人民，掌握着別的国家命运的話，那我們就难免不自以为一切都是为我們这最优秀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而設的，并以为那些煽动改革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或是受人蒙騙的傻瓜，他們受了我們的恩典而不想报答。

英国人是島国民族，多年的成就和繁荣使他們几乎藐視一切。有人說：在他們的眼里看来，“从加来起都是黑人”，但這句話还太籠統。也許英国上層階級多少是照这样来划分世界的：（一）不列

顛——一大段空白之后接着是(二)不列顛的各自治領(單指白種人而言)和美国(單指盎格魯—薩克遜人而言,不包括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等等在內), (三) 西欧, (四) 欧洲其他部分, (五) 南美洲(指拉丁种族), 一大段空白之后接着是(六)亞非二洲的棕、黄、黑种族人民, 全部放在一堆。

我們这些最下層的人距离我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是多么遥远呀! 他們向我們看时眼力模糊, 當我們談民主和自由时他們在惱怒, 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字眼本来不是为我們創造的。不是有一位自由党的大政治家叫約翰·莫萊的, 曾經宣稱过即使到了遥远渺茫的將來他也不能想像印度会有民主制度嗎? 民主之于印度好像加拿大的皮襖一样, 对它的气候是不适宜的。后来在一九二四年英国工党——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旗手和被压迫的下層人的保护者——正当它全盛的时期, 給我們恢复了孟加拉法令, 等到它第二次当政时我們的命运更加糟糕。我完全相信工党里并没有人对我們怀有惡意, 而且当他們以極美妙的說教姿态称呼我們为“真正亲爱的弟兄們”的时候, 他們的确是滿腔誠意。但在他們看来, 我們和他們不是同类, 必須用別的标准来衡量我們。由于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別, 英国人同法国人的思想很难一致; 何况英国人同亞洲人之間的差別更加大得多呢?

最近上院对印度改革問題进行了辯論, 高貴的議員先生們發表了許多漂亮演說。其中有一位是李頓勳爵, 他曾任印度一个省的省長, 并代理总督一个时期。他常常被人称为一位有自由思想和同情心的省長。据說他曾經講过[⊖]: “印度政府在整个印度的代

⊖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院。

表性远远胜过国大党的政客。印度政府能够以官員、陸軍、警察、土邦王公、战斗部队，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名义来講話，而国大党的政客們甚至不能代表一大部分印度人講話。”他接着把他的意思講得十分露骨：“当我提到印度輿論，我指的是那班人，他們的合作我是必須依賴，并且后任的各省省長和总督也必須依賴。”

从他的講話里出現了兩個有趣的論点：合乎資格的印度是指那些給英国人效劳的人們；印度的英国政府在印度最有代表性，因而也是最民主的团体。把这个論点認真地提出来，說明英国文字一过了苏彝士运河好像連意思也改变了。进一步推論下去，显然会得出这种結論：專制政府是最有代表性的和最民主的形式，因为国王代表大家。这就是恢复神授的君权和“朕即国家”的制度。

事实上，即使純粹的專制政权最近也有出色的拥护者了。印度官場中的漂亮人物馬尔科姆·海萊爵士曾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在貝拿勒斯以联合省省長的身分講演时替印度各土邦的專制政权辯护。这样的劝告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根本沒有一个印度土邦会自願放弃它的專制政权。有趣的是有人企圖以欧洲的民主政治正在垮台为借口主張保存我們这里的專制政权。买索尔土邦宰相米尔薩·伊斯迈尔爵士对“議會民主政治正在各地宣告垮台时，有人主張实行根本改革一事，表示惊异”。“我相信我們土邦的良心上会觉得我們目前的宪法在一切方面实施起来都是十足民主的。”[⊖] 买索尔土邦的“良心”大概是为該土邦的王公及其土邦宰相而設的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吧。目前在买索尔土邦流行的民主是同專制政权沒有什麼区别的。

⊖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买索尔土邦的講話。

如果民主不适宜于印度，那也同样不适宜于埃及，我刚好在“政治家”报（这是现在监狱里供给我的一份日报）上读到从开罗来的一条长消息，据说迺錫姆·巴夏总理“目前使有责任心的人士中间发生了不小的惊讶，因为他宣布了希望各个政党——特别是华夫脱党——间的合作，以便召开国民会议，或者举行国民会议的选举，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制定新的宪法。归根结蒂，这样做只能是……恢复人民民主政府的统治，而这种统治，历史已经证明它对埃及永远是有害的，因为它在过去迎合了乱民的极猖狂的心情……凡是对埃及政治和埃及人民的内部活动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将是华夫脱党以多数选票而卷土重来。因此如果我们不设法制止这个程序，不久我们又将忍受一个极端民主的、排外的革命政权了。”

于是有人建议这次选举应该用行政压力来“举行”，作为“对抗华夫脱党的力量”，不幸的是埃及总理的“守法观点太强”，不肯做这一类事。据说，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英国政府出来干涉，并且“宣称它不能容忍恢复这种政权”。

英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步骤，不采取哪些步骤，或者埃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这种论点由一位仿佛是爱好自由的英国人提出来，这倒真正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了埃及和印度局势的一些复杂情况。正如“政治家”报在社论里所指出的：“根本毛病在于一个普通的埃及选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同发展民主的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是不调和的。”该报进一步说明缺乏调和的原因：“在欧洲因为政党太多，民主政治常常解体；而在埃及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埃及普遍展开了反对英国占领的政治暴动。

困难却在于它只有华夫脫这一个党。”

在印度，有人对我们說：我們的教派分歧阻碍了我們的民主發展，因此按照不可爭辯的邏輯，那种分歧是永無休止的。他們又說我們團結得不够。埃及是沒有教派分歧的，似乎那里普遍实现了最完美的政治团结。可是，正是这种团结成为民主和自由的阻碍！民主的道路真是笔直而狹窄啊。对一个东方的国家說来，民主似乎只指一件事情：奉行帝国主义統治者的命令，不要触犯它的絲毫利益。唯有服从这个条件，民主的自由才能繁荣滋長，無阻無碍。



第六十一章 凄 凉

“我渴望躺在青草上，
青草清凉而芬芳。
母亲啊，依傍在你脚下的孩子，
疲劳驱散了他的梦想。”

四月到了。外間發生事件的謠言傳进了在阿利波尔的我的监房，这些謠言是令人不快而且不安的。有一天典獄長偶然告訴我甘地先生已經撤銷了和平抵抗运动。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許多年来对我極关重要的事情竟这样結束，真使我感到悲伤。但我劝慰自己說，这样的收場是必然要来的。我心里明白和平抵抗运动早晚要結束，至少是暫时的結束。个人可以不顧一切后果，無限期地坚持下去；但全国的組織却不能这样做。甘地正确理解了国内人民以及大多数国大党党员的心情，这一点我沒有怀疑。我并且企圖适应这种新的發展，虽然这是令人不愉快的發展。

我也隱約听到关于恢复旧的自主党以便加入立法機構的新的动議。这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老早就認為国大党不能超然于未来的选举之外。在我被釋放出獄的五个月期間，我曾經企圖抑制这种傾向，因为我認為这样做为时过早，并且可能轉移大家对直接行动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新思想發展的注意力，这种新思想

在国大党党员中間正在滋長。我認为危机迁延得越久，这种思想在我們的群众和知識分子中間就散布得越广，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局势的实际情况就暴露得越显著。正如列宁不知在哪里曾經說过的：“任何一次政治危机都是有用的，因为它暴露那些隱藏着的东西，显示政治中的真实力量；它揭穿誑語、欺人之談和虛構的事情；它全面地說明事实，使人民了解什么是现实。”我曾經希望这段过程会使得国大党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更加清醒、組織更严密的团体。有些比較脆弱的分子可能脫党，这并不算什么損失。等到連理論的直接行动也應該停止，并恢复所謂宪政和合法的方法的时候，国大党的先进的而且真正积极的一派就会根据我們的最后目标从大处着眼来利用这些方法。

这个时候显然已經来到了。但使我惊駭的是，我發現曾經在和平抵抗运动中以及在国大党里做实际工作的骨干分子都退居一旁，而一些沒有起过这种作用的人們却在發号施令。

过了几天“政治家”周刊送来，我讀到甘地在撤銷和平抵抗运动时所發表的声明。我感到惊讶而且意气消沉。我一讀再讀，和平抵抗运动和其他許多东西在我的腦子里消失了，但却充滿了別的怀疑和矛盾。甘地写道：“这篇声明是我同坚持真理社的人和同道者私人談話中所得到的啓發写出来的……特別是我从討論一位可貴的多年伙伴的談話中所得的啓示，这位伙伴不願意执行監獄中的全部劳役，他喜欢閉門讀書，而不喜欢接受分派給他的任务。这無疑是違反了坚持真理的規条。与其說是我心爱的朋友的缺点，我痛心地感觉到还不如說是我自己的缺点。这位朋友說他以为我發覺了他的弱点。其实我瞎了眼。做領袖的瞎了眼是不可原諒的。我立即發覺我必須暫時不在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和平抵抗

运动里担任唯一的代表。”

这位“朋友”的缺点也好，錯誤也好，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承認我自己常常有缺点或錯誤，而我是完全不介意的。即使錯誤严重，难道一件直接关系几万人，間接关系几百万人的巨大的全国运动因为一个人犯了錯誤就要宣告中止嗎？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怪誕的提議，也是不道德的提議。我不敢妄談什么是真理和什么不是真理，但是按照我自己不足挂齿的做法，我是一向竭力遵循某些行为的准則的，而这一切准則却被甘地这篇声明所震动，而且全盤推翻了。我知道甘地往往憑着本能（我宁願叫它作本能而不願說它是“內心的呼声”或者是祈禱的回音）行事，他的本能时常是正确無訛。他屢次表現他善于察覺群众的心理和相机行事的惊人本能。事后他說明他的行动的一些理由通常是他后来追想的，很少时候使人十分信服。凡是一个領袖或是活动家遇到危急的时候，他的行动几乎总是下意識的，事后再替他的行动寻求理由。我也感觉甘地中途停止和平抵抗运动做得很对。但他提出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是欺人之談，而且对一个民族运动的領袖來說，这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作法。他完全有权随便怎样对待他的社里的人；因为他们已經立过各种誓言，而且接受了某种法規。但国大党却没有这样做，我自己也沒有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我們要因为那种在我看来是抽象的、神秘的理由，而且是不感兴趣的理由而被反复播弄呢？我們能够想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政治运动嗎？我曾經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我所了解的关于真理的道德观点（我承認是在某种限度之內的接受）。这个基本观点使我感动，因为它好像把政治提到了更高、更尊崇的水平。我承認目的不能証明各种手段的正确。但这次新的發展或者解釋似乎影响更加深远，而且將來

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会使我感到惊駭不置的。

他这整个声明使我大为惊駭和苦惱。最后他給国大党员的忠告是：“必須学习自制和安貧的艺术和美德。必須参加建設国家的活动，以手紡手織来推广土布，以潔身自好的个人行为同各界人士相处，来扩大教派間的心灵团結，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触的骯髒，以亲自接近飲酒和吸毒的人并普遍培养个人純潔来开展戒酒和戒吸毒品。这些工作可以使得穷人維持最低标准的生活。那些不在最低生活标准之內的人們，会在具有全国重要性的、但無組織的小規模工業中得到一个职位，賺到較高的工資。”

这就是我們要遵循的政治綱領。他和我之間好像橫梗着極大的距离。一想到多年来維持我对他忠順的那根帶子忽然中断，我的心如刀割。这种內心的斗争一直繼續了很久。我对甘地的所作所为并不十分了解或贊賞。在和平抵抗运动中間，当他的同志正在奋力斗争的时候，他实行的絕食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的集中精力；他个人的以及咎由自取的混乱，使他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就是在他出獄之后，他宣誓不参加政治运动；他所表示的新的忠誠和誓言，抹煞了他和許多同事共同执行而尚未完成的旧的忠誠、誓言和任务——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苦惱。在我出獄的短时期中，我比平时更加感觉到这些分歧和另外一些分歧。甘地曾經說这是我們兩人性情上的差別。恐怕这不只是性情上的差別，我深知我在許多事情上面有着清楚而明确的意見，是和他的意見正相反的。但是过去我竭力使这些意見服从我所認為更大的忠誠，那就是国大党好像正在爭取的民族自由的事業。我竭力要对我的領袖和同事們效忠守信，因为，在我的心灵里，对事業和对同事的忠誠具有崇高的地位。当我感觉我正在脫离我的精神信念的約束的时候，

我內心里發生了多次斗争。总算得到妥协。也許我做錯了，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脫离那种約束。但在思想斗争中我还是坚持对同事們的忠誠，并希望事情的驟变和我們斗争的發展可能解决我感覺苦惱的困难，而且使同事們比較接近我的观点。

可是現在呢？我在阿利波尔监房里突然感覺非常凄凉。生活好像变得陰暗，变成一片寂寞的荒原。在我所吸取的許多艰苦的教訓中，我現在面对着的是最艰苦的教訓：到了重要关头，任何人都不能信賴。我只能孤独地历尽一生，信賴別人就会使你痛心。

我的日积月累的煩惱有一部分轉向宗教和宗教观点。我想，宗教真是思想清醒和目标坚定的敌人啊，它不是以感情和热情为基础的嗎？假定宗教是精神的，可是它距离真正的灵性和精神的事物又多么遙远啊。宗教着眼于另一世界，它不大关心人的价值、社会价值和社会正义。由于它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宗教有意不看现实，唯恐现实会同它的观点格格不入。宗教植根于真理，但它自信已經發現真理，而且是真理的全部，所以它再也不耐煩去寻求真理；它所关心的只是把真理傳布給別人。服膺真理同相信真理并不是一回事。宗教口談和平，但它所支持的無非是为暴力而設的制度和組織。它譴責武器的暴力，但它怎样对待那种靜悄悄的，常常披着和平外衣而来，但却害得人飢餓死亡的暴力呢，尤其是那种杀人不見血地蹂躪人的意志，摧殘人的精神，破坏人的心灵的暴力呢？

于是我又想到那个引起我內心混乱的人来了。以甘地那种令人惊奇的，难以抵禦的魔力以及他那控制人的微妙力量來說，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著作和言論远不能表达他本人的真实面貌；他的人格远远超过他的著作和言論使人想像的那样偉大。他对印度的功績又是多么宏偉！他培养了印度人民的剛毅和胆量，

紀律和堅忍，為事業從容犧牲的魄力，並以他自己的謙虛，樹立他們的驕傲。他曾經說：膽量是性格的唯一真實的基礎，沒有膽量也就沒有道德、沒有宗教、沒有愛情。“受制於畏懼的人是不能服從真理或愛情的。”雖然他那樣害怕暴力，可是他曾對我們講：“胆怯是比暴力更可憎恨的東西。”他又說：“紀律是使人認真不苟的誓言和保證。沒有犧牲、紀律和自制就沒有解脫，也沒有希望。仅有犧牲而沒有紀律也是不能成事的。”僅僅這幾句話，也許還是陳腐的說教，但話裏面却有力量，而印度人知道這位身材矮小的人物是認真不苟的。

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現了這個受難的古老國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幾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點也正是印度的缺點。對他的輕視不能看作是對個人的事情，而是對這個國家的侮辱。那些輕率無禮的總督和其他的一些人都沒有認識到他們撒下了多麼危險的種子。我記得，當我最初聽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甘地參加了圓桌會議後，在回國途中遭到羅馬教皇拒絕接見的消息時，我受了很大的打擊。那次拒絕接見在我認為是對印度的侮辱，雖然這次侮辱不是預先安排的，但毫無疑問是有意為之的。天主教不同意在它的宗教之外還有聖者或超人，並且因為有些新教徒曾經稱甘地是偉大的聖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羅馬教廷更有必要和這個異端割斷關係。

正在這時，即一九三四年四月，我在阿利波爾監獄裏讀到蕭伯納新寫的劇本，其中“在岩石上”的序言和裏面關於基督同彼拉多辯論一節使我玩味不置。這篇東西好像含有現代的意義，那是另一個帝國面對另一位聖人。序言裏提到基督對彼拉多說道：“我告訴你，不要害怕。不要再對我講羅馬偉大的那套空話。你所謂羅

馬的偉大不過說明你的害怕而已。你怕過去，怕將來，怕窮人，怕富人，怕高僧，你怕猶太人和希臘人，因為他們有學問，你怕高盧人、哥德人和匈奴人因為他們是野蠻人，你怕迦太基，正因為你想解除你的畏懼所以你毀滅了它；現在你比從前更加害怕了，你怕你自己所樹立的偶像凱撒皇帝，你怕我這個受人虐待和揶揄的窮光蛋，你除了上帝的戒律以外什么都怕，你除了流血、武器與黃金以外什么都不相信。你代表羅馬，是一個徹底的胆怯者；我代表天國，擔當了一切，喪失了一切，但取得了一頂永恆的王冠。”

甘地的偉大，他對印度的功績，或者我個人對他極大的感激都是毫無疑問的。雖然如此，他有許多事情却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究竟他的目的是什麼呢？儘管許多年來我同他最為接近，但我並不明了他的目的。我甚至懷疑他自己是否明了。他說他只要走一步就夠了，他不打算瞻望將來，也不打算面前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注意手段，目的自明，這句話是他不憚煩地反復告人的。獨善其身，則一切皆得其所。這種態度不是政治態度或科學態度，或許連倫理態度也不是。精確地說，它是道德態度，它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善？善僅僅是個人的事情還是社會的事情？甘地完全強調品質而忽視智力的培養和發展。沒有品質的智力可能是危險的，但沒有智力的品質又是怎樣呢？究竟品質是怎樣發展的呢？甘地被人比作中世紀的基督教的聖者，他所說的話有很多似乎同這點吻合，但完全不適合現代的心理經驗和方法。

無論如何，我認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動要能收效必須導向明確的目的。生活不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而目的不得不時時改變以適應生活，但我們對於某種目的却必須永遠有先見之明。

我想，甘地对于他的目的并不像他有时从外表看来那样模糊。他朝着某一个方向热切地前进，但这是完全不合乎现代思想和环境的，直到现在他还不能使这两方面融合无间，也还不能安排好走向目标的一切步骤。因此他的目标显得模糊而不清楚了。但自从他在南非开始形成他的哲学思想以后，二十几年来，他的总趋向是很清楚的。我不知道他的那些早年著作是否仍能代表他的意见，我怀疑他的全部著作是否都能代表，但是它们的确帮助我们了解了他的思想背景。

他在一九〇九年的作品里说：“印度的得救在于抛弃它五十年来所学到的东西。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等都必须丢开；所谓上等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学习纯朴的农民生活，认识这种生活才是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他又说：“每逢我坐上火车或是公共汽车，我认为我是在做违背良心的事”；“打算用高度人工的、迅速的动力来改造世界是行不通的。”

这一切说法在我看来都是十分错误而且有害的教条，都是办不成事情的。这里面暗示着甘地对贫穷、痛苦和苦行生活的热爱和赞扬。他认为进步和文明不在于欲望的增加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而在于有意地、自愿地限制欲望，这样才能增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加强服务的能力”。只要我们承认这些前提，我们就容易掌握甘地的思想的其余方面，更加了解他的行动。但我们多数人不承认这些前提的，到后来发现他的行动不合我们的胃口的时候，我们却抱怨起来。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对贫穷和痛苦的赞扬的。我认为贫穷和痛苦毫无可取，而是应该消除。我也不把苦行生活当作社会理想来加以赞赏，虽然苦行生活也许适合个人。我了解而且赞赏的是

純朴、平等、自制，但不是肉体的受苦。我認为正像運動員須要鍛煉身体一样，我們也須要鍛煉我們的意志和習慣，對它們加以約制。期望一个任性縱欲的人能够忍受很多的痛苦，表現不同尋常的自制力，或者临危難如英雄，那是很荒謬的。在培养道德方面須要的工夫至少要同鍛煉身体一样。但这絕不是說要实行苦行或自我折磨。

我也毫不贊賞把所謂“純朴的农民生活”理想化。我对农民生活几乎产生恐惧，我自己不但不願接受这种生活，而且还要把农民也从这种生活中拯救出来，当然不是引导他們走向城市化，而是把城市的文化条件普及到农村去。这种生活絲毫不能給予我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几乎同囚禁一样。所謂“荷鋤的人”有什么可以使之理想化的呢？多少代以来，这班人受尽了摧殘和剝削，簡直同伴随他們的畜类沒有多大的区别。

“誰使他不懂得欢喜，也不懂得失望，
一个不知憂愁，不知有希望的东西，
痴呆、麻木，变成了老牛的兄弟？”

想脫离人的意志，回到意志变成沒有价值的原始狀況的这种打算，我覺得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正是人类引为光荣和得意的事情却遭到了污蔑和打击，而压制意志并阻碍它成長的物質环境却認为可取。現代的文明固然是充滿了邪惡，但也充滿了善，而且文明有能力可以摆脫那些邪惡。把文明連根鏟除就是剝夺文明的那种能力，讓我們回到枯燥、陰郁和悲慘的生活。即使这种生活有它可取之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沒法阻塞一条变迁的潮流，也不能置身于变迁之外，我們既然吃过了伊甸园的苹果，心理上就無法忘記那种滋味，再返回原始状态中去了。

這兩種觀點完全不同，所以很難進行討論。甘地所想的始終是個人得救和罪惡，而我們多數人所最關心的却是社會的福利。我覺得罪惡這個觀念很難理解，也許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不能了解甘地的一般觀點。甘地不主張改革社會或社會的結構，而專門致力於消除個人的罪惡。他曾經寫道：“參加獨立運動的人決不從事於試圖改造世界這種徒勞無功的任務，因為他相信世界是按照而且永遠按照上帝的法則運轉的。”雖說如此，他还是很起勁地企圖改造世界，不過他要進行的改造是個人改造，克制使他們耽迷的感覺和欲望，也就是罪惡。也許他會同意一個有才能的天主教徒的作者描寫法西斯主義時給自由所下的定義：“自由不過是從罪惡的束縛中的解脫”。這句話和二百年前倫敦主教在一封信里所說的話幾乎一樣：“基督教所給我們的自由是從罪惡和魔鬼的束縛中的解脫，從人的貪求、情欲的控制中的解脫”。[⊖]

只要我們一體會這個觀點，就開始稍為了解甘地对性的態度，這個態度在今天的普通人看來是非常特殊的。他認為“凡不是為了生育後代的男女關係就是罪行”，“採用人工方法必然引起虛癱和神經衰弱。”“希圖避免自己的行為的後果是錯誤的，不道德的……縱情色欲，然後靠吃補藥或其他藥品來避免後果是不好的。縱情于獸欲而要避免他的行為的後果就更加不好。”

我個人認為這種態度既不自然而且令人驚奇，如果他說得對，那麼我幾乎是害虛癱和神經衰弱的罪人了。天主教也曾竭力反對節制生育，但他們沒有像甘地那樣把他們的論點提到極端，而是把他們所謂的“人性”加以調和折衷[⊖]。但甘地卻把他的論點提到極

⊖ 這封信在本書第四二九頁已引用過。

端，除了生育子女之外，他否認任何时候性行为的正当和必要，并否認男女之間有自然的性的吸力。他說：“但有人对我說这是办不到的理想，說我沒有注意到男女之間自然的吸力。我不相信这里所說的性慾的吸力竟能看成是自然的，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將大禍临头了。兩性的自然吸力應該是兄弟和姊妹、母和子、父和女之間的吸力，也正是这种自然的吸力才維護了世界。”他更加强調地說：“不，我必須大声疾呼地說：即使在夫妇之間，兩性的吸力也不是自然的。”

在伊地潑斯的心理傾向^㉞、弗洛伊德的學說和心理分析的觀念正在弥漫的今天，像他这样強調他的信念听起来是很奇怪而且迂腐的。你或者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或者拒絕，再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因为这是信念而不是講理的問題。至于我呢，我認為甘地在这方面是絕對錯了。他的劝告也許适合某些情况，但作为一般政策的話，它只能引起失望、克制、神經失常，以及各种身体上和神經上的疾病。性的节制当然很好，可是我怀疑甘地的教义是否能够推广得很远。他的教义太走極端了，大多数人都肯定說他們办不到，还是我行我素，否則夫妇之間就要發生齟齬。显然甘地認為节制生育的方法一定会引起性行为的过度，并認為如果承認兩性間的吸力，那么每个男女都会互相追求起来。这两种推論都是沒有根据的，我真不明白甘地为什么对性問題这样津津有味，虽然这

㉞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發布关于“基督徒的婚姻問題”的諭旨，說道：“如果已婚的人們根据充分和自然的理由行使他們的职权，那么由于時間的关系或某种缺陷，即使不能产生新的生命，他們的行为也决不能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時間的关系”显然是指所謂“安全时期”，这时是不大会受孕的。

㉟ 男孩亲母反父的心理傾向。——譯者

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在他看来性是一个“非白即黑”的问题，没有中间色。無論在哪一头他都采取極端的立場，我覺得这是極不正常，極不自然的。也許这是今天性的文学泛濫成灾所产生的反响。我敢說我是个正常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性具有它的作用，但它并沒使我留連忘返，也沒阻碍我从事其他活动。它只是起了附屬作用。

从本質上說，甘地的态度是苦行者的态度，他不正視塵世，否定人生，并視人生为邪惡。对苦行者而言，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但如果要一般珍爱人生，努力使人生产生極大意义的世間男女也接受这种态度，似乎太勉强了。甘地为了避免一种邪惡，容忍了許多更严重的邪惡。

我一下扯到別的問題上去了。在阿利波尔監獄的那些悲慘的日子里，这些思想涌上心头，既無次序和連貫，而且糾纏不清使我迷惑而苦惱。尤其是我那寂寞淒涼之感，由于監獄和冷落的小監房中的悶人氣氛更加强烈。如果当时我是在外面，我的激动可能是暫时的，我会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并在言語和行动中得到慰借。在監獄里就得不到这种慰借了，那几天我过得很不痛快，幸而我还具有彈性，很快就从悲觀心情中恢复过来，开始摆脱了意志消沉的状态。随后我在監獄中会見了卡麦拉，使我極為振奋，孤独之感也消失了。不管什么事發生，我覺得我們兩人总是分不开的。



第六十二章 自相矛盾

不認識甘地本人仅讀过他的著作的人往往以为他有僧侶的派头，極端拘謹，面孔陰郁，加尔文式的道貌，好煞風景，有点像“穿着黑道袍各处傳道的僧侶”似的。其实他的著作委曲了他，他本人比他的著作偉大得多。把他的文章引来加以批評不是完全公正的。他本人同加尔文僧侶的派头恰恰相反。他笑容可掬，笑声动人，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四周。他有一种天真爛漫的神态使他富于魅力。在他走进一間屋子的时候，他帶來了一陣新鮮的气息，活躍了屋內的空气。

甘地本人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我認为一切杰出的人物多少都有矛盾的成分。若干年来我一直沒有了解这个問題：为什么像甘地这样爱护和关心被迫受害者的人竟然支持那种必然一面产生一面摧殘被迫受害者的制度呢？为什么像甘地那样热烈反对暴力，而竟然贊成一种完全以暴力和威吓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結構呢？也許，說他贊成这样一种制度是不对的；他多少像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無政府主义者。但因为理想的無政府主义国家过于渺茫，不易想像，所以他接受了当前的秩序。我認为，他反对使用暴力来实行改革，并不是一个手段問題。改变現有的秩序，除了要采用的方法以外，还会考虑一个理想的目标，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實現的东西。

有时候甘地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用这个詞有他自己的意义，同寻常所謂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結構很少关連，甚至毫無关系。有些追随他的卓越的国大黨員也習慣于这个詞的用法，因而它的意义竟解釋成为一种含糊不清的人道主义。在使用这个含糊的政治名詞上他們找錯了显貴的伙伴，因为他們遵照着英国国民內閣首相的榜样[⊖]。我知道甘地并非不了解这个问题，他讀过許多关于經濟学、社会主义、甚至馬克思主义的書籍，并曾和別人进行过討論。可是我越来越相信遇到重要的事情，單單意志是解决不了很大問題的。威廉·詹姆士說：“如果你心里沒有相信，你的头腦决不能叫你相信。”情緒操縱我們一般的观点，而且控制我們的意志。無論我們是在談宗教、政治或經濟，其实都是以情緒或本能为基础的。叔本华說过：“人能按照他的意志去做，但不能决定他心甘情願的意志。”

甘地早年在南非的时候經過一次極大的轉变，这次轉变使他大受震动，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观。从那时起，他的一切思想都有了固定的基础，他的头腦变得很不开朗。他以極大的耐心和注意力傾听別人向他提供新的建議，可是就在这样彬彬有礼的傾听之中給別人的印象是，他們在朝着一座封閉的大門講話。他牢牢地坚持某些思想，好像其他一切都無足輕重似的。釘住一些別的事情和次要的事情不放手，就会打乱和歪曲大的計劃。而把握住那一个准則就必然使別的事情得到适当的安排。手段如果正确，目的也必定正确。

⊖ 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爱丁堡保守党人与联邦主义者协会联合会上發言时說：“当前的困难使每个民族都有团结和集中的必要，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因此也就是真正的个人主义。”

我想这就是甘地的主要思想背景。他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因为它们同暴力有关。“阶级斗争”这几个字就有冲突和暴力的气味，所以使他厌恶。他也不愿意提高群众的生活标准，使它超出某种极低的限度以外，因为再高的标准和游手好闲会引起恣情纵欲与罪恶。少数富裕者恣情纵欲已经很不妙了，如果再有更多的人恣情纵欲那就更加不妙。像这样的推论从他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一封信里可以得出。这封信是答复在英国煤矿停工或大罢工时期从英国寄给他的一封信。来信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次斗争中矿工将遭受失败，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应该使用避孕的方法来限制人数。甘地在复信中说：“最后，如果煤矿主人错了而仍然取得胜利，那不是因为矿工子女生育得过多，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克制自己。如果矿工没有孩子，他们就不会有改进生活的动机，也没有提高工资的确凿的理由。难道他们一定要喝酒、赌钱、抽烟吗？如果说煤矿主人也干这些事情但仍然占上风，这能算是答复吗？如果矿工不自称比资本家好，那还有什么权利求得世界的同情呢？难道还要增加资本家的人数，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吗？我们应该在这样一种希望之下崇拜民主，就是当民主统治着一切时，世界就会改进。我们可不要大规模制造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些罪恶。”[⊖]

当我读这封信时，英国矿工和他们的妻儿那些饥饿、愁苦的面孔涌现在我的面前，正像我在一九二六年夏天看到的一样，他们向摧残他们的那个魔鬼制度哀哀无告地进行斗争。甘地讲的事实不完全正确，因为矿工们并不是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反对减低工资，因

⊖ 这封信引自摩·卡·甘地著的“自制与放縱”。

而被趕出礦外。但這點我們暫且不談。我們也不必談礦工使用避孕方法的問題，雖然這是解決工業糾紛的一個頗為值得注意的建議。我所以引用甘地的回信是為了帮助大家了解他對勞工問題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一般要求的觀點。這種觀點絲毫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說是資本主義吧，也絲毫不是資本主義的觀點。我們說今天的科學和工業技術如果沒有特權階級的搗亂，確實能夠讓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房子住，並能夠大大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這類話對他是不大動聽的，因為他對這些結果只有一定限度的關心。因此社會主義的美景不能引起他的注意，而資本主義，因為它有制止罪惡的作用，所以還可將就。二者他都不喜歡，但在目前後者是較小的罪惡，而且是已經存在的東西，他不得不予承認，加以容忍。

我把這些思想推在甘地身上也許是錯誤，但我確實感覺他有這樣的想法，他的言論中使我們迷惑的那些矛盾和混亂實際上都是由於他從完全不同的前提出發的緣故。他叫大家不要把過分的舒適和游手好閑當作理想，而要體念道德生活，改正他們的惡習，逐漸約束他們的行為，從而在個性和精神上培養自己。願意給群眾服務的人與其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不如把自己的物質生活降低到他們的水平，和他們同甘共苦。這樣做法，一定就會幫助群眾多少提高他們的生活。據甘地說，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他發表了一個聲明說：“許多人認為對我抗拒已感絕望。這對我這樣一個有生以來就是民主主義者是一個侮辱的表示。一個人要和最窮苦的人們同化，希望和他們過同樣的日子，並有相當的自覺要竭力達到那樣的程度，如果他有資格這樣說的話，我也要這樣說。”

這種論點和看法，大家都認為它是脫離群眾，在絕大多數窮得

無以为生的人面前卖弄闊綽和高貴生活，这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除了这一点外，恐怕没有一个現代的民主主义者、資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会贊成的。但一个有旧宗教观点的人可能有一部分贊成，因为这两种人在情感上都同过去有着联系，而且永远从过去設想。他們对已有的事情比現有的或將來会有事情想得更多。世界上，思想傾向过去和傾向將來全然是兩回事。在旧世界里我們很难想像提高群众的一般物質生活。穷人总是同我們在一起的。那时候一小撮富人是社会組成的重要部分，为生产制度所必需。因此道德家、改革家和感觉敏銳的人收留他們，但同时又打算指点他們对貧苦同胞应尽的义务。富人是穷人的受托人，他們應該慈善，而慈善是宗教規定的主要品德之一。甘地一直在強調封建王公、大地主、資本家的受托制的这种观念。在这一点上他是追随在一系列的宗教家之后的。教皇曾經宣称：“富有的人應該自認是上帝的僕人，是上帝的財富的保管者和分配者，是基督亲自把穷人的命运委托給他們的。”傳布很广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重复这个思想，一直在要求富人大發善心，而富人的反响是造庙宇、清真寺、义舍，或从他們的丰富的財產里施舍些銅板或銀錢給穷人，因而自以为做了很大的功德。

有一段描写这种旧社会的宗教态度的出色文章見于一八九一年五月教皇利奧十三世發布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著名諭旨。他在提出关于工業新情况的論点之后接着說：

“所以受苦与忍受是人类的命运。不管人类怎样嘗試，从来沒有一种力量和計策能够把人类生活中的邪惡和煩惱排除出去。如果有人妄想标新立异，主張受苦的人要摆脱痛苦和煩惱，平安無事，長远享福，这是欺騙、蒙蔽大家的話，这种騙人的口惠反而使邪

惡變本加厲。最有益的莫过于面向現實的世界，同時還要向別處去尋找解除煩惱的方法。”

他接着告訴我們所謂“別處”是在哪里：

“不考慮來世，即永恒的人生，就不可能正確地了解或衡量現世的事物……我們從自然本身學到的偉大真理也就是作為基督教的基础的偉大教義；今生完結，生命才真正開始。上帝創造我們，不是要我們來承受塵世間可以毀滅的短促的東西，而是來承受天堂的、永恒的東西。他給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流放所，而不是我們的真正國土。金錢以及大家說是好的可愛的東西，我們可以擁有很多，也可以一無所有；就永恒的幸福說來，二者都是無關緊要的……”

這樣的宗教態度和很久以前的社會是有關聯的，那時候唯一的可能逃避現實苦難的方法就是希望來世。雖然後來客觀條件改變了，並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繁榮到過去的人們無法想像的境界，可是那個過去的魔掌仍然箝制着我們，不過現在卻強調某種空洞而不可測度的精神價值。天主教徒把別人稱為“黑暗時代”的十二和十三世紀看作基督教的黃金時代，說那時聖徒興起，基督教徒的君主爭先恐後地參加十字軍運動，哥德式的教堂建立起來。他們並認為那時是“真正的基督教民主”時代，“這種民主在中世紀的行會控制之下比以往和後來表現都更加充分”。穆斯林嚮往早年哈利發統治下的“伊斯蘭民主”以及他們取得勝利的豐功偉績。印度教徒也回憶吠陀和史詩時代，並夢想羅摩的統治。但整個歷史都告訴我們，人民大眾在那些年代里都處在極端悲慘的境地，連餬口和最起碼的生活都得不到。也許有一小撮的人高高在上，陶醉在精神生活之中，他們有的是空閑和財力可以這樣干，但是別人呢，除了為生活鬥爭以外還能想像他們會做什麼呢？對餓肚子的人說

来,文化和精神的进步是毫無所謂的,他的心事只集中在解决吃飯問題。

工業时代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罪惡,它們朦朧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但我們很容易忘記一点:如果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看,特别是就工業化最进步的部分来看,工業时代已經打下了物質幸福的基础,使大多数人更容易取得文化和精神的进步。可是这种好处在印度或其他殖民地国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因為我們沒有得到工業發展的好处。我們受到的只是它对我們的剝削,而在許多方面,甚至物質方面,尤其是文化和精神方面我們的情形更坏。錯誤不在發展工業,而在外国的統治。所謂印度的西方化在今天事实上是加强了封建主义,它不但沒解决我們的任何問題,反而使这些問題更形严重。

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决不要讓这种不幸来影响我們今天对世界的看法。因为富人在現狀之下再不是生产体系或整个社会的必要部分或有价值的部分了。富人是贅疣,永远是阻碍。傳教士要求富人行善,要求穷人忍受、听天由命、节儉、規規矩矩那套老办法,已經沒有意义了。人类的財富已經大大地增加,能够应付和解决世界的問題。好多富人确实变成了寄生虫,而寄生階級的存在不仅是一种阻碍而且还是財富的極大浪費。这个階級以及豢养他們的制度事实上阻碍了工作和生产,并助長了兩種不劳动的人,一种是依賴別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另一种是找不到工作而挨餓的人。前些时甘地自己这样写道:“对于餓着肚子、無事可做的人說来,上帝敢于采用的唯一可取的方式就是給他們工作和許給他們粮食以代替工資。上帝創造人类使他們为吃飯而工作,他說不劳而食的人是賊。”

打算了解現代世界的複雜問題而採用古代社會里並不存在這類問題的時候所採用的方法和公式，而且關於這些問題使用一些陳舊的詞語，這樣做是會引起混亂和招致失敗的。私有財產這個觀念，有些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基本觀念之一，現在也變成經常改變的觀念了。有一個時期奴隸是財產，以至於婦女、兒童、封建主對新婦的初夜權、道路、廟宇、渡船、橋梁、公用事業、空氣和土地都是財產。雖然有許多國家的法律限制對動物的占有權，可是現在動物仍然是私有財產。戰爭時期財產權利不斷地遭到侵犯。今天，私有財產越來越成為無形的東西，例如股份所有權，一定數量的信貸等等。隨着私有財產觀念的改變，國家對產權干涉愈來愈多，輿論要求限制私有財產所有者的無限權利，法律並強制執行這種限制。帶有沒收性質的各種重稅為了公共利益吞沒着個人財產權利。公共利益成為公共政策的基礎，一個人即使是保護自己的產權也不得違反公共利益。總之，絕大多數的人過去是沒有產權的，他們自己還是被別人占有的財產。甚至今天也只是極少數的人有這種權利。我們聽到關於既得利益的許多話。今天卻有一種新的特殊權利應該予以承認，那就是每個男女都有生活、勞動和享受勞動成果的權利。財產和資金並沒有由於這些時時改變的觀念而消滅，只是分散開來；而原來因為財產和資金的集中使得少數人統治別人的權力也被整個社會奪回去了。

甘地打算從內心、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個人，由此再來改變外在的環境。他要大家拋棄惡習和放縱，成為純潔的人。他強調節制性欲、戒酒、戒烟等等。大家對這些放縱行為的邪惡程度，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即使從個人觀點，尤其是社會觀點來看，誰能懷疑這些個人缺陷不像貪心、自私、患得患失、為個人利益而起的

激烈冲突、集团和阶级之间的无情斗争、一个集团对另一集团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剥削、国与国之间可怕的战争等那样有害呢？当然，甘地是厌恶这一切暴力和可耻的冲突的。但是这些东西还不是今天这个贪婪的社会本来就有的吗？这个社会的法律是弱肉强食，它的格言也和旧时一样是“有力者可以得，善守者可以不失”。今天这种唯利是图的动机必然会导致冲突。整个制度都在维护和发扬人类贪求的本能；它固然也激发某些优良的本能，但更多激发人的卑劣的本能。一人的成功就意味着打垮别人，骑在被征服的同类的头上。如果这些动机和野心受到社会的鼓励，而且吸引了我们最优秀的人物，那么甘地是否认为在这种环境里还能够达到他所谓有德者的理想呢？他希望发扬服务精神，这对于某些个人说来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只要社会上仍然把贪婪世界的胜利者奉为榜样，把私人利益的动机当作主要推动力，那么广大的群众就会随波逐流。

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或伦理的问题而已。这是今天一个实际而且迫切的问题，因为全世界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才行。我们不能像盲目的乐天派那样坐等好事来临。也不能单纯地否定一切，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好的方面，而茫然指望一条中庸之道，以为它可以集一切新旧制度之长，融合无间。有病是要诊治的，医药是要我们提供并且加以调配的。无论国内和国际，我们当然都不能站在原地不动，要就是回头，要就是前进。或许在这件事上是沒有选择余地的，因为回头是不堪设想的事情。

但是甘地的许多行动可能使人认为他想恢复最狭隘的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仅要恢复自给自足的国家，而且几乎是还要恢复自给

自足的农村。在原始社会里，农村多少是自給自足的，穿衣吃飯都是自备，其他方面也能供給自己的需要。当然那时的生活水平是低到了極点。我不相信甘地永远只想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是一个無法达到的目的。今天有些国家連大量人口的生存都維持不下去，它們是不会答应回到貧乏和飢餓中去的。我認为在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农业国里，目前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如果發展农村工業，对于群众可能有少許改进。但是我們也像每个国家一样，和世界其他各国互相联系，要割断这个联系，我觉得那是完全办不到的。因此我們必須从全世界的观点設想，如果这样来設想，那么狹隘的自給自足就不值一談了。我个人認为不管从任何观点出發，狹隘的自給自足都是要不得的。

我們無可避免地只能得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首先在國家範圍之內实行，最后推广到全世界去，并为了公共利益实行生产管制和財富的分配。如何实现这个秩序那是另一回事，但显然一个国家或者全人类的利益絕對不能因为在現存的秩序中少数占了便宜的人反对改革就擱置不管。如果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妨碍了这种改革，那么这些制度就必須廢除。牺牲那个有价值的、具体的理想来迁就这些制度是严重的背叛行为。这种改革一部分可能被世界局势促成或推动，但如果沒有有关的絕大多数人民的首肯或同意，它还是实现不了。因此，我們必須改造他們并爭取他們过来。一个小集团的陰謀的暴力是無济于事的。当然，就連那些在現有秩序中占了便宜的人，也应花些力气把他們爭取过来，不过，要把他們中間大部分人都改造过来是很不可靠的。

甘地特別心愛的手紡手織的土布运动加强了生产中的个人主

义，因此它是倒退到工业以前的时代。对解决今天任何一个重要问题说来，它是值得重视的，而且这个运动还会产生一种可能妨碍我们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心理。不过，作为一个临时的办法来说，我深信它已经起了作用；只要政府没有从全国范围正确解决工农问题的话，那么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许还有用处。在印度，没有统计的失业人数是非常之大，农村中的半失业人数甚至更大。国家从来没有试图消灭这种失业现象，也没有想过任何办法救济这些失业的人。在经济方面，土布给全部和部分失业者帮了一点小忙，而且因为这点改进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努力，因而增长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产生了若干信心。最显著的当然是心理方面的结果。土布对沟通城乡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些成绩。它使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农民较前接近。衣服对于穿的人和看的人都有显著的心理效果，中产阶级采用简单的白色土布衣服增进了朴素的风气，降低了浮华和恶俗，并建立了同群众的团结。中产阶级的下层不再仿效富有者的衣著了，也不以自己的简陋衣服为丢脸，而是不但自己感觉高贵，还感觉自己比那班仍然炫耀他们的綾罗綢緞的人稍为优秀一点。就连最穷的人也感觉到一点这种高贵和自尊心。在一个土布衣装的集会上要想分别穷富是很难的，在那里产生了同志友爱的精神。毫无疑问，土布帮助了国大党同群众接触。它变成了民族自由的制服。

土布也阻止了纺织厂主抬高物价的一向就有的趋势。在过去只有外货的竞争，特别是兰开夏产品的竞争，才阻止这些印度厂主抬高物价。只要竞争一停止，比如在大战时期，印度的布价就向上飞涨，印度的纺织厂就大赚其钱。后来的提倡国货和抵制外国货运动也给这些工厂帮了很大的忙，可是土布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

使布价不能漲得像原来要到的高度。的确这些工厂也利用人民对土布的心理（日本也是这样），織出几乎同手紡手織的产品沒有差别的粗布。如果再有一次非常事件發生，比如战争的爆發，以致外国布匹停止內銷的話，那么今天的印度紡織厂主也許不能像在一九一四年以后那样剝削消費者了。土布运动会来制止这种情形，土布运动的組織也有能力在一声号召之下即刻擴張开来。

印度的土布运动虽然今天有这种种好处，但我認為它总归是一个过渡的办法。今后它也許还会繼續作为一个輔助运动，使轉向高級經濟的过程比較順利。但是將來主要的趋势必然是徹底整頓農業制度和發展工業。稍微整理一下土地是不行的，而一大堆任务耗費了数十万盧比，提出一些对上層建筑的細微的改革，这样是沒有多大成效的。目前的土地制度正在我們眼前宣告垮台，它阻碍着生产、分配以及大規模的合理操作。只有徹底改革这个制度，廢止小土地所有权，建立有組織的集体和合作企業，因而以很少的力量做到很大的增产，这样才适合現代的条件。土地是不会，也不能够吸收我們全国人民的劳动力的，大規模的操作將减少土地上所需要的工作者（这是甘地担心的事情）。其他的人，也許是一部分要轉入小型工業企業，但主要是轉入大規模社会主义工業和社会服务部門。

在許多地区，土布运动确实減輕了那里的一些困难，但也正是这点成就含有危險的成分。就是說它支持着一个正在衰敗的土地制度，并在若干程度上推迟了向較好的制度轉变的時間。这个效果还未明显得足以表明显著的差异，但它的傾向已經形成了。在佃戶或小土地所有者方面，他从土地生产中得到的那份收入甚至連他已經降低到了極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維持。他不得不找些外

水来弥补微薄的收入，否则像他平时那样，为了缴纳地租或税款就得债上加债。因此这笔外水反而替地主或政府得到一笔本来得不到的钱。如果这笔外水的数目很大，那么最后很可能地租也跟着上涨，赶上了它。在当前的制度下，佃户的大部分额外劳动和省吃俭用的努力结果都便宜了地主。就我的记忆所及，亨利·乔治在他的“进步和贫穷”一书里曾经讨论到这一点，并举过实例，特别是爱尔兰的例子。

甘地恢复农村工业的企图是他的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这个做法会获得眼前的利益，有一部分多少是永久的，但大部分是暂时的。这个做法对农民眼前的困难有所帮助，使某些行将消灭的有艺术和文化价值的东西重新恢复。但是就它反抗机器和发展工业一点说来，它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甘地最近在为“哈里真报”写的关于农村工业的文章中说道：“在要完成一件工作而人手不够的时候机械化是好的。在人手超过工作需要的数量的时候，像印度的情况，机械化是不好的……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给我们农村中亿万人民以悠闲的时间。问题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悠闲时间，这部分时间等于一年当中六个月的工作日。”这个反对的论调在不同程度下适用于一切闹着失业问题的国家。但是毛病的确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在目前的利润制度下雇主嫌工作不够赚钱。有许多工作亟待去做，比如修造公路、灌溉系统、房屋、发展卫生医药的设备、工业、电力、社会和文化事业、教育以及人民所缺乏的数十种必需品的供应。我们全部亿万人民在未来五十年中可以努力工作，还做不完今天所有可能做的事情。但只有当我们的要求是社会的改进而不是利润，只有当社会为了普遍的利益而从事改进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实现。不管苏联有什么别的缺点，它没有一个失业

的人。我們的人民游手好閑，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獲得工作和提高文化的條件。廢除童工以及給相當年齡的兒童實施強迫教育，會把男女兒童從勞動隊伍或失業群中抽調出來，使勞動市場擺脫數千萬勞動後備軍的壓力。

甘地曾經試驗改進手紡車和紡錘，以增加生產能力，有過若干成效。這是改進工具和機器的嘗試，如果這個改進繼續下去（用電力發動家庭工業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利潤的動機又會出現，並產生所謂生產過剩和失業。農村工業如果不配上現代工業的技術，則連我們今天需用的主要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都供應不來。而且它們是無法同機器競爭的。我們是否適宜或是否可能阻止大型機器在我國發生作用呢？甘地曾經一再說：像這樣的機器他並不反對；但他似乎認為，今天對印度說來，機器還是不適宜的。可是我們能夠把像鋼鐵工業那樣基本的工業企業，或者甚至連已有的輕工業企業都停閉了嗎？

我們顯然是不能這樣辦的。如果我們要有鐵路、橋梁、運輸工具等等，不是我們自己出產這些東西，就要仰賴別人。如果我們要建設國防，我們不僅必須有基本工業，還要有高度發達的工業制度。今天，一個國家如果工業不發達，就不會真正獨立，也不能抵抗侵略。一種基本工業還需要另外一種工業支持它、配合它，最後才能有機器製造工業。有了基本工業開動起來，那就必然有輕工業的發展。這種過程是無法制止的，因為不僅我們的物質和文化的進步同它有關，連我們的自由也同它有關。大工業越是發展，小規模的農村工業越是無法同它相比。農村工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許還有苟延殘喘的機會，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反而不會有這個機會。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們也只能作為家庭工業存留下

去，專門製造那些不能大規模製造的特种物品。

有些國大黨的領袖害怕工業化，以為工業國家今天的糾紛就是來自大規模的生產。這是對當前局勢的一個奇怪的解釋。[○]如果群眾短少一樣東西，我們給他們生產這樣的東西，使他們够用，難道這也不好嗎？難道不從事大規模生產而讓他們一直貧乏下去才好嗎？顯然問題不在生產而在分配制度的愚蠢和不適當。

農村工業提倡者遭遇的另一個困難是我們的農業依賴世界市場。我們的農民被迫種植商品作物，被迫依賴世界的價格。世界的價格是起伏不定的，而農民却不得不用硬幣來繳納地租和稅款。他總想多少提高他的產品價格，至少他打算這樣做，他總想他所種的作物會賣到最好的價錢。至於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需要自給自足的東西，甚至連他們自己的糧食，他也顧不得去種了。

近年來大多數糧食作物以及其他產品的跌價使得數百萬農民尤其是在聯合省和比哈爾的農民，突然改種甘蔗。進口糖的徵稅引起糖廠像雨後春筍似地建立起來，因此甘蔗的需要大大增加。但不久甘蔗的供應遠遠超過需要，工廠主苛刻地剝削農民，於是甘蔗的價格跌落。

我認為上述這幾種情形，還有其他許多情形證明我們的農業和工業問題用任何狹隘自給自足的方法來解決都是不行的，也是不適當的。的確，這些情形牽涉到我們國家生活的各方面。我們不能說些空洞、感情激動的話來安慰自己，而必須面對這些事實，適應這些事實，這樣才能成為歷史的主人，而不是束手無策地受制

○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薩達爾·瓦拉拜·巴特爾在阿麥達巴德城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於發展農村工業。我們不願使西方國家由於大規模生產而引起的普遍混亂現象出現在我們的國內。”

于历史。

我又想到了甘地的矛盾。⊖ 像他那样的才智以及为被蹂躏者和被压迫者改善生活的热情，怎么会支持那样一种分明正在腐朽，并且造成现在的苦难和浪费的制度呢？不错，他是在寻找出路，但是往回走的道路不是闭塞不通了吗？同时他还赞美那些阻碍进步的旧秩序的残余，譬如封建土邦、大地主和地稅征收者制度以及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难道相信富人接受委托的論調——就是給个人以無限的权力和財富而希望他完全用作公共利益——是合理的嗎？难道我們当中的优秀者会十全十美到了值得这样的信任嗎？即使柏拉圖的哲人之王也当不起这个重任。而且讓这些仁德的超人駕馭另外的人，对这些另外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超人或哲人之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脆弱的人类，他們总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或个人思想的發展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出身、地位和經濟权力的势利看法永远繼續下去，在許多方面引起了很坏的后果。

我再一次地說：我現在并不是考虑如何实行改革、如何消除改革的障碍，用强迫呢还是用劝化，用暴力呢还是不用暴力等等的問題。这方面的問題我以后再談。但我們必須承認并清楚地說明改革的必要。如果領導人和思想家不注意也不說明这个問題，他們又怎能指望別人接受他們的想法，或者把必要的思想灌輸給人民

⊖ 在一九三一年的倫敦圓桌會議上，甘地有一次發言說道：“特別是国大党，本質上是代表沉默的、半飢餓的亿万人的，这些人散居在全国东西南北的七十万个乡村里，有来自英屬印度的，也有来自印度的印度（印度土邦）的。国大党認為：凡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必須服从这些沉默的亿万人的利益。显然几种利益之間常常發生冲突。如果确有真正冲突的話，我毫不犹豫地代表国大党說：国大党將为这些沉默的亿万人的利益牺牲一切利益。”

呢？事实無疑是最有力量的教訓，但如果我們要看出事实的重要性，我們就必須对事实有适当的体会和解釋，从而才有适当安排的行动。

曾經偶然被我的言論所激怒的朋友和同事們常常問我：你沒有遇見過善良、仁德的王公、慈善的地主、好心而和藹的資本家嗎？我确实遇見過过的。我自己就屬於一个同地主和富有者有些瓜葛的階級。我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出身于資產階級的环境里，帶來了早年在这样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見。共产党人曾經称我是小資產階級，是完全正确的。也許他們今天会叫我作“悔过的資產階級”。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無關紧要。以孤立的个人观点来考虑国家和国际問題、經濟和社会的問題，那是荒謬絕倫的。那些質問我的朋友們不憚煩地一再說我們的爭論是关于罪惡而不是关于犯罪者。我可不願談得那样远。我要說我們的爭論是关于制度而不是关于个人。一个制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和团体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个人和团体必須加以感化或进行斗争。但如果一个制度已經沒有价值而变成了贅疣，那就必須廢除，依附于这个制度的階級和团体也必須进行改造。改造的过程中應該越少痛苦越好，但不幸是痛苦和紊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因为害怕小惡而容忍大惡，而大惡無論如何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糾正的。

人类的各種关系，政治的、社会的、或者經濟的，背后都有一种哲理。当这些关系一有改变，那么哲理的基础也必須改变来适应它們并充分利用它們。平常总是哲理落后于事实的演变，从而引起了一切糾紛。民主同資本主义是在十九世紀同时产生的，但二者却互不相容，因为它们有一个基本矛盾，民主強調多数人的权力，而資本主义只給少数人实权。由于政治的議會民主本身是一

種有很大局限性的民主，而且不大干預壟斷和集權的發展，所以這一对不協調的伙伴能够共处下去。

縱然如此，但当民主精神正在發展的時候，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分离还是無法避免，而且分离的時間現在已經到來。議會民主在今天已經声名狼籍；它的反响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新口号响徹云霄。因此印度的英國政府變得更加反动，竟拿这事作为借口，連外表的政治自由也扣住不給我們。奇怪的是印度各土邦的王公也竟拿这事作为他們橫行無忌的独裁政治的理由，盛氣凌人地宣稱要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維護中世紀的情況——这是普天之下再沒其他地方會有的情況[⊖]。可是議會民主的失敗并不是因为它跑得太遠，而是因为它跑得不够遠。它还不够民主，原因是它沒有建立經濟民主，而且它的方法遲緩、笨拙，不适合一个瞬息万变的時代。

今天的印度土邦也許代表着世界上一种極端独裁政治的类型了。当然它們是服从英國的宗主權的，可是英國政府所過問的只是保护或扩展英國的利益而已。这些旧世界的封建堡壘怎么能一

⊖ 巴蒂亞拉邦大君兼土邦王公院議長，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德里該院演說時提到印度政客們的意見，他們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希望土邦王公在環境逼迫下成立民主形式的政府。他接着說道：“既然印度土邦王公一直願意為人民謀最大的福利，準備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憲法適應時代的精神，我們就必須坦白地說：如果英屬印度打算強迫我們在健康的政治集團身上穿一件威信掃地的政治理論那樣浸過毒液的襪衣，那他們是太不現實了。”（參見前面買索爾總管的演說。）同日比加尼爾大君也在土邦王公院發表演說說：“我們這些印度土邦的統治者不是一群幸運兒。恕我冒昧地講：由于几百年的世襲余蔭，我們有資格說我們是繼承了統治的本能的，並且我相信我們也有若干程度的政治家的風度，因此我們必須極端慎重，不要匆匆做出輕率而考慮不周的決定……恕我冒昧地說：土邦王公決不願意讓任何人殘害他們；如果不幸有一天英王不能履行條約的義務給印度土邦以必要的保護的話，那么王公同土邦將鬥爭至死為止。”

直延續到二十世紀的中叶而沒有多大改變，這真令人驚奇。那里的空氣是沉重而呆板的，水流是遲緩的，初到那里的人，如果一向看慣了變化流動的局勢，甚至對這種局勢有點厭倦的話，在這裡會感覺昏昏欲睡，被一種輕微的魅力所控制。在這裡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好像在一幅圖畫里，時間是靜止的，眼睛觸及的是一成不變的景致。他幾乎不自覺地回到了過去，回到了童年的夢境，腰束革帶、身著鎧甲的武士和英勇的妙齡處女的幻影出現在他的面前，角樓高聳的城寨，武士精神，吉訶德式的光榮和驕傲的觀念，以及無比的膽量和視死如歸。尤其是如果他在拉其普他拿邦——那個充滿浪漫、虛妄而荒誕的事跡的地方——他更會看到那些情形。

但不久這些幻影就會消失，接着產生一種窒息之感，使人氣悶得呼吸困難，這時在那片安靜或遲緩的水流下面却是沉滯和腐朽了。他會感覺到周圍的阻礙和局限、身心兩方面的約束。他會看見人民的極端落后和困苦，同王宮的宮殿里的豪華成為鮮明的對照。國家有多少財富都流入那座宮殿供應王宮的使用和奢侈，僅有多少財富回到人民的身上！我們這些王公們的出身與供養都是極端糜費的。但是他們有什麼東西拿來抵償這筆糜費的費用呢？

神秘的氣氛籠罩着這些土邦。在那里報紙的發行得不到鼓勵，至多只有一份文學周刊或半官方周刊或許可以流行。外面的報紙往往禁止入境。識字者的比例很低，只有南方各邦如特拉凡哥爾、科欽等除外，這些地方的識字者比例比英屬印度高得很多。各土邦的重要消息不外乎是總督的訪問，以及訪問中的排場、禮節上互相恭維的演說，或者是統治者的盛大婚禮或壽辰，或者是農民起義。王公們享受特別法律的保護，不許別人批評，甚至在英屬印度也是這樣，至于在土邦里連最輕微的批評也會受到嚴厲的壓制。公

开集会几乎没有，連社交性質的集会也常常禁止召开[⊖]。外面的社会賢达往往被阻止不得进入土邦。在二十年代中叶达斯先生害着重病，决定到克什米尔去休养。他是沒有政治任务的。他一路無阻地走到克什米尔边境，但却被阻止在那里。連真納先生也不得进入海得拉巴；奈都夫人有家在海得拉巴城，也長期不能回去。

当这种情况蔓延到各邦时，国大党自然要挺身而出，維護土邦人民的基本权利，批評那种不分皂白的鎮压。可是甘地为国大党制造了一套对待土邦的新穎政策，就是“不干涉土邦內政的政策”。虽然土邦內部發生了極端离奇和慘痛的事件，虽然土邦政府毫無理由地攻击国大党，但甘地还一直坚持着这样沉默的政策。显然他害怕国大党的批評可能触怒土邦統治者，使得“感化”他們的工作更不易做。一九三四年七月甘地在写給土邦臣民會議議長凱尔卡先生的信里反复說明他的信念，認為不干涉政策既明智而又健全；他对这些土邦的法律和宪法地位的看法是極為离奇的。他写道：“土邦是英国法律下一个独立整体。所謂英屬印度沒有权力影响土邦的政策，正如它沒有权力影响，比如說吧，阿富汗或錫蘭的政策一样。”無怪乎連中庸、温和的印度土邦臣民會議和自由党人都反对他的意見和劝告。

但这些意見頗受土邦統治者的欢迎，他們还利用了这些意見。就在一个月內特拉凡哥尔政府取締了境內的国大党，禁止它召开

[⊖]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德干区海得拉巴城消息：“曾經宣布原定昨天在本地衛維克瓦尔第尼剧院为庆祝甘地寿辰而举行的公众集会不得不取消。这个集会 是海得拉巴城哈里真公僕社組織的。社的秘書写信給报纸說：在規定开会時間之前二十四小时，当局宣称，必須繳納二千盧比的現款保證金，担保会上不作政治性的演說 并且不批評政府官員的政务行动，才能准許开会。这就使得主持會議者沒有足够時間同当局商得解决的办法，因此不得不取消这次集会。”

一切集会和發展黨員。該政府声明这是“負責的領袖們”自己劝它这样做的，这明明是指甘地的談話。值得注視的是这个禁令的發布是在和平抵抗运动从英屬印度撤銷之后（各土邦从来沒有参加过这个运动），以及印度政府再度宣布国大党为合法組織的时候。还有一点看来很有趣的是，当时特拉凡哥尔政府的首席政治顧問是（現在还是）拉馬斯汪梅·艾亞尔爵士，他曾任国大党和自治同盟的秘書長，后来是自由黨員，并在印度政府和馬德拉斯政府任高級官員。

由于遵照甘地的劝告，国大党的政策是，它对特拉凡哥尔政府平时的無理由攻击不公开說一句話[⊖]。連有些自由党人都竭力抨击这个政策。甘地对待土邦的立場确实比自由党人的立場温和而且拘謹得多。也許在社会賢达中間只有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由于他同許多王公們的亲密关系，也像甘地一样的拘謹和唯恐刺激了王公們的感情。

甘地对待印度土邦王公們并不一直是慎重的。一九一六年二月在貝拿勒斯的印度大学創校典礼那个出名的日子里，甘地在一個王公主持的會議上演說，与会的有一群別的王公。他那时新从南非洲回来，全印政治的負擔还没有落在他的肩上。他誠懇地并以說教者的热烈心情對他們演講，劝他們改正他們的行為，去掉他們那样虛浮的排場和奢侈。他說：“王公們！去卖掉你們的珠宝吧！”虽然他們不一定卖掉他們的珠宝，可是他們确实是去了。一个一个地，三三兩兩地，都在盛怒之下离开了會場，連校長也匆匆走出，

⊖ 薩达尔·瓦拉拜·巴特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在巴羅達城發表的演說中強調这个不干涉政策。据称他曾經說过：“印度土邦的工人應該按照土邦所規定的各種限制來工作；不要批評政府，而應努力維持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誠懇關係。”

剩下演說者自己在維持場面。安尼·白山特夫人當時也在場，她也被甘地的言論激怒了，離開會場。

甘地在寫給凱爾卡先生的信中还說：“我願土邦給它們的人民以自治權，並願各位王公把自己當作——事實上也是一——他們所統治的人民的受託者……”如果這個委託的想法有點道理的話，為什麼我們還要反對英政府自命為印度政府的受託者的說法呢？除了英國人是住在印度的外國人這一事實以外，我看不出這兩種情形有什麼區別。其實印度各種民族的膚色、種族來源和文化差不多也有同樣顯著的區別的。

在過去若干年間，英國官員很快地滲入了印度土邦，往往安置了一個不願意干但又無法推辭的王公。印度政府一直是高高在上地對土邦加以很大的控制，現在又從內部來對幾個最重要的土邦實行控制。因此這些土邦一發表言論，印度政府就往往同聲附和，並且充分利用這種封建背景。

我了解到，在其他地方採取的行動對於土邦不是都能採用的。英屬印度各省之間在農業、工業、教派、政權方面確有顯著的區別，統一的政策不是永遠行得通的。但是，行動固然必須取決於環境，我們的總政策卻不應該因地而異，不利於一個地方的也必不利於另一個地方。否則我們將受責備，其實已經受到責備，說我們沒有一貫的政策或主張，我們整個的目的是爭取權力。

有許多批評是反對為宗教和其他少數民族分別設立選區，這是完全正確的。有人指出這些選區全然違背民主。如果一個選區分成幾個彼此隔絕的宗教派別，那當然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所謂負責的政府。但是批評者之中最為認真和堅決的，像潘迪特·瑪丹·摩汗·瑪拉維亞以及印度教大會的領袖們竟然默許土

邦的現况，而且显然准备使土邦的独裁政治同印度其他部分的(所謂)民主政治成立联盟。很难設想还有比这个更加荒謬、更加不能并存的联盟了，但印度教大会里面維護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战士竟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过去。我們口口声声講邏輯和主張的一貫，可是我們的根本想法却不断地是感情冲动。

于是我又回到国大党同土邦之間的矛盾方面来了。我想起了托馬斯·培恩和將近一百五十年前他批評伯克的話：“他愛羽毛，但忘記了那垂死的鳥。”甘地的确沒有忘記那垂死的鳥。但又为什么要斤斤計較羽毛呢？

上述同样的意見多少也可适用于地稅征收者制和大地主制。这种半封建制度已經过时，成为生产和全面进步的巨大障碍，似乎是無庸爭辯的事情。这种制度甚至同正在發展中的資本主义發生冲突，差不多全世界的大地产已經逐漸消灭，为小土地所有者所代替。我一直在想：在印度可能發生的唯一問題是賠償。但使我惊异的是大約在去年我發現了甘地贊成这种地稅征收者制，并希望它維持下去。一九三四年七月他在康波尔时說过：“要改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就要双方都改变他們的心腸。如果这个做到了，双方就能够和平而融洽地处在了一起。我从来不贊成取消地稅征收者制或地主制，那些認為應該取消这种制度的人是沒有定見。”（最后这句責备的話頗有些不近人情。）

还听說甘地这样講过：“沒有正当理由而剝夺有产阶级的私有財產的行为，我是不参預的。我的目的是深入你們的心，感化你們（这是对大地主代表团講的話），要你們替你們的佃戶保管全部的私有財產，并主要是为他們的利益使用这些財產……但假使有人有夺取你們的財產的不正当企圖，我会站到你們这边向他进行斗

爭的……西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根据的某些观点同我們的观点根本不同。其中有一点是它們承認人性在本質上是自私……因此我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應該以非暴力主义为基础，以劳資之間、地主同佃戶之間同力合作为基础。”

我不曉得东西方的基本观点是否有这些差別。也許是有的。但不久之前有一个显明的差別是印度的資本家和地主不关心他們的工人和佃农的利益比西方的資本家和地主更要厉害得多。印度的地主实际上毫不打算过問有关佃农福利的任何社会事業。有一位西方观察家赫·恩·布雷尔斯福德曾經說过：“印度的高利貸者和地主比現代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寄生虫还要貪得無厭。”[⊖] 也許过錯不在印度的地主身上。而是环境逼得他們太甚，使他們逐漸衰落下去。現在他們遭遇的困难使他們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許多地主被高利貸者剝夺了他們的土地，小一点的地主淪为佃农，租种原来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这些城市中的高利貸者憑着抵押品放債，随后沒收这些抵押品，發展成为地主。按照甘地的說法，这些人就是被他們剝夺了土地的那些不幸者的受托人，甘地还指望他們把他們的收入首先用在佃农的福利上面。

如果地稅征收者制是好的，那么为什么不讓它普及到全印度呢？但印度的广大土地上現在已有了小土地所有者。我不知道甘地会不会同意使古甲拉特有大地主和地稅征收者出現呢？我猜想他不会同意的。那么为什么联合省、比哈尔或孟加拉适用一种土地制度，古甲拉特和旁遮普又适用另一种呢？据推測，印度的东西南北各地人民之間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別，他們的基本观点是

⊖ 赫·恩·布雷尔斯福德著“财产呢还是和平呢？”

相同的。于是归根結蒂，不管現有的是什么都應該繼續下去，也就是現狀應該維持。对于人民最好或最有利的东西，不必要做經濟方面的調查，也不必做改變現狀的嘗試。所要做的只是改革人心。这是对生活和生活問題采取純宗教的态度。它同政治学、經濟学或社会学毫無共同之处。可是甘地在政治、国家方面的問題上却超越了这个範圍。

这就是印度今天面临的若干矛盾之中的几点。我們已經在一些問題上搞得糾纏不清，不解决这些問題，是很难再干得下去的。解决的办法却不是依靠感情。很久以前斯宾諾沙曾問过下面两种情况哪样好些：“由于知識和了解而获得自由呢，还是受感情的束縛呢？”他选择了前者。



第六十三章 感化或者强迫

十六年前，甘地以他的非暴力主义来影响印度；从那时起，这个主义就统治着全国。广大人民不假思索地但是心悅誠服地反复談論这个主义。有些人对它辯駁一番，然后才有保留地或無保留地接受。还有些人对它公开嘲笑。它在我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并在广闊的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个主义的确同人类的思想几乎一样古老，但甘地也許是第一个人把它大規模地用到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上面。非暴力主义原来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它本質上是宗教的。它主張个人約制，个人为达到完全忘我的境地所做的尝试，从而把自己从人世的糾紛里超脫出来，获得个人的自由和解救。那时沒有人想到把它用来处理較大的社会問題以及改变社会現狀的問題，除了間接地和隱約地这样使用以外。对于現有的社会結構以及它的一切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現象几乎全盤接受。甘地企圖把这种个人的理想轉变为社会集体的理想。他挺身而出，要改变政治現狀和社会現狀；由于这个目的，他处心积虑地在广闊的範圍和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这个非暴力的方法。他曾經写道：“如果有人要根本改革人类現狀和环境，除了制造社会的酵母以外是無能为力的。要制造社会的酵母只有兩個方法：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强暴的压力加在人的肉体上，結果是使用暴力者道德敗坏，而受害者意气消沉。但通过苦行如

絕食等而實現的非强暴的压力，它的作用就完全不同。它不触及肉体，而触及的是那些接受压力者的道德品質，并加强这种品質。”[⊖]

这个观点同印度人的思想有若干程度的融合，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它得到了全国热烈的拥护。很少人認識这个观点的長远意义，就是少数有模糊認識的人也只是在信仰和行动中寻求心安理得。但等到行动的速度减低下来的时候，有些人的心里涌現出了無数的問題，要給这些問題寻找答复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問題并不影响政治上眼前的方向，而涉及的是非暴力抵抗这个观点的全部哲理。从政治意义上講，非暴力运动至今还没有什么成就，因为印度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罪惡控制之下。从社会意义上講，这个运动甚至还没有顧到根本改革的問題。可是稍有一点見識的人都能看到它在印度千百万人中間引起了显著的改变。它使他們培养自己的性格、力量和独立自主，沒有这些宝貴的品質，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进步都很难达到，达到了也很难保持。这些無可怀疑的收获究竟有多少来自非暴力主义，有多少来自冲突的本身，还很难說。各民族已經有許多次是通过暴力的冲突而取得这些收获的。然而我坚信我們可以說非暴力的方法在这方面对于我們有無限的价值。它确实帮助培养了甘地所說的“社会酵母”，虽然这个酵母無疑地有它的基本原因和环境。这个方法在群众当中加速了导致徹底改革的进程。

这是它的显明的优点，但它給我們的帮助并不大。真正的問題还没有得到解答。不幸甘地沒有給我們很多帮助来解决这个問

⊖ 摘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甘地在一次絕食中發表的声明。

題。他給這個題目所寫的文章和發表的演說已經不計其數，但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公開地從哲學或科學方面提到它所有的含意[⊖]。他強調手段比目的重要，感化的手段比強迫的手段重要，並且傾向於把非暴力手段看作與真理和一切的善是同一的東西。他也確實常常把這幾個字當作同義字來使用。他还傾向於把一切不贊成這個手段的人放在良民隊伍以外，認為他們違反了道德條例。對於他的一部分門徒說來，這種傾向必然會導致一種自以為是的感覺。

但是我們一些沒有緣分得到這種信念的人被一大堆疑問所苦惱。這些疑問同當前的需要關係不大，而是關係到我們在理智上要求有一種能指導我們的行動的哲理，這個哲理既要合乎個人的道德觀點，同时也要能在社會上行之有效。我承認這些疑問一直存在我的心上，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答。我是極不喜歡暴力的，可是我自己卻渾身是暴力，時常有意或無意地打算強制別人。甘地的心理強制使得他的許多親密的門徒和同事陷入意志軟弱的狀態，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強制嗎？

但真正的問題是：既然非暴力主義是要大大地提高人類全體到愛和善的很高的水平，究竟民族和社會的集團能夠充分感受這種非暴力主義的個人信條嗎？不錯，唯一的真正有價值的最後理想是提高人類到這樣的水平，消滅憎恨、丑惡和自私。這個理想甚至到最後是否能夠實現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但如果沒有這個理想，人生的希望就差不多會變成“白癡講的故事，有聲有色，但毫無意思”。如果要實現這個理想，我們是否直截了當把這些道德宣講

⊖ 理查·格雷格在“非暴力的力量”一書里從科學方面討論這個題目。這是一部極為有趣而且發人深思的書。

一番，对于阻止理想实现和助长逆势的一些障碍都置之不理呢？难道我们不需要先扫除这些障碍，然后给爱、美、善的发展创造更适当、更有利的环境吗？还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过程合而为一呢？

再说，暴力和非暴力、强迫和感化之间的界线是不是那样明显呢？作为强迫的因素来说，道德力量往往比肉体的暴力可怕得多。非暴力主义和真理是不是同义呢？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过数以千计的答案，但至今还是一个问题。不管真理究竟是什么样子，它同非暴力主义确实不是完全相等。暴力本身虽然不好，但不能认为它本来就是不道德的。形形色色的暴力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同更坏的东西相比，它往往还是可取的。甘地自己也说过暴力比胆怯、恐惧、奴役以及其他许多邪恶要好些。不错，暴力通常和恶意是分不开的，但至少在理论上不是永远这样。我们可以设想暴力可以拿善意为基础（比如外科医生的善意），而以善意为基础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是不道德的。总之，好意和恶意是伦理和道德的最后测验。因此，暴力虽然从道德上看常常是不正当并且很危险的，但不是永远如此。

一切生活都充满了冲突和暴力，暴力产生暴力似乎是真实的，因此暴力并不是克服暴力的方法。但是全然否认暴力就会产生一种脱离人生的完全消极的态度。暴力正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活力。没有国家的强制机器，税收就征取不到，地主拿不到地租，私有财产就会消灭。法律依靠武装力量使私有财产不被别人占用。民族的国家本身因为有进攻和防御的暴力才能够存在。

事实上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决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它不是不抵抗，而是非暴力的抵抗。非暴力的抵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积极的、能动的行为方法。它不是为那些温顺地安于现状的人使用

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制造“社会酵母”，从而改变现状。不管它的感化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力的强制武器，虽然这种强制是采取极文明而且毫不讨厌的方式来进行的。当我们看到甘地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当真也用“强迫”的字眼时，确实觉得有趣。一九二〇年甘地批评总督（契尔姆斯福特勋爵）谈论旁遮普戒严令的错误的演说时写道：

“勋爵阁下在市政会议开幕的时候发表这个演说使我看到一种心理状态，使我感到凡是有自尊心的人是不可能同他本人或他的政府发生联系的。

“关于旁遮普的言论就是干脆拒绝做任何的修正。他要我们注视最近‘将来’的问题！而最近的将来是要促使政府对旁遮普的事件表示悔过。但是政府对此并无表示。相反的，勋爵阁下拒绝人家的劝诱，对批评者不作答复，这就是说他对于影响印度名誉的许多重要事件的意见还没有改变。他‘满足于把这问题留待历史去判断’。现在我认为这种论调是故意讲出来进一步激怒印度人的心情的。试问对于受了委屈的人，对于那些仍然听凭一些全然不配担任机密和重要职务的官员的摆布的人，历史的有利判断又有什么用处呢？既然决定不以公正对待旁遮普，那么要求合作的提议至少可说是虚伪的。”

各国政府都是臭名昭彰地以暴力为基础的，它不只是武装队伍的公开暴力，而且还有更加危险、运用更加巧妙的暴力，比如间谍、通风报信者、暗探、虚伪的宣传、直接和间接教育、报纸，等等，以及宗教和其他种种的恐怖、经济贫困和饥饿。至于两个政府之间，大家认为任何虚伪和背信弃义只要不被别人发觉，都是正当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三百年前，亨利·伍顿爵士——诗

人、曾任英国駐外大使——給大使下了一个定义，說是“被派到国外为本国利益說謊話的誠实人”。今天的大使再加上陆、海軍武官和商务参贊等人的帮助，他們的主要任务是在駐节的国家进行偵察。他們的背后有大規模的特务網在活动，包括層出不窮的陰謀和欺騙、間諜和反間諜、同罪惡的下流社会的勾結、行賄、人性的敗坏、暗杀等等。这种事情在平时已經很坏，战时則变本加厉，而且它的有害的影响向各处弥漫。今天看到世界大战中一些宣傳的事例真使人惊异，比如散布对敌国的荒謬絕倫的謠言，以及用在宣傳和特务活动的巨大款額等。但是和平在今天成为兩次战争当中的暫息時間，成为战争的准备，并在若干程度上成为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冲突的繼續。战胜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附屬国之間、特权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存在着繼續不断的拉鋸战。因此，連在承平时期仍然有某种程度的战争气氛以及与之俱来的各种暴力和謠言。軍人和文职官吏都是为了应付这种局势而受訓練。伍尔斯萊勳爵在“軍人作战手冊”中写道：“我們坚持这样的信念：‘誠实是最好的方針’，真理永远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漂亮的詞句写在小孩的練習本里是很好的，可是一个人如果照着这些话去打仗，那不如把他的刀子永远插进鞘里好了。”

在国与国、階級与階級互相冲突的現狀之下，暴力和虛伪的这个基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特权的国家和集团为要維持他們的势力和特权，不讓那些被压迫者有發展的机会，必須依靠暴力、强制和虛伪。随着輿論的增長以及这些冲突及其压力更加显著之后，暴力的趨勢可能有些削弱。事实上最近一切經驗証明了結果适得其反；由于現有制度遭到越来越有力量的反抗，暴力也随之增長。即使外表的暴力削弱下去，它却采取了更巧妙更險惡的形式。理

性也好、宗教观点或道德也好，它們的增長都沒有制止暴力的傾向。在人的等級上，個人的地位已經提高，也許今天世界上的高等人物（最高等的除外）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得多；整个社会是进步了，在極小程度上开始控制原始的和野蛮的本能。但总起来說，各个团体和組織並沒有很大的进步。个人在提高文明程度的过程中把他許多原始的情感和缺点帶給了团体，并因为暴力总是吸引道德較差的人，所以这些团体的領袖很少是最优秀的男女。

但即使我們設想国家將來会逐漸消除最惡劣的暴力方式，我們也不能抹煞政府和社会生活必須有若干强制这一事实。社会生活需要有某种政权的形式，而当政的人必須制止和防止一切个人或团体的与生俱来而且有害于社会的自私傾向。由于被权力所腐蝕和敗坏，他們做起来通常总是过火的。所以那些統治者不管怎样热爱自由、憎惡强制，也不得不对个别的反抗者施行强制，一直等到国家里人人都变为尽善尽美、大公無私、完全服从公众福利的时候为止。国家的統治者还必須对国外为掠夺而进行侵犯的集团施行强制，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自衛，以武力对抗武力。这种需要只有等到單一的世界国家成立之后才会消灭。

如果武力和强制在对外防御和內部團結都是必要的話，那么怎样在这当中划一条分界綫呢？賴因荷德·尼布尔指出[⊖]，一当倫理向政治作了这次重要的讓步以及强制被公認為社会團結的必要工具之后，暴力的强制和非暴力的强制之間，政府运用的强制和革命者运用的强制之間就不可能再作絕對的區別了。

[⊖] 見“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

我不确实知道,但我想像甘地会承認: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一个民族国家不得不使用武力抵抗外来毫無理由的襲击以保衛自己。当然这个国家應該对鄰邦和其他国家执行絕對和平与友好的政策,但否認外来襲击的可能性是荒謬的。国家也不得不通过一些有强制性的法律,意思就是要剝夺各階級和集团的一些权利和特权,并限制行动的自由。一切法律在若干程度上都是强制的。国大党的喀喇蚩綱領規定:“为了消灭对群众的剝削起見,政治自由必須把千百万飢餓者的真正經濟自由包括进去。”要实现这样一个很好的理想,过多享受特权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些非特权者多讓步一些。綱領进一步規定工人必須有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和其他各种福利;对私有財產征收特种捐稅;“国家应占有或管制重要的工業和業務、矿产、鐵路、航路、船运以及其他公共運輸的工具。”綱領并規定“烈性的飲料和麻醉剂一律禁止使用”。这一切也許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反对。他們也許会順从多数人的意志,其所以順从是因为害怕不順从的后果。民主确实就是多数强制少数的意思。

如果法律影响了私有財產的权利或在極大程度上廢除这种权利,并且被多数人通过的話,那么这种法律是否因为它的强制性而應該遭到反对呢?显然是不應該的,因为一切民主法律的通过都采用这同样的程序。所以强制不能成为反对的理由。也許有人說多数人的行动是錯誤的或不道德的。于是我們就要問:多数人通过的法律是否触犯了什么倫理的原則。而且誰来决定这个問題?如果我們允許个人或团体各按自己的利益来解釋倫理的話,那么民主程序就要完蛋了。我个人覺得私有財產制度(除了極狹义的以外)使个人有控制整个社会的危險的权力,因此对社会極为

有害。我認爲這是不道德的，而且遠比喝酒爲不道德，因爲喝酒對個人的損害比對社會的損害較多。

但是有些自稱是信奉非暴力主義的人對我說：使私有財產國有化的企圖除非得到物主的同意，就是強制，因而也是違反非暴力主義的。關於這個觀點，大地主和擁有許多工廠的資本家給我的印象很深；前者毫不遲疑地倚仗國家的權力強收地租，後者連獨立的工會都不許留在他們的工廠里。大多數有關的人民願意改革，單單這一件還是不夠，應該對那些要受到損失的人也加以感化。這樣，一些有關方面才會支持那種分明有利的改革。

如果歷史上有一件事能夠證明上述這點的話，那就是這件事：經濟利益形成各團體和各階級的政治觀點。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這種利益。個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棄特殊的權利，這雖然是少有的事情，但階級和團體卻不會這樣。因此感化一個統治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它的權力和不正當的特權，這樣的企圖一直是失敗的，似乎也沒有什麼理由說將來能夠成功。賴因荷德·尼布爾在他所著的書里駁斥道德家說：“他們以爲個人的利己主義由於理智的發達或宗教感的善意的滋長而正在逐步受到壓制，並且以爲只有這個過程繼續下去才會對於一切人類社會和集團之間實現社會調和是必要的”。這些道德家“忽視人類社會的正義鬥爭中必要的政治條件，由於他們不認識人類集體行為中一些成分，這些成分是屬於自然範圍的，不能完全歸之於理智或良心的領域。他們不認識：當集體力量，無論是帝國主義或階級統治，在剝削弱者時候，除非用強力去對付它，是決不能打敗它的”[⊖]。作者又

⊖ 見“道德的人和道德的社會”。

說：“因为理智在若干程度上一直以社会中的利害关系为轉移，所以單有道德或理智的說服力还不能实现社会正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冲突中，强力必須以强力去对付它。”

因此，如果有人打算純粹靠理智的辯論和訴諸正义来感化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或者消除冲突，那是欺騙自己。以为不必施用等于强制一样的有效压力，而居于統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就会放弃对另一国家的統治，或者一个阶级就会放弃它的优越地位和特权，那是幻想。

甘地显然也想施用那种压力，虽然他不把它叫着强制。据他說，他的方法是苦行。因为这里面有形而上学的成分，無法衡量，也不能用其他唯物的观点来研究，所以有点难于說明。不过他的方法能够很显著地影响对方是不成問題的。它揭穿对方的精神防御，挫折他的意志，打动他的内心，打开了和解的大門。毫無疑問：爱和苦行的态度無論对敌人或旁观者都会产生强烈的精神反应的。大多数獵人都知道一个人在遇着野兽的时候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他似乎在远处就感觉到野兽来侵的声势而發生反应。甚至連他自己也还不觉得的那点恐惧，也会透露給野兽，这就使得它害怕，而在害怕当中野兽就向他进攻。如果馴獅者稍有一刻气馁，他立即就有遭遇攻击的危險。一个有十足胆量的人除非偶然遇到不幸事件，很少时候会吃野兽的亏。因此人类容易感受这类精神影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个人虽然可能感受这种影响，阶级或团体是否也这样，还是疑問。作为阶级來說，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不發生个人的和亲密的接触；甚至它听到的报告也是局部的、歪曲的。無論如何它对一個侵犯它的地位的团体会产生自發的憤怒的反应，而反应之大盖过了一切次要的情緒。由于長期以来它習慣

地以为它的优越地位和特权对于社会利益有必要，因此任何相反的意见都含有异端的气味。法律、秩序和維持現狀变成了最高的美德，而侵犯这些美德的一切企圖都是元凶巨惡。

由此可見，对于敌对团体，感化的办法不会有很大的作用。的确有时候我們的温和賢良会使敌对团体惱羞成怒，因为这好像使它們理屈，而且当一个人怀疑自己有錯的时候，良心上反而会發生憤怒的。但非暴力的手法对一些个别的人們却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因而軟化了他們的反抗力量。甚至它更获得中間分子的同情，成为影响世界輿論的有力工具。可是这里又有一种可能：統治集团封鎖消息不許外露，或者歪曲这些消息，因为它控制着宣傳机关，所以能够掩盖真相。但非暴力的方法所产生的最强、最深远的的影响还是在实行这个方法的国家里許多关系不大的人們身上。他們的确受到了感化，往往成为这个方法的热烈拥护者；既然他們一般都贊成我們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不需要我們很多的感化了。但这个方法对于害怕改革的人們的影响却并不那样显著。不合作主义同和平抵抗运动在印度迅速的傳播，就証明非暴力主义运动在广大人民身上如何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如何感化了許多动摇分子。可是对那些一向对它怀着敌意的人却没有發生显明的感化。事实上运动的成功反而增加了他們的恐惧，甚至增加了他們的仇視。

如果我們曾經承認：为了維持自由，国家使用暴力是正当的；那末为了爭取自由，国家使用暴力和强制的方法却不正当，这是难以理解的。暴力的方法也許不好和不合时宜，但不会完全不正当以致須要加以禁絕。如果一个政府碰巧是控制武裝力量占优势的党，仅仅这一事实并不說明它有使用暴力的更大的权利。如果非暴力的革命取得并控制了国家政权，它是否立即获得原来沒有的

那种使用暴力的权利呢？如果一旦發生反抗这个政府的叛变，它怎样去应付呢？当然它是不願意使用暴力的方法，而要用一切和平方法来应付这个局势，但它不能放弃使用暴力的权利。在人民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頑固不化的分子反对改革，企圖恢复原狀。如果他们以为他們的暴力不会遭受新政权的强制机器的镇压的話，他們就更可能放縱下去。因此在暴力与非暴力、强制与感化之間要划一条固定的界綫似乎是完全办不到的。考虑政治改革已經够困难的了，而考虑特权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政治改革那就更加困难得多。

为了一个理想受些苦难，这是一向博得大家的称許的；为了一个事業受些苦难，既不屈服也不回击也是值得称道的高貴、偉大的品質。但是这点同为受苦而受苦的差別不大，后一类的苦行容易变成病态，甚至于有点墮落。如果暴力主义往往是殘酷的話，那么非暴力主义的消極方面至少会犯相反的錯誤。它常常有可能成为胆怯、懈怠和維持現狀的掩飾。

几年来，自从社会的根本改革这个思想在印度被人重視以来，有人常說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暴力的使用，因此不應該提倡。階級斗争絕不該談（虽然階級斗争很可能存在），因为它会破坏完美合作的远景，并破坏用非暴力的方式向未来目标前进的步驟。特权階級为了維持他們的有利地位似乎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因此在某一阶段不用暴力就不能解决社会問題，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理論上如果采用非暴力的手法能够实现偉大的政治改革的話，那为什么采用这个手法就不能够实现根本的社会改革呢？如果我们能够以非暴力的方式获得政治自由，并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排除出去的話，那为什么我們不應該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封建王

公和地主的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并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呢？這一切是否都能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倒不很重要。問題是：要末這兩個目標都能用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要末都不能夠。決不能說非暴力的方法只能用來反對外國統治者。表面上看來，用它來在國內反對本國的自私自利的派系和破壞者應該容易得多，因為對這些人的心理影響比在別處要更大些。

近來印度有一種傾向：有人抨擊一些目的和政策，只是因為它們同非暴力主義發生衝突，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由於對這類問題有不正確的看法。十五年前我們就採用了非暴力的方法，因為它可能使我們以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達到我們的目標。當時我們的目標和非暴力主義是分離的，目標不是非暴力主義的附屬物或結果。當時沒有人能說：如果自由或獨立能夠用非暴力的手段取得，那末我們只能以自由或獨立做我們的目標。但現在我們的目標本身卻以非暴力主義來衡量，如果它和非暴力主義不相符合，就要遭到摒棄。於是非暴力主義這個觀念變成了不可侵犯的、死板的教條。這樣一來，它就逐漸失去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持，而鑽進了信仰與宗教的檔案里。它甚至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最後一張王牌，他們利用它來維持現狀。

這樣是很不幸的，因為我相信非暴力抵抗的觀念和非暴力鬥爭的手法對印度以及對全世界都極有價值，而且甘地出了很大的力量推動了現代的思想界注意這個觀念和手法。我也相信它們還會有偉大的前途。也許人類還不夠進步到發揮它們的全部作用。喬治·威廉·魯塞爾的“譯述者”里面一個人物說：“你把遠景的蠟燭獻給盲人，但對盲人說來，他除了用它做棍子以外還有什麼用處呢？”在目前我們的遠景也許還沒有足夠地具體表現出來，但正像

一切偉大思想一样，它的影响将会扩展，將日益影响我們的行动。不合作运动，也就是不同一个我們認為不好的国家或社会合作，这是一个有力的、有能动性的观念。即使只有極少数有德性的人参加不合作运动，它的效果还会扩大开来，而且不断增長的。参加的人数一多，外在的效果就会更加显明，但又將有別的因素来掩盖道德問題的傾向。运动的扩展似乎影响它的深度。集体的人逐渐把个别的人推到后面去了。

但是強調單純的非暴力主义也会多少离开生活并远离生活，而且大家傾向于盲目地、迷信地接受它，或者根本不予接受。知識分子已經裹足不前了。一九二〇年非暴力主义对印度的恐怖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許多人退出他們的队伍，即使留在队伍里面的人也發生怀疑，停止了暴力的活动。可是現在对他們却没有这种影响了。甚至在国大党员的队伍中間，許多骨干分子曾經在不合作主义与和平抵抗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并全心全意遵照非暴力主义办事的，現在却被当作非国大党员的异己分子看待，因为他們不准备把非暴力主义当作信条和宗教，或者不准备放弃他們認為唯一值得爭取的目标，那就是一切人都能享受同等机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有計劃的社会，这个社会只有在廢除了今天还存留的大多数特权和产权之后才能实现。当然，甘地仍然还是主要力量，他的非暴力主义具有能动的、强烈的性質，誰知道他日后不会使全国再掀起一次热烈的运动呢！以甘地的偉大、矛盾和感化群众的力量，他是超过常人的。我們不能像衡量或判断別人那样来对待甘地。但是許多自称追随甘地的人往往变成了無用的妥协主义者、或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主义者、或与生活和现实脫节的狭隘的宗派主义分子。他們团结了一大群人，这些人都是贊成維持

現狀，并借非暴力主义来掩飾他們这个意圖的。于是机会主义偷偷地鑽进来了，而感化敌人的行动在有利于非暴力主义的意圖下却轉而使自己被敌人感化并和敌人站在一条綫上。当我們的热情衰退，变得軟弱無力的时候，我們总是掉轉头去同敌人妥协，而且安慰自己說这是爭取对方的艺术。有时我們是牺牲自己的老同事来取得这种收获的。我們斥責他們的奢侈、斥責他們激怒我們的新朋友的言論，并斥責他們破坏我們的队伍的团結。这不是进行社会秩序的真正改革，而是強調在現有制度內部的仁慈和寬大，讓既得利益集团仍旧安然無恙。

我認为甘地強調手段的重要，對我們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但是我确信更應該強調的是目的。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这点，显然我們就要漂泊不定，浪費我們的精力在無关重要的枝节問題上。不过手段也是不能忽視的，因为除了道德的意义外，它还有实际的作用。坏的、不道德的手段往往会損害目的，或引起重大的新問題。归根結蒂，使我們能对一个人作出真正評價的是他所采取的手段，而不是他所宣布的目的。采取了会引起無謂糾紛和积怨的手段很可能使目的更难达到，更为遙远。目的与手段确实是密切結合，互相分不开的。所以手段主要是减少糾紛，少惹怨恨，或至少要尽量限制它們的發生（因为糾紛和怨恨是避免不了的），并發揚善意。手段比任何其他方法更注意动机、意圖和心情。这也正是甘地所強調的基本动机；如果甘地沒能使人的本性有显著的改变，他却使这个动机影响了关系亿万人的大規模的全国运动，这一点是有惊人的成就的。他坚持遵守严格的道德紀律，这点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他那个人紀律的标准也許还有爭論的余地。他極重視个人的罪惡或缺点，但極少注意社会罪惡。这种个人紀律显然是有必要，

因为离开荒原而去勾结得势的特权集团以便飞黄腾达的这种引诱力已经引走了许多国大党员。对于享有盛名的国大党员说来，那块乐土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

全世界今天处在各种危机之中，而最大的是精神的危机。特别在东方是这样，因为亚洲近来的改革比其他地方更加迅速，而且整顿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决定局势的政治问题也许是最不重要的问题，虽然对我们是首要的问题，而且解决真正的问题之前一定要先好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过去若干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固定的不变的基本社会秩序，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秩序是社会的唯一的、正当的基础，并把我们的道德观念同它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要以现在来适应过去的企图是失败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经济学家魏伯伦写道：“归根结蒂，经济道德取决于经济的需要。”今天的需要迫使我们制定新的道德以适应这种需要。如果我们要为这精神危机打开一条出路，并认识今天的真正的精神价值，我们就不得不坦白、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而不要逃避到任何宗教教条下面去。宗教所讲的可好可坏，但它的讲法以及劝说我们的方法的确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任何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曾指出的，宗教教条“是值得相信的：第一，因为我们的远祖已经相信了它们；第二，因为我们证明，而这些证明正是从那个远古时代留传下来的；第三，因为根本不准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从宗教的、教条的观点来研究非暴力主义及其一切含义，那就沒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它被局限在一个宗派的狭小的信

⊖ 见“幻想的将来”。

条範圍里面，使我們或是全部接受，或是全不接受。它喪失了生氣，不結合當前的問題。如果我們結合現狀來討論非暴力主義，那末它對我們改造世界的企圖才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樣做法必須注意集體的人的本性和弱點。一切大規模的行動，特別是旨在根本的、徹底的改革的行動，不僅受領導者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現狀，尤其是領導者工作的對象——人類——的思想的影响。

在世界歷史上，暴力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今天它還在起着同樣重要的作用，也許還要這樣繼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過去多數的改革是由暴力和強制引起來的。格拉斯頓說過：“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我國人民除了把憤恨暴力、熱愛秩序和實行忍耐記在心外，在政治危機中不給他們一些指示，那末這個國家的自由就永遠得不到。”

無論過去和現在，暴力的重要性都是不能忽視的。忽視暴力的重要就是忽視人生。然而暴力無疑是不好的，並且還帶來層出不窮的壞事。而且更壞的是常常隨暴力而來的怨恨、殘暴、報復和懲罰等等的動機。暴力本身是不壞的，其所以壞就因為這種動機。但沒有這種動機的暴力是可能存在的。暴力可以有好的目的，也可以有壞的目的。但要把暴力和那些動機分開卻極為困難，因此最好盡量避免使用暴力。可是要避免使用暴力，我們却不能採取遷就別的更大的罪惡的消極態度。屈從暴力或忍受以暴力為基礎的非正義的政權正是非暴力主義精神的消極的一面。非暴力的方法如果是正確的話，就必須有能動性，必須是能夠改變這種政權或社會秩序的。

究竟非暴力的方法能不能夠做到這點，我可不知道。我認為暴力能夠引導我們走得很遠，但我還懷疑它是否能夠引導我們達

到最后的目的是。無論如何，采用某种强制的方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掌握政权和享受特权的人非到迫不得已时，非到环境形成了維持这些特权比放弃这些特权对他们为害更大的时候决不肯放弃。目前社会里的冲突，民族的以及阶级的，除了使用强制，根本無法解决。当然，我們还必须大规模地采用感化，因为多数人如果没有被感化，那末社会改革运动还不能有真正的基础。但对某些人的强制还是会有。掩盖这些基本冲突，設法否認它們的存在，也不妥当。这样不仅抑制真理，而且对人民蒙蔽真相就是直接支持了現有的秩序，并且使統治阶级得到了他們一直在寻找的道德基础，而为他們的特殊权利作辯解。要反对一个不正当的制度，必須揭穿作为这个制度的基础的虛伪前提，并暴露它的真相。不合作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我們不迁就这些錯誤的前提和謊言，也不給它們推波助瀾，从而把它們暴露出来。

我們的最后目的只能是一个一切人都享受平等的經濟权利和机会的無阶级社会，一个按照計劃組成的社会，这个計劃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物質、文化的水平，培养精神道德、合作、大公無私、服务精神、寻求正义的願望、善意与仁爱，以至于最后达到世界秩序。凡是阻碍我們实现这个目的的东西必須除掉，消除的方式可以和平緩和就和平，必須强制就强制。我們常常需要强制，这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如果我們要用强制，我們却不应以仇恨或凶暴的精神来强制，而应以消除阻碍的正当願望来强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而且沒有捷徑可循，前途还有許多荆棘。困难与荆棘并不因为我們不理睬它們而自行消灭，而是我們了解了它們的本来面目并勇敢地正視它們才会消灭。这些话听起来很像烏托邦式的空想，許多人很可能不为这些崇高的动机所动。但我們可以把它們

作为目标，強調它們的意义，也許漸漸它們会減輕我們滿怀的怨恨与欲望。

我們的方法必定会實現这个目标，也必須以这些动机为基础。但我們也必須認識：人类的本性就它整个的現狀来看，它是不会永远响应我們的号召和劝說的，也不会永远按照崇高的道德原則来办事。感化以外，往往还需要强制，而我們所能做的是限制这种强制并利用它来减少罪惡。



第六十四章 再进台拉·頓監獄

我在阿利波尔監獄的時候身體很差，體重顯著降低，而且加爾各答的空氣以及與日俱增的炎熱使我苦惱。這時謠傳我將遷移到氣候較好的地方去。五月七日有人來叫我收拾行李，搬出監獄，轉到台拉·頓監獄去。禁閉了几个月之後，在清涼的晚風中驅車通過加爾各答是很爽快的，豪拉火車站里的人群使人迷戀。

我很高興這次轉移，我嚮往着台拉·頓和附近的山巒。可是當我達到那里時，我發現九個月前我離開那里前往內尼的時候的一切景象已經面目全非了。我被安置在一個新地方，一間打掃得很干淨并經過改裝的舊牛棚。

作為牢房，還不算壞，而且它附帶有一條小走廊。房外也有一個小院子，約五十英尺長。這間牢房比我上次在台拉·頓住的那間古老的牢房要好些，但不久發現其他方面卻沒有較好的改變。四周圍原有十英尺高的牆垣專門為我加高了四、五英尺。我所仰望的山景完全被這牆遮住，所能看到的只是幾棵樹的樹頂。我在這個監獄里關了三個多月，可是山的景色連一眼也沒看到。這次不像先前那樣我可以走出監獄的門口，因為他們認為我那個小院子的空間已足夠我鍛煉身體的了。

這些限制以及其他新的限制使我感覺失望和煩惱。我漸漸無精打采，連院子里能夠做的那點運動我也不高興做。我從來沒有

觉得这样孤独，与人世隔绝。单独的禁闭开始影响了我的神经，我的身心都衰退下去了。我晓得牆的那边不过几英尺远的地方就是一片葱翠而芬芳清凉的草香、松软的土地和辽阔的景色。可是这一切都和我隔绝，我只有终日面对牆壁，把眼睛都看得枯涩了。这里连囚牢里通常有的活动都没有，因为我是单独关在一个地方的。

六个星期之后雨季骤然来到，大雨如注，第一个星期我们这里就下了十二英寸的雨。空气发生变化，使人感觉呼呼有生气。气温降低了，身上轻松和舒适起来。可是我的眼睛和心里却不觉得轻松。有时我的院子里的铁门打开一点，只容一个看守人进出，在这一刹那我突然瞥见外面的景色：青翠秀丽的田野与树木，上面闪烁着雨点。仅仅是一刹那，随即像闪电似地消失了。牢门是很难得大开的，分明是看守人接到了训示不许在我走近时开门，即使开门，也只许稍微开一点。像这样匆匆看一眼青葱、鲜明的景色，我并不怎样欢迎，因为它引起了我想家和感伤，所以每当牢门打开的时候，我反而避开不去看它。

这一切烦恼虽然是由监狱引起的，但事实上不应归罪于监狱。这是外界事件如我的妻子卡麦拉的病和我的政治烦恼的反应。我开始晓得卡麦拉的旧病复发，我自己觉得一筹莫展，对她爱莫能助。我晓得我如果在她的身边，情况就会不同的。

台拉·顿监狱不像阿利波尔，我在这里准许看一份日报，因此我掌握了外面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隔了将近三年（在这期间，它大部分时候处于非法状态。）又在巴特那开会了，会上的议程令人沮丧。它使我惊奇的是当印度和世界这样扰攘多事的时候，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竟没有做任何工作来分析局势、充分讨论、以摆脱老一套的做法。甘地依然是独裁的老

作風，站在远远的地方，說：“你們如果要服从我的領導，就要接受我的条件。”他这个要求完全是自然的，因为我們不能既要他的領導，又要他違反他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但他似乎發号施令过多，而互相討論制定政策太少。甘地既然支配了人心而又埋怨人民無可救藥，这是很可怪的。我猜想很少人比甘地更能使群众心悅誠服，因此甘地責备群众沒有达到他为群众規定的高的准則，似乎是不公平的。在巴特那會議上他因为要繼續进行哈利真的旅行，連會議的結束都等不得。他吩咐了全印国大党委員會要認真办事，要迅速通过工作委員會提給他們的決議，于是离开了會議。

曠日持久的討論于事無补，这也許是实在的。黨員中間是一团混乱不清，虽然有許多人准备对这进行批評，但並沒有什么建設性的建議。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斗争的責任大部分落在来自各省的領導人身上，而这些人已經有些疲劳，頭腦不清醒了。大家隱約地覺得他們不得不高喊停止行动，停止和平抵抗运动，但下一步又怎样呢？这就形成了兩派：一派要通过立法机关采取純宪法行动，另一派有要走社会主义路綫的模糊思想。多数的黨員既不屬於这派，也不屬於那派。他們不喜欢恢复宪法运动，同时社会主义又使他們有点害怕，覺得它是分裂他們的队伍的因素。他們沒有建設性的思想，他們的唯一希望和最后的靠山就是甘地。即使他們当中有許多人并不完全贊成甘地所說的話，他們仍然像以往那样去找他，听从他的領導。甘地支持那些温和的宪法运动分子，使他們支配了委員會和国大党。

这一切都是可以想得到的。不过反动势力使国大党倒退得比我原来想的更远。自从不合作运动开始以来十五年中間，国大党領袖还没有用过这种極端宪法运动的語調說过話。甚至二十年代

中叶的自主党虽然是从反动势力中产生的，也比这些新的领导前进得多，我們現在就沒有像自主党那样的领导人物。許多人在参加运动还是冒险的时候一直故意离开这个运动，現在却都鑽进来占据了重要地位。

政府取消了对国大党的禁令，于是党变成了合法的組織。但是同它有联系的以及附屬的团体有許多仍然是不合法的，例如它的志願队，一些半独立的农民协会以及几个教育机构和青年团，包括兒童組織在內。特别是“真主的僕人”，或所謂边省紅衫党人，仍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个組織在一九三一年成为国大党的一个正式部分，是党在边省的代表。因此，国大党虽然完全撤消了斗争的直接行动部分，恢复了宪法运动的方式，可是印度政府却繼續执行关于和平抵抗运动的特別法律，甚至还繼續禁止国大党組織的重要部分。它还特別注意鎮压农民的組織和工会，同时，看起来很有趣的是政府的高級官員到处奔走去催促柴明达和其他地主們組織起来，給这些地主的組織以一切的方便。在联合省里有兩個大的組織的捐款和稅收一起都由政府机关征收。

我可以說我从来沒有偏袒过印度教教派組織，或是伊斯蘭教教派組織。但有一件事使我对印度教大会特別感觉不滿。大会有一位秘書竟然贊成延長对“紅衫党”的禁令，并向政府表示同意。正当沒有剧烈运动的时候，居然同意政府剥夺最基本的公民权，这真使我惊奇。除了这个原則問題以外，尽人皆知的是，边省人民在这些年的斗争中表现得極为杰出；他們的領袖阿卜杜尔·加法尔·汗是印度最英勇、最正派的人物之一，仍然作为国事犯被监禁在獄中，还没有审問。我觉得教派的偏見已經發展到了頂点，希望印度教大会的更杰出的領袖們对这件事情赶紧否定他們的同事的

作法。可是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对这事说过一句话。

我对印度教大会这位秘书的发言是甚感不安。这个发言本身已经很坏，我并且觉得它是国内新事态的象征。在那天炎热的下午，我沉沉睡去。我记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阿卜杜尔·加法尔·汗四面受敌，我为了保护他也加入了战斗。随后我在精疲力竭中醒来，感觉非常难过，眼泪流湿了枕头。这种情况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在醒的时候不容易这样感情冲动的。

那几天我的神经显然很坏。睡眠不安，这是平常极少有的事，而且各种噩梦都来纠缠我。有时我在睡梦中喊叫。有一次叫声显然比平时更凶，我在惊醒时看见两个看守人站在床边，他们对我的叫声颇感焦虑。这次我做的梦是正要被人勒死。

差不多在这同时，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也使我感觉痛苦。据说：“鉴于没收私有财产和需要阶级斗争的这些妄谈”，因而通过了这项决议，决议还进一步提醒国大党人：喀喇蚩决议“既不考虑没有正当理由或赔偿就没收私有财产，也不考虑阶级斗争的主张。工作委员会并认为没收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是违反国大党的非暴力的信条的。”这个决议的措词很粗糙，说明起草人对阶级斗争是相当地无知的。这项决议分明是针对新成立的国大社会党的。事实上这个党的负责人没有一个谈过没收私有财产的话，但是他们却时常谈到在目前情况下的阶级斗争。工作委员会的决议似乎暗示：任何人如果相信阶级斗争的话，那末他连一个普通的国大党员也不配做。从前是没有人责备国大党转向社会主义的，也没有人责备它反对私有财产。有些党员当时是有那些意见的，但现在他们在这个无所不容的全国组织里连普通党员的地位都没有了。

大家常說：国大党代表全国，从王公到貧民，它包括每个团体和派別。全国性的运动也往往自称是这样，大概是說他們代表全国大多数的人，他們的政策有利于一切派別。但这种說法分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个政治組織要能够代表互相冲突的派別就没有不变成一个缺乏显明特点、而且軟弱無力、毫無意义的东西的。国大党要么是一个有明确（或模糊）目标、有取得政权的理論、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实现全国利益的政党，要么仅仅是一个慈善的、人道主义的組織，沒有自己的主張，但求八面玲瓏。它可以只代表一般同意那个目标和理論的人，而那些反对这个目标和理論的人也許会被它当作反民族、反社会主义和反动分子，而且必須制止或消灭这些人的影响才能实行該党自己的理論。全国反帝运动确实具有大家同意的广泛基础，因为它不触及社会矛盾。所以国大党在不同程度上的确代表了印度絕大多数的人民，它吸收了各种不同意見的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反帝問題上意見一致，有些甚至对这个問題还有很大的分歧。对反帝这个基本問題持有相反的意見的人是不参加国大党的，而且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袒护英国政府。因此国大党成为一个永久的、各党各派的党，它包括許多团体，互相影响，并团結在一个共同信仰和甘地的人格感召之下。

后来工作委员会企圖解釋它关于階級斗争的決議。这个決議在文字方面或在明文規定的条文方面都不如它对国大党又一次指出党應該走的道路这一事实那样重要。这个決議显然是国大党的新議會派所發動的，他們的目的是在未来的联邦院里取得有产者的支持。由于他們的要求，国大党越来越向右傾，并且打算爭取国内的稳健同保守分子。它甚至对过去一向仇視国大党运动并且在和平抵抗运动进行中袒护政府的人也講好話。它覺得好吵鬧、好

批評的左翼是这种調解和“感化”的障碍；工作委員會的決議以及許多个別談話都說明党的执行机关不会因为左翼的喋喋不休而改变它的新的道路。如果左翼不老实些，那它就要受到鎮压，还会从党的队伍里清除出去。国大党議會会局發表的宣言包括一項綱領，比十五年来党所主張的任何綱領都慎重和温和得多。

且不提甘地吧，国大党的領導中有許多知名人士，他們在爭取自由的民族斗争中都有过光輝的功績，并以忠貞和勇敢受到全国的尊重。但党的政策的新方向讓許多够不上說是思想家的人都鑽进了党的次要的行列，甚至于前列。在党的队伍中当然有許多思想家，但今天党的門戶对冒險家和机会主义者比过去开得更大大。除了甘地那样令人难解而且不可捉摸的人格統治整个局势以外，国大党似乎具有兩付面孔：在純政治方面它有幕后操縱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像一个充滿了虔誠和热忱的祈禱会。

在政府方面，它是毫無掩飾地兴高采烈，認為他們鎮压和平抵抗运动及其支派的政策获得成就。他們的手术是成功了，可是对眼前病人的死活却不大关心。即使国大党一时有点回心轉意，但他們仍然主張执行这个政策，只是稍微加以改变。他們曉得只要基本問題不变，国家政策上的这种改变只是暫时的，如果他們那方面一有松懈，可能引起运动更快地發展。或許他們还以为，如果他們繼續鎮压国大党或工农队伍中的进步分子，也不会十分触怒国大党内比較稳重的領袖的。

我在台拉·頓監獄时的思想大致就是这样。关于时事其实我沒有資格表示什么明确的意見，因为我和时事脫节。在阿利波尔的时候我是几乎完全脫节的，現在在台拉·頓，政府選擇給我的一份報紙使我看到一部分消息，有时是片面的消息。如果我能接触

到外面的同事并对局势加以一番仔細的研究，那就完全可能使我的意見有若干程度的改变。

感慨当前，我于是回想过去，回想自从我参加公共活动以来印度發生的政治事件。我們所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多少是錯誤的呢？当时我想到如果把我的思想写下来，也許比較条理清楚，更有帮助。这样也会使我的心專一，暂时排开我的憂虑和苦悶。因此从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我在台拉·頓監獄里着手写这本“生平自述”，八个月以来中断了好几次，不願动笔，等到心情恢复时才繼續写作。其中有三次中断都达一个月之久。但我总算繼續写下去了，現在即將完成我的个人的旅程。自傳的大部分是在特別不安的情況下写成的，当时情緒很低沉而抑郁。也許这种心情在我已經写好的部分反映了一些，但是就写作本身來說，它已經大大地帮助我从眼前的一切憂虑中掙扎出来。在写作的时候，我不大想到外面的讀者，我是对自己講的，發問与答問都是从自己設想，有时还以此来自娛。我竭力想使我的思想有条有理，我觉得这样回忆过去可能有助于整理我的思想。

七月底，卡麦拉的病况迅速惡化，几天之內变得严重起来。八月十一日我忽然接到通知离开台拉·頓監獄，当晚就被警察押解去阿拉哈巴。第二天晚上我們到达阿拉哈巴的普拉亞格車站，在那里縣長告訴我，我获得短期的假釋以便看望我那病中的妻子。这时离我被捕的时候恰好整整六个月。



第六十五章 十一天

“宝剑磨损了剑鞘，
心灵磨损了胸膛。”

——拜伦

我的释放是暂时的。我接到的通知是这次释放是一、两天，或者較長的时间，这要看医生認為绝对必要时才能决定。像这样使人捉摸不定的特别情况叫我無法安定下来做任何的事。有了一定的期限我才能安頓自己，才能設法利用这个时间。可是現在呢，任何一天，任何时刻，我都会被送回監獄去的。

这次情况的改变来得突然，我完全没有准备。从单独囚禁的地方来到一間挤滿了医生、护士和我的親屬的房子里。我的女兒英迪拉也从散蒂尼克坦来到。許多朋友川流不息地来看我，探問卡麦拉的病况。我的生活狀況迥然不同了，这里有家庭的温暖，美好的飲食。但隱藏在这一切情景后面的是卡麦拉的严重病况所引起的焦虑。

她形消骨瘦，奄奄一息地躺着，同病魔作筋疲力竭的掙扎。一想到我們可能永別，我就感到不胜痛苦。我們已經結婚十八年半了，我回想到結婚的那一天以及后来那些年月。当时我二十六岁，她約有十七岁，一个天真爛漫的小女子。我們的年齡相差很远，而我們的思想相差更远，因为我比她成熟得多。我的外貌虽然是飽

經世故的樣子，但我還是很孩子氣，沒有意識到這位纖弱、善感的女子的心情像一朵鮮花逐漸開放，需要溫存和體貼。我們兩人熱愛相依，很是相得，但我們的背景不同，不能彼此遷就，有時甚至發生摩擦，為了一些瑣事引起小小的爭吵，這種兒女常態過不了多久就又言歸于好了。我們兩人的脾氣都很急躁，多愁善感，而且都有一點愛面子的小心眼。雖然如此，我們的愛情却有增無已，不過彼此缺乏遷就的情形改正得很慢而已。我們結婚後二十一個月，我們的女兒而且是唯一的孩子，英迪拉出世。

我們的婚姻同政治的新發展几乎是同时，从此我就逐漸全神貫注在后者这方面了。当时是自治的全盛时期，不久發生旁遮普的戒严令和不合作运动，于是我越来越陷入公众事务的塵網中去。因为我集中精力在这些运动上面，我完全不自觉地几乎忘掉了她，而正当她需要我充分的合作的时候，我却听她自生自灭。我对她的爱持久不变，而且还在增長。我知道她在一边用撫慰的力量在支持我，这給我很大的安慰。她给了我力量，但她一定觉得难过，觉得有点被我遺忘。像这样半似遺忘、漫不經心的态度倒还不如待她坏些为妙。

随后她的旧病复發和我長期囚禁的时候来了，那时我們只有在獄中会面。在和平抵抗运动中她站在我們的战士的前列，当她也被捕入獄时，她的心情是愉快的。我們兩人是更加靠攏了。难得的相会对我們極為珍貴，我們盼望着会期，数着日子在等待。我們不会感觉对方討厭或沒有趣味，因为我們每次相会只有短短時間，总是有新鮮之感的。我們兩人不断地在对方的身上發現了新的东西，虽然这新的东西也許不很合意。甚至我們兩個成年人的爭吵还有点孩子氣。

过了十八年的婚后生活，她仍然保持着青年处女的面孔，一点没有已婚妇的样子。她差不多还像好久以前刚进门的新妇。可是我自己却大大地改变了；虽然就我的年龄来说我算是健旺、温顺而活潑——有人对我说我仍然有孩子的特征——但我的面貌却不争气。我的头髮灰白，已有一部分秃顶，脸上满是皱纹，眼眶起了黑晕。四年的困苦愁虑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近年来，每当卡麦拉和我同到一个生地方，她时常被人错认是我的女儿，使我感觉很窘。她和英迪拉比起来像两姊妹一样。

十八年的婚后生活啊！但是其中有多少年我消磨在监牢里，卡麦拉消磨在医院和疗养院里呢？今天我又在坐牢，只能出来几天，而她却卧病在床，作垂死的挣扎。我对她不注意自己的身体颇感恼恨。但是她的热烈情绪，由于不能行动，不能以全付精力投入民族斗争，变成焦躁万分，我还能责备她吗？身体衰败到这样的地步，她既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去就医，而内心的热情还在煎熬着她的身体。

难道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竟要离开我吗？那怎么行！我们才开始真正熟识，互相了解；我们的共同生活也才适当地开始。我们相依为命，我们有许多事要互相合作。

这就是我每天、每时在守候她时所想的事情。

同事和朋友们都来看我，告诉我许多事情都是我不知道的。他们谈论当前的政治问题，问我一些问题，我感觉很难回答。我的心不容易离开卡麦拉的病体，而且在监狱里孤立隔绝之后，我也不能突然应付具体问题。长期的经验使我懂得在监狱里得到的有限见闻是不能用来判断局势的。适当的思想反应必须有亲身的接触，否则所表示的意见就可能是纯学院式的，脱离了现实。而且如果

我还没有机会同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进行讨论之前，就对党的政策发表明确的言论，那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对于已做的许多事情，我有满肚子的意见，但我不准备提任何积极的建议。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会出狱，所以事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問題。

当时我还有一个感觉：既然政府很客气地让我出狱看望我的妻子，我如果趁机进行政治活动是不适当的。我并没有担保或保证不进行这种活动，可是我一直被那样的想法约束着。

除了驳斥一些谣言以外，我避免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即使在私人谈话中我也不主张任何明确的政策，但我对过去的事是自由批评的。国大社会党最近成立，我有许多亲密的同事都和它有联系。就我所了解，它的总政策很合我意；但这个党好像是一团奇怪的乌合之众，即使我完全恢复自由，我也不会贸然去参加。地方政治占用了我的一些时间，因为在阿拉哈巴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地方国大党委员选举当中发生了非常有害的竞选运动。这是没有原则的，而纯粹是个人的问题，我被邀请帮助调停已经发生的一些个人纠纷。

我一点也不愿意过问这些事情，也没工夫去过问。虽然如此，有几件事引起我注意，并给我很大的苦恼。令人惊奇的是大家竟然对国大党地方党委选举这样热烈。在那些最突出的人里面有一些是曾因种种私人理由从斗争中退出的人。由于和平抵抗运动撤消之后，这些理由都无足轻重了，于是他们突然出头露面，进行凶猛而且往往粗暴的竞选运动。他们为了急于打败对方，忘记了一般的礼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使我特别难过的是卡麦拉的名字，甚至她的病也被人利用来从事这种地方的选举。

在大家討論得比較廣泛的問題當中有一個是國大黨關於參加未來議會選舉的決議。許多少壯團體反對這項決議，他們認為這是恢復議會的、妥協的辦法，但他們又沒有提出其他有效的辦法。奇怪的是這些反對者之中有些堅持高度原則的人却不反對由國大黨以外的組織來參加選舉。他們的目的好像是要把這塊地盤留給教派的組織。

我對這種地方糾紛和正在迅速發展的政治情況感覺厭惡，感覺和它們格格不入，在阿拉哈巴家鄉，自己像一個客人似的。我不明白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有一天要我處理這些事情，我能做些什麼呢？

我寫信給甘地告訴他卡麥拉的病況。因為我想到我不久就要回到監獄，也許再沒有機會寫信，所以把我的心事透露了一點給他。近來的事情給我很大的苦惱和麻煩，信里稍微反映了這點心情。我不打算提出什麼該做或不該做的事情，我只是說明我對於已經發生的事件的反應。這封信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感情，後來聽說這封信使甘地感到很大的痛苦。

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我等待政府傳喚回獄或其他通知。我時刻聽說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會來命令。同時醫生們每天都要送一份關於我妻子的病情的報告給政府。從我到家以來，卡麥拉的病情稍有好轉。

一般人認為，甚至平常信任政府的人也認為，如果不因為兩件即將到來的事情的話，我可能獲得完全釋放：一件是十月間在孟買舉行的國大黨全體會議，一件是十一月間的議會選舉。如果我出了監獄，在這兩件事情上可能是搗亂分子，因此也許我回到監獄後再過三個月然後釋放。也有可能我不再回監獄，而且這個可能性

是与日俱增的。我几乎决心要安定下来了。

在我被假釋的第十一天，那是八月二十三日，警車开到，警官来到我的面前，告訴我时限已滿，我該随他到內尼監獄。我向家人告別。正当我走进警車的时候，我那有病的母亲伸出双臂，又向我跑来。她的面孔長期盤旋在我的心上。



第六十六章 回到監獄

陰影的伸展是無限的，而陽光就其本質來說，受到百般的迫害。因此憂慮是遠離幸福的；但幸福却為無限憂慮的創痛所破壞。

——“王河”[⊖]

我又回到內尼監獄，我感覺好像又開始一次新的徒刑。入獄出獄，出獄又入獄，我豈不成了一隻羽毛球嗎！這樣來來去去在情緒上振動了我的全身，而且反復的改變使我很難適應。我本來指望還住進內尼那間原來住的牢房，因為上次長期住在那里已經習慣了。那里有些花，原來是我的妹夫朗吉特·潘迪特栽的，那里還有一條很好的走廊。但這所第六號老營房被一個國事犯佔據了，他是未經審問或判罪就被監禁起來的。因為他們認為我不宜同他接觸，所以把我放在獄中另外一處，那里更為隱閉，而且沒有花草。

但這塊日日夜夜居住的地方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重要，因為我的心已在別的地方。我深怕卡麥拉的病況已有的一點轉機經不起我再度被捕的刺激。事實果然如此。有幾天他們把醫生的很短的病情日報送到獄中來給我。這件報告是兜了個圈子來的。醫生在電話里報告給警察署，警察署再轉到獄里。他們認為醫生與獄

⊖ 潘迪特譯：“王河”，“塔朗加”八首，一九一三年。

吏直接接觸是不相宜的。這樣的報告送了有兩個星期，有時候不很按時送來。後來卡麥拉的健康雖然逐漸惡化，報告反而不送了。

壞消息以及等待消息顯得日子沉長不堪，有時晚上更覺難過。光陰好像停滯不動，又像移動得極其遲緩，每一個小時都使我感覺沉重與恐怖。過去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我從沒有過這種尖銳的感覺。當時我以為或許兩個月內或者在孟買國大黨會議之後我會獲得釋放，但這兩個月好像無窮無盡。

在我再度被捕之後恰好一個月，一個警官提我出獄，暫時去看一看我的妻子。他們對我說准許我像這樣每星期看她兩次，甚至時間都規定下來。後來我等到第四天，沒有人來帶我，再等到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我等膩了。消息傳來：她的病情又嚴重起來。我心里想，他們還告訴我說每星期要帶我去看她兩次，這簡直是開玩笑。

最後，九月這個月過去了。這三十天是我有生以來覺得最為漫長、最可詛咒的日子。

通過各種媒介，他們向我示意：只要我保證，甚至非正式的保證，在服刑期間我不過問政治，我就可以獲得假釋去照顧卡麥拉。在那時我是一點也不想到政治的，而且在外面十一天所看到的政治使我深惡痛絕，但是要我提出保證，要我違背我的誓言、我的事業、我的同伙、以及我自己！無論如何，這是辦不到的。做這樣的事等於對我的生存，對我所奉為神聖的一切東西給以致命的損傷。我聽說卡麥拉的病況越來越壞了，如果有我在她的身旁，也許可以改變她的命運。當時是不是我個人的自負和驕傲勝過我救她的心願呢？本來我是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的，但幸而我並沒有感到這種窘境。我知道卡麥拉本人是會強烈反對我提出任何保證

的，如果我做出這類的事情，就會使她受到震驚與損傷。

十月初，我又被提出獄去看她。由於發高燒，她昏睡似地躺着。她希望我呆在她的身邊，但當我要離開她回到監獄去的時候，她勇敢地向我微笑，叫我彎下身來。當我彎下身以後，她對我低聲說：“關於給政府提供保證的事，你打算怎樣辦呢？別給它保證！”

在我出獄的十一天中，我們決定：只要她的病況稍好一點，就送她到一個比較適當的地方去療養。從那時起我們就在等她的病況好轉，但她反而每況愈下，一直過了六個星期，病情的惡化非常顯著。眼睜睜看着她的病在惡化，再等也是無益了，於是我們決定在她目前的情況下送她到波瓦里的山中去。

在她去波瓦里的前一天，我被提出監獄去向她告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她呢？我是不知道的。還能見着她嗎？但那天她的神色很開朗而愉快，我也長時期以來沒有感覺那樣快樂。

過了將近三個星期，我從內尼監獄遷到阿爾摩拉縣監獄，這樣離卡麥拉的住處比較近些。波瓦里在中途，押解我的警察和我在那里停留了幾小時。我非常高興看到卡麥拉有病有些轉機，因此心情輕鬆地離開她，繼續往阿爾摩拉出發。其實，我還沒有到達卡麥拉那里之前，一路上的山色已經使我滿心歡暢了。

我很高興又回到了山中。當我們的車子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奔馳的時候，早晨的冷氣和眼前展開的景色使我感覺興奮。我們越爬越高，山澗越來越深，山峰消失在雲端里，一路上草木的顏色總在改變，最後看見滿山都是松樹和樅樹。在路上一拐彎，眼前就會突然呈現一片新的山巒和澗谷，澗谷的深處潺潺地流着一條小河。這真是看不夠的景色，我貪戀不置地望着，要把它牢記在心里，讓我在真景已經消逝之後還能回憶。

山旁有一叢叢的小茅屋，茅屋周圍是小塊田地，這是艱巨的人工利用每片坡地開發出來的。從遠處看來很像階梯，這樣的大階梯有的從山谷深處幾乎直達山頂。讓自然給一些稀少的人口生長這樣一點糧食要費多少人力呀！這些人終年不停地勞作，得到的僅夠糊口！這些梯田使當地的山顯得不那樣荒涼，同其他荒蕪的坡地或長滿林木的坡地形成奇怪的對比。

白天，這裡原來是很爽快的，在太陽升高的時候，蒸騰的溫暖使山中顯得生氣勃勃，使人不覺得它們偏僻，反而覺得它們和善可親。但是它們每天都在改變樣子！每當“夜色彌漫了大地”，生命隱藏起來保全自己，讓荒野主宰一切的時候，山中是多麼陰森寒冷呀！在月色或星光半明半暗中，山影顯得神秘、可怕、有傾倒之勢，但又顯得虛幻不實；從空谷中還能聽到淒厲的風聲。可憐的旅人當他踽踽獨行，到處遭受冷眼的時候，感覺瑟縮不安。甚至連風聲也好像在嘲弄、刺激他。再過一個時候，風聲和其他一切聲音完全消逝，沉寂得使人窒息。這時也許只有電綫微弱的呻吟，星光比平時更加燦爛，更加靠近。群山冷峻地向下俯瞰，使人覺得面對一個可怕的神秘，會聯想到巴斯噶的一句話：“無限空間的永恒沉寂使我恐懼。”在平原上，夜是不會這樣寂靜無聲的；在那裡可以聽到生息，各類動物與昆蟲的鳴聲冲破夜的沉寂。

但在我們乘車往阿爾摩拉去的一路上，距離淒涼而且冷淡的夜還很遙遠。當我們快要走完我們的路程，我們拐了一個彎，忽然雲端開處呈現了新的景象，使我看了驚喜莫名。遠處的喜馬拉雅的雪峰閃爍發光，高聳在長滿林木的山巒的背後。安詳、高不可測，它們蘊藏着以往年代的智慧，是印度廣大平原的強大的守衛者。只要一見這些雪峰就能使人頭腦清醒，而且在它們的永恒的

形象前面，平原和城市中的渺小糾紛與陰謀詭計，貪欲與虛偽都變為平凡和無足輕重了。

阿爾摩拉的小監獄高踞在一個山嶺上。我被安頓在一座巍峩的營房里。營房包括一間五十一英尺長，十七英尺寬的大廳，廳內地面非常不平，屋頂已經有了虫蛀，不斷有蛀屑掉下來。大廳有十五扇窗戶和一扇門，或者不如說是牆壁上有這麼多裝了柵欄的洞，因為根本沒有窗扉和門板。因此新鮮空氣毫不缺少。因為天氣逐漸寒冷，有幾個窗洞用椰席遮住。在這塊大空地上（這裡比台拉·頓監獄的任何院子都要大）我是唯我獨尊地住着。但我並不十分寂寞，因為至少有四十只麻雀在傾頹的屋頂上築巢。有時還有閑雲來訪，伸出許多胳膊鑽進窗洞，把屋裡裝滿了潮濕的霧。

在這裡，每晚大約五點鐘就把我鎖在屋裡，在這之前我在四點半吃了最後一餐，這是一種晚茶；到第二天早上七點柵欄門開鎖。白天，我或是坐在營房里或是到外面一個鄰近的院子里坐着曬太陽。從圍牆上我只能看到一英里左右遠的山頭，而在我的當頭是一片廣闊的藍天，上面點綴着一塊塊的雲。這些奇形怪狀的雲使我簡直看得不知厭倦。我覺得它們變成各種動物的形狀，有時并攏起來形成一塊大海洋，有時又像一座海灘。杉樹間蕭蕭的風聲好像遠處海岸上奔騰的浪潮。有時一塊雲向我們沖來，看樣子很堅實而密結，但等到飛近了，最後包圍了我們的時候，隨即變成薄霧消失了。

對於窄小的牢房說來，我寧願要這座營房里寬大的空間，雖然它比小地方更形寂寞一些。在這營房里，即使是下雨天我還可以散步。但是由於天氣漸冷，屋裡格外顯得慘淡，等到氣溫達到冰點左右的時候，我對於新鮮空氣和戶外生活的愛好也減低下來了。

新年下了一場大雪，使我極為痛快，連監獄里那樣單調的環境也為之增色。獄牆外几棵杉樹披上了雪衣，顯得分外美麗，好像飄飄欲仙似的。

我為卡麥拉的病況忽好忽壞感到愁慮，每逢聽到一件不好的消息總使我一時忐忑不安，但山中的空氣給了我恬靜與安慰，因此我恢復了安眠的習慣。每當我快要睡着的時候，我往往想着睡眠是多麼微妙而神秘呀。人為什麼要醒呢？我如果一睡不醒該怎樣呢？

但這時我要出獄的願望比以往更加強烈。孟買國大黨會議已經開過，十一月才來又去了，議會選舉的熱潮也過去了。我很想不久我會被釋放。

可是隨後來了逮捕阿卜杜爾·加法爾·汗並將他定罪的消息，以及對蘇巴斯·鮑斯回印度的短期中所頒布的驚人的命令。這些命令本身就毫無一點人情和考慮，竟然加在一位為廣大同胞所敬愛的人的身上。鮑斯是不顧自己的疾病要在他父親臨終前趕回家來的，可惜太晚了。如果這是政府的主張，那末我就不會有被提前釋放的可能。後來官方的聲明完全証明了這點。

到了阿爾摩拉監獄一個月之後，我被帶往波瓦里去看卡麥拉。從這次起我大約每三星期去看她一次。印度事務大臣薩繆爾·霍爾爵士一再聲明准許我每周看我的妻子一、兩次。如果他說每月一兩次倒比較正確。我在阿爾摩拉的過去三個半月當中去看過她五次。我提這件事並不是有什麼埋怨，因為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為政府對我很體貼，使我得到極大的便利去看卡麥拉。我對這點是很感激他們的。我同她這幾次短短的會面對我非常珍貴，或許對她也很珍貴。在我們會面的那天醫生停止一部分醫療，好讓我

同她有較多的時間談話。我們兩人越來越互相依戀，離別成爲一種痛苦。我們才會面就準備着分離。有時我沉痛地想：总有一天我們兩人會永別。

母親已到孟買去就醫，因為她的病還沒有復元。現在她似乎漸有轉機。可是在一月中旬一天早上來了一封電報使我大吃一驚，她突然中風了。這樣我就有可能被轉移到孟買監獄好去看望她，但因她的病況稍有一點好轉，我沒有被轉移。

一月過了，二月來到，外面微露春意。我又看到并聽見夜鶯和其他鳥的鳴聲，地面上很神秘地鑽出了細微的嫩綠，注視着這奇怪的世界。血紅的杜鵑花一片片地點綴着山腰，和平氣象與李花也在開放。我數着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心里惦念下次再去波瓦里的情形。我不明白：“人生的豐富賜予隨着失敗、冷酷和分離而來”這句成語究竟有什麼道理，或許這種賜予舍此以外再也無法理解吧。或許清晰的思想必須經過一番痛苦，但是過多的痛苦也會使頭腦昏憤。監禁可以推動一個人去內省，因此我的長期監禁促使我的內省越來越深。我生性不是一個內向的人，但監獄生活好像濃烈的咖啡或番木鱉鹼一樣使我變成這樣。有時候當作消遣起見，我照麥克道格爾教授的內外向測驗體積畫出一個輪廓，從觀察中發現從一個解釋到另一個解釋的頻繁變化，這種變化是很迅速的。

第六十七章 几件近事

夜尽見晨曦，
逝者不复回。
平原堪極目，
春來心欲摧。⊖

——李 白

从供給我的报纸中，我依次讀到了关于国大党孟买會議的消息。当然我对政治及其人物是有兴趣的。二十年的联系使我同国大党密切不可分割，好像我个人已經同它成为一体，而把我自己同这个偉大組織以及数以千計的老同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看不見的約束比那任务和責任的約束要有力得多。虽然如此，我对党这次會議的内容很难感到兴奋，除了几項重要决定以外，我觉得整个會議死气沉沉。凡是我感觉有兴趣的問題在會議上簡直沒有討論。我不曉得如果我也出席这个會議，我会怎么办。这一点我是沒有把握的。我不敢說对新的情况和我的环境我会有什么反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在監獄里勉强自己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而且这时完全沒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总有一天我会面对当前的問題，并决定我的行动方向。这时，即使預測这个决定也是一件不必要的糊塗事，因为在我被迫那样做之前，情况已經改变了。

⊖ 原詩沒有查到，这里照英譯文譯出。——譯者

以我这个住在偏远的山中的人来看，国大党这次会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甘地这位笼罩一切的人物，另一个是一件极端卑劣的恶作剧，那就是潘迪特·玛丹·摩汗·玛拉维亚和阿尼先生提出的教派反对意见。凡是深深了解印度群众心理以及中产阶级心理的人，对于甘地在印度的广大地区仍然被奉为了不起的人物这件事，不会觉得惊奇的。政府官吏同一些幕后的政客往往想当然地以为甘地在政治方面已经势衰力竭，至少他的影响已经大大减低了。可是这次他以原有的气势和影响卷土重来，使他们惶恐万分，并研究这次局势显然改变的新原因。甘地所以能够支配国大党和整个国家并不完全因为他所主张的意见，这些意见已经是大家接受了的，而是因为他的独特的人格。无论在哪里，人格的关系都很大，而人格在印度比在其他地方有更大的主导作用。

他退出国大党是这次会议的一项惊人的特色，从外表看来，它标志着国大党和印度历史的伟大篇章的一个段落。但本质上，这件事的意义并不重大，因为甘地不能摆脱他的领导地位，即使他想这样办的话。他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官职或者其他有形的关系。今天国大党差不多和以往一样地反映他的观点，即使党万一离开他的道路，他也许不自觉地仍然对党和国家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件负担和责任，甘地是无法摆脱的。由于印度的客观环境，他的人格感召着人们，不容你忽视。

现在他已向国大党宣告退休，大概是避免使党处于为难的境地。也许他考虑到个人的直接行动必然会导致同政府之间的冲突。他不愿让这件事成为党的问题。

我很高兴国大党采取了以国民议会来解决国家宪法这个主意。在我看来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并且坚信像这

样的会早晚总要开的。显而易见，要开这样的会非經英国政府的同意不可，除非我們的革命已經成功。同样地显而易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同意不可能实现。因此，真正的議會非到全国發展了足够的力量来促成那种局势是不会召开的。这也必然意味着連政治問題也非到那时不能解决。有些国大党領袖一方面接受召开国民議會的主張，一方面却企圖貶低它的意义，按照老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一切政党的大規模會議。这样就成为毫無結果的行为，而原来那些老人物，多半是自己选自己的，又相聚在一塊，互鬧意見。关于国民議会的整个主張是要在極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进行选举，从群众中吸取力量与鼓舞。这样的集会立刻就会遇到实际的問題，不会再走我們常常坚持不放的教派和其他老路的。

讓我們看一看西姆拉和倫敦对这主張有什么反应是很有趣的。据半官方消息，政府不会反对这个會議；他們給了垂憐式的同意，显然把这會議看做老样子的一切政党的會議，注定是要失敗，从而他們就可以加强压力。后来好像他們理解了这个主張的危險与可能性，于是又拚命反对它了。

国大党的孟买會議开过不久又来了議會选举。虽然我对国大党的議會綱領没有什么热情，我对这次选举却很感兴趣，并希望国大党的候选人胜利，或者說得更确当一些，我希望他們的对手失敗。在这些对手中間是一群古怪的烏合之众，包括冒險家、教派主义者、叛徒以及死心塌地支持政府施行高压政策的人們。毫無疑問，这些人有多数是会被刷下来的，但不幸是教派裁判模糊了这个問題，其中有許多人隱蔽在教派組織的广闊的羽翼之下。虽然如此，国大党还是获得很大的成就，我很高兴有很多一無可取的人都被排除出去了。

所謂国大国家主义党的态度使我感觉特别遗憾。我們可以理解他們为什么那样激烈反对教派裁判,但为了巩固他們的地位,他們竟同極端的教派組織、甚至薩納坦派以及許多臭名昭著的政治反动分子結成同盟,至于薩納坦派,無論是政治和社会方面,在印度再沒有比它反动的集团了。除了在孟加拉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大党集团为了特殊理由支持国家主义党人以外,該党有大多数人在各方面都是反对国大党的。当然他們是国大党的最主要的手。虽然有这种种的势力反对国大党,其中包括地主、自由派分子,当然还有官吏在內,但国大党的候选人仍然获得卓越的成就。

国大党对于教派裁判的态度是非常特别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也不能有什么改变。这是国大党人过去执行的中立政策,也可說是軟弱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果在早期我們不顧直接的后果,就采取而且执行有力的政策,那末这个政策就比較正确而且更加体面。但因为国大党不願采取这个政策,所以除了現行的政策以外,再沒有其他途徑可走。教派裁判分明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东西,是無法接受的,因为只要它存在一天,任何自由都得不到。这倒不是因为給穆斯林的好处太多的緣故。如果采用別的方式,就是滿足他們所要的一切也許是办得到的。实际上是英国政府把印度分割成一些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部分,使得外来的英国势力仍然居于支配地位,使印度不得不依賴英国政府。

特別是在孟加拉,那里一向尊崇少数的欧洲人,印度人所处的地位是極不公平的。像这样的裁判或决定,或其他不管什么名称的东西(有人反对叫它作裁判),自然会引起人民的極大憤恨,即使把它强加在人民头上,或者人民因政治的原因暂时容忍,这个裁判也許还是摩擦的根由。我个人認為它的坏处正是对它有利的东

西，因为这样，它才不能成为任何东西的永恒的基础。

国家主义党，尤其是印度教大会和其他教派組織，自然也痛恨这件不舒服的东西，但他們的批評像支持英政府者的一样，实际上是以接受英政府的思想为基础的。这样就引导了他們，而且現在进一步引导他們采取一种非常奇特的政策，这个政策必然是深得英政府的欢心的。由于他們專門注意教派裁判这一件事情，他們就对其他重要的事件减弱了反对的力量，借此希望賄賂或誘騙英政府把教派裁判改变得對他們有利。印度教大会在这方面跑得最远。他們似乎沒有觉得这件事不仅對他們是屈辱，而且是故意用来使教派裁判的更改反而極为困难，因为这只会激怒穆斯林，使他們走得更远些。英政府是不可能爭取国家主义分子的，因为他們之間的距离太大，利害冲突太显明。英政府也不可能从教派利益的狹隘观点討得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教派主义者双方的欢心。他們不得不在二者之間加以選擇，而就他們的观点看来，他們当然選擇伊斯蘭教教派主义。难道他們会为了爭取一小撮印度教教派主义者竟推翻已經稳定而且有利的政策来得罪穆斯林嗎？

作为一个团体來說，印度教徒在政治方面比較前进，对民族自由的要求比較坚决，單是这一事实就必然對他們自己不利。教派方面的小讓步（也只能是小讓步）对于他們的政治敌对状态不会有很大改变；但这样的讓步对回教徒的态度却会有暫时的改变。

議會选举揭露了支持印度教大会和伊斯蘭教大会——这是兩個最反动的教派——的人們的面貌。這兩個教派的候选人和支持者都是来自大地主或富有的銀行階級。印度教大会也对銀行階級表示关切，激烈反对最近的解除債務法案。这些高据印度社会階層最上層的少数人組織了印度教大会。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同一些

專門職業者結合，組成自由主義聯盟。他們在印度教徒中間不起多大作用，因為中下階層已經在政治上覺悟了。實業界領袖們也同他們隔絕，因為新興工業與半封建階級的要求發生衝突。實業家不敢採取直接行動或其他冒險的方法，打算同民族主義和英政府雙方都保持友好關係。他們不大理會自由主義者或教派的團體。工業的發展與利潤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

在穆斯林方面，中下階層的覺悟還須等待，工業方面他們也還落后。因此我們發現一些極端反動、封建的下野官僚不但控制着他們的教派組織，而且在教民中間具有相當影響。伊斯蘭教大會是集合爵士、以前的部長和大地主而成的。但我認為穆斯林群眾也許因為享受到社會關係的某種自由，他們比印度教的群眾具有更大的潛力，一旦動作起來，可能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不過目前伊斯蘭教知識分子好像在智力與體力兩方面都有些癱瘓，缺少勁頭。他們不敢觸犯舊的戒律。

國大黨雖然在政治上是最前進的大黨，但它的領導方面的慎重也超過了群眾需要的程度。他們要求群眾的支持，但很少時候徵求群眾的意見或過問他們的疾苦。在聯邦院選舉之前，他們為了要爭取各色各樣非國大黨的緩和分子，竭力降低他們的綱領的語調。甚至他們對於進入寺廟法案這類措施的态度也都有所改變，他們還給了一些保證來安慰在馬德拉斯的更加正統的人物。本來，只有一往直前、激烈的競選綱領才能够發動飽滿的熱情，對教育群眾起很大的作用。但現在國大黨採取了議會綱領，它就要對政治上和社會上都反動的集團更加妥協，希望在選區里多得幾張選票；同時也就要引起黨和群眾之間更大的分裂。於是發表動聽的演說，舉行最漂亮的議會儀式，一次又一次地使政府遭受失敗，但這種失敗，

政府还同从前一样地泰然处之，滿不在乎。

过去几年，当国大党正在抵制立法机关的时候，我們常常听见官方發言人說：联邦院和省議會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反映公众的意見。但使人觉得有趣的是：現在比較进步的分子在議會里居于支配地位，官方的意見却改变了。只要一提到国大党在竞选中的成就，我們总听说我們的选民很少，差不多三万万人当中只有三百万。据官方意見，被剝夺公权的数以百万計的人民显然都坚决地支持英政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显而易見的。讓每个成人都有选举权，那时我們至少就曉得这些人是怎样想法了。

联邦院选举之后不久議會联席委员会就發表了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各种的、广泛的批評，批評中很多強調这个报告对印度人民“不信任”和“怀疑”的事实。我觉得这样来看我們的民族和社会問題是很奇怪的。英帝国主义政策同我們的民族利益之間难道沒有严重的冲突嗎？問題是它們之中哪个應該占优势？难道我們要求自由的目的就为了使帝国主义政策繼續下去嗎？显然这是英政府的想法，因为我們听说：只要我們安分守己，并且以服从英政府政策来表現我們有自治的条件，那末就可以不用“保証”。如果英政府政策还要在印度繼續下去，我們还为什么奔走呼号要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从經濟上看来，渥太华协定除了印度貿易[⊖]以外，对英国沒有多大好处，这是众所周知的。据印度政界和商界的意見，英国对印度的貿易当然以牺牲印度的广泛利益而占到便宜。对自治領，特别是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它們对英国本土

[⊖] “关于印度貿易” 威廉·庫里爵士說：“渥太华协定肯定是对英国有利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他在主持倫敦半島及东方航运公司會議时講的。

勾心斗角，占了它很多的便宜。虽然如此，它們还再接再厉地打算摆脱渥太华协定及其约束，以便发展自己工业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㉑。在加拿大，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自由党——不久可能要组阁了，他們明确地声明要废除渥太华公約^㉒。在澳大利亚，由于对渥太华协定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使一些布匹和棉紗的关税增加，这就引起了蘭开夏棉紡工业界的愤恨，并谴责澳大利亚破坏渥太华协定。作为抗議与报复，蘭开夏发动抵制澳大利亚貨物的运动。这个恫吓对澳大利亚沒有产生多大效果，反而激使后者采取凶猛的态度^㉓。

㉑ 倫敦“經濟学家”杂志（一九三四年六月）說：渥太华會議“如果增加了帝国内部貿易額而不减少帝国对世界各国的貿易額，那才是正确的。事实上，該会只是稍微增加了帝国内部貿易額对日趋减低的貿易總額的比重。这种改变与其說有利于大英帝国，不如說更有利于各自治領。帝国对我们的輸入从一九三一年的 247,000,000 英鎊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 249,000,000 英鎊，但我们对帝国的輸出却从 170,600,000 英鎊减到 163,500,000 英鎊。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这段期間，事实上仍然是我们对帝国的輸出降低了 50.9%，而帝国对我们的輸入只降低了 32.9%。我們对外国的輸出並沒有降低得这样大，但这些国家对我们的輸入却降低得很大。”

㉒ 墨爾本“世紀”报是不喜欢渥太华协定的。它認為該协定“是經常給人的一个刺激，越来越被人認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錯誤。”（引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曼徹斯特衛报”周刊）

㉓ 連加拿大的保守党人，現任总理班納特先生，也变成了英政府在貿易方面的討厭鬼。他現在談起“新政策”来了，而且有了惊人的改变。由于李維諾夫先生、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和約翰·斯特萊徹先生等人的影响，他变成了集体主义者。这对于一切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印度文官等應該是一个信号和警告，叫他們不要再同这些变卦的人們有同一的思想或發生关系，否則他們自己也將皈依这些危險的信条。（在我这段文字写完之后，加拿大自由党在金先生領導之下，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掌握了政权。）

㉔ 墨爾本“世紀”报宣称蘭开夏计划的抵制运动如果不予制止，澳大利亚必定对蘭开夏同它还在进行的其他任何貿易加以更狠的打击。它將以“毫不动摇的再接再厉的手段”答复蘭开夏。（引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曼徹斯特衛报”周刊）

这种經濟冲突显然不是因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人民对英国本土有什么惡感，不过在爱尔兰这方面的惡感是明显的。經濟冲突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在印度，只要有这类冲突的地方，“保証”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的利益占优势。最近的印英貿易协定是領導人物不顧印度工商業界的抗議而秘密締結的——但英国实業家却听到了这个消息——虽然联邦院拒絕，可是政府仍然坚持执行。这个协定隱約地暗示，“保証”將导致什么結果。这类“保証”也許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地非常需要，以便防止这些自治領的人民不仅在貿易方面而且在关系帝国的安全与团结方面走入歧路[⊖]。

有人說帝国是債務，“保証”是用来讓帝国主义放債人控制不幸的債務人，保全他的全部特殊利益和权力的。一再被官方提到的一个奇怪論調就是說甘地和国大党已經同意这种“保証”的主張，因为“有利于印度的保証”在一九三一年的德里公約里已經接受下来了。

渥太华协定以及有关貿易与商業的保証究竟还是比较不重要的东西[⊖]。远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旨在永远控制印度人民的政治与經濟命脉的一系列規定，这种控制在过去和現在都助長了对印度的剝削。只要这些規定和“保証”存在一天，向任何方面的真正

⊖ 南非联邦国防部長皮罗先生說：联邦不願参加帝国防务的任何总計劃，也不願参加海外战争，即使英国是在对外作战的話。“如果政府粗暴地打算使南非参加另一次海外战争，那就会鬧大乱子，甚至可能引起內战。因此政府不預备参加帝国防务的任何总計劃。”（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开普敦路透社电）总理赫尔左格將軍証实了这个声明，并說它是代表联邦政府的政策的。

⊖ 倫敦“經濟学家”杂志（一九三四年十月）指出：“但是到了將來，英国統治的利益当中有一項是把从關开夏高价买进的不正当的权利强加在世界各地的‘土人’身上。”錫蘭是近来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的进步都是不可能的，至于从事宪法的改革也办不到。在这方面的任何企图只会暴露“保证”的空虚，并使人越来越看出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非宪法的道路。从政治改革的观点来看，这项计划中的宪法和它那古怪的联邦都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从社会和经济的观点来看，就更加糟糕。这个宪法千方百计地阻塞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显然把许多责任转交出来（甚至大部分还是转交给“可靠”的阶级），但做任何有意义工作的权力或财力却没有转交出来。英国保留了不附带责任的权力。它的专制政体毫无遮掩地暴露了出来。大家都知道当前所亟需的是宪法的极端灵活性和适应环境，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迅速做出决定是必要的，执行决定需要权力。即使如此，议会民主就它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情况来看，是否能够实施一些改革使现代世界走入顺境还成疑问。但我们这里并不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运动受到百般的限制，我们的面前是一道紧闭的大门。我们又像是得到一辆有煞车而无引擎的车。这部宪法的编制者，他们的背景自始至终就是戒严令。对于有权力的人说来，除了戒严令只有垮台。

英国这份计划中的礼物究竟送给印度多少自由，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连印度的最温和、政治上最落后的团体都斥责这个宪法是反动的。一向坚决支持政府的人不得不在批评中表现他们平时的恭顺。其他的人比较猛烈一些。

由于这些建议，自由主义派分子觉得很难充分保持关于天意要使印度受英国统治的秘密这一永恒的信仰了。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由于忽视现实，爱讲废话和装腔作势，他们特别强调报告和议案里没有“自治领地位”的字样，而且为此大事叫嚣。现在萨繆尔·霍尔爵士既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类似声明的东西，大体上已经

顧全了面子。自治領地位也許是出現在渺茫的將來的一個空虛的陰影——這個將來是我們永遠達不到的莫須有之鄉，但我們至少能夠對它作一些幻想，臆想它的許多美景。薩普魯爵士大概由於對英議會和英國人民發生懷疑而感到苦惱，以致乞靈於英王。雖然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學家，他却制訂了一條新穎的憲法定理。他說：“不管英議會和人民關不關心印度，它們上面還有英王，他是會照顧印度臣民的利益和印度的和平與繁榮的。”[⊖] 這是一條安慰人心的定理，它使我們不要為憲法、法律以及政治與社會的改革操心。

但是如果認為自由主義聯盟分子反對這個計劃的力量已經減弱那是不公平的。他們之中很多人明白表示：當前的情況雖然惡劣，但比較那個強加於印度的不得人心的禮物還是好一些。除了強調這點以外，他們的原則是不許做任何別的事情，因此他們可能是繼續強調這點。有一句古話，他們大可用來改變一下，作為他們自己的座右銘：“如果第一次你沒有成功，你就再喊一陣！”

自由主義聯盟領袖，也許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包括一些國大黨人在內，都對英國工黨的勝利以及工黨組閣懷着若干依賴的希望。當然，毫無理由說，印度不應該努力同英國的進步集團進行合作，不應該從工黨的組閣得些好處。但一味依賴英國的時運的轉變未免有失體面，也不免影響民族光榮。除體面以外，這樣做也是缺乏常識的。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依賴英國工黨呢？我們已經領教過兩個工黨內閣了，總該不至於忘記它們給印度的恩賜吧。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可能已經離開了工黨的队伍，但他的老夥伴們好像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舉行的南港工黨年會上，

⊖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勒克瑙的公開會議上的講話。

克里希納·梅农先生提出一項議案：“認為印度建立完全自治的自决原則應該立即实行。”阿瑟·韓德遜先生要求撤回這項議案，并且很坦率地拒絕代表执行部門承認执行印度自决的政策。他說：“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要同各方面的印度人进行协商。那样就應該讓人人都滿意了。”这种滿意的表現正是上届工党内閣和国民內閣所宣布的政策，結果产生了圆桌會議、白皮書、联席委員會報告和印度法案。因此这种滿意也許就被冲淡了。

就帝国主义政策來說，英国的保守党或工党之間沒有多大分別，这是一目了然的。不錯，工党的一般黨員远比保守党的进步，但这些人對他們的非常保守的領導人却沒有什麼影响。也許工党的左翼会逐渐得势，因为今天的情况改变得很快，但民族或社会运动难道就該退到一边去睡覺，靜等別的地方产生不一定有的变化嗎？

我們的自由主义联盟分子这样信賴英国工党是很奇怪的。如果湊巧工党左傾起来，在英国实行了它的社会主义綱領，那末印度以及自由主义联盟分子和其他温和派別的反应会怎样呢？这些人从社会观点来看，多数是保守透頂的。他們会討厭工党的社会与經濟改革，怕这些改革傳入印度。甚至連他們对英国的联系的留恋也会發生变化，如果这种联系一旦变为社会騷动的象征的話。也許像我这样要求民族独立、割断这种联系的人們会改变心腸，願意同社会主义的英国取得密切的联系。当然，我們誰也不反对同英国人民合作，我們反对的是他們的帝国主义，只要有一天他們抛弃了帝国主义，合作的途徑就打开了。到那时温和派怎么办呢？也許他們又認為是天意莫測而接受了。

圆桌會議和組織联邦的建議的显著結果之一是大大提高了印

度土邦王公的地位。保守党頑固派对他們的关怀和他們的“獨立”使他們活躍起來。他們從來沒有像這樣被人重視過。以前他們連對英國總督的一個暗示都不敢說一個不字，而印度政府對待許多王公的態度是公然傲慢的。印度政府不斷地干涉他們的內政，常常還是振振有辭。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土邦直接或間接地被英國“供給”土邦的官員所統治。但是丘吉爾先生和羅瑟密爾勳爵的活動好像使印度政府有點胆怯，使它对土邦的決定的干涉逐漸慎重起來。王公們現在講話也神氣得多了。

我曾經企圖研究印度政治局勢的這些表面的發展，但我不得不感覺這些發展是虛假的，而印度的背景使我覺得氣悶。這個背景是：不斷地壓制各種自由，沉重的磨難與挫折，善意被歪曲而許多邪惡的傾向得到鼓勵。一大批人監禁在牢獄里枉度青春，年復一年地受着不白的沉冤[⊖]。他們的家屬、親友以及其他數以千計的人們都是愁苦連天，滿懷都是在野蠻勢力之下遭受屈辱和軟弱無力的可惱的感覺。甚至在平時就有無數的組織遭受取締；“緊急權力法案”和“綏靖法令”成為政府兵工廠里的永久措施。關於限制自由的例外事件很快地變成了通例。大批書籍和雜誌禁止發行或根據“海關法令”不准進口，至於私藏“危險”書籍則可能遭到長期徒刑。對當今政治或經濟問題坦率地表示意見，或對俄國的社會與文化情況作了同情的報告都會引起審查官的堅強批駁。“現代

⊖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內政委員哈利·海格爵士在聯邦院說在監獄和特別營里的政治犯的總數：孟加拉有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迪奧里營有五百。總數是二千至二千一百。這只是政治犯的數目，也就是未經審訊和定罪的囚犯，還沒有包括定罪的 political prisoners。至於定罪的案件，一般判刑是很重的。關於最近加爾各答的一個案件，美聯社（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說：高等法庭判處了九年嚴厲的徒刑，而罪名是私藏軍火。被告人在被捕時身上有一枝左輪手槍和六發子彈。

評論”刊載了泰戈爾博士個人訪問俄國歸來後寫的一篇關於該國的文章，因而接到孟加拉政府的警告。印度事務次官在議會里通知我們說：“這篇文章歪曲了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成就”，因此必須採取措施加以制止[⊖]。審查官既然肯定了這些成就，我們就不許有也不許表示相反的意見。政府也對泰戈爾致都柏林交誼會一信的發表表示反對。像泰戈爾這樣一位專心於文化事業，有意地超然於政治之外，而且受到全印度的景仰，聞名於世界的聖哲，竟然受這樣的壓制，身份卑下的人又當如何呢？比這樣壓制的事例還要惡劣的是他們製造恐怖氣氛。在這樣的環境中，要有老實的新聞報道或者關於歷史、經濟、政治或時事的適當考慮或教育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們要進行改革、建立負責政府等等的奇特的背景。

凡是有理智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世界是處在知識的混亂中，對於現實的情況表現了模糊的或鮮明的極大不滿。我們眼前正在實現着遠大的改革，至於我們的將來，不管它會變成什麼樣子，不再是使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超然心靈發生純學術興趣的遙遠而渺茫的事情了。它牽涉到每個人的幸與不幸；的確，每一個公民的職責是應該了解各種力量所起的作用，並決定自己應走的途徑。世界正走上窮途末路，新的世界正在形成。要想答复一個

⊖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政府在聯邦院發表關於印度新聞法實施情況的聲明內稱：一九三〇年以來，政府曾責成五百一十四家報紙交納保證金並提出沒收的措施。其中三百四十八家因為交不出更多的保證金被迫停刊；一百六十六家付出了二十五萬二千八百五十二盧比的保證金。

近來（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制定了一些法律壓制公民自由，準備實行一個更長的時期。其中主要的是刑法修正法案，適用於全印度。它被聯邦院否決，但後來被總督確認。許多省也通過了這類法律。

問題，就須認識它是什么問題。認識問題确实同尋求問題的解答有同等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家当中居然会对世界事件無知或漠不关心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無知也許發展到印度絕大多数官員中間了，因为这里的文官是优游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的。只有我們的高級官員才不得不考虑这些問題。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留心世界时事，并根据时事来推行它的政策。尽人皆知，英国的对外政策很受对印度占有与保护一事的影响。有多少印度政治家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苏联的日益强大、英俄日三国在新疆的陰謀，或者中亞細亞、阿富汗或波斯發生的事件对印度的政治会有直接的影响呢？中亞細亞的局势显然影响克什米尔的地位，使它成为英国的政策与防御的樞紐。

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經濟。我們必須認識十九世紀的制度已經过时，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盛行于印度的那样逐条援用先例的律师观点在沒有先例可援时是沒有多大用处的。我們不能把牛車放在鉄軌上，叫它做鉄路列車。它只有擱在一边，当做廢料拆卸开来。除了俄国，还有关于新政和巨大改革的言論。罗斯福总統一心一意要保存和加强資本主义制度，大胆創行了改变美国生活的重大計劃。他談到“鏟除特权分子，有效地抬举無权分子”。他的成敗尙在兩可之間，但这人的胆量以及他要使他的国家改弦易轍的心願是無可爭辯的。他不怕改变他的政策，并承認錯誤。劳合·乔治在英国也提出了他的“新政”。我們在印度也需要許多新政。所謂“凡是值得知道的事都已經知道了，凡是值得做的事都已經做了”，这句老話是有危害性的妄語。

我們是要遇着許多問題的，我們必須大胆地正視这些問題。目

前的社会或经济制度如果对群众的境遇不能有很大的改进，还有什么权利存在下去呢？有没有别的制度能够实现这样广泛的改进呢？仅仅是政治改革又能有多大的根本改进呢？如果特权阶级阻碍一种非常适当的改革，难道为了保全他们而使群众遭受穷困，这是聪明的或道德的么？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特权阶级，而是防止他们伤害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同这些特权阶级言归于好，那是再好没有。大家对这样做是否是正义的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很少人会怀疑这样解决是适宜的。这样解决显然不是树立一个特权阶级来消灭另一个特权阶级。在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可以给合理的赔偿，因为一次冲突也许要花费更多的钱。但不幸的是，一切历史都表明特权阶级是不接受这种妥协办法的。凡是在社会上不再起重要作用的阶级特别缺乏智慧。他们不是大胜一场，就是全盘皆输，他们就这样消失掉了。

现在有很多人“侈谈”（这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说法）没收和类似的事。一贯的、继续不断的没收正是现有制度的基础，我们倡议社会改革就是要消灭它。每天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被人没收；由于地租或赋税高涨，农民无力偿付，以致他的土地最后被没收。从前个人没收公共土地，形成了大片田产；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也被消灭。没收是现有制度的基础和生命。

为了部分地纠正这个现象，曾在社会上试用了各种权宜的办法，而这些办法本身就带有没收的性质，如重税、遗产继承税、解除债务法案、通货膨胀等等。近来我们看到国家普遍地否认所负的债务，不仅苏联，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这样做。最显著的例子是英国否认对美国负担的债务，这是摆在印度面前的一个危险的榜样！但是这一切没收和否认债务的做法的用处都很小，不能解

决根本的原因。要想重新建設，就非鏟除这个根本原因不可。

在研究改革現有秩序的方法的时候，我們必須从物質和精神方面来衡量这种改革的代价。短視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注意这种改革究竟对于推动人类的物質和精神的幸福与进步有什么帮助。但我們必須永远記住，如不去改革現有的秩序，而帶着民不聊生、飢餓、困苦、精神与道德的敗坏这样一付重担像我們今天这样混下去，那末我們將要付出很可怕的代价。現有的經濟制度好像周而复始的洪水一样不断泛濫成灾，毀灭大批人。我們想憑几个人用提桶舀水的办法来阻止洪流或拯救人民是做不到的。我們必須修筑堤岸和水渠，把河流的破坏力量用来改进人类的生活。

显然，社会主义所要实行的巨大改革不是突然通过几条法律就能實現的。但規定前进的方向和奠定社会結構的基本法律和权力还是必需的。我們如果要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偉大建設，就不能憑着机会，也不能时作时輟地破坏已經建設的东西。因此我們就必須除去那些重大的阻碍。我們的目的是剝夺，而是給予，把今天的貧乏变为將来的富裕。但是要想这样做，就要把前途的阻碍和足以妨碍社会进步的私利扫除干淨。我們要走的道路不只是我們喜不喜欢的問題，也不只是抽象的正义問題，而是經濟上健全的、进步的、与轉变的环境相适应的、而且有可能給大多数人类造福利的問題。

利益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我們每人都得選擇一边，而在選擇之前，必須懂而且明了。对社会主义單憑感情是不够的。必須以事实、辯論和詳尽的批評为基础的知識与理性来补助。在西方有很多这类的文献，在印度这类文献却是奇缺，而且許多好書不許进口。但仅讀外国書籍还是不够的。如果印

度要建設社会主义，那末就須讓它从印度的环境中生長出来，因此細心研究这种环境是極重要的。我們要求負責的專家研究并准备詳細的計劃。不幸我們的專家多数在政府或半公立大学里工作，不敢大胆放手去这样做。

知識的背景也不足以給我們帶來社会主义，还需要別的力量。但我确实感到，如果我們沒有那样的背景，决不能掌握主题，也不能掀起一个有力的运动。在目前土地問題是印度最重要的問題，以后可能还是这样。工業的重要性比較差一点，而它还在成長。我們的目標是什么呢？农业国还是工業国呢？当然，我們主要还得去搞农业，但我認為我們能够而且必須推进工業。

我們的工業領袖們的思想是落后得惊人的，他們連現代的資本家都說不上。因为群众太穷，工業領袖不把他們当作有潜在力量的消費者，拚命反对增加工資或减少工作時間的任何建議。最近紡織厂里的工作時間已由十小时減至九小时。这样使阿麦达巴德城的工厂主削減了工資，甚至削減了計件工資。因此减少工作時間就等于降低收入，等于更加降低穷苦工人的生活标准。可是合理化發展得很快，給工人的体力增加压力，而在工資上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工業的整个观点还是十九世紀早期的观点。厂主一有机会就大賺其錢，工人却依然如故。如果物价暴跌，厂主就要叫苦連天，說不減低工資就干不下去。他們不但得到政府的帮助，平常还得到我們的中产階級政治家的同情。可是阿麦达巴德的棉業工人的命运还比孟买和其他地方的同業工人好些。整个說来，棉業工人的境遇又比孟加拉的麻業工人和矿工好些。小規模而無組織的工業工人就工業水平來說是最低下的。拿麻業的百万富翁和棉業泰斗的豪华府第以及它們的富丽堂皇和奢侈，同那些差不多

衣不蔽体的工人所住的卑陋的茅屋比較一下，應該是最深刻的教育。但是我們把这个对比看做是理所当然，無动于中地忽略过去了。

印度产业工人的命运虽然很坏，但从收入方面来看，比农民的已經好得多。农民有一个便宜：他生活在新鮮空气里，避免了貧民窟的恶劣环境，但是他們的境遇越来越糟，以致常常把他的空气新鮮的村庄变成甘地所謂的“粪堆”。他不認識合作的意义，也不認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的好处。就这一点来責备他是很容易的，但是面对着艰苦的、不断斗争的，并且受到人人排挤的这样一种生活，这位不幸者又能怎么办呢？他能够生活下去，这已經几乎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了。据調查，旁遮普一个普通农民的平均每日的收入在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間大約是九安納（約合九便士），在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間跌到九派士（約合三法新）。旁遮普的农民还是比联合省的比哈尔和孟加拉的农民要富裕得多。在大跌价前的繁荣时期，联合省的东部各地区（如哥拉克浦尔等地）每天的田間工資只二安納。至于說用慈善事業或当地农村改革的办法来改进这种不稳定的状况，那是对农民和他的不幸开玩笑。

我們怎样才能摆脱这个泥沼呢？办法不成問題是有的，不过要想提高处境这样恶劣的农民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真正的困难是来自反对改革的一些有关的团体，而且在帝国主义統治之下似乎也談不到改革。未来几年，印度会朝什么方向走去呢？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好像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趋向，中間立場和动摇不定的集团正在逐漸消灭。馬尔科姆·海萊爵士曾經預言印度会走向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也許就最近的將來說，他的話是对的。印度的青年男女，特別在孟加拉，甚至多少

在各个省份都有显明的法西斯倾向，国大党正在开始反映这个现象。因为法西斯主义接近极端的暴力主义，所以党内坚守非暴力主义的老党员自然对它发生畏惧。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哲学根据——就是保存私有财产但削弱而不消灭特权阶级的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也许会使他们合意。最初看来这个根据好像是既能存旧又能革新的金科玉律。但是否二者都能得兼还是问题。

但真正倾向法西斯主义的自然是中产阶级的青年。目前实际情形是印度一部分中产阶级是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还不很革命，不过产业工人更可能走向革命。这种国家主义的中产阶级是法西斯思想发展的有利对象。但是我们这里只要一天有外国政府，法西斯主义传播的意义就和在欧洲不同。印度的法西斯主义必须主张印度的独立，因此就不能同英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它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等到英国的统治完全消除了，法西斯主义也许才能迅速成长起来，那时一定会获得中上层阶级和特权阶级的支持。

但是英国的统治不一定马上就会取消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在英国政府的严厉镇压下正在扩展。共产党在印度是非法的，所谓非法一般连同情者和有进步纲领的工会都包括在内。

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是完全同情共产主义的。从我前面所写的看来，我一点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的根本思想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十九世纪的，我受人文主义的傳統太深，以致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这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背景既然附着在我的身上，当然引起许多共产主义者的恼恨。我不喜欢教条主义，不喜欢那样把马克思的著作或其他书籍看成是无可辩驳的經典，不喜欢那样整齐划一和攻击异己，这些似乎都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特点。我

也不喜欢俄国所發生的許多事情，特別它在平时过分地使用暴力。虽然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傾向共产主义的理論。

馬克思的若干論点或他的价值論也許是錯的，不过对这些我沒有資格批評。但我認為他对社会現象独具只眼，他所以能这样，显然由于他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把这个方法用来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比用其他方法使我們了解得更多，正因为这样，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發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我們也很容易指出馬克思忽視了或者低估了某些后来發生的傾向，如中产階級中出現革命分子，这是今天很突出的現象。但我認為馬克思主义的整个价值在于它沒有教条主义，在于它強調某种观点和处理的方式，在于它对行动的态度。那种观点帮助我們了解我們时代的社会現象，指出行动和規避的方法。

連那个行动的方法也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道路，而是必須适合客观环境。無論如何，这总归是列宁的观点，而在这点上他以行动結合变化多端的环境給了很出色的証明。他对我們說：“对于具体的斗争手段这一問題，不仔細考察斗争發展的特定阶段中的特定時間的具体情况，就打算回答‘是’或‘不是’，这是完全違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的。”他又說：“沒有一件事是最后的；我們必須从环境中學習。”

由于这样广闊而全面的观点，这位具有真知灼見的共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生活掌握了有系統的認識。在他看来，政治不再是机会主义的紀錄，也不再是暗中摸索。他所爭取的理想和目的使斗争和他甘心忍受的牺牲具有了意义。他感觉他是为决定人类命运而前进的一支大軍的一部分，而且怀着“与历史并駕齐驅”的思想。

也許大多數共產黨人毫無這樣的感覺。也許只是列寧一人對生活的全部有這樣系統的認識，因而使他的行動產生實際的效果。但是只要懂得他的行動哲學的共產黨員都多少有這樣的感覺。

對許多共產黨員都能平心靜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有一種激怒人的特殊方法。雖然如此，他們都是千錘百煉的人，除了在蘇聯，他們還須克服巨大的困難。我是一向欽佩他們忍受犧牲的偉大勇氣和毅力的。他們像無數的人們忍受各種痛苦一樣忍受着極大的痛苦，但在惡毒的、全能的命運面前他們却不是盲目地忍受。他們作為人來忍受痛苦，因此這種忍受具有一種悲劇性的高尚品質。

俄國的社會的試驗，無論成敗，都不會直接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效。這種試驗會被一些不順利的环境或一些列強所推翻，這雖然不是很可能，但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那些巨大的社會變革的價值將仍然存在。我雖然本能地不喜歡俄國國內發生的許多事情，我却覺得這些事情給全世界昭示了極大的希望。我的認識很不够，我也沒有資格批評他們的行為。我所害怕的主要是過分強暴和壓制的背景可能引起難以擺脫的惡果。但我對目前那些決定俄國命運者最贊佩的地方就是他們不怕從自己的錯誤中去學習。他們能夠退回原地，另起爐灶。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理想。他們通過共產國際對別的国家採取的行動是完全白費力氣的，顯然這些行動現在已經縮減到最小限度了。

再回來談印度，在這裡如果不是有外力的推動，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只是一陣空喊而已。我們不但要應付共產主義，另外還要應付教派主義。從教派方面說，印度還處在黑暗時期。活動人物把精力都消耗在瑣碎的事物、陰謀、策略上面，並互相欺騙。他們

当中很少人关心把世界变得又好又光明。也許这是临时的現象，不久就会过去的。

国大党至少是大体上避免了这种教派的黑暗，但它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它企图纠正这个观点的办法也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是从小资产阶级方式出发的。这样做法不一定会有多大的成就。今天国大党代表着中下层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最爱说话，也最革命。虽然如此，它实际并不像它外表那样重要。它处在两种力量夹攻的境地，一种是防衛严密的力量，一种是虽然薄弱而生长很快的力量。国大党目前正处在生存的危机当中，今后它的情况很难预言。它不可能还没有完成争取民族自由的历史使命就走向防衛严密的力量那边去。但在它获得这方面的成就之前，别的力量也许强大起来，吸引它走它们的方向，或者逐渐代替它的地位。但是只要一天还没有取得广泛的民族自由，国大党还会在印度起主导作用。

任何暴力行动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有害而白费力气的行动。我想这一点在印度是一般人公認的，虽然这里还有少数毫无效果的暴力的个别例子。这条道路只有引导我们投进暴力与反暴力的绝望的迷途，再也不容易跳出去了。

我们时常听人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一条“统一战线”。奈都夫人以诗人的热情，雄辩地为这个目标而呼吁。因为她是诗人，所以她有资格强调和谐与一致的美妙。显然“统一战线”只要是一条战线，它永远是好的。把这名词分析一下，我们就得出下面的结论：统一战线的目的在于使领导者中间成立协定或妥协。这样一种结合当然意味着由最稳重和最温和人来决定目标和决定步调。还有一些人，众所周知是不喜欢一切活动的，其结果变成了统

一的立定。这不是統一战线，而是統一的与广泛的落后表现了。

如果說我們不願同別人合作或妥协，那当然是無稽之談。生活与政治的复杂不容許我們永远朝一条直綫去想。甚至倔强的列宁也說：“不妥协、不拐弯地一直前进”是“書呆子的天真，却不是革命階級的認真严肃的策略”。妥协是非有不可的，我們不必因它發愁。不管我們妥协不妥协，要紧的是，首要的事总是應該先做，次要的事决不能赶过头去。如果我們弄清楚我們的原則与目的，暫时的妥协是沒有妨害的。危險在于我們怕得罪我們的弱小弟兄以致对原則和目的有所含糊。錯誤的指导比得罪人还要糟得多。

关于时事我写得很空洞而且帶学院气。我打算居于超然的旁观地位。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我往往就不是旁观者了。別人常常对我說：我得罪人的地方在于沒有充分的理由而一味地冒进。我現在該干些什么呢？我該指示我的国人干些什么呢？也許像我这样一个从事公众事業的人，我的本能的慎重阻止我过早地行动。不过，如果讓我說实話的話，我真不知道做什么，也不設法知道。既然我还不能行动，那末又有什么可憂虑的呢？但我却有很大的憂虑，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只要我还在獄里，我可以不必为这个直接行动的問題糾纏不已。

一切行动好像都和監獄隔离很远。在这里，一个人只是受时局的摆布，而不能采取行动。他只有等一等再等，等着一天有事發生。我这里写了关于印度和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問題，但这些問題对于長期成为我的家庭的这样一間牢房——悠然自得的小天地——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囚徒的只有一件最关心的事：釋放的日期。

在內尼監獄和在阿尔摩拉監獄这里，許多囚徒都來問我，焦急地打听“鳩格利”（jugli）的消息。我起初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后

来才發現这个字是“鳩比利”(Jubilee, 紀念的意思——譯者), 原来他們指的是英王乔治即位二十五周年紀念, 可是他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过去的联想使他們对这个字了解成这样一个意思: 一部分囚徒获得大赦, 或者重大的减刑。因此每个囚徒, 特别是刑期較長的囚徒对于未来的“鳩格利”很感兴趣。在他們看来, “鳩格利”比宪法改革、議會法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更为重要。



第六十八章 尾 声

上帝教我們勞動，却不讓我們完成
我們的工作。

——犹太教經

我的傳記写完了。关于我个人經歷的自述，写到今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在阿尔摩拉監獄中）为止。三个月以前的今天，我在这个監獄中紀念我四十五岁的生日，我相信我还会活若干年。有时我有一种衰老的感觉，在其他的时候我又觉得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我的身体很健康，我的心經得起刺激，因此我認为我还能活得很久，除非意外的遭遇降临到我的身上。但是要写未来的事情，首先自己得亲身經歷未来的生活。

我所經歷的事情也許并不十分动人。長期的監獄生活很难称之为惊心动魄的生活。这些經歷也沒有什么突出之处，因为我跟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共同經歷过这些沉浮变迁，而这种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意志消沉，时而积极活动，时而被迫过孤独生活的这种經歷，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情形。我是群众中的一員，跟着群众跑，有时左右群众，也受了群众的影响。可是我也像其他人一样，是一个人，在群众中过我独自的生活。我們的姿态做得太多了，可是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也有許多真实之处，这就使我們超出卑微的自我，使我們更有力，更重要。有时我們很幸运，由于企圖使理想跟

行动相适应而感到生活的充实。我們認為其他任何生活如果否認這些理想，馴伏地服从強力，那麼這種生活就是一種白費了的無意義的生活，充滿了不滿和內心悲哀。

這些歲月給我帶來了許多好處，其中有一點特別有豐富意義。我更加認識生活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經歷，在生活中有許多東西要學，有許多事要做。我經常有一種成長的感覺，這種感覺現在仍然存在，使我更積極地活動，更熱心地讀書，使生活更有價值。

在敘述這些事的時候，我努力說明我當時的思想和感情。要追述過去的感情是很困難的，而忘記事後的發展也不容易。因此後來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關於早期活動的敘述，但是我的目標在於追述我自己的認識發展的過程，主要是供自己參考。我所寫的與其說是我的實際情況，倒不如說是我有時希望的或我所想像的情況。

幾個月前拉瑪斯汪梅·艾亞爾爵士公開說我並不代表群眾的情緒，可是由於我的犧牲，我的理想，以及我的熱烈信仰（他稱這些為“自我催眠”），我是一個更加危險的人物。一個患“自我催眠”病的人很難判斷自己。我不想在個人問題上跟拉瑪斯汪梅·艾亞爾爵士爭論。我跟他多年不見面了，可是我跟他曾經在自治聯盟中共過事，我們二人當時都是該聯盟的秘書。此後經過了許多事變，他扶搖直上，地位很高；我則依然故我，平平庸庸。現在我們二人之間，除了我們的國籍相同之外，共同之點很少。今天他完全替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辯護，在過去幾年中間特別賣力，是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治的崇拜者，他本人就是一個印度土邦獨裁政治的漂亮裝飾品。我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不同，可是在一個小問題上我們的看法一致。他說我並不代表群眾情緒，這種說法絕對正確。關於這

一点，我没有什么幻想。

实际上，我常常怀疑我是否代表任何人，我以为我不代表任何人，虽然许多人对我很客气，很亲热。东方和西方思想在我身上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适合，没有一个地方感到自在。也许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看法接近西方多，接近东方少，可是印度在各方面深刻地影响我，像对她的所有的儿女一样；并且我还有若干代婆罗门的下意识的、民族的回忆作背景。我不能摆脱过去的遗产和新近学得的东西，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在东方和西方都对于我有益，可是不仅在公共活动中，而且在生活中，使我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我在西方是一个陌生者，一个外人。我不可能是西方的人。可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有时也有一种流亡者的感觉。

远处的高山似乎容易攀登，山顶向人招手。可是当你走近的时候，困难就出现了，越往上爬，旅程就越辛苦，山顶退隐在云层里。不过爬山虽然费力，始终是值得的，而且本身有它自己的快乐。也许使生活有价值的是奋斗，而不是最后的结果。常常很难知道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认识不对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避免不正确的东西是有意义的事。让我摘引伟大的苏格拉底临死前所讲的几句话：“我不知道死是什么，也许死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怕死。可是我的确知道丢掉自己的过去是一件坏事，我宁愿选择可能是好的东西，而不愿要我知道是坏的东西。”

我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是些什么日子！我一个人孤独地坐着，浸沉在自己的思想中，看着一年四季过去。我看过多少次月亮的盈亏，群星运转。我的多少青年时日埋葬在那里，往事不时涌上心头，带来刺心的回忆，它们细声细气地对我说：“值得吗？”关于这

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犹豫。如果根据我现在的知识和经验去重新过以前的生活，毫无疑问我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作出许多改变。我将在各方面改进我以前所做过的事，可是我不会变动我在公共事务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决定。实际上，我不能更改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比我自己有力，一种非我所能控制的力量推动我采取这些决定。

我被定罪到现在正好一年。我被判两年徒刑，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还得再过整整的一年，因为这次不会减刑，普通徒刑没有减刑的规定。我去年八月间在监狱外的十一天也算在徒刑内。不过这一年总要过去，我总要出狱，以后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另一阶段将要开始。未来的这一阶段是什么呢？我不能猜想得很清楚，这部传记就此宣告结束。

后 记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于

许瓦尔茨华尔德，巴登威勒）

今年五月间我的妻子离开波瓦里到欧洲去继续治疗。在她走后，我就用不着再到波瓦里去看她了，用不着每两个星期出去并且在山路上坐车旅行。我很留恋这一切，阿尔摩拉监狱似乎比以前更枯燥无聊。

基达地震的消息传出了，在一个时期内，其他的事情统统被人忘记。可是这个时期并不久，因为印度政府不让我们忘记它，不让我们忘记它的奇特作风。不久我们就听说政府不让国大党主席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到基达去协助救济工作，普拉沙德对于地震救济

工作比印度国内其他任何人更有经验。政府也不让甘地或其他有名的社会人物去。许多印度报纸因撰写关于基达地震的文章，结果当局没收了它们的保证金。

到处都是军人和警察的看法——在联邦院中，在政府机关中，在边省的轰炸中都是如此。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似乎经常在跟很大一部分印度人作战。

警察是一种有用的、必需的力量，但警察密布和横行的世界究竟不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常常有人说，没有节制地使用武力，一方面侮辱和降低了被武力压迫的人，一方面也会使运用武力的人堕落。今天，印度高级官员——特别是印度文官——在精神和知识方面的逐渐堕落比其他任何事更突出。这种现象在高级官员中更为显著，在整个政府公务人员中像一条线一样贯穿着。当需要委任新人任高级职位的时候，总是任用那些最能代表这种新精神的人物。

我在九月四日突然从阿尔摩拉监狱中被释放出狱，因为消息传来说，我妻子的病况严重。她当时在德国许瓦尔茨华尔德的巴登威勒城就医。我得到通知，我的徒刑“停止执行”，我在徒刑满期前五个半月被开释。我坐飞机赶往欧洲。

欧洲当时很混乱，人们担心战争和动乱，经济危机常常出现。阿比西尼亚被侵，它的人民遭受轰炸。各种帝国主义制度互相冲突，彼此互相威胁。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出来维护和平和国际联盟公约，同时自己却轰炸和残酷地压迫自己属国的人民，而在这里黑森林中，一切都很宁静、和平。纳粹党的旗帜也不多见。我看着雾慢慢地布满了山谷，掩盖了远处的法国边境和景色，我很想知道雾后面是些什么。



五年后

五年半前，我坐在阿尔摩拉地方监狱的囚房中写完了我的自传的最后一行。八个月后，我在德国的巴登威勒城添写了后记。这本自传在英国出版后在各国受到各种读者的欢迎。我很高兴我所写的东西使印度跟国外的朋友更接近，使国外的朋友相当认识我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内在意义。

出版我的自传的书店老板最近要求我添写一章新的，使本书能包括一些最近的材料。他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不能加以拒绝。可是要答应他的要求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处在一个奇特的时代，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种更严重的困难。我的自传全部是在监狱里写的，跟外面的活动隔绝了。正如每个犯人一样，我在监狱中经历过各种心情，可是我逐渐养成一种自省的心情，心平气和。我现在如何能够恢复这种心情呢？我如何跟自传中所写的协调呢？我现在重新翻看这本书，我几乎觉得好像是别人写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一样。过去的五年改变了世界，并且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烙印。自然在生理方面我比以前老了些，我的心一再受了刺激，变得更坚强，或者说成熟了。我的妻子在瑞士死了，这结束了我生活中的一章，使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一部分。我很难认为她死了，我不容易使我自己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中，企图在工作中找到一点安慰，匆匆忙忙地往来

于印度各地。我有时跟广大群众在一起，积极活动；有时又感到孤寂，这种情形比早年更厉害。后来母亲的去世割断了跟过去生活的最后联系。我的女儿远在牛津读书，后来又在国外的一所疗养院里治疗。我在外边东奔西走后，很勉强地回到家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所没有人的屋里，甚至避免接见任何人。我跟群众打交道后，希望能够清清静静地生活。

可是在我的工作中，在我的心里，我都不能安静下来。我负担的责任常常使我感到极大的苦恼。我跟一些党派不能协调，甚至跟最亲密的同事也不协调。我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活动，我也阻止了别人随他们自己的意而活动。我产生了一种被压制和失望的心情，因此虽然广大群众来听我的講演，并且对我表示热情，可是我在公共生活中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人。

我比其他的人更受了欧洲和远东局势发展的影响。慕尼黑事件是一个很难忍受的打击，西班牙的悲剧更是我个人的痛苦。这些灾难的岁月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使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我对于世界光明前途的信心也随之而减少了。

大难竟然来到了。欧洲的火山在喷火和破坏。在印度，我坐在火山的边缘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会爆发。我很难勉强使自己不管当前的问题，养成一种回顾往事的心情，检查一下已经过去了的五年，平心静气地来写这五年中的事情。要是我能够这样做，我就得另外写一本厚书，因为要讲的事情实在太多。因此，我只想尽我的力量简单地讲一讲那些我曾经参加过的，或者曾经使我受过影响的事件和变化。

我的妻子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瑞士洛桑去世，当时我跟她在一起。不久以前，我得到了消息，说我第二次当选为印度

国大党的主席。不久我就搭飞机回印度。中途在羅馬停留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我动身前几天，我接到一封信，說当我中途經過羅馬时，墨索里尼先生很想跟我見面。尽管我很不贊成法西斯政权，在平时我可能願意會見墨索里尼先生，亲自看一看在世界事务中起这样重大作用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可是当时我不高兴接見什么人。特別使我担心的是，当时意大利还在繼續对阿比西尼亞打仗，我深怕法西斯党人会利用我跟墨索里尼的会晤进行宣傳。到了那时，即令我加以否認亦將于事無补。我还記得甘地先生在一九三一年經過羅馬时，“意大利日报”登載了一篇捏造的訪問記，硬說甘地曾經向該報記者發表談話。此外，我还記得有些訪問意大利的印度人被人違反了他們的意願利用来替法西斯宣傳。意大利方面向我提供保證，說不会發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墨索里尼先生的會見完全是私人的事。不过我仍然决定避免这种會見，因此向墨索里尼先生表示歉意。

但是我并不能避免路經羅馬，因为我坐的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要在羅馬停留一夜。我到羅馬后不久，就有一位高級意国官員來訪，邀請我当天晚上去見墨索里尼先生。这个官員對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告訴他我早已声明我有事不能跟墨索里尼先生見面。我們爭論了一个小时，一直到預定的見面時間。我終於胜利了，沒有去見墨索里尼。

我回到印度后立刻投入工作中。回国后不过几天我就主持国大党的年会。由于在監牢中过了几年，我跟局势的發展有点兒脫节，我發現国大党內部發生了許多变化，出現了新的分野，各派別的立場更鮮明了。存在着一种猜疑、激憤和冲突的气氛。我把这一切看得很輕鬆，我自信有应付这种情势的能力。在一个短时期

內，我似乎領導着國大黨向着我要求的方向走。可是我很快就認識這種衝突是根深蒂固的，很不容易消除彼此間的猜疑以及我們內部的憤激心情。我曾經鄭重考慮過想辭去國大黨主席的職務，但是一想到我辭職會使事情惡化，也就把辭職的事作罷了。

在以後的幾個月中間，我又一再考慮辭職的問題。我覺得很難跟國大黨領導機關中的同僚們順利地一起工作，很顯然，他們擔心我的活動。他們並不是反對某件特別的行動，而是不喜歡一般的趨勢和方向。他們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因為我的看法跟他們不相同。我完全服從國大黨的決定，可是我強調這些決定的某些方面，而我的同僚卻強調其他方面。最後我終於決定辭職，並把這件事通知甘地。我在給甘地的信中寫道：“從歐洲回來後，我發現工作委員會的會議把我弄得精疲力竭，傷了我的元氣，我幾乎有一種每經歷過一件新的事情後，年紀就老多了的感覺。如果工作委員會的同僚們也有這種感覺，我是不會奇怪的。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經驗，足以妨害有效的工作。”

以後不久在很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一件事——跟印度無關——大大地影響了我，使我改變原來的決定。這件事就是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發動叛亂。我認為這次叛亂有德國和意國在幕後支持，可能擴大成全歐洲的衝突，或者甚至成為世界衝突。到了那時，印度一定會被卷入衝突中去，在我們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時候，我不能由於辭職而削弱我們的組織，並引起內部的危機。我這樣分析形勢並不是完全錯誤的，雖然我言之過早，作結論太快，而這些結論要過幾年後才能實現。

西班牙戰爭使我更認識印度問題是跟其他世界問題相聯系的。我更加認識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歐、印度以及其他地

方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都是世界問題不同的表現。除非根本的世界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都不能根本解決。在取得根本解決以前，可能會發生騷動和災難。在今天的世界上，據說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自由也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部分自由，一部分不自由，這種情形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威脅，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的威脅。它們是雙生子，所不同的只是帝國主義在國外的殖民地和屬地中活動，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則以同樣的方式在本國內活動。如果要在世界上建立自由，不僅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必須滾蛋，帝國主義也必須徹底消滅。

不僅我對於外國的事情有這種看法，在印度還有其他許多人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樣的看法，甚至一般人也很感興趣。國大黨在全國各地組織各種會議和示威運動，向中國、阿比西尼亞、巴勒斯坦和西班牙的人民表示同情，因而使一般人經常注意世界情勢。我們並且曾經企圖運送藥品和食品到中國和西班牙去援助中國人民和西班牙人民。這種對國際事務更廣泛的關心，幫助提高了我們自己的民族鬥爭，減少了民族主義所經常帶有的狹窄性。

但是外國的事務並不影響每一個人，而每個人卻有他自己的苦惱。農民到處都是困難，他窮得要命，各種重擔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土地問題是印度的基本問題，國大黨逐漸制訂了一個關於土地問題的綱領。這個綱領雖然目標很遠大，可是承認現行的制度。產業工人的情形並不比農民好些，常常爆發罷工。關心政治的人在那裡討論英國議會強加在印度身上的新憲法。這個憲法雖然規定各省的一些權力，可是卻把實權保留在英國政府和它的代表的手裡。中央政府是一個聯邦，由封建和專制的各邦跟半民主

的各省共同組成，其目的在于永远保存英国的帝国主义統治。这个宪法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文件，絕對不能实行。这个宪法規定了人类智慧所能想出的各种办法来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国大党很憤慨地拒絕了这个宪法。事实上在印度几乎沒有人替宪法說好話的。

起初宪法中关于各省的条文付諸实施了。尽管我們拒絕了宪法，我們仍然决定参加竞选，因为参加竞选不仅可以使我們跟千百万选民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可以跟其他的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对我來講，大选是一件难忘的事。我本人不是候选人，我代表国大党候选人到全国各地活动竞选，我在竞选活动方面創立了一个紀錄。我在四个月中間足迹走遍了五万英里，用了各种交通工具，常常到沒有适当交通工具的偏僻农村中去。我旅行时坐飞机、火車、汽車、卡車、各种馬車、牛車、自行車、輪船、木船，有时也騎馬，騎大象或駱駝，有时也步行。

我随身帶着扩音器，每天参加十多次會議，發表演說，这不包括在路旁临时講話。有些大会有十万人参加，一般會議平均兩万人。每天来听我講話的人的总数常常达十万人，有时要多得多。粗略的估計，来听过我講演的人数总計不下一千万人，此外还有几百万人在我沿路旅行的过程中曾經跟我見過面。

我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从印度北部边疆到南部海岸，很少休息，当时的激动心情和热情支持着我。我的身体吃得消，这不免使我惊奇。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許多人支持我們。这种运动震动了整个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新生活的表現。對我們而言，这次运动不仅是竞选运动。我們所关心的不只是三千万选民，我們也关心几亿沒有选举权的人。

在这次广泛的旅行中，还另外有一方面的情形吸引了我的注意。对我来说，这次旅行帮助我認識印度，認識印度人民。我看到了我自己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尽管情况复杂，差别很多，可是却具有异中有同的印度的特点。我注視那帶着友誼神情望着我的千百万人，我設法了解他們心中想些什么。我对印度的地方看得越多，我就越感覺我对于印度的美丽和多样性知道得太少，需要我去了解的事情就越多。印度似乎常帶着微笑看我，有时嘲笑我，避开我。

有时(虽然很少)我也在百忙中抽出一天時間去參觀附近的名胜，如阿旃陀石窟，或印得斯山谷中的摩亨殊·达罗。在这种短短的時間中，我生活在过去的事物中間，我心中所想的是菩薩像和阿旃陀石窟的壁画中的美女。过了几天，当我看見妇女在田中劳动，或者在村中井边取水的时候，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她使我回想起阿旃陀的女人。

国大党在大选中胜利了。当时关于我們是否在省府中接受部長的职位問題曾經發生过激烈的爭論。最后决定这样做，不过有一个諒解，那就是总督或省長不得干涉。

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天訪問緬甸和馬來亞。这次旅行并不是假日旅行，因为每到一个地方都得見很多人，应付各种約会，可是換換地方总是好的。我很愉快地会見漂亮的、年輕的緬甸人民，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跟印度人不相同，印度人总帶有过去長期历史的痕迹。

我們在印度面临着新問題。在大多数省中，国大党政府上了台，許多部長过去坐过牢。我的妹妹維伽亞·拉克什米·潘迪特在联合省当了部長，她是印度的第一个女部長。国大党上台执政

后，在农村中馬上产生了一种轻松的情绪，仿佛放下了一个重担。全国出现了新气象，工人和农民希望馬上发生重大的事情。政治犯释放了，并且建立了过去所沒有的广泛的民权。国大党的部長們埋头苦干，并且也要求其他的人努力工作。可是国大党的部長們却得利用旧的政府机器，这种机器他們不能控制，而且对他們表示敌对态度。国大党部長曾經有兩次跟省長們发生冲突，提出辞职。結果省長接受国大党部長們的意見，危机因而結束。但是旧人員——政府人員、警察及其他——的势力和影响很大，他們有省長和宪法的支持，在各方面都能起大作用。因此进步很慢，人們产生了不滿情绪。

在国大党內部也表現出了这种不滿情绪，比較进步的分子躍躍欲試。我眼看着我們优良的战斗組織逐渐变成一个單純的竞选組織，感到不好过。爭取独立的斗争似乎不可避免，目前这种省自治只是暫时的局面，不久就会过去。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写信給甘地，对国大党部長們的工作表示不滿。我指出：“国大党的部長們过于迁就旧制度，并且努力辯护自己的这种作法。这种行为虽然不好，还可以容忍。而更坏的事却是我們正在失去我們辛辛苦苦在人民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我們墮落到普通政客的水平。”

也許我对于国大党部長們的要求过于苛刻。这种缺点大部分是当时的形势和环境所造成的。这些部長們过去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有很大成績。他們的工作受了一定的限制，而我們的問題却需要打破这些限制。他們作了許多好事，其中包括通过了土地法，大大地減輕了农民的負担，开始实行所謂基本教育，規定全国兒童，从七岁起到十四岁止，一律要免費受七年的强迫基本教育。这

种基本教育根据现代通过一行技能进行教育的办法，大大地减少了費用，但并不影响教育的效率。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要教育几千万兒童所需要的費用是一个大問題。这种制度使印度的教育起了革命，前途很有希望。

国大党政府也努力解决高等教育問題和公共衛生問題，可是在他們最后辞职时，这方面沒有多大的成績。成年人的識字教育，大力推行，产生了良好的結果。农村建設也受到很大的注意。

国大党政府的成績大有可觀，可是这些工作虽然做得好，并不能解决印度的基本問題。要解决这种基本問題就需要更深刻、更根本的改变，消灭保存各种既得利益的帝国主义制度。

因此国大党內部产生了稳健派和进步派間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召开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會議上第一次采取有組織的形式表現出来。这使甘地非常不好过，他在私人談話中强烈地表示过这种意見。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不贊成我以国大党主席的資格所采取的某些行动。

我認为我不能再繼續担任领导机关的負責人，可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足以促成危机爆發的事。我的国大党主席任期快滿了，到了那时，我可以靜悄悄地退出。我連續当了兩年的主席，一共三次。有人在那兒談論我会被选再任一次主席，可是我自己心中明白我不应当参加竞选。大約在这个时候，我玩了一个把戏，这件事很有趣。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加尔各答的“現代評論”报上發表，沒有署名。这篇文章反对选举我連任国大党主席。沒有人（甚至該报的編輯在內）知道这篇文章是誰写的。我看我的同事們和其他的人的反应，很有兴趣。对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曾經有过各种想入非非的猜測。約翰·根室在他的“亞洲內幕”一書中提到这件事以

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苏巴斯·鲍斯被选为下一次在哈里浦拉城召开的大会的主席。不久我就决定到欧洲去。我想看看我的女儿，可是真正的原因却是让我疲倦惶惑的心吸收点新鲜空气。

但是欧洲并不是一个和平考虑问题的地方，也不是光明照耀黑暗心境的地方。那兒有的是阴沉气氛和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欧洲，尼维尔·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风行一时，一些国家被出卖了，被摧毁了，终于要演出在慕尼黑所筹划的一幕。我直飞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走进了乱纷纷的欧洲。我在巴塞罗那住了五天，每天晚上看见炸弹从天空中落下来。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东西。在贫乏、破坏和日益接近灾难的环境中，我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安心。那兒有光明——勇敢、决心和作点有意义的事的光明。

我在欧洲住了一个月，遇见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人。我觉得一般人发生了变化，一种向正确方向走的变化。可是上层没有什么变化，张伯伦主义在上层仍然是声势赫赫。接着我去捷克斯洛伐克，实地观察出卖朋友、出卖自己根据最高的道德理由所主张的事业这种困难、复杂的把戏。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我从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方观察这种把戏，得出许多奇怪的结论。最使我惊奇的是所谓进步人士和进步派别在危机中完全倒台了。日内瓦给我一种考古遗物的印象，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都在日内瓦，而这些组织现在都寿终正寝了。伦敦因为避免了战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外就不大关心其他的事了，别人付出了代价，这无所谓。可是不到一年，那就很关重要了。尽管有人抗议，那时却仍是张伯伦先生得势的时候。巴黎使我很难过，特别是巴黎的中产阶级使我难过，

巴黎的中产階級甚至沒有很好地抗議过。这就是全世界自由的象征——革命的巴黎！

我从欧洲回来，心中十分难过，許多幻想破灭了。在归国途中我在埃及停了一些时候，受到华夫脫党領袖的热烈欢迎。我很高兴又一次会見他們，根据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討論我們兩国的共同問題。几个月后，华夫脫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印度訪問我們，并且参加了我們国大党的年会。

印度的老問題和冲突仍然存在，我仍然遇到如何跟同事們協調的困难。看到許多国大党人在世界大变动的前夕仍然糾纏于琐碎的斗争，实在使我难过。可是上層国大党人士却有相当的認識。在国大党外，情形就更糟糕。教派間的斗争發展了，形势很紧张；在真納先生領導下的穆斯林联盟日益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心胸狹窄，繼續走一条令人驚訝的路綫。沒有建設性的建議，甚至不准备讓步妥协，对于自己的要求如何滿足的問題，也沒有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仇恨、暴力的消極綱領，令人回想起德国納粹所采用的方法。特別令人难过的是教派組織日益發展的下流行为影响了公共生活。当然也有一些伊斯蘭教組織和很多的伊斯蘭教人士不贊成穆斯林联盟的活动，并且支持国大党。

穆斯林联盟执行这条路綫，就不可避免地一天比一天走入歧途，到后来就公开反对在印度实行民主，甚至主張瓜分印度。英国官員鼓励他們这种荒謬的要求，因为英国官員想利用穆斯林联盟和其他一切破坏力量，以圖削弱国大党的影响。当时有一种明显的說法，認為小的国家除了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一部分外，在世界上就沒有更多發展的余地，就在这个时候提出分裂印度的要求，实在令人震惊。也許他們的这种要求并不認真，但是这种要求

是真納先生所主張的建立兩個國家的理論的必然結果。教派主義的新發展跟宗教分歧很少關係。這種宗教分歧是可以解決的。教派主義的新發展實際上是主張建立一個自由、統一和民主的印度的人跟那些在宗教的外衣下面，企圖保存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反動封建分子之間的政治鬥爭。各種宗教信仰的人這樣信奉宗教和利用宗教，在我看來是很不幸的，而且阻礙了社會和個人的進步。宗教本來應當提倡精神生活和友愛的感情，現在變成仇恨、心胸狹窄、卑鄙的泉源，變成最低下的唯物主義。

在一九三九年初的主席選舉中，事情就在國大黨內部露了頭。艾卜勒·凱拉姆·阿薩德大毛拉不肯參加競選，結果蘇巴斯·鮑斯當選主席。這引起了許多糾紛，經過幾個月還沒有能夠解決。在特里浦里大會上發生了不堪入目的場面。我那個時候的情緒很低，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就很可能不拖倒。政治事變，國內和國際間所發生的事情，當然影響了我，可是近因卻跟公共事務無關。我對自己不滿。我在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上這樣寫：“我很少使同事們滿意，可是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我更少使我自己滿意。像這樣的人不可能希望他發揮領導作用。我的同事們如果能早些認清這點，那就對於他們，對於我都更好些。心還在有效率地起作用，智力照舊行事，可是給心和智力以生命力的泉源似乎快干枯了。”

蘇巴斯·鮑斯辭去主席的職務，建立前進集團，作為跟國大黨競爭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過不好久就無聲無息了，這是必然的現象。可是它加強了破壞的傾向，促進分化。冒險家和機會主義分子在漂亮詞句的掩蓋下提出自己的政綱，這不禁使我回想起納粹在德國上台的情形。他們的辦法是提出一個綱領，爭取群眾的擁護，然後利用這種擁護去進行目的完全不同的事。

我故意不参加国大党的新领导机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并且有许多已经作了的事情我都不喜欢。甘地因拉吉科脱事件而绝食，以及其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大伤脑筋。我当时写过这样的话：“在拉吉科脱事件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增加了。我不能在我所不了解的地方工作，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逻辑一点也不了解。”我紧接着加以补充，“摆在我們许多人面前的选择是更加困难了。这里谈不上左或右，甚至政治决定的问题。所能选择的只是盲目不加思索地接受有时互相抵触并且没有逻辑关联的决定，否则就表示反对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些办法没有一个是可取的。不加思索地接受自己不知道、不愿意表示同意的事情，结果必然产生知识上的软弱和麻木。绝不能在这种基础之上进行任何伟大的运动，当然民主运动更不能在这种基础之上进行。如果反对的行动削弱了自己，帮助了敌人，那么要进行这种反对行动就很困难。不采取任何行动必然产生失望焦躁和其他各色各样的情绪，因为当时正是各方面要求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

我在一九三八年底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就有两种其他的活动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主持在卢德希那召开的全印各邦人民代表会议，因而跟半封建的印度各邦的进步运动发生了更亲密的关系。大多数印度各邦酝酿着各种行动，有时引起人民团体跟当局的冲突，而英国军队总是支持当局。关于这些土邦的情形以及英国政府在保卫中世纪残余势力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写文章时很难压制自己的感情，采用含蓄的词句。最近有一个作家很有道理地称这些残余势力是英国在印度活动的第五纵队。有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想站在人民这一边，实施切实的改革，可是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干涉。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够执行第五纵队的任务。

事情很明白：五百五十多个土邦不能够各自作为政治或經濟的單位而活动。它們不能在民主的印度内部保留封建的地盤。一些大的土邦可能成为民主單位，参加联邦机构，其他一些邦則必須全部合并。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土邦的制度必須取消，英帝国主义消灭后这种制度就会跟着消灭。

我另外还担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委员会是在国大党倡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并且取得了省政府的合作。随着我們工作的展开，委员会一天比一天扩大，到后来几乎包括全国活动的各方面。我們指派了二十九个小组委员会研究各类問題，如农业、工业、社会、經濟、財政等，使这些活动互相配合，以便替印度訂出计划經濟的计划。我們所拟訂的计划只能是一个大綱，詳細內容有待將來补充。计划委员会現在仍然在工作，还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对于我，这种工作是一件很有兴趣的工作，我从其中学得了很多东西。事情很明白，不管我們訂出什么计划，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印度国家里我們才能实行这种计划。任何切实的计划必然涉及經濟机构的社会主义化問題，这也是很显而易見的事。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去錫蘭作了短期訪問，因为那里的印度居民跟政府之間的摩擦在發展中。我很高兴重新回到这个美丽的島。我这次訪問替印度和錫蘭之間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打下了基础。我受到了各种人士的热烈欢迎，包括政府中的錫蘭人在內。我不怀疑，在任何未来的制度中，錫蘭和印度應該携手合作。我个人对于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認为將來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緬甸和錫蘭，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如果实现天下一家的話，那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

一九三九年八月間歐洲的局勢很危急，我不想在有危機的時候離開印度。可是我很想訪問中國，就是短期去看一看也好。因此我坐飛機去中國，兩天就到了重慶。可是不久我就得匆匆忙忙地趕回印度，因為歐洲終於發生了戰爭。我在中國的自由區不到兩個星期，可是無論就我個人而言，或就印中兩國的未來關係而言，這兩個星期都是值得紀念的。我很高興發現中國的領袖，特別是成了中國團結與決心爭取自由的象徵的偉人充分同意我認為中國和印度應當更加接近的主張。我跟蔣介石元帥和蔣夫人見面多次，討論我們兩個國家的現在和未來。我回到印度後比以前更敬愛中國和中國人民，我想不到有任何不幸的命運能夠摧毀這個有古老歷史而現在又很年輕的民族的精神。

戰爭和印度。我們怎麼辦呢？在過去的年歲里我們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並且宣布了我們的政策。儘管這樣，英國政府不跟印度人民商量，也不跟中央聯邦院或省政府商量就宣布印度是一個交戰國。這是一種欺負人的行為，不能輕易放過，因為這種行動表明帝國主義仍然像過去一樣活動。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發表一篇很長的聲明，說明我們過去和現在的政策，要求英國政府說明它的戰爭目的，特別是有關英帝國主義的問題。我們常常責難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可是我們更加關心這個控制我們的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會滾蛋嗎？他們承認印度的獨立嗎？承認印度有權通過制憲會議制訂自己的憲法嗎？他們準備馬上採取什麼步驟實現由民眾控制中央政府呢？後來，考慮到少數派各種可能的反對意見，還更進一步充實了關於制憲會議的想法，聲明關於少數派的要求應在制憲會議中取得有關的少數派的同意後予以解決，而不是由多數票決定。如果有任何問題不能獲致協議，

就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一个公正的机构作出最后决定。从民主的观点而言，这种建议是不妥善的，可是国大党准备作任何让步以平息少数派的猜疑。

英国政府的答复是很明白的。他们不准备说明他们的战争目的，也不准备把政府的控制权移交给人民的代表。旧制度将继续下去，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必须加以保护。各省的国大党部长们提出辞职，因为他们不准备根据这些条件跟英国政府合作，进行战争。政府停止了宪法，重新建立专制统治。在西方国家里民选的国会跟国王的特权之间曾经发生过有关宪法的冲突，并且为了这种冲突在英国和法国有两个国王掉了脑袋。这种冲突在印度出现了，不过问题更复杂些，不仅是为了宪法。火山还没有爆发，可是火山在那儿，而且还可以听见地下的隆隆声。

僵局仍然存在，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新的紧急法令，更多的国大党人以及其他人士被捕。群情愤慨，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但是鉴于战争发展的情形，以及英国处境的危险，我们不禁犹豫起来，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忘记甘地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的目的不应当是在敌人困难的时期去跟敌人为难。

随着战争的发展，新问题出来了，或者一些老问题采取了新形式，旧的结合似乎在改变中，旧的标准似乎在消失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适应很困难。苏联跟德国缔结了条约，苏联侵入芬兰，苏联对日本表示友好。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则？有没有行动的标准？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临机应变？

四月间发生了挪威战役的惨败。五月间，荷兰和比利时受尽了苦难。到了六月间，法国崩溃了，名城巴黎——自由的摇篮——倒了下去，被人征服了。法国所遭受到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尤

其糟糕的是精神上的屈服和墮落。除非內心里腐敗了，怎么会發生這種事，我實在有點奇怪。是否由於英法兩國是舊制度的傑出代表，而這種舊制度必然要消滅，因此這兩個國家不能夠支持？是否因為帝國主義雖然表面上給它們以力量，實際上卻在這種性質的鬥爭中削弱了它們的力量？如果它們自己否認自由，它們就不能夠為自由而戰。它們的帝國主義就會變成恬不知耻的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就發生了這種事。尼維爾·張伯倫先生的陰影和他的老政策仍然籠罩着英國。英國封閉了中緬公路以綏靖日本。在印度沒有一點改變的暗示，我們的自我約束被解釋成我們無力採取有效的行動。英國政府這樣沒有眼光，真使我吃驚，他們完全不認識時勢的趨向，不了解正在發生中的事變，不能夠使自己適應這種事變。在國際事件中，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有了因，就必然產生果，一種不能再發生好作用的制度甚至不能好好地保衛自己，這難道是自然的規律？

如果英國政府認識遲鈍，甚至不能夠從經驗中吸取教訓，我們對印度政府能夠說什么呢？這個政府的作風真是又可笑，又可憐，因為不論是邏輯和理智，或危機和災難都不能動搖它長期的自滿。他們像里普·范·溫克爾[⊖]那樣，張着眼睛在西姆拉山上睡覺。

戰爭形勢的發展向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提出了新問題。甘地要求工作委員會把非暴力原則（我們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堅持這個原則）擴大到一個自由國家的活動中。一個自由的印度應該依靠這種原則，保衛自己，防止內部的混亂和抵抗外來的侵略。就我們而言，當時還不發生這個問題，可是甘地卻注意這個問題，他認為

⊖ 美國十九世紀作家華盛頓·伊爾文短篇小說中的主角。——譯者

明确地说清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们每个人深信我们在斗争中应当坚持非暴力主义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一向就是如此。欧洲的战争加强了这种信念。可是要未来的国家确守这种原则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实在不容易说。

甘地先生认为(也许有道理)他不能够放弃或缓和他为全世界所提出的使命。他应当自由行事，而不应该由于一时政治上的考虑而畏缩不前。这样他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各走各的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没有跟他决裂，因为联系很密。甘地也会继续在各方面出主意，并时常加以领导。不过，也许真是由于甘地部分地退出，我们的民族运动史上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在近年中，我发现他坚强了一些，他所具有的适应性减少了。可是他仍然保有过去的吸引力，旧时的魔力仍然存在，他的人格和伟大超过其余的一切人。人们千万不要认为甘地对于印度千百万群众的影响减低了。二十多年来他是印度命运的建筑师，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在过去几星期中，国大党根据拉贾戈帕拉查里的倡议，又一次向英国提出建议。拉贾戈帕拉查里在国大党中被认为是右派。他的才华，他的无私品格和他敏锐的分析能力，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当国大党政府在马德拉斯执政时，他任首席部长。他急欲避免冲突，提出一项建议，他的一些同事几经踌躇才加以接受。这个建议规定英国承认印度的独立，在中央立刻建立一个全国的临时政府，向现在的联邦院负责。如果这点办得到，这个政府就可以接管国防，协助作战。

这个国大党建议是切实可行的，而且马上可以实行，不至于打乱其他任何事。这个建议中的全国政府必然是一个由各方面共同

組成的政府，各少数派都有充分代表。这个建議是一个稳健的建議。从国防和从事战争的观点来看，任何認真的努力必須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有机会办到这点，帝国主义是办不到的。

但是帝国主义的想法不同，它認為它可以繼續存在，威胁人民服从它的意志。如果涉及放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对印度的控制，甚至在有危險威胁的时候，帝国主义也不准备取得这方面的切实帮助。帝国主义如果在印度和帝国的其他部分作得对，它就会获得道义的威信，但是甚至对这种威信它也不在乎。

今天——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当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总督把英国政府的答复交给了我们。所用的仍然是帝国主义的語言，内容一点也沒有改变。在印度，在欧洲，在全世界，時間都很短促。

我的許多同事又重新回去坐牢，我有点兒羡慕他們。也許在被监禁的孤独生活中比在战争、政治、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这种乱紛紛的世界中更容易認識生命的有机意义。

但是有时也可以逃避現在这个世界。我上月回到一别二十三年的克什米尔去。我在克什米尔只住了十二天，可是这十二天真是美好的十二天，我尽情享受这个可爱地方的景色。我漫游山谷和高山，还走过了一条冰河，我覺得生活是有价值的。

賈瓦哈拉尔·尼赫魯

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于阿拉哈巴城



附 录

(一) 独立日誓詞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們認為享受自由，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并且具有生活必需品，以便有充分發展的机会，这是印度人民（正如其他人民一样）不容侵犯的权利。我們也認為如果政府剝夺了人民的这种权利，压迫人民，那么人民就更有权更动这个政府，或者打倒这个政府。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剝夺了印度人民的这种权利，而且把自己建立在剝削群众的基础上，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精神方面摧殘印度。因此我們認為印度必須跟英国断絕关系，完全独立。

印度在經濟方面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政府从人民手中所取得的稅收是人民的收入所不能負担的。我們每天的平均收入只有七派士（不到两个便士），在我們所繳付的重稅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农民繳納的土地稅，百分之三是鹽稅，而鹽稅对于貧民是很重的負担。

农村中的工業（例如手工紡紗）被消灭了，使农民一年中至少有四个月無事可做，由于缺少手工業，农民的智力迟鈍了，而且像在別的国家里一样，沒有什么事業去代替那些被摧殘的手工業。

關稅和通貨的各种規定更加重了农民的負担。我們的进口貨物大部分是英国貨。關稅显然优待英国貨，關稅的收入並沒有用来減輕群众的負担，而是用来供养一个鋪張浪費的政府。关于匯兌率的規定更是独断專行，結果使印度的錢財大批向外流。

在政治方面，印度的地位从来沒有像現在处在英国統治下这样低，沒有任何改革使人民真正获得政治权力。我們中間地位最高的人也得在外国当权者的面前低头。我們被剝夺了自由發表意見，自由結社的权利，我們許多同胞被迫在国外过流亡的生活，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一切行政人材被埋沒了，群众只好滿足于乡村中的小职位和文書的职务。

在文化方面，教育制度把我們弄得糊里糊塗，失去了方向，我們所受的訓練要我們死心塌地地承受壓迫。

在精神方面，強迫解除軍備的結果使我們喪失了勇氣。此外，外國占領軍駐在印度，被用來摧毀我們的抵抗精神，並且獲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一切使我們認為我們不能夠照料自己，不能夠防禦外國的侵略，甚至於不能夠保護我們自己的家，去對付小偷、強盜和匪徒的進攻。

我們認為，如果對給我們國家造成這四方面災難的統治者繼續表示屈服，那就是對人類、對上帝的罪行。可是我們認為爭取自由的最有效方法不在於採取暴力。我們決定竭力撤銷跟英國政府的自願聯繫，準備開始和平抵抗運動，包括抗稅運動在內。我們深信只要我們撤銷我們的自願幫助，停止納稅，甚至在被人挑釁時也不採用暴力行動，那么就一定能夠取消這種不人道的統治。因此我們莊嚴地決定執行國大黨為實現完全獨立所隨時發出的指示。

(二) 關於和平條件的建議

——在耶拉伏達監獄中的國大黨領袖們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致函
德吉·巴哈杜爾·薩普魯爵士和姆·爾·杰雅克爾先生，提出
關於實現和平的條件——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對你們謀求英國政府與國大黨獲致和平解決的努力，深為感激。我們仔細研究了你們與總督來往的信件，跟你們進行了多次的談話，並且在我們內部進行了討論，我們所得的結論是：為我們的國家爭取一個光榮解決辦法的時機還沒有成熟。雖然群眾的覺悟在過去的五個月中間表現了驚人的提高，代表各種信仰的各階級和各階層的人民所受的痛苦雖然很深重，我們認為這種痛苦還不能馬上結束。不用說我們絲毫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和總督的意見，認為和平抵抗運動使國家受了損失，認為和平抵抗運動所選擇的時期不好，是違反憲法的。英國的歷史上充滿了流血反抗的例子，英國人對於這種反抗行動稱贊不絕，並且教育我們採取同樣行動。因此總督或任何有見識的英國人指責這種無論在意圖或實行方面都是很和平的反抗行動，實在說不過去，但是對於當前和平抵抗運動的指責，不論來自官方或非官方，我們不想爭辯。我們認為群眾對於和平抵抗運動的熱烈響應，就足以充分說明問

題。在这里所要談的問題，就是我們高兴地与你們一致希望(假如可能的話)結束或暫時停止和平抵抗运动。要我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必要地去冒坐牢、挨打或更不幸的事的危險，因为这对于我們來說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此當我們向你們保證，并且通过你們向总督保證，說我們將用尽一切方法来探索导致光荣和平的每一个途徑时，你們可以相信我們的話。不过我們得承認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征象。我們还没有看到英国官方改变他們的看法，接受由印度人决定印度事务这种意見。我們不相信官方所說的他們居心很好的說法。英国人对于我們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进行了長期的剝削，他們几乎看不见这种剝削使我們的国家在道德、經濟和政治方面遭受的摧殘。他們不肯承認目前他們必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再騎在我們的头上，弥补过去的錯誤，帮助我們从一百多年英国統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中解脫出来。

但是我們知道你們以及一些有知識的印度人跟我們的想法不同。你們認為無論如何已經發生了变化，有理由去参加建議中的會議。尽管我們的工作受到限制，我們願尽我們力之所能及，同你們合作。

下面就是我們在目前处境中对于你們的友好努力所能提出的最大限度的答复：

(一)我們認為总督关于會議問題給你們的回信，措辞含糊，不能够使我們根据去年拉合尔會議所規定的要求来判断总督回信的价值。同时我們在沒有把問題提交国大党工作委員會正式會議(必要时，提交全印度国大党委員會)以前，我們也不能表示任何負責的意見。不过我們可以表示我們個人的意見，除非具备下述的条件，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令人滿意。

(1)承認印度自由脫离英帝国的权利；

(2)允許印度建立完全的国民政府，对印度人民負責，并且应当有控制国防部队和經濟的权力；承認甘地在給总督的信中所提出的十一点；

(3)印度有权在必要的时候把国民政府認為不合理的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包括印度的“公共債務”在內)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

(注：在政权移轉期內，根据印度的利益所必需的調整，应由印度选出的代表决定。)

(二)如果英国政府認為上述的条件可行，并且根据这些条件發表一个令人滿意的声明，我們願意向国大党工作委員會建議中止和平抵抗运动，即

中止为了抵抗而抵抗某些法令。但是和平抵制外国布和酒的运动仍将繼續进行。只有在政府自己能够禁止酒和外国布时，才能取消这种运动。老百姓仍然可以繼續制造鹽，鹽法中所規定的处罰条款不予执行，不得搜查政府或私人的鹽庫。

(三)在和平抵抗运动中中止时，应同时办理下述各事：

(1)釋放一切沒有从事暴力行为或煽动暴力行为的因参加坚持真理运动而被捕的人以及其他政治犯，不管这些人是否已經被判了刑或者仍然在审讯中；

(2)發还根据鹽法、报纸管理法、稅收法等所沒收的财产；

(3)因参加坚持真理运动而被判刑的人所繳的罰金和保證金，以及根据报纸管理法所繳的罰金和保證金应予發还；

(4)在和平抵抗运动期內辞职或被解职的全部官員，包括乡村中的官員在內，凡願意恢复旧日工作的人，应讓他們复职；

(注：上述条文也同样适用于不合作运动期內。)

(5)总督所頒布的各种紧急法令应予廢止。

(四)关于會議的組織，以及国大党出席这次會議的代表团等問題，只有在上述先决条件获得圓滿解决后才能决定。

穆狄拉尔·尼赫魯

摩·卡·甘地

薩罗基尼·奈都

瓦拉拜·巴特尔

吉拉达斯·陶拉特拉姆

賽德·馬茂德

賈瓦哈拉尔·尼赫魯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于耶拉伏达中央監獄

(三)紀念的決議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們这些……公民，在这里对那些参加爭取独立的偉大斗争并自己忍受

痛苦和牺牲以求祖国自由的印度儿女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经常鼓舞我们，向我们指出高尚目标和努力的出路的伟大的、敬爱的领袖圣雄甘地，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些为了自由贡献出自己生命的几百个英勇青年，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白夏华、整个边省、绍拉浦、米德那浦区和孟买的烈士们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些受过敌人野蛮棍打的成千上万的人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些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拒绝向自己的同胞开枪或采取其他行动压迫自己同胞的加瓦利团的士兵，以及政府军警中的印度人，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面临各种恐怖行为而丝毫不动摇、不退缩的古甲拉特地区的英勇农民，向印度其他地方不顾一切摧残压迫，积极参加斗争的长期受苦受难而继续坚决奋斗的农民，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些不顾自己的损失，支持民族斗争，特别是抵制外国布和英国货的斗争的商人和其他商业界人士，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坐过牢，受尽痛苦，并有时在牢里挨过打的十万人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向那些像真正的印度战士一样，不顾名利，一心只想到他所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在各种痛苦和困难中坚持和平工作的志愿队员，表示我们的感佩心情。

我们在这里向印度的妇女表示我们的敬意和钦佩，她们在危急的时候，为了祖国，抛弃了家庭，勇敢地、坚持地跟男子一起，站在印度民族斗争的前线，共同牺牲，共同取得斗争的胜利；我们以我国的青年和“民族大军”而自豪，他们年纪虽轻却参加了斗争，有些人并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了性命。

印度大大小小的阶级和各种人士大家一起进行伟大的斗争，为了共同事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人士——伊斯兰教人士、锡克教人士、拜火教人士、基督教人士以及其他人士表示感谢，他们由于勇敢和对祖国的忠诚，共同建立了一个团结的、不可分离的国家，对于胜利抱有信心，对于赢得并维护印度的独立具有决心，并且决心利用这种新的自由使印度各阶级的人士摆脱枷锁和不平等的地位，并借此促进更伟大的人类事业。在我们面前有了为印度事业忍受痛苦和牺牲的光荣的和令人鼓舞的榜样，我们重申我们争取独立的誓词，我们决定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印度完全取得了自由为止。